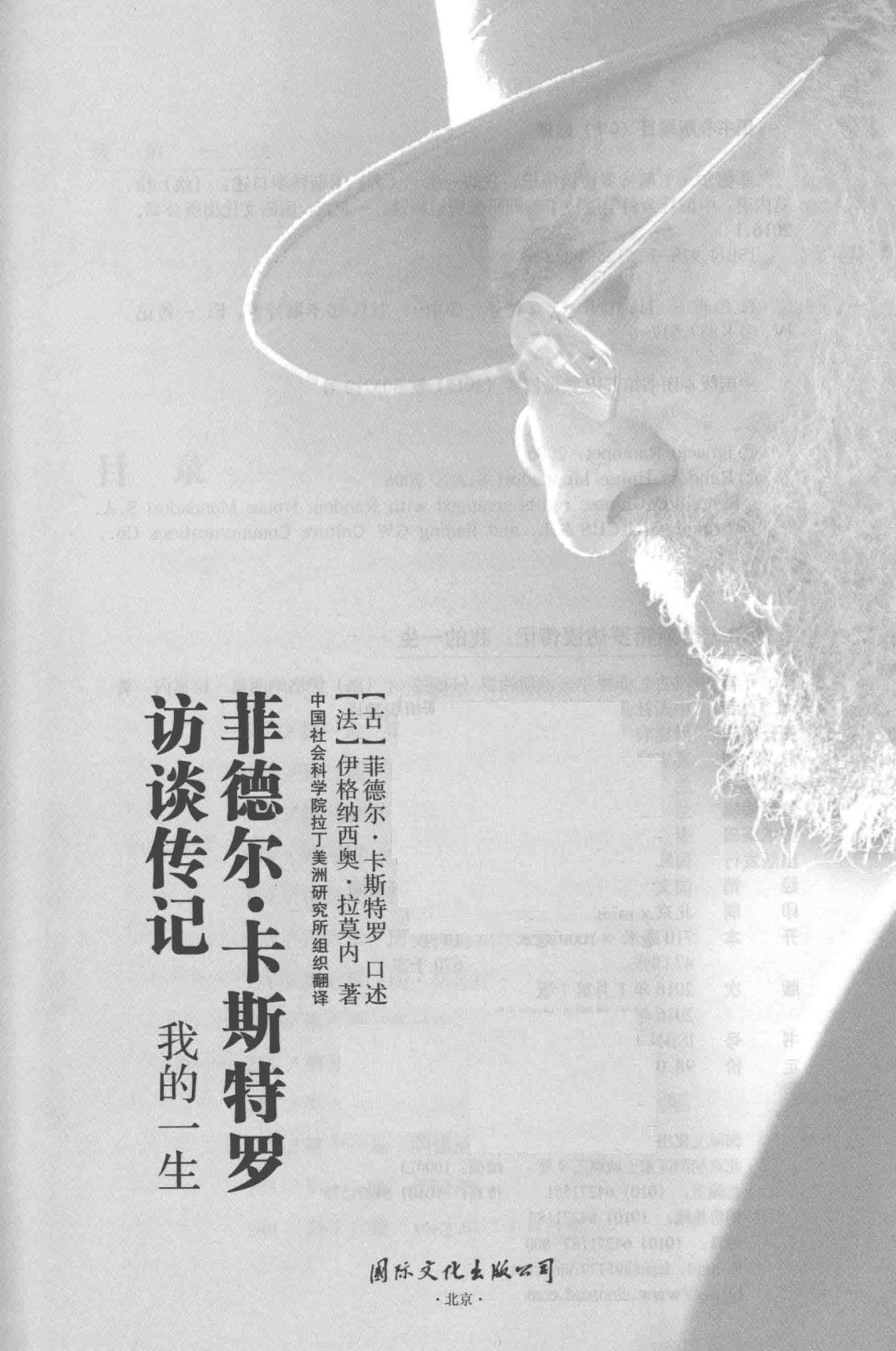




【古】菲德尔·卡斯特罗 口述
【法】伊格纳西奥·拉莫内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织翻译

菲德尔·卡斯特罗 访谈传记 我的一生

卡斯特罗唯一授权出版的回忆录
书中附有多幅珍贵的历史照片



菲德尔·卡斯特罗 访谈传记 我的一生

〔古〕菲德尔·卡斯特罗 口述
〔法〕伊格纳西奥·拉莫内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织翻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菲德尔·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 / (古) 卡斯特罗口述，(法) 拉莫内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织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6.1

ISBN 978-7-5125-0828-6

I. ①菲… II. ①卡… ②拉… ③中… III. ①卡斯特罗, F. —传记
IV. ① K837.51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3212 号

© Ignacio Ramonet, 2006

© Random House Mondadori S.A., 2006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with Random House Mondadori S.A. through SINICUS S.L. and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菲德尔·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

作者 (古) 菲德尔·卡斯特罗 (口述) (法)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 著
译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织翻译
责任编辑 潘建农
总策划 葛宏峰
统筹监制 兰青
策划编辑 兰青 周金稳
美术编辑 秦宇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47 印张 67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828-6
定 价 98.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 64271551 传真：(010) 64271578

销售热线：(010) 64271187

传真：(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引言

对菲德尔·卡斯特罗一百小时的访谈

已经是清晨两点了，我们连续几小时地交谈着，地点是他的私人办公室。办公室简朴、宽敞，屋顶很高，几扇大窗户都被淡色的窗帘遮掩着。窗外是一个大阳台，从那里可以远远辨认出哈瓦那最主要的街道。房间的尽头是一个很大的书库，有一张结实的、摆满了书籍文件的长桌，一切井井有条。在书架和沙发两旁的小桌上，分别放着先哲何塞·马蒂（José Martí）的一尊铜像和一座半身塑像、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和安东尼奥·何塞·苏克雷（Antonio José Sucre）的雕像，以及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半身塑像。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可以看见用金属丝做成的、骑在罗西南特（Rocinante）背上的堂吉诃德（Don Quijote）塑像。各面墙上除了挂着作为马埃斯特腊山（Sierra Maestra）时代主要助手之一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Camilo Cienfuegos）的油画肖像外，另外还有三个镜框，分别装着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José Bolívar）的一封亲笔信、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题赠的照片，照的是一条硕大的箭鱼，题辞写道：“赠菲德尔·卡斯特罗博士，愿您在科希马尔（Cojímar）的深海里也扎中一条这么大的鱼，您的朋友欧内斯特·海明威赠”，以及1895年从遥远的加利西亚故乡来到古巴的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父亲安赫尔（Angel）先生的肖像。

菲德尔坐在我面前，身躯高大，胡子几乎花白，身着一如往常的橄榄绿军装；尽管夜深了，他却没有显露一丝疲劳，平静地回答着我的问题。有时他的声音轻微得像风的细语，我勉强能听清。2003年1月，我们开始了第一次交谈，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我数次回到古巴，又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交谈，直至2005年12月。

关于对话的想法是一年以前，即2002年2月产生的。当时我来到哈瓦那在书展上做一个报告，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也在场。菲德尔把他介绍给我并说：“他是经济学家，美国人，但他是我见过的头号激进分子。在他的身边一站，我倒像个温和派了。”我们开始谈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问题和我刚参加过的、在巴西阿莱格雷港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菲德尔对会议上引起争论的议题、专题讨论、参加者、前景等一切都想了解。他表达了对“变革世界运动”的敬意：“现在出现了新一代反叛者，他们中有很多美国人。他们利用了一些新的、不同以往的抗议形式。他们使世界的主子感到战栗。思想比武器更重要；除暴力以外，我们应该用一切方式来对抗这个全球化。”

像以往一样，菲德尔思绪如泉涌。他具有世界眼光。他分析全球化、全球化的后果及针对这些后果的办法。他那些既现代又精明的论证，充分表现出一种战略眼光、评价具体事物及迅速做出分析的能力，他的许多传记作者都曾指出过他的这些素质。除了这些素质之外，还要加上他在长期的抵抗和斗争中积累的经验。

我边听他说话，边想到，年轻的一代并未充分了解他的经历，许多人沦为持续不断复古宣传的无辜牺牲品，“变革世界运动”中许多朋友，特别是欧洲更年轻的一代有时只把他看作一个“冷战”时代的人物、一个当代史上已过去阶段的领导人、一个很难对21世纪的斗争有什么贡献的人物。

今天，说起古巴政权，许多人感到害怕、对之持批评态度和反对立场，

包括左派内部的一些人。尽管古巴革命仍然能激发热情，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使人们意见不合与分裂的议题。无论在支持古巴还是反对古巴的人群中，能够在评价古巴时严肃、冷静发表意见的人越来越少。

当时刚出版了一本我与马科斯副司令——墨西哥萨帕塔运动的星外来客式的浪漫英雄——访谈的小书。菲德尔读了这本书并且很感兴趣。我向古巴司令建议搞一个类似的、但规模更大的访谈。菲德尔没有写过自传式回忆录，而且可以肯定，出于时间的原因，他也不会写了。因此，我们的这一本可以成为一种“两人交谈出来的传记”：这是一份政治遗嘱，是他即将年满八十高龄时的个人经历总结；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菲德尔的公众生涯始自1953年进攻古巴圣地亚哥蒙卡达兵营——而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能幸运地在有生之年成为历史人物和传说人物的人并不多，菲德尔是其中之一。他是国际政治中最后一个“神圣怪物”（monstruo sagrado）。他属于那一代传奇的造反者：曼德拉（Nelson Mandela）、胡志明（Ho Chi Minh）、卢蒙巴（Patricio Lumumba）、阿米尔卡尔·卡布拉尔（Amílcar Cabral）、切·格瓦拉（Che Guevara）、卡洛斯·马里盖拉（Carlos Marighela）、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图西奥斯·利马（Turcios Lima）、迈赫迪·本·巴尔卡（Mehdi Ben Barka）。他们都怀着正义的理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投身政治，踌躇满志、满怀希望，试图改变早期苏美冷战时代那个不平等和歧视人的世界。像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甚至包括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人——一样，这一代人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预示着光辉灿烂的未来，相信非正义、种族主义及贫穷都能在十年的时间里从地球上消失。

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在越南、阿尔及利亚，还是在几内亚比绍，半个地球上的被压迫民族都在造反，人类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处在无耻的殖民主义阴影下，在整个非洲和亚洲的一大片土地上，人民还忍受着老西方帝国的统治和欺辱，在理论上已经独立了一个半世纪的拉丁美洲，人民忍受着少数特权者的暴政，经常被华盛顿庇护之下的凶残独裁者，如古巴的巴蒂

斯塔 (Batista)、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鲁希略 (Trujillo)、海地的杜瓦利埃 (Duvalier)、尼加拉瓜的索摩查 (Somoza)、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 (Stroessner 又译史托斯纳尔)……套上沉重的枷锁。

听了我的建议，菲德尔半开玩笑地露出一丝笑容。他用深邃狡黠的眼光望着我，不无讽刺地问：“您真的愿意浪费时间与我聊天吗？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可干吗？”我当然回答他说“没有”。全世界有几十个记者，包括最负盛名的记者，一年年等待着与菲德尔交谈的机会。对于一个职业新闻工作者来说，还有比采访菲德尔更重要的对话吗？他是 20 世纪下半叶和 21 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

菲德尔·卡斯特罗难道不是执政时间最长的国家元首吗？他曾与整整十个美国总统斗争：艾森豪威尔 (Eisenhower)、肯尼迪 (Kennedy)、约翰逊 (Johnson)、尼克松 (Nixon)、福特 (Ford)、卡特 (Carter)、里根 (Reagan)、老布什 (Bush Padre)、克林顿 (Clinton)、小布什 (Bush Hijo)。他曾与左右过 1945 年后世界进程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尼赫鲁 (Nehru)、纳赛尔 (Nasser)、铁托 (Tito)、赫鲁晓夫 (Khrushchev)、奥洛夫·帕尔梅 (Olof Palme)、艾哈迈德·本·贝拉 (Ahmed Ben Bella)、胡瓦里·布迈丁 (Houari Boumediene)、亚西尔·阿拉法特 (Yasser Arafat)、英迪拉·甘地 (Indira Gandhi)、萨尔瓦多·阿连德 (Salvador Allende)、勃涅日涅夫 (Brezhnev)、戈尔巴乔夫 (Gorbachov)、密特朗 (Mitterrand)、江泽民、约翰·保罗二世 (John Paul II)、胡安·卡洛斯国王 (el rey Juan Carlos) 等人打过交道。他认识我们时代一些主要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比如萨特 (Jean-Paul Sartre)、西蒙·德·波伏瓦 (Simone de Beauvoir)、海明威 (Hemingway)、格林 (Graham Greene)、米勒 (Arthur Miller)、巴勃罗·聂鲁达 (Pablo Neruda)、若奥·亚马多 (Jorge Amado)、奥斯瓦尔多·瓜亚萨明 (Oswaldo Guayasamín)、亨利·卡尔捷-布雷松 (Henri Cartier-Bresson)、胡利奥·科塔萨尔 (Julio Cortázar)、何塞·萨拉马戈 (José Saramago)、加夫列尔·加西亚·马

尔克斯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Eduardo Galeano)、奥利弗·斯通 (Oliver Stone)、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及很多人。

在菲德尔的领导下，他的小国家（10 万多平方公里，1100 万人口）制造出一种世界级的大国政治，甚至敢于与美国较量，美国的领导人没能打败古巴、消灭古巴，甚至连改变古巴革命的方向也没能做到。

1962 年 10 月之际，由于美国政府的態度，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当时美国政府抗议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而这些导弹主要是为了阻止再次发生 1961 年吉隆滩 (Playa Girón, 即“猪湾”Bahía de Cochinos) 式的登陆：一次直接由美国武装力量（应为美国雇佣军——编者）执行的、旨在搞垮古巴政权的行动。

五十多年来，华盛顿对古巴实行贸易禁运和金融封锁 [1990 年前后，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和托里切利法案 (Helms-Burton y Torricelli) 使这一政策变本加厉]，阻挠了古巴的正常发展，加剧了该国困难的经济形势，给该国居民造成悲剧性的后果。此外，美国还通过设在佛罗里达的强大的“马蒂电台”和“马蒂电视台”对哈瓦那发动持久的思想攻势和媒体大战，企图照搬最黑暗的“冷战”时期的做法，把古巴岛淹没在宣传的汪洋之中。

另一方面，诸如阿尔法 66 (Alpha 66)、欧米加 -7 (Omega-7) 一类敌视古巴政权的恐怖主义组织将总部设在迈阿密，他们在那里拥有训练营地，并在美国当局的默许下不断从那里往古巴派遣武装小分队搞破坏。古巴是近四十年来受恐怖主义之害最大、受害人数最多（超过 3000 人）的国家之一。

尽管菲德尔本人不断遭受来自美国的攻击，包括许多直接危及其生命的谋杀计划，但他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针对纽约和华盛顿令人憎恶的袭击发生之后，发表了这样的声明：“不管在何种情况下，我们都会为针对美国人民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而感到沉痛。我们说过，无论我们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如何，不会有任何人从我们这里出发到美国去搞恐怖主义活动。”他还曾这样强调说：“如果有谁在这里发现一句贬低美国人民的话，那就

让他们砍掉我的一只手好了。假如我们把两国政府间的分歧归罪于美国人民，那我们就将成为无知的狂热分子。”

面对来自外部经久不息的攻击，古巴政权的反应是千方百计维护国内的团结，坚持一党制原则，倾向于以严厉的手段处理不同意见，用他们的方式实施圣伊格纳西奥·德洛约拉（San Ignacio de Loyola 又译罗耀拉）的箴言：“在一座被围困的堡垒中，任何异义都是背叛。”因此，国际大赦组织的年度报告总要批评古巴当局在自由方面的态度（舆论自由、思想自由、政治自由），并提醒，在古巴有几十个“思想囚犯”。

不管引述什么理由，这种局面是无法辩解的，正如保留死刑也是无法辩解的，今天，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死刑已被取消，只有美国和日本是明显的例外。任何民主派都不会认为思想犯的存在和保留死刑制度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国际大赦的这些报告没有指出过古巴存在拷打、“失踪”案、政治谋杀，或者治安力量用武力镇压群众示威的例子，也从未有关于民众起义反对政府的记录。在革命成功后的四十六年里，没有发生过哪怕一次这样的事件。与此同时，在邻近古巴的、被称作“民主的”国家里——比如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多米尼加共和国，甚至墨西哥，更不用说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了，暗杀工会人士、反对派、记者、神父、市长、公民社会领袖人物的罪犯逍遥法外，虽然这样的事屡屡发生，但这些一般犯罪并未引起国际媒体的过分反应。

还应该补充下列事实。在上述一类国家里，在全世界大多数贫穷国家里，存在着对成千上万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长期侵犯，存在着骇人听闻的高婴儿死亡率、文盲率和众多无房、无工作、无卫生条件的民众，存在着乞丐、流浪儿、贫民窟区、吸毒、高犯罪率、形形色色的犯罪……而这些现象在古巴未有所闻，几近不存在。

也不存在官方的个人崇拜。尽管菲德尔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报刊、电视及街道上，但是在古巴不存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或其他在世革命领导人的官方个人标准像、塑像，货币上没有他们的头像，没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大街、楼宇或敬献给他们的纪念碑。

面对着来自外部的不断骚扰，这个绝不放弃主权的小国在人文发展方面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果：根除了种族主义，解放了妇女，杜绝了文盲，明显降低了婴儿死亡率，提高了整体文化水平……在教育、卫生、医学研究和体育领域，古巴跻身于效率最高的国家之列。

在外交方面，古巴继续表现为世界上最活跃的国家之一。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古巴政权支持过中美洲（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南美洲（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玻利维亚、阿根廷）许多国家的游击队。从世界一端培训出来的古巴武装力量，参加了世界另一端地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的战争。古巴军事力量在安哥拉的行动最后导致南非共和国精锐部队的溃败，这毫无疑问加速了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的该国种族主义政府的垮台。

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启蒙者及富有魅力之领袖的古巴革命取得了成就，同时也存在显而易见的不足：经济困难、官僚机构可怕的低效、小规模但已普遍化的腐败、贫穷、停电、交通困难、配额制、日常生活的艰苦、自由在某些方面所受到的限制等；但无论如何，对于地球上千百万穷人来说，古巴革命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榜样。在拉丁美洲各地或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人们抗议着、斗争着，有时甚至牺牲生命，为着建立受到古巴社会主义模式启发的政权。

当古巴的主席由于自然原因消失以后，会发生什么呢？当然会发生变化，既然在古巴的权力结构中，没有一个人（无论是在国家层次、党的层次还是在军队中）拥有他那样的权威。这一权威来自他所拥有的四重特点：国家的缔造者、革命的理论家、成功的军事首领，以及四十六年以来古巴政治的舵手；还有不少人提出他的另一个特征：坏现象的主要批判者和反对者。

一些分析人士预言，就像柏林墙倒塌后在东欧发生的情况一样，古巴现政权会很快垮台。他们分析错了。在古巴发生类似东欧变化的可能性很小，东欧曾有一个外部强加的体制，这个体制受到相当多人的唾弃，因而顷刻间崩溃。

尽管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对手不愿承认，大多数古巴人对于革命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政治现实。这是一种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忠诚，与东欧前共产党国家发生的情况正相反，古巴的民族主义植根于反对美国兼并企图或帝国主义野心的抵抗史。

无论诋毁者是否愿意看到，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那个世界伟人祠里拥有一席之地；被敬奉在那里的，都是为社会正义进行过最持久的斗争，都是最坚决地支持过地球上被压迫人民的人物。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同时不排除我对2003年三四月间古巴当局对70个非暴力不同政见者判处长期徒刑、对一艘船的三名劫持者判处枪决之事件的不同意见，我认为这样一个等级的领导人，一个受到西方众多媒体如此猛烈抨击的领导人，如果不对影响了他一生的伟大战斗、不对他仍在全力以赴进行的斗争提出个人的见解，提出他本人的直接佐证，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菲德尔，这位演说频频不断的人，一生中只接受过几次屈指可数的个人访谈。五十年里，只发表过四次与他人的长谈。其中，与詹尼·米纳（Gianni Miná）两次，与弗雷·贝托（Frei Betto）、托马斯·博尔赫（Tomás Borge）各一次。我在等待了几乎一年之久后，被告知他接受我的建议，并准备与我进行他的第五次长谈，这次长谈后来成了迄今为止最长最完整的一次。

我进行了充分准备，好像要参加一场马拉松跑步。我一遍遍地读着几十本书、文章和各种报告。我咨询了许多朋友，他们比我更了解古巴革命的复杂历程，他们给我指出了一些问题、命题和访谈的方向。在这本访谈录里，我向菲德尔·卡斯特罗提出的一些问题来源于他们的建议。

当我们在他那个安谧、昏暗、宁静（出于将一部分访谈拍摄成一部纪录片的需要）的个人办公室坐下来安心工作之前，我想对这个人物就近多了解一些，在他的平日工作中、在他处理日常事务的环境中观察他。在此之前，我仅仅与他进行过短暂的、非常具体的交谈：有时是我在古巴岛上进行采访，有时是由于某个类似那次哈瓦那书展的活动。

他接受了这个主意，邀请我陪同他在几天内到不同的地方巡回，不仅在古巴国内〔圣地亚哥、奥尔金（Holguín）、哈瓦那〕，还陪同他到了外国（厄瓜多尔）。我们一起乘汽车、坐飞机，一起散步、吃午饭、吃晚饭，讨论着当天的消息，就他以往的经历，就他当前的关注交谈着……想到什么谈什么，没有进行录音。事后，我凭记忆在笔记本上补记这些对话。

就这样，我发现了一个内心深处的、甚至有点羞怯的菲德尔，一个有教养的、非常有风度的菲德尔。他注意倾听每一个对话者的谈话内容，本人谈吐朴素，毫不造作。他的举止和表情带着一种古老的礼性，对别人总是很关切，尤其是对他的合作者、卫队，语调从来都很平静。我没有一次听过他发号施令，但他却对周围显示出绝对的权威，这要归结于他那具有震慑力的个性。只要有他在场，就只能听见一个声音，即他的声音。他是那个大事小事做决定的人。尽管他向领导党和国家的政治官员征求意见，并表现得彬彬有礼、非常正式，但最终是由他来做出决定。切·格瓦拉死后，在菲德尔活动的权力圈子内，没有一个人具有接近他的思想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给人一种孤独的印象，没有亲密的朋友，没有同等水平的思想搭档。按照我能做出的评价，他是一个过着几近斯巴达式俭朴生活的领导人，看不见一丝奢华，用着简陋的家具，吃着健康的粗茶淡饭，着装是修道士兼士兵式的。连他的敌人都承认，他是为数不多的、不利用职权发财的国家领导人之一。

他的工作日——每周七天——通常在黎明时分的五六点钟结束。不止一次，他在深夜两三点钟中断我们的交谈，带着微笑和疲倦告诉我，他还得去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他一般只睡四个小时，间或在白天的任何时刻再睡上一两个小时。但他也是个很能早起的人，对这一点人们提及不多。外出、走动、开会、访问、讲话，一环接一环，没有间歇，节奏紧张。他那些年轻的、三十上下的优秀助手们，在一天的工作结束时，都累得散了架子。他们站着睡觉，精疲力竭，无法跟上那位快80岁的、不知疲倦的“小伙子”的节奏。

菲德尔不断向部下要记录、报告、电报、国内外新闻社的消息、统计数字、电视或广播综述、电话内容、从经常进行的国内民意调查中搜集来

的意见……他的求知欲无止无尽，他不停地思索、考虑、给他的助手鼓劲。他是典型的反教条主义者。没有什么东西比教条、戒律、规定、体制、神圣真理更与他格格不入了。他是一个本能的犯规者，也是一个永远的叛逆者，当然这后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他总是警惕着，行动着，带领着他的小参谋部——他的助手班子——发起一个又一个新战役，一次又一次地重组革命。他的主意层出不穷，思考不可思议之举，想象无法想象之事。用这样无比勇敢的头脑，他确实无法不想出惊世骇俗的主张。

一旦经讨论确定了某项计划，任何障碍都无法阻止他前进。他坚信计划一定能够实现。“后勤将跟上”，戴高乐如是说。菲德尔也这样认为，且说到做到。他对正在做的事满怀热烈的信心，热情就这样拉动了意志。那些主张好像变魔术似的在我们的眼前变成了现实；事物、事件变得可触可摸，言语变成了事实。这应该就是个人魅力吧。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他具有人类应有的美德，同时具有巨大的个人魅力。他与公众交流的娴熟才能仿佛浑然天成。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吸引听众、控制听众，使他们触电、兴奋，报以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很熟悉菲德尔，他这样论及后者面对广大听众的讲话方式：“他总是以微乎其微的声音开始，内容方向不明。但他善于利用任何机会争取地盘，步步前进，直到猛击一掌，随即抓住听众。这是灵感，是无法抵御的、耀人眼目的潇洒风度，否认它的只是那些没有幸运感受他的人。”

多次被人们描述过的菲德尔的口才确实令人惊叹。我不是指人们所熟知的公众演说，而是指茶余饭后的随意交谈。他那连珠般的妙语朴实无华而又落地有声，他那气势如虹的言谈总是伴随着优美手掌的舞动，在空中回荡。

它具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感，他对关乎民族性的一切事物具有超级敏感。他引征古巴独立战争英雄何塞·马蒂的次数多于引征社会主义运动史或工人运动史上的任何一个人物。马蒂是他主要的灵感源泉。他反复阅读马蒂的作品。科学和科学研究使他着迷，医学进步使他激动。他希望治愈全世界所有

患病的儿童。事实上，成千上万的古巴医生正在几十个贫穷国家里为最底层的民众治病。出于人道主义同情心和国际主义义务，他无数次表达在全世界播种健康、知识、医药和教育的宏愿。这是海市蜃楼般的梦想吗？难怪他所喜爱的文学作品中的英雄是堂吉珂德。看来他是一个完全受高尚志向本身驱动的人，一个为实现正义和公正理想而斗争的人。这使人们想起切·格瓦拉的一句话：“一场伟大的革命只能诞生于一种伟大的爱。”

他喜欢精确、准确、准时。他常就任何一个题目以惊人的速度进行数学计算。与他打交道，来不得半点粗疏。他记得最小的细节。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历史学家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塔比奥（Pedro Alvarez Tabío）经常作陪，在需要的时候，他向菲德尔提示某个具体资料、某一日期、某个人名或某个情况……有时候需要提示关于菲德尔自身经历的具体资料，比如“在攻打蒙卡达兵营前夜，我是几点到达西波涅（Siboney）小农庄的？”于是，佩德罗回答说“司令，是几点几点”。有时也需要提示关于某个遥远历史事件的次要方面，如：“那个不想援助切的玻利维亚共产党第二号领导人叫什么来着？”于是，佩德罗回答道“叫某某”。菲德尔本人的惊人记忆力已经骇人听闻地准确，佩德罗是他身边的第二记忆力。

这样好的记忆力有时似乎妨碍他进行总结式的思考。他的思想是冠状的，一环套一环，节外又生枝，事事相关联。谈话不时偏离主题，总有额外插曲进入。由于联想到其他的想法，由于回想起某个情景或某个人物，一个主题的深入往往使他又想起了另一个平行的主题，这样一个又一个新出现的主题使他渐渐离开了中心主题，以至于对话者一时间担心他失去了线索。但是菲德尔却能沿着走过的路再走回来，重新回到主题思想。

在我们交谈的一百多个小时里，菲德尔从未限制我们的议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菲德尔不惧怕辩论。正相反，他希望辩论，鼓励辩论，随时准备与任何人对阵。他辩论起来时，论据绰绰有余，表达口若悬河，同时非常尊重对方，非常精明。他是一个精力无限、令人敬畏的、很有教养的讨论对象、辩论者；只有那些怀着恶意和仇恨的人才会讨厌他。

如果在这本书里缺少某个问题或某个命题，归根结底是因为我这个采

访者的不足，菲德尔从来没有拒绝谈论他漫长政治生涯里的任何方面。一般来说，在一些访谈中，由于提问者 and 回答者之间的思想水平有差距，这些访谈实际上成了独白。在这样的独白里，提问者并不一定要对自己是否有道理负责。这样的访谈既不是辩论，也不是讨论——既然记者并不是国务活动家——而是从已经成为历史人物的被采访者那里获得一种对他本人生平和政治生涯的个人说法。在采访中，我从未想过要问及菲德尔的私生活、感情生活、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我认为有些界限是不应该越过的。任何再著名的公众人物也应该有权保护他不可侵犯的隐私。

2003年，在那些漫长的工作日结束之后，我写出了这本书的第一遍草稿。时间就这样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但是文稿还没有达到付印水平。日子和历史流逝着。2004年9月，我又有机会来到了哈瓦那，并再次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会面。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对前几次谈话中的某些内容进行材料更新和补充。2005年，我又一次与他交谈了几个小时，我们都希望于再次更新资料后彻底结束工作。这一点我们基本上做到了，同时我们一致同意由采访者在对话文本之外写一些补充说明，以便读者能够了解情况，了解整个访谈过程中涉及某些方面是怎样展开的。要向读者讲清的是，我仅限于在必要的情况下加些新的材料。

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消失、国家专制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失败看来都没有改变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一个新型社会的梦想，这个社会相对公正，更加健康，教育程度更高，不搞私有化，没有歧视，拥有一种综合整体文化。古巴与乌戈·查韦斯总统领导的委内瑞拉之间密切的新联盟增强了他的信心。

在生命的秋季里，菲德尔的新动力是保护生态、保护环境、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反对国内的腐败，他继续在战壕里作战，在第一线作战，领导着一场旨在实现其信仰之理想的战斗。看来，无论任何事物，无论任何人，都无法使他放弃这些理想。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IGNACIO RAMONET）

2005年12月31日于巴黎

目 录

- 001 / 引 言 对菲德尔·卡斯特罗一百小时的访谈
- 001 / 第一章 革命的起源
- 027 / 第二章 领袖的童年
- 059 / 第三章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
- 093 / 第四章 投身政治活动
- 119 / 第五章 攻打蒙卡达兵营
- 153 / 第六章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 171 / 第七章 切·格瓦拉
- 187 / 第八章 在马埃斯特腊山
- 215 / 第九章 游击队的经验教训
- 227 / 第十章 革命：最初的步骤，最初的问题
- 255 / 第十一章 阴谋活动开始
- 273 / 第十二章 吉隆滩
- 289 / 第十三章 1962年“十月危机”

- 313 / 第十四章 切·格瓦拉之死
- 333 / 第十五章 古巴与非洲
- 361 / 第十六章 与美国的移民危机
- 383 / 第十七章 苏联的崩溃
- 399 / 第十八章 奥乔亚事件和死刑
- 421 / 第十九章 古巴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 443 / 第二十章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访问
- 475 / 第二十一章 2003年3月逮捕不同政见者
- 507 / 第二十二章 2003年4月的劫持事件
- 533 / 第二十三章 古巴与西班牙
- 561 / 第二十四章 拉丁美洲
- 581 / 第二十五章 今日古巴
- 615 / 第二十六章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
- 677 / 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生平和古巴革命的大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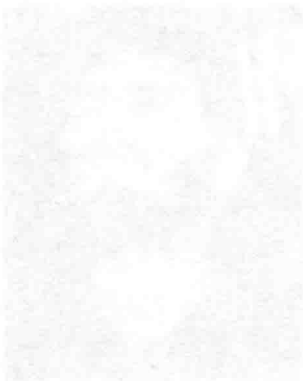


我
的
一
生

第一章 革命的起源

1917年，在墨西哥，一个名为“墨西哥革命”（Mexican Revolution）的动荡时期开始。这场革命始于1910年，当时墨西哥总统弗朗西斯科·伊图里维（Francisco I. Madero）被暗杀。革命领袖包括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潘菲洛·德拉罗萨（Panfilo de la Rosa）、维克多·瓦雷拉（Victor Varela）和胡安·维内内塔（Juan Venustiano Carranza）。这场革命导致了墨西哥的长期内战，直到1920年才基本结束。革命后，墨西哥建立了新的宪法，并开始了现代化进程。

1917年墨西哥革命（Mexican Revolution）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不仅推翻了旧有的统治阶级，还建立了新的国家制度。革命领袖们提出了“土地和自由”的口号，要求土地改革和工人权利。这场革命对墨西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来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玻利瓦尔—奴隶制和独立—自治派和亲美派—两次独立战争—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马克西莫·戈麦斯—安东尼奥·马塞奥—何塞·马蒂

拉：司令，2003年不仅纪念了何塞·马蒂诞生150周年，而且纪念了攻打蒙卡达兵营50周年。可不可以说，古巴革命是从1953年7月26日开始的？

卡：这不太符合情理，因为古巴革命是从1868年第一次独立战争开始的，是这一年的10月10日，在东部地区开始的。领导这次独立战争的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古巴人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Carlos Manuel de Céspedes）^①。在东部地区，奴隶制不太普遍。而在西部地区，奴隶制很普遍，西部地区有大规模的咖啡园，后来又有甘蔗园。甘蔗园的兴起是与法国种植园奴隶起义相关的。

拉：是指1791年海地奴隶起义^②吗？

① 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1819—1874）。生于巴亚莫（Bayamo）。1840年在西班牙攻读法律。1842—1844年赴欧洲、土耳其、巴勒斯坦和埃及旅行。1844年定居巴亚莫，任律师。曾参加1852年拉斯波萨斯（Las Pozas）起义并被捕入狱。1868年10月10日在其“拉德马哈瓜”（La Demajagua）庄园发动起义，高呼“自由古巴万岁！”的口号，解放其奴隶并签署“独立宣言”。12月20日，攻占巴亚莫。12月27日签署关于奴隶的法令。1869年被任命为起义共和国总统。1873年在希加瓜尔（Jijagua）一次众议员会议上被撤职。1874年2月27日在马埃斯特腊山（Sierra Maestra）战斗中身亡。

（除专门说明的注释外，其余所有的注释，均为伊格纳西奥·拉莫内所加。）

② 1791年在圣多明戈（Santo Domingo）岛，约10万名法国人拥有7800个甘蔗园和50多万奴隶。同年8月14日，奴隶们高举法国大革命思想的旗帜，在有“黑色斯巴达克（Espartaco Negro）”之称的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领导下起来造反。战争持续了13年之久。同法属加勒比岛马提尼克（Martinica）土生白人克里奥女子何塞菲娜（Josefina）结婚的拿破仑（Napoleón）派了4.3万名经验丰富的远征军镇压起义。1803年11月18日，在韦尔蒂埃（Vertières）进行了决战，起义军打败了法国人。战争的结果令人震惊：15万奴隶和7万名法国士兵阵亡。1804年1月1日，在戈纳伊夫（Gonaïves）市，圣多明戈岛原属于法国的部分宣告独立，从那时起，改称为原印第安人用过的名称：海地（Haiti）。

卡：是的，是在海地。不少法国的垦殖者移民到古巴，移民到离海地最近的奥连特省（Oriente，又译东方省），海地和奥连特省只相隔向风海峡（Paso de los Vientos）。

从印第安土著居民时代起，古巴和圣多明戈（Santo Domingo）岛〔西班牙人称之为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的西部地区，即今海地所在的地区一直存在某种交往。有一部分加勒比人部族战斗性很强，对西班牙殖民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中有些人越过海峡到达古巴东部地区。

因此，当西班牙殖民者开始征服和殖民古巴时，已经有些印第安人从圣多明戈岛移民到古巴岛，并在古巴岛最东部地区组织抵抗。其中有一人名叫阿图埃依（Hatuey），他是古巴历史名人之一，是第一个企图抵抗的人，因为古巴当地原始族群是由非常和平的居民组成的。征服者骑着马、手持弓箭、火枪而来，但印第安人没有做好抵抗的准备，尽管有些人进行了抵抗。

拉：技术水平的差异很大。

卡：西班牙人经历了八百年的战争，西班牙士兵充塞了古巴岛。这些人曾为本国的独立和反对阿拉伯人占领而战斗过。

拉：您说过，当时奴隶在海地起来造反。

卡：1791年当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领导海地奴隶起来造反时，海地约有40万奴隶。约有数百名，或许有数千名法国垦殖者逃到古巴，有些还把他们手下一部分奴隶也带到古巴，在古巴最东部地区定居下来。

拉：在古巴其他地区有没有奴隶？

卡：前面我对您说过，在古巴，奴隶最多的是西部地区。在原奥连特省（东方省）有奴隶，但人数不多，因为当时那里主要饲养牲口，种植不多，是庄园主人数最多的地区。其次是卡马圭（Camagüey）省，那里也有大规

模的畜牧场，奴隶人数也很少。

从中部到西部有许多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咖啡和甘蔗种植园。在马坦萨斯（Matanzas）省和哈瓦那（La Habana）有几百家小榨糖厂，其机器设备往往可用牲口拉来拉去。古巴一度成为最大的咖啡生产国和出口国，占领了原先由海地占领的市场。

19世纪40年代，两次大飓风横扫咖啡园。由于甘蔗抗飓风和抗干旱的能力更强，所以更保险。一场大飓风可能会减少20%—25%的收成，但不会使甘蔗园毁灭。甘蔗是最适宜在古巴种植的作物，但种植甘蔗需要大量的奴隶劳动力。

在1868年第一次独立战争爆发前二三十年，在古巴约有30万奴隶。

拉：当时古巴全国居民有多少？

卡：我不能告诉您确切的数字，但我估计约有100万至150万人左右，包括奴隶在内。居民的大多数是殖民初期西班牙人的后裔，即土生白人克里奥约人（criollos），他们是地主和种植园主；还有梅斯蒂索人（mestizos），即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印第安人的混血种人；再后来，是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混血种人。而直接来自宗主国西班牙的半岛人（peninsulares）控制着古巴的行政、贸易、内务和国防。

奴隶人数最多的是在土生白人的甘蔗园。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西班牙美洲独立战争之后，在西半球，西班牙的殖民地只剩下古巴和波多黎各。1821年在圣多明戈也爆发过独立运动，圣多明戈曾一度属于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的大哥伦比亚（Gran Colombia）。19世纪西班牙曾一度重新占领伊斯帕尼奥拉。但那里的战争主要是同毗邻的海地进行的。大约在1830—1850年间在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爆发前，有一些多米尼加人移居古巴。他们中有些人在西班牙军队中服役，作为西班牙人来到古巴，尽管他们出生在多米尼加。他们具有作战经验，但他们是小农、农场主，后来参加到古巴爱国者的队伍中来。

拉：第一次古巴独立战争是如何开始的？

卡：1868年的独立战争是由一批地主发动的。他们事先做了准备，具有一定的文化。其中不少人是律师。他们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主张独立，其中有些人是甘蔗园主，拥有一些奴隶。拥有大量奴隶的大咖啡园主要分布在靠近海地的关塔那摩（Guantánamo）地区。

前面我提到，领导这场独立革命的是一位杰出和有教养的人，名叫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他是一家小榨糖厂厂主。他们先在东部地区的卡马圭省密谋，后被发觉。当局甚至已发出了通缉令，但他们有朋友在邮电局工作。卡洛斯·曼努埃尔·塞斯佩德斯得知要逮捕他，于是便提前于1868年10月10日在自己的榨糖厂发动起义。他宣布解放自己手下的所有奴隶，尽管总数不多，但他毫不犹豫地发布命令，宣布取消古巴的奴隶制。

拉：当时，解放奴隶是不是很平常的事？

卡：对，不平常。这一举动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这里同南美洲不同，因为当南美洲于1810年开始独立战争时，当时西班牙被法国占领，建立了君主国，拿破仑封他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Joséph Bonaparte）为西班牙国王，因此，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起来造反时，不是反对西班牙，而是反对拿破仑强加给西班牙的拿破仑君主国，于是，在南美洲和西班牙在西半球的其他殖民地建立了爱国的“洪达”（Junta），即执政委员会。

第一个“洪达”是1810年4月在委内瑞拉建的，称作“保护费尔南多七世（Fernando VII）权利委员会”，费尔南多七世是被拿破仑废黜的西班牙国王。委内瑞拉有一位独立战争的先驱，名为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Francisco de Miranda）^①，他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因为在卡洛斯三

^① 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1750年生于加拉加斯，1816年卒于加的斯），委内瑞拉爱国者，作为西班牙军队的军官在1779—1781年间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后在法国被任命为将军参加拿破仑军队。1806年组织一次远征到达委内瑞拉，宣告成立共和国，1811年在加拉加斯举行投票通过独立宣言。1812年被西班牙人打败，被关进加的斯监狱至死。

世统治下的西班牙曾派出生于南美洲和古巴的士兵，其中有黑人、梅斯蒂索人，还有西班牙人到美国去为争取美国独立而战。这是在1776年，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十三年后，1789年法国爆发革命。后来参加法国大革命的拉法耶特（La Fayette），曾经也同许多西班牙志愿军^①一样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同英国的争夺很激烈，西班牙站在法国一边。因此，有一些古巴人参加了美国的独立战争。

历史上的联系很奇特。出生于委内瑞拉的西班牙军人米兰达在古巴时决定脱离西班牙殖民军，正是在哈瓦那时，他开始了漫长的反帝道路，使他制定了“哥伦比亚”计划，即解放西属美洲各殖民地人民，将他们联合组成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集团。后来他移居法国，成为法国革命领导人手下的一名杰出的军官，表现突出。但正如当时常常发生的那样，他后来失宠，甚至差一点被处死。后来，他被平反。他为法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救了他的命。他周游欧洲，出了名。后成为南美洲独立的先驱者。1806年8月他在委内瑞拉登陆，开始了斗争。

拉：这是不是发生在西蒙·玻利瓦尔为争取西属美洲独立斗争开始之前？

卡：是的。当拿破仑占领西班牙并在那里建立拿破仑君主国时，在西属美洲成立了忠于西班牙王室的“洪达”，但“洪达”中也有坚决主张独立的人，西蒙·玻利瓦尔正是其中之一。他们成立“加拉加斯洪达”，这是西属美洲第一个决定宣告独立的“洪达”。玻利瓦尔就是这一“洪达”的成员，当时他是一名年轻的军官。

玻利瓦尔曾同他的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Simón Rodríguez）一起到意大利，1805年8月15日在圣克罗山（Monte Sacro）宣誓要为委内瑞拉

^① 最著名的有贝尔纳多·德加尔维斯（1746—1786），他在1779年的战役中攻占了汤普森（Thompson）、史密斯（Smith）、莫恰克（Mauchak）、巴吞鲁什（Baton Rouge）和纳齐兹（Natchez）港。还攻占了莫比尔（Mobile，1780）和彭萨科拉（Pensacola，1781）市，在彭萨科拉俘虏了英国将军坎贝尔（Campbell）。

独立而斗争。很难想象他那不平凡的预见。

拉：他们是否解放了奴隶？

卡：没有，一开始，土生白人没有解放奴隶。在当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何塞·托马斯·博韦斯（José Tomás Boves）^①，这位狡猾的阿斯图利亚人就利用了这一点。他到亚内罗人（llaneros，平原地区居民）那里去，亚内罗人是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是奴隶或半奴隶，在遍地野马驰骋的广阔的平原地区，他们是威风凛凛的骑手。博韦斯在那里进行了土改。由于土地属于起来造反的土生白人，他将土地没收，分给亚内罗人，将庄园交给他们，使他们成为主人。他率领一支由此组建的军队在平原地区为所欲为，到处杀人放火。这是一场由西班牙殖民者挑起的委内瑞拉人之间残酷的阶级斗争，被称作1814年穷人起义。

阿图罗·乌斯拉尔·彼得里（Arturo Uslar Pietri）是委内瑞拉一位杰出和天才的作家，尽管作为政治家，他并不杰出。乌斯拉尔写了一部描绘上述题材的优秀的长篇小说《红色的长矛》（*Las Lanzas Coloradas*），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②读他的描绘，仿佛听到骏马在平原上奔驰的马蹄声。正是这支由奴隶和半奴隶的贫苦亚内罗人组成的骑兵军队打败了独立军并占领了加拉加斯。于是，开始了一个拉美大陆独立斗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场景：加拉加斯居民向东部迁徙，在委内瑞拉历史上称之为“向东部移民”，是由玻利瓦尔亲自率领的，在这次迁徙中，不知死了多少妇女、儿童、青年和老人。委内瑞拉人民为争取独立付出了难以置信的代价，他们为忍受这一切是多么坚强！

^① 何塞·托马斯·博韦斯（1782—1814），生于奥维多（Oviedo），后成为委内瑞拉平原地区的考迪罗，效忠于西班牙王室。1814年在拉普埃尔塔（La Puerta）战役中打败玻利瓦尔并占领加拉加斯。

^② 阿图罗·乌斯拉尔·彼得里（1906—2001），委内瑞拉著名作家，著述甚多，其中长篇小说有：《红色的长矛》（1931，*Las Lanzas Coloradas*）、《通往黄金国之路》（1947，*El camino de EL Dorado*）、《死者的职业》（1976，*Oficio de difuntos*）、《萨穆埃尔·鲁滨逊》（1981，*Samuel Robinson*）和《适时的访问》（1990，*La visita en el tiempo*）等。

在这场值得纪念的“令人钦佩的战役”的推动下，玻利瓦尔建立了第二共和国。玻利瓦尔于1812年底离开新格拉纳达（Nueva Granada），即如今的哥伦比亚的马格达莱纳河（Río Magdalena），于1813年8月到达加拉加斯，在那里，他被称为“解放者”（Libertador）。

但是，在此之前，1810年在第一共和国成立时，政治和军事领袖并不是玻利瓦尔，而是得到革命者欢迎和支持的米兰达。失败后，米兰达准备同西班牙讲和。他在拉瓜伊拉（La Guaira）正准备登上一艘英国轮船时，玻利瓦尔和一些不同意同西班牙讲和的军官赶来了。米兰达养成了法国人地位的人、贵族的洗澡等生活习惯。因此，当晚他没有在船上过夜，而是在陆地上过夜。这样，他被偶然地抓住了。逮捕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同西班牙讲和被看成是背叛行为。

拉：西班牙在亚内罗人的进攻下，是否已经恢复了权力？

卡：没有。亚内罗人行动时，1813年已成立第二共和国，重新宣告独立。前面我提到的事发生在前。当米兰达同西班牙讲和时，玻利瓦尔同他的朋友们被迫逃走，他们搞到了一条船。米兰达则被交给了西班牙军队首领多明戈·蒙特韦德（Domingo Monteverde）。玻利瓦尔率领少数人向西走，向荷属博内尔（Bonaire）岛方向走去，后在马格达莱纳河附近乘船向上游走，发起了一次闪电般的攻势，即我在前面提到的历史上称之为“令人钦佩的战役”。

在新格拉纳达有一部分爱国者军队。玻利瓦尔到达后，将他们团结在一起，重新开始斗争，再次占领加拉加斯和建立爱国政权。但是，奴隶仍没有获得解放。1812年3月26日，星期四发生了一场大地震，玻利瓦尔说了一句名言：“如果大自然与我们的计划作对，我们将同它斗争，要使它服从我们。”地震很可怕，玻利瓦尔的这句话也出了名。

在第二共和国失败后，玻利瓦尔离开委内瑞拉到牙买加。他遭到一场密谋的暗杀，但幸运地活了下来。1815年9月在牙买加写下了著名的“牙

买加来信”，1816年在牙买加同海地总统佩蒂翁（Pétion）^①接触，佩蒂翁对玻利瓦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他决定解放奴隶，向他提供武器援助，玻利瓦尔向佩蒂翁保证将废除奴隶制，这已成为玻利瓦尔革命思想的组成部分。玻利瓦尔已吸取了第一和第二共和国失败的教训。他开始为建立第三共和国而斗争。他从海地出发乘船远征，在委内瑞拉登陆，出发前，在海地发表《奥库马雷（Ocumare）宣言》，宣言中有一段宣告：

“我们一部分在奴隶制苦难中呻吟的不幸的兄弟现在已经获得自由。大自然、正义和政治要求解放奴隶。从此，在委内瑞拉只有一种人，所有人都将是公民。”

解放者从玛格丽塔（Margarita）岛沿着奥里诺科（Orinoco）河到达今天的玻利瓦尔城（Ciudad Bolívar）。在安戈斯图拉（Angostura）他构建了1819年宪法的思想并颁布法令废除奴隶制。一位名为何塞·安东尼奥·派斯（José Antonio Páez）的爱国的亚内罗人率领许多印第安和梅斯蒂索亚内罗人支持玻利瓦尔。这些事件确保了胜利。通过这一生动的例子您可以了解奴隶制的废除与独立的关系。

拉：在古巴，塞斯佩德斯是第一个解放奴隶的人吗？

卡：是的。卡洛斯·曼努埃尔·塞斯佩德斯是在斗争开始时解放奴隶的。这一举措在奥连特和卡马圭得到了实施。许多被解放的奴隶加入了爱国者的队伍。战争持续了十年。在战争中涌现了一位出生于多米尼加的将领，他就是马克西莫·戈麦斯（Máximo Gómez）。^②另一位杰出的将领是黑人。

^① 亚历山大·佩蒂翁（Alexandre Pétion，1770—1818），海地将军，1803年参与打败法国军队，1807年起任海地总统直至去世。

^② 马克西莫·戈麦斯·巴埃斯（Máximo Gómez Báez，1836—1905），生于圣多明戈。1865年移居古巴，1868年参加古巴独立斗争。1895年同何塞·马蒂（1853—1895）一起回国，此时其军衔是解放军总司令。杰出的战略家，在古巴两次独立战争中领导了无数次战役和战斗，决定性地打败了最强大的殖民军队，其中一次西部突进战役，被许多欧洲军史学家认为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奇迹战役之一。在哈瓦那去世。

拉：是安东尼奥·马塞奥（Antonio Maceo）吗？

卡：是安东尼奥·马塞奥^①，他是古巴最杰出的将军，是黑人，1845年生于古巴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uba）。独立战争开始时他23岁。

拉：看来，1868年起反对西班牙的土生白人中有一部分人起义的目的是要合并到美国，是吗？

卡：在18世纪和19世纪，争取独立的思想不得不同许多思潮做斗争，如改良主义思潮、自治主义思潮、兼并主义思潮等。

西班牙殖民主义与英国殖民主义有所不同。说实在的，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不一样，其殖民主义也同英国殖民主义不同。有各种殖民主义，对待奴隶的态度也不一样。西班牙人的做法有可取的方面，比方说，西班牙人允许和批准来自非洲的奴隶保留自己的习俗。这是一种能使奴隶保持比较平和的方式。因为在这一领土上，奴隶受到剥削和虐待，在这一气候下，奴隶曾举行过多次起义，许多奴隶逃走，后来又遭到残酷迫害。但是，允许奴隶保留自己的习俗和宗教传统。

然而在美国是多么不同！在美国，不允许奴隶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因此，目前在美国有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也有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等，但是，几乎没有非洲宗教。而在古巴，天主教占优势，基督教等其他教派人数不多，但是，在广大奴隶中，保留着非洲的宗教信仰。由于宗教方面的容忍，天主教某些偶像被改名换姓引进到非洲宗教习俗中，但他们有自己信仰的神。在这方面，西班牙和英国殖民主义差别是大的。

拉：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些土生白人想合并到美国。

卡：甚至在某些参加武装起义的人中也有兼并主义思想，这是因为

^① 安东尼奥·马塞奥·格拉哈莱斯（Antonio Maceo Grajales，1845—1896），古巴独立战争最杰出的将士之一。解放军副总司令，在两次独立战争中领导了无数次战役，包括西部突进战役。具有明确的爱国主义思想。1896年12月7日战死在圣佩德罗（San Pedro）。

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刚刚结束，北方赢得了战争。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成为具有崇高威望的人物。

早在19世纪初古巴许多土生白人地主就拥有奴隶，特别是西部地区。他们具有兼并主义的思想，想合并到美国。英国人已经禁止贩卖奴隶，有些土生白人害怕英国人在整个加勒比地区宣布并实施废除奴隶制。英国人已经废除了奴隶买卖，即已禁止从非洲贩卖奴隶。这样产生了一种受到美国南方人怂恿的兼并主义思潮，美国南方人反对北方人，并在参议院中争夺选票。南方人在南方建立了一个新的奴隶国度，而北方人则建立了另一个国度。北方人由于经济原因和较自由的思想，他们反对奴隶制度，获得了多数票。这时，爆发了南北战争，1862年颁布法令，废除了奴隶制。

奴隶主的大多数——而不是全部，总有例外——渴望合并到美国南部。形成了一种兼并主义的思想，但兼并主义思想主要在西部地区，慢慢地扩展到东部地区，独立战争正是在东部地区首先爆发的。

拉：他们真的想脱离西班牙、合并到美国吗？

卡：卡洛斯·曼努埃尔·塞斯佩德斯没有，大部分举行起义的人也没有。但在卡马圭地区，具有兼并主义思想的人有一定的影响，我想他们主要是由于仇恨西班牙。当时在美国刚发生的一个事件对古巴有影响，经过一场血腥的战争后，美国废除了奴隶制，涌现出一位杰出的、有吸引力的人物亚伯拉罕·林肯，林肯后来被杀害。当1868年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开始时，在一部分人中间这一兼并主义的思想并没有完全消除，这些人把塞斯佩德斯看成是考迪罗式的首领。恰恰相反，塞斯佩德斯是一位杰出的人，一位爱国者，他勇敢和慷慨。被抓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斗争。他解放了奴隶，担任总司令，并选择了一面同美国国旗很不一样的旗帜做国旗。当时，人们都很注重形式。在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还召开立宪会议讨论，也讨论了国旗问题。由于一部分立宪议员同塞斯佩德斯有争议和保留，他们不同意选择塞斯佩德斯开始斗争时使用的旗帜做国旗。

最后采用的国旗是纳西索·洛佩斯^①（Narciso López）1850年带来的旗帜，同得克萨斯的三角形中孤星旗很相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古巴把纳西索·洛佩斯视为英雄。他曾作为西班牙军事首领之一参加了1821年的卡拉沃沃（Carabobo）战役，三年后，委内瑞拉获得独立。

拉：他是同玻利瓦尔一起战斗的吗？

卡：不是，纳西索·洛佩斯是西班牙军队杰出的军官，他同西班牙人一起反对玻利瓦尔。后来，他回西班牙，然后又到古巴和美国。奇怪的是他率一支军队从美国到了古巴。美国一直想吞并古巴岛。纳西索·洛佩斯组织远征，他得到美国南方奴隶主的资助，他设计的国旗模仿得克萨斯的旗帜。在历史的大混乱中，他设计的旗帜是第一面被举起来反对西班牙统治而战的旗帜，因此成为独立战争的象征，而实际上他所进行的是一场兼并主义的战争。

后来的史实发现了这一切，但长期以来，甚至直到成立了所谓古巴主权共和国之后，一直把这场战争说成是一场爱国主义的战争。显然，帝国主义和它的同伙是不可能对弄清事实真相感兴趣的。

为成立国会，1868—1869年召开了立宪大会，在一场非正规的战争中，立宪大会是一个流动的国会，可以设想当时的情况是多么复杂，在复杂情况下，采用了纳西索·洛佩斯的旗帜，而没有采用卡洛斯·曼努埃尔·塞斯佩德斯的旗帜。

拉：然而，最后这一来历不清的旗帜成为古巴的国旗。

卡：是的，因为这面旗帜充满了光荣。在立宪大会通过这面旗帜为国旗之后，它成为我国人民英勇斗争的旗帜，是一百三十五年以来古巴人民

^① 纳西索·洛佩斯（1799—1850）。生于委内瑞拉加拉加斯—西班牙家庭。曾作为西班牙军队的军官作战，反对玻利瓦尔。参加过西班牙第一次反卡洛斯战争。1841年到古巴任总督的副官。自1848年起，同情古巴土生白人反对西班牙统治并希望古巴合并到美国。后逃到新奥尔良（Nueva Orleans），在那里组织几次远征到古巴。他参照得克萨斯的旗帜，提出古巴的国旗。后被捕，1850年5月19日在哈瓦那被处以绞刑。

过去为争取独立，现在为社会主义不断奋斗的旗帜。它的不明来历已经过千万次最纯洁、最团结的鲜血的洗刷。正是在这面旗帜下，古巴生存了下来。因此，它成为古巴的国旗，它引导了我们所有的斗争，直至今天。

拉：我的理解是，许多古巴土生白人不希望古巴独立，主张在脱离西班牙之后，古巴作为一个州合并到美国，特别是合并到美国南方各州，因为南方各州反对废除黑奴，那里奴隶制盛行。

卡：古巴有过奴隶制社会，当时大多数富人是奴隶主，他们是兼并主义者，害怕取消奴隶制。但在东部地区，除关塔那摩存在强大的奴隶制外，其他地方情况不一样。因此，在独立战争头几年，当黑人领袖马塞奥开始崭露头角时，在马克西莫·戈麦斯的指挥下，他必须攻占关塔那摩，同驻扎在咖啡园的西班牙军队展开殊死的战斗来解放奴隶。在圣地亚哥和整个东部地区留下了许多法国人的姓名，这是因为当时在种植园里干活的奴隶起的姓都是种植园主人的姓。

拉：在 1868 年第一次独立战争中，爱国者遭到了失败。

卡：是的，他们失败的原因归根到底是由于他们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不团结。

拉：尽管第一次独立战争失败了，但正如您所说的，古巴革命是从它开始的。

卡：是的，我们认为古巴革命是从那时开始的。对我们来说，伟大的斗争是从那时开始的。第一次独立战争延续了多年，共十年之久！

西班牙军队是强大和顽固的，同他们作战是非常艰难的。由于一部分古巴人反对独立，他们是种植园主，因此，尽管美国在 1862 年废除了奴隶制，而古巴直到 1886 年才废除。然而，在爱国军队所到之处，从东部一直到马坦萨斯，所有在古巴东部地区获得解放的奴隶都投身到训练有素、有文化修养的人所领导的独立战争中去。在爱国者队伍中，有许多杰出的黑人

军官。前面我提到的马塞奥，他出生在圣地亚哥，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贫苦出身，他具有卓越的指挥才能，十分聪明，尽管出身低微，但具有良好的文化水平。

拉：战争结束后，发生了什么？

卡：十年战争结束后，国家筋疲力尽，战争停息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生了“小战争”（Guerra Chiquita）：发生过登陆和其他行动。但缺乏足够的力量。老百姓和经济还没有从十年毁灭性的战争中恢复过来。直到十七年之后，1895年才开始第二次独立战争。

拉：这场战争的主角是何塞·马蒂（José Martí）。

卡：是的，是马蒂。他生于一百五十年前，1853年1月。1868年第一次独立战争爆发时，马蒂才15岁。他是西班牙军队一名上尉的儿子。

拉：马蒂的父亲有没有参加战争……？

卡：没有，他没有参战。马蒂的父亲属于哈瓦那卫戍部队。在其儿子诞生时，没有战事。马蒂诞生于1853年，独立战争爆发时，他才15岁。

马蒂具有非凡的天才。少年时，他被捕入狱，被戴上脚镣，被迫在采石场服役。后来，他写了许多名篇，如《古巴的政治犯苦役》。后在西班牙流放期间，又写了《西班牙共和国对古巴革命的态度》。当时西班牙爆发一场运动，建立了共和国。但是，这个共和国却对渴望独立的古巴发动了一场血腥的战争，马蒂分析了这一矛盾。他在16岁至20岁就写下了这么杰出的文献，难以置信！

拉：马蒂后来又做了些什么？他在西班牙待了一段时间吗？

卡：后来？是的，他在那里学习。他身体不好，又处在流亡状态，他很年轻时就被迫流亡国外。后来又去了墨西哥和危地马拉。《桑洪和约》签订时，他回到古巴。《桑洪和约》的签订标志十年战争的结束。在第二

次流放西班牙结束后，他途经法国和英国前往拉丁美洲。他在委内瑞拉待了些日子。1880年抵达美国。

拉：看得出您对何塞·马蒂十分崇敬。

卡：马蒂的巨大功绩在于：当1868—1878年的战争结束时，他是一名25岁的青年知识分子和爱国者、诗人、作家，具有独立的思想和思想，他开始做工作使参加过十年艰苦和光荣的独立战争的老战士团结一致。要领导这些老战士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更何况做这项团结工作的是一位在西班牙居住过、从未参加过战争的知识青年！但马蒂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多么伟大的天才和能力！多么伟大的思想，多么坚强的意志和巨大的力量！马蒂创造了一种理论，发展了独立的哲学和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马蒂不止一次地谈到仇恨：“我不仇恨西班牙人……”在这方面，他是宽容的。

拉：这是他的主要功绩吗？

卡：我认为他的主要功绩是团结和领导了那些著名的将领。他个性强，能言善辩，有时会同某位将领闹翻。但他将古巴移民团结在一起，成立了一个革命政党。他传播思想，募集资金，做了大量具体的、多方面的工作。此外，他还发展了拉美团结的思想。他十分崇拜玻利瓦尔，崇拜胡亚雷斯（Juárez）^①，崇拜拉美各国所有的争取独立的战士。他写道：一天，他到达委内瑞拉，在掸去征尘之前，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谒玻利瓦尔的塑像。遗憾的是，人们对马蒂关于“我们的美洲”的思想所知甚少。

后来，马蒂越来越为古巴人所知道。马蒂将那些威信高、功绩卓著的老将团结在一起，团结在他的事业和他所创建的党的周围。他为独立战争做准备，当战争快要打响时，在美国，他募集的武器被没收。

^① 贝尼托·胡亚雷斯（Benito Juárez，1806—1872），印第安人出身，1858年任墨西哥总统。因拒绝偿还外债，拿破仑三世皇帝入侵墨西哥。拿破仑三世封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o）为墨西哥皇帝。胡亚雷斯领导了一场抵抗战争，抓住并枪毙了马克西米连，推翻了法国人的统治，再次成为墨西哥总统直至去世。

拉：尽管这样，他还是计划开始发动独立战争？

卡：是的。尽管武器被没收，他仍下命令，他开始斗争的决心没有动摇，他下了命令。他缺乏资金，设法募集到了一些，他去了圣多明戈，同最杰出的军事战略家马克西莫·戈麦斯会晤，马塞奥此时在中美洲。当时主要的军事首领都分散在各地，有几个在美国。马蒂将他们组织起来，组织他们登陆古巴。战争首先在马坦萨斯打响，那里有甘蔗园，有许多奴隶。后来，又在东部地区进行，那里起义的传统又重新活跃起来。马蒂在圣多明戈起草了《蒙特克里斯蒂宣言》（*Manifiesto de Montecristi*），在宣言中阐述了独立革命主要的纲领性的思想。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他从搭乘的德国轮船“诺斯特拉德”（*Norstrand*）号下来，乘上一艘小船登陆。他登陆的地点在普拉伊塔斯（*Playitas*），同马蒂一起登陆的共6人，其中有马克西莫·戈麦斯。

从中美洲登陆回国的人中间有马塞奥，他们也经历了十分艰难的情况，类似后来1956年我们乘坐“格拉玛”号游艇登陆后遇到的情况。那里既有老战士，也有镇压过当地老百姓的匪帮，这些匪帮受过西班牙人的训导，挺吓人的……马塞奥在巴拉科阿（*Baracoa*）登陆，曾一度孤立无援，但后来他到达圣地亚哥附近地区，十天后，当马蒂和马克西莫·戈麦斯登陆时，马塞奥已拥有数千名骑兵。

拉：他们在这一战争中所使用的战术，他们的游击战术，对您在1956年后在马埃斯特腊山的斗争是否起示范作用？

卡：在1895—1898年的战争中，古巴人同30万西班牙军队打仗。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是“19世纪的越南战争”。古巴起义军“芒比”（*mambises*）战士被迫进行非正规的战争。根据当时的观念，必须向西部即富饶的地区“突进”，“芒比”战士边行军，边烧毁一切。

而我们同他们不一样，我们根据我们的情况，没有毁灭蔗糖业。如果毁了蔗糖业，你就没法征税，就不能购买所需的物资，包括枪支弹药，也不能伏击在蔗糖业周围巡逻的军队。我们同他们的想法不一样。1895年“芒

比”战士是想烧毁一切：甘蔗田、榨糖厂，统统毁掉。因此，他们从岛的一端进军到岛的另一端，一路上烧毁了所有的糖厂，因为西班牙打仗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靠糖。作为糖的出口地，古巴这一殖民地给西班牙提供了无数资金。当时古巴的糖已向美国和欧洲等地出口，所以“芒比”战士的想法是要切断西班牙人的财源。

而我们所做的不是烧毁糖厂，而是尽可能征税。到战争结束时，我们已征收了约 800 万美元现金的税收，有的糖业主是后来才支付税款的，但还是交了。此外，糖厂是当时唯一就业的场所和维护支持我们的工人和农民的生计的。

拉：在 1895 年的战争中，马蒂与其他领导人如马塞奥或马克西莫·戈麦斯之间有没有发生过争吵？

卡：马蒂记录下这一战争所有的准备阶段和开始阶段所发生的事。他在他的战地日记中详细地做了记述。他的日记记得好极了。需要补充的是，由于马塞奥认为给他寄去的资金太少，不够登陆古巴所需的费用，马蒂不得不让另外一个人以足够的资金负责组织远征。于是马塞奥在马蒂临时任命的负责人弗洛尔·克龙贝特（Flor Crombet）的指挥下，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从巴拉科阿登陆。很快，马塞奥这位最杰出的、最有经验和最有威望的首领就成为数千名士兵的统帅，控制了周围地区的局势。

很难使马塞奥相信，马蒂在资金匮乏和刻不容缓的情况下所做出的上述决定是正确的。马克西莫·戈麦斯和马蒂来到营地。马塞奥接见了他们，他对待他们好像对待客人一样。正如马蒂在日记中所说的，马塞奥曾一度感到伤心。他们来后的第一天睡在营地外，后走进营地，进行辩论，看来，辩论十分激烈。马蒂在日记中写道，马塞奥发牢骚。甚至有些伤心，但是，最后还是接受了决定。他是一个诚实的、纪律严明的人，后来，他一直是这样。

拉：马蒂是否参加了战斗？作为知识分子，他有作战的经验吗？

卡：由于我前面所说的原因，马蒂自然没有作战的经验。在他离开马塞奥军营没有几天，1895年5月19日，发生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战斗。一支西班牙军队的小分队在离马蒂所在地不远的地方活动，与马蒂发生遭遇。马蒂渴望战斗。马克西莫·戈麦斯，这位久经沙场的老战士和军事首领呵斥马蒂：“你留在这里！”并派一名年轻的副官跟在马蒂身边。对马蒂这位自尊心很强的人来说，这等于对他说：“你不会打仗，留在这里！”1948年我在波哥大时也曾遇到类似情况，其实在此之前，我已多次参加过战斗的冒险行动，但那些军人还是对我说，让我留下来。

拉：是1948年盖坦（Gaitán）^①遇害时吗？

卡：是的，他们对我也说了类似“你留在这里”这样的话。是当时正在哥伦比亚访问、住在古巴领事馆的古巴军人对我说这番话的。此前，在领事馆门口刚刚发生了一场枪战。这当然是另一段历史了。

人们对马蒂抱有好奇，称他为总统：“总统万岁！马蒂万岁！”他同人们交谈，了解他们，他组织这一切，人们称他为总统，别人做不到这点。马蒂牺牲前的详细情况可从他写的日记和亲眼看到马蒂牺牲的副官的叙述中得知。

拉：这使马克西莫·戈麦斯感到不快吗？

卡：不是指这个。原籍多米尼加的总司令马克西莫·戈麦斯是令人钦佩、才能出众、纪律严明的将领，但他脾气不好。当时他在谈到马蒂时说（这是马蒂在他的日记里写的）：“不要在我面前称他为总统——他似乎害怕会毁了马蒂——我不允许这样称呼他。只要我活着，马蒂永远不会成为总统。”我这里引用的不是原文，而是我记得的大概意思。

^① 豪尔赫·埃利塞·盖坦（Jorge Eliécer Gaitán, 1898—1948）哥伦比亚自由党领导人，著名演说家。1948年4月9日遇害。他的死引起了一场民众起义，起义被残酷镇压，数千人死亡，这一事件史称“波哥大事件”（Bogotazo），参见本书第四章相关注释。

戈麦斯之所以这么说，还因为他对战时共和国总统这一职务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在战争中共和国不可能有固定的大本营，因此，这一职务没有实际意义。他认为马蒂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人。

1895年5月的一天，发生了一次偶然的战斗，戈麦斯劝马蒂带一名叫安赫尔·德拉瓜迪亚（Angel de la Guardia）的副官留在那里。但马蒂没有同副官留在那里，他对年轻的副官说：“年轻人，我们冲啊！”，他骑着马冲向埋伏在一牧场里的强大的西班牙军队。他几乎马上就战死。

德拉瓜迪亚在战争结束后发表的珍贵的回忆录中记述了马蒂遇害前后的事件。在投入战斗前，马蒂还在写日记，他给他的一位结识多年的墨西哥好朋友曼努埃尔·梅尔卡多（Manuel Mercado）写信。在这封未写完的信中，马蒂写道：“现在我每天都可能为我的国家和责任而献出生命——我了解这一点，并且有决心把它实现——我的责任是通过古巴的独立，及时防止美国在安的列斯群岛扩张，防止它挟持这一新的力量扑向我们的美洲。我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以及今后要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接着，他又写道：“以前我们对这一点不得不保持沉默并采用暗示，因为有些事必须隐蔽些，如实公布的话，可能引起过分巨大的不安，从而不易实现。”以上引用的是原文。这是马蒂在这封未写完的信中所说的话。

拉：这是马蒂生前最后写下的遗言。

卡：马蒂非凡地写到：通过古巴的独立，及时防止美国挟持这一新的力量扑向我们的美洲，“我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以及今后要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并说：“不得不保持沉默”，并解释为什么。这就是马蒂这位伟人给古巴革命者留下的难以置信的遗产。

拉：他的这些话对您影响深刻。您是否已把马蒂的话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

卡：是的。我是中学毕业后，读到他的话后开始具有政治觉悟的。此前，我一直在我父母送我去的教会学校念书。先是在法国人开设的拉萨列

(La Salle)小学，读到五年级；后在耶稣会开设的多洛雷斯(Dolores)学校，读到初二；后又在哈瓦那也是耶稣会开设的贝伦(Belén)中学求学，那时西班牙残酷的内战已经结束，内战中相互残杀。

中学毕业时，我读了有关古巴爱国者及其斗争的书，对他们及其斗争寄予极大的同情。在学校里很少给学生讲这些事情。当时学校教的，是美国人使古巴获得独立、成立共和国。当时我还小，不清楚爱国者在我国独立战争中所起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我那时去圣地亚哥看莫罗(Morro)堡垒和海湾，在海湾南部美国和西班牙曾打过一场著名的海战。^①

我当时无法知道美国是怎样进行和为什么要进行干涉。我在几处都看到了失败，这使人回忆起当年炮轰的场景。后来，我明白了。但当时我不明白这是一场什么类型的战争，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作为一名四五年级的小学生，又没有老师或其他人向我做解释，我当时无法搞明白。

拉：但是，您在少年时就开始读马蒂的著作并了解马蒂的政治重要性。

卡：我少年时最早阅读的是关于独立战争的书籍和马蒂的著作。当我开始阅读马蒂著作时我便成为马蒂的崇拜者。玻利瓦尔早在1823年就认识到帝国主义，他写到：“美国似乎是由上帝指定以自由的名义使美洲遍布贫困”，马蒂也觉察到这一点。第一个谈帝国主义的是马蒂，马蒂谈到了新诞生的帝国主义。他了解美国的扩张主义，了解美国对墨西哥发动的战争和其他战争。他极力反对并抨击美国的外交政策。他是先驱者。在列宁之前，马蒂就创建了一个进行革命的党，即古巴革命党。但这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因为当时古巴社会还是一个奴隶社会，一小部分自由人士和爱国者正在为独立而战。但是，马蒂的思想已非常先进，是反奴隶制的，

^① 1898年7月3日在圣地亚哥进行了一场海战。西班牙舰队在帕斯夸尔·塞韦拉(Pascual Cervera)海军上将的指挥下被威廉·桑普森(William Sampson)海军准将指挥的美国海军舰队摧毁，美国舰队在吨位、装备、大炮的射程和威力方面超过西班牙舰队两倍。350名西班牙海军在海战中阵亡。

主张独立和人道主义的。

拉：马蒂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吗？

卡：看来，他读过一些马克思的著作。因为在马蒂著作中谈到马克思。马蒂在谈到马克思时，有两三句赞美的话，我现在记得其中的一句是：“由于他站在穷人一边，值得尊敬。”^①马蒂还有其他一些赞美马克思的话。

拉：您是不是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马蒂的思想？

卡：马克思的理论是根据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来制定的。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出现将埋葬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著书立说时，正值1845年美国入侵墨西哥、吞并得克萨斯州。有人告诉我说，马克思当时认为这一吞并是积极的，因为它有助于生产力、工人阶级、矛盾和危机的迅速发展，将导向社会主义，这是他总的设想。当时没有谈及殖民地问题。

马克思对马蒂有没有影响我不太清楚，甚至对马蒂思想最有研究的专家也不清楚马蒂对马克思究竟有多少了解。但是，马蒂很清楚，马克思是一位为穷人而斗争的斗士。他知道马克思在为工人的组织而斗争，创建了共产国际。马蒂肯定知道这一点，尽管当时的有关争论几乎仅仅局限于欧洲，而马蒂正在为一个殖民地和奴隶制国家的独立而斗争。

对马蒂触动最大的事件是1871年8名古巴医科学生被残酷和不公正地枪毙的事件。1871年11月27日8名学生遇害时，马蒂才18岁。他写了文章和一首动人的诗，题目是：《致我的11月27日遇害的兄弟》。马

^① 马蒂的原话是“由于他站在弱者一边，值得尊敬”，这是1883年3月29日“纽约来信”的片断，发表在1883年5月13日布宜诺斯艾利斯《民族报》，信中马蒂回忆起纪念刚刚去世的著名的卡尔·马克思“这位心地善良、办事果断的德国人”的集会。参阅罗伯特·费尔南德斯·雷塔马尔（Roberto Fernández Retamar）和佩德罗·巴勃罗·罗德里格斯（Pedro Pablo Rodríguez）合编：《何塞·马蒂在美国：1881—1892年的报刊文章》（*En los Estados Unidos. Periodismo de 1881 a 1892*），马德里—巴黎—哈瓦那 ALLCA 出版社，2003年。这篇文章发表在《何塞·马蒂全集》，第9集，第387—397页，社会科学出版社，哈瓦那，1975年。

蒂也知道 1886 年 5 月 1 日芝加哥工人被杀害的事件，为纪念这一事件，5 月 1 日被确定为“国际劳动节”。马蒂在 1895 年开始投入独立战争，同年阵亡。

拉：马蒂是在战斗中阵亡的吗？

卡：是在战斗中阵亡的，他是知识分子，有着深刻的信念。

他满怀理想。他是多么敬重那些古巴独立战士！他纪念 11 月 27 日和 10 月 10 日这两个日子，10 月 10 日是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爆发的日子。他是作家、传记作家，他称颂所有伟大的爱国者。他有别具一格的风格。他的演说不太容易懂，他在发表演说时，不断涌现出一连串思想的火花。我有时候这样来描述：“在一条语言的小溪里涌现出思想的瀑布。”他发表了著名的演说，特别是在每个最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所发表的演说。

正如所有的西方人道主义思想，马蒂思想中也有基督教道义的内容。他是一位讲道德的人。基督教最好的道德价值观对马蒂有显著的影响，对他有显著影响的还有西半球独立战争的英雄的传统，欧洲的斗争和法国的大革命。他是新闻记者、作家、诗人、国务活动家和预言家。

我对您说，马蒂在列宁之前就组织政党，领导反对当时依然存在的合并主义派的斗争，他同时也反对自治派，因为他们不敢提及“独立”一词，他同这两派的代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拥护和平，对和平抱有诚挚的感情；他也主张进行独立战争，称这是一场“必须和迅速的”战争，他想使战争伤亡的人数尽可能减少。他坚决反对奴隶制和反对种族歧视，在这方面他写过很好的作品。

他主张建立一个“同所有人一起，为所有人的利益”的共和国，包括古巴人、西班牙人和各种种族的人。他的宣言是对未来极好的承诺，他是同后来成为总司令的马克西莫·戈麦斯一起在圣多明各签署的。宣言阐明了他对共和国的设想，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但不能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毫无疑问，他是同情劳动者的，因此，他也钦佩马克思的目标，他说，

因为马克思站在穷人一边，值得尊敬。

他无所不知，他对经济有深刻了解。他写了一些有先见之明的文章。他写道，美国首次建议要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①，即拉美经济共同体。您写过很多关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文章，不知您是否知道，马蒂在当时就已反对签订类似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条约。他机智地说明，这类经济共同体对拉美国家是不适宜的，他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同一个十分发达国家建立的同盟，这种联合对拉美来说是不适宜的。

拉：马蒂早就反对建立自由贸易区。

卡：马蒂写过很好的文章，今天可以拿来重新发表，以反对美国的吞并计划。您可看到，目前这些思想的深刻的根源。正因为这点，我认为马蒂的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拉：此外，他不仅主张古巴独立，而且主张波多黎各独立，是吗？

卡：是的，他的目标是争取古巴和波多黎各两个岛的独立。

当他准备下令开始独立战争时，遇到了难以置信和难以想象的困难。当时他已确定日期，购置了武器，做了巨大的努力，从坦帕（Tampa）工人那里募集了资金。马蒂是当时古巴工人的领袖，是坦帕卷烟厂工人的偶像，坦帕卷烟厂工人是支持古巴独立战争的主要捐款者。

① 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Area de Libre Comercio de las Américas, ALCA）的倡议是乔治·布什（老布什，George Bush）于1990年6月1日提出来的，后他的继任者威廉·克林顿（William Clinton）和乔治·W. 布什（小布什，George W. Bush）继续维护这一倡议。倡议主张实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所有的国家（除古巴外）一体化，建立一个拥有8亿人口的巨大的自由贸易区。倡议想把已于1994年1月1日生效的，由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Tratado de Libre Comercio de América del Norte, TLC）扩大到整个西半球。许多人认为美洲自由贸易区是美国企图巩固它在西半球的经济霸权地位，是对拉美国家民族经济道义上的危害。在本书作者撰写这一注释时，拉美强大的反ALCA的运动阻止了美国继续实施这一计划，这是美国在战略方面的一次重大失败。在2005年11月初在阿根廷马德普拉塔（Mar del Plata）举行的美洲首脑会议上，由于拉美一些国家代表团的反对，小布什的这一计划没能通过。

拉：这些卷烟厂工人是在佛罗里达工作的古巴侨民。

卡：这些古巴人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在美国工作。马蒂在古巴移民中，特别是在坦帕市的专门从事卷烟的古巴移民中享有崇高威望。这些古巴侨民把从古巴运来的烟叶，在佛罗里达卷成雪茄。马蒂的许多演说是在坦帕发表的。他创建的党的基础是工人，主要是卷烟工人。尽管当时不可能谈社会主义共和国，但他的纲领是当时最人道的和最进步的。如果您遵循马蒂思想的轨迹，最终会导致一个社会主义纲领。我认为新约全书和基督的说教也一样。用基督的说教也可能制定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纲领，无论您是不是信徒。

拉：特别是山上的布道^①。

卡：根据圣经，基督的布道、寓言和思想均被能读会写的渔民所收集。我有时候说：基督将水变成葡萄酒，使鱼和面包数量增加了数倍。我们也这么想，我们也想成倍地增产鱼和面包数量。^②富人埃普里翁（Epulión）对工作4小时的人和工作8小时的人支付同样的报酬，^③这是共产主义的分配，而不是社会主义分配。基督在某些时候也使用暴力，他打过商人，把他们赶出圣殿。^④但是，也出现了某些流派，他们没有多少基督教的东西，因为他们同富人结盟。

拉：在内心深处，您是一个伟大的基督徒。

卡：不久前，我对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说——因为查韦斯是基督徒，喜欢谈基督教，“如果有人称我为基督徒，不是从宗教角度，而是从社会学角度，那么我会说，我也是基督徒”，这是从我的信念和目标来衡量的。

① 《马太福音》，第5—7章；《路加福音》，第6、17—49章。山上布道具有耶稣教导的实质，是基督教学说的精华。

② 《马可福音》，第6、30—44、8章第1—9页。

③ 《马太福音》，第20章第1—16条。

④ 《马可福音》，第11章第15—19条。

在当时的时代，即野蛮人的时代，基督教教义是第一种学说，从这一学说引申出一系列非常人道的概念。不必成为宗教意义上的基督教徒，就会明白这一思想的道德价值和社会正义价值。当然，我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我过去没有，将来也决不会放弃。

拉：您肯定也是马蒂主义者，当然了……

卡：当然，我首先是马蒂主义者，然后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

拉：您的思想是马蒂思想的引申吗？

卡：我最初的政治思想是马蒂思想，然而，在1953年攻打蒙卡达兵营前，我读了不少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我当时具有马蒂的思想和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坚持这一思想。因此，当您说，革命是从7月26日开始时，我对您说，革命是从1868年10月10日开始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

我向您介绍了马蒂的作用和为什么我成为马蒂主义者。原谅我谈论得过长，但既然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我必须解释某些事情。



我
的
一
生

第二章 领袖的童年



童年在比兰—安赫尔先生—村落—母亲—“饥饿之家”—
拉萨列小学—西班牙内战的回响—多洛雷斯学校的耶稣会教徒

童年回忆录 第二卷

拉：历史的根源是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我想问您：您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在富人子弟上的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又攻读法律。受这样的教育，您完全可能成为一位保守派的领导人，是吗？

卡：是的，但人不完全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人也会受环境、困难和斗争的影响。困难会像一台车床加工一块金属一样锤炼一个人。我敢说，人不是生下来就是革命者的。

拉：您是如何成为革命者的？

卡：我是演变成革命者的。我曾思考过使我成为革命者的因素。这要从我出生地的农村和庄园的环境说起。

拉：您能描绘一下您出生的地方吗？

卡：我出生在一个庄园。庄园位于原奥连特省的中部偏北，离尼佩（Nipe）海湾不远，在马尔卡内（Marcané）糖厂附近。我出生的地方称作比兰（Birán）。比兰不是一个镇，连小村庄都算不上。那里只有几户人家。我的家就在那里，在一条从县城通往南方的、被称作“皇家之路”的土路旁边。当时的路都是泥泞不堪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或牛车。还没有汽车，也没有电。我小时候，照明主要是蜡烛和煤油灯。

拉：您还记得起您的故居吗？

卡：这是一幢西班牙式建筑，更确切地说，是一幢加利西亚式建筑。应该说明，我的父亲是西班牙加利西亚（Galicia）鲁戈（Lugo）省兰卡拉（Láncara）村人，贫农的儿子。加利西亚农民习惯在自己家里畜养牲口。

我的家是按照加利西亚的建筑风格建造的，房子盖在木柱子上，按照加利西亚的习惯，柱子高6英尺多。我记得，当我三四岁的时候，奶牛就睡在房子下面。傍晚把奶牛牵到房子下面，在那里挤奶，将奶牛拴在柱子上。像在加利西亚一样，我家房子下有猪圈和鸡窝鸭窝。鸡、鸭、几内亚鸡、火鸡，甚至鹅都在那里走来走去。

拉：我访问过比兰，参观过您出生的故居。它的确是一幢典型的加利西亚风格的建筑。

卡：它是木结构的房子。柱子是很硬的木头，是桃花心木或其他硬木。我记得开始时房子的底层是四方的。后来又延伸，建了一间卫生间、一间食品储藏室、一间餐厅和一间厨房。再后来，又建了一间附属设施，在拐角处建了一间办公室。在原来四方形的底层上方还有第二层，但面积要小些，称作“瞭望楼”。据说，我是1926年8月13日凌晨两点诞生的。

在这一环境下，我从小就习惯于农村的风景和劳动，熟悉那里的树木、甘蔗田，那里的禽鸟和昆虫。

拉：在比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能够感受到您父亲安赫尔（Angel）先生坚强的创业精神。

卡：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学会读书写字。毫无疑问，他很活跃，活动频繁，创业性和组织能力很强。

拉：您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到古巴来的？

卡：我父亲是非常贫困的农民的儿子。1992年我访问加利西亚时，到过他的故乡兰卡拉村，参观了他出生的房子。这是一幢小房子，长10米，宽6米。用石板建成，当地盛产石板，加利西亚的农民通常用石板来盖房子。父亲全家就居住在这幢房子里，我设想家里养的牲口也在那里。卧室和厨房都在唯一的一间房间里。家里没有自己的地，连一平方米的土地都没有。家里耕种租来的几小块分散的地。

我父亲十六七岁时，在西班牙被征兵服役，到古巴参加1895年爆发的第二次独立战争，那时他已二十多岁。我不太清楚他到古巴来时的身份。当我懂事时，我没有同父亲谈过这方面的事情。他有时候同他的朋友一起吃饭时，会同他们提起相关的事情。但是，我的姐姐安赫莉塔（Angelita）和二哥拉蒙（Ramón）——他们都还活着——也许知道得多一些，因为他们同父亲交谈得比较多。当我在哈瓦那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准备攻打蒙卡达（Moncada）兵营时，以及后来被捕入狱，再后来参加“格拉玛号”（Granma）远征时，我的弟弟劳尔（Raúl）（我比他大4岁多）和留在家里的两个妹妹爱玛（Enma）和胡安娜（Juana），他们同父亲交谈得比较多，也许我父亲同他们讲了更多有关他个人经历的事情，但我没能听到。

通过我的兄弟姐妹我得知了一些事情，如据说我的父亲是位加利西亚贫穷的青年，某位富人弟子为了避免服兵役，给了他一笔钱，让我父亲顶替他服兵役。看来，这可能是真的，我父亲很可能是这么服役的。您明白，当时的战争是怎么回事。

拉：当时是抓阍服役的，但富人可以付钱给穷人，让穷人顶替他们服兵役或参加战争^①。

卡：是的，就像您说的，当时有不少类似的情况，即当一位富人应该服役或参战时，他弄到一笔钱，把钱给一位居住在农村、种着一小块地或从事其他劳动的穷苦的农民，让他去服役。

我的父亲作为西班牙士兵被派到古巴，在胡卡洛（Júcaro）至莫隆（Morón）之间的通道（trocha）上修筑工事^②。马蒂逝世后不久，在马克

① 当时在大多数西方国家，这一办法很普遍，只要支付一定数量的钱，抓到阍应该服役的人可以让另一位比较穷的青年替他服役。如在美国，这一不公正的做法是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在1863年7月在南北战争时建立的，这曾引起纽约的一场骚乱，马丁·斯科尔西斯（Martin Scorsese）曾以此为题材拍了一部题为《纽约匪帮》（Gangs of New York）的电影。

② Trocha 意为在森林或草木丛中开辟的通道，这里是指在通道上修筑的防御工事、铁丝网和驻军。

西莫·戈麦斯和马塞奥率领下，东部“突进”军曾穿过这条通道。

拉：东部“突进”军无论如何必须得穿越这段通道，这是一项艰难的行动。这条修筑了防御工事的南北通道位于古巴中部最窄处，从北部的莫隆到南部胡卡洛港，全长可能有近 100 公里长。据我所知，我父亲曾在这里服役。但是，我想当马塞奥越过这条通道时，他还没有到那里。不断有古巴人通过这里，或者从北部一个名叫图里瓜诺（Turiguanó）的小岛通过这一通道，图里瓜诺和莫隆之间有一块沼泽地相连。我父亲就在这一通道当兵服役。这是我所知道的关于我父亲的事，也许我的兄弟姐妹们知道得更多一些。

拉：您还记得您同您父亲有关这段历史的谈话吗？

卡：有时候我曾听他讲过一些。我喜欢到马亚里（Mayarí）松林的工人居住地去，我喜欢去任何地方，就是不喜欢待在家里。家对于我来说是权威，而我那时就开始具有叛逆精神。

拉：您从小就是造反派？

卡：这有几个原因。当时对西班牙的专制主义，对统治的西班牙人和当局，一般都是尊重。但我不喜欢权威，当时还使用某种体罚，如敲打头部或身体其他部位，我们都有被处以体罚的危险，但我们已学会抵御这一危险。

拉：您父亲专制吗？

卡：他脾气大。如果没有坚强的性格，他就不可能做到这一切：他很年轻时就自立，先是远离家庭、远离祖国参战，后来，他身无分文、白手起家，又没有任何关系，最初他又是文盲，但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了自己的庄园，积累了财产。如同大多数加利西亚移民一样，具有谦虚和勤劳的精神。他有刚强的意志和性格，但他从来不会不公正待人。当有人相求时，他从不拒绝。他始终关注他人的困难。他自己从小就遇到很多困难。据我所知，他 11 岁时就失去了母亲，他父亲后来又结婚。

总之，他的童年是相当艰苦和不幸的。但是，他具有加利西亚移民崇高的品德：善良、好客和大方。

很多人一致证实，他是一个慷慨的人，甚至是一个善良的人。他心地很好。他总是帮助朋友，帮助劳动者，帮助那些处于困难的人。他有时也抱怨，发牢骚，但绝不会不解决问题。每当甘蔗季节结束、淡季来临时，就业机会很少。当有人走到他面前，对他说：“您看，我的儿子们有困难，我们什么也没有，我需要工作。”当时有一种调节的制度：“您清扫一下这个。”这种调节在古巴是降低地主成本的一种方法，其做法是同一个家庭或一个劳动者签订一项合同，让这个家庭或个人清扫甘蔗田，以卡瓦耶里亚（caballería）或洛萨（roza）^①为单位支付报酬，当时尚未使用公顷为计量单位。据我所知，1卡等于18洛萨。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各国当时的度量衡各不相同，后来，幸亏有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发明的公制。当时，这么订一份合同：“好的，干这个活，20比索。”我父亲特别找了清扫甘蔗田或其他并不是必需的活计，为的是帮助人们找到一份工作，尽管从经济角度来说，并不划算。我大一点后，放假时在庄园办公室帮忙，我觉察到这一点。我父亲就在那里给工人发号施令，让工人去商店采购货物，尽管没有同他们签订合同。他是一位善良和崇高的人。

拉：在1898年独立战争结束后，您父亲决定留在古巴？

卡：没有，1898年战争结束后，他被遣回西班牙，然而，看来，他喜欢古巴。第二年，像其他加利西亚移民一样，他又回到古巴。有档案记载，他于1899年12月在哈瓦那上岸。他身无分文，也没有任何关系，开始工作。后来，不知为什么，又到了奥连特省。当时美国种植园在那里大肆砍伐有着珍贵木材的森林，以扩张耕地，砍下的树作为糖厂的燃料。古巴东部珍贵的木材曾被用来修建西班牙埃尔埃斯科里亚尔（El Escorial）宫和其他建筑物，或用来建造著名的船只，如当时体积最大、威力最强的战舰“圣

^① 这两个农业计量单位今天仍在古巴普遍应用。1卡瓦耶里亚等于13.4公顷，1洛萨等于0.75公顷。

特立尼达”（Santísima Trinidad）号就是用此木材在哈瓦那造船厂建造的，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海战中被英国人俘获，后来，在一场暴风雨中沉没。

美国人雇用工人砍伐森林和耕种甘蔗。原是森林的土地很肥沃，最初的收成很好。

拉：您父亲替美国人干活吗？

卡：我父亲开始在奥连特省中部靠北的著名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干活。后来，他组织一批工人，同美国公司签订了承包合同，这些工人服从他的指挥。我听说，我父亲曾一度指挥过300名工人，因此挣了些钱。他具有一定的组织才能。但他不会读书写字，后来费好大劲才学会。他开始组织了一个小企业，砍伐森林、种植甘蔗，向糖厂供应木材。这样，作为这批工人的组织者开始取得了一定的积累。我想，这些工人是那些移民，其中很多是西班牙人和安的列斯群岛人如海地人和牙买加人。

拉：他最后拥有多少自己的地产？

卡：他拥有900公顷属于自己的地产，后来，他又向两名独立战争的古巴将军租了几千公顷的地。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到这些土地的。广阔的松林，大多数是原始的处女地。这些地遍布山谷和山岭，其中有一片海拔600米的丘陵地，那里生长着原始的松林。我父亲开发马亚里的松林。每天有17辆卡车满载松木从丘陵开下来。他靠甘蔗和牲口的收入不菲，他还拥有自己的土地，大多数的地是平原或在山脚下。总共他有1万多公顷的地。

拉：数量很大。

卡：您可以加一下，属于我父亲自己的土地，再加上承租的土地，总共不少于11000公顷。

拉：数量很可观。

卡：是的，是很可观。我可以这么说，是因为，在那种条件下，我确实已不是属于“相对”有钱有势的家庭，而是属于相当有钱有势的家庭。我这么说并不是论功摆好，而是实事求是阐明事实真相。

拉：这么说，您是百万富翁的儿子。

卡：谈不上是百万富翁的儿子。从来没有人说我的父亲是百万富翁。当时，百万富翁是巨富，是的确具有巨大财富的人。当时1美元还值一些钱，一个工人平均每天挣1美元，百万富翁就是拥有百万份一个工人的日工资。我父亲的资产还不到这么大的数目。不能说我父亲是百万富翁，但是，他相当有钱有势，经济地位相当高，至少在当时贫困和痛苦的社会把他的子女们看作是富人的子女。我可肯定地说，很多人之所以向我们靠拢，对我们亲近，是有目的的，但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

拉：在比兰，您的父亲不光是盖了房子，而且在“皇家之路”公路的旁边建起了一个面包房，一个旅馆，一个酒馆，一所学校和一些供海地人居住的房子……一个真正的小镇。

卡：我们居住的地方没有镇，只是有一些设施。最多可以称之为村落（batey）。当我小的时候，我家房子下面就养着奶牛。后来，在离我们家40米远的地方开了一家牛奶店，牛奶店对面有一家修理工具、犁耙等农具的作坊。附近还有一个小的屠宰场。离我家40米远的另一方向有一个面包房，离面包房不远处有一所公立小学。在公路旁，有一家商店，出售食粮和其他商品。在另一旁，是邮局和电报局。不远处有几个简陋的大茅屋，地面是土，屋顶是棕榈树叶，这里居住着种植和收割甘蔗的海地的移民，甘蔗的种植和收割是庄园的主要活计。我家附近有一片大的柑橘林，面积约有12—14公顷，我父亲亲自双手握一把大剪刀进行嫁接。除柑橘树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果树，有的是单个的树，有的是一小片一小片的，有香蕉、番木瓜、椰子、山番荔枝、牛心果等，还有3个养蜂场，40多个蜂箱，生

产大量的蜂蜜。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记得那个柑橘林，记得各种酸性水果树的位置，我用手剥柑橘，在假期和圣诞节充分享用。谁也不如我一下子吃那么多的柑橘。

拉：还有一个大的养鸡场。当时进行斗鸡比赛吗？

卡：是的。在离我家 100 米处，公路旁有一个您说的斗鸡场。在甘蔗季节，每星期天、圣诞节、新年、复活节的星期六和星期天进行斗鸡比赛。在当时农村，斗鸡是一项运动。

拉：是地方的一项娱乐活动。

卡：是的，因为当时娱乐活动很少。当时玩多米诺骨牌，也玩纸牌。我父亲年轻当兵时喜欢打纸牌，看来他是玩纸牌的高手。此外，在我 3 岁时，家里添置了一台留声机，是那种需要上发条的留声机，我记得是 RCA 维克托尔牌的柜式留声机，用来听音乐。当时连收音机也没有。我想我父亲是唯一有留声机的人。当我较大一些的时候，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家里添置了一台收音机。什么？不，大约是在 1936 年或 1937 年我 10—12 岁的时候，因为我们家购置收音机、一个电熨斗和一台小马达时，西班牙内战已经爆发。那台小马达每天运转两小时，靠几台蓄电池来带动。每天需要给马达添加一些雨水。

拉：这一切都是您父亲的财产吗？

卡：除了小学和邮局是公家的以外，其他均是我家的财产。1926 年我出生时，我父亲已积累了相当的财产，作为地主，他很有钱有势。人们称他为“堂^①安赫尔”“堂安赫尔·卡斯特罗”（Don Angel Castro），在他的那个领地，他是受人尊敬、权力很大的人。所以我对您说，事实上，我是地主家的儿子，我父亲多年来一点点购置土地。

① 西班牙语中，Don（堂）是先生的尊称。（译者注）

拉：给我谈谈您的母亲。

卡：她叫莉娜（Lina），古巴人，西部比那尔德里奥（Pinar del Río）省人，祖籍加那利（Canarias）群岛。她也是农民出身，家庭也很困难。我的外祖父是一个牛车夫，用牛车运输甘蔗。当他们一家搬到比兰时，我母亲只有十三四岁，她同父母、兄弟姐妹一起先乘火车从比那尔德里奥省到卡马圭，再从卡马圭乘牛车先到瓜洛（Guaro），最后到达比兰。

我母亲像我父亲一样，最初也是文盲。后来，几乎靠自学也学会了读书写字。她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她的意志也很顽强。我从未听说她上过什么学。她是自学的。她十分勤劳，十分细心。她是厨娘、医生、保管员，她向我们提供我们所需的每样东西，我们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向她求助并可得到她的帮助。但她并不溺爱我们，她要求我们遵守秩序，注意节省，爱清洁。她掌管全家内外日常事务，掌管全家经济。谁也不知道她哪来的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干这么多事。她从不坐下，每天从未见她休息片刻。

她共生了7个孩子，都是生在这个家，都是由一位农村接生婆帮她接生的。当时在整个这一偏僻地区，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医生。她千方百计使她的儿女能上学，她未能上学，但她希望她的儿女能上学。没有她，我这个一直喜欢学习的人，很可能到今天还是一个文盲。我母亲的情感虽然并不经常外露，但实际上，她很爱她的儿女。她性格坚强，勇敢，富有牺牲精神。她沉着地、毫不犹豫地承受我们子女中某些人并非有意地给她带来的痛苦。她无怨无悔地接受了土地改革和对她所热爱的土地的分配。

她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对此我一直是尊重的。作为母亲，她的痛苦找到了安慰，她为革命经受了許多磨难，她以母爱接受了革命；她的贫困农民的身分并没能使她有机会懂得人类的历史，懂得她所亲身经历的导致古巴和世界发生重大事件的深刻原因。在古巴革命胜利三年半后，1963年8月6日她去世。

拉：您父亲呢，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卡：他去世得早。他年龄比我母亲大得多。他是1956年10月21日

去世的。当时我 30 岁零 2 个月，也是我乘“格拉玛”号从墨西哥远征古巴前 2 个月。

拉：您父亲会说加利西亚语吗？

卡：会的，但他从不说。

拉：您听他说过加利西亚语吗？

卡：有时候听他用加利西亚语说过几句。那里居住着加利西亚人，我父亲可能用加利西亚语同他们交谈过。但是，那里也住着其他省的西班牙人，如阿斯图里亚斯人，他们不会讲加利西亚语。而加利西亚人却已习惯讲西班牙语，他们能讲西班牙语，懂西班牙语，能用西班牙语同其他人交谈，此外，他们不可能用加利西亚语同古巴人交谈，因为古巴人不懂加利西亚语。同工人、同大家说话必须讲西班牙语，甚至同未婚妻或妻子讲话也必须讲西班牙语，因为他（她）们不会讲加利西亚语。因此，我从来没有听他讲加利西亚语。

拉：当西班牙内战爆发时，您 10 岁。

卡：我还不满 10 岁。我 1926 年 8 月 13 日出生，西班牙内战是在 1936 年 7 月 18 日爆发的，当时我是 9 岁零 11 个月，我已会读书写字。

拉：您记不记得您父亲对西班牙发生内战感到担忧或谈论过它？

卡：在比兰居住和工作的西班牙人分成两派，每派大约 12—14 人。

拉：是指同您父亲在一起或常到您家来的西班牙人吗？

卡：是指同他一起承担各种工作的人或者是工人。当时那里有一个阿斯图里亚斯人，他有不少书，相当有文化。传说他会说 7 种语言，我相信他确实会 7 种语言。因为当我家购置收音机后，收音机里用英语或德语广播时，他翻译得出来。他一手歌德式的字写得很漂亮，他会拉丁文。这

个阿斯图里亚斯人——说他是阿斯图里亚斯人，因为他个子很矮——毫无疑问，是当地知识面最广、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他知道希腊，谈论狄摩西尼^①（Demostenes）；他是第一个同我讲狄摩西尼这位伟大的演说家的，他对我讲狄摩西尼的为人，讲狄摩西尼为了改正他那口吃的毛病，在嘴里含一块小石子的故事。就是这个阿斯图里亚斯人同我谈了这样和那样的故事。

这一派和其他几个人，当内战爆发时，他们赞成叛军，即赞成那些起来反对共和国的人。

拉：是指佛朗哥分子吗？

卡：是的。另外一派支持共和国。他们是工人，其中一些人是文盲。但其中有一位西班牙人，名叫巴莱洛（Valero），他是电报局和邮局局长，他同不少工人一样，支持西班牙共和国。这些工人中，有一位厨师，起初他是喂牲口的工人，后因为得了关节炎，几乎不能走路，所以让他改当厨师。我很尊重他和敬重他，但他饭做得不太好吃，我家的人对他做的饭菜经常抱怨。他名叫加西亚（García），是文盲。

拉：是文盲？

卡：是的。我小时候在比兰居住的人只有不到20%的人会读书写字，而且困难不小。很少有人读到六年级。我在那里的经历使我今天明白文盲的痛苦。谁也难以想象文盲有多么痛苦，因为，谁都知道什么叫自我尊重。而什么是文盲？文盲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他被迫请求一位朋友帮他给自己的未婚妻写情书。在比兰，不识字的人求识字的人帮忙给他写情书。但是，并不是由不识字的人念，识字的人写。比方他说，昨晚一晚上都做梦想她，吃不下饭老在想她等，仿佛这位农民真的想自己这么写信。不是的，而是他对识字的人说：“我不说，请您帮我写封信，就像您要给

^① 希腊著名的政治家和演说家（公元前384—前322）。（译者注）

您的情人写信一样，要博得她的欢心！”我没有夸张。这是我当时在家乡亲眼所见的。

拉：您本人还记得一些当时有关西班牙内战的争论吗？

卡：1936年我在圣地亚哥一所学校住读，当年夏天战争爆发时，我正在比兰度假，当时我还不满10岁，小学二年级还没有结束。

发生了什么？当我从圣地亚哥回到比兰度假时，由于我已会读书写字，所以曼努埃尔·加西亚，那位一条腿有些瘸的厨师，他干活很勤奋，当时他住在离邮局不远的一个小房子里，他急急忙忙请求我给他读报。他是铁杆的共和国派——从中您可以看到什么是阶级精神，很多次我问自己他为什么会是如此铁杆的共和国派，同时，说实话他也是非常反教权主义的，于是，我给他读报，读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消息。这样，我不到10岁就知道西班牙内战。我给他读各种报纸。当时在比兰有一份报，我记得是《消息报》，还有《世界报》《国家报》和《古巴日报》，但是，当时到达比兰的主要报纸是《海军日报》。

拉：这是一份哈瓦那的报纸。

卡：不，这不是一份哈瓦那的报纸，是全共和国的报纸。从独立战争开始起，它一直是一份亲西班牙的报纸，直到古巴革命胜利，它是全国所有的报纸中最右的一份报纸。每星期天，出一份照相和图片副刊。当时这份报很有名。它刊登许多广告，所以页数很多，报纸很厚。我跑到加西亚的木头房子去给他读报。我什么都读。报上褒义地称之为“造反派”。

拉：称佛朗哥分子为“造反派”。

卡：也把他们称之为“民族主义分子”。而将对立的一方则贬义地称之为“红色分子”“赤派”，这份报纸偶尔和蔼地称他们为“共和国派”。这是当时到达比兰的主要的报纸，最出名的、版面最多、消息多、纸张好、广告多的报纸。我给加西亚读报。尽管有时候还有一些其他报纸，关于西

班牙内战报道最多的是《海军日报》。

我记得这场战争，几乎从战争开始起。如我记得共和国军队占领特鲁埃尔（Truel）。

拉：记得埃布罗（Ebro）阵线吗？

卡：埃布罗阵线还要靠后，差不多战争快结束时。

拉：马德里之战记得吗？

卡：记得。马德里保卫战。这是共和国派给向马德里进军的驻扎在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的墨索里尼（Mussolini）士兵的打击。我对他讲，共和国派是如何进军并占领特鲁埃尔的，莫拉（Mola）将军又是如何发起反攻来重新占领特鲁埃尔的，以及讲其他来自聚集在佛朗哥的大本营布尔戈斯（Burgos）的驻军的消息。被包围的佛朗哥分子驻扎的堡垒叫什么名字？

拉：托莱多要塞（El Alcárcer de Toledo）。

卡：托莱多要塞。我给加西亚读关于托莱多要塞的战事，我站在这位加利西亚人一边。我甚至还安慰他。我对他说：“但是，您瞧，您瞧，特鲁埃尔战役打得不错——我提醒他——打得不错，您瞧共和国派他们，他们在这里和那里作战。”每逢有什么有关共和国派的好消息我都读给他听。我现在对您讲的，就是当时比兰所发生的确切情况。

拉：您父亲站在哪一派？还是对西班牙内战漠不关心？

卡：不，他不是漠不关心。他反对共和国。

拉：反对共和国？

卡：是的，他反对共和国。反对共和国的，还有那位拥有不少图书的阿斯图里亚斯人和其他一些人。我认为，在比兰的大多数西班牙人是反对共和国的。但是，还是有另外一些人，其中包括加西亚等一些西班牙人，

如电报局局长巴莱洛是铁杆的共和国派。

拉：他们打多米诺骨牌战争。

卡：同情和反对共和国的两派聚集在一起，进行激烈的多米诺骨牌战争。这有点像瓜雷斯基（Guareschi）著名小说中一位名叫堂卡米洛（Don Camilo）的牧师与一位共产党人市长之间的争吵^①。每逢暑假、圣诞节前夜和圣诞节15天假期以及复活节，我都给加西亚读报。我不太清楚当我上学时，谁给加西亚读新闻。他没有收音机，只有我父亲的大房子里有收音机。

拉：正是由于加西亚，您才关注西班牙内战？

卡：是的。他使我清楚地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班牙内战的情景，当时共和国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我给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种族灭绝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加上引号——发生交锋。西班牙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西班牙共和国会垮台？西方民主国家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从西班牙内战开始起进行的干涉采取的“不干涉”政策的实质是什么？这意味着什么？这促使世界大战的爆发。

最初的战役正是在西班牙的左派与右派即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支持的所谓的“民族主义派”之间进行的。而西班牙共和国是混杂在“民主制度”内部的左派，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最正确的、最得人心的，因为西班牙共和国在一个几乎是封建社会、尚未实现工业化、很长时间里依靠殖民地收入来维持的社会里捍卫进步思想。西班牙人民是战斗性很强的人民。

在西班牙甚至教徒之间也发生对抗和互相残杀。有些牧师站在共和国一边，有些牧师——可能占多数——站在“造反派”即“民族主义分子”

^① 乔瓦尼·瓜雷斯基（Giovanni Guareschi），意大利作家，以写幽默小说著称，在20世纪50年代十分流行，其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堂卡米洛的牧师，他同一位名叫佩波内（Peppone）的共产党人市长经常发生激烈、友好的争论。堂卡米洛的系列小说曾改编成多部电影，取得了巨大成功。扮演主人公的是法国著名喜剧演员费尔南德尔（Fernandel）。

或佛朗哥分子一边。当时我所在的圣地亚哥学校的西班牙老师经常谈论西班牙内战。从政治角度来说，他们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是民族主义分子，更确切地说，都是佛朗哥分子。他们谈论最多的是战争的恐怖、民族主义分子被杀害，包括教徒被枪毙等。西班牙内战确实很残酷，交战双方手腕都很强硬。

记得在内战结束后，我的一位老师对我讲述了有关内战结束后，共和国派战俘被枪毙后的情景。当时我在哈瓦那贝伦中学读书，这也是一所耶稣会办的学校，我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是牧师，其中有一位牧师名叫略伦特（Llorente）——内战时他是卫生员——他对我讲述了在战争结束后，枪毙了数万人，让他当卫生员，主要是检查每位被枪毙的人的遗体，在埋葬这些遗体之前，看看有没有还活着的。他详细地向我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毫无疑问，这对他触动很大。也有不少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站在共和国一边。

我对您讲述了我对西班牙内战的回忆。当然，后来我读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书，但我同您讲的是我当时所知道的事情。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埃布罗战役是在1938年。这是共和国派最后一次进攻。有关这场战役出了不少书，拍了不少电影。但是，我是在不到10岁时开始读报的，我得知这场战争是如何发展的。

拉：您认为您小时候对这场战争的兴趣对您的成长是否起了某种影响？

卡：是的。主要在关注国际事务方面。少年儿童都喜欢战争的场面。我也像几乎所有的孩子一样，喜欢看美国西部片，此外，我把电影里的事当作真事。

拉：但是，当时的西部片是非常种族主义的，是反印第安人的，是吗？

卡：我当时把牛仔的特技镜头当真。是的，我小时候把它们当真。后来，我大了一点，比较成熟了，我看到西部片里一拳头把威士忌粉红色的

酒瓶打到酒吧柜台的另一头，感到挺有趣。我还记得所有这些情节。牛仔的左轮枪里的子弹从来是打不完的，除非设计的情节有这个需要。当时虽然还没有机关枪，但枪声总是不断，越来越猛。谁要是骑马没有子弹，就会受到惩罚，被吊在树枝上。

所有的小孩都看西部片。从小就受到暴力教育。总之，在当时读报时，我怎么会想到后来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呢！

拉：后来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卡：我也确切地记得 1939 年 9 月 1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我已 13 岁，我从报上读到鲁尔（Ruhr）被占领、奥地利被吞并、苏台德区（Sudetes）被攻占、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和约（el Pacto Molotov—Ribbentrop）的签署、入侵波兰。虽然我不十分清楚这些事件的意义，但我得知所有这些事件。

我记得从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 1945 年以对日本投掷原子弹大战结束所进行的主要战役和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可以谈很多，因为当时我对它十分关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在读初小时，还发生过埃塞俄比亚战争。

拉：您记得埃塞俄比亚战争吗？

卡：记得。当时卖饼干时送小卡片，上面介绍意大利人占领阿比西尼亚（Abisinia）^① 的战争，当时人们称埃塞俄比亚为阿比西尼亚。

拉：称之为阿比西尼亚战争。

卡：是的，阿比西尼亚战争，当时就是这么称呼的。当时推销饼干的

^① 阿比西尼亚战争（1935—1936），1935 年 10 月 2 日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法西斯意大利发动了征服埃塞俄比亚的殖民主义战争。1936 年 5 月 2 日，意大利军队开进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ie）逃走。1941 年打败了意大利法西斯军队，海尔·塞拉西又恢复皇位。

商人为了刺激购买，奉送一套小卡片，上面介绍关于意大利人占领阿比西尼亚战争很少公布的 10 至 12 个场面或行动。有些小卡片从没有再印过，这样使得小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向家长要钱购买饼干。

我收集了许多套小卡片，几乎成了这场战争的专家。当时我在圣地亚哥拉萨列学校读书，我学会玩小卡片：将小卡片顺着墙壁斜倚，再用右手大拇指将卡片上方握住，然后再松开，让卡片转几转后再掉下来。那张卡片掉在另一张上，就赢一张。我在墙上做了记号，注意风向和其他细节，这一套技术还很有效。我不知赢了多少张卡片。

我现在还记得印在小卡片的图片和颜色。孩子们总是喜欢找那些从来没有过的印制卡片。

拉：总是缺几张吗？

卡：有几种卡片故意不印制，以此来刺激购买。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手段。我记得当时很难收集一套全的卡片。

一天，一位孩子对我说，他有一本拿破仑·波拿巴（Napoleón Bonaparte）图片集。图片集里的图片不是印在纸板上的卡片，而是另一种更好的纸，像相片纸一样，这套图片集是全的——我还保存着它，不久前，欧塞维奥·莱亚尔（Eusebio Leal）^①找到了这本图片集——这位孩子提议用这本图片集换我收集的有关阿比西尼亚战争的几百张小卡片。我立刻就同意了，因为这本图片集是很珍贵的。

拉：看来，您对战争很感兴趣。

卡：您看，《圣经》里谈到不少生动的事件和战争。从小学一年级起，在《圣经》史——当时我读的小学里设这门课——就谈到巴比伦（Babilonia）惩罚、以色列人或犹太人的奴隶制、渡过红河、约瑟（Josué）的号角、杰里科（Jericó）和桑松（Sansón）塔楼的倒塌和他们力大无比，可用双手推

^① 欧塞维奥·莱亚尔·斯彭格勒（Eusebio Leal Spengler），哈瓦那历史学家和古代殖民时期中心的修复者。

翻一座圣殿；摩西十戒板、变成崇拜物的教堂资产登记册。我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中，为表达社会主义思想，提道：“我们不相信教堂资产登记册（意即不相信金钱——译注）。”这是我在攻打圣地亚哥蒙卡达兵营后的自我辩护词，是在1956年。而我现在同您讲的是1936年的事情，我说过，当时我大约10岁。

拉：但阿比西尼亚战争要早于西班牙内战，您那时还很小。

卡：是的，阿比西尼亚战争要早些。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拉萨列小学读二年级，大约9岁。我前面说过，我通过交换，获得了那本美妙的拿破仑画册，哈瓦那那位知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因我曾经同他说起过这本画册，他找到了这本画册或者同它一样的画册。从画册发黄的图片来看，我相信这本画册就是我保存多年的那本画册，当时我赏心悦目地欣赏画册中有关著名战役的图片。如阿尔科（Arcole）战役，拿破仑在紧要关头，举起旗帜，越过大桥，高声喊道：“跟着你们的将军！”这会使所有男孩激动不已。然后，是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战役和其他所有的战役。拿破仑一生的主要经历通过图画得到展现。当时，很自然，我看得着迷，我同情这位将领，就像我同情历史书上不断赞扬的阿尼拔（Aníbal）和亚历山大（Alejandro）一样。我当时想，要是阿尼拔占领罗马该多好，我之所以同情阿尼拔或许是因为他带着他的大象越过了阿尔卑斯山（Alpes），或许是因为他不是最强者。我也喜欢斯巴达人，他们只用300人就守住了特尔蒙比拉斯（las Termópilas）山口。总之，今天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的拿破仑画册要远比西部电影好得多。

拉：您喜欢军事首领。

卡：所有的男孩都喜欢军事首领。我首先从《圣经》上有关的故事讲起。旧约上讲述了许多战争和新奇的事件：诺亚（Noé）方舟、洪水、接连下了40天雨。在《创世记》中谈到，在洪水之后，诺亚栽了一个葡萄园，葡萄制成葡萄酒，他喝酒有点过量，他的一个儿子便嘲笑他父亲。诺亚便

诅咒他这个儿子，罚他成为黑人^①！这件事记载在《圣经》上，我认为总有一天，教会本身会对此做修改，因为似乎黑人成了上帝的一种惩罚。看来《圣经》把成为女人也看作一种罪孽，把最初罪过的责任归咎于女人。

拉：您是否在要求天主教会改正这些内容？

卡：实际上我出自信仰并没有要求修正或改变这些内容。但是，勇敢的、果断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uan Pablo II）说过，进化论同创世的理论并不是不可调和的。

我曾同枢机主教和主教在某一场合交谈过这个问题。有两种观点。我认为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年历史的教会，是会同意男女平等的思想的，是不会把世界上的罪孽都归咎于女人的。也不应该由于诺亚的一个儿子嘲笑他，他便罚这个儿子成为黑人。

拉：您首先造反的也是您父亲，是吗？

卡：应该说我并没有造我父亲的反，造他的反很困难，因为他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我反的是权威。

拉：您不能忍受权威。

卡：我这是有前例的，并不是在10岁或12岁时才有的。在这之前，在我六七岁时，我就开始具有叛逆性格。

拉：您对您在比兰的童年还有什么其他记忆？

卡：我记得许多事情。有些事情对我产生了影响。但是，死亡对我童年影响不大。我不到3岁时，姨妈安东尼娅（Antonia）去世了，她是因难产去世的。我还记得全家悲伤的情景和大人们悲伤的气氛。她是我母亲的

^① 《创世记》第9、18—28章。诺亚诅咒并惩罚他的儿子闪（Cam）的儿子，即他的孙子伽南（Canaan）和伽南的后代即伽南族人成为永久的奴隶。根据《圣经》，他们居住的地方是腓尼基（Fenicia）—巴勒斯坦（Palestina）。

姐妹，同一个西班牙人结婚，这个西班牙人同我父亲一起在比兰干活，掌管着一片名叫索托的甘蔗田。我记得我们沿着甘蔗田田边的小路走，女人们边走边哭，一直走到一间木头房子。我记得姨妈的去世，但这对我影响不大，因为我那时很小，不知道死意味着什么，没有任何概念。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火车头的情景。蒸汽火车头所有的一切，它的轮子、声音、力量、汽笛声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人们乘火车来到甘蔗田收割机前，将收割下来的甘蔗运到榨糖厂去榨糖。我感到火车头真是一个庞然大物。

当我七八岁上小学时，我听到有关巴尔韦兰（Barberán）和科利亚尔（Collar）航行^①的消息。在比兰人们说，“巴尔韦兰和科利亚尔就是从这里飞过的”，这两个西班牙飞行员越过大西洋，飞往墨西哥。但是，后来再也没有听到关于巴尔韦兰和科利亚尔的消息。至今人们还在争论，他们究竟是在哪里遇难的，是在比那尔德里奥和墨西哥之间的海上，还是在尤卡坦（Yucatán）或是在其他地方遇难的。他们驾驶一架螺旋桨小飞机完成了飞越大西洋的丰功伟绩，当时航空飞行刚刚起步。他们的飞机上装满了汽油罐，当时这是唯一能做的事。他们从西班牙起飞，抵达古巴。后又再起飞，想飞到墨西哥，但是，由于飞机失事，他们没能到达墨西哥。

我从小就看到飓风。狂风暴雨，卷起巨浪，暴风雨迅猛地袭来。当我四五岁时，我还遇到过一次地震^②。我家的房子激烈摇晃起来。所有这些自然现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① 华金·巴尔韦兰·特罗斯（Joaquín Barberán y Tros）上尉和华金·科利亚尔—塞拉（Joaquín Collar y Serra）中尉成功地用39小时55分钟进行了当时世界上在海面上飞行距离最长、长达4000海里（7320公里）的航行。他们于1933年6月10日西班牙时间凌晨4:45从西班牙塞维利亚（Sevilla）塔博拉达（Tablada）机场出发，乘坐一架“四风”号半双翼飞机飞向古巴。6月11日古巴时间下午3:40抵达卡马圭古巴的土地。然后从卡马圭飞达哈瓦那哥伦比亚机场。几天后，他们在从哈瓦那到墨西哥城的航行中，因飞机失事而失踪。

② 1929年2月2日，菲德尔·卡斯特罗两岁半时在古巴东部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使圣地亚哥市遭到巨大损失。

拉：还有什么事，对您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卡：一种特权和一种运气。我是地主的儿子，而不是孙子。如果我是地主的孙子，我可能出生在一个贵族住宅区，而我的朋友，我所接触的文化，很可能会使我充满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我出生的地方，全是穷人，是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孩子。我自己的家庭、我母亲的家庭是穷的，我父亲的几个来自加利西亚的表兄弟是穷人，我父亲在加利西亚的老家，也是非常穷的。

可以肯定地说，小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出生的地方住的都是最穷苦的人。我还记得那些文盲的失业者，他们在甘蔗田附近排着队，没有人给他们一口水喝，没有人给他们提供早餐和午餐，他们既没有地方住，也没有交通工具。我也不会忘记那些光着脚走路的孩子们。在比兰同我一起玩、一起到处跑来跑去的孩子，都是穷人的孩子，其中有些孩子，我在吃午饭的时候，从家里给他们带满满一罐头可口的饭菜，这不是我们家的剩饭。我同他们一起游泳、骑马、步行，到处漫游，去扔石子，去捉鸟，现在捉鸟会遭到责备，而当时都习惯用弹弓捉鸟。而后来，我在圣地亚哥和哈瓦那读书时，上的学校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学校，那里有地主的子弟。

拉：您也同他们一起相处过。

卡：他们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当然，我同他们也建立了友谊，同他们一起玩，做体育活动等。但我没有同他们一起住在富人区。

在那里我们脑子里想的是其他事情，主要是体育活动、上课、远足等。我有进行体育活动和爬山运动的习惯，这是我的两项自发的爱好。此外，拉萨列学校在圣地亚哥一个半岛上拥有一所庄园，如今半岛上有一家炼油厂。半岛名为伦特（Renté），上面有一个浴场。浴场中用棕榈树干竖了几根桩，划定了一个游泳的范围，因为这里是一个海湾，鲨鱼经常在这里出没，其危险是真实的，尽管并没有那么可怕。浴场有三块跳台。我可算是跳水运动员，因为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我就从最高的

跳台跳水，似乎是对我的同伴的一种挑战。谁在跳水？“呼”的一声，我跳入水中。还好，幸亏没有头朝下。跳台很高，但我想都没有想，就往下跳了。

拉：您当时会游泳吗？

卡：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在比兰的池塘和河流里学会了游泳，是跟童年时同我进行各种冒险活动的伙伴一块学会的。

拉：同您那些贫苦出身的伙伴一起学会的吗？

卡：是的，同我童年的那些伙伴和朋友们。我没有接受资产阶级文化。实际上，我父亲是一名孤独的地主。我的父母很少出门去拜访别人，也很少接待客人。他们没有养成富人家庭的文化和习惯。他们整天干活，我们所接触的只是居住在比兰的人。

拉：同您一起玩耍的孩子中，有没有黑人？

卡：在我家里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不许同这个或那个孩子玩耍！”这样的话，从来没有过。我常常去海地人居住的大茅屋那里玩，因此我家里常常斥责我，但不是因为社会地位的原因，而是因为卫生的原因，因为我常在他们那里吃烤老玉米。我家里常常威胁我说，要把我送进位于哈瓦那西部的瓜纳哈伊（Guanajay）少年教养院。

拉：是教养那些叛逆的孩子的教养院吗？

卡：我家里人对我说：“我们要把你送进瓜纳哈伊教养院去，因为你总是到海地人的大茅屋里啃老玉米！”他们不止一次因这个或那个原因威胁我。当我开始明白事情时，我感到我最好的学校是童年时所生活的农村和我出生的地方。农村意味着自由。

后来，因为我是富人的儿子，我受到了剥削。

拉：受到了剥削？

卡：是的，受到了剥削。

拉：是什么样的剥削？

卡：您听我讲。我年幼时在比兰公立小学读书，当时我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家里就把我送到小学，因为我的一个姐姐安赫莉塔和一个哥哥拉蒙也在那所小学学习，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我还记得送我上学的日子。我记不清楚，坐在第一排的我是怎样学会读书写字的。

我记得这是 1930 年。

拉：您那时是 4 岁。

卡：是 4 岁。我看着别人和看着拿着粉笔的女教师，学会了读书和乱涂乱画，作为一个地主的儿子，我也经常调皮捣蛋。那位女教师常到我家来，同我家一起吃饭。在学校里，实行体罚，我记得常常用尺打板子。有时还罚跪，让你手伸直，手心里放上重物。虽然没有让我们跪 3 个小时，但即使是几秒钟，也是够受的。更厉害的是，有时候还放上玉米粒。

拉：放在膝盖下面？

卡：是的，放在膝盖下。我体验了学校的各种体罚，尽管体罚并不是每天都有，不是经常的。体罚是用来吓唬我们的办法。

拉：这是折磨。

卡：我那时已经相当叛逆，要说为什么这样，有些事情，说来话长。如您想知道，以后再对您讲，是什么事情使我成为叛逆者。我不得从小就自己解决问题，这使我了解了世道的不公和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但现在我们不谈这些事情，您不一定对这些事情感兴趣。

拉：我感兴趣。

卡：到时候，如您愿意的话，我可同您讲。但是，我补充讲这些事情，是因为我认为，它们有助于我们原计划要谈的问题：我是怎样成为一名革命家的？什么因素影响了我的一生？尽管我的社会出身是地主的儿子，尽管孩子们是自私的，是好虚荣的，并且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点意识。

拉：在比兰小学，您是唯一的富家子弟吗？

卡：除了我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外，我是唯一的富家子弟。小学里没有其他人是富家子弟，连中等家庭的子弟或店主的子弟都没有。学生的父亲都是农业工人，最多的拥有一小块土地。所有的学生都是非常非常穷的穷人的子女。

拉：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您父母才决定把您送到圣地亚哥，让您接触另一种社会地位的孩子？

卡：不是。我不认为我父母曾考虑过这个原因。我父母为我做了些什么？在我6岁时，他们送我到圣地亚哥，因为他们听我的女教师说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此前，他们就已决定让名叫欧弗拉西娅·费利乌（Eufrasia Feliú）的比兰小学的女教师把比我大三岁的姐姐安赫莉塔带到圣地亚哥她的家里去。我6岁时，我姐姐9岁或10岁。于是，把我姐姐和我一起带到圣地亚哥，我父母觉得应该把我这个孩子也带到圣地亚哥去，在女教师家里接受更好的教育。我既吃惊又好奇，没有吭声就跟着去了。

拉：您从农村出来，圣地亚哥给您的印象如何？

卡：当时圣地亚哥同现在相比，还是一个小城市。但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觉得它大极了。因此，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后来我16岁时首次看到共和国首都哈瓦那时给我的印象一样深刻。在哈瓦那，我看到了高楼大厦，当时四五层楼的房子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大了。而当时圣地亚哥一般的房子都比较矮，比较小，几层的楼房很少。但我要补充说

一下，我6岁时在圣地亚哥第一次看到了大海。我来自农村，来自山区，来自内地，因此当在圣地亚哥海湾出口处第一次看到大海时，我很惊讶。

拉：您在圣地亚哥住的房子是什么样的？

卡：这是一幢木头房子，位于总督山上，属于比较穷的埃尔沃利区……房子又窄，又暗，又潮，又小，有一间小客厅，客厅有一台钢琴，有两间房间，一间洗手间，还有一个阳台，从阳台望去可看到马埃斯特腊山美丽的风景，以及附近圣地亚哥海湾的部分景色。

房子的墙是木板的，房顶是褪了色的红瓦，房子门前是一个小广场，没有树木。旁边是一排只有一间房间的平房。在另一个街区，有一个杂货店，出售用粗糖加工做的椰子糖。对面，在小广场另一边，我记得有一幢大房子，是一位名叫伊迪的摩尔人富翁的。紧挨着的是一所中学。我在这所房子里度过了寒冷的日子，我记得当时那所中学被士兵所占领，因为这所中学所有的学生都反对马查多（Machado）^①。我记得我曾见到被士兵占领的中学的一个场景：士兵们用枪托殴打一个老百姓，可能是他对士兵说了些什么。类似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住在对面，看到了这些场景。

气氛是紧张的，士兵们逮捕行人。比兰有一位名叫安东尼奥（Antonio）的机械工被关在监狱里。后来我听说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我记得他的妻子在探监时把我也带去，那时我还很小。监狱在圣地亚哥市大道的尽头一个不祥、阴暗的地方，其墙壁肮脏不堪。一想起那些狱监、铁栅栏和囚犯的目光，我就不禁毛骨悚然……

圣地亚哥我所居住的那幢房子，每当下雨，屋顶都漏水，把一切都弄湿了。房子里下雨比外面还要厉害。只好用脸盆去接漏下来的水。房子里非常潮湿。我和姐姐就被带到这家人家。在一间小房间里，放了一

^① 赫拉尔多·马查多（Gerardo Machado），古巴总统、独裁者（1925—1933）。以亲美立场和对反对派进行残酷压迫著称。1933年爆发“1933年革命”，革命以一场大罢工结束，面临大罢工，马查多于同年8月逃离古巴。一个月之后，1933年9月4日，发生了以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为首的“士官叛乱”。

张床，女教师的父亲内斯托尔（Néstor）住在那里。另一间屋子，住着女教师的一个姐姐，她是一位钢琴教师，是一位优秀人才，但她连一个学生都没有。

拉：那时有电灯了吗？

卡：是的，已经通电了，但使用得不多。还继续使用油灯，我想可能因为油灯省钱。

拉：在那幢房子里住了多少人？

卡：住了姐妹3人，他们的父母是海地人，不知道她们是在法国还是在海地上的学。她们是混血种人。一个是教师，另一个是钢琴教师，第三个是医生，但第三个医生在我们住进去前就已去世。姐妹两人同她们的父亲鰥夫内斯托尔一起居住。此外，还住着我的姐姐和我，总共是5人。在学期里女教师还继续去比兰上课，在放假时回家。后来又来了一位年轻的农妇埃斯梅利达（Esmérida），她是这个卑微的、凌乱的家雇的女佣。但从未见到曾支付工钱给她。这样，总共有6人。后来，我的哥哥拉蒙在我劝说下也到圣地亚哥来了，这样连女教师在内，共7人。实际上，我们住得比较拥挤。

拉：这是在什么时期？

卡：是在马查多独裁时期。当时在古巴有不少人挨饿。马查多垮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饥饿。因为，除了192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外，更糟糕的是，美国根据在古巴依附性的共和国成立初期时同古巴签订的贸易协议，禁止古巴生产许多产品，强迫古巴从美国进口这些产品，尽管美国仍向古巴购买蔗糖，但是，由于发生经济危机，它强迫古巴在出口糖时支付美国所规定的关税。这样，限制了古巴蔗糖的出口，使糖价降到最低水平，使古巴经济更加萧条，饥饿遍布全国。

拉：这是经济危机的时期，也是政治压迫的时期。

卡：马查多开始执政时曾得到人民的支持，因为他采取了一些民族主义措施，并兴建了一些工程和几家工厂，力图发展工业。然而，他很专横，很快他的政府成为血腥的政府，遭到了大学生的反对，特别是大学生联合会和古巴共产党创始人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Julio Antonio Mella）^①的反对。当时梅利亚只有20岁或21岁，他是大学生、工人和人民的象征人物。后被马查多下令在墨西哥被杀害。

梅利亚是一位特别能干的、早熟的青年，是继马蒂之后古巴最杰出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提出要建立“工人大学”这一光辉思想。当时，大学生到大学来听他演讲历史和英雄人物。的确，1917年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发生，他在这场革命的激进主义和革命的原则的启发下已创建了古巴共产党。梅利亚是马蒂主义者，也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坚决的同情者。这使他同马蒂的朋友、马克思主义者卡洛斯·巴利尼奥（Carlos Baliño）一起，创建了古巴第一个共产党。

拉：马查多是在1933年被推翻的吗？

卡：是的。马查多是在8月被1933年革命推翻的，在9月，发生了“士官叛乱”。我刚满7岁。士官们以造马查多的同伙军官的反为荣。这时，所有的组织都摆脱了地下状态。在反对马查多的组织中，有一些是左派组织，也有一些是以右派思想指导的组织，其中有一个甚至是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思想为指导的右翼组织。在一个有战斗力的运动，即大学生运动中，涌现了一位生理学教授，名叫拉蒙·格劳·圣马丁（Ramón Grau San Martín），被提议并最终成为古巴总统。马查多被推翻3周后，在9月4日运动之后，成立了格劳政府。在政府中，安东尼奥·吉特拉斯（Antonio

^① 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Julio Antonio Mella，1903—1929）1922年创建了大学生联合会（la Federación Estudiantil Universitaria，FEU），1925年创建古巴共产党。其真名是尼卡诺尔·麦克法兰（Nicanor MacFarland）。在马查多独裁统治期间（1925年5月至1933年8月），曾被捕入狱，曾进行绝食。后被释放，释放后流亡墨西哥，1929年1月10日在墨西哥遇害。

Guiteras)①被任命为内政部长。他是一名年轻的十分勇敢和无畏的人，曾在奥连特省圣路易斯占领一个兵营，曾采取各种坚决的武装斗争方式反对马查多。

拉：安东尼奥·吉特拉斯。

卡：吉特拉斯使人们尊重法律，他没收了电业公司和其他美国公司，这在古巴是前所未有的。他推动了成立工会的法律，规定每天8小时劳动的劳动法，以及其他一系列由格劳政府颁布的进步措施。

他颁布的法律中有一项法律有一定的可理解的理由，但它本身不完全是公正的。这就是《劳动国有化法》，这项法律颁布后，使得许多海地人被残酷地驱逐出古巴，尽管这并非这一法律的本意。吉特拉斯是格劳政府中最强有力、最有决心的部长，在他推动下，政府颁布了这一法律，其目的是想保护古巴的劳动者，使他们不再受许多西班牙商人的排斥，因为西班牙商人在用人时优先考虑的是西班牙人的家属。

当时古巴政府开始是5人政府，后来由格劳·圣马丁教授任总统。格劳任总统的头三个月里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古巴人民的法律和措施。然而，美国通过其驻古巴大使本哈明·萨姆纳·韦尔斯(Benjamin Sumner Welles)已开始对巴蒂斯塔产生影响，尽管当时美国总统是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他正在拉丁美洲推行其“睦邻政策”。

由于美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和本质，美国在英国和法国之后已成为一个强大和崛起的帝国强国，但当时美国也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危机使美国人民遭受巨大打击。我认为，罗斯福是我们北方邻国历史上最好的总统之一。数年后，我上中学时，对罗斯福抱有好感。他是残疾人。他演说

① 安东尼奥·吉特拉斯·奥尔梅斯(Antonio Guiteras Holmes, 1906—1935)，生于美国费城，在费城度过童年。其家庭于1914年定居比那尔德里奥，父亲在该市任英语教授。吉特拉斯是1933年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后任临时政府部长，任内采取了社会改革措施，如颁布最低工资法、8小时工作法等。在1934年1月政变后，巴蒂斯塔实行残酷镇压，1935年5月8日吉特拉斯遇害。

时激情的嗓音很吸引人。

也许罗斯福出于对古巴人民的精神和战斗性的钦佩和出于改善同拉美关系的愿望，也许是他预感到由于希特勒的上台会使世界的未来变得不确定，他所做的好事是，废除了普拉特修正案^①，并批准了海—克萨达条约，根据这一条约，美国将它所占领的、前途不确定的松树岛（Isla de los Pinos）——今称青年岛（Isla de la Juventud）特别县——归还古巴。

拉：该岛是由美国军事占领的吗？

卡：美国从 1898 年起一直占领着松树岛。

拉：它是不是由古巴共和国管理？

卡：不是。从普拉特修正案实施时起，它一直是美国的领地。松树岛被收复了，但关塔那摩基地还在美国人手中。普拉特修正案作为古巴宪法的修正案，授予美国有权干涉古巴内部事务的权利。

拉：普拉特修正案是在 1902 年签订的吗？

卡：是在 1901 年强加的，1934 年被废除，具体日期记不清了。

吉特拉斯在政府中只任职约三个月。到 1934 年初，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将他赶出政府。1935 年安东尼奥·吉特拉斯准备离开古巴去墨西哥准备继续斗争时被杀害，正如此前梅利亚所做的和此后我们所做的一样，离开古巴去墨西哥准备继续斗争。

在 1933 年革命政府时期，展开了几次战斗，其中一次是在首都国家

^① 美国自 1898 年起军事占领古巴，并把一项“修正案”——以提案的美国参议员名字命名的“普拉特修正案”——强加给古巴 1901 年宪法。此修正案明显地限制了古巴新生共和国的主权，规定美国有权干涉古巴内政，将松树岛从哈瓦那的辖区内划出，强迫古巴政府向美国军舰提供建立储煤站和海军基地所需之领土。其中一个“储煤站”自 1903 年 7 月 2 日起成为关塔那摩海军基地，至今美国仍违背古巴的意愿霸占着这一基地。由于美国乔治·W·布什将这一基地变成非法关押所谓的伊斯兰恐怖分子的中心，至今这些人仍被美国军队关押，这使关塔那摩基地在全世界媒体中出了名，媒体多次揭露这里对被关押的人的酷刑和非人道的待遇。

饭店进行的，在饭店里躲藏着一些拥护被推翻的马查多政府的陆军军官，其中有些人训练有素、枪法很准。最终这些军官都被士兵和军士赶了出来，但战斗十分激烈。

还有 ABC 集团分子，他们曾经反对马查多，但他们的思想趋向是法西斯的，他们造反，占领警察站，进行战斗，最后一次是在阿塔雷斯(Atarés)旧城堡进行的。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反对进步的政府，反对吉特拉斯颁布的法律。

巴蒂斯塔夺取军队的大权，军队成为他的军队。后来，在美国大使的压力下，推翻了政府，任命另一位总统。巴蒂斯塔本人晋升为上校，其他的士官被巴蒂斯塔晋升为中校。当时没有将军，其他一些老的低级军官和所有的士官们都被晋升为中尉、上尉、少校、中校。我相信唯一的上校是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他是陆军司令。

这发生在 1934 年。巴蒂斯塔统治了 7 年，一直到 1940 年立宪大会的召开。这一时期我在圣地亚哥，先是住在女教师家里，后来是在耶稣会开设的拉萨列学校和多洛雷斯学校住读。1942 年我到也是耶稣会开设的哈瓦那贝伦中学学习，正如前面我对您所说的，这是全国最好的中学。1945 年我中学毕业。

这就是我对您讲的我的童年生活。



我
的
一
生

第三章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

1961年10月



最初的叛逆—政治气氛—马查多和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哈瓦那—贝伦中学

拉：您的知识的形成是在两个不幸的时期：一个是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第一次独裁统治时期，另一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卡：这一切毫无疑问都对我的成长产生影响，但是，对政治和革命力量的产生和发展影响更大。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末，产生了著名的人民阵线。但是，我现在先不谈这些。

拉：您在女教师家受到了什么教育？

卡：她什么也没有教我，什么课也没有给我上，也没有送我到学校去学习，把我放在那里，什么也不让我干。在她家里没有收音机。我唯一听到的是钢琴声：多，来，米，发，少，拉，西，巴，巴，巴。您想，每天听两小时这样的钢琴声，会是什么滋味？我本应成为音乐家。

女教师的姐姐，那位钢琴教师本来应该是教我小学课程的老师，但她什么课也没有给我上过。我从这段经历开始讲起，但现在不想铺开讲。如您愿意，以后我再详细对您讲。我对您说，我是自己一个人通过印在练习本红色封皮封底上的加、减、乘、除表自学学会加、减、乘、除的。我独自一人学习，背加、减、乘、除表，别的什么也没有学。因为她们什么也没有教我。所谓上课就是自学练习本封底上的加、减、乘、除表。我在那里待了两年，时间都浪费了。

拉：您那么小，一定很想家。

卡：家里人把我送到那里，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学到，反而遭受许多磨难，甚至忍饥挨饿，当时我还不知道是饥饿，以为是胃口好。

拉：难以置信。

卡：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事情。在那里我第一次造反，我那时很小，大约是8岁。但我已出门在外，经历了两个阶段。

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使您失去了对您父母的爱？

卡：没有。我对我父母一直是热爱的，起码对我的父亲和母亲是尊敬的。对我母亲更亲热一些，这是自然的，母亲总是对子女更亲近一些。

拉：尽管他们让您在圣地亚哥住读。

卡：住读？没有，还没有。我当时可以说是被流放，忍饥挨饿，把饥饿当作胃口好！

拉：您把它归咎于谁？

卡：我不能把它归咎于我父母，也不能归咎于任何人。说实话，在最初，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倒霉的事。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不能做出判断。我本来在比兰感到挺幸福的，突然，把我送到一个远离父母、远离家庭、远离我喜欢的农村的地方。我被迫忍受不是我亲的人的不公正待遇。

拉：在那里您有小朋友同您一起玩耍吗？

卡：有的，幸亏有。有一位名叫加夫列利托·帕劳（Gabrielito Palau）。他的父母是做买卖的，经济状况比较好，在小广场附近有一幢好房子。我和他以及其他小朋友一起在旁边的马路上玩耍。他很长时间，直到革命胜利后一直在电视台工作。现在仍在工作，我想，可能还在电视台。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了。

此外，我在那里度日如年。很快，我厌倦了那里的生活，厌倦那个房子，厌倦那人家，厌倦那里的规矩。我的反应犹如一个被追捕的小动物的本能的反应。

拉：什么规矩？

卡：那家人受的是法国人的教育。他们法语讲得很好，他们保持着细致的形式。所有的规矩，所有的形式，都要求我照着做。如说话时要细声细语，不能大声嚷嚷，不能说一句粗活。有时候，还用鞭子打我。如果我表现不好，就威胁我说，要送我进拉萨列学校住读，后来在我最后一年，我在该校读了一年级。我在那个人家浪费了两年时间。当时我的年龄在今天古巴的孩子可以升三年级。

拉：总之，您是一个受到虐待的孩子。

卡：反正是够受的。在头几个月，我的鞋子破了，还得自己缝补。有一次我不小心弄断了一根缝衣服的针，便遭到训斥。我穿的鞋子开线了，我只好自己去缝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用细的线去补，因为没有别的线。这是我自己找的麻烦。我不会光脚走路，不得不自己补鞋。我不记得后来是如何解决这场争吵的。反正，后来争吵得到了解决。

当然，我不想夸大，我不是关在集中营。当时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女教师的家庭比较穷，全靠她一人的工资维持。当时的政府常常拖欠教师的工资。有时要等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领到工资。这造成不安情绪和过分的自私自利。家庭每花一分钱都必须精打细算。

拉：您说在那里忍饥挨饿？

卡：是的，忍饥挨饿。在比兰我吃饭时，他们强迫我吃；在圣地亚哥，我特别爱吃饭。我突然发现，米饭是那么好吃，有时候他们家蒸米饭，并在米饭中加一块红薯或一点肉末。我记不得曾吃过面包。但是，问题是在她们家共有六七个人要吃午饭和晚饭，如何解决吃饭问题？晚饭是由女教师的一位名叫科西塔的堂姐妹做好后拿到家里来的，科西塔（Cosita，西班牙语意为“小东西”——译注）非常胖。我不知道为什么称她为“小东西”，看来她是吃得最好的人。她在自己家里做饭，由一位姓马西亚尔的堂兄弟——他的名我忘了——把蒸好的米饭、芸豆、红薯或香蕉，偶尔难

得还有一点肉末准时拿到女教师家里来。然后，再分给每个人。我记得我每次都会把叉子上的米饭舔得干干净净，一粒米都不剩。

拉：既然在他们家那么不愉快，为什么后来您的哥哥拉蒙也到他们家去了？

卡：有一天，拉蒙到圣地亚哥来，我记不得是来干什么，他带了一个装硬币的小皮钱包，口袋里装了一些 20 分的比塞他、10 分的雷亚尔及 5 分和 1 分的硬币。当时，一根冰棍是 1 分钱，一块粗糖做的椰子糖也是 1 分钱。我常常羡慕其他小孩——孩子们一般都比较自私，因为尽管邻居家也很穷，但他们的孩子总还是有一二三分的零花钱。但是，我所在的人家，她们用法国的方式来教育我，对我说，要东西是缺乏教养。孩子们知道我必须遵循这一规矩，当他们有人买冰棍或椰子糖吃的时候，如果我找他们要一点，他们就会向女教师或她的姐姐告我的状。

我记得一天，我向女教师的姐姐——她是个好人，但很穷——要一分钱。我忘不了她恼怒地拒绝给我一分钱了，并大声吼道：“我已经借给你 8 角 2 分钱了。”这是真的。她再也不借给我一分钱，我也没敢再向她要钱。

当几个月后拉蒙来时，他带来的装满硬币的小钱包，当时在我看来，似乎是一大笔财富，它意味着可以买许多椰子糖糕和冰棍。因此，我们吵着要他留下。但是，实际上，他留下来后，日子更苦，因为又多一人吃饭，而饭菜的量还是同原来一样。

后来，我意识到我们的处境。这大约在一年之后。有一天，我的父母亲也发现了这一情况。

拉：您的父母亲不知道你们的处境吗？

卡：有一天，我父亲来了。我刚出了麻疹或得了其他病，我头发很长，因为他们从来不替我理发；我骨瘦如柴。但我父亲却什么也没有觉察到！他们对我父亲说，我瘦是因为我刚刚得了麻疹。

又有一天，我母亲来了。当时女教师、她的姐姐和父亲已经搬了家，

因为他们的状况有了好转，我们三姐弟作为她们的学生，每月总共支付给她们 120 比索。我母亲发现我们又瘦又饿。这天，我母亲带我们到一家圣地亚哥最好的咖啡店，我记得要了店里有的各种冰激凌，我们吃了个够。这个咖啡店名叫“拉努维奥拉”。当时正是芒果收获季节，我母亲买了一口袋托莱多芒果，这种芒果个小，但很好吃，我们一下子都吃完了。第二天，她把我们带回了比兰老家。

不久前，我同我大姐安赫莉塔聊天时，我还责备我姐姐。责备会读书写字的她为什么不向父母亲告状，当时我太小，还不懂事。我从比兰的庄园来。比兰真是一个富裕的天堂，在比兰，我家里人要劝我们吃：“尝一尝这杂烩菜，尝一尝这肉，尝一尝这，尝一尝那。”我们整天不停地吃从商店买的或从家里食品储藏室里拿的各种零食，到饭桌上吃饭时，还要强迫我们吃。我责备我姐姐说她应该向家里汇报我们在女教师家里的遭遇，我友好地批评她为什么不告状。她回答说：“实际情况是，她们不让我将写的信拿出去寄，把我写的信截留了。”

拉：他们收你们每人 40 比索，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

卡：是的，当时——我记不起确切的时间了——他们家的状况有了好转。我们来自比兰的三人，每人 40 比索，共 120 比索，现在在任何第三世界国家都相当于 3000 美元。当时海地领事娶那位钢琴教师为妻。于是，情况有了明显好转。

女教师把钱攒了起来，甚至去美国旅游了一趟，去观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她带回来一些小旗做纪念。真倒霉！我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听她不厌其烦地重复谈论尼亚加拉大瀑布，谈来谈去这些话，同埃雷迪亚（Heredia）的《尼亚加拉颂》^① 差之甚远！她旅游回来后，我听她讲尼亚加拉大瀑布

① 何塞·马利亚·埃雷迪亚（1803 年生于古巴圣地亚哥，1839 年卒于墨西哥），古巴著名前浪漫主义诗人，著有：《流亡者进行曲》（*Himno del Desterrado*）、《在乔卢拉的特奥加里》（*En el Teocali de Cholula*）等用西班牙语写的诗作。他最著名的诗作《尼亚加拉颂》（*Niácara*）写于 1824 年。不要将他同法国同名高蹈派诗人、《战利品》（*Los trofeos*）的作者埃雷迪亚相混淆。

都听厌烦了。她不仅出去旅游，而且也买了家具，她是靠让我们挨饿挣来的钱买的家具。

到这里，我明白无误、坦率地向您讲述了这一切。这时，我们开始造反了。

拉：你们起来造女教师的反？

卡：当母亲把我们带回家，回到比兰后，我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罪行，因为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我们三人忍饥挨饿，我们终于回到日夜思念的老家，我们变成女教师不共戴天的敌人。她经常到我们比兰家吃午饭，吃了还拿走米饭和鸡……我母亲把我们带回家时，还是上课时期，女教师还在比兰小学上课。我和拉蒙对她采取了第一次行动。

拉：造反。

卡：不是，不是造反。可以说，是第一次报复行动，或者说是复仇。报复行动是用弹弓将小石子弹到小学的屋顶上，由于屋顶是带槽的洋铁皮，石子弹上去会发出响声。傍晚，天色渐渐变黑。附近有一个面包房，我们躲在面包房炉子旁的劈柴堆后面。我们用番石榴树杈和橡皮筋做的弹弓将石子像连珠炮一样向小学屋顶上弹去，弹了大约有半小时，也许不到半小时，但是，在我看来，这已经是很伟大了。石子弹向屋顶的洋铁皮。当有一二粒石子掉下来时，总有二三粒石子在空中：我们使弹弓称得上是老手了。石子的声音湮没了住在小学里女教师可能发出的叫喊声。我们就这样报了仇！

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父母又同女教师达成和解，再次把我送到圣地亚哥女教师家。我的命运不好。拉蒙留在比兰，他的哮喘病帮了他的忙。

拉：是吗？

卡：是的。但这次我不再挨饿了，丑事已经过去。但是，我继续浪费

时间。我在她们家又浪费了好几个月时间，无所事事，还是自学数学表。第二年1月，她们送我进拉萨列小学一年级作为走读生读书。我一生第一次开始系统地上课。

当时马查多倒台后的过渡期已结束，巴蒂斯塔已采取行动，我还记得1935年3月那几天的大罢工。我借住的家对面的中学被军队占领，在那里我见到了军队对罢工者的凌辱。21年后，1956年11月30日，当我们从墨西哥出发乘船在红滩（Las Coloradas）登陆后，“七二六运动”^①的成员攻占了这所中学。

拉：是这所中学吗？

卡：是的。是这幢楼，但在巴蒂斯塔重新掌权后，它已不再是一所学校，而变成了一个兵营。1956年那里是警察营。在我读小学时，它还是一所中学，但是，后来变成了兵营或者警察营。当我在女教师家借住时，已有军人在那里进进出出，军队很可能已经占领学校。这幢楼得过奖。我知道，1956年11月30日，在弗兰克·派斯（Frank País）^②奥连特省的“七二六运动”组织的成员攻打了这一警察营。他们估计一下日子，决定在30日采取这一行动配合我们的登陆行动。但这一行动比我们的登陆要早两天。我们由于遇到风浪和“格拉玛号”游艇出了点问题，登陆行动推迟了48小时，而他们的行动是在30日，因为他们估计我们会在那天登陆。我本来不想这两项行动同步进行，而是主张先登陆。

① 1955年由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其他革命者正式创建的组织。其名称是纪念1953年7月26日那天攻打古巴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和巴亚莫的“卡洛斯·曼努埃尔·塞斯佩德斯”兵营的行动。“七二六运动”同“革命指导委员会”一起，在古巴山区和平原的两个阵线领导了反巴蒂斯塔的战争。

② 弗兰克·派斯·加西亚（Frank País García），圣地亚哥年轻的革命家，在奥连特省将大学生运动同工人和农民的斗争相结合。于1955年6月参与创建“七二六运动”组织，成为该组织全国领导委员会成员和全国行动领导人。在领导支持游击斗争的地下运动方面，起了主要作用。1957年被巴蒂斯塔的警察杀害。

拉：您对那些年代还有哪些记忆？

卡：在我进小学学习前，女教师的姐姐，那位钢琴教师同海地领事结婚。他们两人是讨人喜欢的，是混血种人，法语讲得都很好。于是，一位新的角色海地领事路易斯·希帕特（Luis Hibert）进入了这个家庭。情况发生了变化。女教师家搬进旁边一幢比较好的房子，这幢房子不再漏雨，也比较宽敞。此外，由于家庭收入的增加，饥饿也减少。也许女教师工资能正常领取。她的姐姐嫁给了海地领事，而领事有一份工资。家里的伙食也有了改善……

领事夫妇带我去教堂洗礼，因为大家都叫我“犹太人”，当时称还没有洗过礼的人为“犹太人”，这可能与反犹太的宗教偏见有关。

拉：您那时还没有洗过礼吗？

卡：没有。我是在满8岁后才洗礼的。因为我父亲的一位朋友，一位百万富翁要做我的教父，我一直等着他。牧师和我一致同意，过了8岁，就给我洗礼。我的兄弟姐妹都早已成为教子，但我直到8岁时才进行洗礼。原因是一直等着名叫菲德尔·皮诺·桑托斯（Fidel Pino Santos）的百万富翁当我的教父。我的名字就是来源于他，因此，我不能引以为荣。我是8月13日生的，而圣菲德尔·德西格马林亨（San Fidel de Sigmaringen）^①的日子是4月24日。8月13日是圣伊波利托·卡西亚诺（San Hipólito Casiano）日。但是，他们还是给我起了个菲德尔的名字，因为我的那位要当我教父的富翁名叫菲德尔。这位菲德尔有时去我们在比兰农村的家。

^① 圣菲德尔·德西格马林亨（1577—1622），殉教者。生于德国苏阿比亚（Suabia）西格马林亨（Sigmaringen）。是一位免费为穷人辩护的律师，被称为“穷人的辩护律师”。35岁时放弃律师职务，参加方济各会教团，成为（瑞士）弗里堡（Fribourg）方济各会的修士。是著名的演说家和布道者，常常被称为“人民辩士”。教皇本笃十四于1746年封他为圣徒，并评价他说：“他将他的全部仁慈用来安慰和帮助他人，用他慈父的心来拥抱所有受苦受难的人，他用募集来的施舍物接济许许多多穷人。”1622年4月24日在西维斯（Seewis）遇害。

拉：那么，您真正的教父是那位海地领事了？

卡：是的，是那位海地领事，他同女教师的姐姐，那位钢琴教师结了婚。他们两人是我的教父和教母。记得有一天，我的教父，那位海地领事带我去参观一艘很大的客轮“拉萨列号”，这是一艘远洋客轮，有两个烟囱，客轮像马蜂窝一样，装满了根据前面我同您谈到过的《劳动国有化法》被驱逐出境的海地人。我先是在老家看到住在大茅屋的海地人，同他们一起吃烤老玉米，后来，又看到了装满豪华远洋客轮的海地人，他们被驱逐出境，将回国，将在自己国家海地经受更多的磨难。海地比古巴还要穷，他们将从一个大的磨难走向更大的磨难。

拉：海地人是被驱逐出古巴的吗？

卡：是的。在蔗糖繁荣的年份，数以万计的海地人到古巴播种、种植和收割甘蔗。他们像半奴隶一样在甘蔗田劳动，做出了很大牺牲，而工资却十分低微。我认为，19世纪奴隶的生活条件或许要比那些海地人还要好些。奴隶是某个奴隶主的财产，因此奴隶主对待奴隶就像对待牲口一样。奴隶主得负责牲口的健康，并喂它们吃。而资本家对从前的奴隶、现在所谓自由的工人却不顾他们的身体，也不管他们吃饭。

1933年的所谓革命的确是一场反对滥用职权的运动，它通过了《劳动国有化法》，满足了优先使古巴人就业的要求，前面我已同您谈到了这一事件。这一法律的起因是合理的，但是，它导致了残酷措施的执行，被利用来驱逐已到古巴岛定居二十多年的数万名海地人。古巴人口增长了，海地人多余了，便残酷地、冷酷无情地驱逐出古巴，送回海地。这一做法是非人道的。他们带我去看了这一场景，这对我后来了解世界起了很大作用。

拉：您在女教师家一共待了多少年？

卡：我在她家度过了3个三王节^①，这是我用来判断我在她家待了多

^① 西班牙的传统节日，每年1月6日这一天，父母向未成年子女赠送礼品，原自“东方三王”向圣婴耶稣献礼的传说。（中文编者注）

少时间的唯一依据。顺便对您讲的是，我本应成为一位音乐家，因为我的教母是钢琴教师，她整天弹钢琴——遗憾的是，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时间教我弹钢琴，而我在他们家度过的3个三王节，每次给我的礼物都是乐器。第一年的三王节，我得到的礼物是一个马粪纸做的小号，只有喇叭口是铝的；第二年的三王节，我得到的礼物也是一个小号，一半是马粪纸做的，另一半是铝的；第三年的三王节，我得到的礼物又是一个小号，这次的小号，全是铝的，还有三个按键。过了3个三王节并不意味着我在那里待了3年，我是9月份被送进学校的，到1月份三王节的最后一天，总共在他们家是2年又8个月。此外，还应该扣除我们回比兰的时间，在比兰一天傍晚，我们用弹弓将石子弹到女教师住的小学房顶的洋铁皮板上。

实际上，我每年都给三王写很长的信，我在床底下放了许多给骆驼吃的草和几杯给骆驼喝的水等等。在信中我向三王要一个男孩想要的一切：一辆火车，甚至一架电影摄影机。但是，每次我得到的总是小号，别的什么也没有。

在女教师的新家，有一棵攀缘植物，叶子宽宽的，遮住了阳光。我在树荫下坐在红色瓷砖地面上的椅子上，独自一人一次又一次学习数学公式。是的，我自己给自己上课。从那时候起，我便自学成才。

在新家她们让我睡在通向后街过道的一个沙发上，这是一个用柳枝做的沙发。当时在圣地亚哥经常发生炸弹爆炸事件。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发生一起或几起炸弹爆炸事件。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发生了二三十起爆炸事件。我担心随时有可能在我住的房子里发生炸弹爆炸。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炸弹爆炸事件，为什么要放炸弹。在后街旁，在我住的房子的过道里，我不得不伴随着炸弹爆炸声入睡。

拉：是谁投放的炸弹？

卡：我想，可能是反马查多或反巴蒂斯塔的革命者投放的。

拉：反马查多？

卡：是的，是反马查多。后来，是反巴蒂斯塔。巴蒂斯塔是在1933年9月4日发动政变的。这些炸弹应该是在反马查多斗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投放和爆炸的。之后，大约有三个月时间是所谓的革命政府执政。

我对您说过，“士官叛乱”也是一次这样性质的行动。但是，此前，民众已展开了反马查多政府的斗争，一直到1933年8月。在一场严重危机的情况下，马查多还再次竞选当选总统。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古巴国内饥饿严重。先是反对马查多，马查多垮台后，斗争停息了一段时间。同年9月，陆军士官、速记员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发动政变——还有一名士官参与组织政变，成为政变头目，掌握了政权。士官们同大学生和其他革命力量团结在一起。

当时参与战斗的还有ABC组织成员。ABC组织是准法西斯组织，很可能是ABC组织成员在1933年最后季度，即10月、11月和12月投放的炸弹。我不太清楚这一阶段是否在1933年12月或1934年1月初结束，之后，便开展了反巴蒂斯塔的斗争。

我不能对您说是谁在一个晚上投放了30枚炸弹，因为我的记忆有些模糊，我只能根据我当时那个年龄的回忆。当颁布著名的《劳动国有化法》和发生驱逐海地人时，我住在女教师第二幢房子里。这一点我是肯定的，从此可以判断我第一次到圣地亚哥大约是在1932年年底。确切日期我记不清了，只凭记忆和印象及古巴发生的著名事件来大致推断日期。

拉：您当时应该是六七岁吧？

卡：大约是6岁。肯定不会超过6岁，因为我在女教师第一幢房子里最多住了一年。

我记得一年后，我已住在他们的第二幢房子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发生炸弹爆炸事件。这应该是在1933年年底。马查多是在同年8月下台的，后来发生巴蒂斯塔运动、寿命只有三个月的联盟，即革命政府，大约在同年底，革命政府被推翻。还有一些法西斯倾向的组织如ABC组织，它们

反对革命政府，后来成为巴蒂斯塔的同盟者。我不禁要问自己，究竟是谁在当时投放了炸弹？

拉：在 1932 年。

卡：不是。1932 年是谁投放炸弹都很清楚。问题在于，后来是谁投放的炸弹？很可能是革命的敌人。1933 年年底，ABC 组织成员曾策动一场叛乱，反对生理系教授格劳·圣马丁政府和其左翼吉特拉斯。也许，唯一有足够力量投放如此多炸弹的只有 ABC 成员。

我回想，当时在圣地亚哥没有大学，学生们既没有组织也没有资金来投放 30 枚炸弹。也许不到 30 枚，但我的感觉是很多。因此，我推想我在柳枝沙发上听到炸弹爆炸声时，应该是在 8 月之后，而不是之前，可能是在 1933 年年底，甚至可能更往后。在此前，我已经在比兰第一次造了反，更确切地说，是一次报复行动。在一场苦难之后，我被再次送到圣地亚哥，进入拉萨列小学，走读一年级。

拉：您是一个人步行上学吗？

卡：是的，我来回走，中午回去吃饭。午饭已有改善，因为那时已按照法国人的习惯，吃蔬菜，午饭有蔬菜和其他东西，已不再是大锅饭。当时食品比较便宜，有钱的人很少，而且有工作的人也很少。我说过，我家每月给她们 120 比索，在当时，这是一笔大数目。

我每天中午回来吃午饭，然后再回学校。我对来回走感到厌烦了。我还是自己学习。三王节的第三天已经过去，大约是 1935 年 2 月，我必须寻找纸张。他们老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像天使一样听话，就要把我送到学校去住读。而住读正是我所乐意的。

拉：为了逃避他们家。

卡：我对过去发生的事已有察觉，我对法国式的规矩和所有那些折磨感到厌烦。一天，我冒犯了所有法国的习惯和风俗。在他们家，他们强迫

我吃蔬菜：甜菜、胡萝卜、佛手瓜。我不习惯。佛手瓜我觉得淡而无味，而甜菜我觉得甜得恶心。多年后，有些蔬菜我还拒绝吃。这是法国的习惯和习俗。一天，我起来造反：“我不愿干这个，我不喜欢。”我并不是真的反对法国习俗，而是反对我经受的折磨。

拉：您造了反。

卡：没有别的办法，这是本能。事实上，这是我一生第一次有意识的叛逆，结果正合我意。他们竭尽全力地把我送到拉萨列小学一年级住读，那时候已经是第二学期了。这样，我感到很幸福，因为可以天天与同学在一起玩，每星期四和星期天，学校带我们去海边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有一块比较宽敞的场地，可以做各种运动和游戏。我终于成为一名自由的孩子了。

拉：您对他们家怀有怨恨吗？

卡：说实话我并不怪他们。他们生活在那样的社会里，我不能说他们是一些坏人。那样的社会充满着不公正、许多困难、许多不平等、许多需要和许多牺牲。人们都很自私自利，人变得唯利是图，总是想得到好处。缺乏仁慈和慷慨。他们得维持生活，他们发现了一种剥削的办法，就是剥削有钱的西班牙人的子弟。他们没有钱。我成为他们剥削的牺牲品，我的父母亲把我送到他们家支付给他们的钱对他们家来说是一笔收入。我经受了他们的剥削。

拉：您是什么时候读狄更斯（Dickens）的《奥列佛·退斯特》（*Oliver Twist*）或《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等小说的？您对小说主人公的经历有何感想？

卡：说起来您不会相信，有些作品我是在毕业后才读的，因为我所读的学校从来不教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他们连莎士比亚的作品也一部都不提。作为规矩，所有的课文都是西班牙的。著名的《汤姆叔叔

的小屋》^①我是在离开学校后读的。我们是豪华的、上层阶级学校得天独厚的学生，但是，我们缺乏艺术、绘画和音乐知识。在三年级时曾让我进入合唱团，但是后来发现我——不知为什么——唱歌老走调，又把我赶出了合唱团。

记得从小学五年级中期到高中毕业，几乎我所有的老师都是西班牙人和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思想都是右翼的、佛朗哥主义的、反动的。但是，从纪律性、性格特征和简朴方面来看，他们又是优秀的老师。

拉：此外，他们都是信教的。

卡：我对这些人，特别对耶稣会教徒很了解，我在耶稣会的学校学习了7年，他们有个性，有修养。耶稣会的学校要付学费，但不贵，他们办学不是为了赚钱。那些牧师是不拿工资的。他们生活很简朴。他们一丝不苟，舍己为人，吃苦耐劳。应该说，他们帮助了我，因为他们鼓励我爱好大自然。我喜欢爬山。当我看见一座山，就感到是对我的一种挑战，就想去爬这座山。有时候，因为我正在爬一座山，大客车等我4个小时。我有时一人，有时同一两个同学一起爬山，回来的时间常常比预计得要晚几个小时，但从没有遇到问题。那些教师当看到学生的某种性格，如牺牲精神、奋发向上、大胆冒险的精神时，总是寄予同情，并予以鼓励。他们重视学生性格的形成。

拉：您从耶稣会教徒那里学了不少东西，是吗？

卡：是的，但不是在头几年时。头几年，我是在拉萨列小学向拉萨列修士们学习，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其中我从三年级直接跳到五年级。在那里差不多有4年。我很乐意住校。如前所说，每星期四和星期天，学校带我们到农村和海边去。我们去圣地亚哥海湾的一个半岛上。学校在那里有

^① 《汤姆叔叔的小屋》（*La cabaña del Tío Tom o la vida de los humildes*, *Uncle Tom's Cabin*, 1851）是美国女作家哈丽叶特·比彻斯陀·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的作品。

一个浴场和体育设施。有棒球场、洗手间、自由活动间、游泳池等，可以游泳、钓鱼、远足。我对每周两次去那儿感到很高兴。后来，在圣地亚哥的多洛雷斯中学，那里的耶稣会教徒就没有类似的庄园，尽管学校不错，而我那时年龄也比较大了。

拉：您的同学全是富家子弟，其中有没有黑人？

卡：在拉萨列学校，是允许黑人孩子入学的，但黑人学生寥寥无几。在我所在的班上，只有一个黑人，名叫拉里尼亚加，是一个活泼的孩子。我忘不了他。在耶稣会办的多洛雷斯中学和贝伦中学，没有一个黑人学生，连黑白混血穆拉托人（mulato）和印欧混血梅斯蒂索人（mestizo）的孩子也一个都没有。在这些学校学习的都是有钱人的子弟，全是白人。

拉：学校里没有黑人孩子您不感到奇怪吗？

卡：我曾提出疑问，这倒不是对这个问题有意识或受过教育，而是感到奇怪。我前面提到，在拉萨列学校有一个黑人同学。但是，在耶稣会办的学校，在最有名的学校，上层资产阶级子弟的男子中学里，既没有黑人，也没有穆拉托人和梅斯蒂索人。他们做了一些解释，但在我看来，他们很难自圆其说。

拉：他们挑选吗？

卡：这些学校都是富人学校，不允许黑人入学。尽管某些黑人付得起学费，也不被接受。当然，学校没有像纳粹分子那样，对入学的学生验血。但是，毫无疑问，如果外表看来不是白人，就不允许入学。

拉：即使他们有条件支付学费？

卡：是的，即使付得起学费，也不让黑人入学。尽管耶稣会教徒叛逆性强，曾不止一次造当局和政治高官的反。

拉：最近，拉丁美洲的耶稣会教徒很大胆，富有抗议精神。

卡：在当代，有些叛逆者，如萨尔瓦多大学的牧师等人，都是耶稣会牧师，他们都很勇敢，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看来，这同耶稣会的起源相关。圣伊纳爵（San Ignacio）^①是位军人。我还记得耶稣会会歌，即《圣伊纳爵进行曲》的歌词：“伊纳爵，您是耶稣会的创始人，是将军，以耶稣的名字为荣耀。”^②其歌词和乐曲是拟声的，描写天使反对妖魔的战斗。它是一首战斗进行曲，而圣伊纳爵是耶稣会的将军。因此，我可以批评他们，但也要承认他们在培养拉萨列学生方面是出色的。他们是虔诚的信徒，学习很刻苦，连续几年刻苦学习。古巴一些著名的植物学家是耶稣会教徒，杰出的天文学家，如预报飓风的比涅斯（Viñes）神甫也是耶稣会教徒，另一些耶稣会教徒是优秀的西班牙语和文学教授，如鲁维诺斯（Rubinos）神甫等。

拉：此外，耶稣会组织观念很强，是吗？纪律性强，像军人一样。

卡：他们知道如何培养孩子的性格。如一个学生进行冒险和困难的活动，他们会看作是树立进取心和坚忍不拔精神的一种锻炼。他们不会不加以鼓励。此外，在我学习的耶稣会学校里，老师将耶稣会传统的军事精神、军事组织性同西班牙人的性格结合在一起。西班牙的耶稣会教徒善于传授个人的尊严感和荣誉感，善于肯定个性、坦诚、直率、勇敢、自我牺牲精神。

① 伊尼戈·洛佩斯·德洛约拉（又译罗耀拉，Iñigo López de Loyola，1491—1556），出生巴斯克的贵族，很年轻时就从军。1521年在法国军队围攻潘普洛纳（Pamplona）时受重伤。在长期养伤期间，读了有关宗教方面的书籍，使他放弃以前的世俗生活。1539年在罗马创建耶稣会，耶稣会从事教育和布道活动，耶稣会仿效军团编制。1622年被谥给圣号。

② 耶稣会会歌，即《圣伊纳爵进行曲》，歌词是：“伊纳爵，您是耶稣会的创始人，是将军，以耶稣的名字为荣耀。罗耀拉军团，有一颗忠诚的心，无畏地高举起罗马教皇的十字标旗。投入战斗，投入战斗。迅猛的罗斯贝尔，将妖魔打得落花流水。罗斯贝尔的军团正在行进，它的黑色旗帜挡住了太阳。耶稣会，投入战斗，投入战斗！生活在地狱的人们，不要熄灭您的热情，让伊纳爵的勇气照亮您的前额。听战斗的号角已经响起，圣军不停息地高举十字标旗，投入决战。等着你们的是战争的桂冠、和平的桂冠，胜利的桂冠、和平的桂冠。”

他们善于赞扬这些价值。

拉：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总之，算不算是好学校？

卡：除了对黑人歧视和是上层资产阶级子弟的学校外，对我来说是有益的。有一次，我读了一部小说，书名是《一个反叛者的锤炼》（*La forja de un rebelde*）^①，小说叙述一个反叛者——我这里说的不是一个革命者——部分地说，是如何经受了自已一生和经历的考验。尽管人物的特征和性格也有影响。人物的性格部分是生来就有的，部分是受耶稣会教徒的锤炼。

拉：圣伊纳爵本人就是一个榜样，他用军事战略来征服人们的思想。

卡：我认为他是一位军人，他组织了一个军团。我不记得很多，但知道那首耶稣会会歌，它是一首军歌。但是，我对这并不太感兴趣。我喜欢耶稣会学校这种健康简朴的生活。

拉：无论如何，您喜欢运动。

卡：特别是我在高中学习时，我喜欢运动和爬山。我的主要活动是运动和爬山，特别喜欢！我当时还没有爬过图尔基诺峰（Pico Turquino），很想去爬。有一次，我同贝伦中学一牧师阿曼多·略伦特（Armando Llorente）差一点要去攀登图尔基诺峰。阿曼多·略伦特还没有毕业，是实习教师，哥哥塞贡多·略伦特（Segundo Llorente）曾在阿拉斯加爱斯基摩人中间传教，写过一本关于“冰天雪地之国”游记，写得很生动、很有趣。一个夏天，我和他一起在圣地亚哥港准备出发去图尔基诺峰所在的地区。

①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La forja de un rebelde*，1941—1946）是西班牙小说家阿图罗·巴雷阿（Arturo Barea，1897—1957）写的三部曲《锤炼》（*La forja*）、《道路》（*La Ruta*）和《烈火》（*La Llama*）。通过对小说主人翁一生的自传体式的回忆，展现了西班牙20世纪初至西班牙内战（1936—1939）的画卷。（参见沈石岩：《西班牙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2页——译者注。）

我还从家里拿了一支勃朗宁猎枪。当时我已高中毕业，即将进入哈瓦那大学学习，我父亲对儿子的业绩感到自豪，对我的行为已不再更多地过问。但是，由于我们准备乘坐的轻便船漏水，难以在一个漫长的夜晚里修复，所以计划落空了。阿曼多·略伦特是莱昂（León）教团年轻的耶稣会牧师，是我的朋友，因为他喜欢运动和探险。

自第一次远征尤穆里（Yumurí）山谷时起，我就被任命为探险队队长之一，队长的职责是整个晚上不睡觉，像哨兵一样。探险队员有自己的队服，在农村住在帐篷里，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擅自加上了登山运动。最后，我被任命为全校探险队司令和队长。这是我在学校里的第一个官衔。但是，我还参加所有的运动。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我被学校——共有一千多名学生——视为最好的运动员。我在篮球、足球、棒球、田径运动和几乎所有的运动方面都表现不错。

的确，我花费许多时间从事运动，也去听课，但平时不用功学习，考试时临时抱佛脚。我每天都奉劝大学生不要跟我学。我又成为自学成才者，自学数学、代数、物理、几何，自学那些定理。此外，我的运气很好，期终考试成绩常常名列前茅。在平时，耶稣会老师不说什么，但到快期末考试前，他们就提醒我的监护人，对他说我所有的课程都有可能不及格。我的监护人就是我父亲的朋友，本应成为我教父的那位富翁，共和国国会的债主和国会议员，因为是议员，他在哈瓦那有房子。高中三年，他们在学期末总是这样预言。

拉：这是因为看起来，您似乎对学习不感兴趣。

卡：说真的，我从来不去听课，也许农业课我去听过，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农业课老师的讲课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学习的方法是看书，有时看书一直看到天亮，因为我是负责每天最后关自习室灯的人。当大家都回宿舍去睡觉后，我没有关灯和去睡觉，而是留在那里学习，一直到凌晨两三点。就这样，我数学和其他所有课程，都是自学的。

拉：您的弟弟劳尔，也同您一起学习吗？

卡：说来话长。他比我小五岁，是我们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我们常打架。他开始时在比兰，四岁半时同我一起在拉萨列学校读书。他同母亲一起来看我们，后坚决要求留下来同我们一起在拉萨列学校学习，他又哭又闹，坚持要留下，我母亲只好同意。拉蒙、劳尔和我，还有克里斯托比塔（Cristobita），我们四人同住在一间房间里。克里斯托比塔是外资公司巴哈马古巴公司下属木材厂厂长的儿子，这位厂长同我父亲一起开发马亚里部分松林。劳尔当时不听话，我有时不得不责备他，但拉蒙总是替他辩护。

拉：他是大哥。

卡：拉蒙是大哥。当时劳尔同我们一起在拉萨列学校住读。

拉：您有没有教育劳尔？

卡：放假回家，我总是听到父母亲批评他。我对父母亲说：“你们把他交给我，让我来管他。”于是，我开始照顾他。他总是逍遥自在。

后来，我让他看几本书，他挺感兴趣，我使他开始对学习感兴趣。我感到他浪费了不少时间，他可以读大学。有一条路子：读管理专业，这是与社会科学和法律有关的大学分科。学起来并不很困难：假如您学习这一专业，然后可以转学文学专业、外交法或社会科学专业，甚至法律专业。我这么设想，并说服了父母亲，于是劳尔来到哈瓦那。这说来话长，但我先给您说到这里。

拉：您对我说过，您在女教师家，造了第一次反。您后来的造反是在什么时候？

卡：后来，又有两次，几乎有过第四次。从女教师家我被送到拉萨列学校住读。在拉萨列学校，我读了一、二、三年级，后从三年级跳到五年级。一天，我同训导员发生了一场争吵。这就是我第二次造反。发生了不公正

的事情，我换了学校。由于这一任校长的诡计，作为惩罚，我父母不愿意再送我继续学习。

我对您讲，这个学校先后有两位大不相同的校长，第一位校长费尔南多（Fernando）教士，人很好；第二位是内翁·马里（Neón Marí）。由于一位名叫贝尔南多（Bernando）的训导员教士经常打他负责的住校学生，我反对他，遭到了处罚。这是这位训导员第三次打我，最后两次较轻些，第一次很重，原因是我同另一个男孩在船上吵架。每星期四和星期天我们住读生都乘船去半岛，上岸后，我们穿过海湾，穿过大道，沿着上坡路向学校走去，因为学校在城市里最高的地段。我们经过塞斯佩德斯公园。回学校的上坡路经过一个红灯区，即妓院所在地区。学生们拿训导员开涮，看到一两个穿着教士服的人时说：“喂，小牧师，快来，快进去！”等话。学生们见到这场景，都不由得笑了起来。

吵架是在从浴场上船后开始的，一路上没有结束。幸亏在船上我们吵架时没有摔倒在马达上，因为马达上没有保护罩。那艘船名为“埃尔卡特托号”（El Cateto）。但是，其他人把我们两人分开了。回到学校后，官司并没有打完。同我吵架的学生是一个好孩子，多年后获知他从事革命活动，这里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但是，在校时他是训导员的大红人和受溺爱者，当时的倾向是对每个学生予以特别的关照。学生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正常。这些教士中许多人素质比较高，但是他们是属于纪律性不如耶稣会强和严格的教团。这种情况使我们一些人感到不快，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我们要反对的任人唯亲的做法。

我现在无论如何想不起来当时船上吵架的细节。问题是我和他的官司还没有结束。回学校后，我找他，对他说：“站住！”他起身，我用右手给了他一拳。我们互相打了几下，后来被人拉开，但后果接踵而至。我那时上五年级，学校的训导员贝尔南多教士第一次狠狠地打了我。

从其他方面来看，我在学校很高兴，因为我可自由地从事运动、下海和钓鱼。

拉：但是，发生了什么？

卡：很简单，我同那位训导员的大红人吵了一架，前面我已同您提及。

在拉萨列学校有一个大水池，位于中间长方形院子最高处下面，在学校这个区域，只有一种植物。在院子这一部分的下方是水池。因此，学校的院子分上下两部分。上院有餐厅，紧接着在小教堂拐角处是圣器室，占据中间的一部分；在另一个拐角处，是阅览室，向右拐沿着走廊，左边是几间教室。上院四周的建筑物都是木结构的。

这天傍晚，是小教堂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在同那个男孩吵过架后，我小心翼翼地进入圣器室，担心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从圣器室可看到小教堂的祭坛活动。我在圣器室时，从院子通到圣器室的木板大门打开了，训导员用手指做手势叫我——我本能地预见到会发生什么，他不尊重礼拜仪式，把我叫到一边，强迫我穿过过道，向右拐，向前走一段路，停在教室前问我：“你同他发生了什么？”我回答说：“情况是这样的……”我已经站在他前面，但他不让我站稳，伸出右手狠狠地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毫无思想准备。

拉：一记耳光。

卡：然后，他又用左手在我右脸上打了一记耳光。这是一名强壮的成年人用双手打一名五年级小学生。我茫然得不知所措，两耳嗡嗡响。天色已晚。

这使人屈辱，令人愤怒，简直是滥用权力。

同我吵架的男孩身体不弱，是一个强壮的少年，可以进行角斗。而那位训导员的力气是我的两倍，是一位年轻人。

几个星期后，这位训导员第二次又在我头上打了两下——原因是我在排队上楼梯走向宿舍时说话——尽管打得不重，但使我的内心感到十分痛苦。

拉：是因为屈辱。

卡：身体的攻击、暴力对我说来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

后一次打我，发生在我吃完早餐。早餐几分钟就吃完了，喝一杯牛奶，吃一两个小面包。早餐还有盛放在绿色盒子里的黄油，这样不用冷冻便可以保存。男孩们吃完后常常用黄油再抹两三个面包拿在手里。这个年龄正是胃口大的时候。

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水池顶部的小院子排成一行，接着大家争着去碰一根圆柱，谁第一个碰到，打棒球时就第一个发球。有8到10分钟自由活动时间可以玩棒球。

我们正玩时，有人在我脑袋上打了两三下。打我的又是那位训导员。这是他在我脑袋上打的最后几下子，我们马上吵了起来。我愤怒地抓起手中涂了黄油的面包使劲向训导员脸上扔去，然后，我当着全校的面，像猛兽一样对他拳打脚踢。这是我第二次造反。我是一名小学生，而他是一名滥用权力、欺侮学生的训导员。

男孩们生气时常常说：“我朝他脑袋上扔墨水瓶”“我要对他干这个”。我从来没有说过要向任何人扔墨水瓶。但是，这第三次，我再也不能忍受了。训导员好不容易摆脱了我。这时，我看见了校长内翁·马里，他站在过道尽头学习室附近。我走近他，对他说：“您瞧刚发生的事。”他打断我说：“没什么，他只是推了你一下。”校长可能没有见到训导员打我脑袋，但却看见我推他，踢他和用拳头揍他。这就是我从校长那里得到的判决。专横的训导员因滥用职权受到了道义上有力的打击。所有的学生都支持我。我谅他再也不敢再打我或打别的同学。要不然，墨水瓶会像雨点一样向他袭来。谁也难以预料会发生什么。

我那时在上五年级第一学期，每周给学生打德行分，分三种：白色是表现好；红色是表现不好，很少打红色；绿色是表现很坏。

拉：您得了绿色。

卡：没有。到了宣布打分的时候，我等着。白色：张三、李四、赵五；红色：张三、李四；绿色：无人。没有给我打任何分，既不是白色，也不是红色和绿色。这时，他忘了我，我也忘了他。出于尊严，我不可能表现

得更好。还差几个星期就是圣诞节假期了。在这几个星期，我没有同训导员说过一句话。

假期到了，父母亲来学校接我回家，校长对他们说——您别笑话，您知道西班牙人爱动感情——你们的三个孩子是“我们学校有史以来三个大坏蛋”。

您看，坏蛋劳尔，他才上一年级，只有6岁；坏蛋拉蒙，他有一颗菩萨心肠；而我是坏蛋，情况我已对您讲了。于是，父母把我们带回了比兰。

拉：父母亲相信你们是坏蛋吗？

卡：倒霉的是，他们信以为真。特别是我父亲，因为我听到了父亲对来我家做客的好朋友说的话。我们回到比兰。父亲坐在办公室里。有人对我说：“要算账了。”要惩罚我们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弄虚作假，拿出了学校的记分册。我不知道我们是如何搞到记分册的，是拉蒙设法搞到的。我从未问过他。但是，实际情况是，由于内翁·马里校长的诡计，我们天天受到惩罚。我听到一些到比兰我家来的地主和商人朋友对我说，我父亲对他们讲述了所发生的悲剧和拉萨列学校校长所说的话。父亲宣布不再送我们到其他学校读书了。

喜欢乘坐拖拉机和卡车的拉蒙感到满意。劳尔还小，不可能有自己的看法。我是受损害和受欺侮的人，我认为所有这些罪名和我挨的打都是不公正的。我被宣判再也不让上学了。

于是，我不得不再次造反。我对我父母亲说，必须送我上学。我要求他们送我去读书。这时，我展开了斗争。这次我是在自己家里造反。我宣布：“我不同意你们不让我上学。”这次造反很厉害，我提出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我真的要做，但是，我还是说了。

拉：您是对您父亲说的吗？

卡：我是对母亲说的，我母亲给转达的。因为1月7日三王节又到了，三王节过后第二天，本应是送我们回学校的日子。但是，没有任何送我们

回学校的消息和动静。看来是没有指望了，只有挨罚。于是，我发火了。

拉：当时您才 11 岁？

卡：是的，应该是。因为我在上小学五年级。当时我说了一句很厉害的话。

拉：您说了什么话？

卡：我说，如果不让我上学，我就放一把火，把家烧了。

拉：烧您自己的家？

卡：是的，我家是木结构的房子。

拉：但是，您并不是真的要烧，是吗？

卡：我肯定不会那么做。但是，这话还是说了，而且很严肃地说的，因为我决心同学校和家里对我的不公正做法斗争到底。我认为我的话触动了他们。

拉：您母亲把这当真？

卡：当母亲的总是调解人。我父亲很能体谅人。也许我维护我上学权利的决心打动了。于是我父母亲决定再次送我去继续学习。当时是干旱季节，他们驱车送我到圣地亚哥，路上灰尘扑面。大约是 1938 年，临近国会选举。他们送我到“娃娃”商店老板马索拉（Mazorra）商人的家里。他是加利西亚人，同圣地亚哥一位穆拉托女子结婚。那女子又高又壮，大他两号，尽管不是她管家。这位瘦小的加利西亚人不愿意争吵，如需要拿拖鞋，他就自己去拿。他容易激动。他不让别人来管他。他是服装店老板。他是她的第二个丈夫。她同前夫有一个儿子，当时正在为一个儿科医生竞选众议院全力以赴，这位儿科医生答应帮他儿子找一份工作。她同第二个丈夫也有一个儿子，名叫小马丁，在美国学开民用飞机。我到他们家的

天发生了一件倒霉事，他们儿子乘坐的教练机出现了故障，儿子从飞机上跳伞，下落不明，马上派人找他父亲，结果可想而知。他们还有一个女孩，名叫里塞特，上高中三年级，她穿的蓝色裙子上有三条白色饰带。您知道，男孩子到了这个年龄总是想入非非，甚至会暗恋上比他们大的女子、老师或者几乎所有的女人。好的，我不再谈这些，因为我们正在谈论政治问题。我童年的第四次造反正是发生在他们家。

拉：造那商人的反？

卡：商人马索拉是服装店老板，也是我所在的一家之主。我住在他们家的二层楼。房子是长方形的，并不宽。我住过道尽头的一间小屋。正是在他们家时，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乔·路易斯（Joe Louis）和马克斯·施梅林（Max Schmeling）的第二次拳击比赛，这场大战很快就结束了，我记得只打了一轮，一个拳击手就把另一个击倒了，比赛就宣告结束。

拉：乔·路易斯获胜了，是吗？

卡：乔·路易斯在几秒钟之内便获胜^①。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入侵苏联前夕，马克斯·施梅林作为伞兵参加了对克里特（Creta）岛的袭击^②，报纸上大肆宣传。他是伞兵，是“德国高贵种族”的象征，但是，由于在拳击比赛中被一位黑人拳击手乔·路易斯击败，因此受到羞辱。这事我就讲到这里。

① 乔·路易斯（1914—1981），拳击手，外号“黑色轰炸机”，重量级拳击世界冠军。同曾于1930年获重量级拳击世界冠军的德国拳击手马克斯·施梅林进行过两次比赛。第一次是在1936年6月19日，乔·路易斯被击败。第二次，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这里说的那场比赛，是在1938年6月22日在纽约扬基运动场进行的，有7万名观众观看了这场比赛，比赛用英、德、葡、西四种语言通过电台转播。这是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比赛：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一位美国黑人拳击手同一位德国“雅利安人”（ario）拳击手进行对抗的比赛，象征民主与纳粹法西斯的对抗。结果乔·路易斯在第一轮就击倒对方而告胜利。

② 马克斯·施梅林1941年作为伞兵参加了德国对克里特岛的入侵，在战斗中负伤。

拉：您在同我讲第四次造反。

卡：第四次造反是因为我对住在那家人家感到厌倦。好的，我得给您讲讲我干的一些淘气事。

拉：给我讲讲您的淘气事。

卡：我给您讲讲？

拉：好。

卡：好的，这是今晚给您讲的最后的事情。

那位商人的社会地位在不断上升。他同他那个子高高、体格强壮的穆拉托夫人已步入中等阶层，他们正在贵族区维斯塔阿莱格雷区盖一幢房子。

他们把我送到耶稣会办的多洛雷斯中学学习。在这所中学学习的都是贵族子弟，即圣地亚哥上层资产阶级子弟。商人的太太为自己家里有一个学生在校念书感到幸福，因为这样她可同有子女在校念书的富人交往。如前所说，那位西班牙商人夫妇在维斯塔阿莱格雷区盖一幢房子。他们甚至还带我去看过正在盖的房子。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幢房子。一个上层家庭应该有个学生在校学习，而且必须是该校最好的学生。在我这个学生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

拉：您发生了什么事情？

卡：我姐姐安赫莉塔当时正在学习，准备进入高中学习。她的一位老师埃米莉亚娜·丹杰（Emiliana Danger）是一位优秀的黑人教师，她教我姐姐七年级的课程，为上高中做准备。那年假期，我没有回比兰度假，从五年级升入六年级。但是，即使我读完六年级也不能进入高中学习，因为升高中有一个年龄规定，我记得起码得满13岁或差不多13岁。于是，丹杰老师对我很关心，因为我学习认真，并争着回答所有问题，我把考高中的一本厚厚的参考书背得滚瓜烂熟。女教师很热心。她是第一位鼓励我干某一件事的人。她坚持要我同时读六年级、七年级和高中一年级，这样，当

我上完六年级，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可以参加七年级和高中一年级的考试。

正当我对此感到干劲十足时，遇到了倒霉事。在六年级时，学期刚开始，医生诊断我得了阑尾炎。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做阑尾炎手术。譬如我，因为有点疼，就给我做了手术，割除了阑尾。当时在古巴如同在美国一样，对很多人都做阑尾炎手术，实际上没有这个必要。我不得不做手术。我们是西班牙移民协会会员，这是一个合作社性质的机构，由于在古巴的西班牙移民有数千人，通过每月支付一个或一个半比索的会员费，会员便可享受某一医院的医疗。这样，中等西班牙移民家庭也可享受经济实惠、比较好的医疗服务。

应该说，西班牙移民医疗合作社同社会主义合作社最为相似，因为它有自己的医生、护士、医院等看病所需要的一切。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每人每月只需缴纳一个半或两个比索的会员费，就能享受医疗保险。如果需要做手术，就可给您做，此外，还给您提供药品。当时给我做手术时，使用的是局部麻醉——过去是用全身或局部脊椎麻醉。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我使用局部麻醉。手术使我永远难忘。我感到很疼，但是，最倒霉的是第七天……您知道，当时手术后的一周内，不让病人活动。

拉：我不知道。

卡：现在手术结束后不久，就让病人活动，以免由于淤血等问题引起栓塞症。当时这种医疗办法是落后的。手术后第七天，让我起来，拔去了针头，但是，在48小时或72小时后，我的伤口感染了，幸亏是表面感染，不是在里面，那时候，还没有青霉素或其他类似的药品。伤口完全敞着，我在医院住了整整三个月。丹杰老师为我制定的计划告吹，我只得重新开始的多洛雷斯学校读六年级。我进该校时，上的是五年级中期。我在医院度过了六年级头三个月。

拉：不能上学。

卡：上不了学。我在五年级时都干了些什么？我没能取得好分数，原

因是环境、老师、计划和课本的变化。但是，我的监护人，商人马索拉的妻子要求我必须取得优秀成绩。于是，我不得不弄虚作假。

我想了想，对她说：好的。当时我必须将记分册拿回家让监护人签字，然后拿到学校交给老师。当时打分有：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五种。我的监护人出于她的社会奢望，要求我拿最高分。我必须每门功课都得优。不然的话，就不给我每周5分钱的零花钱在报亭购买阿根廷漫画杂志《麻雀》（*El Gorrión*）^①。

拉：您喜欢看漫画吗？

卡：很喜欢。当时，我在《麻雀》杂志上也看到了《有其父必有其子》（*De tal palo, tal astilla*）^②的连载漫画小说和其他漫画。每星期四给我5分钱买《麻雀》杂志，每星期天给我20分钱，10分用来看电影，5分用来买冰激凌，5分用来买面包夹猪肉的三明治，很便宜。总共每周25分，一个月大约1个比索。我的监护人提醒我说，如果不能所有功课都得好分数，就不给我一周25分钱。

于是，我只好自己想办法。我若无其事地、甚至沾沾自喜地做这一切。我自忖：要是我的记分册丢了怎么办？我拿着旧的记分册，让他们给我签字，但是，我把它留下来，放在自己那里；我对学校说：“我的记分册丢了。”学校又补发我一本新的。于是，我有两本记分册，一本记的是真实的分数，尽管没有不及格的，但不是我的监护人所要求得的分数；另一本上的分数是我自己写上去的。

① 《麻雀》（*El Gorrión*），阿根廷漫画杂志，1932年创办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其最出名的连载漫画故事是1938年的《复仇者》（*El Vengador*），主人公是一位伸张正义的超级英雄。漫画的主要作者是世界闻名的阿尔贝托·布雷西亚（Alberto Breccia，1919—1993）。1968年，他出版了一本著名的有关切·格瓦拉生平的画册。

② 《有其父必有其子》（*De tal palo, tal astilla*，1880），西班牙作家何塞·马里亚·德佩雷达（José María de Pereda，1833—1906）的长篇小说。

拉：您弄虚作假。

卡：是的，在分数上弄虚作假。我有两个记分册，一本我自己打分，然后由监护人签字；另一本上是真实的分数，由我自己签字。但到了课程结束时，我捅了大娄子。我的监护人满以为我会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她穿了一身黑色的、长长的礼服，因为她未来的维斯塔阿莱格雷区邻居的富家子弟都在那里，而我将会得到所有的奖励。

拉：所有的奖励？

卡：一个最优秀的学生！

拉：您自己给自己打了最高分？

卡：我打的全是10分，一个9分或别的分数都没有，因为我必须得最高分。当课程结束时，学校要举行一个隆重集会，宣布获全科奖和各门功课前几名学生的名字，但是，我还没有想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我记得我只是得到一个提名奖，不知是什么课程，可能是地理，因为我喜欢这门课程。那天下午，开始宣布获奖学生的名字：全科奖，恩里克·佩拉尔（Enrique Peral），我还记得他的名字；语言科第一名，张三；第二名……我开始装成吃惊的样子，居然“成绩均为优的学生”获奖名单上没有我——而竟没有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我装成吃惊的样子：我连一个分科的名次也没有获得？集会已经结束，而我既没有获得最优，也没有获得分科奖，我记得，只是被提了一次名。于是，当到了应该做些解释时，我总算找到了一个理由：“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我是课程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入学的，第一学期我没有任何分数，因此，我什么奖也没有获得。”还好，这是一个慰藉，监护人总算安静了下来，大家都感到心安理得。我忘不了我想出的理由。

在六年级我做了阑尾炎手术，浪费了三个月时间，出院后，又回到商人的家，一切照旧。我对打假分数、编故事和自吹自擂已感到厌烦。我决定离开他们家。于是我不好好学习，因为在每天下午强迫你学习的情况下，

我常常是心不在焉。于是发生了以前曾发生过的事情：他们威胁我说，要送我去住读。他们开的方子同以前我住女教师家时让我到拉萨列小学住读一样。我便造反，不听话，不听劝，他们只好把我送到学校住读。对住读我已有过一次幸福的经历。住读后，我开始取得好成绩。到了七年级，我获得全科优秀奖。

拉：是正常获奖，没有弄虚作假吗？

卡：正常获奖。我读书不是特别用功，有点用功，不放弃运动。那时我正在学习英语，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临近。这时，我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我们学习英语，使用的课本是古巴圣地亚哥一位老师编的，内容与名叫布莱克的一家人家相关。我们在学习有关他家房子、餐厅、食品、货币的单词。我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我想要一张绿色的10美元纸币：“a ten dollars green bill。”^①我在信上甚至还谈到矿山、马亚里的松林、造装甲舰用的铁矿等许多事情。我收到了回信。您想，美国人是 有组织的，总统有一套助手班子，他的助手替他回了信。一天，我走出教室，学校过道里熙熙攘攘：同学们说：罗斯福给菲德尔写了封信。有一封抄件在布告栏里陈列。革命胜利后，美国人找到了我当初写的信的原件，并予以发表，于是，我有了复印件，因为我的信并没有留底。有一些人同我开玩笑说，如果当年罗斯福把10美元寄给我，我就不会在后来使美国这么头痛了。

拉：如寄给您10美元，他可能会赢得一位好朋友。

卡：好的，我已同您讲了不少事情。我们没有设定时间的限制，我把一切都一五一十地如实地向您讲清楚。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小时候寄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 罗斯福的信是用英文写的，信中说：“美国总统……如您愿意的话，请给我寄一张绿色的10美元纸币，我想要一张。我的地址是：古巴奥连特省古巴圣地亚哥市多洛雷斯学校，菲德尔·卡斯特罗先生。我不会英语，但我西班牙语很好；我想，因为您是美国人，英语一定讲得很好，但您西班牙语懂得不多，但是，我不是美国人……”

拉：您同我谈了关于您童年时四次造反的情况，您从当年的表现中能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

卡：我自然不是生来就成为革命者的，但是，同您说过，我生来就是一个反叛者。我认为我很小时，在学校，在家里，就开始看到和体会到什么是不公正。我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里，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对农村资本主义有不可磨灭的印象。我脑子里这么多的贫苦人的印象是不可能磨灭的：在比兰，他们饥肠辘辘，光着脚，住在那里和附近的大茅屋里，特别是在美国大糖业公司劳动的工人，他们的境况还要糟糕，到了农闲季节，他们到我家找我父亲，让他帮助想办法。我说过，我父亲不是一个吝啬的财主。

我也是一些事情的牺牲品。我慢慢地树立了关于公正和尊严的某些观念和某些价值观。同时，通过所经受的艰难考验、所克服的困难、所面临过的冲突、所做出的决定和所造的反，我也培养了自己的性格。我开始根据自己的判断质疑整个社会，这是正常的，是具有某种逻辑的思维方法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没有靠任何人的帮助。很早，这一切经历使我把滥用权力、不公正和对他人的欺辱视作不可容忍的东西。我逐渐觉悟。我从不屈从于滥用权力。我树立了深刻的公正、道义和平等的观念。这一切，还有不容置疑的造反性格对我的政治和革命使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拉：总而言之，您在童年就发展了反叛者的性格。

卡：也许生平的特殊环境使我做出这样的反应。从小我就付出了辛劳，正因如此，我渐渐地形成了反叛者的性格。有人说“没有原因的反叛者”，但在我看来，我记得，我之所以成为反叛者，是有许多原因的，我感谢我作为反叛者所走过的一生。即使在今天，我更有理由成为反叛者，因为我的思想更成熟，经验更丰富，我从自己毕生的斗争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对我出生的土地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更为了解。



我
的
一
生

第四章 投身政治活动



大学—爱德华多·奇瓦斯 (Eduardo Chibas) —孔菲特斯岛
(Cayo Confites) —“波哥大事件” —考虑攻打蒙卡达兵营

拉：您后来在大学就读期间有过几次上当受骗的经历，我想这使您对人有了更深的了解。

卡：对。首先背叛我们的人正是那个比兰的报务员瓦莱罗的儿子。他是个共和主义者。我们谈及西班牙内战时我曾提到过这个人。他曾是我们的同志，就住在哈瓦那。而我来自外地，在哈瓦那上学，攻读法律专业。我和他同在一个组织，成了朋友。他同情我们，支持我们。我信任他。这就酿成了大错。不应该仅仅因为某人是朋友就信任他。

拉：他是怎么背叛您的？

卡：我们当时在油印一份地下刊物——一份传单，一份宣言，并商量创办一份革命报、筹建一家短波电台。因为我们在为一个民众政党——古巴人民党（即正统党）的生存和发展而战。古巴人民党广受支持，是深负众望的政治领导人爱德华多·奇瓦斯^①组建的。许多青年人追随他。他们是工人、劳动者，没有什么阶级觉悟，但都对巴蒂斯塔（Batista）深恶痛绝。他们反对贪污腐化，反对1952年3月10日政变——巴蒂斯塔在大选前数周得知他将落选时发动了政变。

瓦莱罗的这个儿子向巴蒂斯塔的警察告发了油印机的所在地，当时我

^① 爱德华多·R·奇瓦斯（Eduardo R. Chibas, 1907—1951）参加过反马查多（Machado）学生运动，为真正党杰出成员。因不满真正党人总统拉蒙·格拉·圣马丁背信弃义、委曲求全及其政府的贪污腐败，遂于1947年5月另立新党——古巴人民党（即正统党）。卡斯特罗不久就成了该党的追随者。奇瓦斯是个性格极具魅力的领袖，联系广泛，竭力维护民族主义路线，痛斥贪污腐败及其他政治恶习。古巴人民党推举他为候选人，参与1952年6月的总统竞选，预料他会胜出。1951年8月5日，他在电台录完周日演讲后拔枪朝自己的腹部开了一枪，数日后去世。

们正在那儿印刷一份小报，我们称之为《指控者》，小报上刊载了我写的第一则宣言。那是在1952年8月16日奇瓦斯去世一周年、巴蒂斯塔政变后第四个月的事。

拉：奇瓦斯在政治上对您有影响吗？

卡：我说过，奇瓦斯是个民众政党的领袖。他极力反对巧取豪夺、投机钻营、贪污腐败，一再对之加以痛斥，并经常指责巴蒂斯塔。

一档周日广播节目使他声名鹊起。这档节目全年周日晚8:00至8:30播出。他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尊重。这首次在我国证实了广播的政治影响力。广播成就了奇瓦斯；他每个星期天与人民交流30分钟。这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了他那特有的政治个性。该节目收听率很高。

拉：奇瓦斯痛斥贪污腐败。

卡：这是他的主要业绩。他要清除政府中的蠹贼。他还时不时敲打敲打“章鱼”：每次电费、话费上调时，他总要指责一下电力公司、电话公司。他是个进步的平民思想家，其主要目标不是革命性的社会变革。然而一个新的政治时代正在降临。

我同奇瓦斯的支持者们接触时，还在哈瓦那大学上一年级，学习法律。我是通过他矛头直指巴蒂斯塔及其对贪污腐败不断的指责才知道和了解他的。

在20世纪30年代反对马查多（Machado）的学生运动基础上诞生了古巴革命党（即真正党）。成立古巴革命党，是要继承马蒂创建的革命党传统，而由于另有一个叫古巴革命党的组织，所以就加上了“真正”二字。真正党是格劳·圣马丁1934年组建的，1944年赢得大选。奇瓦斯为该党成员，曾任参议员。差不多两年半后，他于1947年自行组建古巴人民党（或称正统党），并开始揭露真正党政府的一切不道德行为——

他曾在党多年^①，而该党执政时间很短，就在道德和政治上暴露出了问题。该党1933年组建时的革命品行已荡然无存。您知道那些政党是怎么组建的吗？

拉：不知道。

卡：要是有一个革命工人政党的话，有那么10个或12个人就行了。例如，列宁在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时，同多少人一道组建的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10位代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书中有相关记载。我们组建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运动开始时只有三四个人。想想看，开始时我们运动的领导人很少，只有三个执行成员。而奇瓦斯的党是在那个已上台执政的所谓古巴革命党的强势左翼基础上组建的，又有为数不少极具威望的社会名流和领袖人物——他们均反对多年前（1933）担任革命政府总统的那个人（指格劳·圣马丁——译注）所实施的蛊惑人心、姑息养奸而又贪污腐败的政治——的支持。您看，成立政治组织的方式是多么地不同。激进的革命政党大多是秘密成立的，是由少数人组建、领导的，通常是比较团结一致、能够长期存在的。

拉：奇瓦斯自杀了？

卡：奇瓦斯自杀了。这是另一段历史。

拉：您愿给我谈谈奇瓦斯为什么自杀吗？我是说，一个想要改变自己国家命运的领导人怎么会自杀呢？这不是很矛盾吗？

卡：他当时极其郁闷。怎么回事呢？奇瓦斯是在指控教育部长后自杀的。这位部长是个极具政治素养的人，在上学和任教期间从事反对马查多

^① 1952年之前，古巴主要政治力量分别集结在真正党、正统党、自由党、民主党、共和党以及较小的人民社会党（共产党）周围。大选时，共和党人通常与真正党人联手；而民主党人和自由党人则总是同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1952年前几年刚成立的统一行动党结盟。

和巴蒂斯塔的斗争时曾是个左派人士。其实，最具政治素养的人是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这是因为许多政治家并不了解社会为何物。

而这位先生却成了贪污腐败、声名狼藉的政府的教育部长。奇瓦斯指控他在危地马拉占有数处庄园。此人很会演戏，要奇瓦斯拿出证据来。奇瓦斯拿不出证据。看来是他所信任的那位消息提供者只向他提供了消息，而没有向他提供相关证据。奇瓦斯受到了巨大压力，被指控说谎、诽谤。他郁闷难当，遂在做完他那档周日广播节目后朝自己腹部开了一枪，当时谁也没有来得及阻止他，数日后去世。

数周后，我提出“不用去危地马拉”，并出示一些无可辩驳的文件证明：包括总统在内的许多政府领导人都以来路不明的金钱和其他一些不光彩的手段在古巴攫取了几十处庄园。这些文章发表在《警戒》日报上。该报极具影响——特别是周一特刊，发行量是创下最高纪录的。文章发表后数日即发生了巴蒂斯塔政变。因此，他们——那些曾在政府中任职的人——后来指责我用那影响巨大的揭发毁了合法政府。

奇瓦斯死后接替他在那档节目广播的人叫何塞·帕尔多·利亚达（José Pardo Llada）。他不攻击巴蒂斯塔，而奇瓦斯是经常抨击巴蒂斯塔的。奇瓦斯谈到巴蒂斯塔及其同伙时往往历数他们过去犯下的血腥罪行，称他们为“蓖麻油上校、逃跑法上校”。Palmacristi 是种蓖麻油，抑或是种海狸油。这是他们虐囚的一种方法，墨索里尼法西斯分子就是这么干的。而逃跑法就是以逃跑为罪名杀害囚犯。

奇瓦斯突然去世极大地影响了他组建的党，而没有了他的指责又让巴蒂斯塔得以发动政变。是奇瓦斯的不断敲打，才使巴蒂斯塔一直不敢轻举妄动。奇瓦斯是个能够力阻篡权者采取政变行动的公众人物。

拉：您有一档节目广播吗？

卡：政变发生数周前，我曾要求接手奇瓦斯的那档节目，用以揭露巴蒂斯塔的阴谋。已有他要发动军事政变的明显迹象。我曾说过，我同发行

量最大的报纸《警戒》报有关系。该报社社长是个杰出的记者，当时在奇瓦斯党内是个强有力的支持者，还是参议员候选人。然而他过去与巴蒂斯塔的关系使我考虑到：他尽管一直对我特别尊重，但他恐怕不愿卷入这件十分棘手的事。我在一家名叫阿尔瓦雷斯的电台也有一档每天 15 分钟的广播节目，但那是家地方台，电波只传及首都和今哈瓦那省的部分地区。在我向正统党领导报告了有关巴蒂斯塔的阴谋活动后，他们答应进行调查。他们只同一些党员——一家培训在职高级军官的军官学校里的教官们——谈了谈，得到的回答是“平安无事”。他们没有让我使用那档周日广播节目进行揭发。不幸的是，数周后令人震惊的事件发生了，这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奇瓦斯的那档广播节目由帕尔多·利亚达接手了，此人年轻时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他通过每天两次广播的新闻解说节目——先播出新闻，最后做一简单评论——声名远扬。他通常为罢工以及整个工人运动辩护。他在 1950 年大选中获得的选票比对手高出 7.1 万张，当选为参议员。真是难以置信！大众传媒的影响力真是与日俱增啊！

奇瓦斯通过多年来每周日晚 8:00—8:30 半小时的广播已然成了全国性的领袖人物，而帕尔多·利亚达则靠着其每天两次的新闻解说广播成了家喻户晓的奇异人物。人们都去拜访他，工会和其他组织也找他揭发一些事、播出一些消息。我不想多谈他了。我只想说：帕尔多·利亚达同奇瓦斯不一样，没有像奇瓦斯那样经常敲打巴蒂斯塔，使他不敢胡作非为。如果奇瓦斯还活着，就不会发生政变。他们显然是出于忌妒、争名夺利、庸人自扰加上工于心计，不让我使用那声誉高、影响大的平台揭露巴蒂斯塔。逆境中，主观因素作祟。

拉：奇瓦斯 1951 年 8 月自杀。您当时 25 岁，已在法律系结业。对吗？

卡：对。奇瓦斯 1951 年去世，离 1952 年总统选举差不多还有十个月。他因从事反对马查多的斗争而出类拔萃。他是奥连特省关塔那摩地区一富家子弟。正巧他同我一样也曾在圣地亚哥的多洛雷斯耶稣会学院和哈瓦那

的贝伦耶稣会学院学习过。他是个反马查多斗士，真正党 1944 年大选获胜后成了参议员。我那一年是中学最后一年的学生；有位生理学教授在那一年当选为总统。他曾在 1933 年主持过 3 个月的政府工作，后被巴蒂斯塔赶下台。

拉：您说的是格劳·圣马丁吗？

卡：是的。格劳 1944 年当选为总统。那时世界大战行将结束，全世界的人们言谈中无不赞同战争年代政治宣传中提出的有关民主、主权及其他事项的主张。

因此，那个巴蒂斯塔在舆论压力下也有所收敛。1940 年宪法通过后他被推选为总统。该宪法受了当时在人民阵线中与他结盟的共产党人的影响，某些方面是相当进步的。

法国和英国——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殖民强国——在慕尼黑^①合谋促使希特勒反对苏联。然而我认为，这类帝国主义谋划绝不能证明斯大林同希特勒的协议是正确的。这委实难以令人接受。共产党的特点是严守纪律，不得不支持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不得不耗费政治血本。采取这一步骤是非常艰难、代价高昂的。最守纪律、最忠于伟大十月革命的共产党——我这样说是心怀真诚敬意的，因为共产党人始终是忘我、坚定的——是拉丁美洲的共产党，古巴共产党是其中之一，我对该党一直保有很高的评价。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问世前，联合起来从事反法西斯斗争的必要性在古巴导致古巴共产党人同巴蒂斯塔结盟，尽管他血腥镇压了 1934 年 4 月的罢工运动——这是他狡猾地发动政变推翻 1933 年临时政府后爆

^① 1938 年 9 月 29、30 日，法、英、意、德四国首脑（达拉第、张伯伦、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德国慕尼黑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实际上是西方民主国家在法西斯强权的扩张野心面前所表示的屈从。巴黎和伦敦由于害怕引起冲突——然而冲突几乎是在所难免的——而应允希特勒兼并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苏台德区；这就激励了第三帝国的扩张主义政策。这一背信弃义行为促使苏联谋求同德国协调，1939 年 8 月 23 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人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一周后，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发的一次罢工运动，无疑是场革命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人运动和古巴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是马丁内斯·比利埃纳（Martínez Villena）^①，后来的领导人是梅利亚（Julio Antonio Mella）和巴利尼奥（Carlos Baliño）〕英勇斗争的成果。巴蒂斯塔屠杀了不知多少人，盗窃了不知多少钱，1933年底背叛后一直充当美帝国主义的马前卒。

拉：共产党人在巴蒂斯塔政府中供职。

卡：说得对。这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指令。当时的共产国际并没有什么真正的集体领导。我跟您说过，古巴共产党人都很优秀。他们中的一些人担任了部长及其他一些职务。古巴共产党被迫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而他们又是守纪律的党员，自然要遵命行事。例如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②他是个极其正直的人，我非常怀念他，独裁政府做最后挣扎时，他毅然上了马埃斯特腊山，同我并肩战斗。

1944年（应为1945年——编者），虽然为捍卫社会主义而牺牲的数百万苏联战士鲜血染就的红旗飘扬在了柏林德国国会大厦楼顶，但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日本还在顽抗，那个德日意三国轴心军事同盟还在。两颗原子弹投向未设防的日本非军事城市，那是要吓唬全世界人们。紧接着就开始了世界性的镇压共产主义的狂潮。就在美国本土出现了麦卡锡主义，优秀男女进步人士有的（如罗森堡夫妇）被处死，有的遭监禁，还有许许多多

① 鲁本·马丁内斯·比利埃拉，诗人、思想家、革命斗士，1889年12月出生在哈瓦那省阿尔基萨尔（Alquizar）镇。年轻时即投身政治斗争，揭露、谴责新殖民地政府的种种弊端，1923年同其他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一道发表了人称“13人抗议书”的文件。1927年加入共产党，不久即成了其领导人，虽说健康状况不佳，但仍积极参加工人和人民群众反抗赫拉尔多·马查多独裁残暴统治的斗争，称马查多是头史无前例的“蠢驴”。身患肺结核，1934年1月在哈瓦那去世。鲁本·马丁内斯·比利埃拉是古巴历史上最具良知的知识分子典范。（古巴编者注）

② 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1913—1997），1930年投身政治活动，参加反对赫拉尔多·马查多独裁统治的斗争。罗德里格斯年轻时即成了共产党（1944年改称人民社会党）的积极分子和领导成员，曾在1940年巴蒂斯塔组建的联合政府中任主管部部长，同时在政府中任职的还有另一位共产党人胡安·马里内略。1959年革命胜利后，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在古巴共产党和政府中相任对不同职务，为古其中央政治局委员。1997年去世时为部长会议副主席，主管外事工作。

多人受到传讯和迫害。在古巴，生理学教授（拉蒙·格劳·圣马丁）的政府残酷地屠杀了为数不少的共产党人工人领袖。历史教训要牢记：一个革命政党可以采用战术性的策略，但不应犯战略性的错误。

我们自己的革命运动认识了救世、仁慈的国际主义，也认识了世上导致令人难以忍受、差不多置人于死地的沙文主义。有了沙文主义，就不可能有真诚的国际主义；没有了国际主义，就不可能拯救人类。

拉：您是什么时候大学毕业的？

卡：我1950年9月毕业于法律系。当年24岁。1952年，我打算在6月大选——那年3月10日巴蒂斯塔政变导致大选流产——中角逐代表哈瓦那省的众议员；这完全是我的个人行为，是我在学生时代即已开始的斗争的延续。

拉：不是代表正统党？

卡：我进入大学后就同奇瓦斯创建的正统党在大学里的一些支持者有了联系。该党创建之初我也是其坚定的支持者。后来我开始看到一些我不喜欢的事，有了更为激进的政治意识，越来越了解马克思和列宁。我也阅读恩格斯和其他人的著作以及经济、哲学类书籍，而主要是研读马克思有关政治、政治观念和理论的著作。

拉：您都读了马克思的一些什么著作？

卡：我最爱读的马克思著作，除《共产党宣言》外，要算《法兰西内战》（*Las guerras civiles en Francia*）、《雾月18日》（*El 18 Brumario*）、《哥达纲领批判》（*Crítica del Programa de Gotha*）及其他一些政治分析文章。他那清贫的生活、忘我的精神和严谨的研究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最爱读的列宁著作是《国家与革命》（*El Estado y la Revolución*）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El imperialismo, fase superior del capitalismo*），还有他对各种问题的大量

评论文章。恩格斯有关英国工人阶级史的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还记得他的另一本书《自然辩证法》（*Dialéctica de la naturaleza*），我对这本书很感兴趣。他在书中说：太阳总有一天要熄灭，向照耀着我们的那个星球之火提供的燃料耗尽时，太阳光就没有了。恩格斯虽然未能读到霍金斯（Hawkins）的《时间史》（*Historia del tiempo*），也未能知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还是说了这番话。

我记得，1952年3月10日发生政变时，许多人都开始阅读列宁的文章《怎么办》，寻求当时该怎么办的良方佳策。而我有一天碰巧读到了库尔齐奥·马拉帕尔特（Curzio Malaparte）^①的《政变术》（*La tecnica del golpe de Estado*）。读这本书时不是在攻打蒙卡达兵营之前，而是在后来坐牢期间。那完全是好奇心使然，我觉得很荒唐：政变夺取政权是许许多多环境因素造成的结果，怎么成了一个简简单单的技术了呢。马拉帕尔特杜撰了一则故事：你只要控制了交通、铁路和其他战略要地，就成了国家的主宰。2002年4月11日委内瑞拉反查韦斯的政变行动不是这样的。那次行动纠集了受帝国主义教育影响而背信弃义的军官、黄色工会阴谋小集团、大产业主、电视频道及主要舆论传媒业主、腐败的旧政党、各类鼠窃狐偷之辈，形成了一支具有法西斯思想和拥有巨额资财及掌握极其强劲宣传工具的力量，力图搞垮玻利瓦尔计划。这才是反革命政变的真实手段，是帝国主义为了阻止拉美实施任何社会变革计划而采用的手段。

在古巴发生政变的时候……

拉：1952年3月10日。

卡：对，1952年。当时，在几位卓越的同志帮助下，我组织、培训了

^① 库尔齐奥·马拉帕尔特（1898—1957），意大利作家，主要著作有《政变术》（1931）、《完蛋了》（1931）和《皮》（1949）。

一支 1200 人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阿贝尔 (Abel)^①、蒙塔内 (Montaner)^② 等人] 的队伍。他们年轻、十分善良。我亲自同他们交谈，向他们讲解我们组织设定的目标和纪律。他们都是正统党青年组织成员，几乎无一例外。

拉：为了攻打蒙卡达兵营？

卡：开始时我们并未想由我们来发动一场革命，只想同大家一道为恢复到 3 月 10 日之前的生活、恢复被政变破坏了的宪政进程而斗争。当时我想到的是，大家团结一致共同结束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我当时十分明确：必须用武力推翻巴蒂斯塔，恢复宪政。而面对 3 月 10 日的那场背信弃义的政变，团结一致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天之前，我一直怀有一种美好的想法：在古巴应该走合法斗争道路。但这一想法发展成了要用革命方式夺取政权的理念。巴蒂斯塔发动的政变使这一理念成了问题。我当时考虑到：新形势下各政治力量的心思都在于恢复到政变前的原状。

拉：您在大学读法律时就开始对政治感兴趣了吗？

卡：我刚入大学那会儿，是个政治盲。我跟您说过，大学当时在一帮与格劳·圣马丁政府关系密切的人控制下。我从入学的第一年起，就觉察到了一种高压、敬畏、耀武扬威的氛围。有支在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一帮人完全控制下的校警队。大学是腐败政府掌控的一座堡垒。大学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在政府中供职，领取政府薪金，享用政府一切人力和物力。这时奇瓦斯起而反对真正党，进而组建古巴人民党（即正统党）。在我进入大学时，这一刚组建的运动已在那儿开始了活动。

① 阿贝尔·圣马利亚·夸德拉多（1927—1953），正统党青年组织成员，后来成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组建的运动领导人、攻打达卡达兵营的第二负责人，1953年7月26日那天被捕，后受刑，遭杀害。

② 赫苏斯·蒙塔内·奥罗佩萨（1923—1999）生在松树岛，攻打蒙卡达兵营运动领导人之一，参加了攻打行动，后被捕，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关押在一起。为“七二六运动”全国指导委员会创始人之一，任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格拉玛”号游艇远征队成员之一，在阿莱格里亚德皮奥与部队失散后被俘。革命胜利后，曾担任党和政府重要职务。在哈瓦那去世。

拉：您是什么时候进入大学的？

卡：我是1945年9月4日进入大学的。我曾说过，我是地主的儿子，所以能够读完六年级，七年级考试通过后得以进入大学预科学习。我父亲有钱，我因而后来得以来到有大学的哈瓦那求学，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就读。我难道比比兰的那数百名穷人家的孩子都聪明吗？他们中几乎无人读到过六年级，没有一个人中学毕业，更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

那些上不了中学的人还能上大学吗？那些生活在大糖厂地区 and 市镇——圣地亚哥、奥尔金以及曼萨尼约和旧奥连特省内二三个市镇除外——的农民、工人的儿子谁也上不了中学。其他各省——首都及其周边地区除外——的情况也是这样。更不用说上大学了。因为那时中学毕业后得来哈瓦那上大学。哈瓦那大学不可能是穷人的大学，那是一所中等阶层和富人上的大学。尽管如此，那些年轻人往往超越其本阶级的利己主义，成为理想主义者、敢于斗争的人。他们在古巴历史上一直进行着斗争。

我刚入大学时只不过是有点反叛精神和朦朦胧胧的正义思想而已。但在大学里，我成了革命者、马列主义者，具备了我一直坚守的价值观，我一生为之战斗。

拉：您在大学的这种氛围中开始了政治活动。

卡：对。开始时我对当时的所见所闻产生了反感情绪。这只是出于一种反叛精神、对思想和知识的渴求、好奇心和一种信念。我的生活经历使我很早就觉得有许多事要干了。

不久，我就根据生活经历和所获得的有关当时在资本主义社会传播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开始自行慢慢成了一名当今人们称之为的空想共产主义者。中学最后一年也教授这种政治经济学，但讲得很糟糕、很浅显。

我之所以跟您说我在大学里成了一个革命者，是因为我阅读了一些书籍。而在读这些书籍之前，我就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所质疑了，因为我学习之初就觉得它所言荒谬了。大学一年级时有位极其严厉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名叫波特拉（Portela）——当时没有印刷出版的课本，只有900

页油印的讲义。他名气不小，很可怕，令人畏惧。真走运，举行的是口试。我顺顺当当地回答了问题，得到了一个少见的高分。

这是一门讲解资本主义法则的课程，几乎从不提及不同的理论观点。我学习这门政治经济学时，是越学越生疑，越学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我在大庄园里生活过，了解情况，就像全世界许许多多的空想家一样，总想要改变那种状况。

拉：您是个什么样的学生？

卡：我是一个很糟糕的学生，因为从不进教室听课。我已跟您说过：上中学时从来不上课。我被迫走进课堂，是因为我是寄宿生，身在课堂，心早就飞到九霄云外了。临考试了才学习，搞突击。上大学时同样不上课。干什么呢？我在花园的月桂树下跟同学们谈天说地。在那里——有几张长凳——跟男同学们聊，更跟女同学们聊，因为她们比较用心听我讲话，比较有礼貌。总有那么一些学生听我讲，我向他们讲解一些理论问题。今天还真想不起来那时都跟他们谈了些什么，解释了一些什么问题！从三年级开始，我已不能再担当正式的学生领袖，因为我必须做出抉择，注册为自由生。原因嘛，我会在别处谈及。尽管如此，我在大学生中已有影响，很大的影响。

打那以后，我就自由学习了。什么叫自由学习呢？就是不注册某一固定的课程，而是想注册几门课程就可以注册几门课程。我注册了50门课程。

拉：50门？

卡：自由选了50门。专业学习的最后阶段，我是真踏踏实实学习了，选修了3门相近的课程：法律学、外交法和社会学。谁要是获得了这3门课程的学位，就可以申请奖学金了。我已有了明确的政治思想，但还想多学点东西，想丰富一下经济方面的知识，就想得到一份奖学金，好让我到欧洲、甚至去美国学习。我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每天要学习十五六个小时。一日三餐就书进食，学习不间断。

拉：您父亲是位右翼人士，他一直让您在保守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您在大学学习期间是什么时候接触到左派的呢？

卡：我曾说过，我刚入大学时，那儿还真没有几个左派。我入学前二十年，哈瓦那大学在梅利亚的影响下极负盛名，极具战斗精神。差不多十二年前，在鲁本·马丁内斯·比利埃纳领导的共产党的影响下，大学生们支持促使马查多尽快倒台的街头斗争和革命罢工运动。我入学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结束，当时麦卡锡主义和反共活动十分猖獗，1945年注册入学的1.5万人中，积极反帝的知名人数不超过50个。那时根本就没有多少工农出身的学生。年轻人关注的是其他问题——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根本就不关心社会彻底变革问题。左派人士认为我是个怪人，他们说：“这位地主的儿子、贝伦耶稣会学院毕业生，应该是个世上最反动的家伙。”刚入学那会儿，我同在中学时一样，成天泡体育。但在一年级上了几周后，就开始也对政治感兴趣了，我跨出了最初的几步，两三个月下来完全忘了篮球、棒球、足球等所有体育活动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政治活动。我是年级代表的候选人，以181票赞成、33票反对当选。

从事这类政治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多。临近大学生联合会主席选举时，我开始竭力反对政府提名的人选。这使我陷入了危险境地，因为同黑手党——我曾跟您说过，它控制着大学——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拉：什么样的危险？

卡：人身安全方面的压力和威胁都很大。大学生联合会选举即将举行时，我在上法律系二年级。黑手党被我的抗拒激怒了，在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后，使用强硬的威逼手段：禁止我进入哈瓦那大学。我不能回到这所学校了。

拉：那么您干什么了？

卡：嗯，我哭了。是的，哭了。我走到海边冥想，20岁的我趴在沙滩上，泣泪涟涟。问题非常复杂。我所面临的是种种权势的重压和

死亡威胁。那帮人备有武器，杀人成性，得到所有警察机构和格劳腐败政府的支持。而我遏制他们的唯一法宝是道德力量、越来越多的支持我的学生群众。在他们那片大学封地里从未有人公开跟他们唱过对台戏。他们不能容忍抗拒的存在。他们还有校警帮忙。我可能会在一场派别冲突中丧生。哭过后，我决定回学校，回去进行搏斗。我意识到回去很可能就意味着必死无疑。

一位朋友帮我弄到了武器，一支 15 发的勃朗宁手枪，类似于我现在还在用的这支枪。我决定不能轻易丢掉性命，不能接受逼使我离开大学这一羞辱。我就这样开始了我那最初的、方式奇特的反对政府和国家权力的武装斗争。然而这场斗争的特点不在于使用了武器，而在于引发了一连串难以置信的风险和冲突。我时刻都有被警方逮捕、送交紧急法庭的危险；这种法庭可以自由处置被捕者，且不准保释。敌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轻易地使我销声匿迹。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最危险的时期之一了。我在那种状态下，同五名年轻人一道返回学校；他们完全是出于对我单打独斗精神的崇敬主动要求陪伴我的，同我一样都带着家伙。那次行动使那些禁止我踏进大学校门的人惊诧不已，可这种情况并未发生过几回。我很快就不得不经常单独行动，几乎总是赤手空拳。1953 年 7 月 26 日前的七年间——参加反特鲁希略远征和波哥大民众起义那两次除外——我从事斗争活动时从来不带武器。大多是一群手无寸铁的人陪同我一起行动，这是我能够受到保护的唯一方式。不断的揭发和对风险的藐视，是驯兽师手中紧握的两根钢鞭。事实教育了我：尊严、道德和真理是战无不胜的武器。我自打 1956 年 12 月 2 日从“格拉玛”号游艇上岸以来，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武器。

拉：可您会使枪吗？您都使过哪些枪？

卡：我是个好射手。我出生在农村，曾无数次偷玩过家里的枪，有温彻斯特连发步枪、勃朗宁猎枪、左轮手枪和所有能弄到手的枪。

拉：您射击过吗？

卡：我在比兰时曾编了一个故事，说秃鹫^①吃小鸡。嗯，编故事，说秃鹫吃鸡蛋和小鸡。我家屋边有根木杆，就像接收广播用的天线那样，上边常常落有秃鹫。这就使我有时充当了小鸡的保护者角色，因为我认为秃鹫是种害鸟。其实那样认为是不对的，它们实际上是清洁工，吃的是大型或中型动物死后的腐肉。

拉：它们是以腐肉为食的鸟类，并不侵害活物。

卡：我从小就经常带枪行走在比兰大地上。我家有支半自动猎枪，是枪膛里压4盒子弹的那种。你瞄准目标，扣动扳机，两秒钟内连续射出5颗子弹。还有3支步枪，较老式的那种，但可以用现在的子弹，人们称之为毛瑟枪。还有两支44口径的温彻斯特步枪，就像野牛比尔使的那种，枪膛里可压多颗子弹。

拉：您用上随身带到哈瓦那大学的那支勃朗宁手枪了吗？

卡：那次没有用上。争夺大学生联合会的大战奇迹般地和平停息了，但我所遇到的风险，就像跟您说过的那样，是相当大的。这就是我1945年入学就读的这所大学的特色。一波三折，千变万化，轶事不断，形势对我来说十分严峻。这方面的事太多了，一时讲不完。我已讲得不少了，够多了。

我只再说一点：当时天真地支持大学前领导、同我唱对台戏的一些青年学生后来参加了革命活动，有些人甚至献出了生命。如今我们的大学里不存在这类冲突，50多万年轻人在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他们有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定信念和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从而具备了维护革命、保卫祖国的战斗精神。多么了不起啊！

^① 秃鹫是种以腐肉为食的鸟类，形似兀鹫，成群飞翔在古巴上空。人们也称之为“加勒比鹫”。

拉：就在那样的形势下，进行了从孔菲特斯岛出发反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独裁者特鲁希略^①（Rafel Trujillo）的远征。

卡：对。1947年7月我加入了孔菲特斯岛远征队，参与反对特鲁希略的斗争，因为我从一年级开始就被指定为大学生联合会争取多米尼加民主委员会主席。我还被任命为争取波多黎各独立委员会主席。我非常认真地担负着这些使命。我们再谈1947年，打从那时起，我就怀有了从事非正规斗争的念头。根据古巴的经验、独立战争经验和对其他方面情况的分析，我确信可以应用非正规战的方法进行反抗现代正规军的斗争。我当时认为可以到圣多明各岛的山区打游击，而不要拿一支没有受过什么训练的非职业部队去同特鲁希略的正规军作战。

我们抵达多米尼加共和国时，孔菲特斯岛远征队一片混乱，无组织无纪律；我看到这一状况后，决定辞去中队长职务，打算率同我的中队人马上山打游击。那件事发生在1947年；攻打蒙卡达兵营是在差不多6年后的1953年。我已有了进行这种斗争的思想，落实到行动是在马埃斯特腊山上。我相信非正规战是出于一种本能，因为我出生在农村，因为我熟悉山区，还因为我意识到那次远征是场灾难。由于古巴军队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军队都拥有海军、空军，拥有一切的一切，傻瓜才会无视这一情况。这就更坚定了我的信念：不能同这样一支军队进行正面冲突。

拉：1948年4月9日那天，深孚众望的政治领袖豪尔赫·埃利塞尔·盖坦（Jorge Elifecer Gaitán）被杀，您当时正好在波哥大。您在那儿经历了一次人们称之为“波哥大事件”^②的暴动。那次经历情况怎么样？

卡：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政治经历。盖坦是哥伦比亚和平与发展的

① 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1891—1961），多米尼加共和国独裁者，1930年至1961年遇刺身亡期间一直是美国盟友，受美国保护。1946年曾宣布允许流亡在外的共产党人回国，但回国后又下令处决他们。这之后就有了从孔菲特斯岛出发的远征行动。特鲁希略的长期独裁统治是拉丁美洲历史上最反动、最残暴的统治之一。

② 对“波哥大事件”的生动描述，参见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生而述之》，巴塞罗纳蒙达多里，2000年，第332—363页。

希望。他的死犹如一声晴天霹雳。人民发动起义，谋求正义；人们抢武器，警察也加入行动；没有统一指挥，随意破坏；死了数千人。我站到人民一边，到一处警察局抢到一支枪；此处警察局在蜂拥而至的人群面前瘫痪了。我见识了一种完全是自发行动的民众革命场景。我曾详尽地讲述过那次经历，就记载在那本哥伦比亚史学家阿拉佩(Alape)^①撰写的书里。

但我可以对您说：那次经历使我更加支持人民事业。马克思主义思想——我当时还刚刚有一点儿——与我们的行动毫无关系。我们的行动完全是我们这些具有马蒂主义、反帝、反殖、争民主思想的一帮青年人的自发行为。

盖坦被杀害前的那些日子里，我在巴拿马同大学生们举行了会晤。他们刚刚遭受盘踞在运河区的美军的偷袭，他们在举行抗议游行、要求归还运河时，遭到了机枪扫射，致使多人伤亡。我记得当年我们路过的一条街上满是酒吧和被迫卖身的妇女，那是个大妓院，面积达数千平方米。一些年轻人住了院，有位青年脊柱受损瘫痪了，我去看了他，充满了钦佩之情，我非常钦佩这些勇敢的年轻人。

我是路过委内瑞拉到的巴拿马。当时罗慕洛·贝坦科尔特(Rómulo Betancourt)是民主行动党的领导人。他那时不是后来的样子。委内瑞拉革命^②在古巴赢得了广泛支持。卡洛斯·安德列斯·佩雷斯(Carlos Andrés Pérez)当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在执政党的官方报馆里工作。罗慕洛·加列戈斯(Rómulo Gallegos)^③是个谦和、正直的人，在政治和文学上享有盛誉，当时刚当选为委内瑞拉总统。而我在不久前参加了反特鲁希略远

① 1981年9月，哥伦比亚记者阿图罗·阿拉佩就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波哥大事件”中的经历同他做了长时间的访谈。参见阿图罗·阿拉佩：《波哥大事件：忘却的纪念》，美洲之家出版社，哈瓦那，1983年。

② 1945年10月18日，委内瑞拉发生政变，将独裁总统伊萨亚斯·梅迪纳·安加里塔赶下了台，革命执政委员会随之成立，罗慕洛·贝坦科尔特任主席，直至1948年2月15日。1947年12月大选，罗慕洛·加列戈斯获胜，1948年2月就任总统。这一“革命”时期只延续至1948年11月2日，当天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罗慕洛·加列戈斯政府。

③ 罗慕洛·加列戈斯(1884—1969)，政治家，但首先是个委内瑞拉的伟大作家，著有小说《堂娜芭芭拉》——一部西班牙美洲经典名著(1929)、《卡纳伊马》等。

征队。那次行动当时得到了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进步和革命力量的关怀和支持，想必民主行动党亦是如此。查韦斯（Chavez）还没出生哩。盖坦在哥伦比亚团结起了自由党人，在大学里有着巨大影响。我们同大学生们进行了接触，从而结识了盖坦；我们同他一拍即合，他决定支持我们当时在积极筹组的拉丁美洲大学生代表大会，答应为代表大会主持开幕式。我们的筹组活动与那几天在波哥大创建美洲国家组织的工作同时进行。不过那完全是种巧合，不是有意安排的。

我记得：我们在筹建拉丁美洲大学生联盟的同时，还干了不少事，其中包括支持阿根廷人为收回马尔维纳斯群岛而进行的斗争、支持争取波多黎各独立的斗争、支持推翻特鲁希略的斗争、支持要求美国归还巴拿马运河的斗争以及支持西半球欧洲殖民地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这些也都列入了我们的斗争纲领，但只能说这是个反帝反殖的纲领，还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纲领。

拉：您认为：通过在哈瓦那大学的斗争、孔菲特斯岛的经历、参与“波哥大事件”的经历以及在正统党内的活动，在1952年3月10日巴蒂斯塔发动政变时，您已初步掌握某种社会学说和夺取政权的理论了吗？

卡：那时我已读了许多有关古巴独立战争的书籍。进入哈瓦那大学后，我就开始对政治经济学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很快，我就从有关书本的论述中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理性。

如我前面所述，后来我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那时我全身心地投入了政治活动，一年级时就没有很好地学习那门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的课程，连考试也没有考。我曾跟您说过，这门功课是位非常严厉的教授主讲的，差不多有上千页的讲义，都是油印的，纸张又长又大，有的地方字迹潦草难辨。我跟您提过这一点。我在决定认真深入学习这门课程后，开始接触到了有关价格的种种学说以及对其决定因素所做的不同解释。这是一门向资产阶级青年传授的政治经济学。我打那时即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

我自行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经济学是十分荒谬的。在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著作前，我已成为一个空想共产主义者。空想共产主义不根据科学和历史思考问题，而是根据看上去非常糟糕的贫困、非正义、不平等、社会与实际发展情况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些现象的存在看问题。人们还有一种道德观：我跟您说过，我们的道德观主要是通过研读马蒂的书籍形成的。

生活对我的教育非常深刻，指导着我的生活方式和我对生活的看法。我根据人们所说的“生产过剩危机”“失业”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制度不灵。社会学史和劳工法这两门课程使我对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思考。这两门课的课本是接受过左倾教育的教授编写的^①。

我跟您说过，我最早阅读的马克思著作之一是《共产党宣言》。这本书对我有很大的影响。由于我是出生在四周都是大庄园的一家庄园里，了解那里人们的生活状况，从而开始理解、明白了一些事。可以说，我是亲身体会了什么叫帝国主义，什么叫统治，什么叫顺从美国意愿、腐败无能、镇压民众的政府。正统党揭露、指责了这类行为、这类贪赃枉法行为。而我站在这个民众政党左翼一边。

打那以后，我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些著作越来越吸引我。我开始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我极富正义感，具有明确的道德观。我反对不平等，反对非法枉为。我感到，那些著作说服了我，在政治上证明了我自己得出的结论。我曾说过：如果说女海妖的诱人歌声迷住了尤利西斯的话，马克思主义揭示的那些难以辩驳的真理则迷住了我。我曾有过乌托邦思想，这时感到脚踏实地了。

马克思主义向我揭示了社会的真实面貌。我当时就像是森林中辨不清方向的一头鹿、一个行路人。您如果不真正了解阶级斗争史，抑或一点都

^① 大学里开设了社会学说史这门课，课本是劳尔·罗亚·加西亚编写的。他是个思想家、作家，参加过反马查多的学生革命运动。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时期，被迫流亡国外。曾任古巴革命政府外交部长多年，积极维护古巴外交政策，人送绰号“尊严外长”。劳工法——法律专业课程之一——课本是奥雷利亚诺·桑切斯·阿朗戈编写的。此人曾任格劳·圣马丁政府教育部长，受到过奇瓦斯的谴责。（古巴编者注）

不了解社会有贫富之分、一些人压迫和剥削另外一些人这些现象，那就是一个身处森林、根本不辨东南西北的人。

拉：在您生活的环境里，这样思考问题的方式应该不多见……

卡：是啊，对许多人说来，现行社会似乎是世上最合乎情理的，所出生的那个家庭和所生活的那个村镇也是这样。这一切都是很熟悉、很古老的惯例。如果一辈子老是听说“这位是马的主人；这位是茅屋（bohío）^①的主人；这位是一大片土地和土地上所有人和物的主人”这样的话，也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所有权概念普遍适用于一切的一切，子女也不例外。这位是某人的儿子，这位是某人的女人：啊，一切的一切都成了某人的财产。这一所有权概念适用于一切：马、卡车、庄园、工厂、学校，公共财产自然除外。

对一个出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满脑子财产权观念的人说来，一切都是财产，自己的一双鞋、子女和女人同工厂一样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财产。工厂里有位老爷，他是主人，掌管着一切，会发善心给人一点小事干干，会给那些无知无识、既不会写又不会读的人们一点小恩小惠。这是因为资本家会运用心理学，而社会主义者们通常不会应用。社会主义经营管理者们认为劳动完全是劳动者应尽的义务，而资本家明白劳动是为他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对他说来，一切都是非常合乎常情的：他组织、找钱、做买卖、发财——发大财。

那时，嗯，生活在那种低声下气、自卑情结状态下的人们，明知道某个政治家十分富有、极其腐败，但还是怀着钦羡之情看待他。

我在开始动脑筋思考问题时——开始学习经济学后，才知道有个卡尔·马克思，才知道有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空想主义者。后来我又发现，我原来是个空想家，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① 茅屋是古巴农民特有的住房，通常是泥土、木板或棕榈树枝做墙，棕榈叶盖顶。

拉：您认为这时已锻炼有成、具备从事政治活动的条件了吗？

卡：同几年前刚踏入哈瓦那大学校门时相比，我是成熟多了，但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我还不够成熟。

我从那些伟大的革命思想家那里得到哪三件宝呢？从马蒂那里得到了灵感、榜样以及其他许多东西。但我们主要是接受了他的道德观，首先是他的道德观。我一直牢记他曾说过的一句话：“世间一切荣耀实乃沧海一粟。”说得太棒、太妙了。面对着满世界的自负、贪婪，我们革命者要终生提高警惕，出污泥而不染。我接受、坚守这一道德观。道德同行为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是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我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了有关人类社会真面貌的论述，而谁若没有读过这一论述，或不明白这一论述，那就好比是黑夜置身森林中央、不辨东南西北了。马克思向我们揭示了社会的真实面貌及其发展史。离开马克思，您就难以合理地阐释历史重大事件、提出发展方向、指出人类可能走的道路，人类社会的发展并未到头。

我们，包括您和世上许多人，都在关注着像当今十分时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样一些学说和理论。这些学说和理论会使殖民主义时期的一个人担心，会使马蒂担心，古巴当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这些学说和理论已使人们担心了近三十年。许多重要事理是明摆着的。因此人类历史……

拉：谈谈您自己的个人经历好吗？

卡：嗯，我已经跟您说过，我出生在农村，这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父亲是地主，我祖父不是地主。我就生活这样的环境里。我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后，认清了那些大庄园里的生活真相，因为我亲眼见过那里的情况。我父亲这个地主可说是所有地主中最富有同情心的地主。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爸。他在那儿，同人们交谈。有人有事相求，他瞅着可怜，会出手相扶。

而其他那些美国公司的大庄园，股东们在纽约，在古巴的是管家和工头，他们不可能帮助别人。他们有预算，不得随意开支。切·格瓦拉曾找

来相关文件，对大跨国公司种植园的管理方式进行了研究——我知道您对切的事很感兴趣。他研究后说：“连一分钱也没有用来帮助过别人。”我父亲——我已跟您说到过他拥有的土地面积——在那儿进进出出，成天跟人们照面。人们跟他亲近；他出门从来不带什么保镖，也没人跟随；他独来独往，一个人走上数公里路是常事，人们可以随便同他接触交谈。在纽约，人们是很难接触到像联合果品公司这类企业的总裁的。因此说，我父亲那里的情况是最富有人情味的。我见到过这一切，这一切是我同情一无所有者思想形成的直接原因，使我获益匪浅。

我跟您说过：我挨过饿；我对您谈到过很多事；我受过苦；因此我很容易就明白，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等、非正义的社会里。

拉：您是什么时候决定从理论过渡到实践的呢？

卡：别忘了：我那时已是半个国际主义者。1948年我在波哥大同大学生们并肩战斗，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请记住：这一计划内容很多，其中有为收回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而斗争、要求美国归还巴拿马运河。我还参加了孔菲特斯岛远征队，也执行过其他任务。最最重要的是：几年下来，我已成了一名信仰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这时，1952年3月10日那天，巴蒂斯塔发动了政变。我说这些，都是为了说明我的价值观的形成、我这几年在大学里学到了些什么；没有这样的价值观、不掌握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我任何事也干不了。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ristobal Colón）如果没有罗盘，就什么地方也到不了。而有这么一只罗盘，我得到了这只罗盘：我发现了马克思和列宁。道德观嘛——我再重复一遍，我得自马蒂。可能也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我是个运动员，经常爬山；环境有影响，生活有助益。

1952年巴蒂斯塔发动政变后，我构思了今后的斗争战略：宣布革命纲领，组织人民起义。从那时起，我树立了斗争观念，具有了信仰坚定的革

命思想，这些思想见诸《历史将宣判我无罪》^①。我已有了必须运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想法。要视那一年6月1日大选后局势发展的情况做决定。局势一如往常，毫无变化。幻想再次破灭，令人失望。不能再走老路了，否则将一事无成。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1953年7月26日攻打古巴圣地亚哥蒙卡达兵营失败后被俘受审。他本人作为一名律师进行自我辩护，他的辩词以“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结束，并以此冠名发表流传于世。他的辩词同时也是一篇揭露巴蒂斯塔罪行的宣言，一篇从哲学、法学和伦理学上论证反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斗争合理性的演说，一篇对古巴社会发生彻底变革纲领进行的陈述（又参见第六章注5）。



我
的
一
生

第五章 攻打蒙卡达兵营



准备—人员—武器—战略—西沃内小庄园—攻打—撤退

青島六十年代史 第五卷

拉：您是什么时候决定攻打蒙卡达兵营的？

卡：有迹象表明巴蒂斯塔在策划政变，这引起了我的警觉。我向正统党领导——我不是领导成员——做了报告，领导让其信任的人进行调查，那些人调查后对领导说没有发现问题，一切正常，平安无事。我曾跟您说过这件事。

我们什么时候决定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呢？就在我们确信没人会动手干的时候、不会有反巴蒂斯塔斗争的时候。当时许许多多团体——很多人同时参加几个团体——均未准备组织起来从事我们所期盼的武装斗争。例如，大学教授拉斐尔·加西亚·巴塞纳来跟我说他想夺占政府主要堡垒哈瓦那哥伦比亚兵营。他对我说：“我里边有人，他们会帮我。”我对他说：“有人为您扫清道路，您想占领哥伦比亚兵营？那您别再跟别人说了。我们有足够的人手，您得严守秘密。”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跟20多个组织说了。没几天，整个哈瓦那，包括军队，全都知道那位教授要干什么了。他是个好人，很正派，曾给军官们上过课——这是他准备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巴塞纳就是这么一位教授。可想而知，所有的人通通被捕，这位教授也在劫难逃。

在我同巴塞纳交谈后的几个星期里，在可想而知的结局发生前，我们判断公众舆论会支持夺占哥伦比亚兵营，遂决定用我们自己的力量不日行动。我们在人数、纪律和训练方面均优于其他组织，它们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我们。这样说不太客气，但事实就是那样。这些组织中最重要、最具战斗精神者当推大学生联合会，但它那最辉煌的篇章当时尚未书写，它那最辉煌的篇章是在刚入大学不久的何塞·安东尼奥·埃切维

里亚（José Antonio Echeverría）^①和他1956年组建的革命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写就的。

我们分析了形势，制定了计划。我们选在古巴圣地亚哥开始行动。我没有同那位教授谈我们的计划。我在乘汽车从圣地亚哥返回首都那天的路上，从广播里听到巴塞纳和哥伦比亚兵营周围一些平民百姓被捕的消息。

拉：您是如何集合起这么一批攻打蒙卡达兵营的人员的呢？

卡：我已具备了革命思想并考察了每个自愿参战者，摸清了其参战的动机，指导其遵守组织纪律和行为准则，向其说明一切可以而又应该说明的事情，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没有革命思想做指导，就不可能制定出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计划。行动的基础是什么？依靠什么样的力量？用什么样的战斗人员？在一个惨遭剥削、受苦受难的国度里，如果不考虑工人阶级、农民和劳苦大众，干什么事都没有意义。我当时还没有什么阶级觉悟，有的只是我所称的阶级意识。而那些人民社会党（共产党）党员则不同，他们是一群受到过良好政治教育的人。有位梅利亚，是大学生领袖，年轻，才华横溢，1925年同一位参加过独立战争的战士一道成立了古巴共产党。我曾多次提到过他。然而，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在帝国主义使出浑身解数猖狂反共的影响下，这个党1952年陷入了孤立状态。当时的政治异常野蛮。

拉：您邀集人员时花了很多时间吗？

卡：还是比较快的。人员聚集得相当快，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看来，你用具有说服力的道理和大量事例是足以使人相信这一社会不合理、必须加以变革，从而立即投入战斗的。开始时我只同少数干部谈了谈。许多人

^① 何塞·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1932—1957），出生在马坦萨斯省卡德纳斯镇。哈瓦那大学杰出的学生领袖，1955年任大学生联合会主席，次年组建革命指导委员会，广泛团结大学生，发展武装力量。组织战斗队，1957年3月13日攻打总统府，试图处死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发动人民起义。当天行动时不幸身亡。

反对贪赃枉法、贪污腐败、失业、不公正，但认为对此负责的应当是那些道德败坏的政治家，而不认为造成这一切的是制度问题。

人所共知，资本主义对人的影响，大多数人是看不到的，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许多人深信：只要从天上请下一位称职的天使，让他治理国家，他就会组建起诚实的政府，就会开办更多的学校，再也不会有人贪污公共卫生及其他紧急项目用款了。他们不明白，天使解决不了失业、贫穷、无地、一切灾难等问题，因为那些大庄园、那种生产制度是绝对不会允许改变现行秩序的。我的信念就是一个：必须根除资本主义制度。

那些小伙子们都是正统党人，坚决反对巴蒂斯塔，非常善良，但没有受过什么政治教育。他们具有阶级本性，但尚没有阶级觉悟。

就像我开头说的那样，我们开始召集、训练人马，准备同其他力量一道参加为恢复 1952 年宪政进程的斗争——这是我们的最低斗争纲领。这是因为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在大选前两个月零二十天发动政变中断了这一进程。巴蒂斯塔在他那支资历深且腐败不堪的军队里影响很大，他在确信难以赢得大选时发动了政变。

再说一遍，我们组织了一支战斗队，不是要进行一场革命，而是要同其他反巴蒂斯塔力量联合一致，因为 1952 年 3 月 10 日政变后，必须联合起一切反巴蒂斯塔的力量。1948 年赢得大选的真正党上台执政，十分腐败，可巴蒂斯塔则更坏。正当选举进程根据宪法向前发展时，就在 1952 年 6 月大选前 80 天的 3 月 10 日那天，巴蒂斯塔发动了政变。

大选本应在 6 月 1 日举行。巴蒂斯塔也是候选人，是他所在的党推荐的候选人。但民意测验表明，他不可能当选。奇瓦斯建立的正统党将以压倒多数票获胜。巴蒂斯塔于是狡诈地发动了军事政变。人们开始自发组织起来，谋划推翻这一非法、专制政府。

拉：你们都有哪些人员？

卡：我们一分钱也没有，赤手空拳。我所拥有的就是跟那个正统党的联系。该党有许多青年成员，他们都坚决反对巴蒂斯塔，是巴蒂斯塔

的对立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内没有一个组织比得上它。这些青年人的道德水准和爱国热忱是很高的。我曾跟您说过：不能说他们有多高的政治觉悟、革命觉悟、阶级觉悟，因为该党的领导一如既往最终还是落入了富人和地主之手，只有哈瓦那是个例外，那儿有群信仰坚定的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

该党的群众是好的，他们是劳动人民，一群正直的人，还包括一些不那么反帝的中产阶级人士，因为当时还未讨论到帝国主义问题。差不多只有在共产党内讨论过这一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的强大攻势下，古巴人民的革命精神大为委顿。

拉：你们训练了多少人攻打蒙卡达兵营？

卡：我们训练了1200个年轻人。就这1200人，也就是说，到这个数，我们就不再招募、训练新人了。我们组建了一小支部队。我同他们一个一个分别进行了谈话，坚持不懈，每天得花上好几个钟头。我谈的主要是政治问题、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做好准备的必要性、明确意图，但绝对不谈具体计划。纪律是头等大事。我说过，我们几个月里招募了1200人。我驱车走了5万公里！这辆车的发动机在攻打蒙卡达兵营前几天给烧坏了。这是辆雪佛兰牌米色轿车，车牌号为50315。我记得清清楚楚。而后我就换了一辆车，是7月26日前几天租借来的。

我们打入了其他组织。有个组织隶属于3月10日被推翻的那个腐败的执政党，它也在策划推翻篡权者。它拥有大量武器，什么都有，就是缺人。前政府的一些军事领导人在组织力量、招兵买马。我们借助阿贝尔的身份地位、热忱和机敏，得以使他们相信会有三队训练有素的人马参战，每队120人。他们视察了分布在首都几个点的小分队，每队40人。这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他们没有其他要求了，人手够了。我们表现得有点过了。他们起了疑心，中断了同我们的接触。我的名字是不该提到的，但是一次接触时疏忽大意提到了我的名字。我曾写过几篇文章揭发那个政府极其恶劣、不道德的事实，登在《警戒》日报上。那是国内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

每周一特刊连续发表了这些文章及相关证据。那是在奇瓦斯去世后数月、巴蒂斯塔政变前数周发生的事。因此，他们指责我挖政府的墙脚，从而导致了政变。

我已跟您说过，我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集合、训练了那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是正统党青年组织的成员。我们的纪律性很强，非常团结。他们相信我们能够成功，拥护我们的主张，使我们满怀希望。

拉：当时所有成员都很年轻。

卡：都很年轻，都很年轻，都是20、22、23、24岁的年轻人。30岁以上者好像只有两人：马里奥·穆尼奥斯博士——随队医生——和希尔多·弗莱塔斯——曾在贝伦学院办公室工作，我从那时就认识他了。我1945年从该校中学毕业后已过去了七个年头。其他成员来自我们在各市镇组织的分支机构，都是一些极其善良、仁爱的年轻人。全国许多市镇设有分支机构。我们挑选攻打蒙卡达兵营人员最多的市镇是阿特米萨（Artemisa）。该市当时属比那尔德里奥（Pinar del Rio）省，输送了二三十名战斗人员，一批优秀成员。还有来自首都和老哈瓦那省的几个市镇的人。老哈瓦那省现在已划分为两个省。

那时有许多形形色色的组织，许多年轻人同时参加几个组织。

我召集的人中有些认识，但大多不认识，因为我同正统党领导成员交往很少，只交往过几个人，其中有马克斯·莱斯尼克（Max Lesnick）、里巴杜利亚（Ribadulla）和奥兰多·卡斯特罗（Orlando Castro）。莱斯尼克现在佛罗里达英勇地同疯狂反对古巴的敌人进行着斗争，深为古巴人民熟知，深受古巴人民尊敬。奥兰多·卡斯特罗当时是正统党青年组织领导人，巴蒂斯塔政变前在竞选众议员，政变后出走委内瑞拉，在那儿成了一位百万富翁。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开始时许多人在政治骗子们的胡言乱语面前茫然不知所措。

我经常到普拉多109号的正统党全国办事处，每天都有许多人去聊天、打探消息。这有利于隐蔽和散布假消息。那儿没有头儿，只有几名管理人

员。我在一间小屋里同五个、六个或七个年轻人聚会。我已说过这样的工作。我们的任务是说服、教育，进行初步组织工作。必须对他们进行考察，不能透露我们的计划。正统党是个中产阶级、贫苦人、劳动者、农民、职员、专业人员、学生的政党。也包括失业人员。有些人在商店干活，有些人在工厂劳动[像佩德罗·马雷罗(Pedro Marrero)]，有些人干个体[像费尔南多·切纳尔德(Fernando Chenard)，摄影师]。还有像戈麦斯兄弟，他们是贝伦学院的厨师，同希尔多·弗莱塔斯一样，我也是在那所学校认识他们的，他们都真是大好人。

我记得：1952年3月10日政变后的几天里，我们最先碰头的人中有赫苏斯·蒙塔内(Jesús Montaner)和阿贝尔·圣玛丽亚(Abel Santamaría)。我在瓜纳博(Guanabo)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有人借给了我一座房子。我用的学习材料是梅林^①写的马克思传记，我很喜欢这本书。书中讲述了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阿贝尔和蒙塔内参加了学习。我发现，在那样的环境里，世间最容易的事是使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我有点爱说教。

拉：可能是因为您受了基督教的教育吧。

卡：也许是吧。我在还没有读到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们写的书之前，曾经是个空想共产主义者。正像我跟您说过的那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我那出生地和特有的生活经历的影响。

那个社会一团糟，根本没有理性可言。

拉：当时您已是一名律师了吗？

卡：我是我们运动的第一个职业革命者，因为那时出资养活我的是运动的成员。他们有工作，我是个职业革命者，因为我作为一名律师只为那些很穷的人辩护，不收钱。我没有其他工作，再说，我得成天为革命工作

^① 弗兰茨·梅林：《卡尔·马克思》，墨西哥格单哈尔博出版社1957年版。

奔忙。

蒙塔内在银行里还有点存款，不多，大概是两三千比索吧；他还有一份酬劳还算不错的工作。而阿贝尔的薪金在那时算是不菲的了，他还在贝达多（Vedado）的一幢楼里拥有一套公寓房。他姐姐艾德^①同他在一起。巴蒂斯塔政变后我结识了他们三位。我的钱都用来给汽车加油、付房租和维持生计所需了。我要说明的是，牌照为50315的汽车并不完全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是分期付款买来的，得每月付款，否则赊销公司会随时随地收回汽车。阿贝尔和蒙塔内曾多次不得不用他们自己的薪金收入赎回汽车。

拉：某些历史学家指出：许多参加攻打蒙卡达兵营的人都是西班牙人，特别是加利西亚人的后代。您能证实这一说法吗？

卡：不错，我注意到了这一事实。我有一天随便查了查攻打蒙卡达兵营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注意到我们中有许多人是西班牙人的后代。嗯，何塞·马蒂就是个很突出的例子：他是古巴独立英雄，父母亲都是西班牙人。我要说明：有许多西班牙人和加利西亚人参加了古巴历史上的独立斗争。我估计有一百多个加利西亚人同古巴人一道为共同事业并肩战斗，其中有些人表现还相当出色。

我们运动的二把手阿贝尔·圣马利亚，一个非常勇敢的好同志，也是加利西亚人的后代。我们运动的第一、第二把手正好都是加利西亚人的后代。劳尔当然也是加利西亚人的后代，起过非常突出的作用。

“七二六运动”历史上的其他领导人——像弗兰克·派斯（Frank País）和他兄弟霍苏埃（Josue）——也都是加利西亚人的后代。他们的父母是加利西亚的加利西亚人，我之所以要澄清这一点，是因为在古巴，人们把所有的西班牙人都轻蔑地称之为加利西亚人。在我们的革命进程中、

^① 艾德·圣马利亚·夸德拉多（1922—1980），正统党青年组织成员，后来加入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运动，为参加1953年7月26日行动的两名女战士之一。行动失败后被俘坐牢。参与了《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第一版的秘密编印、发行工作。反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战争期间任“七二六运动”全国委员会委员。古巴重要文化机构美洲之家奠基人，生前长期任该机构主席，直至去世。

在马埃斯特腊山上的战斗中，有几位杰出的军事领导人也是加利西亚人的后代，卡米洛·西恩富戈斯（Camilo Cienfuegos）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同西恩富戈斯不是在交谊俱乐部里认识的，而是在战场上相识相知的。

拉：你们所有的人都赞同马克思主义吗？

卡：阿贝尔、蒙塔内和我这三位主要领导人是这样的。劳尔当时还不是领导人，他当时还小，还在上学，刚踏入哈瓦那大学校门。有位第三把手，名叫马丁内斯·阿拉腊斯（Martinez Alarsz）^①。此人很有才干，很活跃，是个杰出的组织者，可他就爱实干，不那么注重理论。他受命夺占巴亚莫的兵营，任支队长，负责攻打驻扎在该市的一连敌军。我们要是没有学习过马克思主义——说起来话就长了，我这里就跟您提一提吧，要是没有通过书本学到了马克思的政治理论，要是没有受到马蒂、马克思和列宁的启示，我就连要在古巴进行革命的思想也不会有，因为仅靠一批没有在军校学习过的人，是难以同一支组织完善、武装精良、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军队作战的，胜算几乎为零。这些思想是进行革命的主要基础。

拉：您的弟弟劳尔当时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成员，对吧？

卡：唔，劳尔当时已很左了。但说实在的，向他介绍马列主义思想的人是我。他跟我一起到哈瓦那，同我一道栖身在一间小小的阁楼里，对面是一座兵营。现在著名的科伊巴饭店^②就在那个位置。

拉：梅利亚·科伊巴饭店？

卡：梅利亚·科伊巴饭店是古巴自己出资兴建的，根据经营管理合同由梅利亚负责施工。在它的位置上以前是座兵营。那栋建筑不高，当时邻

① 劳尔·马丁内斯·阿拉腊斯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为准备1953年7月26日行动而组织的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受命指挥一队人马于7月26日同一天突袭夺占设在巴亚莫市的“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兵营，行动亦以失败告终。

② 指的是工程部队所在的营地。（古巴编者注）

近海边没有什么高层建筑。劳尔根据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加入了共产党的青年组织。

拉：他自行参加的？

卡：他自行参加的。他始终保有自己的行为准则。

拉：您从未参加过共产党？

卡：从未参加过。曾有过周密的考虑，也曾好好地分析过。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到时候再跟您聊。

拉：你们是在哪里进行准备攻打兵营的训练的？

卡：我们的人是在哈瓦那大学里进行训练的。我们还组织了突击队。同我们合作的一位先生很有经验，老在革命者们周围转悠，行动诡秘，这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对他也就不再那么热情了。然而他不知道我们的计划，也从未见到过一件武器。我们更像是在进行体育活动。

拉：在哈瓦那大学？

卡：对，哈瓦那大学。佩德罗·米雷特^①（Pedrito Miret，佩德里托为佩德罗的爱称——译注）也在那儿，是教练员。

拉：你们在哈瓦那大学里练射击？

卡：不，不，我们在别处组织训练。在哈瓦那大学只练安装和拆卸武器以及如何射击。佩德里托把训练中心设在烈士大厅里。大学是高度自治的，大学生们十分活跃。大学校区在一段时间里是不受外界侵犯的，开始时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受到干扰，后来就有人跑去表示不满了。巴蒂斯塔及其一伙对此肯定是窃窃欣喜的。

^① 佩德罗·米雷特·普列托，生于1927年。攻打蒙卡达兵营分队组织者之一，参加了行动。现为古巴部长会议副主席。

米雷特是学工程的。我在哈瓦那大学里有许多朋友，在那儿结识了米雷特。我开始把我们的人组织成6人、8人、10人或12人的小组，进行训练，每组有个组长。我负责政治教育和组织工作。我是不在哈瓦那大学里那些训练的地方露面的，是完全避开巴蒂斯塔及其他组织的。

拉：米雷特有过从军的经历吗？

卡：没有，一点儿没有，谁也没有在军校学习过。谁也没有参加过战斗。啊，对了，有一个。我们招募了一个士兵，他是哈瓦那一个兵营里的优秀士兵，就他一个。您知道我们在哪儿训练射击吗？

拉：在哈瓦那郊外？

卡：不对，在哈瓦那的射击俱乐部里。我们根据各人的体型、风格和才能，将一些同志装扮成资本家、商人和各种各样的人等。例如，他们有意地注册在狩猎俱乐部，然后邀请我们到俱乐部进行飞碟射击运动。其实，我们完全是通过种种合法的手段对1200人进行了训练，然而只对一部分挑选出来的人进行了实弹训练。巴蒂斯塔的那些镇压机关没有太注意我们，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一分钱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我当然也很少在那些地方露面了。

有成百万资财的人是那些前政府官员。他们还有从国外弄来的武器，他们有关系、有办法，可以从事训练活动。

拉：您在“波哥大事件”期间曾有过军事锻炼。

卡：嗯，对，“波哥大事件”时有过锻炼，可主要还是在我家乡比兰有过的锻炼。我从十岁、十一岁起就老持枪出行，枪法很准。

拉：在孔菲特斯岛也有过相当的锻炼，是吗？

卡：是的，我甚至还练过迫击炮及其他武器。我实际上差点儿就参与了一场战争。别忘了，那个远征队里有好多反对我的人。尽管如此，我还

是参加了远征队，那仅仅是因为我是争取多米尼加民主委员会主席。我已跟您谈过一些情况。那是一件麻烦事，如何组织和武装那支远征队，谁来组织那支远征队，什么时候开始组织。那是在 1947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特鲁希略已掌权多年，古巴大学生们对他深为反感。

拉：您确实从那次冒险行动中得到教训了吗？

卡：那次行动既没有策略也没有战略。

拉：而且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卡：说来话长。他们是如何招募来这一千多号人的呢？他们是从大街上找来的。

拉：有点愚昧粗鲁？

卡：唔，愚昧粗鲁者受到良好教育是会成为好人的。我不想这样轻蔑地称呼他们。他们缺少思想教育。我从那次孔菲特斯岛远征中学到的主要是应该如何进行组织工作、应该如何挑选人员。

拉：这使您避免了一些错误。

卡：我已跟您说过，我从那时起就在思考进行一场非常规战了，因为那支远征队是支不能算是军队的军队。远征队的头头们甚至还拥有歼击机；他们想得很简单：就是到圣多明各岛海岸登陆。可他们没想到这就要同多米尼加的军队正面交锋。多米尼加军队有数千人，组织完善，受到过美国政府军的训练，装备有美国政府提供的武器；此外还有海军和空军。那个远征队一团糟，混乱不堪。派别林立，指挥权分散，各自为政。其中有个大骗子，名叫罗兰多·马斯费雷尔（Rolando Masferrer）。此人曾经是个左派，还参加过共产党，参加过西班牙国内战争，受过一定的思想教育。可他却成了巴蒂斯塔旗下最凶残的走狗之一，他组织了准军事部队，胡作非为。唔，那支远征队上岸后迟早是要被消灭的。

拉：我们还是来谈攻打蒙卡达兵营吧。您认为这次攻打完全是个失败的行动吗？

卡：蒙卡达兵营是完全可以拿下来的，我们如果拿下蒙卡达兵营，也就推翻了巴蒂斯塔，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会有数千件武器。我们采用麻痹敌人、突袭的战术。我们模仿 1933 年巴蒂斯塔发动的士官政变那样，全部穿上了士官服。巴蒂斯塔不是那次政变的主要组织者，但他有那么一点经验，会耍手腕，当过参谋部的速记员，成了“士官政变”的头头。我们在古巴圣地亚哥的出现会引起混乱，使敌人茫然不知就里，遂趁势进行下一步行动。

拉：您认为攻打计划很完善吗？

卡：我如果再次制定攻占蒙卡达兵营计划的话，会完全依原计划行事，一点不会有变化。那次唯一短缺的是没有足够的战斗经验。后来我们才一点点积累起了经验。

从思考、组织、保密等方面说来，那是个十分完善的计划，如果哪个细节出了问题就会全盘皆输。现在如果有人问我怎么做会更好，我会以不同方式回答他：我们那次攻打蒙卡达兵营如果获胜了的话——我得说一下，我们就胜利得太早了。1959 年胜利后，苏联的援助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我们为胜利而战时并未考虑到这一点。1953 年可能不会这样。那时是斯大林主义的理念和政策主导一切。虽然斯大林已在 1953 年 7 月前的三月份去世，但那还是斯大林时代。斯大林不是赫鲁晓夫。

我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了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那些英勇战斗情况。但我知道我们自己国家历史上的一些故事。我可以跟您说一些对我们所进行的游击战和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有影响的因素。有些事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例如，我不知道像法西斯政权在意大利垮台时斯科泽尼（Skorzeny）^①营救

^① 奥托·斯科泽尼，德军突击队队长，1943 年 9 月 12 日救出了当年 6 月被推翻关押在亚平宁山中大萨索的贝尼托·墨索里尼。参见奥托·斯科泽尼：《危险生活》（第一卷）和《战斗与失败》（第二卷），巴塞罗那阿塞尔博出版社 1966 年版。

墨索里尼那样的一些事儿。我再跟您说件事：我读了所有能弄到手的苏联人和德国人撰写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特别是在革命胜利后。

当发生某种情况时，一些基本原则还是要坚持的。只要准确无误地清除当时未能预料到的一个小小障碍，蒙卡达兵营就拿下来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拉：你们是只攻打蒙卡达兵营呢，还是同时也攻打其他目标？

卡：我们攻打了两座兵营，除蒙卡达兵营外，还有座巴亚莫兵营。拟用做前哨基地，抵御增援敌军。我们打算炸毁巴亚莫以北数公里处一座横跨考托河的中央公路大桥，因为首批救援敌军可能会来自奥尔金，然后才是其他地方。空运，力量不够。其他通道就是铁路了，那很容易防范。你可以使火车脱轨，也可以扒掉一段铁轨。最要紧的是中断一座坚固的钢铁大桥或水泥桥梁。我们派出 40 人去夺占巴亚莫兵营，旨在抵御可能来犯的敌军先头部队，在离圣地亚哥 200 余公里的地方掩护我们。

援救的敌军从陆路进行反击。我们认为要迅速撤离兵营，以防空袭，将武器分散存放在圣地亚哥的一些地方，然后再分发给民众，圣地亚哥人民具有维护独立的斗争传统。1952 年 3 月 10 日巴蒂斯塔发动政变时，圣地亚哥守备团在一些军官的影响下拒绝服从政变命令——然而在这些军官被革职后还是服从了命令，圣地亚哥人民紧急动员表示支持。圣地亚哥人民完全反对、厌恶那场政变。

拉：您周密地准备了这次攻打行动。行动的前一天，所有参加者都乔装集合到了圣地亚哥郊外的西沃内小庄园。

卡：我们都在前一天从首都到了那里，就在行动前数小时。我们从小庄园出发向蒙卡达兵营挺进。

拉：您的大多数人在到达小庄园时还都不知道要干什么？

卡：嗯，从哈瓦那向小庄园运动时，每个小组有个头头带领。我是 25

日（星期六）凌晨2点40分出发的，这样，我在攻打行动开始前就有24小时没合过眼了。我是25日夜间到的小庄园。阿贝尔·圣马利亚在等我。其他人则分别聚在城里预定的公寓里，备有汽车，到时候一齐出发。谁也不知道小庄园，只有阿尔贝、雷纳托·基塔尔特（Renato Guitart）^①和我知道。嗯，还有埃尔皮迪奥·索萨（Elpidio Sosa）。梅尔巴（Melba）^②和艾德，她们是后来才知道的。

这个小庄园是1953年4月租来的，是在攻打行动前3个月。这事是雷纳托操办的，他是圣地亚哥人，年轻、机敏、善良、勇敢、坚定，是唯一一个知道行动目标的圣地亚哥人。他十分熟悉圣地亚哥市及其郊区的情况。他是重大机密的主要保守者，是唯一一个知道武装行动首要目标的外省人。

阿贝尔是第一个从西部地区到达的人，而后是埃尔皮迪奥·索萨。战士们个个都有思想准备，一接到通知就会立即赶到指定地点。我们对他们进行了多次调动演习，完后各自回家。这次可是真干了。我们对他们每个人已了解得很透了。每组有个组长。我们用租借来的车送他们离开首都前往圣地亚哥，行程近千公里。

拉：在圣地亚哥？

卡：不，在哈瓦那，车行近千公里抵达圣地亚哥。我们定于7月26日凌晨发起攻击。我是25日拂晓时分从哈瓦那出发的，具体时间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路过圣克拉拉时买了几副眼镜。是啊，买了几副眼镜，因为我那时已有点儿近视了。视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低了。

^① 雷纳托·基塔尔特，1930年11月出生在古巴圣地亚哥，是唯一一位事先知道1953年7月26日行动计划的圣地亚哥人，并全身心地参加了准备工作。参加了攻打蒙卡达兵营第三哨位的突击队。战斗中牺牲。

^② 梅尔巴·埃尔南德斯·罗德里格斯·德尔雷伊，生于1921年，律师，是同艾德·圣马利亚一道参加1953年7月26日行动的另一位女性。被俘坐牢。积极参与了《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第一版的秘密编印、发行工作。战争期间任起义军第三战线军法顾问。革命胜利后担任过各种职务，其中有古巴越南团结委员会主席、驻越南和柬埔寨大使。古巴共和国英雄。

拉：您忘了戴眼镜？

卡：不，不，我没有忘，一般说来是不会忘掉眼镜的。我记不得是怎么回事了，是眼镜坏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记不清了。好在圣克拉拉有眼镜店，我得配眼镜，就在那儿配了几副。我继续赶路，在巴亚莫停了停，看了一下准备攻打这座历史名城的兵营的战士们。我又在帕尔玛·索里亚诺（Palma Soriano）停了停，跟阿基莱里塔（Aguilerita）——另一位支持我们行动的奥连特省人——碰了个头。我25日傍晚时分到达圣地亚哥郊外的西沃内小庄园，就在攻打行动开始前数小时。他们绝大多数人是乘车从哈瓦那出发走中央公路到的圣地亚哥。有些车上插着巴蒂斯塔集团的小旗“9月4日旗”。我的车上没有插，因为谁都了解我；有人要是看到我“9月4日旗”就会说：“这是怎么啦？”

我们最终选定了西沃内小庄园，因为那是个战略要地，是个可以集合人员的最隐蔽、最合适的地方。由小庄园前面经过的公路可从圣地亚哥直通海边，1898年美西战争中美军就是在西沃内海边登陆，而后沿海岸推进至关塔那摩附近的。这个地方林木密布，尤其是成片的芒果树，枝叶繁茂，有利于我们的行动。我们将小庄园伪装成一家养鸡场，孵化小鸡，饲养雏鸡。我们把一部分武器藏在住宅边上的一口井里。但大部分武器是与我们差不多同时运到的。我已跟您说过，只有一名圣地亚哥人，那就是雷纳托·基塔尔特。为了不引起敌人的一丁点儿怀疑，所有的人均来自西部地区。

拉：可为您开车的是个圣地亚哥人，对吧？

卡：开车的来自哈瓦那。

拉：您从哈瓦那来的时候？

卡：对，我从哈瓦那来的时候，司机是米歇尔，特奥杜利奥·米歇尔（Teodulio Mitchell）。唔，我们到小庄园时差不多是晚上了。我们到圣地亚哥市时，天就黑下来了，我立即同阿贝尔·圣马利亚取得联系。各组人马一到就住进了事先安排好的公寓。

那天是狂欢节，这也是我们挑选这一天的原因。许多人涌到了圣地亚哥，十分热闹，全城洋溢着狂欢气氛。圣地亚哥的狂欢节是很有名气的，这十分有利于我们的行动。然而始料未及的是，这个狂欢节也使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因为兵营里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这些措施就成了后来出问题的主要原因。我们乘车从小庄园出发前往兵营，做好了一切准备。这些车在庄园里掩藏得很好。

拉：车是如何掩藏的呢？

卡：车辆不多，就藏在棚子里，共有 16 辆车。我们在棚子四周栽种了些树木、杂草，以使人们看不到藏在里面的车辆。走过那里的人见到的只是一些鸡笼、鸡舍而已。

拉：武器藏在哪儿了？

卡：藏在住宅边上的一口井里，近旁有棵树封盖着井口。我们在那里面存放一部分武器。许多武器一直到快行动了才运到。有些武器是星期五刚在哈瓦那购得的，行动前数小时才运到。每个细节都预先考虑到了。

拉：为了 26 日星期天的攻打行动？

卡：星期天清晨 5:15 开始行动时要用的一大批武器，24 日星期五下午才弄到手。我们也在圣地亚哥通过正常交易在一家买卖自由的武器店里买到了一些武器，这些武器自然是藏在井里。而那些星期六才运到的武器就直接放在房间里和屋里其他地方了。

拉：主要都是些轻武器？

卡：我来跟您说。我们所拥有的一件比较好的武器是支比利时造的猎枪。我会使这样的枪，因为我父亲在比兰家里有一支这样的枪。我跟您说过这事的。有支 M-1 美式半自动轻步枪、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也是美国造的武器）、45 口径的汤姆森式冲锋枪，带有支架，也可用独杆支撑。M-1

小巧玲珑，人人喜爱，轻巧，小不点儿，效能高，半自动。而最适合攻打行动的武器是 12 口径的比利时式猎枪，每个弹盒装有 9 颗子弹，可在数秒钟内连发 5 盒子弹。我使用了一支。近距离作战时，比机关枪还灵，因为扣动扳机连发九弹，杀伤力极强，这种枪我们有数十支。都是完好无损的。

拉：也有几支枪筒受损的？

卡：在政治运动史上，就在我们古巴，好多次反抗行动中都使用过枪筒受损的猎枪。但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枪。有些枪弹盒里只有一颗子弹，那像是用做猎杀大型动物的，而我们的枪可不是这样的。

我们还有 22 口径的步枪，这种枪有时是很有用的。而有时要对付 150 米开外的，30.06 口径的长枪，这种枪就不行了。

拉：射程不够。

卡：目标如果太远，射程就不够了。猎枪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行。

拉：射程不够？

卡：近距离作战可使用 22 口径的步枪。而攻打兵营时，最理想的武器是猎枪。手提式 45 口径机关枪是种自动式武器，可我们只有一挺，也许是两挺。22 口径半自动步枪射程不短，可用金属弹丸。你总得要弄到那些最有效能的武器吧，你总得要对搞到手的武器感到满意才行吧。

拉：你们是如何弄到这些武器的？

卡：12 口径的半自动猎枪是我们从武器店里买来的。巴蒂斯塔政变后这里显得非常平静，政变者们感到平安无事了，武器店也可开张营业了。我负责经办武器的收购和资金的筹措工作，一件一件地买，差不多所有的武器都是我设法弄到的。我们得乔装成有钱人、运动员，我们得玩点儿障眼法，装着纯粹是在进行交易活动。我们甚至还在古巴圣地亚哥的一家武器店里买到了武器。我跟您说过这事的。

拉：您使的是什么枪？

卡：我跟您说过的：我使的是一支 12 口径的比利时造猎枪。这种枪可以装几盒子弹。那唯一的一支 M-1 归佩德里托·米雷特使用。我们还携有一两支汤姆森式冲锋枪、一支斯普林菲尔德步枪和两支温切斯特连发步枪——这种枪膛开在侧面，带盖，口径与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一样也是 30.06。两支温切斯特连发步枪是从比兰家里拿来的。我父母家里通常都有几支猎枪以及四五支其他种类的枪。我知道比兰家里有枪，武器严重短缺时，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能是哪儿有就到哪儿取了。劳尔跟佩德罗·拉戈（Pedro Lago）学会了拆卸温切斯特连发步枪。拉戈是庄园上的一名雇员，为人十分厚道。劳尔在我们家的立柜里找到那两支温切斯特连发步枪后，先到马卡内（Macane），再到奥尔金。他在奥尔金用快件给哈瓦那邮寄了内装一支枪的包裹。他携带另一支枪上了从圣地亚哥开往哈瓦那的公共汽车。他把枪放在头排座位的前面，自己坐到后排，一旦有检查，好当机立断，采取行动。

拉：您兄弟劳尔说，你们还有一挺 45 口径的手提勃朗宁机枪。

卡：那是一支汤姆森式冲锋枪。我想他是弄错了，只记得从哈瓦那大学弄到的那一支了。没有什么 45 口径的勃朗宁机枪。我记得，勃朗宁自动步枪带有支架，口径也是 30.06。巴蒂斯塔军队的士兵们用这种武器，我们一支也没有。

简要地说吧，我们有一支 M-1 美式半自动轻步枪、一支 45 口径汤姆森式冲锋枪、一支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两支温切斯特连发步枪。其他是 22 口径的半自动或连发步枪和 12 口径的猎枪。另外还有一些手枪，都是我们中有些人自己随身带的。我再跟您重复一遍，最厉害的武器是那支 12 口径的半自动猎枪，枪膛里可放四盒子弹，枪筒里还可以放一盒，每盒 9 颗子弹。你可以在数秒钟内连发 45 颗子弹，杀伤力极强，可以撂倒许多人。想想看，您要在兵营里与对方短兵相接，面对面交战，差不多是在进行肉搏，这种枪最有用。这是一种杀伤力极强的武器。

嗯，以我们的装备拿下蒙卡达兵营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即使参加行动的人数再少点也没有问题。我们已做了周密安排。要解决的是一个团的官兵和一个中队的乡警，大约 1500 人；将在黎明时分发起突袭，夺占指挥部门和宿舍。

22 口径的半自动步枪是中等距离射程的一种作战武器。要想弄到这种武器，我们就得攻克兵营，控制驻军，夺取那里的所有武器。军队有这种作战武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夺取作战武器。要不，我们干吗要去攻打兵营呢？我们如果拿下蒙卡达兵营，就会拥有数千件武器。除了士兵们的武器外，还有海军和警察的武器。海军和警察部队弱多了，一旦解决了那团人，他们就肯定难以反抗了。

拉：蒙卡达兵营的军人都有些什么样的武器？

卡：各种武器。他们拥有各类武器：连发五弹的斯普林菲尔德步枪、加伦德式（即 M-1）半自动步枪、汤姆森式手提冲锋枪、自动步枪、30.06 和 50 口径的三脚架机枪、迫击炮等。

拉：有多少战士参加了攻打行动？

卡：160 人。我们分派 40 人到巴亚莫，目的是夺取那里的兵营，防备敌人从中央公路进行反扑营救；120 人攻打蒙卡达兵营。我率领 90 人攻进兵营。

拉：所有人都配有武器？

卡：对，所有人都配有武器。

拉：身穿军服？

卡：全都身着巴蒂斯塔军队的服装，配军士衔。

拉：你们是如何弄到这些服装的呢？

卡：我们是在哈瓦那梅尔巴·埃尔南德斯家里缝制的。她还健在。她和叶耶（Yeye，即艾德·圣马利亚）都帮忙赶制。我跟你提到过，我们还有一个人，他是一名士兵，打入了哈瓦那军需部，购买了一多半的军服。我不谈他行动的详情了，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你想要找人完成某项任务，总是能找到的。此人帮了我们大忙，给我们弄来了军帽、护眼罩以及一大批现成的军服。

拉：你们混在兵营的士兵中怎么相互辨认呢？

卡：您知道我们是怎么相互辨认的吗？除了武器明显不同外，穿的鞋也不一样。我们穿的不是军靴，是矮帮鞋。我们戴的帽子是军帽；其他都像个军人样。你可以想见，缝制军服、军帽这些东西的任务有多繁重。梅尔巴·埃尔南德斯一家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叶耶当时很年轻。她们不是一家人，是朋友。叶耶来自古巴岛的中部地区拉斯比利亚斯省，在哈瓦那同她弟弟阿贝尔一道生活。阿贝尔是一家汽车销售店的会计，月薪至少 300 美元，可能是 300 多美元。蒙塔内也有一份类似的工作。

拉：那家小庄园有那么多房间让 120 人躺下休息吗？

卡：不，不，只是到那儿集中一下，没有时间躺下休息。

拉：那他们睡哪儿呢？

卡：他们一到，就住进预先租好的公寓里了。这些琐细的事务都是阿贝尔抓的。有好几处公寓呢，每组一处。恰逢狂欢节，来了许多外地人，他们的行动不显山不露水十分妥当。

他们是夜间到的，夜里 10—11 点到的小庄园。第二天清晨 5 点开始攻打行动，他们就不能在那儿停留了。他们在小庄园接受命令。

拉：您一到西沃内小庄园，您的同志们就知道要行动了。他们知道行

动的目标吗？

卡：他们都有思想准备。我跟您说过，我们曾多次通知他们投入行动，用 22 口径的步枪进行实弹演练，或从事其他活动。

拉：可他们知道要攻打蒙卡达兵营吗？

卡：不知道，他们到小庄园后才知道要干什么。他们受过训练，不用知道情况，随时待命行动。他们已多次受命行动从事不一样的活动了。

嗯，当时就出了问题。有那么一个大学生五人小组，他们都是些“吹牛大王”。我们之所以这么叫他们，是因为他们太爱自吹自擂，自以为谁也没有他们勇敢。可他们听说我们要去夺占蒙卡达兵营时，一下就傻眼后悔了。让他们参加行动完全是出于一种礼貌。而佩德里托·米雷特已训练了数百名学生，他们中有些人也知道我们在活动。这五位本不是哈瓦那大学主要组织的成员，而是一些散兵游勇式的人物，但十分狂热，一心想包打天下。为了避免同他们发生冲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们让他们参与了所有重大行动。

这回他们也就跟着一起来了。这就像是同这个小组的一种联盟，或者说是种小联盟。他们竭力反对巴蒂斯塔，并表示愿意参加行动。因此，这个小组的人——那些最勇敢者，唔，那些装成最勇敢者的家伙就被招来了，因为一般说来学生们都是很勇敢的。

拉：他们在小庄园得知要攻打兵营时，就不想干了？

卡：当他们看到那场面，看到一支支部队开到，因为那时我们的队伍一批一批赶到，战士们个个训练有素，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他们在黎明时分最终明白了我们的意图，看到我们在分发制服、武器等时，后悔了。这几个非常狂热、非常勇敢的年轻人决定不参加行动。

于是我就对他们说：“好吧，你们就先留下，我们出发后你们再走，走在队伍的后头，跟着我们，我们不会强迫你们去作战。”

拉：攻打计划怎样？

卡：我们小组的任务是夺占兵营的指挥中心，这个任务应该是不难完成的。我们指派的人员不管攻打什么地方，都要突袭，完完全全的突然袭击。我们挑选的日期7月26日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圣地亚哥的节日活动在7月25日，狂欢节日。

我有120人，我把他们分成三组。第一组率先行动，占领一家医院。这家医院与营房的后墙相连，但不是军医院，是普通百姓看病的地方。占领这家医院是十拿九稳的事。我指派我们组织的第二把手阿贝尔——一个绝顶聪明、干事利索、英勇无畏的优秀青年带队前往执行任务。两个女孩艾德和梅尔巴跟他一起行动，跟他一起去的还有一名大夫马里奥·穆尼奥斯，此人的任务是医治送去的伤员，我们的伤员。可以很好地利用那堵后墙控制兵营后部的营房。

第二组前往占领司法大楼，那是座多层楼房。由一位青年带队，我兄弟劳尔也在组里。我们把他也招来了，充当一名普通战士。

我率领第三组90人，任务是占领哨位、参谋部和营房。八九个人夺哨位、攻占参谋部，其他人占领营房。我的车一停，其他车就跟着一起停在营房前。这时士兵们正在酣睡，我们进去将他们弄醒，把他们赶到营房后面的空地上。那片空地正好处在占领了医院的阿贝尔等人和占领了司法大楼的同志们的控制下。士兵们只能穿条内裤，因为没有时间穿衣、拿武器了。这会令他们大惑不解，我们都穿着一身的军士服呢。这军士服只是我们的标记而已。

拉：从理论上讲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

卡：阿贝尔那里地处兵营背后，看来没有什么危险。占领司法大楼的一组人也不应该有什么问题。我心里有数——这是很自然的：我一旦被打死，阿贝尔得接替我，所以我把他放到了那个岗位上。劳尔入队不久，我把他放到执行相对比较危险、重要、但我觉得不那么困难的任务的那个组里了。让他这么个年龄的孩子参加那次大胆无畏的行动，我深感对我父母

有种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我有责任、也有实际需要来亲自承担我认为是最困难的任务，等由赫苏斯·蒙塔内——运动领导成员、拉米里托·巴尔德斯（Ramirito Valdés，即拉米洛·巴尔德斯——译注）、基塔尔特和阿特米萨小组的一些成员组成的战斗队打开营门、撤除阻挡车辆进门的栅栏后，我随即率队驱车突入兵营。我率领一批优秀战士执行这一任务。

拉：你们是几点钟从小庄园出发的？

卡：大概是4点45分吧。

拉：几点钟开始攻打行动的？

卡：准5点15分我们开始行动，因为这时士兵们还都在睡觉，得赶在他们起床前行动。要等天刚麻麻亮有点光线、而对方还都在睡觉时开始行动。

拉：那不是天亮了吗？

卡：圣地亚哥地处国家东部，天亮要比首都早20分钟左右。天亮了，正好借亮发起突袭。这一切都是估算安排好的。若非如此，哪能就这么行动哩！战斗人员原先都是分组训练的，从来没有一起协同行动过，执行起任务来是不那么容易的。必须摸清所有人的情况，必须做好周到的安排，必须给每个人——分派任务。

拉：攻打行动5点15分开始。结果如何？

卡：正像我跟您说过的，那次行动要占领三个目标，我有120人，不包括那几个后悔的大学生，还有16辆车。给那几位后悔的人留了一辆，路上又坏了一辆；这样我们就少了两辆。计划占据医院楼顶、控制蒙卡达兵营后部的组和计划占领司法大楼的组提前出发了。我们小组人员分乘10（或12）辆车向蒙卡达兵营大门进发，距离100米，我在第二辆车上，走的是西沃内到圣地亚哥的那条公路。天开始放亮，我们要在对方起床前

发起突袭行动，完完全全的突袭行动。7月里，太阳在东方升起得比较早。这样我们就在白天到了。我们必须通过一座窄窄的小桥进城，车辆一字排开，一辆一辆地过，这使我们延误了一点时间。

离兵营大门还有约100米；第一辆车沿加尔松（Garzón）大街前行，向右拐驶入通向兵营大门的岔道儿；我的车跟着右拐，其他车辆也跟着拐过来了。

拉米里托·巴尔德斯小组的人、赫苏斯·蒙塔内、雷纳托·基塔尔特及其他人乘坐第一辆车，走在前头。蒙塔内自告奋勇承担夺取大门入口的任务。我这时离大门80米，单等他们解决兵营入口的岗哨、撤除阻挡车辆进入兵营的栅栏。他们一得手，我们就驱车全速突进。

第一辆车开近目标时停了下来，战士们迅速下车控制哨兵，下了他们的武器。就在这时，我看到我的车前方约20米处左侧人行道上出现了两个巡逻的士兵，身挎汤姆森式冲锋枪。他们觉察到离他们大约60米处的大门口哨位上有情况，准备向已解决了岗哨的拉米里托小组人员、蒙塔内等人开枪。也许这只是我的一种感觉。

我脑子里瞬间闪过两个念头：解决那两个威胁同志们生命的家伙，夺取他们的武器。我在看到那两个士兵背朝我用枪瞄准大门入口时，随即缓速驱车接近他们要将他们抓获。这时我左手紧握猎枪，右手持手枪；我已到他们身边，车门已半开；我想毕双功于一役：既避免他们朝拉米里托小组的人和蒙塔内射击，又夺取他们手中的那两支汤姆森式冲锋枪。

也还有另一种行动方式，我在有了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后完全明白了这一点：我当时应该做的是甬管他们，全速突进。那两个士兵如果看到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在他们面前全速突进，是不会开枪的。我的确应该先吓唬他们，让后面的人逮他们。我在离他们还有两米时，他们听到身后有响动，转过头看到了我的车，本能地举枪对着我们。我让还在前移的车冲向他们。这时车门已半开，我就跳下了车。

跟我一起的人也迅速下了车。跟在后面的车上的人也下了车。他们以为已进入兵营。他们的任务是攻克宿舍，把那些士兵赶到后面的空地上，

让他们光着脚、只穿内裤、解除武器、半睡半醒迷迷糊糊地当上俘虏。

拉：那怎么会没有干成呢？

卡：这两个武装巡逻兵好像是专为狂欢节指派、在兵营大门口与加尔松大街之间来回巡游的，他们的出现纯属意外，而由于他们在向兵营大门口哨位接近，这就引起了我们极大的混乱。为了解决那两个巡逻兵、夺取他们的武装，我们手持武器跳下车，驱车向他们冲去。跟我同乘一辆车的人中有个人从前排座位右侧下车时放了一枪，这是那次独特的战斗中听到的第一声枪响。接着许多人举枪射击了起来。枪声四起，乒乒乓乓响个不停。警报器跟着鸣响起来，与枪声混成一片，尖声刺耳，令人心惊。跟在我后面的人像预先通告过的那样纷纷跳下车，冲进一座长长的大楼，这座楼同兵营里的其他军用建筑形式一样。这座大楼只不过是家军医院，他们误以为是要占领的目标，遂纷纷攻了进去。

拉：那座大楼不是你们的目标？

卡：问题就在于，战斗应该在兵营里打响，可在外面打了起来。慌乱中，一些人占领了不是想要占领的建筑物。就在我们下车的当口儿，那两个巡逻兵消失不见了。我立即冲进军医院，叫住那些误入其中的战士们。还好，他们才刚到大楼的底层。我立即叫住了他们，重新组织了一支有六七辆车的车队，因为不管怎么说设在兵营大门口哨位已经拿下了。

拉米洛（Ramiro）——即上面提及的拉米里托（为拉米洛的昵称——译注）——小组的人和蒙塔内已拿下哨位，并随即突入兵营内第一座营房，直奔存放武器处。他们进入的营房是军乐队住处，队员们还在睡大觉哩，武器好像都集中到军需官那里了。其他营房的情况也是这样，因此士兵们遭到突袭时难以反抗。

阿贝尔带领的一组人已占领想要占领的大楼。劳尔所在的小组也拿下了司法大楼。

拉：可这时却枪声大作了。

卡：嗯，刚开始时那些士兵们还在穿衣、套鞋、相互催促、准备战斗，急寻武器，只有那些哨兵在放枪发警报。乡警们也睡在一座营房里，士兵们睡在其他营房里。他们睡觉时枪都不放在身边，开始时也没有人指挥。一些军官睡在自己家里。没有一个蒙卡达兵营的军官、军士或士兵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战斗在兵营外打响，突袭先机丧失殆尽。

我刚才跟您说了，我冲进军医院大楼，将误入大楼的人员带出，同少数几个人再次登上几辆汽车，准备直扑参谋部。就在这时，我们后面的一辆车突然驶出，飞一般从我们旁边驰过，直奔兵营大门，临近大门时又以同样速度后退，正好与我的车相撞。诚如我跟您所说，我们的一辆车在枪声一阵紧似一阵的情况下，自行向前直冲，又迅速倒退，重重地撞在我的车上。我于是不得不再次下车。就是在那样始料未及的逆境中，我们余下的人依然坚持战斗，顽强不屈。人人英勇善战，但还是难以逆转形势。战斗在持续，我们的队伍被打散了。

我们同拿下兵营大门口哨位的那车人失去了联系，同阿贝尔和劳尔那两拨人也没了联系，只能凭枪声判断情况了。我们这边的枪声越来越稀，而敌人那边却惊魂已定，并各就各位，抗击来犯者。希尔多·弗莱塔斯——我跟您说起过他——同志当时十分镇静地站在我们同那两个巡逻兵遭遇的地方附近的一个屋角旁，观察着那始料未及的形势发展状况。我跟他交谈了数秒钟。那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事态突变时，我就完全意识到难以完成预定的任务了。在士兵们还都在熟睡时，你可以用少数人马拿下兵营；可兵营里一千多名士兵起床后全副武装起来的话，这座兵营就难以占领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枪声仍回荡在耳畔，而那警报器发出的震耳欲聋、令人心酸的凄厉声则像是在宣告我们计划的终结。

拉：这就是说，任务完成不了了。

卡：根据周密策划的方案，完全能够拿下兵营。假如要再次制定和那

次一样的战斗方案，我会完全照此策划。只是根据亲身经历，我们绝不会再理会那两个巡逻兵了。那次行动完全是瞬间闪过脑际的决定。保护处在危险中的同志们是我的首要动机。

拉：您是什么时候决定下令撤退的？

卡：枪声一阵紧似一阵。我讲得太细了吧，不过我讲起这一切来是毫无保留、绝对客观的。当时大约过了30分钟（也许在更短的时间里）我就意识到实际上任务不可能完成了。我比谁都清楚预计到的整个细节和条件。我曾周密思考、详尽制定了行动计划。

是时候了，我该下命令撤退了。我当时的处境怎么样呢？我在街当中，离大门口的哨位不远。我手持那支12口径的猎枪，而在兵营的一所主要营房上架着一挺50口径的重机枪，可以横扫大街，因为那挺机枪正好瞄准这个方向。当时有个人正向那挺机枪处运动，好像就一个人。他像猴那样蹦跳着向前运动，要拿那挺机枪进行射击。而其他人上车撤退时，我对付那个家伙。只要他伸手想拿机枪，我就向他射击压住他。唔，您可以想见，我当时也完全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

我们的人都已上车撤退了，我随即跳上最后一辆车。可我刚落座，车上最后一排座位右侧出现了一个我们的人。他赶到时车已满，呆呆地站在那里。我立即下车，把座位让给了他，下令开车撤退。

我留了下来，一个人站在大街上，一个人，就我一个人。就在这时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事。我当时正站在兵营大门口的正前方，已是完全将生死置之度外了。这时我们的一辆车救了我。一辆车冲我驰来，开到我站的地方，车上人一把将我拉上了车，我还浑然未知。原来是阿特米萨小组的一个年轻人开的车，车上还有其他几位同志。他们的车开到我在的地方把我救了出来。后来我未能——没有来得及向那个年轻人询问详细的情况。我一直想要同他谈谈，问一下他怎么会不管不顾钻进那子弹横飞的险境的。然而就像对其他许许多多的事情一样，您觉得总有一天是要去做的。可不幸的是，那个人十多年前去世了。

拉：他是你们一起的吗？

卡：对，他是我们中的一员，叫桑塔纳。好像是他注意到我落在后面了，于是回过来找我。他已经撤出去了。好像是一时注意到我不在，立即调转头回来找我。应该就这件事写点东西，找找当时亲历此事的人了解一下。

我当时孤身一人，也只有那支 12 口径的猎枪。我不知何去何从，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唔，也许我应该转身冲进街旁的小巷撤退。

拉：您打枪了吗？

卡：打了，朝那个想从兵营里一屋顶上用 50 口径机枪向我们扫射的人打了好几枪呢，一直压着他，使他捞不着任何机会向我们开火。

拉：您阻止了他开火？

卡：对。他向前运动，想使那挺机枪，我朝他开火，他跳了下去。一会儿他又上房想拿那机枪，我又朝他射了一梭子弹。他上了几次，都被我压下去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是改变了主意，停止了行动。就在我专心对付那个想使重机枪的人的同时，我们的汽车载着同我一道计划突入兵营将其占领的人员开始了撤退。

在那种情况下，人们几乎都是各自为战的。后来回头找我的那个桑塔纳肯定也是自行决定那样干的。没有人会下那种行动命令。他开车突进来，找到我，一把将我拉上了车。车上人已满了。我对他说：“我们到埃尔卡内伊（El Caney）去。”当时有数辆车正等在街上，我向各车下了行动命令。可走在最那头的那辆车不知道埃尔卡内伊在什么地方，没有沿着加尔松大街一直开下去，经过维斯埃阿莱格雷（Vista Alegre），而是朝右拐奔向了西沃内。当时有三四辆车，把我找回来的那辆排在那小小车队的第二或第三位。

我很熟悉埃尔卡内伊，1898 年第二次独立战争行将结束时曾在那儿发生过一次重要战斗。那儿有座相对较小的兵营。我想出其不意拿下那座兵

营，以此支援攻打巴亚莫兵营的同志们。我不知道巴亚莫的战况。我断定他们已占领那里的兵营。我当时主要关注的就是那里的情况。我们的人员受到了沉重打击，很难再组织他们投入战斗了。

拉：其他小组的情况怎样？

卡：在我率领的小组撤退时，现场一个人也没有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佩德罗·米雷特等人当时正隐蔽在一个地方。我们不知道，也没法跟他们取得联系。

拿下司法大楼的那组人注意到了所发生的一切。那个小组的头头带领人马下楼，劳尔也在其中。当时门口有个军士带着几个兵在那儿站着，喝令他们缴械投降。那个小组的头头放下了武器。劳尔当时是普通一兵，同其他人一道也放下了武器。而就在这时，劳尔救了大家，也救了他自己。他眼疾手快顷刻间采取了行动：他看到那个军士拿着手枪的手在发抖，一把夺下他的手枪，俘虏了那几个兵。而后他同其他人一道撤了出来。他们当了俘虏，转瞬间又反过来逮住了俘虏他们的那几个人。否则的话，他们就要同其他人一样遭受拷打、被处死了。他们撤退出来后，盘算着往哪儿逃，脱下军服，相互鼓舞，而后就散开各奔东西了。

拉：你们预先估计到会发生这一切吗？

卡：没有，我们没有预先估计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拉：你们没有预先考虑到会有撤退的可能？

卡：没有，真见鬼，我们怎么会预先考虑这种事哪。怎么会在这样的一次行动前就考虑到要撤退的事呢？

拉：可是，你们没有预先考虑到如果受挫就决定撤退这一点吗？

卡：没有，没有。在这样一次像我跟您说过的那样经过周密策划的行动里，你如果突入兵营后未能控制住里面的人马，怎么个撤退法？他们在

兵营各个能够出进的卡口都设有岗哨，你从哪里撤退？

在同那两个巡逻兵不期而遇发生交火前，突袭行动一帆风顺，已是胜利在望。我们非常遗憾的是未能预料到会发生那样的事。我一点儿都不怀疑：兵营里的官兵将悉数被俘，我跟您说，只消几分钟即可解决问题。敌军方面必定是惶惶然不知所措，而我们穿的军装更使他们茫然失措。

拉：而阿贝尔他们见到这一切时想到要撤走了吗？

卡：没有，他们在坚守阵地，因为医院里的人在设法保护他们。

医院里的人支持他们，帮他们化了装，在千方百计保护他们。他们当时断定行动已经失败，极可能认为我们全都牺牲了。而我对他们是非常地放心，因为阿贝尔完全了解我们的行动计划。在那辆车来救我的一刹那，我想到的是如何援助攻打巴亚莫兵营的那支人马。

您该去同梅尔瓦谈谈，她至今还记得那些事。那些事都有人写出来了，我就不必多说了吧。那位较早接触那些事的历史学家叫什么来着？他叙述得很详细，因为他走访了所有相关人员。那位法国史学家叫什么来着？

拉：罗贝尔·默尔（Robert Merle）。他写了一本好书^①。可我想要听听您的叙述，您的亲口叙述。

卡：好吧。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向默尔讲述我现在对您所说的这一切。

拉：你们遭受的伤亡有多大？

卡：战斗中牺牲5个人，另有56人惨遭杀害。战斗中牺牲的5个人是希尔多·弗莱塔斯、弗洛雷斯·贝坦科尔特（Flores Betancourt）、卡梅洛·诺亚（Carmelo Noa）、雷纳托·基塔尔特（Renato Guitart）和佩德罗·马

^① 对攻打蒙卡达兵营所做的详尽描述——被认为是最精确的描述之一，请阅读罗贝尔·默尔：《蒙卡达：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第一次战斗》，巴黎罗贝尔·拉丰出版社，1965年。古巴史学家马里奥·门西亚和何塞·M. 莱伊瓦也著书详尽地描述了1953年7月26日所发生的一切。特别要参见马里奥·门西亚的书：《蒙卡达呼声》，哈瓦那政治出版社1993年版。

雷罗（Pedro Marrero）。他们差不多都是乘坐第一辆车突进兵营的几个人。他们已拿下了大门口的哨位，隐蔽在离大门口最近的那所房子里。同他们一道突进兵营的其他人幸存了下来。唔，希尔多不是那个组的人，是我们在外面试图重新组织车队突入兵营这一拨的。

拉：这种局面使您十分沮丧。

卡：当时我面对着所发生的情况，非常伤心。然而壮心不已，得坚持斗争。我当时以为奔赴巴亚莫的那队人马已经占领了兵营^①，就说：“巴亚莫那边得孤军作战了。”我跟您说过，于是我就想直奔埃尔卡内伊兵营将其占领，以支援巴亚莫的同志们，进而至少可以在古巴圣地亚哥地区打开战斗局面。嗯，我是想沿一条与直通埃尔卡内伊的公路相连的大街进军，我们当时有约20个人。可，我跟您说过，可走在最前面的那辆车搞错了，向右拐奔西沃内方向开了。当时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未能及时叫住那辆车，攻打埃尔卡内伊兵营的计划也就泡汤了。我当时没有开车，我在营救我的那辆车上。

拉：你们仍穿着军服？

卡：对，仍穿着军服。

拉：仍带着武器？

卡：带着武器，所有的武器，直至最后时刻、行动失败数日后才放下武器。

拉：您返回小庄园啦？

卡：对，我们又回到了西沃内小庄园，准备进行攻打失利后的重组工作。一些车辆已先行到达。我见到了各种情况：有人表示要继续战斗，

^① 劳尔·马丁内斯·阿拉腊斯率领25个人攻打巴亚莫的“卡洛斯·曼努埃尔·塞斯佩德”兵营，但行动亦告失败。后来10名战士被俘，惨遭杀害。

有人在脱军装。有人仍手握武器，有人挂了花，有人已站不起来，一副凄惨景象。

我到那儿后随即说服、集合了一批人，19个人跟我一道上了山。我已难以出手援助巴亚莫那边的同志们了。我没有放弃，没有投降，根本就没有诸如此类的想法；这倒不是因为怕被敌人杀害，而是因为我们的脑子里根本就不存在“投降”这两个字。



我
的
一
生

第六章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被捕—萨里亚 (Sarría) 中尉—“思想杀不了”—审讯—辩护词—坐牢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第六卷

拉：您离开西沃内小庄园上了山。

卡：当时我决定继续进行战斗。我集合了差不多 20 人。而我们此前弄到的武器虽然适合于攻打、占领军营时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可要进行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就不那么适用了。我决定上山继续进行战斗。我对同志们说：走，上山。

我们原想翻过山梁下到埃尔雷亚伦戈 18 (el Realengo 18) ——历史上农民起义战斗过的地方，在那个地区继续进行在蒙卡达打响的战斗。我们当时所在的地方海拔为零，要爬上海拔 1000 多米——那个地区的平均高度——的山顶。而那些士兵是乘车沿公路上的山，他们自然是抢先占领了制高点。

我们 19 个人里有几个受了伤，其他人也大都已筋疲力尽，很难日夜兼程、尽快离开那段四处是士兵的地界了，又没有向导、不熟悉地形、没水喝、没东西吃、连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也没有。巴蒂斯塔的人不择手段、灭绝人性地严刑拷打被他们抓到的人，而后将他们差不多通通杀害。数十人惨遭毒手。令人发指的暴行引起了整个奥连特省以及全国民众的义愤，古巴圣地亚哥大主教佩雷斯·塞朗特斯 (Perez Serantes) 阁下开始同其他一些名流贤达一道行动起来，努力营救攻打蒙卡达军营的幸存者。

我们试图从这里突出重围，沿途数次看到士兵在活动。他们的步枪和 30.06 口径自动步枪射程比我们的 22 口径步枪和 12 口径猎枪远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换了一支射程较远、较精确的 22 口径步枪。

山路崎岖多石。我们这一小队人马又有几个遭流弹受伤。没有医生治疗。我决定委派一位有威望的同志带领伤病员撤到圣地亚哥市去，请求市民们帮忙对他们进行医治。那次我撤走了 12 个人。

在民众的压力下，敌人的暴虐、滥杀行径有所收敛。巴蒂斯塔及其政

府有点害怕了。我们就剩下8个人了，其中五位是我们组织中负有一定责任的骨干分子，一直跟随着我们。虽说他们中有几位身体极度虚弱，但我们也得保留住他们。这8人中的其他三位是负有更大责任的领导人：我们组织的领导小组组长奥斯卡·阿尔卡尔德（Oscar Alcalde）^①、阿特米萨战斗队队长何塞·苏亚雷斯（José Suárez）^②和我。

尽管困难重重，我从未放弃过坚持战斗的念头。由于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没有把握能否翻越山梁，我遂决定改变行动方向。我们沿海滨地区潜行至古巴圣地亚哥湾。我打算到一个叫拉奇维拉（La Chivera）的地方上一艘小艇渡过海湾到对岸，上附近的马埃斯特腊山。

在那几个人——那几个所负责任比我刚提及的三个领导人要小的人——身体状况极其糟糕的情况下，要完成这样的军事行动是不可能的。所幸的是我们三个领导人还行，要渡过海湾没有问题。我们详细地分析了各种情况。阿尔卡尔德、苏亚雷斯和我继续行动。其他五人在求得天主教会和其他组织担保被俘人员人身安全不受侵害的条件下自首。由于已有一些幸存者被囚，这五位同志将同他们会合，将消息和指示传给他们。主意拿定后，我们决定等天黑前往一农户家。这位农民颇有名望，拥有一片庄园，毗邻从圣地亚哥到西沃内的公路。我们要请他出面同大主教联系、协商。

我们在夜色掩护下，陪护那五位同志步行数公里抵达农户家。即将撤出去的同志将武器掩藏在了途中。我们其余三人仍携带武器行动。

我们同那位农民谈妥细节详情后，立即往回赶。我们打算乘黑夜时刻进入离公路不太远的树木繁茂地带。我们肯定能够及早越过公路，

① 奥斯卡·阿尔卡尔德·巴尔斯（Oscar Alcalde Valls，1923—1993），攻打蒙卡达兵营行动小组成员，行动失败后同菲德尔·卡斯特罗一道上了大石山（La Gran Piedra）。被俘后受审，被判处13年徒刑。1955年大赦攻打蒙卡达兵营者获释后流亡国外。革命胜利后历任要职。1993年1月5日在哈瓦那去世。

② 何塞（佩佩）·苏亚雷斯·布兰科（José [Pepe] Suárez Blanco，1927—1991），攻打蒙卡达兵营3号哨位的小组成员。失败后同菲德尔·卡斯特罗一道上了大石山。被俘后受审、被判刑。1955年大赦攻打蒙卡达兵营者获释后流亡国外。1991年6月15日在哈瓦那去世。

穿过海岸边那横生的杂草和交错的林木，在敌人发现新动向前尽快赶到海湾。

在那种情形下，我中学时代养成的登山爱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离我们要去的对岸西北方向数公里处，有一名叫埃尔科夫雷（El Cobre）的村落。村子周围林木参天、浓荫密布、山峦环抱，特别是西南方向的那座山，我在多洛雷斯学院上学时曾经爬过。这时我们打算前往海湾过到对岸，登上山岳中心地带。

当时有谁会想到十三年半后要从阿莱格里亚德皮奥（Alegria de Pio）出发向东前往这同一处山岳地带呢？

然而，那次横渡海湾只是黄粱一梦。我们愚蠢地犯了一个大错。我们沿下山的路往回走，由于连日来一直露天宿营在树林里，所以就想找个地方先睡一觉，同时等下一个黑天。于是我们回头又向山上攀行二三公里后，发现了一间小茅屋——农民存放棕榈树干等什物的地方。我们由于连日来饱受饥寒、出生入死，加之下一个黑天到圣地亚哥湾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所以就决定在那间小屋睡上一觉。小屋就在我们埋藏留在那农民家的同志们的武器的地方附近。我们没有警觉到附近有敌人。我们倒头便睡，没有寒冷、雾气、露水的侵袭，我们睡得很熟，很熟。

我记得，在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时——我们已经睡了四五个小时，就听到一阵类似马蹄的嘚嘚声，接着有人嘭嘭嘭重重地叩打屋门，又用枪托将门砸开。我们完全清醒过来。就这样我们极不光彩地突然落入敌手，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就那么几秒钟的事。

拉：你们没有武器啦？

卡：我们三个人都有武器。我的枪是支22口径的长筒步枪。后来，1956年我们从“格拉玛”号游艇登陆后，碰到的情况大致相同，但这时我采用了不同的措施：将枪放在下巴下睡觉。那会儿有五六架歼击机对我们进行疯狂的空袭，每架飞机都装备有八挺50口径机枪，一齐直冲我们扫射，历时数分钟，这使我们躲进甘蔗垛。飞机飞走后不一会儿我们就睡着了，

实在是太困倦了。这次我们遭到沉重打击后也只剩下了三个人。但这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我这会儿要对您说的是，我们被捕了。这是怎么回事儿？据说：那位农民——我们将五位同志托付给他照顾的那位农民——同大主教通了电话。我还真不知道他给谁打了电话。嗯，人们可以做出多种推测：大主教做了举报，或者是发生了其他什么情况；也许是同大主教的通话被截听了；或者是敌军头目可能也知道我们曾来回走过的那条山道。

一大清早，敌军数支小分队就上山分头搜索了。有支小分队正好搜索到我们睡觉的地方，逮住了我们。

那十来个兵恶狠狠地直嚷嚷，脖子上的青筋直暴，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他们恨不能立即一枪结果了我们。我们跟他们吵了起来。他们将我们五花大绑。我们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坐到地上。我们当时十分狼狈，他们浑然不顾。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我随便报了一个。我当时记起了那则嘲弄一个人的笑话，随口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弗朗西斯科·贡萨莱斯·卡尔德林。”我当时如果说出我的真名实姓，他们就会本能地采取行动，谁也拦不住。

我们同他们争吵，我刚才说了，差不多从一开始我们就同他们不断地吵来吵去。他们朝我们嚷道：“我们是争取独立起义军的接班人”，诸如此类的话还说了不少。不知道是什么人灌输给这帮暴徒、杀人凶手的，他们还真信了。我们回答道：“争取独立起义军的接班人是我们。”

拉：是您对他们说的？

卡：对。我对他们说：“争取独立起义军的接班人是我们。你们是西班牙军队的接班人。”那些个兵火了，带领他们的中尉说道：“别开枪”，竭力阻止他们行凶。中尉是个黑人，高高的个子，三四十岁的样子，名叫佩德罗·萨里亚。他当时好像还在自修法律。他竭力阻止那些兵行凶。那些家伙养得肥肥胖胖，身强体壮，走在草丛中一踩一大片。他们当时个个举枪对着我们，要像通常对待俘虏那样结果我们，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

杀的人中有我。中尉说话的声音很低，几乎听不见。他在说：“别开枪，别开枪。思想杀不了，思想杀不了。”就这样僵持了数分钟，没想到又发生了一件倒霉的事。

那几个凶神恶煞似的士兵开始在四周搜索，发现了我刚才提到的那五位同志的武器。这还了得！他们发现那五件武器后又来火儿了，一时出现了极其难以应付、极其危险的局面。他们跑过来跑过去，到处乱翻；中尉这时也很难控制住他手下的人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在不停地说道：“冷静点！冷静点！”他没有大声喊叫，因为当时大声喊叫是于事无补的。他只是平静地说：“冷静点，小伙子们，冷静点。”大兵们狂躁无比，决意要结果我们。他命令他们不许开枪。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最终使他们恢复了理智，平静了下来。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但肯定是说了：“别开枪，思想杀不了。”

拉：佳句。

卡：“思想杀不了。”中尉低声说道，几乎是在自言自语。我听到了，我想那些士兵也听到了。就这样，我们活了下来。他们拉起我们，向公路走去。

拉：中尉不知道您是菲德尔·卡斯特罗。

卡：他一直不知道，但我随后告诉了他。他们把我们提溜了起来，而后我们出门上路。突然从我们要去的那个方位传来了几声枪响，可能是敌军同那位农民接触后逮捕了交由大主教庇护的那五个人。我当时认为，这是要向我们开枪而耍的一个花招儿。

我还记得那些士兵狂怒的神情。枪声持续了几分钟，我也说不清，可能是8分钟，也许是10分钟。那些士兵听到枪声狂躁不安，走来走去，踏平草丛，随即卧倒。他们冲我嚷嚷：“卧倒！”我说：“我不卧，我不卧倒。你们如果要杀我，我要站着让你们杀。”我没有听从那种强制性的命令，站着一动不动。萨里亚中尉走到我身边，低声说道：“你们非常

勇敢，小伙子们，你们非常勇敢。”

我考虑了一下那个人的表现后，便对他说：“中尉，我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他马上就对我说：“你别跟其他人说，别说。”这时他才知道我是谁。想知道他接下来的表现吗？我们走到那位农民的家，离公路很近，那儿停着一辆卡车，他们让我登上车，其他士兵和被捕人员也在车上。中尉让司机就位，把我安排在中间，他自己坐在右边。这时佩雷斯·乔蒙（Pérez Chaumont）^①少校乘车开了过来，要中尉把我交给他。这家伙是个杀人狂，负责指挥屠杀被捕人员。

拉：这位佩雷斯·乔蒙是他的上司，他只是名中尉。

卡：佩雷斯·乔蒙是少校，但中尉回绝了他，说道：“是我逮住的。”中尉对少校说，不行，不能将我交给他，他应该负起责任，把我带到埃尔比巴克（El Vivac）。少校说服不了中尉。中尉让车直接开往埃尔比巴克。我如果被送到蒙卡达兵营的话，他们不把我剁成肉酱才怪呢。您想想看，我要是到了那儿还会有什么别的结果吗！巴蒂斯塔已在四处造谣，说我们屠杀了所有住院的生病士兵。这种诽谤不知要了我们多少同志的命。

萨里亚决定不走加尔松大街，离蒙卡达兵营太近，而是绕道把我送到了埃尔比巴克——由警察看守的地方。埃尔比巴克是座关押平民的监狱，设在市中心。犯人由法院审处。我们八个人谁也不能被带到蒙卡达兵营。他们会把我们通通杀掉。兵营里满是嗜血成性的家伙。乔蒙是蒙卡达兵营里最最凶狠的杀手之一。

一切均在预料之中。他们甚至在报纸上登出了我已死亡的消息。

拉：从“格拉玛”号游艇登陆后不是这样吧？

卡：不是这样。而这一次，7月29日报上就登出了这样的消息。当时

^① 指的是安德雷斯·佩雷斯·乔蒙（Andres Perez Chaumont）。他是驻扎在蒙卡达兵营里的乡警第一团行动总指挥，杀害许多攻打蒙卡达兵营者的直接负责人。

我还在山上哩。他们还没有逮着我。《阿塔哈》日报最先登出了这一消息，其他报纸也跟着发了这一消息。那几天我死了好多次。

拉：我看萨里亚中尉不会有好日子过了。

卡：他们是不会原谅他的。当时有个叫查维亚诺（Chaviano）的中校，此人是驻扎在蒙卡达兵营那个团的团长，原来是个上尉，3月10日巴蒂斯塔提升他为中校，他亲自到埃尔比巴克对我进行了审问。当时他们给我照了一张像片，我站着，背后墙上有幅马蒂像。他们还在那间审讯室里照了其他一些像片。我承担了全部责任，对他们说：“我对这一切负全责。”

他们确信，攻打行动是3月10日被巴蒂斯塔赶下台的前总统卡洛斯·普里奥·索卡拉斯（Carlos Prío Socarras）提供的资助。我对他们说，我们跟普里奥没有关系，跟谁也没有关系，说跟这个有关系、跟那个有关系，通通是胡扯。我向他们做了说明。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承担了全部责任：武器是我们从武器店里买来的，谁也没有向我们提供过什么武器。别人都没有责任。他们放进了几名记者，其中有个某知名报社的人，我得以同他聊了一会儿。隔天，他们没收了报纸，因为忘乎所以地让报纸登出如“逮住了……”这样的消息。这真实的消息一经公布，立即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就使他们再也难以对我下手灭口了。

询问前，我是同一批幸存的同志待在一起的。打那以后，他们把我隔离开，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

拉：您后来结识这位萨里亚中尉了吗？

卡：当然，当然。战争在继续，他一直在军中服役。然而反动政权对他极其反感——我们在马埃斯特腊山上打游击时，他们甚至把他投入了大牢，因为他逮捕了我，又不让杀害我。不管怎么说，是他带领的搜索小分队干的好事。我完全可以相信，他们恨死他了。

1959年战争结束后，我们提升了他，任命他为胜利后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卫队副卫队长。可惜的是他未能活多久。他得了癌症，眼睛瞎了。不久，这位立下奇功的人就去世了。人们对我讲了这些事，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拉：那是因为他救了您的命。

卡：起码是三次！

拉：没有说出您是谁，没有把您交给他的上司。

卡：我在看到此人如此深明大义、情操又如此高尚时，就上前一步对他说：“我是某某。”他立马对我说：“别说了，别再说了。”像他是如何拒绝把我交给佩雷斯·乔蒙少校的这样一些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注意到了他让我坐在司机旁边、我在中间、他在右边的举动。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他是个好学的人，是个正派的人，是个勇敢的人。这就是从一开始他不让人枪杀我的缘由。

他拒绝把我送到蒙卡达兵营而将我带至埃尔比巴克^①时，就第三次救了我的命。

我被囚禁在博尼亚托（Boniato）省监狱。1953年9月21日星期一开始对我审讯时，我自任律师进行自我辩护。作为律师，我开始讯问所有的证人和凶手。那是一件令人震惊的大事。他们忍不住了，把我带出了审讯现场，因为他们难以阻止我对其罪行所进行的揭露。后来他们对我进行了单独审判，就在那家市民医院内的一间小房子里，同时受审的还有位伤员。

^① 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人生经历中这事件的详情，请读拉萨罗·巴雷多·梅迪纳：《我的俘虏菲德尔：佩德罗·萨里亚中尉回忆录》，哈瓦那巴勃罗德德拉托连特出版社2001年版。

拉：您进行了自我辩护？

卡：没错。我尽情地做了揭露。

拉：您用您的那句名言“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结束了辩护。

卡：我当时感到他们随时都会干出点胡作非为的事来。我被关押在博尼亚托监狱时，他们禁止我与同时被审讯的或走过囚禁我的牢房门前的同志们说话，我就宣布绝食。我胜利了。后来他们又把我隔离开了，我在单人牢房里待了75天，谁也不能跟我说话。我寻求一切可资利用的机会和手段跟同志们保持联系。

有段时间他们甚至一连换了几茬监管我的看守，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我的朋友。他们找了几个特别狠毒的家伙来当看守，可其中也有个人也成了我的朋友。三年后1958年底的马福（Maffo）战役中，他被我们的部队包围了，当时他在陆军中服役，他所在的那个营凭借十分坚固的防御工事据守顽抗。他在博尼亚托监狱看守我时成了我的朋友。他原本是个农民，当兵后十分凶狠，所以被抽调出来与其他一些同样凶狠的士兵一道监管我们。

绝食的那几天，他们给我送饭来时，我就对他们吼叫：“我不吃。跟查维亚诺说，拿去喂牲口吧。”查维亚诺当时是驻扎在蒙卡达兵营的那个团的头儿。唔，我用词不太妥当，这里就不想重复了。这似乎是疯了，但那种仇恨的心理状态是可以理解的。人们只要了解到或回忆起那帮家伙干的那些事、他们对我们的同志所施加的骇人听闻的酷刑、他们对我们的同志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就完全可以理解那种仇恨的心理状态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沉默是不行的。我向他们宣布绝食。真正的目的是要他们听到我的声音。这下他们才让我同艾德、梅尔巴等人谈话。我从他们那里知道了许多事实，得到了许多资料，了解到所发生的一切情况。这对我在受审时进行辩护很有帮助。当然了，此前传递过纸条，有时把纸条揉成团扔出去，因为总有士兵看守在门口。尽管有人监视着，我们还是

千方百计地进行联系。由于他们最终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就开始进食了。那些恶贯满盈的看守们只给了大约 24 小时的谈话时间，时间一到就又把隔离开来。然而我赢得了一场战斗。我没有再次绝食。说不定他们这会儿又要耍什么花招哩。

在我抗争的那几天，有个看守头目跟我说了几句话。您知道他跟我说了一些什么吗？他说：“您是个懂道理的人，您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不要这样说话。”我一天三次向他们发出的吼叫声着实使他们不好受了。整个监狱里的人——所有的看守士兵、所有的囚犯、所有在监狱里干活的平民百姓、所有的人都听到了那吼叫声。他们泄气了。

尽管他们不允许，但我还是弄到了一些书籍。我是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能清楚地记得所学到的相关知识，有些话还能背得出来。我也设法弄到了一些马蒂的著作。

拉：如果蒙卡达兵营被占领的话，您打算接下来干些什么事呢？

卡：如果蒙卡达兵营被占领的话，那 3000 件武器就是我们的了。别忘了，我们都是士官。一纸“士官起义”的公告将会在敌人内部引起混乱。被我们俘虏的一些军人将以他们的真实姓名和军衔向全省各中队的头头们通告，说发生了“士官反叛”事件。我跟您说过，古巴共和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唯一的一次了不起的军士反叛运动。我们将花上三四个小时散布假情报。

然后我们就立即亮出占领蒙卡达兵营者的真实身份。就是说，通告我们都是些什么人。与此同时，将武器分散藏到市内其他地方，以防敌人飞机可能对兵营进行轰炸时受损。他们是不会顾忌到兵营里有没有士兵的。

我们计划立即将武器从蒙卡达兵营运走，送到市内一些地方的房子里，因为当时唯一可能随即进行反击的是空袭。我们不担心铁路那边，铁路容易切断。我们担心的是中央公路，奥尔金的一团人马和那个地区其他地方的驻军可能经由中央公路进行反扑。所以我们要攻打巴亚莫。至关重要的

是截断中央公路，这就必须破坏考托河上的那座桥梁。人民必将应声而起。铁板钉钉，毫无疑问，因为起来反对巴蒂斯塔的人会立即得到我们的人民的支持。

我们起初会以“士官”身份亮相，在我们进入蒙卡达兵营后的那一刻，谁也不会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我们将向全省各中队发送消息。

拉：用他们的通信设备。

卡：对，用他们的通信设备。我们将以守备团全体军士的名义向其他各兵营发公告，以引发混乱和惊恐。与此同时，我们从那儿向外运送武器。

那起初好像是一场士官反叛运动，要引起敌军大乱一通。

两三个或三四个小时后，我们就亮出真实身份，而首先要重新播放正统党领袖那令人震惊的自杀前的讲话。

拉：爱德华多·奇瓦斯。

卡：我们将要在圣地亚哥最大的一家广播电台播放他的遗言。

拉：你们想要占领广播电台？

卡：当然了，这是必然的。一经拿下蒙卡达兵营，就要去占领广播电台。

拉：不是同时行动？

卡：不，不，朋友，不是。没有那个必要！首先要占领的是兵营，而后再去占领其他目标。我们开始时也不能太张扬，先只利用一下已被占领的兵营里的联络设备，最大限度地敌在敌军士兵中制造混乱。

这第一步行动是要使人们以为是近卫军们——老百姓是这样称呼他们的——自己跟自己打了起来。这必将造成影响，在敌军中引起混乱。与此同时，我们将安排下一步行动，以扩大战果。

接下来就要去占领省电台了。所有的文件材料均已备齐：各项法

规——这些法规后来收编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①一书中、呼吁人民起义动员书和总罢工号召书，因为当时总罢工的政治气候条件已经成熟，这是毫无疑问的。

1959年1月1日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当时一些已被打败但还有一定影响的军政头目图谋在首都发动政变。

拉：你们攻打蒙卡达兵营时想到胜利后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权了吗？譬如说，想到要建立苏联式的政权了吗？

卡：我们当时没有想到要建立苏联式的政权，一点儿也没有想到。建立那样的政权是后来的事了。我们只认为古巴经历了两次独立战争——当时古巴人口很少，两次战争中就死了五万人——后赢得的主权是地球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应当受到尊重的权利。我们是这么认为的。我们认为应该尊重我们进行革命的权利。那会儿的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想要了解这一切，得读一下我的那份辩护词，即人们熟知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那里面含有日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一点也没有必要。得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行。如有必要，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激进措施。

拉：攻打蒙卡达兵营的结果是许多同志惨遭酷刑被折磨致死，其他一些同志被囚禁，您也在押。您为什么不从这次失败中得出结论：譬如说，武装斗争道路根本行不通？

卡：结论恰恰相反。我们在攻打蒙卡达兵营时就有了思想准备：一旦

^① 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指挥两路人马分别攻打古巴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和巴亚莫的“卡洛斯·曼努埃尔·塞斯佩德斯”兵营，均告失利。一些人被捕后在古巴圣地亚哥受审。1953年10月16日最后判决前一次的审讯中，菲德尔·卡斯特罗做了长篇自我辩护演说，最后一句话是“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他的自我辩护词编辑成书后即采用了这句话做书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是宣言书、起诉控告书，是从法律、道德、哲学和政治层面为反独裁革命斗争进行辩护的辩白书。就其自身价值而言，它又是古巴革命的基本文献、古巴和拉丁美洲政治思想和革命斗争史的主要文本之一。参见菲德尔·卡斯特罗：《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塔比奥和吉列尔莫·阿隆索注释本，国务委员会出版物办公室出版，哈瓦那，1993年。（古巴编者注）

反动政权垮不了台，我们就带着从兵营里缴获的武器上山继续战斗。然而我当时是确信反动政权一定会垮台的。

拉：那时拉丁美洲还没有游击队在活动，对吧？

卡：1948年我亲历波哥大暴动时，哥伦比亚就有了非正规的军事群体，只不过还没有后来古巴使用的游击战这一概念。拉丁美洲曾爆发过无数次武装起义、武装暴动。墨西哥发生过革命，那次革命给了我们极其深刻的启示。也有过桑地诺的英勇斗争^①。

拉：20世纪30年代桑地诺在尼加拉瓜领导的武装斗争。

卡：“自由人的将军”……这些都是历史先例。

拉：您了解桑地诺的活动情况吗？

卡：太了解啦，真正是一清二楚啊。我们都知道桑地诺的英雄壮举。他只有一支人数不多的部队。书上说是“一支少数几个人凑在一起的部队”。没错，书上对我国独立战争领导人马塞奥、戈麦斯等在古巴的行动也是这样写的。我读过不少这类书籍。

拉：您非常了解古巴的历次战争。

卡：对。我们对照历次战争制定出了一种不同的战斗方式，因为无论是马塞奥还是马克西莫·戈麦斯他们率领的都是骑兵，灵活机动，就像通常说的那样，可以自由行动。几乎所有的战斗都是遭遇战。而在新的战争

^① 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1895—1934），尼加拉瓜革命家，20世纪拉丁美洲反帝解放武装斗争伟大先驱之一。1926年发动武装起义，次年开展游击战，反抗保守党政府和美国占领军。1928年，萨尔瓦多共产党领导人法拉本多·马蒂参加桑地诺游击队。1933年，美军撤离尼加拉瓜。桑地诺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但1934年2月阿纳斯塔西奥·索摩萨下令将他杀害。阿纳斯塔西奥·索摩萨当时是国民警卫队司令，后来成为独裁者，开始实行残暴的亲美独裁家族统治，1979年7月19日最终被桑地诺主义革命推翻。

环境下，我们的战斗都是有计划、有准备、有条件的阵地战。我们独立战争的先辈们从未修过工事、筑过堑壕，好像在比那尔德里奥有过那么一次。差不多全是遭遇战，而我们就不得不预先进行思考、进行规划了。

我们起初在 1200 米高、丛林密布的山上，而后在平原地区、公路上、咖啡园里、芒果树丛中、甘蔗园里进行的战争，是场独特的战争。这就得从头学起。譬如说吧，每次战斗，巴蒂斯塔的人总要派飞机在我们头顶上空盘旋，占尽了优势，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优势。学起来不容易啊，因为战斗方式差异太大了。不过我认为，这种巨大差异正好使我们学会了制定新型的战斗方式和应用新型的思维方式，从而解决了这一差异问题。

我们准备开始行动时，发生了一起背叛事件，差一点使我们全军覆没。还算好，那起事件没有来得及给我们造成致命打击，没有追捕我们，没有阻挡我们的行动。我们的队伍在马埃斯特腊山上从未落入过敌人的埋伏圈。反而是我们多次巧妙地打击了他们。例如，有一次他们来了一个加强连，三百人的正规军，我们只布置了七八十个人进行拦击，打退了敌人。

拉：您了解武元甲^①、胡志明^②和毛泽东^③的革命战争理论吗？

卡：嗯，我们知道，越南人是特别能征善战的战士，他们 1954 年在

① 武元甲（1911—），越南将军。1930 年加入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组织武装力量，反抗日本占领军。从 1946 年开始领导反抗法国殖民军的战争。被认为是现代游击战争伟大的实践家和理论家之一。1954 年指挥奠边府战役，打败了法国人。1961—1975 年间策划、指挥了抗美援朝战争，赢得胜利。

2013 年武元甲逝世。（中文编者注）

② 胡志明（1890—1969），越南革命家，20 世纪伟大的政治领袖之一。曾在莫斯科学习，加入过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返回越南领导反法独立斗争。1954 年殖民军战败撤离后，在越南北半部，当选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组织了反美侵略战争，同时组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越共）指导解放越南南部的战争，1975 年打败美国，越南重新统一。

③ 毛泽东（1893—1976），中国革命家、政治领袖，参与了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从 1927 年开始组织基层农民暴动，反抗国民党反动政府。组织了红军，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从 1934 年 10 月开始率领他的部队长征至陕西省，这使他得以提出了革命战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跟国民党休战共同抗日（1937—1945）后，毛迎对内战，赢得革命胜利，1949 年 10 月 1 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国家主席。

奠边府打败了法国人。但那是另一种类型的战争，动用了大量人力、大炮等各种武器。他们有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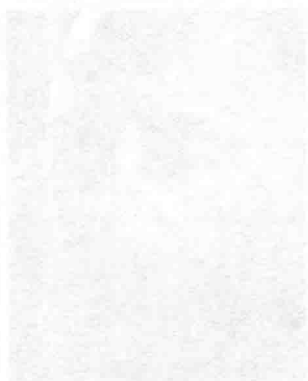
毛泽东 1935 年在中国指挥长征时，完成了一大军事壮举，当时我们在古巴知之甚少。我后来才阅读了许多相关的著作。在古巴这块土地上，进行一次长征根本不可能，然而其政治—军事策略和原则对任何一种类型的战争说来都会很有价值。毛泽东此举向人们证明：什么事都可办成，因为他们边走边战走了 1.2 万公里。

我们的问题在于身处一种非常不同的战斗环境。



我
的
一
生

第七章 切·格瓦拉



墨西哥—与切·格瓦拉相遇—才智合谋—人格和意志—准备游击战—训练—“格拉玛号”游艇

世界名著·传记·革命

拉：您在皮诺斯岛（Isla de Pinos）被囚禁两年之后流亡到墨西哥，在那儿您第一次遇见了埃内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Guevara）。您能否给我讲讲您是在什么情况下认识他的。

卡：我很高兴讲起切·格瓦拉，真的^①。当他还在阿根廷读书的时候，他的旅程就广为人知^②。他骑着摩托先是在本国各地游览，后又游历了智利、秘鲁、玻利维亚和其他一些拉美国家^③。别忘了，当时在玻利维亚，即在1951年发生军事政变之后，1952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工农运动，引起战斗，影响巨大^④。

切·格瓦拉在其医学专业即将毕业时的旅程也是人们所熟知的。他和朋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Alberto Granado）参观访问了许多不同的医院，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其文章、演说和访谈中经常提到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有关材料主要收集在《菲德尔·卡斯特罗记忆中的切·格瓦拉》（*Che en la memoria de Fidel Castro*）一书中。该书由赫苏斯·蒙塔内作序，墨尔本大洋出版社1998年出版。另见詹尼·米纳（Gianni Miná）：《采访菲德尔》（*Un encuentro con Fidel*），哈瓦那，国务委员会出版局，1987年，第311—349页；《菲德尔访谈录》（*Habla Fidel*），西班牙，蒙达多里出版社1988年版，第345—371页。

② 见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Ernesto Guevara Lynch）：《我的儿子切·格瓦拉》（*Mi hijo el Che*）中的相关章节：“在阿根廷内地旅游（1950）——他的日记片段”，马德里，普拉内塔出版社1981年版。

③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我的第一次长途旅行（1951—1952）：骑着摩托从阿根廷到委内瑞拉》，巴塞罗那，塞伊克斯·巴拉尔出版社1994年版。

④ 1952年4月9日，由维克多·帕斯·埃斯登索罗（Victor Paz Estenssoro）领导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由胡安·莱钦（Juan Lechín）领导的玻利维亚总工会发动人民起义。武装起来的工会占领了庄园和工厂企业，推翻了掌握着国家矿产等财富的三大家族的统治，选举埃斯登索罗为总统，进行土改，把锡矿收归国有。

最后留在了亚马孙河地区一所麻风病医院当医生^①。他访问了拉丁美洲许多他方，到过劳动条件极差的智利丘基卡马塔（Chuquicamata）铜矿，穿越阿塔卡马沙漠（Desierto de Atacama），参观了秘鲁的马丘比丘（Machu Picchu）遗址，乘舟在的的喀喀湖（Lago Titicaca）上游览，了解和关心土著人的情况。他还去过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大家知道，他从那儿转到了危地马拉，那是在哈科沃·阿本斯（Jacobo Arbenz）当政时期^②。切·格瓦拉对所有那些问题都有浓厚的兴趣，早在学生时期就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感兴趣。

拉：当时哈科沃·阿本斯总统在危地马拉推行非常进步的改革。

卡：是的。那里当时正进行着一场重要的土地改革，把一家美国大跨国公司经营的广大香蕉种植园分给农民。有人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那场土改就此失败了。在那个年代谈论土地改革，乃是共产党人干的事，就会自动被看作是共产党人。

在危地马拉进行了土改，有权势的人马上予以反对。北方邻居及其专门机构立即组织反革命行动，他们联合旧军队的军官，从边境派遣一支远征军，旨在推翻当选的哈科沃·阿本斯总统。

1953年7月26日，当我们发动攻打蒙卡达兵营后，有一批同志设法

^① 阿尔贝托·格拉纳多（Alberto Granado）：《与切·格瓦拉游南美》，哈瓦那，古巴文学出版社，1986年。2004年，以此次旅行题材，由沃尔特·萨勒执导拍摄了一部名为《摩托日记》（*Diarios de Motocicleta*）的电影，获得巨大成功。

^② 哈科沃·阿本斯（Jacobo Arbenz，1913—1971），原是危地马拉陆军军官，“1944年10月革命”，即推翻豪尔赫·乌维科（Jorge Ubico）长达14年的独裁统治的人民武装起义的主角之一。通过民主选举，1951年当选总统，颁布土地改革法，把联合果品公司和大庄园主的空地分给农民。美国中央情报局指责他是“共产党人并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赞同下，在中美洲一些独裁者的支持下，于1954年6月27日组织武装入侵和军事政变，推翻了阿本斯政府”。

逃出国外。安东尼奥（尼科）·洛佩斯（Antonio [Ñico] López）^①和另一些人去了危地马拉。切·格瓦拉已经在那儿了，他遭受了哈科沃·阿本斯被推翻的痛苦经历。他结识了我们的同志，并与他们一起去了墨西哥。

拉：您的弟弟劳尔比您先认识他？

卡：是的，因为劳尔是最早离开古巴去墨西哥的几个人之一。他已经受到指控，甚至被指控投放炸弹，于是我亲自对他说：“你必须走。”在墨西哥组织武装返国的主意，是我们在牢里想好的。那是古巴的一个传统。劳尔去了墨西哥，并通过早在那里的同志认识了切·格瓦拉。对了，他当时不叫“Che”（切），而是叫Ernesto Guevara（埃内斯托·格瓦拉）。但是，因为阿根廷人总是对着别人叫“Che”，在那儿的古巴人就开始称他“Che”，于是“Che”（切）这个名字就叫开了。

我之所以能晚些时候才离开古巴，是因为我当时的处境还不十分危险，但不能继续搞鼓动。终于到了我也必须去墨西哥的时刻，原因之一是必须赶快进行返国的准备工作。我们在出狱后的那些日子里开展了紧张的思想宣传和觉悟的运动，构建了我们自己的革命组织“七二六运动”。我们已经证明不可能继续通过和平和合法的途径进行斗争。

拉：那时切·格瓦拉已与你们志趣相投吗？

卡：那时他已经是位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未参加任何政党，但已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墨西哥与尼科·洛佩斯有联系。尼科·洛佩斯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是正统党（Partido Ortodoxo）的领导人之一，是位好同志，谦逊、很激进、很勇敢，参加了攻打巴亚莫兵营的行动。我自己跟他有过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谈论。志同道合是促使我亲近切·格瓦

^① 安东尼奥（尼科）·洛佩斯·费尔南德斯（Antonio [Ñico] López Fernández，1930—1956），参加了1953年7月26日攻打巴亚莫兵营的战斗。他最终摆脱了追踪，进入危地马拉驻哈瓦那大使馆避难。1955年大赦蒙卡达兵营袭击者之后，他回到古巴，成为“七二六运动”第一届全国领导机构成员，后又参加了“格拉玛号”远征。1956年12月8日在博卡—德尔托罗遭杀害。

拉的最有利因素之一。

拉：您第一次见到切·格瓦拉时，觉得他与众不同吗？

卡：他深受人们的喜爱。自然、朴实、讲义气和其他一些优良品德，使他成为一个很快就能博得大家好感的人。他是医生，在社会保险协会的一个中心工作，进行一些研究工作，不知是心脏病方面的还是过敏症方面的，这我不清楚，但他是个过敏症患者。

拉：患哮喘病。

卡：他跟我们在墨西哥的那一小批人很合得来。劳尔跟他已经成了朋友。我到墨西哥后就认识了他，那时他 27 岁。

他自己讲^①，我们是在 1955 年 7 月的一个夜晚，在一个名叫玛丽亚·安东尼亚·冈萨莱斯的古巴妇女的家里相见的，她家坐落在墨西哥首都恩帕莱街上。他是一个周游了南美洲、亲眼目睹了危地马拉的事变、见证了美国的干涉、熟悉我们在古巴的斗争、知道我们的想法的人，所以他的和蔼可亲就不会让人感到有丝毫的奇怪。我们一到那里，就开始交谈。就在那时那地，他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他知道在我们的运动中也有小资产阶级，知道我们要进行民族解放革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知道尚未预见社会主义革命。但这不是障碍，他很快就加入了，马上参加了。

拉：他参加了冒险。

卡：他只跟我提了一件事：“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当古巴革命胜利后，

^① “我与菲德尔整整谈了一晚上。天亮时，我已是他未来的远征军的医生”，这是阿根廷记者里卡多·马塞蒂（Ricardo Masetti）于 1958 年 4 月在马埃斯特腊山采访切·格瓦拉时他的谈话。见里卡多·马塞蒂：《斗争的人们和哭泣的人们（我所见到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哈瓦那，马迪多出版社，1960 年。关于这次会见，切·格瓦拉还写了这样的话：“认识古巴革命者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一个政治事件。他年轻、聪明、自信和非常勇敢。我认为我们相互有好感。”见埃内斯托·切·格瓦拉：《1955 年第二次旅行日记》（*Notas del Segundo Diario de viaje*, 1955）。

你们不要因为国事而禁止我去阿根廷搞革命斗争。”

拉：在他自己的国家？

卡：对，在他自己的国家。他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我们当时已在推行一种初期的、但是强烈的国际主义政策。我们在波哥大的行为是什么？反对特鲁希略^①的斗争，捍卫波多黎各的独立，把运河归还巴拿马，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以及加勒比地区欧洲各殖民地的独立，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是什么？我们不是一些简单的学徒。切·格瓦拉充分信任我们。我回答他说：“同意。”这就够了，无须再说什么。

拉：他就开始跟你们一起进行军训？

卡：他参加了一期战术课程，由一位名叫阿尔贝托·巴约（Alberto Bayo）^②的西班牙将军授课。此人于1892年即古巴独立前出生在古巴的卡马圭。20年代曾在空军服役，在摩洛哥作战，后来又成为共和军军官参加西班牙内战，随后流亡墨西哥。所有的战术课，切·格瓦拉都参加了。巴约说，切·格瓦拉是他“最好的学生”。两人都喜欢下国际象棋，在被拘禁之前，他们在营地每天晚上都要杀上一盘。

巴约的教学没有超出游击队应如何行动才能突围这一内容，其基础是阿卜杜勒克里姆（Abdelkrim）率领的摩洛哥游击队员突破西班牙军队包围圈的多次经验。他未能提出某种战略，他从未想到过一支游击队可以变成一支军队，一支能击败另一支军队的军队，而这正是我们的基本想法。

拉：那是你们想要做的？

卡：我所说的军队是指要发展一支能打败另一支军队的力量。那是我

① 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Rafael Leónidas Trujillo），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他在美国扶持下，实行家族独裁统治达30年（1930—1960）。（译者注）

② 阿尔贝托·巴约（Alberto Bayo）：《我对古巴革命的贡献》，哈瓦那，起义军出版社1960年版。古巴革命胜利后，他定居古巴，1967年在哈瓦那逝世，享年75岁。

们出发去墨西哥时所形成的基本想法。我们的一小股力量在马埃斯特腊山最初几个月的斗争中所建立的英雄伟绩，巩固了这一想法。

拉：你们的想法是把游击队变成军队，开展一场新型的战斗吗？

卡：有两种战争：一种是非正规战，另一种是正规战或正规战。我们制定了一套对付巴蒂斯塔军队的方案。巴蒂斯塔的军队拥有飞机、坦克、大炮和通信设备。我们既没有钱，也没有武器。我们必须寻求和找到一种在古巴推翻暴政、进行革命的方式。我们的想法成功了。我不想说一切都是功绩。运气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个人可能犯错误，或者可以尽可能地把事情做得更完美些，但总是有些事情是不能预见到的。生死存亡往往系于某一简单的细节问题，系于收到或未收到某一适时的情报。你还记得我痛苦地谈到，在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工作后，一些偶然的因素使我们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计划失败了。我们还将谈到我们从“格拉玛号”游艇登陆后遭到的愚蠢伏击。在这两次行动中，有多少宝贵的生命未能保存下来啊！

在墨西哥，许多同志跟着巴约训练。我必须关注组织工作和采购武器的工作，还要负责在靶场训练人员，整天跑东跑西，很难去听巴约讲课。

拉：切·格瓦拉坚持上课吗？

卡：是的，他上理论课，也上射击实践课。他是个很好的射手。在墨西哥，我们在墨西哥城附近的一个射击场练习射击。那是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①的一位老朋友的财产，我们把它租了下来。我们登陆时拥有55支带望远式瞄准镜的步枪。用那些枪支进行无依托端枪射击训练，打的是200米开外的活动靶子。我们能击碎600米远的碟子。我们的人枪法都很好。我们让人站在200米远的地方，在他旁边摆个瓶子，用望远式瞄准镜进行瞄准。这种瞄准镜能大大提高你的瞄准精度。我们

^① 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1876—1923），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时期北方农民革命军领袖。（译者注）

要做数百次实弹练习。志愿者中有个叫“朝鲜人”^①的。我们把瓶子摆在离志愿者身体1英尺的地方，这样的射击我必须做许多次，而没有一次射不中的。当然喽，一定要把枪很稳地搁在依托上。这种射击练习不能是无依托的，因为稍有偏差，就会伤了同志。这样的练习能使你对那些武器的使用具有充分的把握。

拉：切·格瓦拉到那里时没有任何军事经验吧？

卡：是的，没有，没有任何军事经验。

拉：是在那里学的吗？

卡：一边学习，一边实践。不过他是作为部队的医生跟我们在一起的，他是一位杰出的医生，给同志们看病。我可以讲讲他具有的能说明他这个人的一种品质，那是我最赞赏的许多品质之一。他有哮喘病。在墨西哥首都郊外有座火山，即波波卡特佩特火山。他每个周末都要去爬那座火山。他准备好器具——山很高，5000多米，终年积雪，开始往上爬，尽最大努力往上爬，但还是爬不到山顶。哮喘阻碍他到达目的地。下个周末他又试图爬上他所称的“波波”山顶，但依然没有爬到顶峰。他从未爬到过波波卡特佩特山的山顶，但他可能一辈子都在努力攀登波波卡特佩特火山。他做出了英勇无畏的努力，尽管从未达到那个山顶。你一定赞赏这种品质。它反映出一种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

拉：一种意志……

卡：当时我们的队伍还很小，每当需要有人志愿去执行某项特定任务时，第一个自告奋勇站出来的人总是切·格瓦拉。他的另一个特点，毫无疑问是在他向我请求不要因为国事而禁止他以后回祖国进行革命斗争时所

^① 米格尔·安赫尔·桑切斯（Miguel Angel Sánchez），一位原籍古巴的美国公民，因为参加过朝鲜战争，所以人们称他为“朝鲜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在1956年年底认识他的，不久他就在墨西哥参加了准备远征的小组，在战术训练上为远征队提供帮助。1956年年底与古巴革命者失去联系。

反映的那种预言家的预见性。

拉：是要去阿根廷的预见吗？

卡：是的。以后在战争中，我不得不要努力保护着他，因为如果放任他去做他想做的一切，他早就没命了。从一开始他就表现突出。每当需要有人志愿去完成某项艰巨任务——进行突袭，收回一些失落的武器以免落入敌人手中等——时，第一个志愿者就是切·格瓦拉。

拉：他志愿去执行所有那些最危险的任务吗？

卡：对任何艰难任务，他总是第一个志愿者。他的特点是非凡的勇猛，完全藐视危险。但此外有时还建议搞些十分艰巨、十分危险的事情。这时我就对他说：“不。”

拉：是因为太冒险了？

卡：瞧，如果你派一个人去进行第一次伏击、进行第二次伏击、第三次伏击、第四次伏击、第五次伏击，甚至第六次伏击，那肯定就会像扔钱币赌正面或反面：在一场班或排规模的近战中，一个人会像那些玩俄罗斯轮盘赌的人那样死去。

拉：不会因为他不是古巴人而出现什么问题吧？

卡：会。在墨西哥，我们曾派他作为一个营地的前哨，有些人就开始抱怨，说他是阿根廷人，还跟我大吵大嚷。我现在不想提他们的名字，因为后来他们表现得都很有礼貌。是的，那是发生在墨西哥的一个营地。战时他是医生，但由于他的勇敢、他的品德，我们委派他担任一个纵队的指挥员。他的许多品质使他在队伍中出类拔萃。对此谁都没有异议。

拉：是做人的品质、政治品质、军事品质？

卡：做人的品质和政治品质。作为人，他是极有人情味的。此外，他

是个很有文化修养、十分聪明的人，也有军事天赋，他从医生变成了士兵，但一分钟都没有停止行医。我们俩并肩参加过很多战斗。有时候我们把两个纵队集中起来，针对敌军的埋伏和可预见的调动，开展比较复杂的行动。

我们革命者从斗争中学习战争。我们发现敌人在阵地战中是强的，而在运动中是弱的。一支三百人的队伍，走在前面的只有一个或两个班的兵力。打起来时后面的人都不开枪或朝天开枪，以壮声势。他们不看，也看不见正在袭击其先头部队的人。这是我们采用的一个基本原则：当敌人变得最脆弱时进行攻击。假如我们攻其阵地，我们总会有伤亡，消耗弹药，但不是每次都能攻克目标。相反，敌人待在战壕内作战，情报更畅通，军队更加安全。我们发展了战术，但我现在不跟你谈这个。我们慢慢学会了跟一个强大的对手作战，而第一纵队是我们的基本学校。

拉：你们在墨西哥训练时曾经被囚禁过，还记得吗？

卡：是的。这有一段故事。我们被捕了。我本人几乎是偶然被抓的。墨西哥警察在被捕者的衣袋里搜到一两个小纸条，从中发现了某个地址或某个电话号码。任何人都没有提供丝毫的消息。

我们的运气不错。我们遇到的是联邦安全警察，而不是秘密警察。由军队的一名军官率领。他们原以为我们是些走私犯之类的人，因为巴蒂斯塔的特务们制定了绑架计划，我们采取了一些反绑架措施，这些具体措施使我们变成了嫌疑犯。他们觉得我们的行动很怪异。在后来发生的事件中没有把我们杀了，那真是奇迹！

巴蒂斯塔有其影响力，他通过贿赂获得了秘密警察的支持并制定了在墨西哥绑架我们的计划。我们被迫采取措施。一天，几乎是晚上，因为处境危险，我们从原来的住处搬到另一处去住。几个联邦警察从另一所房子看到了我们的行动，就决定逮捕我们。他们干得相当漂亮。我正在从马路左边的人行道步行转移——因为我们也发觉了车辆的异常活动，我让小拉米罗跟在我后面，保持三四十米的距离。我朝着附近的一个拐角走去。那是一个住房稀少的街区，在那个拐角处有幢正在建筑的房屋。突然，我看

见有辆汽车从后面马路上急驰而至，在拐角附近嘎的一声刹住了，从上面下来了一组人。我躲到一根楼柱后，正要拔枪——一支 25 响西班牙自动手枪。就在那时，有人用手枪使劲顶住了我的后颈。是个联邦警察。他们早已逮住了拉米罗。从此开始了我们在墨西哥的漫长历险。

出了什么事？当时我以为我有拉米罗和乌尼韦索（桑切斯 Sánchez）做后卫，但实际上他们早已被抓起来了。正当我准备自卫，对付从车上下来的人时，有人从背后把我制住了。你能想象出我从拔枪到射击需要多少秒。就在我拔枪的那一刹那，他们把我摁住了。他们认为抓住了几名走私犯之类的人。那个年代，几乎不存在毒品问题。当局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走私上。他们把我们带到警察总局。

到了那儿，马上就开始跟我们谈话。这使我们松了一口气。那是一些很凶狠、态度相当强硬的人。他们在抓捕和侦查方面确实能干，因为一旦他们掌握了任何一个小纸条，就会进行细致周密的追查。我被抓到那里后，想起坎迪多·冈萨雷斯——一直跟随我的一个同志——曾经在我的衣袋里塞过一个纸条，上面有我们存放着一大批优良武器的那所房子的电话号码，而只有我和另一位同志知道。当时我想起那纸条时心里有多难过！我一时竟然忘了那个纸条。幸好那些到处跟踪追查的警察，还没有想到要进一步追查那个电话。否则，会是一次最沉重的打击。但不管怎样，他们根据其他一些线索查获了我们的一大批武器。然而，我能觉察到，随着对我们的认识逐渐加深，他们越来越敬重我们。

拉：您被捕时切·格瓦拉不跟您在一起？

卡：不在一起。切·格瓦拉是在市郊他们进行训练的那个营地，即在查科的圣罗莎营寨被捕的。警察他们正在寻找那个地方，已经发现了一些踪迹，而且不找到它决不罢休。有一天，那个头头对我说：“我们已经知道训练营地在哪儿？”像是一种花招，又像是种挑衅。他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寻找。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找到真实踪迹的并把它跟在查科有古巴人的奇怪活动的说法联系起来。他们对我说了营寨所在的确切地点。我知

道那里大约有 20 位同志，还有武器。面对那样精确的情报，我就对联邦警察头子说：“我想求你一件事：为了避免发生冲突，请允许我与你们一起去他们所在的地方。”他同意了。我去了，到了那地方，并请求联邦警察让我单独行事。我爬上门楼，探出身来。同志们看到我后显得很高兴，以为我获释了。我对他们说：“不，不，安静！不要动！”，接着把发生的事告诉他们。

他们在那儿逮捕了切·格瓦拉。有几位同志不在屋里或在执行其他任务，因而未遭逮捕。巴约是其中之一。他没被逮捕，他不在那儿。我现在要给你讲的好像有点儿奇特：他几周前连续搞了 20 天的不吃早餐、进行意志力的锻炼。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在西班牙内战中，他曾率领一支远征军进攻巴利阿里群岛（las Baleares），但没能把它们从佛朗哥的支持者手中解放出来。

每次军事冒险和每次不可逆转的失败之后，他都要写本书。我们被囚禁期间，他又开始写书，书名为：《我的夭折的古巴远征》（*Mi frustrada expedición a Cuba*）。那位在古巴出生、在加那利群岛（las Canarias）长大的西班牙人，是个天才，直至安葬都是有名的。

拉：他没有被捕？

卡：没有。巴约没有被捕，当时他不在那里。但是他们拿到了几十支枪，那是同志们进行训练用的，因而不是最精确、最好的。那些步枪没有望远式瞄准镜。营寨里有个羊奶及奶酪加工作坊，由几个友好的邻居经营。那是掩护训练中心的，使之不被发现。

但警察不停地侦查，我已说过，他们已经找到了某些踪迹，最终找到了那地方。切·格瓦拉是在那里被捕的。

拉：你们是被关在一起吗？

卡：是的，我们被关在一起差不多有两个月。他是什么时候给我们制造麻烦的？当他们审讯切·格瓦拉时。他们问：“你是共产党人吗？”，

“是的，我是共产党人”，他回答说。墨西哥当地的报纸报道说，有共产党人正在密谋“消灭”本大陆的“民主制度”。他们把切·格瓦拉带到检察官面前加以审讯，而他甚至开始辩论个人崇拜和批判斯大林问题。您可以想象切·格瓦拉专心致志地就斯大林的错误，跟警察、检察官和移民当局进行思想辩论的情形。这发生在1956年7月。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发生在那年的2月^①。当然喽，他采用苏共党代会的官方说法。切·格瓦拉说：“是的，他们在这方面和其他问题上犯了错误”，为他自己的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辩护。请你想象一下，他，一个阿根廷人，在那种时刻有更大的危险啊！我坦诚地认为，在那样一种任何计划都可能失败的情势下，最合适的做法是用假情报迷惑敌人。可是，对深受共产主义文献史诗影响的切·格瓦拉，不能因为策略上的添乱而指责他，也没有因此而阻止他与我们共赴古巴。

实际上最后出狱的两个人是他和我。我认为，我比他甚至还早几天被搭救出来。在古巴囚犯问题上，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进行了干预。他的关心对我们的获释起了很大作用。他的名字受到人民的景仰，他的道义威望足以打开那座监狱的大门。

拉：有人讲，不如说切·格瓦拉对托洛茨基主义有好感更为确切。您当时觉察到了吗？

卡：没有，没有。听我告诉您切·格瓦拉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就像我对您说过的那样，切·格瓦拉当时已经是个有政治修养的人。他自然已经读过许多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著作。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从未听他谈过托洛茨基。他维护马克思，维护列宁，批评斯大林。对了，那时他批判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但我从来没有听他真正谈过托洛茨基。他是列宁主义者，甚至以某种方式承认斯大林的一些功绩，如工业化和其他一些事情。

^①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在莫斯科召开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和在农业问题上的错误。

从我的内心深处，我对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批判比切·格瓦拉更严厉。依我看，那个国家在 1941 年遭受希特勒强大战争机器的入侵，而苏联军队却没有接到战斗警报的号令，斯大林应对此负责。此外，斯大林还犯有严重的错误，他的滥用权力和其他专制独断行为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也有功绩。苏联的工业化，以及使军事工业转移到西伯利亚并得到发展，这些成了那次世界反纳粹主义斗争的决定性因素。

我在对斯大林做分析时，对他的功绩和严重错误进行了评估，包括他面对纳粹分子的阴谋而对红军“下泻药”的严重错误。

拉：他自己解除了武装？

卡：自己解除了武装，自我削弱，签订了那个不祥的里宾特洛甫 - 莫洛托夫苏德条约和其他东西。这些我已跟您谈过，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



我
的
一
生

第八章 在马埃斯特腊山



阿莱格里亚·德皮奥—最初的胜利—战斗中的切·格瓦拉—
劳尔和卡米洛—战争战略—革命胜利

山翻林浪斜日白 道八氣

拉：你们于1956年12月2日登陆，不久就在阿莱格里亚·德皮奥（Alegria de Pio）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卡：这发生在5号。我们用一艘空船进行了所有的航行试验，我们对航海技术懂得不多，当我们82个人下到“格拉玛”号游艇上，再装上武器、弹药、食品和补给燃料，船速就降下来了，本来5天的行程，我们却用了7天时间，到达时油罐里只剩下数立方英寸燃料了。我们迟到了两天。登陆后第三天我们遭到了袭击。

在阿莱格里亚·德皮奥，我们朝着山区进发，离得还很远，12月5日的曙光已经出现。我们绕过一座不超过1公顷大的小山，又朝着一座大山走了一二百米。那大山南面是海岸线，北面是一片长着牧草和甘蔗的平地沃原。我们到了那片树林的边上，对树林进行侦察，然后队伍就分散开来，前后拉开了数百米的距离。那是一个合适的地点，控制着我们来的那条道路的很大一段，但是岩石之地，满是粗糙的石块。傍晚时我们又将起程，为了穿越包围圈，我们又将走一夜的路。有些同志已经精疲力竭。于是我决定在一个小山上扎营，那里地面松软，几步远的蔗田里长着可供食用的鲜甘蔗。各班分别找好安顿的地方休息，等待天黑。岗哨离营地只有100米。太自信了。

过了中午，敌人的轻型飞机就早早开始侦察。下午4点左右，歼击机贴着小树林的树梢盘旋飞行。大约5点钟时，响起了第一批枪声，接着第二批枪声，密集的步兵子弹向我们射来，而我们当时被贴地飞行的歼击机震耳欲聋的响声分散了注意力。我们遭到了突然袭击。

彻底溃散了。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待在附近的甘蔗地里。一部分人员撤向或穿过那片甘蔗地。每个人或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历险遭遇。我们3人

躲在甘蔗丛中，等待快要降临的夜晚。我们转移到大树林中，在那里尽可能地睡了一觉。全部兵力：3人；全部武器：我的步枪和90发子弹，以及乌尼韦索（桑切斯）（Universo [Sánchez]）的步枪和30发子弹。这就是我能指挥的全部兵力。

那地区布满了士兵。应该朝东走，尽可能地把分散的队伍集合起来：我主张沿着树林边缘往东走，而法乌斯蒂诺（佩雷斯）（Faustino [Pérez]）——像我一样，也是运动的领导成员——主张穿越一片广阔的甘蔗种植区。正在生长的甘蔗还不到1米高，老远都能看到我们。我当时做得不对，因为我面对法乌斯蒂诺的固执已见大发雷霆。我说：“是打那儿走吗？好吧，那就从那儿走！”不难想象，看到几乎两年中所做的努力在仅仅几分钟内就化为乌有，我当时的情绪有多坏。走那个方向是愚蠢的举动。我们在阳光下已经走了数公里，这时我发现一架中型民用飞机在大约1000米高的空中围着我们转。我意识到有危险。我们加快步伐。前面是一片被毁的甘蔗田，有3个马拉布（一种在荒芜的田野中自然生长的带刺植物）荆棘丛，向东一字儿排开，每个之间相隔不到30米。我们藏到第一个荆棘丛中。正在观察我们的那架飞机在等待歼击机的到来。歼击机几乎立即出现了，向离我们60米的第三个荆棘丛扫射。离我们藏身之地几米远处，是另一片荒芜的甘蔗田。我说应该马上离开那个直径不到10米的荆棘丛。我们跑到几米远的那个甘蔗地里，躺在甘蔗的杆叶下面。几乎同时，那些歼击机自东向西开始攻击，向我们待过的那个荆棘丛连续扫射了几次。那段时间好像长得没有尽头。每架飞机装备8挺50口径机枪，大地在机枪的扫射下颤动。每次扫射过后，我在离荆棘丛几米远的地方大声叫喊乌尼韦索和法乌斯蒂诺。尽管法乌斯蒂诺脾气固执，我还是很敬重他，我永远因为他的许多革命品质而敬重他。我们3人无一死亡或受伤。我们利用几分钟的扫射间歇时间向三四十米开外的一个长得更高更密的甘蔗丛奔去。可以跑得更远些。扫射已经停止。几架轻型侦察机轮流从低空监视着那个地方。我们埋在甘蔗的杆叶下不敢有丝毫的动弹。

那是我一生中最具戏剧性的时刻之一。在离遭扫射的地点很近的那片甘蔗地里，我困了，非常困。我不时地说：“他们肯定要来进行地面侦察，会前来察看不成比例的攻击实绩。”

他们不可能知道躲在那里的是些什么人。不管是谁，他们对其进行了真正疯狂的攻击。那是中午刚过时发生的。我不能知道确切的时间，但知道我们待在甘蔗的杆叶下，他们保持一架轻型飞机在空中不停地监视着那个地方，使我们实际上不能活动。在甘蔗的杆叶下，保持着那样的姿势，加上前几天的种种紧张，一个人就会感到精疲力竭。

拉：那是您所经历的最具戏剧性的情况之一吗？

卡：我所经历的最具戏剧性的情况就是那次，那个下午，那个时刻，任何其他情况都没有那次更具戏剧性。我已给您讲过萨里亚的情况，就是在攻打蒙卡达兵营之后他们抓我的时候。

拉：是的，但这次是最具戏剧性的，不是吗？

卡：记得是在我几乎无法忍受困倦的时刻。我的步枪扳机有两档：一是缓和击发档，二是触发档。按下第一档后，只要轻轻一碰就可精确射击。我的步枪有个10倍放大瞄准镜。

在那种情况下我该做什么呢？当我感到不可避免地会睡着时，我便侧过身来，把枪托夹在双腿间，将枪口对着下巴。我不愿意在我睡着时敌人侦察到那儿并把我活捉了。在那种情况下，要是有一支手枪就好了：你可以便利地拔出枪来，向敌人射击或对着自己开枪。但是用一支有那种特点的步枪，如果你睡着时被他们撞见，你什么都干不了。我们在杆叶下面，轻型侦察机在上面。因为不能动，我就沉沉地睡着了。我困乏得足足睡了3个小时。下午天气开始变得凉爽起来。

拉：虽然那次登陆结局悲惨，遭受伤亡，但您没有气馁？

卡：没有。我们靠两支步枪开始重新组织起来。另一方面，两周后，

劳尔带着5支步枪到了一个地点。两边加起来，我们那天集合了7支步枪。在那儿我第一次说：“我们现在可真得要赢得战争了。”我记得卡洛斯·曼努埃尔·塞斯佩德斯的一句话。当他处于相似境地，只有12个人时，他回答那些悲观主义者说：“我们还有12个人！足以使古巴独立。”劳尔和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开进山里，继续战斗。

所以，我们有段时间靠7支步枪继续斗争。但就在那时，我们一些被杀害的同志的枪支或者把枪藏起来准备以后去取的同志的枪支，有些被农民捡到了。在农民的帮助下，我们收集了17件武器，并且靠那些武器取得了首次胜利。

拉：首次胜利是哪个？

卡：第一次战斗是攻击一支海陆混合巡逻队。发生在1957年1月17日，即1956年12月2日我们登陆后的第46天。那是我们第一次获胜的战斗，第一次小规模、而且是象征性的战斗。5天以后，有一小队伞兵，它作为一支300人的部队的前卫，孤军深入，遭到了经过多方周密准备的有力伏击。打死打伤约5人，还缴获一支加伦德式半自动步枪及其全部子弹。要详细讲述那头两次胜利的战斗，即拉普拉塔（La Plata）战斗和帕尔玛—莫查地区的亚诺斯·德尔因菲耶诺（Llanos del Infierno de Palma Mocha）战斗，时间就长了。我们的武装战斗人员，从参加第一次战斗的19人已发展到30人。

后来，自从我们的唯一向导背叛之后，就产生了巨大的困难。他的背叛是令人遗憾和具危害性的。我们的人员又减至20名，后来只剩8名。登陆后，我们在阿莱格里亚·德皮奥遭受了巨大挫折。正当我们处于迅速恢复过程中时，发生了那次背叛。

拉：初期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卡：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学习。如果我们82个人能在预计的合适地点登陆的话，那么战争可能只需延续5个月。凭什么？凭经验。依靠我

们拥有的那支队伍，55支带望远式瞄准镜的步枪、优秀的射手和经验，战争不需6个月就可结束。在“格拉玛”号船上，我把55支步枪进行了校正，使之能击中600米远的目标。我们有3种品牌的步枪，根据其钢质和子弹种类，每一种的变差都不一样。在“格拉玛”号船上，我花了两天的时间，运用一种几何公式，把所有枪在10米的射击距离内，全部进行了校正。

拉：切·格瓦拉有哮喘病，这应该成为他在游击队参加战斗的严重困难。您在挑选上“格拉玛”号游艇的人员时剔除的是其他人，而不是他。他的哮喘病后来产生过问题吗？

卡：切·格瓦拉自然得上“格拉玛”号船。当然喽，一切都按照应该做的那样做了准备。全体人员都应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谁也不知道我们何时动身。1956年11月24日的那个晚上，当我们向图兹潘（Tuxpan）河边的一所房屋移动时，切·格瓦拉也行动了，他没有带哮喘气雾剂。但是，他当然得上“格拉玛”号船。

拉：没有带他的哮喘药吗？

卡：没有带。几个月以后，在马埃斯特腊山，在1957年2月与《纽约时报》记者赫伯特·马修斯^①会晤之后，当我们的战士再次增至20名时，当我们越来越熟悉地形时，当我们越来越有经验在那种困难的条件下，在敌人——一个职业自豪感已经受到伤害，却对我们这支不起眼的力量十分

^① 赫伯特·马修斯（Herbert Matthews），第一个上马埃斯特腊山采访的记者，当时古巴的所有传媒对关于游击队的报道进行严格审查，而巴蒂斯塔则宣传说，菲德尔·卡斯特罗自从“格拉玛号”游艇登陆后已经死了。马修斯那时57岁，是《纽约时报》的拉美问题社论撰写人。曾作为《纽约时报》记者，在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赴那儿采访，也是西班牙内战时期《纽约时报》驻西记者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驻欧洲记者。1957年2月17日会见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3篇文章。第一篇登载于2月24日的第一版，题为：《在其藏身处被采访的古巴起义者》；另两篇分别发表于1957年2月25日和26日。《纽约时报》还在28日登载了一张马修斯与菲德尔·卡斯特的合影，证明采访的真实性。这张照片很快被全世界媒体转载。通过马修斯，菲德尔·卡斯特的游击队首次产生了国际反响。

轻视的敌人——穷追不舍的情况下努力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的时候，出现了因为切·格瓦拉哮喘病发作而导致的复杂情况。

一支强大的部队向我们进攻。由于切·格瓦拉的哮喘病大发作，我们的行军危险地延缓了。他当时几乎走不了路。我们必须爬上一个很陡的山坡。我们正在往上爬，奔向有树林的地方时，在我们的左翼，一支大约有300名士兵的部队，正行进在一个长满牧草的高地上，而他们所在的位置比我们的高。见到我们后，就用迫击炮和步枪火力对我们进行攻击。尽管这样，我们连架带拖地拉着切·格瓦拉继续往上爬，试图先于敌人到达林地。已经很晚了，快要天黑了。我们到达树林后几分钟，一场倾盆大雨开始朝着相隔只有六七百米之遥的争斗双方泼来。大雨迫使我们不停地继续前进，来到山头的另一边。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在那里找到了两户相距数百米的农家。我们被淋得浑身湿透，寒冷袭人。切·格瓦拉这时已动弹不得了。

拉：他哮喘病发作了？

卡：是的，真正的大发作。这使我们处于相当难办的境地。没有药品。快的话只能到曼萨尼略，即我们与赫伯特·马修斯会晤的地方去搞药。切·格瓦拉一句话没说。那时他已动不了了，而敌军还在后面。他们不可能在夜间行动，不可能摸黑从那泥泞的林间道过来。肯定会在拂晓时开始行动，直至到达我们所在的地点。

我去找那两个农民。我假冒巴蒂斯塔陆军上校，显得镇定、沉着。考虑到不久前在附近响起的迫击炮的爆炸声和密集的枪声，那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种计谋有时候是必要的，因为起初当有起义者小组第一次前去访问时，农民们会感到很不安，担心随后军队对他们进行报复。但我的假冒身份有缺点：我表现得太过文雅了。我心里想：“我应该对这两个人加以研究，因为必须寻找让其中一人去搞药的办法。”我在那里跟两人谈了几个小时。其中一人是名副其实的巴蒂斯塔分子，我现在不提他的姓名。他说：“哎，替我向我的将军问好，把这话和那话告诉他。”他是怎样招待我的！另一个人说话比较和善。我对伊萨克——他就是这么称呼的——说：“好了，

你对这个人怎么看？”我是指巴蒂斯塔。他回答说：“你瞧，我是正统党的。”伊萨克提到的那个党是非常反对巴蒂斯塔的。他接着对我说：“哎，但是应该看这个人所干过的事。”他在指巴蒂斯塔。我当时想到很多事，想到他的军队在马埃斯特腊山所干下的烧杀抢劫种种可怕的事情。我意识到那就是我需要的人，我看得很准，他并不真的支持巴蒂斯塔。于是我对他说：“伊萨克，我不是上校，我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他睁大了眼睛，充满了喜悦。

我解释道：“我们有个十分困难的情况，有个同志处境很困难，必须去曼萨尼略找药，还须找个把他藏起来、外人找不到的地方。”我们给了他钱，让他天亮时动身去曼萨尼略搞药。他去了^①。

我们把切·格瓦拉连同他的枪和另一位同志藏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小队中的其他人——当时总共还有 18 人——沿着军队应该利用的那条宽阔和泥泞的道路，朝着米纳斯·德尔弗里奥（Minas del Frío）进发。

在那个年代，我们脚力好，走得很快。打了头几仗之后，吉列尔莫·加西亚^②常常穿着军曹的制服，头戴缴获的钢盔。我们患了心理饥饿症，经常派人在前面准备一些吃的。我们已经到了拉马埃斯特腊^③，却发生了没有搞清楚离我们最近的敌军前进方向的事，而我们当时分散着在执行各种任务。结果：我们 18 个人，6 个走一边，他们全是新加入的农民；我们剩下的 12 人全是乘“格拉玛”号来的，走另一边。

就在那一天，巴蒂斯塔的陆军司令在总司令部哥伦比亚兵营发表演说。

① 何塞·伊萨克（José Isaac），自那第一次向游击队提供服务后，在整个战争进程中他与起义军进行了可贵的合作。1990 年年底卒于哈瓦那。（古巴编者注）

② 吉列尔莫·加西亚·弗里亚斯（Guillermo García Frías），山区农民，出色地参加了为迎接“格拉玛”号远征而做的准备工作，并在阿莱格里亚—德比奥事件后为集合分散的远征战士和回收武器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很早加入了游击队，参加了头两次胜利的战斗。由于他在整个战争中的突出功绩，荣获“革命司令”特殊头衔。自 1959 年起，担任过许多军事和民事要职，现任国家动物植物总局局长。

③ 拉马埃斯特腊（la Maestra）是马埃斯特腊山山区主要山脉坚实土层即纵轴的简称，它从托罗（Toro）河起自西向东延伸，是向南流的河流与向北和西北流的河流的分水岭。卡斯特罗提到的当晚游击队小队进发的目的地米纳斯·德尔弗里奥就是在拉马埃斯特腊的坚实土层上。（古巴编者注）

瞧，多么凑巧！他说：“我们要把这水罐插个底朝天^①。只剩12个人了，他们只能在投降或逃走之间做选择，如果逃得了的话。”切·格瓦拉那时不在，他留在了前面说过的地方。农民何塞·伊萨克完成了任务。

拉：他带回药了？

卡：带回药了。分别时，我交给切·格瓦拉一项任务：迎接弗兰克·派斯（Frank País）正在准备的、将从古巴圣地亚哥送来的支援人员，并加以训练和协调。招募的新战士有个不足之处：经验不足。由于这一原因，一次伏击或其他行动可能会失败。但是他们更加坚决，因为他们想在一个月、两个月或三个月内做到听说其他人需要一年才能做到的事。在那种情势下，招募的兵更好，但必须要有好的、有经验的指挥官。关于这些，只有在几个月之后我们才能发觉。

那些支援人员数周后到了，但由于切·格瓦拉是阿根廷人而产生了问题。他们对待他的态度有点儿沙文主义。

拉：那时还把切·格瓦拉看作阿根廷人吗？

卡：那时他还不是司令员。他那时是我们部队的医生，很出众……

拉：作为游击队的医生。他的表现怎样？

卡：切·格瓦拉跟伤员在一起，细心地照料他们。这是他的特点。作为医生，他跟病人在一起，因为在那种杂草丛生、树林很多的自然环境中，在战士们遭受四面八方追击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称之为主力的队伍就是那支必须打了就跑的队伍。我们转移时必须留下明显的记号，以便医生和伤员在附近地区安全驻扎。在一段时间里只有他一个医生，直到其他医生加入到我们的斗争行列。

第一次战斗之后，我们对伞兵部队进行了一次伏击。如我所说，我们

① 水罐，西班牙的谚语，意思是“我们要捣毁他的巢穴”。（中文编者注）

的武装人员已发展到 30 名。我们在第一次战斗中无人受伤，在第二次战斗中也无人受伤。作为医生的切·格瓦拉就无所作为了。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我们进攻位于海边的乌韦罗兵营（cuartel de Uvero）时^①。那是一次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十分危险的行动，理由很简单。我们当时在山上监视着敌军的活动，以便找机会狠狠地予以打击，突然传来消息说，有些古巴人的武装在该省的北面登陆。他们属于一个独立行动的组织。我们想到了我们在开头的那些日子里所遭受的巨大困苦。为了支援那些登陆者，我们决定进行一次非常大胆的行动，但从军事角度看，行动不是最合适的，因为简单地说，是向一支位于山南海边，离我们的活动区不远并有良好防御工事的敌军部队发动进攻。

那次战斗是个大胆之举，是为了支援一批跟我们都没有关系的人。但他们是些爱国人士，我们知道他们可能会发什么事。当时我们已对自己充满信心，为了支援他们，我们背离了我们的理论原则。我们进行了一次鲁莽的进攻，参加者中三分之一的人惨遭伤亡。行动是在大白天展开的。幸好我们一开始就切断了他们的通讯。因为通讯破坏了，所以那儿没有出现战舰和飞机。

我带着给你看过的那支带望远式瞄准镜的步枪^②。在那个阶段，打第一枪的总是我，那是一种下令开始战斗的方式。请注意那次战斗的火力，在那个木结构据点中有 7 个饶舌的家伙，5 个吃了枪子归天了。行动开始时，我们有两个小队做预备队，他们和我在一起，从一个小高地上射击。必须观察守军怎样反应。据点后面堆着一些树干，因为那儿是林区，从那儿把木材装上船运往古巴圣地亚哥。也有人利用那个大柴堆做掩护，向我们所在的高地开火。士兵们也有几个木头小堡垒，所以其火力很难被压制住，他们从那里向起义军射击。

① 乌韦罗战斗发生于 1957 年 5 月 28 日。

② 2003 年 1 月 19 日，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陪同下参观蒙卡达兵营时，我看到了那支具有历史意义的步枪。

拉：有不少班排长在战斗中表现突出，如吉列尔莫，他带着一个班从西边进攻。会同古巴圣地亚哥小分队的弗里^①和其他勇士，攻占了处于那个方向的小堡垒。

卡：战斗一打响，胡安·阿尔梅达（Juan Almeida）^②就带着他的小分队被派去进攻主堡。已接近主堡时，与位于其行进路线左边的一个据点接上了火，当时他实际上是直着身子射击的。他身中3弹负伤倒地。

拉米洛·巴尔德斯，劳尔那个分队的第二队长，在离劳尔很近的地方报告说，胡利托·迪亚斯眼睛中弹，刚刚在他身旁牺牲了。

虽然遭到巨大的突然袭击和伤亡，但是敌人很快就恢复了状态并全力地投入战斗。

在那样复杂的情况下，我把一开始就和我待在一起的劳尔派去支援正在艰苦地进攻主要目标的同志。那是最后一支预备队。跟我在一起的还剩下塞莉亚（Celia）^③、艾德和参谋部的五六个同志。他们在两个多小时以前，行动一开始就参加了战斗。在这之前，我已命令切·格瓦拉从侧翼迂回，他使用的是一支自动步枪。他跟我们指挥小组在一起。我们见他焦急不安，很想去增援从那个方向进攻的同志，于是我派他带两三个人去那儿增援，

① 阿韦拉多（弗里）·科洛梅·伊瓦拉（Abelardo [Furry] Colomé Ibarra）将军现在是古巴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兼内政部部长。

② 胡安·阿尔梅达·博斯克（Juan Almeida Bosque, 1927—），革命司令。于1952年3月10日发生政变后开始参加反巴蒂斯塔的斗争并在大学认识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参加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行动并被捕入狱，也是“格拉玛号”远征军成员，在马埃斯特腊山参加过许多战斗。1958年晋升少校，被任命为起义军第三战线司令。第三战线在马埃斯特腊山东边、古巴圣地亚哥周围地区。是古巴共产党1957年成立后的历届政治局委员，担任过许多职务，现任古巴革命战士协会主席。

2009年胡安·阿尔梅达·博斯克逝世。（中文编者注）

③ 塞莉亚·桑切斯·曼杜莱伊（Celia Sánchez Manduley），1920年生于如今格拉玛省的梅迪亚罗那镇。青年时期就参加反对腐败政府的斗争，后又参加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斗争。1955年正式建立“七二六运动”后他就加入了该组织并负责在奥连特省西南沿海地区为迎接“格拉玛号”远征军创造条件。在弗兰克·派斯的领导下，他是向马埃斯特腊山游击队输送的第一批平原战士的主要组织者。1957年10月彻底参加了游击队，不久便成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创建起义军后方工作中的主要助手。革命胜利后，他留在卡斯特罗身边工作，1976年起担任国务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直至1980年1月逝世。（古巴编者注）

因为敌人有可能从那个地区获得支援，尽管我们知道敌人的部队处于何地以及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到达。

奇怪的是，那些主要的班排长同时在那次艰苦的战斗中亮相了。其中三人——劳尔、阿尔梅达和拉米洛，都是参加攻打蒙卡达兵营的，也是乘坐“格拉玛”号游艇的远征队队员；其他两人——吉列尔莫·加西亚和阿韦拉多·科洛梅即“弗里”，前者是阿莱格里亚·德皮奥事件后第一个加入我们的农民，后者是弗兰克·派斯送来的圣地亚哥战士。

如我所说，幸好空军没有出现，因为我们的阵地就在兵营周围的高地上，从那儿向敌人射击，如果上面有飞机，那场战斗就会变得十分严酷，或者有军舰用大口径火炮从海上轰击我们毫无防护设施的阵地，那么我们可能在开始行动后最多一小时就不得不下令撤退。他们拥有自动和半自动武器，而且竭力抵抗。那是特种部队的一个连。

切·格瓦拉完成了我交给他的任务。乌韦罗战斗差不多进行了3个小时。敌方死11人，伤19人，受伤者中包括兵营的中尉指挥官。我们牺牲了7名战士，还有8人负伤，其中数人伤势严重。取得胜利后，我们向所有需要帮助的提供了帮助。切·格瓦拉和兵营的军医给受伤的士兵治疗。受伤的士兵比我们的伤员要多。切·格瓦拉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你想象不出那个人的情感！

我们缴获了45支步枪，其中24支是加伦德式半自动步枪，20支斯普林菲尔德步枪，1支勃朗宁自动步枪，近6000发3006型子弹，以及其他装备：手枪、制服、靴子、背袋、子弹带、钢盔和刺刀。

我们带走了一批俘虏，而我们的人中有两个已经动不了了，所以也只好把他们留在那儿。

拉：你们把你们的伤员抛弃了？

卡：我给您讲，我们带走一批俘虏，是为了确保留在兵营中的两名受伤的革命者不被杀害。不是为了在任何情况下进行报复，但是我们这样可给敌人施加压力。假如你手上有十五六个俘虏，你就有了某种保证。留

在那里的是他们的那些不能走路的重伤士兵和我们的两个不能行动的重伤员。我们把能带走的俘虏带走了。

切·格瓦拉给伤员治伤。他知道我们的一位同志，一个优秀的小伙子快要死了。切·格瓦拉做了啥？他亲吻了那个几乎垂死的战士。当他痛苦地把这些讲给我听时，我为之感动。他向我回忆起那一时刻，即当他知道那位受伤的同志已经没有救治的可能，他俯下身去，亲吻他的前额的那个时刻。切·格瓦拉知道那个战士将要无情地死去^①。另一个伤员活下来了。正如我们一贯做的那样，我们自然把我们的其他伤员都带着一起走，包括阿尔梅达。切·格瓦拉同我们一起上了最后一辆卡车。我让队伍先行，随后我们撤退，尽快离开那个地方，我们应该赶到一个地势更高的森林地区，因为包括战斗机在内的敌人的援军随时可能到来。确实如此，驻军中有一个没有被俘而逃走的士兵报告了情况。那时敌人才知道遭袭。

我们把切·格瓦拉连同我们那些能行动的伤员送到一个有人照顾的农业区。为了不留下太多踪迹，只有少量部队随行。切·格瓦拉有几个贴身武装人员，他依靠少量的那几个人给病人治疗。有几支敌军部队正在接近我们。在那次大胆的、挑战性的攻击之后，可以预见到敌人往后会对我们做出怎样的反应。

我们进行了一次长途急行军，穿插于敌军的几路部队之间，向西北方向挺进。那是他们必然要追击我们的方向。那次行军并非易事。切·格瓦拉和他的人员留在了遥远的后方。一个多月之后，他才带着他的小组和几名投奔他的农民，再次与我们会合。那时我们任命的第一位少校（Comandante）就是切·格瓦拉。有两个人表现得很突出：切·格瓦拉和卡米洛。

^① 里戈贝拉托·西列罗（Rigoberto Sillero）是在用飞机送往古巴圣地亚哥的途中死亡的，当时乌韦罗卫戍部队长官佩德罗·卡雷拉斯少尉也在机上，他也在战斗中负了伤。另一名起义军重伤员马里奥·莱亚尔活了下来，在战争剩余的时间中，一直被关押在皮诺斯岛监狱。（古巴编者注）

拉：卡米洛·西恩富戈斯。

卡：是的。卡米洛比不上切·格瓦拉聪明，但也很勇敢，是个杰出的指挥官，非常勇猛，非常人道。两人相互尊敬，相互爱戴。卡米洛早已表现出众，在头几个月的艰难日子里，他就是我们一纵队先头部队的指挥员。现在我们把他派到切·格瓦拉的那个纵队。后来，他挺进平原地区并最终在那里开辟了一条战线。因为没有经验，所以那是很难做的事情。卡米洛非常杰出。

拉：您与切·格瓦拉、卡米洛和您的弟弟劳尔已在那里建立了不同的游击战线？

卡：我从那次战斗后回到海边，就让一部分部队和一些优秀军官，包括卡米洛和其他人，带着他们的人员跟随切·格瓦拉到图尔基诺峰东部建立第二纵队。那儿离第一纵队所在地区不太远。这就是第一战线，由切·格瓦拉指挥的原来的纵队和新纵队管辖。

在那个时期，原来的游击纵队按照运动战的战术活动，打了就撤，没有永久的根据地。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我一直掌控着第一纵队的指挥权。从该纵队派生出了其他纵队。切·格瓦拉指挥的纵队是派生出的第一个纵队，然后是劳尔的纵队。劳尔纵队横穿马埃斯特腊山，到达东部地区东北部山区。他带着50个人展开行动，第一次穿越平原，向那个方向挺进。他们干得很漂亮，建立了东部第二战线。在那辽阔而遥远的地区，劳尔有权组建纵队和任命指挥官。很快又组建了胡安·阿尔梅达的纵队，即第三纵队，以便开辟第三战线。

先后组建的新纵队，包括卡米洛和切·格瓦拉的纵队、劳尔的纵队、阿尔梅达的纵队，以及在敌人的最后一次进攻前后，在东部、东部的西北地区和中部建立的其他纵队，都出自第一纵队。

拉：您那时就毫无疑问地认为切·格瓦拉是位优秀的领导人吗？

卡：他是个典范，他在部队德高望重，有很大的影响力。我认为他是

革命者的榜样。

拉：有人说，他的个性也许过于冒险。

卡：他大胆勇猛，有时更喜欢一支用地雷和其他战争手段装备起来的部队。相反，卡米洛更喜欢一支轻装的部队。切·格瓦拉有激进倾向，有时候可以避开的战斗，他不避开。这又是跟卡米洛不同的地方。切·格瓦拉勇敢无畏，但也承担了太多的风险，因此有时我对他说：“你要对跟随你的那些部队负责。”

拉：他有时过于鲁莽？

卡：如果对他的大胆和鲁莽品性不那样予以约束，切·格瓦拉就不能在那场战争中活下来。你看，敌人发动最后一次进攻时，卡米洛、切·格瓦拉和其他司令官都不在第一线。我把切·格瓦拉派到新兵学校，那里大约有 1000 名新招募的新兵。巴蒂斯塔发动最后一次进攻时，拉米罗·巴尔德斯和吉列尔莫·加西亚待在其纵队战斗的地点。后来，我把他们俩都调来加强一纵队，但是切·格瓦拉被派到了学校并让他负责第一战线最西边一段的防务，从那儿迎击敌人的进攻。

拉：您这样做是为了避开过大的风险吗？

卡：是的，因为他们都是指挥官。为了在以后的战略行动中使用他们。有些战略意义的是在第二战线的劳尔纵队、在圣地亚哥战线的阿尔梅达纵队、在拉斯比利亚斯的切·格瓦拉纵队，以及开始前往比那尔德里奥的卡米洛纵队。

拉：我们在反击进攻的斗争中失去了一些非常杰出的指挥官。在第一纵队前线，我几乎已无指挥官可用。但上述这些同志都是很可靠的人，他们所到之处，带去的是同一学派、同一个对待民众的政策、同一个对敌政策；熟悉我们在艰难和危急的战争岁月里获得的全部经验，而他们

每个人都在为战争不断做出新贡献。

卡：巴蒂斯塔的最后一次进攻之后，我们把切·格瓦拉作为纵队司令派到拉斯比利亚去。他带走了140人和最好的武器，带走了缴获的一个火箭筒、优良的装备和优秀的战士。卡米洛也一样。所以我们挑选了两个杰出的指挥官，尽管卡米洛带的装备比较少。但是，当他们出发时，那地区遭到了热带飓风的袭击，大量的雨水使河流泛滥，淹没了田地。此外，两个纵队必须穿越卡马圭平原，要走400多公里的路程。在那儿，“七二六运动”的力量较弱，而巴蒂斯塔的部队却拥有空军支援。他们忍饥挨饿，各种给养严重不足。这些在卡米洛和切·格瓦拉的历史性文件中都有记载。

在摩托化步兵和空军的时代，那些人竟然能徒步穿越那些平原和沼泽地，真是非凡的英勇壮举。在这样的逆境中，他们成功地进行了几次战斗。这一英雄业绩已写成了文字。卡米洛起草了一份详尽的、动人心弦的报告。切·格瓦拉在其征战日记中做了描述。他后来根据自己的日记写了一本书，书名是《革命战争片段》。他有把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的习惯，具有杰出的叙述才能，非常简洁、非常概括的叙述能力。他后来在玻利维亚写的日记，是简洁和概括的奇迹。

拉：打断一下，请问你们什么时候决定蓄须，作为起义象征的？

卡：胡须的故事很简单。那是在我们游击队的艰苦生活条件下产生的。我们既无剃须刀，也没有刮脸的小刀。我们在深山中，看到大家都长了胡子，披头散发，最后这就成了一种识别身份的标志。对农民和所有的人说，对新闻界、对记者来说，我们是“大胡子”。这有其积极的一面：必须早早提前做准备，才能将某个特务打入游击队，因为他至少需要6个月才能蓄起胡子来。就这样，胡子成了识别和保护要素，并逐渐变成了游击队员的象征。革命胜利后，为了保存这个象征，我们保留了胡子。

除此之外，胡子有其实际好处，即不用每天刮脸。如果您将每天15分钟的刮脸时间乘以1年的天数，就会知道差不多每年要用5500分钟来做这件事。每天工作8小时，就是480分钟，这意味着若不刮胡须，你1

年就多了 10 天时间可用于工作、读书、体育锻炼，用来干你想干的事。

拉：这还没有说到节省了刮脸刀、肥皂、洗涤剂和热水。因此，蓄须有其实际好处，还更节约。唯一缺点是首先变白的是胡须，所以一些蓄须的人，一旦出现了白胡须。马上就把它剃掉，因为这时没有胡子比留着胡子更能掩饰其年龄了。

1958 年 4 月爆发了一次反巴蒂斯塔的总罢工，但是您在山上不支持罢工，为什么？

卡：总罢工在 1958 年 4 月 9 日那天爆发并失败。我们当时并不赞成罢工。“七二六运动”的领导批评我们，甚至说我们没有意识到革命进程已经达到的成熟程度。然而，由于运动的领导同志向我们转达了对罢工的信心，我在举行罢工的号召书上签了字。我们还在所在的地区对敌人武装展开了猛烈的军事运动，具体地支持了罢工。

存在着分裂，而且带点儿排斥性。例如：虽然在工会中共产党干部的影响巨大，却存在对共产党人的偏见。在山上没有这种事。在“七二六运动”内部，有的干部把我们看作是一些搞煽动的人。我们赢得了声誉，搞乱了巴蒂斯塔的生活。他们想，在地下战士和游击队的斗争推动下，与“七二六运动”联合搞一次军事政变，那场斗争就将结束。我们不这样看自己。我们把自己看作是一支小军队的胚胎，它富有经验、勇猛无畏，在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包括革命总罢工，终将打垮敌军。

拉：这就是最终发生的事。

卡：这就是所发生的事。但 1958 年 4 月那次罢工的失败很严重，因为造成了士气低落，却鼓舞了敌军，致使其对我们发动了最后一次进攻。

他们出动了 14 个营和许多独立的步兵、炮兵和装甲部队，总共 1 万兵力，在空军和海军支援下，向第一纵队的前线阵地、总司令部和起义军电台驻地发起攻击。他们以为这样的进攻不可能顶住。这是我们首次寸土必争地保卫我们的阵地，而在他们发起攻击时，我们还不到 200 人。我决

定调动其他战线的队伍。卡米洛在平原作战，我让他向我们的战线移动；我向阿尔梅达发出了相同的指令，叫他派一部分力量来支援我们。阿尔梅达的部队已在马埃斯特腊山的东部地区，靠近圣地亚哥的地方开辟了另一条战线。我没有要求前来支援的部队是劳尔的部队，因为他们离得太远了。连续战斗了70多天。

最后那次进攻被击退后，我们的力量从300人增至900人，装备着从敌人那里夺来的武器。依靠武装起来的那900人，我们几乎征战全国。反击结束后，我们组建，或更确切地说，重组了各纵队。首先，我们从新装备和加强了两个很强的纵队：切·格瓦拉纵队，140人；卡米洛纵队，90人。我们靠这两个纵队，横扫了半个岛屿。它们人数似乎不多，实际上确实不多，但从打击能力看，它们是令人可怕的。卡米洛纵队应继续向比那尔德里奥进发，但我们让其停在了圣克拉拉。

拉：为什么？

卡：为什么我们拦住卡米洛，不派他去比那尔德里奥呢？简单地说，因为在我们脑海里的种种事件中还包括1895年独立战争中的进军史实，而这一史实的影响很大。但是，当卡米洛抵达中部时，向那儿进军就没有战略意义了。另一方面，从拉斯比利亚斯那里的具体情势看，最好让卡米洛去加强切·格瓦拉应在那个地区进行的军事和统一政治的行动。我们发觉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情况完全变了，向比那尔德里奥进军已没有意义。于是，我适时指示卡米洛：“在中部停下，与切·格瓦拉会合。”

拉：巴蒂斯塔的最后一次进攻失败后，您决定转入反攻吗？

卡：各路起义军星星之火四处燎原，所向披靡，无人能挡。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就控制和包围了巴蒂斯塔最精锐的部队。在奥连特省，包括野战军和卫戍部队，总共有不少于1.7万名敌军，他们已无路可逃，谁也逃不出奥连特了。自从“格拉玛”号登陆后，战争就在那儿展开。

敌人拥有的3艘护卫舰，有两艘被困在古巴圣地亚哥湾，无可逃遁。

我们从敌人那儿缴获了 8 挺机枪，从几个制高点完全封锁了海湾的狭窄出口。它们可向船甲板扫射：

战争结束后我参观了那两艘护卫舰，发现在机枪的火力下，它们将陷于瘫痪，指挥台也将不复存在，甲板上的任何一门炮将不能发挥作用，因为建造那些护卫舰是为了在海上攻击数公里以外的目标，而不是为了攻击安置在只有 300 米远的高地上的 8 挺机枪。那些舰只指挥台的金属和玻璃，在那些口径的武器面前是脆弱易破的。它们将是无自卫能力的。

拉：那时您建议您的军事对手“体面撤离”。您的建议是什么？

卡：敌野战军司令欧洛希奥·坎蒂略将军，应他本人的请求，在 1958 年 12 月 28 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会晤是在帕尔玛索里亚诺（Palma Soriano）附近的一个破旧被毁的制糖厂——“东方蔗糖厂”举行的。那家伙不是打手，也不能把他看作是无可救药的吸血鬼，他具有一定的声望，是巴蒂斯塔于 1952 年 3 月安置在军中的少数几个学院派军官之一。当巴蒂斯塔投入 1 万兵力进攻我们时，他甚至还给我写了一封信。我给他回了信，因为他对我说，他对正在发生的事感到遗憾，说我们都是勇敢的人，说他为国家将要失去像我们这样的人而感到痛心。我对他表示感谢，回答他说，如果他能打败我们，就别为我们的命运感到遗憾，因为如果他们能战胜其将会遇到的顽强抵抗，那么我们将书写历史的一页，就连进攻我们的士兵的子女有一天也会感到钦佩的一页。我们的答复是高傲的，但不失绅士风度。

我不时地跟他有书信来往，比如当我们要释放数百名敌人俘虏时。我们很多时候与被围困或处境困难的部队的指挥官交换书信，劝其投降。这是一种斗争方式和方法。28 号那天；坎蒂略非常信任地来了，也跟我谈了。他是乘直升机一个人来的。瞧，这是什么样的安全水平！我记得他对我说：他承认已“输掉战争”，并求我提供一个结束战争的处方。我回答说：“好，我们可以挽救许多没有罪行的官兵。我建议你让古巴圣地亚哥的卫戍部队起义，以便给它一个加入起义军的军—民行动方式。”坎蒂略还是国家东

部地区所有驻军的司令。他同意，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们商定了日期。我对他说：“这件事发生后，24小时内巴蒂斯塔将会下台。”

然而，他要去哈瓦那，理由是他有个兄弟也是陆军高级军官，担任驻马坦萨斯的那个团的团长。我对他说：“您为什么要去哈瓦那？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风险？”

一位前陆军军官，何塞·克韦多少校，随我一起参加了那次会晤。他是一个在埃尔希圭（El Jigüe）被围后被迫投降的营的营长。这个营在1958年7月11—21日向我们猛烈攻击了10天。这个营的俘虏立即交给了国际红十字会。这位军人后来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有声望，由于在我军服役多年，按其表现，最终荣获我军将军军衔。

拉：他参加了起义军？

卡：他在埃尔希圭被包围了，我在那儿认识了他，因为在敌人最后一次进攻的日子里，包围他、与他那个营作战的部队，由我直接指挥。有好几个营包围了我们，而我们包围了那个营。我们的包围很严紧，而他们的包围只是战略性的。我们把克韦多的那个营打垮之后，也就打破了平衡。我们抓了许多俘虏，他们的伤亡很大，我们还缴获了大批武器。我们没有立即宣布胜利，让敌人不清楚最后结局。

48小时后我们才宣布，那时我们已武装了新战士，已调动部队扑向其他的营，一刻不停地对它们实施包围。

拉：您准备进攻古巴圣地亚哥吗？

卡：这发生在敌人的进攻于8月被粉碎5个月之后。由于跟坎蒂略的会晤和达成的协议，我们停止了12月月底对圣地亚哥的进攻。我们准备投入大约1200人来实施这次进攻。他们有5000人。然而，对我们来说，从未有过这样有利的力量对比。我们准备采用与在马埃斯特腊山使用的相同战术：在城内围点打援。根据我的估计，那次战役大概要持续5天。我们已经通过小海湾给在圣地亚哥城里的战士偷运去了100支

枪，因为第5天将进行该城的起义。包围4个营，4场攻打援兵的战斗，最后起义。

我们已经推迟的那场战斗最多要持续6天。本应于12月30日左右开战。与坎蒂略会晤后，我们等待履行与那位军事长官达成的协议。卡米洛在亚瓜哈伊（Yaguajay）围住了敌军的一个营，而切·格瓦拉正在进入拉斯比利亚斯首府。

拉：您在等待与敌军司令达成协议以便结束战争？

卡：是的。那个坎蒂略将军终于去了哈瓦那。我向他提了3个条件，而他答应了。我对他说：“好吧，既然你决意要去，那就去吧。但是第一，我们不想在首都搞政变。”我们把在首都政变的事作为首要条件。第二，“我们不希望有人帮助巴蒂斯塔逃跑。”第三，“我们不想与美国大使馆接触。”这是3个基本的、很明确的条件。将军接受了，动身去了哈瓦那。

商定的时间过了，却没有任何有关他的消息。他走时让圣地亚哥的卫戍司令与我联系。总而言之，坎蒂略做了3件相反的事：第一，1958年12月31日晚上跟巴蒂斯塔共进晚餐并把他送上飞机，巴蒂斯塔将乘机与一批将军离开国家；第二，支持在首都的政变并委派最高法院中最年老的成员，一个名叫卡洛斯·皮埃德拉的法官担任政府首脑；第三，他当然已与美国大使馆取得联系。怯懦的背叛！

拉：当时您做了什么？

卡：1959年1月1日我们做了什么？1953年7月26日以后，5年又5个月零5天——精确的数字，这是自攻打蒙卡达兵营之日起经过的时间，包括大约两年的囚禁，差不多两年在国外做武装返国的准备，另外两年零一个月战争。

1月1日，当我们通过电台得知巴蒂斯塔已经逃亡，而首都正在筹划一场政变时，我们马上朝着起义者广播电台当时的所在地，即帕尔玛索里亚诺城赶去，向我们的部队发出指令：“你们一刻也不能停，不要接受停火。”

我们命令各纵队：继续前进，继续战斗，并号召劳动者和全国人民举行革命总罢工。

劳动者们一致决定罢工，甚至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将其频率调至与我们的短波电台——只有1千瓦功率的起义者广播电台相同的频率。这样，我们就能通过全国的广播电台和刚出现的电视台的频道讲话，通过这一途径向各部队发布指令。我就是这样向全体战士和全国讲话的。

拉：当时大部分工会控制在一批黄色·^①的、亲巴蒂斯塔和亲美的人手里。然而，古巴劳动者们跨越了各种机构，步调一致地支持罢工。

卡：我坐着吉普车，沿着山边朝圣地亚哥进发，准备从城北进入。路上我遇到了几位正要加入我们行列的穿制服的人。因为有协议，所以我先与圣地亚哥卫戍司令取得联系。在这之前，我们已经交换了几封信，产生了某些疑问，因为他没有明白我对他说的话。我说：“假如到30日未履行协议，我们将发起攻击并在驻军投降前不会停火。”他给我写了一句话：“士兵们不会不战而降，不会不体面地交出武器。”我回答他说，我没有胁迫他投降，而是提醒他，一旦战斗开始，就不会停火，直至驻军无条件投降。

他答复我说：“请相信将军”——他明显是指坎蒂略将军，并向我提供了一架直升机，以便在古巴圣地亚哥上空转上一圈。我为头天晚上两名青年被杀害一事向他提出抗议并表示我不需要任何直升机。他对罪行感到遗憾。现在我从帕尔玛索里亚诺城赶往城北的埃尔卡内伊（El Caney）镇，那里的兵营正是我在1953年7月26日攻打蒙卡达兵营后想攻占的那一个。圣地亚哥卫戍部队和驻在城里的野战部队的军官们前来迎接我，他们热情洋溢地欢迎我。我与大约300名军官会晤，保卫古巴圣地亚哥的军队的300名军官！

^① 黄色工会：法国蒙索明市的一个厂主于1887年收买工会头目所组织的假工会，用以破坏工人罢工。当时工人打碎了这个工会会所的玻璃窗，资方就用黄纸裱糊，故称黄色工会。（中文编者注）

我与他们讨论问题，向他们解释与欧洛希奥·坎蒂略将军达成的而他并没有履行的协议，解释背叛行为。他们支持我们，站在我们的一边。我委派那些部队的负责人担任军队余部的司令。

劳尔说，当我通知他我已任命何塞·M. 雷戈·鲁维多（José M. Rego Rubido）上校为卫戍司令和军队司令时，他出于纪律而接受了，但并不理解，还说：“他应该明白他正在干的事。”为履行诺言，雷戈·鲁维多当了一段时间的军队司令。

拉：与此同时，卡米洛和切·格瓦拉正在进入哈瓦那吗？

卡：不，切·格瓦拉正在攻打圣克拉拉城，已经占领了警察局。开来了一列防护严实的装甲列车。切·格瓦拉的部队破坏了几段铁路，把列车分隔在城外。装甲列车后退时出轨了。车上的所有武器成了战利品，士兵们当了俘虏。

坎蒂略将军没有履行协议。就在1月1日那天，我向卡米洛和切·格瓦拉下达了有关指令：“向哈瓦那挺进。”我对卡米洛说：“你朝哥伦比亚兵营方向前进”；对切·格瓦拉说：“你朝拉卡瓦尼亚（La Cabaña）方向前进。”当时他们还在为攻占其各自的目标而战斗。但是很明显，在独裁统治垮台、总罢工如火如荼的时候，切·格瓦拉和卡米洛实际上只需一天时间就能打垮剩余守军，进行整编和拔营。我认为他们在当天晚上或第二天就急速出发了。那时我通知他们：“沿中线公路全速前进。”巴蒂斯塔那班人的精神状态坏透了。切·格瓦拉和卡米洛组织了两个纵队，向首都挺进。几小时之后就抵达了，就达到目的了。没有人进行抵抗，他们无须放一枪一弹，我们在城内的人差不多已占领一切。对手完全丧失了士气，全国处于瘫痪状态，各城市纷纷起义，各地人民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

拉：哥伦比亚和拉卡瓦尼亚是哈瓦那的两个大兵营吗？

卡：是的。瞧，哈瓦那的第一要塞是哥伦比亚，卡米洛正向那儿挺进。

军队的参谋部就设在那个据点。切·格瓦拉正在向另一个要塞拉卡瓦尼亚进军。时机十分有利。他们是两支强大部队的指挥官，没有东西能阻挡其前进。卡米洛攻克哥伦比亚兵营后，就投入部队的改组工作，因为他在哥伦比亚兵营引入了美国顾问。这些顾问在那儿生活得十分安宁。

切·格瓦拉在占领要塞、结束战争之后，立即开始组织那些农民上课，开始建立学校，培训他的人员。他把实行其扫盲计划和培训战士作为军事长官的首要任务。

在哥伦比亚兵营，卡米洛找到了几名旧军队的军官。他们因为密谋反对巴蒂斯塔而被囚禁在皮诺斯岛，即今日的青年岛，1月2日政权垮台后出狱。他们有一定的声望，其中一名上校——曾是这批人的头头——想组织那支旧军队，想保持那里的人的士气。他们出狱后直接去了哥伦比亚兵营，他们先于卡米洛到达。如果乘飞机，从皮诺斯岛到首都只有几分钟的行程。他们坐在参谋部，希望跟我在圣地亚哥说话。我答复道：“请转告巴尔金上校”——一名上校，那批被囚军官的领导，曾在美国求学，“在哥伦比亚我只跟卡米洛说话，而在拉卡瓦尼亚只跟切·格瓦拉说话”。

他们企图另做安排，找一条出路，但我们没有给他们任何机会。

在那种形势下，在拥有人民——街道和国家的主人——全力支持的情况下，一分一秒都没有浪费掉。

拉：坎蒂略将军怎么样了？

卡：坎蒂略被捕了，被判了几年徒刑。后来我们把他释放了。

拉：您是什么时候进入哈瓦那的？

卡：我2号离开圣地亚哥去巴亚莫。总部设在巴亚莫的野战部队曾经与我们激烈交火，这时已与埃尔卡内伊的300名军官会合，并在我跟他们在巴亚莫的一个体育场会晤后就立即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实际上，他们以难以置信的热情欢迎了我。真是难以解释的事。我率领1000名起义军战士向哈瓦那进发，那边有关旧军队的情况即将明确。我试图把那2000名

士兵以后留在我们的军队里。这是十分艰难的事。

我邀请那 2000 名士兵带着武器加入我们的部队。他们拥有我们不能操纵的谢尔曼式坦克、大炮等等。因为在切·格瓦拉和卡米洛到达时，在首都那边还没有最后明确，所以我就做了那个决定。我带着 3000 名起义军战士和 2000 名旧军队中最精锐的野战部队的士兵前往哈瓦那。那些士兵在最后一次进攻中曾对我们进行残酷的攻击，先是在马埃斯特腊山，几天前在吉萨（Guisa）、拜雷（Baire）、希瓜尼（Jiguani）和马福（Maffo）。在这些战斗中，他们也许损失了一半人员，我常常替他们医治伤员，释放俘虏。而如今，他们准备与我们并肩战斗。他们随我而战，操纵着我们的人当时不会使用的坦克和其他重武器，感到满意。他们见证了公众的洗礼，见证了人民的海洋。

我花了 8 天时间才抵达哈瓦那，因为在每个省会都必须停留，参加热烈的群众性集会。只有乘坦克才能过去，不能乘坐别的车辆，否则会被踩扁。在首都没有抵抗，那儿是头 72 小时中唯一的危险之地。罢工在继续，当什么都不缺的时候，人们就热情地支持罢工。到后来，所有的人实际上都像在过节一样。

我于 1958 年 1 月 8 日到达首都。在我那已经安排好的行程中参加了各种活动，我去了西恩富戈斯，那是在叛逆的学生年代被囚禁的地方，也是海军士兵跟随革命人士英勇起义的地方。切·格瓦拉和卡米洛在他们坚固的阵地上等候我。在哈瓦那，“七二六运动”自第一天起就占领了所有的警察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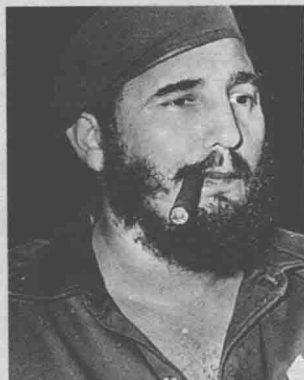
拉：自 1 月 1 日？

卡：是的，我们自己的人。早在卡米洛和切·格瓦拉到达之前，“七二六运动”的行动和破坏小组的人员已占领了所有的警察局。许多人在斗争中牺牲了，是些非常勇敢的人，但他们没有，比如说，没有山上的那种老练。许多平原战士情愿冒城市中的生死风险，也不愿意做上山下山那种牺牲。有许多人，他们在城市中是优秀的战士，却是糟糕的游击队员，因为在游

击队，最苦的是上下爬山，体力上需做出巨大的努力和艰苦的牺牲。游击战是这样，游击队员也得这样。

拉：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卡：我军最后成长得很快。根据我的估算，1958年12月只有3千名武装人员。到1959年1月1日，即用了数周时间，我们夺取了所有的武器，军队人数增至4万。3000名战士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赢得了战争。不能失去时间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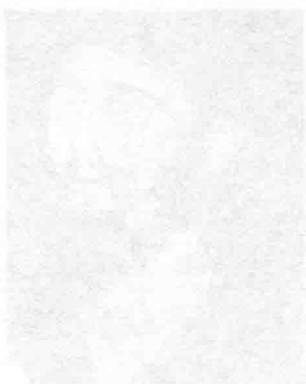
我
的
一
生

第九章 游击队的经验教训

在古巴革命（1953—1959）中，在不利的环境下，胜利是属于那些能够以革命手段来对付敌人力量十倍用之武装力量的人。那些武装力量在革命初期对敌人力量进行猛烈攻击，使敌人感到自己的力量——包括军事力量在内——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发挥了自己的特殊力量，使成千上万的人加入革命，使革命力量互相团结，使革命力量得到政府，使革命力量壮大，使革命力量胜利。我们战胜了敌人的力量，使革命力量胜利。

但是，我们并没有使用了一种特殊的人，而是使用了革命的手段。我们使用了革命的手段，使革命力量壮大，使革命力量胜利。我们战胜了敌人的力量，使革命力量胜利。



暴力和革命—对农民的伦理—对俘虏的态度—山上的战时
法庭

新式革命时期到革命时期

拉：您认为赢得了那场战争是由于您的军事战术呢，还是您的政治战略呢？

卡：是两者。早在入狱之前，我就有在马埃斯特腊山上作战的计划，是全部计划。我已对您说过，我们开展一场打了就跑的运动战。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攻击，再攻击。许多心理战。焚烧甘蔗田，以便骚扰巴蒂斯塔，迫使他调动和分散军队，使其失去大地主的资金和支持。破坏交通运输线。对我们来说，游击队是一个进程的引爆物，其目标是革命夺取政权，极点是革命总罢工和全国人民起义。

拉：您把宝押在了非正规战。为什么？

卡：我一直相信非正规战的能力。历史上，自亚历山大（Alejandro）和阿尼瓦尔（Aníbal）时代起，在所有的战争中，胜利总是属于那些在排兵布阵、利用地形和战术方面善于使用运动秘密计谋的人。那些战略家们有多少次是利用太阳和风来对付其敌人的？谁更善于利用自己的资源——有时甚至包括大自然这个资源——谁就能获胜。

我们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想法子去克服巨大障碍，去打败一个有 8 万装备精良的军队支持的政府。我们的资源很少，因此对其使用，比如对武器和人员的使用，必须做到最佳化。这就是我们的根本问题。

但是，我们很快就使用了一种迷惑敌人、迫使其按照我们的想法行事的战术。我是说，使用了挑逗敌人、迫使其运动的战术，这一战术的依据是我们逐步发现的、我已对您说过的那个原理，即对手在其阵地上是强者，在运动时是弱者。我们使用了迫使敌人上路，以便在他们变得最脆弱的时候和地点进行攻击的战术。

应该明白，比如在林中，一支 400 人的队伍成纵队前进，有的地方只允许一个一个地通过，所以一个成纵队行进的营的战斗力的很小的，兵力不能展开。我们消灭其先头部队，攻击其侧翼；然后，当他们撤退时，在预先选好的地点伏击其后卫。总是进行突袭，但是在选定地点。这样，我们最后对那种战术运用自如，屡试不爽。

拉：你们发展了伏击战术。

卡：对，伏击就像战争那样古老。我们丰富了伏击的方式。我们总是首先伏击其前卫，这在许多情况下可使敌人在失去其前卫后全队撤退；然后攻其两肋；最后，当他们撤退时，就伏击其后卫。当一支丧失了士气的部队企图返回其出发地时，其前卫就变成了后卫。

你在一条路上搞两三次夜袭，敌人就会放弃夜间出动。白天，如果敌人徒步行军，你就在其行军时攻击之；如果他们乘车行进，你就在其上坡时或在山间土路上行驶得很慢的时候发起攻击。你可用自动武器攻击，如果你有这种可能或拥有这种武器的话，或者用你所掌握的武器进攻。如果他们使用装甲车，你就使用地雷。假如你未能予以突然袭击，你就应该发明其他战术。

永远应该抢在别人前头。突袭，再突袭。在他们想象不到的地方和用他们想象不出的方式进行攻击。如果他们不出动，你就把守军团团围住。被围的部队总是盼望援军。当他们盼不来援军时，就投降了。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知道，革命军队尊重俘虏的生命和人身安全。

拉：但是我想，对你们来说，军事服从政治。最重要的是军事战略吗？

卡：假若从一开始就建立了政治战线，实现了我们所建议的各种反对巴蒂斯塔的力量的团结，那么那个政权就会自己倒台，也许不用再流一滴血。这些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战术。我们在谈论战术，谈论怎样赢得战争。我们的战术表明，在古巴的具体情况下，它们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最正确的战术。因此，我常说应该执行一种对民政策和一种对敌政策，否则你

就不可能获胜。你不能杀害无辜者，你应该在战场上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能为使用暴力开脱罪责的方式了。

拉：你们进行了一场不正规的战争，但是决心遵守战争法？

卡：是的，因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心理因素。当敌人终于钦佩和尊重对手时，就取得了一种心理上的巨大胜利。人家钦佩你，因为你已经打败他，因为你给了他沉重的打击，还因为你尊重他，因为你没有拷打任何一个被俘的士兵，没有侮辱他们，没有辱骂他们，特别是因为你没有杀害他们。我们对对手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时刻终于到了。他们尊重我们，因为他们知道通常战争是怎样的，知道在所有的地方都是冷酷残忍地对待战败者的。

拉：你们把尊重俘虏作为一条原则吗？

卡：反对拷打。因为激发我们跟那个政权斗争的东西正是它进行谋杀和拷打的事实。我曾经对指控我们践踏人权的人说过：“请你们找一找有无庭外执行的事例，找一找有无拷打的事例。”

拉：自革命存在之日起吗？

卡：自革命胜利之日起，自更早，自我们在蒙卡达开始斗争或后来在1956年登陆之日起。记得有一次，在60年代剿匪斗争中，我们的一名指挥官开始使用一些吓唬人的办法，如把一些俘虏放到水池中，把另一些人装上直升机，不是要把他们扔下去，只是想吓唬他们。我得知消息后，马上到发生此情况的埃斯坎布拉伊。他们受到了严厉批评。虽然他们没有做出伤害俘虏身体的事，但那是一种精神折磨，是不可接受的。

此外，实行严刑拷打的警察或情报部门，他们不使用我们所使用的方法，特别是深入调查取证的方法。一个人被捕后，他不记得某某天到过哪儿，而我们的情报机构却知道，因为他们记下来了。如果问你：“去年5月某天某时你在做什么？”你就不记得，而被捕的人也一样。“跟谁在一起？”“把

武器交给谁了？”总是要有确凿的证据才逮人。深入调查的作用很大，严刑拷打的方法不可取。

拉：你们是创立不抢农民东西、不强奸妇女、不拷打俘虏的思想的第一支游击队吗？

卡：不，不，绝对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不相信越南爱国者们或阿尔及利亚爱国者们会强奸妇女或抢农民东西，他们开始斗争是在1946年和1954年，都比我们早。我不相信。过去的许多斗争都遵守这些原则，我没有任何与此相反的证据。

我不信在苏德战线后方抗击德国士兵的人曾拷打过什么人或强奸过妇女，因为搞烧杀奸抢的人是革命者与之斗争的反动独裁政权的军队，尽管谁也不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战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想发生过一些人枪杀另一些人的事情，因为毫无疑问，纳粹军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但我真的不知道苏联抵抗运动的人是如何对待被俘的纳粹分子的。我想他们不能像我们那样做。如果把那些法西斯分子中某一个释放了，那么第二天他又会杀害苏联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在那样的情况下，假如使那些法西斯分子丧失战斗能力，我将认为做得完全有理。

1910年墨西哥发生了一场延续多年的激烈的革命；1936年在西班牙也爆发了血腥的战争。

拉：两边都有暴行。

卡：在西班牙，甚至后方都有战斗。这给了海明威创作灵感，写下《战地钟声》（*Por quién dobla las campanas*）（又译《丧钟为谁而鸣》）这部

小说^①。西班牙内战中在后方发生的故事，对我们是有用的东西，可以了解共和政府游击队员在佛朗哥军队的后方是如何夺取敌军武器的。那本书帮助我形成了在古巴开展非正规战的思想。

拉：是海明威的那本小说吗？

卡：是的，因为对那本书记忆很深……改天谈它时我给您讲。

拉：为什么不现在给我讲？

卡：好吧，如果您愿意的话。瞧，我第一次读《战地钟声》是在学生时代。我后来应该又读了不止三遍。我也看过后来拍的电影。我喜欢那本书，因为如我对你说的，它讲述了在一支常规军的后方开展的斗争。它给我们讲述后方的生活，阐明游击队的存在，以及游击队如何能在表面上被敌人控制的地区活动的。我是指海明威在那部小说中对战争所做的非常准确的描述。

我们从直觉感知，从政治和军事角度看一场非正规战可能会是怎样的，但《战地钟声》让我们看见了那种经验。因为海明威在他所有作品中对事物的描述都是十分现实主义的，十分明了和清晰的。一切都是现实的，一切都是令人信服的。读了很难忘掉，因为就像亲身经历似的，因为他具有把读者带到残酷的西班牙内战舞台上的才能。后来，我们通过自己在马埃斯特腊山的活动体验了那种游击队生活。当然我们还读过其他许多关于这个题材的真实的或杜撰的事情的书本或文章。我们试图为在我国特殊条件下的斗争建立一种伦理。

我要再次对您说：不能讲我们是唯一遵循一种伦理的游击队。

^①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美国作家，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班牙内战时期（1936—1939）是驻西记者。这一经历促使他后来在哈瓦那双世界饭店525号房间创作了《战地钟声》（*For Whom the Bells Toll*）一书，1940年出版。导演萨姆·伍德于1943年在好莱坞将此书改编拍成同名电影，获得巨大成功。

拉：但你们使那种伦理成为一个基本原则。

卡：在这儿，要是没有那种伦理学，战士们也许会随意枪杀俘虏，也许会为所欲为。对不公正和对罪恶的仇恨是很大的。

拉：比如说，你们有没有用恐怖主义对付巴蒂斯塔的军队或搞暴力袭击？

卡：我们既不搞恐怖主义，不搞暴力袭击，也不搞暗杀活动。你知道，我们反对巴蒂斯塔，但从未想袭击他，尽管我们能做到。他是很脆弱的。比较而言，更困难的是在山上跟他的军队作战或尝试攻占由一个团保卫的某个要塞。1953年7月26日那天，蒙卡达军营中有多少人？将近1000人，或许更多。

准备一次针对巴蒂斯塔的袭击并消灭他，这要容易上10倍或20倍，但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历史上有过用诛除暴君来搞革命的吗？产生暴政的客观条件没有丝毫改变。

攻打蒙卡达要塞的人们可以在巴蒂斯塔的庄园或在路上把他干掉，就像对特鲁希略和任何其他人那样。但我们的想法很清楚：暗杀不解决问题。反动势力会安置另一个人来替代死去的那个并把死去的那个奉为他们的烈士。暗杀的不宜性是很早以前革命学说培育的一个老见解。

关于通过抢劫银行来筹集资金的做法是否正确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许多争论。在苏联历史上，有人指责斯大林搞过几次那样的抢劫行动。无论是暗杀的理论，还是通过抢劫来筹措资金的理论，都是有悖于最起码的常识的。这后一种理论在古巴已是声誉扫地。当时的古巴是个资产阶级特性的国家，那儿的金融机构是非常受尊重的。这不是伦理问题，简单地说是个实际问题：你是帮助革命，还是帮助敌人。

拉：那么可能伤及无辜的暴力袭击理论呢？

卡：如果说的是战争，那么我们根本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仗打了25个月，而在第一纵队开展的任何一场战斗中，我不记得有过平民死

亡的事例。应该问问其他战线的指挥官，在他们的军事行动中是否有过这种事例。

对我们来说，不能牺牲无辜者的原则是一种哲学。那是个一贯的原则，几乎是一种教条。有过“七二六运动”的地下战士投放炸弹的情况，这属于古巴革命斗争的传统做法，但我们不愿意这样做，我们不赞成这种做法，在那些可能有危险的战斗中，我们是真正关心平民安全的。

对了，你看了蒙卡达兵营，我们给你解说过那次计划。那儿没有一个冒着危险的平民，唯一冒着危险的平民是我们这些武装起来的革命者。

拉：看起来你们提出了减少死亡包括巴蒂斯塔的士兵死亡的口号，这是真的吗？

卡：对于在战斗中死亡的敌军士兵，我们不怎么关心。我们关心的是在战斗中投降或被俘的人。如果你置之不顾，你就不能获胜。有些原则是战争和政治的基本原则。这与慈悲为怀行为无关。伦理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伦理，如果它是真诚的，也能结出果实。

拉：现今，在世界许多地方，一些暴力组织寻求通过盲目袭击和恐怖活动来达到政治目的。您不赞同这些方法？

卡：我对您说，依靠恐怖主义是赢不了任何战争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你只能招致你为了打赢战争而需要的那些人的反对、仇视和唾弃。

因此我们拥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的支持。假若我们在古巴屠杀无辜的人，您认为我们还能获得这样的支持吗？假若我们投放炸弹、杀害俘虏的士兵、杀害平民，您认为我们还能获得我们所获得的那些武器吗？我们拯救了多少生命啊！

我给您讲过那次乌韦罗战斗中发生的事，那是攻打海边的一个兵营时发生的战斗，一次非常危险的行动，是我们进行的最艰苦的战斗之一。在那次战斗中，真如我所说的，我方伤亡人数达到参加者人数的三分之一。我们给一大批敌人俘虏治伤，把一部分伤员留在那儿，让敌军收容；把一

批没有受伤的俘虏带走，没有立即释放他们。

自第一次战斗起，我们的药品毫无区别地用于治疗所有的伤员：我们的伤员和敌军的伤员。在进行第一次胜利的战斗即攻击一支海陆混合部队时，我们只有 19 个人。这我给您讲过。战斗结束时，有好几个敌军士兵死亡，剩下的人中只有一个没有受伤。我们无一伤亡。战斗是在凌晨 2 点 40 分打响的，差不多持续了一个小时，因为敌人顽强抵抗。他们认为，即使投降，也会被我们杀掉。当一切结束时，我们给伤员治疗，给他们留下了必需的药品，还留下一名同志来照看他们。我们取走了武器，天亮前撤离了那个地方。

我们与敌军伤兵分享我们不多的药品。我们有时没有伤员。如果双方都有受伤的人，我们就给所有伤员治疗。假若我们必须在一个同志的生命和一个敌手的生命之间做出抉择，我们肯定会选择保存同志的生命；但如果你根本没人负伤，我们就从我们不多的可支配的药品中分出一部分必要的药物，留给敌军伤员。从战争的第一次战斗到最后一次战斗，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如果有人能找出在我们的解放战争中有处决或殴打被俘士兵的一个实例的话，我们将把我们所有的东西全给他，尽管这个国家拥有的东西不太多。

自 1956 年 12 月 2 日我们从“格拉玛”号船登陆之日起，这些思想——因为我们在跟一个极具镇压性的，必然要干拷打、杀戮这种事的政权做斗争——已坚持了四十九年多。到 2005 年 12 月，您算算有多少年。

拉：四十九年。

卡：自我们从“格拉玛”号登陆之日起，四十九年来，一直保持着我们提到的这些思想：不搞暗杀，不伤及平民，不采用恐怖方法。为了啥？我们从未想过。

别忘了我给您讲过，我们那时已经具有一定的马列主义修养。我也给您讲过我的想法。这些对战略策略产生了影响。没有必要搞暗杀，我们清

楚地知道这没有意义。我跟您解说过我对在古巴特殊情况下资金征用方式的想法。这些方式，与其说与伦理原则相关，不如说跟实际意义有关联。不论是我们独立战争的理论家们，还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家们，他们都不提倡可能伤及无辜群众的暴力袭击或其他行动。革命学说的武库中不包括这类武器。

掌权后犯的错误是另一回事，那是不同的。我在给您讲述我们的历史。我认为我们书写了前所未有的一页，特别是长时间来一直保持着一种不变的行为，尽管经历了非常艰难、非常严重的插曲。

发生过被围后整营投降的情况。我们给俘虏如下优待：给予士兵绝对的自由；对那些罪行累累、臭名昭著的人，许诺不予判处死刑。在与被围的营或部队达成的协议中，我们答应给当官的保留个人武器。我们始终如一地执行一种尊重对手生命的政策。如果他们投降后你又把他们杀了，他们其余的就会死不投降；此外你还要消耗弹药、牺牲生命。总之一句话：你赢不了战争。对手始终是拥有较多的武器、资源和训练有素的人。

有的士兵投降过三次，我们释放了他三次。不管怎样，他们把武器留给我们了。他们的上级长官又把他们派到另一地区或另一个省，但战火也烧到了那儿。敌军士兵是我们的武器供应者，而农民是我们的主要支柱和食品供应人。巴蒂斯塔的士兵抢劫、烧杀。相反，农民们看到我们尊重他们，用了东西就付给他们钱，而且按较高的价格偿付；如果我们买一只鸡、一头猪，而当场没有人在，那么我们就留下纸条，写明钱放在哪儿，等人回来以后去取。那里的任何一家小店都无我们的欠债。这就是对人民的政策。没有这样的政策，我们就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说农民们都上了革命培训学校，这你别信。我们谁也不熟悉马埃斯特腊山。但是，我们能用什么方法来赢得那场战争吗？

拉：唯有用那种政策吗？

卡：没有那种政策就赢不了那场战争，而没有具体的行动思想也不能赢得那场战争。

拉：然而，你们在山上不得不组建一个“革命法庭”，对那些必须以死刑的人判刑，这是真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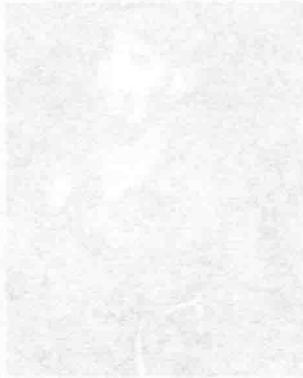
卡：只是对付背叛行为。被惩办的人数非常少。我记得有一批起义军的合作者，其内部萌发了土匪主义思想。虽然当时我们已经成为一个能够自卫和摧毁不了的运动组织，但我们还是一支人数很少的力量，还不到200人，对，还要少，大约150人。一切的基础是对待人民的态度，如我所言，是极好的态度。我们用我们少得可怜的资源向农民偿付我们消费掉的每一样东西，尽管他们不要，我们还是付钱给他们，而且我向您保证，是以较高的价格偿付的。我已说过，保护他们的庄稼和家畜家禽，保护家庭，保护儿童和妇女，这是我们的格言。巴蒂斯塔的军队却烧杀抢劫，无恶不作。

对我们来说，土匪主义的萌发是致命的，所以必须枪毙，很简单。处决了几个人室抢劫或抢劫店铺的人，而这一回执行死刑是在战争高潮时进行的。那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效的，因为从那以后，再没有发生过起义军成员抢劫商店的事。创建了一个传统，推行了一种革命伦理，一种对人民的完全尊重。



我
的
一
生

第十章 革命：最初的步骤，最初的问题



过渡—宗派主义—对暴虐者的公开审判—革命与同性恋者—革命与黑人—革命与妇女—革命与大男子主义—革命与天主教会

返回的度量，罪恶的度量，革命，章十第

拉：1959年1月，你们并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实现了革命变革，而是经过了一种过渡，对吗？

卡：我们已经任命了一个政府。我提出无意做总统，希望证明我并非为了个人利益而战。我们物色候选人，选中了一位曾反对巴蒂斯塔的大法官。他在一次重要的诉讼中无罪释放了革命者。

拉：是曼努埃尔·乌鲁蒂亚（Manuel Urrutia）吗？

卡：对，是乌鲁蒂亚。他德高望重。可惜不大谦逊，缺乏坦诚和常人意识。

拉：当时您不想当总统吗？

卡：不想当。我并不感兴趣，只想进行革命，斗争，壮大我们英雄的起义军。当然，会在特定的时刻举行选举，如果我有意的话，会争取当选总统。但是我并没有心思这样做，而一门心思制定革命的法律，落实蒙卡达纲领。

拉：也就是说，您打这场战争并没有在战火平息后立即当总统的个人野心？

卡：可以向您保证，确实没有。大概除了没有兴趣之外，其他因素也起作用了。也许有些自豪感，多少有一些吧。但是我确实没有那种心思。你会记得，我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在为革命而战，并非为了一官半职。战斗，成功，胜利的满足感是最大的奖赏，远远胜于任何官职。当我表示无意当总统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的运动组织推荐乌鲁蒂亚做总统，确实看上了他的禀赋。他和“七二六运动”一起任命了内阁。“七二六运动”

的一部分领导人属于中产阶级，毋宁说属于其右翼，他们在半路上加入进来。另外一些人为左翼。

一些人撰写了回忆录，很多人后来参加了革命。他们如实记述了当时自己的所思所想，很多有趣的事，像同切和卡米洛的争论等。

拉：切对一些领导人不信任吗？

卡：切思维十分敏锐，对一些人颇不信任。因为他也亲眼目睹了1958年4月大罢工存在的问题。当年在圣克拉拉打仗时，他同“七二六运动”的一些领导人曾进行过谈话，他认为这些人持有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切极力主张进行土地改革，而这些人主张进行温和的土改，给予赔偿，并提出其他考虑或设置障碍。

但切拥护革命力量的团结。另一方面，还存在反共产主义的势力，它们拥有力量 and 影响，切是反对它们的。在麦卡锡主义时代，人们通过一切途径实行恶意中伤，传播偏见。除了不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反马克思主义分子外，在共产主义者内部，还存在宗派主义。

拉：是极左分子吗？

卡：不是。是共产主义者，人民社会党人。^① 他们以某种形式在内部搞宗派，流行宗派习气。

人民社会党与我，后来与“七二六运动”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我在大学读书时阅读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大部分是从卡洛斯三世大街的人民社会党书店中获得的。

我曾经说过，政变发生后，我们组织了我们的运动，实施了攻打蒙卡塔兵营的行动，力图推翻那个被广大人民所憎恶的非法政权。这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当时也只能采取这种方式。此后，敌人采取镇压行动，在搜捕布拉斯·罗加（Blas Roca）时，逮捕了一些共产党人，其中有拉萨罗·培

^① 是原来的古巴共产党当时的正式名称。那时，总书记是布拉斯·罗加。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当时是该党成员。

尼亚（Lázaro Peña）。7月26日前一天，布拉斯·罗加恰好去圣地亚哥了，幸免于难。当时，我被单独关押在一间阁楼里，从带防护栏的房间中，我看到拉萨罗·培尼亚走过走廊，脸上充满高贵的神色和尊严。他被指控为这次行动的同谋，受到冤枉。当时身处国外的一些左派人士提出暴动主张。这不能责怪他们，因为谁也不了解我们发动这次行动内心是如何想的，也没有条件意识到，在实行社会变革的众多形式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策略。由于人民施加压力，我们组织的成员获释了，当我们再次走上街头时，我与从前在大学并肩战斗的共产党员伙伴们恢复了直接接触，与人民社会党青年组织老的领导人弗拉维奥·布拉沃（Flavio Bravo）建立了联系。事实上，“七二六运动”与人民社会党是同盟者，他们知道我们转移到墨西哥的计划。人民社会党高层地下领导人知道并原则上赞同我们的打算，希望在反暴政的斗争中保持交流和合作。

1956年快要过去时，在墨西哥，我们遇到了严重困难，甚至很多人被抓。当时，古巴的形势还并不严峻。根据共产主义运动的古典学说，严重的经济危机向来是革命行动的先兆。1956年下半年的形势并不完全有利于爆发革命。弗拉维奥·布拉沃到墨西哥看望我们，转达了他们党领导层的看法，要求我们推迟采取行动。弗拉维奥与我们亲如兄弟。我们似乎过分强调了履行我们誓言的重要性：在1956年，我们不成功，则成仁，谁也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我坚信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正确的。

我们出发，登陆，3天后在阿雷格里亚德比奥遭遇可怕的伏击。这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远征军战士们被打散了，受到穷追不舍的搜捕，很多人惨遭杀害。共产党人揭露并谴责了这些罪行。壮胆生威的暴政者发泄仇恨，12月杀害了很多革命者，其中包括几个共产党员工会工作者。

一切似乎都完了。在分析挫折的原因时，与“七二六运动”无关的一家左派杂志刊登文章，提出关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种种说法，甚至乘坐“格拉玛号”游艇归来并被捕入狱的一位战友也赞同这种说法。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那些日子极端艰苦，我们几个幸存者仍然坚信，即使环境如此差，仍应为胜利而战。确实，在我国，当时主观条件起了重

要作用。

后来，我们这些“格拉玛”号游艇的幸存者得到了农民的支持，弗兰克·派斯和塞莉亚·桑切斯·曼杜莱给我们派来青年援军，他们来自曼萨尼略、巴亚莫、圣地亚哥及其他地区。我们又组建了部队，这是一支能征善战、受过战火考验的部队，尽管它规模还小，仅250人，却有力量依靠4个纵队扩大行动范围，甚至波及古巴圣地亚哥附近，深入到广阔的东部战略纵深地带。

人民社会党历史性的领袖布拉斯·罗加出身低贱，生于曼萨尼略，自学成才。他不倦地进行斗争，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在古巴发展他们党的组织。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不得不流亡国外一段时间。在地下斗争时期，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Anibal Escalante）是组织书记，肩负主要责任。革命胜利后，埃斯卡兰特很有权威，在组织书记的位置上，实际发挥他们党的领导人的作用。他精明强干，聪敏过人，颇具组织能力。但是他具有根深蒂固的宗派陋习，为了他的党无孔不入，想控制一切。这是共产主义发展史上阶段性的旧策略和手法，因长期受歧视、排斥和反共情绪的迫害而形成的犹太人的思维方式。

在结束战争后的革命初期，尽管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也对我们“七二六运动”施展这种手法。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却被一些毫无疑问地受到尊重、具有牺牲精神的革命者和反帝斗士所采用了。

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在组织工作中采用了这种手法，由此造成严重的宗派主义问题，严重损害了团结，当时我们已经组成了革命统一组织^①，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领导机构。我当时公开揭露了这一问题，别无他法。还令人痛心的是，在人民社会党的领导层中，阿尼瓦尔是开展反对巴蒂斯塔武装斗争的支持者。

虽然他犯了令人遗憾的错误，团结还是保持下来，我平静地对待了这

^① 1961年，作为巩固革命力量团结的一个组成部分，“七二六运动”与“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和人民社会党合并，组成革命统一组织，后改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1965年成为古巴共产党。

种政治上不诚实的行为。我没有任何虚荣心，凡是立志变革社会和改变世界的人都应该自始至终地保持谦虚和团结意识的美德。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以平常心，公正地维护团结。

阿尼瓦尔从来没有叛变过，我对他没有任何怨恨。他的兄弟塞萨尔（César Escalante）是统一革命组织的意识形态书记，革命胜利后没几年就去世了，他是我一生中所认识的最正直、无私和忠诚的共产党人之一。他长期患重病，使我们感到非常伤心。每当我们找到一种新药，都满怀希望能够治好他的病。如果是在今天，他也许能够战胜病魔。

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话题上来。当美国和苏联进行争斗，而苏联垮台、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一强独大时，孤立无援的古巴小岛国挺过来了，证明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

在现实生活中，世界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与巴黎公社社员的继承者们同帝国卑劣的统治者所进行的斗争交织在一起。那个帝国不仅占有了我国人民的财富和汗水，而且剥夺了我们的独立、我们历史最美好的东西和传统。我国人民进行了您所提及的伟大事业，有望继续书写美丽的篇章，为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奋斗。

拉：你们曾承诺，当战争结束后，审判、并可能以死刑治罪巴蒂斯塔镇压机构的成员，因此成立了“革命法庭”进行了大清洗。对此，很多观察家认为矫枉过正了。

卡：他们受到了审判，一些人被判处死刑。

拉：您认为这是一种错误吗？

卡：哪个？

拉：革命胜利后数周内进行的公开审判和行刑。

卡：我认为失误可能是在形式上，比如说，审判是在公共场合进行的，对大量罪行义愤填膺的很多民众聚集在那里，会与我们的司法观念发生、

也确实发生了冲突。这被美国充分利用了。我们适时地纠正了这一毫无疑问的错误。但是那些杀人犯是根据战时革命的法律进行审判和量刑的。我们并不感到后悔，尽管回忆这些是十分遗憾的，即对他们来讲，人民的仇恨是多么痛苦。他们令人厌恶的罪行理所当然地招致人民的仇恨。

在此之前，我经历过“波哥大事件”，就像我对您讲述的，看到过揭竿而起的人民是什么样子。1933年，在古巴，当马查多垮台时，马查多分子被拖上街头，发生了抢劫和盗抢民宅事件，这是一种民众复仇行动。在整个战争期间，考虑到当人民取得胜利时，会发生民众暴力事件，我们提醒人民注意这一点。我们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通过设在山顶上的短波广播电台进行广播，它的功率为1千瓦特，是当时某个时段古巴收听率最高的广播电台。我们告诉人民，“七二六运动”不希望出现押人游街和报私仇现象，因为将会组织公审。对十二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进行的著名的纽伦堡审判，我们仍然记忆犹新。

谁也不会认为这是唯一一次审判和惩罚主要战犯的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没有发生抢劫、游街和报私仇现象，也没有对任何人设私刑进行拷打，尽管人们很想这样做。残暴政权的帮凶们犯下的罪行是十分恐怖的，虽然有人认为是可宽恕的。当时没有发生私刑拷打和流血事件，是因为我们做了宣讲工作，做出承诺：“将会以规范方式审判和惩罚战争罪犯。”

当时，我们正在落实蒙卡达纲领，对此，老幼皆知。尽管革命的品行是无可挑剔的，对战争罪犯的惩罚还是被人用来诋毁革命。存在着我所提到的错误，由于聚集在那里的公众太多……

拉：曾在—一个体育场所进行公开审判。

卡：是的。但是还有—个人道主义情感问题。—些帮凶犯下的罪行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说是令人发指的。所有人，没有任何例外，都认为对此应该加以严惩。但是到了对那些最直接涉案的罪犯行刑的时候，处以死刑时，有些人的反应十分痛苦，甚至产生怜悯。

拉：是同情心。

卡：执行死刑时人们做出情绪反应，但是人们认为所犯罪行是令人发指的，惩罚是罪有应得，这两者间没有相应的关联。我已经提到，有纽伦堡法庭负责审判纳粹战犯，不要忘记当时没有法律可依，也实行了死刑、无期徒刑和做出了其他惩罚严厉的量刑。空降到英国的伞兵鲁道夫·赫斯被关押了多少年，我都记不清楚了。其他一些人也死了。那些纳粹分子犯下了世界上最野蛮的罪行。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当攸关我们的生死存亡时，如发生严重的叛变或间谍行为时，战时法庭可以实施死刑。在两年战争中，这种事例很少。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因为我们的人反感执行这样的任务，必须挑好人选来执行这样令人难受的任务。必须实施死刑的情况非常少。

拉：你们在山区就已经执行过死刑？

卡：是的。因为有些人威胁到了整个部队。一些叛徒曾3次带领敌军摸到我们的营地。最早参加我们起义军的一个人被巴蒂斯塔的人抓住后投降叛变了^①。当时有通讯员往来于山区和平原之间进行联络，被捕事件时有发生。我们在伏击中也抓获过一些好人，他们被敌人俘获并派来执行暗杀任务。实际上，他们的真实意图是来向我们通风报信。他们在我们的伏击中令人惊奇地幸存下来。

巴蒂斯塔的军队系统地采用这种手法，主张不杀掉那些有可能加以利用的人，不处决他们，保留其性命，施以恩惠，让他们寻找我们的行踪，以便全歼我们或暗杀我。

我们不得不进行审判并执行刑法。在这方面别无他法，也容不得丝毫犹豫。

^① 这里是指欧蒂米奥·格拉，他是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农民，在拉普拉塔地区进行的第一次战斗前参加游击队，后被巴蒂斯塔军队俘获，受丰厚物质利益的诱惑，答应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并帮助摧毁游击队营地，他曾两次险些得逞。起义军发现了他的变节行为，将其俘获并于1957年2月17日处以极刑。行刑日期为美国记者赫伯特·马修斯采访菲德尔的同一天。（古巴出版者注）

后来在哈瓦那进行的审判工作出现了错误，但是并不是因仇恨或残忍原因造成的。要对杀害数十名农民的凶手进行审判，但是却是在聚集几千人的大厅中进行的，他们对凶手普遍义愤填膺^①。

拉：是在一个体育场，对吗？

卡：不是一个罗马式的杂技场，也不是球场，是一个体育活动场所。这被帝国主义的媒体加以利用了。在这里设立了法庭，采用传统方式进行审判，惩处了战争罪犯。这次属特殊情况。当一个人亲眼目睹在几千人面前审判凶手，哪怕是首屈一指的杀人犯，他也会对被审判者产生同情心理。

拉：这似乎是一种教训。

卡：是这样。但是就连这也得到了纠正。

拉：最初几年对革命的指责包括人们提到的攻击性行为，即对同性恋者的迫害，设有关押和迫害同性恋者的拘留所。您能否谈谈这个问题？

卡：简单说吧，您在指对同性恋者所谓的迫害。

我告诉您这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我可以向您保证，从来没有迫害同性恋者，也不存在什么同性恋者拘留所。

拉：但在这方面有很多证据。

卡：发生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最初几年，面对美国迫在眉睫的侵略危险下，全国都进入总动员状态。侵略确实发生了，有肮脏战争、吉隆滩入侵和“十月危机”。在这一时期，逮捕了很多人。

当时我们建立了义务兵役制，面临3个问题：在武装力量服兵役

^① 1959年1月22日，在哈瓦那体育城的场所审判了赫苏斯·索萨·布兰科。他被指控犯下108项谋杀罪行。最残忍的一项是，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奥罗德吉萨村，下令杀害了12名手无寸铁的当地农民。其中，有阿戈特一家九口人。

需要一定的受教育程度，因为需要使用尖端技术，不可能是二、三或六年级，至少是七、八或九年级水平。后来水平要求更高。我们不得不从大学、甚至从大学毕业生中招兵。操作地对空导弹必须是大学毕业生。

拉：我想这是在理工方面。

卡：您很了解情况。需要成千上万人，涉及各个学科，不仅是预科班，而且也包括很多经济学科。很多人没有条件，而国家却需要他们。因为国家已经从生产企业抽调了很多人了。这是面临的一大问题。

与此同时，一些宗教团体，或因原则或因学说，拒不从军或拒绝拿枪。有时候，一些人就把这些视为批评或仇视的借口。

最后，是同性恋者的处境。他们并没有被列入服兵役范围。您说有强烈抵触同性恋者的问题，革命胜利后，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时期，社会上存在明显的大男子主义（machismo），在军队中排斥同性恋者的观念还很盛行。

这三种因素决定了他们不用应征入伍，但是也由于他们不用做出那么大的牺牲而激起人们的愤怒，一些人以此为缘由更尖刻地批评同性恋者。

这三种人因这种或那种原因可以不应征入伍，于是便建立了被称作支援生产军事组织，由上述三种人组成。这就是事情的原委。

拉：这不是拘留所吗？

卡：这种组织遍布全国，从事劳动，主要支援农业生产。也就是说，不仅仅涉及同性恋者，尽管确实直接关系到他们之中的部分人，这部分人属应征入伍的范围，这是所有人都应履行的义务。

问题就出在这里。这确实不是实施拘留也非进行惩罚的组织。恰恰相反，是为了提高参加这些组织的人的道德水准，给他们提供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为国家工作和提供帮助的可能性。也有很多人，因宗教原因，

有机会以另一种方式支援祖国，他们并不参加战斗部队，而进入劳动组织，他们甚至享有在武装力量服兵役的成千上万的士兵所拥有的同样的物质待遇。

当然，此后我在视察卡马圭省时，考察了当地的农业计划，得知有些地方情况有违初衷，因为我不能否认存在着针对同性恋者的偏见。我亲自责令当地检查这一问题。这些组织仅存在三年而已。

后来，在纠正了最初的不足之后，出现了我们享有盛誉的青年工作者志愿军，它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志愿者先进行一段时间的军事训练后，利用其他时间帮助居民进行生产。他们修建住宅和学校，修筑铁路，从事其他经济方面和基础设施的劳动。在劳动力短缺的地区，他们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参与也是十分关键的。在特殊时期的困难时刻，他们起到了值得肯定的作用，赢得了人民的承认。

拉：您认为这种偏见是一种大男子主义？

卡：这是一种文化，如同在其他领域一样。我可以肯定，革命从来没有怂恿这种偏见。恰恰相反，革命提倡与各种偏见进行斗争。对妇女曾存在偏见，十分强烈的偏见，对同性恋者也是如此。我现在并不是在这方面为自己辩护，我承担属于我自己的责任。确实，我对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见。我本能地反对任何陋习、任何歧视，因为根植于不公正之中的那个社会充满了偏见。确实，同性恋者是歧视行为的牺牲品，同这里相比，其他地方更有甚者，不过在古巴他们确实曾受到歧视。今天，民众更有教养了，更有觉悟，正在消除这些偏见。

另外，我还要指出，在我国文化和文学界以及知识界的很多部门，曾经和仍然存在很多著名人士曾是或仍然是同性恋者，他们曾经或仍然享有很高的评价和尊重，尽管存在偏见。不要认为是普遍的情感。在更有教养和修养的阶层，对同性恋者的偏见要少一些。在目前和将来，歧视现象和大男子主义愈来愈与我国同胞们的文化和知识水平成反比。

拉：您认为与针对同性恋者的偏见进行了有效斗争吗？

卡：我更倾向于认为对同性恋者的歧视问题正在得到解决，我的感受是这样的。我相信这一点，就如我相信我国人民将很快成为世界上最有教养、最富情感和最公正的人民一样。陈旧的偏见和狭窄的思维方式将会成为过去。

最初，在革命与一些教会间也曾存在冲突，从偏见中，一方面滋生了反社会主义分子，另一方面产生了反宗教者。共产党曾采取严格措施，禁止宗教信仰徒入党。我认为自己在这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因为我们一度认为在是否忠诚方面有可能造成冲突，例如，有很多天主教徒……

拉：是在党内吗？

卡：不是。是作为革命者的天主教徒。

拉：他们不能入党？

卡：曾有这样的原则，即宗教徒不能加入党组织。宗教徒们可以依其政治态度受到完全肯定和尊重，但是不能入党。您不要以为，必须向宗教信仰徒敞开党的大门的标准占上风，是轻而易举和短短几年便可做到的事情。

拉：您最终捍卫了这种观点吗？

卡：在建党时，我持另外一种立场，做出了不允许宗教信仰徒入党的决定。但是我几乎是最早赞同宗教信仰徒入党的人之一。在三十多年前，我接触了解放神学。1971年，我第一次与这一流派的代表在智利开会，结识了各种神学流派的很多神甫和牧师，并在古巴驻智利使馆与他们会面。那时，经过几个小时的谈话后，我向他们提出我酝酿已久的一种想法，无神论者与宗教信仰徒团结起来，亦即马克思主义者和宗教信仰徒联合起来，共同推动革命。

拉：就像桑地诺主义者所说的，“基督教和革命并不矛盾”。

卡：我们在很早以前就说过这一点，因为桑地诺革命胜利于1979年，

而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主张这种思想，1971年在智利拜访萨尔瓦多·阿连德时，1977年在牙买加，甚至会见迈克尔·曼利时。这就是我们一直贯彻的政策。几乎所有属于这一思想流派的教会都是十分开放的。我提出，在西半球进行必要的革命变革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与基督徒联合起来。我坚持，而且日益坚定地坚持这种思想。

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我曾经说过：“我们主张马克思主义者与基督徒联合起来。在党内我们没有实施这种思想，还是老观念。”与偏见和随时产生的各种观点进行斗争并不容易，必须进行艰苦的努力。

拉：在革命队伍内部也必须进行反对歧视黑人的斗争？

卡：并不存在主观上的歧视。因为所有的革命者都懂得，困扰人类社会的最残酷的苦难包括种族歧视。

在西半球的很多国家，以血腥手段强加给自非洲贩来的男女大众的奴隶制盛行几个世纪之久，其中包括古巴。在一百二十年之前，1886年，在我们的祖国，奴隶制被废除了，尽管仅在形式上是如此。此后的七十多年间，曾受这种令人厌恶的制度奴役的男女大众又经历了这样一种生活，他们似乎是更加自由的劳动者，却生活在城乡的茅草屋和破板房中，很多家庭全家挤在一个房间，孩子上不起学，劳动报酬极低，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革命胜利。

您无法想象，在一次广播电台节目中，当我谈论反对种族歧视问题时，不得不提及三次。我们的敌人曾蛊惑说我们要剥夺那些父母的祖国权，把他们的孩子——请注意——送到俄罗斯。这就是戈培尔之流的纳粹法西斯主义论调：谎言重复千遍就会变成真理。戈培尔的无耻论调还不仅如此，他还提到为人熟知的古斯塔夫·勒庞，^①只不过含义有所不同。我想后者是一位法国心理学家，他指出了反复散布谎言的消极效应。

^① 古斯塔夫·勒庞（1841—1931），法国医生、考古学家和心理学家，著有两部十分有名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于世：《民众心理演变规律》（1894）和《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1895）。

拉：是民众心理学。

卡：我记得本人曾阅读过勒庞的那部著作，论述的是在军事方面形式主义的重要性和人们遵从指令的习性。人们会根据别人发给他的指令去从事，乃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那本书叫什么名字？好像是《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

拉：对。法文的是《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

卡：作者叫什么？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o Le Bon）。

法文我把它读成古斯塔沃·莱庞（Gustavo Lebón）。很早以前我读过这本书，记得这些基本论述。当时我在大学学习。

拉：是一部经典作品。

卡：我对您说过，当我第一次通过广播电台谈论种族歧视时，我不得不重复两次。当然，从一开始我们就采取了革命措施，关闭了禁止黑肤色人、甚至黑白混血人人内的俱乐部、学校和一切机构，尽管是尽可能谨慎地采取这些措施的。

拉：也有一些饭店不允许黑人进入。

卡：是的，什么都有，包括海滨。海滨大多是私人的，禁止黑人、甚至也经常禁止白肤色的穷人进入，还有学校也是如此。我曾谈到，在我就读的学校，贝伦学校，有学生一千多人，不接收黑人和黑白混血人。

在贝伦，有一所附属学校，那里接收一些黑人和黑白混血人。1998年1月，当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那些曾不接收黑人的天主教学校时，我对他解释了种族歧视方面的问题。

革命胜利以后，对种族歧视现象我们知之甚少，认为只要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足以，问题将会迎刃而解。在一次电视节目中，我谈到这一问题。后来，谣言丛生，十分令人厌恶，就像我同您提到的，谣

传我们把儿童送到苏联去，其中一些反复重复的谎言起到了效果。我不知道勒庞是否说过，有时候谎言愈离奇，愈荒谬，就愈有可能被当作真实的东西。

这件事情过去后，1962年发生了“十月危机”，飞往美国的航班终止了。在这之前，有直飞美国的航班。我们从未限制那些人出境，多次开放绿灯。有一次，在采取开放措施后，我们宣布：“你们驾驶私人船只过来吧，更保险地接走你们的家眷。”

关于种族歧视的谣言，我的讲话一经电视播出，有人就散布说我们要强迫不同种族的人，白人与黑人通婚等等。谣言引起不少恐惧，激化了偏见，促使一些人担心失去自己的种族优越感和傲慢感。

希特勒本人没有任何雅利安——他所说的理想的雅利安——血统，无论是希姆莱还是戈培尔都没有，他怎么能够使人们相信他们要优于其他人，驱使他们犯下针对其他人的罪行？您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存在无性繁殖技术将会怎么样！如果法西斯主义与无性繁殖技术杂交，亦即种族主义与无性繁殖技术杂交，那将会是十分可怕的。

拉：这种新版优生论会成为未来的巨大威胁之一。

卡：科学研究一直想证明种族之间是否存在不同，但却一无所获，除了那些最细微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与人的才智绝无相干。科学有助于开展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科学以无可辩驳的方式证明，所有的人类在智力上实际上是同等的，但是歧视依然存在。

我们革命者认为，反对种族歧视是一种神圣的原则。但是，我说过，当我第一次涉及这一问题时，一部分居民便做出强烈反应，焦虑不安。我又一次谈到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共谈了三次。这并不意味着强迫谁与谁通婚，而是要消灭工作、娱乐和教育中的种族歧视、非正义和不平等现象。

当时我们太天真了，认为在法律面前实现完全和绝对的平等就会消灭种族歧视。因为存在两种歧视，一种是主观的，一种是客观的。

拉：今天，您对古巴黑人的状况感到满意吗？或认为尚可加以改善？

卡：不满意。如果我们说满意了，那么我们就是典型的虚荣、沙文主义和自满自足。即使在古巴这样的脱胎于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的社会里，种族歧视仍然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在古巴，人民在法律上获得了充分和完全的平等，达到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已根除了种族歧视的主观因素的革命教育水平。我把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种族歧视称为种族歧视的客观因素，它是一种与贫困和知识的历史性垄断相关联的现象。

革命已经给予了所有公民，无论什么种族和出身，以权利和保障，但是在消除黑人居民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差距方面，却并未实现同样的业绩。黑人并没有生活在最好的住宅里，他们从事繁重的工作，往往薪金很低。从国外接收家庭外汇汇款的黑人数量要少于他们的白人同胞。

但是我们发现了问题的原因所在并正在加以解决，对此，我感到满意。如果不能根除这些原因，甚至就会延续今后一代代人的边缘化现象。根源在哪里？谁助长了犯罪现象？为什么？

拉：是社会原因。

卡：为什么存在边缘化现象？在1959年革命很早以前奴隶制便废除了。在古巴，废除奴隶制已经七十三年了。是1886年，已经一百二十年了。我们已经发现，在知识、文化与犯罪率之间存在反比规律。例如，知识和文化水平愈高，愈能达到大学水平，犯罪率就愈低。在拥有80万名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的国家，我们搜集数据，在监狱进行调查，深入20个地方，我们正在发现这种比率关系。

拉：文化愈缺乏，边缘化现象就愈重，犯罪率愈高，种族歧视就愈烈。是吗？

卡：是这样。我们认为这很重要，要为那些最贫穷的人，为那些未能上大学的人的后代进入需要通过学历和考试才能进入的学校提供便利。

如果你进行一番分析，就会感到吃惊，有那么多的20—30岁的青年

人——我们仍在进行调查——在狱中服刑。国家已经拥有数量巨大的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但是在狱中服刑的人中，仅有2%的人为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的后代。你到监狱去看一看便会发觉，很多犯人来源于边缘化的城区，是这样家庭的后代，他们全家挤在被遗忘的城区的一间房子里生活。

拉：革命未能解决这种不幸的问题吗？

卡：最初我们解决了一些边缘化城区的问题。但是一种边缘化文化业已存在：虽然你建筑了新住宅，在这一地区存在的问题仍然在延续，除非通过获取知识，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专业人员致力于教育自己的子女，教授他们文化，帮助他们准备考试，他们普遍拥有更好的条件上最好的学校。

革命造就了多少人才？嗯，有几百万人。我想，革命目前拥有的高等专业人员或知识分子——医生、工程师等——与1959年具有六年级毕业水平的人的比率至少是3:1。因为现在教师数量十分巨大，几乎全部为大学学历。很大一部分护士也是大学学历。

边缘化文化及其造成的所有后果趋于再生。那么正面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呢？

拉：在一些国家，正面的歧视大大增加了。

卡：是的。我们认为这不是法律问题或类似的问题，是公正和政治观念问题，在这里实际上主观方面的种族歧视已经消除了。

在电视节目中，有时会出现关于这些或那些警察工作效率的介绍，出现一批黑人或黑白混血青年罪犯……因为存在两类盗窃：使人十分恼火的常见的偷盗；还有偷窃围脖和领带的监守自盗，偷盗这些东西的大多为这里或那里的管理人员……他们盗窃的对象是社会，只不过谁也没有发现。人们更多了解的是溜门撬锁，席卷一空，偷盗某件商品、珠宝、某件产品，毁坏东西。这些案件大多为最贫穷的人所为。

有一次，我与负责制作这种电视节目的人谈到关于打击犯罪行为机构

的行动的报道。他们真心诚意地想表示十分信任警察的工作效率。我对他们说：“我不想再看到任何这类的节目。”任何岗位上的人都想证明其工作效率……作为罪犯暴露在屏幕上的首先是黑人和混血青年，也有一些白人青年，但是一般很少。这样做会起什么作用？把令居民们最为恼火的案件与特定的种族群体联系起来。

但是，通过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和黑人居民的行为教育，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最贫穷的阶层是最支持革命的。

拉：他们是否以其他形式继续受到歧视？

卡：很多人享有了新的机会。但是在考大学、进入热门学校方面，他们并不具备与其他人同样的条件。这些热门学校必须通过提交档案、还要考试才能进去。复习准备考试是十分艰苦的。

人们可以批评我们，这些问题发现晚了，但毕竟发现了。有一天，我不得不发表评论性的讲话，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处理，就像我曾说过的，我有自己的体会。

剩下的是深层次的问题。在那些有文化、经历过多年革命并目睹了革命所获得的巨大成就的人中，实际上还存在一点儿主观上的歧视。我想让您清楚这一点。

拉：在国家高级干部中黑人仍然较少。

卡：是的。您发现在一些领导岗位上是如此。因为我们仍然面临以前遗留下来的后果。当时，达到大学水平的黑人和混血青年的比例很低。服兵役期一般为3年。我们采取措施鼓励入校学习，为此，压缩了兵役期，当所有人结束预科学习后，根据其表现可以服兵役两年，而非3年。我们派送很多预科毕业的青年军人作为寄宿生，到学校上一年强化进修班，进行知识更新，以便考入大学。很多人通过这种方式考入大学，最贫穷家庭的孩子就这样进入大学，否则他们很有可能无法进入通过考试选拔学生的学校。这些学校的生源是社会和文化水平更高的阶层。

确实，我十分满意在思想战役方面正在实施的 106 个项目。其中有很多教育项目，我首先过问的是种族构成如何，这在以前是不考虑的，因为它似乎具有区别对待性^①。

拉：现在你们特别关注种族构成？

卡：是的，在所有新创建的、由刚参加工作的教师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学校中，在文化和艺术节目中，都是如此。我们正在培养艺术教员：有 15 所培训学校，每个省份有一个，预计在未来 10 年中，将会有 3 万名经过才智方面挑选的艺术教员进入教育中心和社团讲授知识，因为这方面的需求十分巨大。各省之间种族构成存在差别。一些省份黑人居民占 70%。

拉：我想这是在奥连特省。

卡：是的。其他省的情况与此相反。例如在奥尔金省，白人居民占大多数，他们是西班牙加那利或其他省的农业生产者的后裔。这取决于该地区是否存在过奴隶制种植园，如关塔那摩和其他具有类似历史经历的地区。地区不同，由黑人、白人和混血人组成的种族构成便不尽相同。

在艺术和造型艺术学校——绘画和雕塑，必须学习音乐、舞蹈和戏剧艺术，就某种表现艺术接受专业培训，并获得其他方面的基础知识，因为他们也会到某个学校讲授其他专业的课程。

专业爱好出现了膨胀，现在正在培训 1.6 万名青年人，需要考虑他们的种族构成和才智。我们十分满意地看到所有这些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专业所体现的种族构成。学生有权进入具有近乎专业性的大学学习这些专业。可以说，对此我仍然十分关注，我的问题是，“来看看，这类干部有多少个？”这就是您所提的同一个问题。有些机构多一些，有些机构少一些。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指的是当时在伟大的教育运动中所实施的发展计划，这场运动被称为“思想战役”，其目的是普遍提高全体人民的总体文化水平和觉悟水平。这些发展计划的数量不断增加，到 2005 年中期，共计 150 多项，其成效令人振奋。

拉：您同样也关注妇女的比例吗？

卡：反对歧视妇女的斗争是一项艰苦的任务，甚至颁布了一项道德性的法令，即《家庭法》，男人有义务与妇女共同承担家务、做饭、照料子女。在这方面成果卓著。

在考入大学的人中，妇女占大多数。简单地说，在中学和预科阶段，女孩子学习更加用功，成绩更加优良。她们靠提交档案入校……

我们把我国的医生派遣到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有些国家，因地方文化原因，妇女很难从事医疗服务工作，可是医学专业招生会有男有女，在每三个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中便有两个是女生。

有时候，在涉及某个专业时，您会说：“嗯，我们很需要嘛”，在这种情况下，男生便被挤掉了，甚至军事专业也如此。在每三个保送人员中便有两个是女性。我们不得不规定比例，比如，要求男性占45%，女性占55%，因为符合条件的大多数是女性。由于上面提及的原因，这种过程使得妇女技术力量得到增加，目前全国65%的技术力量为女性。

拉：这是十分壮观的进步。

卡：另外，妇女要生孩子，这是其天职。她们生完孩子后，我们给一年的产假，照顾婴儿，这样做并非为了她们生更多的孩子，而是因为孩子出生后，最好的东西是母乳和母亲的影响。

还存在着通过非正规途径实施子女教育的其他计划。必须教育父母。如果是母亲的话那就更好了。例如，核心家庭的破裂对孩子逃学和犯罪入狱影响很大。但是如果父母一方是专业人员，尽管他们离婚了，一般来讲孩子跟随母亲生活，如果母亲是专业人员，离婚造成的消极影响便会大大减少。

拉：离婚在边缘化和犯罪方面的影响如何？

卡：在占总数71%的青年人犯罪案件中，19%的涉案人员既不同父亲也不同母亲生活在一起。如果孩子与母亲或父亲生活在一起——一般习惯

由母亲抚养——且父母有文化水平，你就无法察觉离婚和核心家庭破裂通常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如果夫妻双方或其中一方，特别是母亲照料子女，那么几乎不会存在什么区别。我们希望，为了家庭和社会的福祉，妇女尽量提高其专业和技术水平。过去，妇女受尽歧视，她们只能从事最低贱的工作。现在，妇女本身已经成为关键性的、享有良好声誉的社会组成部分，就如我所说，占国家科技力量的65%。

妇女自己为自己开辟了道路，成为一种占压倒优势的力量。将来或许需要建立一个古巴男人联合会。

拉：为了自卫嘛！

卡：没错！您已经看到了，无论在哪里，妇女都在崛起，而且前途无量。自革命胜利以来的四十六年光景并没有白费。

拉：很多妇女投身于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中。您本人提到了艾德·圣玛丽亚和梅尔瓦·埃尔南德斯，她们参加了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行动，我们还可以提到其他很多杰出的女革命者，如塞莉亚·桑切斯或比尔马·埃斯平（Vilma Espín）。我想问一下，在山区打游击时是否有女战士？

卡：是的。在山区我组织了一支名叫“玛丽亚娜”的娘子军。^①我们证明，妇女可以成为像男人一样优秀的战士。在那里，我必须同大男子主义进行艰苦的斗争，由于我们为娘子军保留了一批轻武器装备，一些人便说：“怎么能够给女兵一支M-1枪——这是在向巴蒂斯塔发起最后攻势之后——呢？为什么不给我？”我回敬道：“喂，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你，因为她们是比你优秀的战士。”

我亲自训练了最早的几支女兵队伍，她们表现得十分神勇，强于一般

^① 取名为“玛丽亚娜·格拉哈莱斯”的娘子军是为了纪念马塞奥兄弟的母亲，它是古巴战斗妇女的象征，由菲德尔·卡斯特罗创建于1958年9月，敌人向起义军发动最后一次攻势之后。娘子军折服了很多起义军军官，她们参加了很多次战斗行动，功勋卓著。参见萨拉·马斯所著“玛丽亚娜娘子军战士：战火中的妇女”，《格拉玛报》，2003年9月14日，哈瓦那。（古巴编者注）

男人。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她们开赴战场，并没有留在办公室之类的地方。这并不是一种辩护，而是事实。

拉：您认为古巴已经不是一个大男子主义国家了？

卡：今天或许可以说，我们是大男子主义最少的国家，我不会说是在世界上，至少在西半球是这样。我们建立了一种平等和互敬的文化，您知道，这在现存社会并非都是如此。

我并不是在进行比较，因为大男子主义是一种遗留的产物，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它是遗留下来的，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种残余，我们对此曾知之甚少。我的感情是不同的。我刚才提到山区时的娘子军；我还有另外一种看法，我有一种共济之情，因为我目睹并亲历了在那一剥削社会中妇女受歧视的痛苦。

但是我们甚至已经准备好聆听与此有关的表述。我并不认为大男子主义已经完全绝迹，不过同您所说的最初的那个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向您完全坦率地说明了当时情况如何，我们承担责任，也许当时我们能够具有足够的文化意识，当时的环境也许足以避免不公平的、伤人的歧视形式。简而言之，这就是我所能够给您的答复。

拉：对你们的另一个指责是，在古巴革命初期，发生了宗教迫害。你们把天主教学校收归国有，驱逐了一部分教职人员，逮捕了神甫。您认为在这方面存在过激行为吗？

卡：我们把所有的学校都收归国有了，不仅天主教学校。这是一场深刻、彻底的革命，我是这样认为的，能够对此进行辩护，并证明没有枪决任何神甫。这是政策和观念的一部分，并不仅仅是道德原则，而且也是政治原则问题。美国帝国主义及其政府喜欢根据最初年代发生的冲突和我们被迫采取的某些措施，把古巴革命说成是一场反对宗教的革命。阴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说实话，我们并不能听之任之。发生了一些十分残酷的事情。

拉：什么事情？

卡：譬如彼得潘行动（Operación Peter Pan），实际上是绑架了1.4万名古巴儿童，这发生在我们的敌人炮制了灭绝人性的诽谤之后，他们造谣说，革命要剥夺父母的祖国权利。在这种借口下，或出于荒谬的恐惧心理，1.4万名儿童被秘密地遣送到美国。一些天主教神甫，还有迈阿密的神甫参与了这一反革命绑架行动^①。

拉：有1.4万名儿童被运送到美国去了？

卡：是的。把这些儿童带走了。他们捏造了一个所谓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那些父母的祖国权利将会被剥夺。当涉及与如此深层次情感相关的问题时，人们失去了理智，由于以这种形式、在这种时刻散布这种谎言，人们很容易上当受骗。在这种情况下，像父母与儿女之间的感情受到刺激，那种疯狂的念头冲击着人们的本能，他们无法进行冷静的思考。在这里，甚至很多中产阶级的父母也被吓坏了，造成了大逃亡，秘密地把那些儿童送走了。从此，一些家庭与子女永远地分别了。

后来，我读了肖洛霍夫的作品《他们为祖国而战》和《被开垦的处女地》^②，还有其他作品，我本人发现，以前不知道，在肖洛霍夫的小说中便出现过这种关于父母权利的谎言，这是一种老生常谈。请注意，我不得不说：“如果剥夺了父母的祖国权利，那么由谁来抚养这些孩子？”甚至在四十六年后，我们还不能为所有希望送孩子去幼儿园的母亲提供足够的设备。

他们还散布了另一种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谣言：这些儿童将会被用来做罐头肉。

^① 这场运动及其实施过程被称为彼得潘行动。有历史文献证明，古巴和迈阿密天主教会的势力参与了这次行动。参见拉蒙·托雷拉·克雷克斯波和何塞·布阿哈桑·马拉维所著《彼得潘行动》，政治出版社，哈瓦那，2000年。

^② 米哈依尔·肖洛霍夫（1905—1984），苏联作家，生于乌克兰，于196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朽名著《静静的顿河》（1928—1940）的作者。

拉：多恐怖啊！

卡：说什么我们要把这些儿童遣送到苏联，在那里把他们做成罐头肉，然后供应古巴。

拉：多么荒谬的事情！

卡：这纯粹是一种虚构。但是一些人并没有因为它是一种荒谬的虚构而拒绝相信。人们相信它，因为谎言牵动着像母子和父子之情，特别是母子之情这样如此强烈的本能。

拉：孩子们被带走了？

卡：是的，1.4万名儿童被带走了。

拉：是以秘密方式带出去的？

卡：并不完全是这样，当时允许那些想出国的人出去旅游，甚至包括医生，古巴多么缺少医生，我国半数的医生流失了。当时旅游不需要办复杂的手续。毋宁说那些孩子是以欺骗的方式带出去的，把孩子单独或托送给某个朋友送出去，戏弄了有关的规定，一旦孩子发生事故，没有任何安全性。也有可能办理了护照和证件所要求的手续。当然，没有任何低贱、贫困或受歧视的阶层送孩子出去。这些人是大多数，如痴地相信革命。而那些属于高收入阶层，不少人属于富有家庭，但是孩子们没有任何过错。

有些人希望出走，没有受到任何人的阻拦。但是他们采取的方式是无法加以辩护的。很多父母留下来期待着，认为革命不会持续多久，此后便可以托人把孩子带回来。事实是1.4万名儿童被送走了，很多人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们谴责父母。在迈阿密他们无家可归，甚至被安顿在专门为关押罪犯修建的拘留所内，或其他随便什么地方。很多古巴儿童被美国遣散了。

拉：教会在这场绑架潮中负有责任吗？

卡：这大概是最为痛苦的事情之一。无论在迈阿密还是在古巴，一些神甫和有身份的人士卷入其中了。就这件事情我们并不想折腾。公民移居美国并未受到禁止。没有给他们设置任何障碍，最基本的要求是提供身份证明，仅此而已。随便以某种形式、凭借某种证明文件或在没有证明文件的情况下送孩子出去，这是无法说得过去的。有美国撑腰的反革命派虚构了一部法令并广为散布，靠恐惧和恫吓卷走了 1.4 万名儿童。

拉：你们没有发觉吗？

卡：我已经说过，我们从未采取措施限制出国，他们可以出走和回来。美国政府敞开大门，以便卷走技术人员、教师、医生和技术工人，并拥有充裕的人力资源，为进攻我国招兵买马。这些情况是十分严重的。他们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从这种意义上讲，事态是十分严重的。我们并不因此责怪罗马，也无意归罪于天主教会，因为有很多革命的天主教徒。一些人因反革命行为而受到了惩罚。

拉：是神甫吗？

卡：是的。但是他们被关押的时间并不长。在吉隆滩入侵中，有 3 个神甫跟随雇佣军过来了，他们叫作……跟随军队、为士兵做祈祷的人叫什么？

拉：叫作随军牧师。

卡：对。我们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时也有一位随军牧师，是天主教神甫，他参加了起义军，甚至晋升到司令官职，身穿橄榄绿军装，吉列尔莫·萨迪尼亚斯神甫，十分有名，很受爱戴。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战友笃信天主教，常去教堂，不过几乎所有人都经过宗教洗礼，对那些未受洗礼的人，我曾经说过，他们称其为“犹太人”。

我曾说过，这不仅是原则问题，另外还具有普遍的、基本的政治含义：一位神甫在这里被处决了，被列入殉难者名册，成为送给那个帝国的一份礼物，变成对古巴和世界上很多信徒的一种侮辱。

拉：古巴革命特别谨慎对待神甫们？

卡：发生过一些严重事件，但是从来没有处决过神甫。这是唯一一场没有处决过神甫的革命。您知道，在墨西哥，发生过反对取缔教会者们的革命。^①在其他很多革命中，也发生过同样事件。您对法国革命进行分析，从这场革命的思想中获得很多东西，尽管并不出生在这一国家……

拉：法国革命是坚决反对教会的。

卡：请您回忆一下3个等级。在1789年的这场革命中，发生了相互屠杀，因为教会下层拥护革命，而教会上层则站在封建政权一边，尽管教会上层的一些人士也投入了革命阵营。我从未听说过有哪场革命没有发生过类似事情。

我不知道现在是否有人会否认，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在那个后来被称为苏联的国家也发生过这种事情。

墨西哥革命发生在1910年，是一场重要的社会革命，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不是社会主义的，但确实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其间，发生相互屠杀，宗教信徒也不例外。

后来，西班牙内战爆发了。西班牙人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大部分站在共和国一边。相互敌对的宗教信徒们都处决过对方的信徒。也就是说，我不记得在哪场革命中没发生过宗教界相互残杀的事例。

我们则例外。这证明，我们遵循了特定的标准及政治和伦理原则，二者兼而有之。这点十分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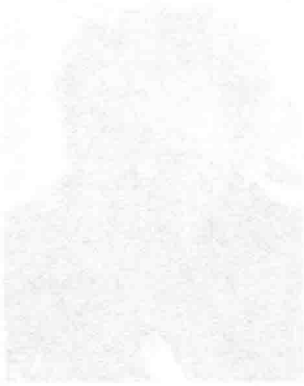
^① 1926—1929年，在“基督国王万岁！”的口号下，墨西哥反对取缔天主教会者、印第安人和农民天主教信徒发动暴动，反对反教会者。这场暴动最后发展成为一场真正的内战，造成几万人死亡。

如果那些如此批判古巴革命的媒体不知道、不言明或隐瞒事实，那么我不会加以认真理会。您对我提出了问题，我做了解释，像残虐等，什么样的污蔑之词没有强加在革命身上？



我
的
一
生

第十一章 阴谋活动开始



最初的革命法律—切·格瓦拉在政府中—土地改革—切·格
瓦拉与志愿劳动—最初的破坏活动—与美国决裂—恐怖主义—
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

《切·格瓦拉传》 卷一 第十章

拉：1959年1月2日战争结束时，您才32岁，毫无执政经验。你们是怎样开始进行革命的？我猜想有点混乱。

卡：我们最先做什么？兑现了审判罪犯的诺言，这是确实在西半球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兑现了没收在巴蒂斯塔年代非法占有和贪污的所有财产的诺言。这件事我们没有再扩大到过去，因为在斗争时期必须达到某种团结，如果我们把前几届政府非法占有的财产都包括进去，那么几乎就没有任何财产了。为了团结我们实行了一种事实上的大赦。大家都服从了“七二六运动”和获胜的起义军的决定，以便实现在大小不等程度上为反对暴政而斗争的所有人的团结。我们维护这个思想。

拉：后来又做了什么？

卡：又做了一件事：恢复所有在巴蒂斯塔时期从工厂开除出去的工人的工作。我们的打算没有太多经济观点，也不太符合芝加哥学派的思想，也不太符合今天我们亲美的新自由主义思想。

我们还大幅度地降低了房租，后来又进行了新的住房改革，把房客变成了不动产购买者。当然，我们给房产不多的房主做了补偿。这都是1959年5月以前的事。

后来我们制定了土地改革的法律，第一部土改法是当年5月17日颁布的。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反对愚蠢行为，每时每刻都有难题，例如乌鲁蒂亚突然说，应该关闭所有的赌场——当时还有赌博，那些在与旅游业有关的设施上班的工人们对此项措施的反应相当强烈。

拉：赌场工人抗议了吗，上街了吗？

卡：由于我们正在做这些事，经常有人闹事。

在教育方面，建了一万间新教室。没有钱，巴蒂斯塔把几乎所有的钱都卷走了。由于政治组织之间的敌对活动，由于鼓励瓜分土地这种革命前的旧习惯，人民社会党（共产党）方面采取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措施。当时我公开说，这是不能允许的。我不得不采取一种强硬立场。我们甚至制定了一条法律规定：“法律将不承认自行占有土地的人对土地的权利。”在一场据调查得到90%以上人口支持的革命中，什么事情都可能搞乱。有竞争，此外还有一些分歧。

这是最初时候的状况，我前面说过，到了5月17日，颁布了在拉普拉塔司令部签署的《土地改革法》。

不到一年前，从桑切斯·莫斯克拉^①的第一营冲进的圣多明戈那个村落，到巴蒂斯塔在他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中投入的巨大兵力的主要目标那个司令部之间，除了我的步枪外再没有别的武器了。

在飞往奥连特的飞机上，我给这部法律增加了一些补充内容，后来还在那个司令部与有权根据《共和国临时宪法》批准它的其余部长们讨论过，诸如已经收入《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关于合作社的想法。后来我们为发展农牧业生产合作社做了巨大努力。我们也主张建立国营农业企业。那些大庄园中，有的农业或牧业发展得不错，我们怎么能把他们分成几百个小庄园呢？

我们在甘蔗区建立了合作社，并且比较快地取得一些成功。那时对经济相当普遍地无知，工会和农民组织的旧的口号很盛行，口号很对，但都是在一个应该改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我记得，1960年最初几个星期，在有3千多个座位的古巴工人联合会的剧院里，坐满了糖业工人的代

^① 安赫尔·桑切斯·莫斯克拉，战争开始时任中尉，因在马埃斯特腊山脉中的血腥表现晋升至上校，是巴蒂斯塔军队拥有的最有能力和最坚决的军官之一，也是最嗜杀成性的军官之一。在1958年夏季敌人对起义军第一条战线的大规模进攻中，他的部队是到达拉普拉塔司令部最近的部队，在那次进攻的最后一次战斗中，头部受重伤。（古巴编者注）

表，一致要求在糖厂中实行四班制，不是三班制。“七二六运动”和人民社会党的领袖们竞相疯狂地支持民众的主张。怎样向那些群众解释这种主张会造成经济破产，需要的是创造新的就业，而不是瓜分现有的就业呢？还没有，而且还不能宣布社会主义嘛。企业是私人的，而且许多最重要的企业是美国所有的嘛。但我们的思想确实是社会主义的，而且相当激进。我们会事先注定要破产。我不得不运用想到的一切手段来劝说他们，但不做许诺。我相信我说服了他们。现在谁也不怀疑我是对的。我有一个得天独厚之处，就是保持从不背弃的信念。我不能说：“看，你们要丢下的是已经破产的企业和产业”，但我用道理劝说他们：“因为这个，因为这个，因为这个，不宜这样做。”必须在“七二六运动”的积极分子本身中做解释工作。在领袖之间也有竞争，你必须非常当心。在最初那几个月里，我们签署了所有这些法律。

拉：那个时期您发挥了什么作用？

卡：我有两个职务，但那时主要负责作为军队和人民领导的义务，军队和人民突然在国家领土上行使了权力。我事先就放弃了国家元首的职务，力图与我们任命的最高政治当局忠诚地合作。我确实一直在抵抗我们那位没有经验、不幸又没有能力的总统的凌辱。部长们早就对他不耐烦了。此外他还反共。更加不幸的是，他得意忘形起来。小马查多^①是个老游击队员和医生，被任命为他的助理，他竟然派小马查多陪他妻子到奢侈品商店去买东西。身为总统，这个人竟以为自己是在不知哪个香蕉共和国或类似什么地方。

阴谋活动也开始了，卡马圭省有乌韦尔特·马托斯（Hubert Matos）的阴谋活动。他是右派，有些社会关系。所有这类问题都有。土地改革时期，他不是部长，他正在给他指定的一个靠近海的地方休养。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其他几位同志和我到那儿去看他，我们不止一次地同他见面，

^① 何塞·拉蒙·马查多·本图拉，现任古巴共产党政治局委员。

分析《土地改革法》的草案。当然，他坚持负责领导驻扎在拉卡瓦尼亚要塞的军队。

切是军事首长，因为我们应该保持警惕。一宣布有什么入侵危险，劳尔就去奥连特，切去比那尔德里奥，阿尔梅达去中部，我在哈瓦那，我们分头指挥。

吉隆滩战役时也一样：切去比那尔德里奥，阿尔梅达在中部，劳尔在奥连特，我在哈瓦那。喏，吉隆滩战役或“十月危机”时，各人有各人的位置，每个人都各就各位，不管当时在做什么。

拉：刚一取得胜利，切·格瓦拉就坚持要走，要在阿根廷搞革命吗？

卡：有那个承诺，我总对他说：“你放心，我会兑现这个承诺。”但是切对革命有极大热情。我跟您说过，他甚至到科希马尔附近的几个海滩去治哮喘病。努涅斯·希门尼斯（Núñez Jiménez）^①、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还有一两个人，我们聚在塔拉拉那儿的一所房子里，讨论《土地改革法》，那已经不应该再等了。确实，我们在那儿都主张一部比较温和的法律。切意识到，与美国大企业的冲突会很激烈。他肯定记得危地马拉的经验，他的看法深思熟虑，以聪明和认真的方式阐述出来。我应该老老实实地说，当我提出进行一次激进得多的土改时，切很吃惊。

这里有占地 20 万公顷的大庄园，为外国人所有。有些美国企业拥有大型糖厂和广阔的土地。他们在许多国家有土地，但在历史上，这里的美国企业非常有实力，非常有影响。除了迟早将它们国有化以外，没有其他选择。实际上这个过程加快了，这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加快，或者想要造成与美国的冲突。问题是，不管比较激进也好不太激进也好，第一

^① 安东尼奥·努涅斯·希门尼斯（1923—1998），地理学家、洞穴学家和自然学家。起义军上尉。曾任政府高级职务，其中有 1959 年 5 月《土地改革法》设立的国家土改委员会执行主任。著有关于古巴地理和许多其他内容著作多部，包括多卷本里程碑式百科全书《古巴，自然与人》。

部《土地改革法》对于一个其企业占据了古巴最好甘蔗地的国家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土改法中提出，最多占地 100 卡瓦耶里亚。有的庄园占地 1 万甚至更多卡瓦耶里亚。^①1 卡瓦耶里亚相当于 13.4 公顷。如果土地正在有效地生产，那就尊重最多 100 卡瓦耶里亚的所有权；否则，最多 30 卡瓦耶里亚。这就是标准。任何一个企业不得拥有 100 卡瓦耶里亚以上的土地。其条件是，土地在技术上得到很好的开发；就是说，任何企业不得拥有 1340 公顷以上的土地。如果不是产量很好的土地，任何人不得拥有 30 卡瓦耶里亚以上。

我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中谈到了合作社、绿化造林、工业化，还谈到“金牛犊”，我用了一种象征性语言。那时谁也不相信随便哪个古巴革命者的任何计划，因为许多人已经许诺过计划，但没有一个人实行了。实际上，我们的过错是超额实行了。

农村地区有几十万人根本没有土地，以万计的农民租种土地。其他人则是既没有土地证也没有土地权的短工和生产者，可以随意把他们赶出土地。这些人主要占着山区国家所有的土地。还有就是所说的佃农，这些人境遇更糟：地由他们种，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收成被地主拿走了。这些地早已分了，要做的是给这些农民他们占的那些土地的所有权，当时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我们不想把制糖业搞乱。我们没收的最后土地是大型甘蔗种植园，那是最大的大庄园。最后，我们把大型农业企业作为国有集体企业保持下来，今天，已成为合作社。甚至在燃料极其短缺的特殊时期，也认为把小块土地分给家庭耕种，以便有助于居民的食品供应是适宜的。我们没有像俄国革命某些困难时期那样做，就是强制性合作化，这种做法代价非常大，也很残忍。

^① 卡瓦耶里亚：古代西班牙面积计量单位，约相当于 13.4 公顷，如今古巴仍然非常普遍使用。见第二章注 3。

拉：而且没有成果。食品短缺在苏联持续了很长时间。

卡：我们根本没有强迫两小块土地连在一起。古巴革命从第一天起就规定，始终不渝地尊重农民的意志。永远不会对任何一个农民施加压力，让他把土地连在一起建立更大规模的农业单位，这样的单位也许按人头和公顷计算的效率更高——但也并非永远如此，可是，这就像所有强行实施的事情一样，总会留下创伤。

特殊时期^①出现的合作社是从原有的国有农场演变来的，只要不官僚化和陷入贪大的狂热病，许多合作社效益好，也有很好的技术前景。所有这些都是作为革命的生产者长期而艰苦的学习过程中发生的，我们还没有化解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所有挑战，这些挑战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的：一方面是有帝国主义的严重经济封锁的冲击，另一方面是作为寻求更加正义的社会的一部分，试图改变人剥削人的状况，因此出现了理想主义的幻想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混杂的解决方案，从而造成混淆和混乱。

那些最有效益和最经济的农业生产中心，是从独立小农自觉自愿联合中诞生的，他们建造了住房、学校、医疗设施、分配中心、电力和供水设施与其他设施，所有这些结束了许多家庭的隔绝状态和困苦。他们正准备创造和完善其他辅助性的生产方式，我看这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不少场合成功地进行了试验，可以与前面说的那些方式同时并存。

在苏联，不是零就是一百：新经济政策^②年代根本不搞集体化，后来一下子又搞全面集体化，这样做会造成严重暴力、冲突和损害。

事实是我在土地改革问题上非常激进，我为什么要说不呢。喏，如果不激进，你就什么也干不成，你组织政党，搞20次选举，结果什么也没有。

① 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倒台和苏联解体对古巴意味着失去主要贸易市场和信贷来源，这造成自1991年以来古巴经济急剧萎缩。世界上许多人预测古巴革命会很快终结。在古巴，将国家在这种困难形势的后果下经历的岁月称为特殊时期，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古巴经济开始持续恢复。

② 1921年内战结束时，苏联经济衰退，人民遭受饥饿威胁。于是，列宁决定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提出新经济政策——这是部分地回归资本主义，是一种混合经济，并优先关注农业。结果是积极的。列宁于1924年逝世。1928年，斯大林突然放弃新经济政策，转向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优先搞工业化以便“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但我是激进的，我认为必须用《土地改革法》进行一次决定性打击。

拉：切跟着你干吗？

卡：他乐意。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他比较小心，因为他还有点是外国人的那种约束，尽管他有很多长处……

拉：因是外国人的约束？

卡：他在山里提过产业建议和类似建议。胜利后，国家土改委员会变成了一个权力很大的机构，事实上干预所有的土地。土改委员会里有点混乱，比如有位同志，他是莫阿那个地方一个农业开发区的领导，他跟谁也没商量，就冻结了在那儿正在建设、几乎建成的重要的产镍企业的资产。毫无顾忌地就那么干了，因为那时候无政府状态相当浓厚，别以为事情简单，那是一场严重的闹事。

我决定讨论这件事，但他们已经冻结了，甚至也不宜后退，我们就进行讨论和商量。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个例子是劳动部长，他非常激进，随便干预和决定重大事务。别以为最初那会儿有严明纪律。

在它蓬勃发展时期，国家土改委员会不仅冻结土地，还控制工业，设立了一个工业和工业化局。我叫切负责工业局。他仍然是个政治和军事人物，除了是政治领导，革命统一组织全国领导委员会成员以外，在有任何情况时，在有任何入侵危险时，他还以一个地区军事领导的身份出现。

拉：革命统一组织。

卡：是的。这是我们在1961年对“七二六运动”、革命指导委员会和人民社会党这三个组织进行的一次整合。我们全国领导委员会的成员们每个星期都聚在科希马尔，讨论重大问题。切和劳尔作为全国领导委员会成员参加那些会议。

在国家土改委员会的工业局里，逐步产生了工业部的雏形。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国家银行没有资金，它掌握的资金很少，储备都被巴蒂斯塔掠

走了，需要一位国家银行的领导。那时候需要一个革命者。由于切的信念、才干、纪律、能力和正直，他被任命为古巴国家银行行长。

这件事还出过笑话。敌人总企图嘲笑人，我们也开玩笑。但这个玩笑有政治意图，说的是有一天我说：“需要一个经济学家。”于是有人搞混了，以为我说的是：“需要一个共产党人。”所以就召来了切，因为切是共产党人。他们搞错了。切是应该在那个位置的人，这对他来说毫无疑问，因为切是个革命者，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出色的经济学家。

拉：出色的经济学家？

卡：是的，因为做出色的经济学家取决于对领导国家一条经济战线的人，这次是领导古巴国家银行这条战线的人对想要做的事情的了解。因此，从他共产党人和经济学家的双重身份来说，他是出色的。不是因为他有大学证书，而是因为他读过很多书，注意观察事物。不管切在哪里负责，他都圆满地履行了职责。我曾说到过他的毅力、他的意志。不管分配给什么任务，他都能完成。

后来，银行核算账目，没有多少钱，这时工业化的事情更加重要了。在国内，国家控制的制糖厂和其他产业与工厂数量不少，因为我们的敌人开始采取措施了，我们就采取反措施。这时我们看到，主要产业已经收归国有。对于反对革命的每个措施，对策就是国有化。众多产业开始由革命掌握，其中有镍和制糖厂，为了领导那个刚刚建立的部，我们任命了切。他做了怎样的工作呀！好极了！多么讲纪律，多么有才能，多么认真学习，多么无私，多么堪称楷模，多么简朴！不管你给他什么任务，他都全力以赴。

他是政治领袖，也是军事领袖，但那时候他的具体工作是工业部。他多么善于学习呀！在那里他特别注意领导方法。

拉：他与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有分歧吧？这人主张实行苏联试验过的方法。

卡：喏，那就是切与其他同志出现一些分歧的所在，是一场似乎无谓

的争论，我当时不太明白事情有多重要，因为切主张预算拨款制，而其他同志倾向于自筹资金^①。

切所关注的并非是纯粹的预算拨款制领导经济的方法。他不反对某些物质刺激，但一直提请注意滥用物质刺激作为生产主要动力所意味的风险，和物质刺激对劳动者觉悟的影响^②。

于是就进行了那些友好的争论和讨论，但没有特别深入下去。革命战士们思想又在考虑其他事情。我说：“好，让他们各自维护自己的立场，互相之间讨论观点吧。”我虽然主要负责针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战役，但是个空想共产主义者，坦率跟您说，在上面说到的这个问题上，我更喜欢切的立场，与我们在山里的游击生活方式非常接近。坦白地说，我更喜欢切提倡的精神方法。

切高度评价共产主义觉悟和榜样。

^① 1963—1964年，就古巴革命的经济体制产生过一场重大的理论辩论，主张经济核算制的人与主张预算拨款制的人进行论战。前者以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阿尔贝托·莫拉、马塞洛·费尔南德斯·丰特和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夏尔·贝特黑姆（Charles Bettelheim）为首，主张和维护一个商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案，企业实行分权管理，享有筹资自主权，在市场上竞争，用货币交换各自商品。每个企业以物质刺激为主导。经济核算制的追随者认为，计划通过价值和市场发挥作用。这是苏联人在那些年代选择和推行的主要道路。

后者以切·格瓦拉为首，还有路易斯·阿尔瓦雷斯·罗姆和比利时经济学家及第四国际领导人恩斯特·芒代尔等人，他们质疑社会主义与市场联姻。他们维护一个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极端的政治方案。切认为，计划远不止是一种管理经济的单纯的技术手段。它是扩展人的理性幅度、逐渐减少拜物教份额的途径，而这种份额正是“经济规律自主”信念赖以成立的基础。

主张预算拨款制的人，诸如切，赞成对所有生产单位实行金融统一，实行单一的和集中管理的预算，所有生产单位是一个大型社会主义企业（由每个单个生产单位组成）的组成部分。在合并而成的同一个企业的工厂与工厂之间，没有通过金钱和市场进行的买卖，只有通过一种银行账户登记簿进行的交换。产品从一个生产单位转到另一个生产单位，但不是商品。切及其支持者提倡和推行志愿劳动和精神鼓励，以此作为提高劳动者社会主义觉悟的得天独厚的工具，但不是唯一工具。

参见奥兰多·博雷戈（切在工业部的同事）：《切·格瓦拉，火的道路》和《切，阵风中的记忆》，新人出版社，布宜诺斯艾利斯，分别为2001年和2003年。也可参见内斯托尔·科汉：《（资本论）读者切·格瓦拉与奥兰多·博雷戈的对话》，《起义报》，布宜诺斯艾利斯，2003年8月13日。

^② 关于切的经济思想请参见《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见“全球正义、解放与社会主义”，墨尔本海洋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拉：切主张志愿劳动，是吗？

卡：切是古巴义务劳动的创立者。每个星期天他都去进行义务劳动，一天在农业，另一天在建筑业，要么就试验机器。他什么都干过。

他与劳动中心保持着密切接触，与工人交谈，有时候去码头，去矿山，或者去甘蔗田砍甘蔗。如果制造一台联合收割机，需要试验，他就坐上联合收割机；如果需要搞建筑，就看见他推独轮手推车；如果需要扛大包，他就扛大包。他给我们留下了那种实践的遗产，通过他的率先垂范，那种实践赢得了数百万同胞的支持和参加。

一个真正的榜样！是值得敬佩的做法。我喜欢切的那些表现。

拉：他跟劳尔处得好吗？

卡：劳尔跟切虽然有时候争论，但两人很团结。切在政治问题上从来没跟我有过争论，据我所知，跟劳尔也没有什么不一致。在某些事情上，例如农民自己分割土地，我猜想无论切还是劳尔都支持这样做，因为两人都非常不信任受反共思潮影响的“七二六运动”里的一个派别——不知道我是不是在诬蔑，我猜想是这样，但知道得不确实。这事发生在革命最初几个月，但最终两个人都完全服从了不能这样搞土改的主张。

我们赞成一场非常激进的土改，我们还要把它进行得更远。我对革命中农业改革和其他领域里的激进主义负完全责任。我跟切，他跟我，可能都有理想主义成分，但我绝不后悔。因为我在我的革命生涯中愈是逐步了解资本主义的恶习，就愈加相信榜样、思想和觉悟的重要性，愈加相信这些是维护革命的根本要素。

在最初几个月耗尽看似永远用不完的商品，快要花光暴政政府没有掠走的那一点点外汇的时候，仍然在领导经济的寡头和资产阶级出口产品，开低价出口发票，把一部分钱留在国外。如果东西卖了 200 美元，发票上开的是 150 美元，这就是拿回来的那点钱。我们为没有经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们方面有错误，这给美国提供了方便，他们冻结了没有从美国银行取出的古巴国家的几百万美元。

拉：您以前跟我说，革命刚一胜利，“阴谋活动就开始了”，指的是什么？

卡：开始了破坏、人员和战争装备的渗入，为的是搞破坏和鼓动恐怖主义活动与起义造反。我们国家经历了历史上最漫长的经济战，经历了一场已经持续了四十五年多的不断和残忍的恐怖主义战役。开始派飞机轰炸甘蔗田。劫持我们的民用飞机，带到美国，许多架被毁了，还有些被没收。报纸的主人，像今天在委内瑞拉反对查韦斯一样，煽动攻击革命。《海军日报》和其他报纸发表跑到迈阿密的那些人的恶毒声明。

这是一场战争的一部分：海盗攻击我们的沿海、我们的捕鱼船和来古巴的运输船。甚至在联合国暗杀外交官，杀害我们的同志。从美国弄来炸药，甚至还有活性磷！装在香烟盒里带进来，投进剧院，投进商店来制造火灾和死亡。问题严重。从革命胜利最初几年起，还在国家领土各个地方安插了武装集团，暗杀工人、农民、教师和扫盲队员；焚烧住房，捣毁农业和工业中心。我们的港口、货船和渔船受到经常不断的袭击。1960年3月4日，在哈瓦那一座码头上炸毁了一条法国船“库布雷”号（La Coubre），一百多人被炸死，其中有6名法国船员，好几百名古巴人受伤。1961年3月，在一座炼油厂制造爆炸。同年4月13日，破坏并火烧了哈瓦那的“埃尔恩坎托”百货公司。最令人厌恶的是，1976年10月袭击了一架满载旅客正在飞行的古巴民用飞机，造成73人死亡，打捞不上来的尸体沉入几百米深的海底。

拉：所有这些都是美国组织的？

卡：最初那些日子，那些恐怖活动更多是由巴蒂斯塔分子、旧警察和巴蒂斯塔的人，夹杂着一些反革命分子组织的。但美国政府已经在利用这些分子加紧反对古巴。开始了经济封锁。在吉隆滩入侵前的几个月，中央情报局疯狂地成立反对我们的组织，竟然成立了三百多个反革命组织。现在清楚了，1960年3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就签署了一项命令，批准开展一场反对古巴革命的“强大的宣传攻势”，和一项旨在推翻古巴政府的秘密

行动计划^①。

从吉隆滩入侵以后的1961年11月到1963年1月，一共有5780次针对古巴的恐怖主义行动，其中717次是严重袭击古巴的工业设备。所有这一切造成234人死亡。这些恐怖主义袭击使3500多人遇害，2000多人伤残。

拉：还对你们发动了生物战，向你们运送未知的病毒，不是吗？

卡：1971年，尼克松任总统时期，据中央情报局的消息来源说是通过集装箱，把猪瘟病毒带进了古巴。我们不得不宰杀50多万头猪。岛上对这种源于非洲的病毒一点也不了解。他们带进古巴两次。

还有更坏的：Ⅱ型登革热病毒，造成对人类来说经常是致命的出血热。这事发生在1981年。35万多人被感染，死亡158人，其中101个儿童。当时世界上对那种血清型病毒一点也不了解，是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基地设在佛罗里达的恐怖主义组织“欧米加-7”的一个领导人1984年承认，是他们把那种致命病毒运进古巴的，企图造成尽量多的受害者。

对我们的暗杀我还没说。

拉：对您的暗杀？

卡：有好几十个计划，其中有几个差一点就成功了。有记录的一共有600多次^②。记录的计划各不相同，从刚开始的到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就是说，在不同执行阶段被发现了。是由三种不同形式推行的：第一种，由中

^① 1960年3月17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批准了中央情报局针对古巴采取行动的计
划，行动包括“成立一个负责的、有吸引力的和团结的卡斯特罗政权的古巴反对派”，
开展“一场强大的宣传攻势”，为“在古巴国内成立一个地下情报和行动组织”继续努
力，最后，在古巴以外训练“一支适当的准军事力量”。这份文件是颠覆、破坏稳定和
侵略运动的直接前奏，这场运动以1961年4月猪湾入侵而告终。（古巴编者注）

^② 参见何塞·拉蒙·费尔南德斯和何塞·佩雷斯·费尔南德斯：《美国针对古巴的战
争》《吉隆滩入侵》《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638个计划》《40年的侵略》，政治
出版社，哈瓦那，2001年；哈辛托·巴尔德斯—达佩纳：《中央情报局反对古巴》《中
央情报局的颠覆活动与反革命（1961—1968）》，圣路易斯上尉出版社，哈瓦那，2002
年。还可参见路易斯·巴埃斯：《价值是活着。目标：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拉布
甘比列出版社，巴塞罗那，2002年。

央情报局直接组织；第二种，成立所谓独立小组，向它们提供全部行动资金，美国机构不直接介入；第三种是煽动，搜罗了很多人，给可能的杀手灌输猎人心理，灌输有一个人应该猎取的意识。他们有完全的豁免权来进行狩猎，来给所谓的政治团体募集资金，雄厚的资金，例如那个著名的基金会和居住在迈阿密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数十个黑帮团伙。当然，在某个时刻也直接利用基金会来领导恐怖分子和提供资金。

拉：是全国古美基金会吗？（Fundación Nacional Cubano Americana）

卡：是的。它的路线是搞政治和美国院外活动集团的工作，后来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倒台后的时候，建立了一个行动小组。^①基金会领导人豪尔赫·马斯·卡诺萨是巴蒂斯塔军队一位军官的儿子。里面最有影响的首先是巴蒂斯塔分子，他们掠走了许多钱，领导那个基金会。后来他们帮助所有这些小组，给他们钱。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正式小组来搞这些武装行动，后来到1992年“特殊时期”开始时，成立了小组。但他们与中央情报局训练的所有恐怖分子一起工作，为他们的暗杀计划和其他恐怖计划出钱。

所以说最后一种方式是煽动。他们给很多人脑子里灌输必须干一件大事，例如杀死这个魔鬼的思想。是“引诱暗杀”，我是这样叫。不同形式的暗杀，我说了，一共有600多个计划，有几个相当接近成功。

有时候是侥幸把他们化解了，侥幸也发挥了作用。一个特务掌握着一片氰化物，差一点放进我常去的自由哈瓦那酒店一个咖啡厅的一种巧克力奶茶里。碰巧那药片冻结了，就在他要放的时候放不成了，粘在保存它的冰箱的冰上了。

那时这里有一个赌博和走私黑帮，一群匪徒，他们的利益受到革命的损害，后来被美国政府利用，执行暗杀计划和其他反革命计划。他们在一些酒店有他们事先安插在那里的人。

^① 本书第一版出版后，迈阿密爆发了一个由全国古巴美洲基金会领导委员会一个资深成员所做的披露引起的大丑闻，他在披露中确认了这个行动小组的存在，并详细讲到1997年在玛格丽塔岛举行伊比利亚美洲峰会期间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计划。（古巴编者注）

朋友，虽然大多数劳动者是好人，是模范，但他们总能够找到个把愿意合作的雇佣分子，他们把这个办法用绝了。美国参议院自己也证实了这一点^①。

在另一次暗杀中，他们想利用一个化学特务制造类似于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一种强力迷幻剂）那样的效果，来毒化我要去谈话的一个电视工作室的空气。另一次，他们用致命毒药喷洒我要抽的一盒哈瓦那雪茄烟。1971年我访问智利时，有一阵儿，在几米的地方，用一架里面藏着枪的电视摄像机把我锁定在目视孔里。但是，如果他们开枪的话，肯定也会死在那里，所以他们没有开枪。

最近一次引人注目的暗杀计划是在那次巴拿马会议期间，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卷入了这个计划，他是1976年炸毁古巴飞机的凶手，也是负责进行这次行动的小组的组织者。

拉：在一次伊比利亚美洲峰会上？

卡：是的，2000年那次。把他抓住了。喏，现在的问题是华盛顿拒绝引渡波萨达·卡里莱斯^②。

① 关于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的计划，请阅读丘奇报告：《关于暗杀外国政治领导人的计划》，主编弗兰克·丘奇参议员，美国参议院，华盛顿，1975。丘奇委员会认为，1960—1965年间，由中央情报局直接参加和提供资金的针对菲德尔·卡斯特的8项暗杀计划已得到确认。

② 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和另外3个与暗杀菲德尔·卡斯特有牵连的古巴人，即佩德罗·雷蒙、吉列尔莫·诺沃和加斯帕尔·希门尼斯，都在巴拿马被捕、接受审判并投入监狱。2004年8月，该国卸任总统米雷娅·莫斯科索赦免了这4个供认不讳的恐怖分子，其中3个立即去了美国，被美国当局收留在美国领土上。2005年3月，古巴揭露波萨达·卡里莱斯秘密进入美国领土，美国政府最初否认。面对古巴开展的紧张的舆论动员运动，后承认波萨达在迈阿密，这给美国政府造成一个困难处境，反对恐怖主义的世界十字军冠军竟然给一个供认不讳的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提供保护。（参见《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采访记》，《纽约时报》，1998年7月12日。）美国当局别无选择，只好将他逮捕，并以“非法入境”为由交法庭处理。2005年9月，美国司法机关裁定，不将波萨达放逐委内瑞拉（他是1985年从那里越狱逃走的）或古巴，因为考虑到“那些国家可能对他施以酷刑”。2005年10月西班牙美洲峰会期间，聚在萨拉曼卡的国家元首们表示了对委内瑞拉和古巴的声援，并支持了为对波萨达·卡里莱斯“实行引渡或送交司法当局”而进行的斡旋。

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出的钱。

拉：据您看，波萨达·卡里莱斯在所有这些对古巴的罪行中有什么责任？

卡：波萨达·卡里莱斯和他的同谋奥兰多·博什是针对我国人民的帝国主义的恐怖主义最残忍的标志。他们在本半球很多国家，包括美国自己的土地上，执行了数十次灭绝人性的行动。由于美国政府这些怯懦和可恶行动的结果，数以千计的古巴人，包括其他国家的公民丧失了生命，或者成了残废。

如同大家知道的那样，就是训练了这些古巴出生的恐怖分子的那些美国机构和设施，还训练了2001年9月11日猛烈袭击纽约双子座大厦事件的组织者，那次袭击中数几千名美国人失去了生命。

波萨达·卡里莱斯不仅与奥兰多·博什一起——那时候后者是由中央情报局成立的统一革命组织协调组织的头头——参加了炸毁载有73名旅客的古巴飞机，而且在后来许多年里，还组织了数十次暗杀古巴革命最高领导人的计划，在古巴的旅游饭店引爆了许多炸弹，显然是美国当局的在逃犯奥兰多·博什，与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镇压机构一起，参加了对智利重要人士的绑架和暗杀，例如卡洛斯·普拉茨和奥兰多·莱特列尔，或者参加了许多智利反法西斯斗士的失踪事件，甚至参加了绑架和杀害古巴外交官。奥兰多·博什在委内瑞拉入狱11年，他就在狱中指示手下刺客执行恐怖计划。

如此居心险恶的角色总是在美国政府和特别机构的指令下行动，而一再被非法免除罪责和惩罚，例如老布什总统宽恕了博什，美国现任总统容忍波萨达·卡里莱斯在美国领土存在并活动了整整几个星期，这是应该保护美国人民不受恐怖袭击的最大责任人公然违反自己国家的法律。

自从1981年由里根和布什建立全国古美基金会起，波萨达·卡里莱斯所有的恐怖行动，包括在哈瓦那旅游饭店安放炸弹和暗杀计划，都是美国历届政府通过这个臭名昭著的基金会资助的。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出的钱。

从来没有人做事会这样骗人和虚伪。

拉：这些罪恶行动后面总是有美国吗？

卡：从最初时刻起，美国政府就企图制造古巴革命的不利形象。他们开展了大规模宣传战反对我们，进行了大量尝试来孤立古巴。目的就是遏制革命思想的影响。他们1961年断绝了外交关系，采取了经济封锁的措施。

他们早在拉萨罗·卡德纳斯时期就对墨西哥革命这样干过，当时卡德纳斯在1938年对石油实行了国有化。把那场革命说得令人毛骨悚然。1954年对危地马拉哈科沃·阿本斯的革命也这样干，因为阿本斯进行了土地改革。他们对萨尔瓦多·阿连德和他在智利的改革以及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也大动干戈。他们对所有的革命都这样干，今天又对委内瑞拉乌戈·查韦斯的革命这样干。

拉：可是，华盛顿能够得到反对革命的古巴人的帮助来反对你们。

卡：是的。喏，我跟你讲个情况：我们看到和学到的情况是，跑到迈阿密去的许多人，参加恐怖活动的许多人，并不是想他们参加是为了打倒革命。他们都抱着这样的信念：将会是美国和它强大的武装力量打倒革命。离开古巴、抛弃了房子和一切的富人和特权者中的很多人——不是我们赶走他们或者剥夺了他们的房子——说：“这是四五个月的事，一场革命在这个国家怎么能持久呢？”于是就走了。但是反革命分子也有一个信念——在其他进程中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就是他们声名狼藉的事业会因为某种原因取得胜利，而在这种极特殊的情况中，就是因为斗争是跟美国进行的。因此就是企图在某种意义上积累功绩，进几次监狱——虽然这不是特别重要，或者参加个把反革命游击队，在里边不是寻求战斗，也没有任何进攻精神，单纯地是为了表明他们的亲美态度。

他们希望美国人干涉来打倒革命。



我
的
一
生

第十二章 吉隆滩

袭击—雇佣军—美国的干涉—军事胜利—对战败者的待遇—交换俘虏—“肮脏的战争”—肯尼迪总统的作用

拉：那次干涉 1961 年 4 月 17 日发生在吉隆滩，猪湾。

卡：是的，那一天，一支大约 1500 名由中央情报局训练的雇佣军的远征军，分成 7 个营，每营 200 人，分乘 5 条运输船到了吉隆滩。此前的拂晓时分，投下了一个伞兵营，任务是占领穿过萨帕塔沼泽通往滩头的两条公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乘坐几艘美国军舰，其中有“USS 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停在距海岸只有几海里的地方，准备一旦“临时政府”请求，即刻在海军和空军支援下登陆，只要占领吉隆滩一个滩头，就将“临时政府”空运进来。

雇佣军拥有一个 B-26 轰炸机组，由巴蒂斯塔的飞行员驾驶，也有美国飞行员驾驶的。4 月 15 日，他们突然用那些带有古巴标记的飞机袭击我们简陋空军的基地。这次袭击是个迹象，表明入侵迫在眉睫。第二天，在阵亡者葬礼上，我宣布了我们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

他们为登陆选择了一个封闭的地方，就是吉隆滩，那里有一大片沼泽将它与其他领土隔开。很难进行反击，因为必须沿着仅有的两条公路前进，还要穿过 10 公里不可通行的沼泽。这就把那两条公路变成了德摩比利（Térmopilas）道^①。

从 4 月 17 日拂晓到 19 日下午 6 点，连续战斗 60 个小时，经过一场激烈的战役，我们打败了他们，我们有 150 多人战死，几百人受伤。那场战役是在美国舰队面前进行的。将近 1200 名雇佣军做了俘虏，几乎是具有作战能力的敌军的全部，不包括入侵的伤亡者。

^① 古希腊狭窄通道（宽 10—15 米），又译“温泉关”，公元前 480 年这里发生过一场著名战役，一方是莱昂尼达斯指挥的斯巴达人，一方是赫尔赫斯统帅的波斯人。经斯巴达人顽强抵抗后，波斯人终于穿过狭道。

拉：不久你们就将那些俘虏送回去了，是吧？

卡：是的。关了一小段时间后，我们向美国政府要求了一笔赔偿金，好给儿童买药品和食品。如果是在美国，可能以叛国罪处决几个，其余的会判终身监禁，恐怕至今还关押着呢。如果我们招募一千多雇佣军入侵美国，谁都知道会怎么处罚他们。然而四十年后，2001年12月，我们5位同志去美国了解针对古巴的恐怖行动的情况，他们却被非常严厉地判了刑，3个人判终身监禁，甚至还有一个判两个终身监禁，就是我们在这里宣布为“古巴共和国英雄”的那5位同志^①。

拉：我想你们是要用药品交换这些俘虏的。

卡：是的，还有生产食品的资金。甚至谈过农业设备，拖拉机……我们想的是寻求一个能为我们自己人民接受的解决办法，把他们送到那里去。我们要关押的1200名“英雄”干什么？1200名“英雄”还是在那里更好。

我跟他们所有人谈过很长时间，因为我参加过对几个人的抓捕，我可以对您说，或许这又是历史上唯一的案例，请听好，那场残酷的战斗以后，连一枪托也没有打过他们。

拉：没有虐待那些俘虏？

卡：连一枪托也没打，现在同您说话的人是随最先到达吉隆滩的战士

^① 赫拉尔多·埃尔南德斯·诺德罗、拉蒙·拉瓦尼诺·萨拉萨尔、费尔南多·冈萨雷斯·略尔特、雷内·冈萨雷斯·塞赫维雷尔特和安东尼奥·格雷罗·罗德里格斯5名古巴特工，打入了在迈阿密活动的反对古巴的恐怖主义组织，他们毫无根据地被指控进行“间谍活动”，1998年在佛罗里达被逮捕，2001年12月迈阿密一个美国法庭判处他们长期监禁。2001年12月，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授予他们“古巴共和国英雄”称号。2005年8月，亚特兰大上诉法院3名法官组成的一个专门小组宣布迈阿密进行的审判无效，因此强加在5名古巴人身上的刑罚也属无效。但一年之后，这次判决被同一个法院的全体会议前所未闻地撤销。在写这条注释时，5名古巴人仍然关押在美国监狱，其中2名甚至被剥夺了见母亲、妻子和儿女的可能。由于在古巴人们都了解他们，这“5位英雄”的案件掀起了一场强大的国际运动，声援和抨击对他们的非法监禁（还可参见第21章注10）。

一起进入那里的。最后进攻是在入夜时分。我们不想让美国舰队把他们救回去。他们的军舰停在距海岸几海里的地方，得到一艘载着几十架战斗机、登陆装备和随时准备行动的海军陆战队的航空母舰的支援。

我不是要编造那场战役的历史，我只想对您说，在进入吉隆滩之前的最后那几分钟，听到有一条 105 毫米无后坐力炮组成的反坦克屏障的消息，我在最近的 3 辆 T-34 坦克的每一辆上都安置了一名重要军官，我要求他们全速通过屏障。几乎已是黑夜了，我在 5 分钟之内把他们送走了。

我甚至落入我们自己炮兵的轰击之下，因为，喏，当我们的空军报告敌人正以更多兵力登陆时，我说：“不，是正在重新上船。”我指示炮兵向地面鸣几响礼炮，再向大海鸣几响，有不少大炮，还有一整队 122 毫米榴弹炮射击。

当然，那 3 名军官谁也不迟疑，可我忍不住了。我在等一队配备着 122 毫米大炮的重型坦克。我问他们怎样了，他们落后了，迟迟不来。我随便上了一辆停在那儿的、结果是一座 100 毫米 SAU—100 型自动推进加农炮，那时天已黑了，一辆坦克也看不清了，我照旧全速前进，我不知道那座已经战斗了整个下午的铁家伙只带着 3 发、最多 5 发炮弹。

拉：有一幅您在吉隆滩的著名照片，从一辆坦克上跳下来。

卡：是的，我在那些行动的不同时刻上过好几辆坦克，不止一辆。那是另一个故事。

我在跟您讲，从最初的几分钟时起，我偶然跟一小股先头部队在一起，这股部队从北面沿着两条不同的公路前进，一条向东，一条向西，部队在一片黑暗中，在几分钟前我派出的坦克进入了吉隆滩。我走的那条公路，两边靠海的多石土地上长着浓密的树林。反坦克屏障消失了，没有人射击。

我参加抓捕了不知多少俘虏。就在那天夜里，我救了一个俘虏的命，当时他说：“杀了我吧！”他长着大胡子。一个溃烂的伤口在流血。我

对他说：“我们不杀俘虏。”我们用一辆吉普车全速把他送到医院去了。这样他的命才得救。

拉：对吉隆滩那些俘虏，一个也没有虐待？

卡：连打一下都没有，因为那一直是我们的原则，这话我对您说过了，全世界都知道。最令人敬佩的是，在各条战线上有数以千计的人艰苦战斗，看着 450 多个亲爱的同志遇难或受伤。

您要明白，那些以极大热情战斗的人控制住了自己的愤怒，对那些为一个外国强国效劳、没有一点好感的雇佣军中的任何人连一枪托也没打，就一枪托呀，别的我就不说了。我不知道历史上是不是还有同样的例子。

这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觉悟比任何纪律都重要。没有觉悟就不可能有纪律。

喏，越南怎么样？美国军队和他们的越南盟友杀了多少人？平民，被抓的人，不只是战斗中死去的人。

拉：估计 200 万越南人在越南战争中丧失了生命。

卡：多得多，应该看多少人在战斗中死亡，多少人被杀。您知道，在所有这类战争中都是这样。你们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进行过一场战争，应该看有多少阿尔及利亚人受过酷刑和被杀害，这在很多地方都发生过。在 1999 年科索沃战争中，我不知道北约士兵是不是杀过什么人，我不知道那些人的纪律程度怎么样，在那儿杀人的是发射的炮弹和所谓的“隐形”飞机，一场高科技战争，从美国飞去的 B-52，还有其他杀人和毁灭方式。人已经几乎不参加战斗了，战场才是可能出现士兵杀死俘虏情况的地方。

在任何一次现代战争中，美国都不能保证它的士兵没有犯下暴行。朝鲜战争极端残酷，美国在越南那儿有同伙。我不知道其他盟友怎么样，我没有做判断的数据，但是那里杀了很多俘虏，越南傀儡政权的人杀了

很多人。

喏，您找找在一场战役中没有虐待俘虏的例子看。后来，我们参加了其他战役，因为从1975—1990年我们在安哥拉待了15年，我们介入了决定性的奎托夸纳瓦莱战役^①。

可以去问问南非军队，有没有哪个当了俘虏的人受过古巴军队的虐待，有没有挨过一下打，他们在我们手里感到安全。一个例子也没有，请注意。我们对一些国家给予了战斗支援。

由于西亚德·巴雷发动反对埃塞俄比亚革命的侵略战争，我们在那里战斗过^②。我们的军人从来没有处决过一个俘虏，从来没有虐待过一个俘虏，总是给他们医疗援助。

我们古巴的战争，是一场持续25个月的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我跟你说过，如果在那场战争中我们处决过俘虏，那就永远不会赢得那场战争。

拉：你们把吉隆滩的俘虏都安然无恙地送回去了？

卡：是的。我跟您讲过战斗以后的插曲，当时那些人因为死者、伤者和战斗的紧张，情绪很激动，肾上腺素特别多。在革命最初几年，许多战士是民兵，是志愿者，是工人，农民和大学生，他们连一枪托也没打俘虏。送回美国去的俘虏人都还在，住在迈阿密，可以去问他们，看是不是有人说挨过打，一个也没有。

出过一次意外事故。说给您听听：被抓的人很快送往哈瓦那。用卡车，

^① 安哥拉1975年独立后，立即成了一场长期内战的战场，内战一方是阿戈斯蒂纽·内托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控制的罗安达政府，另一方是美国和南非共和国（及其种族隔离政权）支持的安哥拉全国彻底独立联盟。南非和扎伊尔的军队侵入了安哥拉，并威胁要占领国家首都罗安达，面对这种直接干涉，古巴提出“卡洛塔行动”，从1975年11月起，派出一支重要的远征军阻止南非军队，将他们打败，并在1987年奎托夸纳瓦莱战役中使他们遭受惨败，消灭了他们（参见第15章“古巴与非洲”）。

^② 1974年，军队中一些军官在学生、知识分子和居民支持下发动起义，结束了埃塞俄比亚古老的帝制和海尔·塞拉西皇帝的统治。1977年，索马里入侵埃塞俄比亚，占领奥加登地区，要求该地区主权，在此时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上校取得政权。苏联向埃塞俄比亚提供援助，古巴派出一支远征军。1978年，古一埃军队大败索马里军队，迫使其退出奥加登地区。

用拖车等等。人很多，那时我们还没有现在的这些工具和组织。一辆拖车门关死了，由于一个负责运送的人粗心大意，没有采取适当措施，在那辆运送俘虏的车里有几个人窒息了。

拉：有死的吗？

卡：有。那件事完全是一次意外事故。我们怎么想？我们不想死一个人，因为我们的俘虏越多，胜利就越大，这是从俘虏的雇佣军人数上看的。虽然胜利不是只根据敌方伤亡人数来衡量。我们死的人比他们多得多。

雇佣军受过很好的训练，有良好的装备。但我们白天黑夜地进攻，进攻，进攻，打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美国的几千士兵、几百军官，就是我说这话的证人。

用古巴标志伪装起来的 B-26 轰炸机袭击我们运送步兵的汽车。以此来欺骗我们的部队，发生过可怕的事。但尽管如此，没有一个俘虏受虐待。

我们判处他们为每位俘虏支付一笔 10 万美元的赔偿金，或者一种替代性的刑事处罚。我们想要的是支付赔偿金，不是因为需要钱，而是因为这是美国政府对革命胜利的一种承认，更是一种道义惩罚。

拉：必须要有所惩罚。

卡：这么说吧，当时他们被关押了，就谈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央情报局企图利用跟我谈判的那位律师，让他给我带来一件浸了足以杀死我的蘑菇和细菌的潜水衣做礼物。那个跟我谈判释放吉隆滩俘虏的律师！

拉：他们肆无忌惮。

卡：我不能说他卷入了这个计划。知道和了解的情况是，他们想利用他做工具。那个律师姓多诺万，叫詹姆斯·多诺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自觉参加的，而是他们想利用他。当然，我在这种炎热的气候下不常穿潜水衣。你穿上一件潜水衣，就必须给铅腰带增加重量，在我们的海里不能用。喏，在许许多多暗杀计划里有这个，因为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调

查和公布了这个计划。

拉：丘奇委员会？

卡：是的。所有这些都是他们调查的，不是我编造的。不过请注意，有什么道义嘛！这就是谈判释放那些俘虏的那个人，许多俘虏本来是会以叛国罪处以极刑的。

而我们却在释放他们！

拉：在吉隆滩登陆的那些人是什么人？

卡：那些雇佣军是什么人？是跑到美国去的战犯，因为军官和主要头目几乎无例外地是巴蒂斯塔军队的军官，在入侵者队伍中有很多地主和富人家庭的儿子。这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入侵的阶级性。

拉：最终你们交还那些俘虏得到的赔偿是什么？

卡：我想经过与多诺万讨论后，他们支付了 200 万美元现金，我们用它在加拿大买了孵化器来开发饲养业的基因学。据多诺万说，还有 5000 万美元的儿童食品和药品。药品收费相当贵，别以为比现在便宜多少。总数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支付了赔偿。

就是这样。是我们为他们寻找办法来解决关押的这么多俘虏的问题。美国政府没有充分的想象力。我们甚至要跟他们建立某种关系，因为他们最终确实说了真话，公开说的。处罚不是出于仇恨和报复。胜利是对我们最重要的奖赏。我们把那 1200 名俘虏留在这儿干什么？

拉：您就不怕他们回到迈阿密后重新应招参加反对古巴的暴力行动？

卡：不错，是的，我们送回去的一些人确实再次安放过炸弹和进行过敌视行动。难道这要我们承担责任吗？不。一艘装“英雄”的船是可怕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成了头头，每个人都是“英雄”。实际上，我们送回了一千多个“狗熊”。

可是，我们给他们送去了多少这样的人，就是那些所谓“不同政见者”呀？是谁放了他们？古巴政府。这件事的证人，约翰·奥康纳红衣主教^①，是纽约的大主教。好几千因为严重暴力行动而受惩罚的人跟他走了，很多是恐怖主义行动，因为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历届美国政府组织的针对古巴的反革命行动有好几千次。

他们只受了一部分惩罚我们就放了他们。我们对红衣主教说：“请设法为他们搞到签证，因为您也知道，他们想去的是美国。”所有这些“不同政见者”在美国都得到了特权，包括工作；喏，甚至包括为试图消灭革命没有做过什么事的人。

我对纽约那位红衣主教约翰·奥康纳很敬重。革命释放了好几千反革命分子。确实，有些人又重新犯罪，组织小组，自行训练，编造各种谣言和谎话。因此，在这些事情上必须小心行事，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大方，宽恕他们个把人，他们就去了美国，开始接受训练，组织反对古巴的活动，潜入我们沿海，这最终会要了我们一个同胞的命。

拉：您指的是“阿尔法-66”的活动分子还是“欧米加-7”^②的活动分子？

卡：还有别的。我跟您说过，在最初几年，有几千人卷入反革命武装集团。甚至在全国各省都开展了“肮脏的战争”，包括哈瓦那省。只要有隐身处，有甘蔗田就行，全国都有“肮脏的战争”。可以说，古巴是我们这个时代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肮脏战争”手段的唯一的革命国家，这种战争对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代价高昂，耗时费力。

^① 约翰·奥康纳(1920—2000)，从1984年至2000年5月4日逝世，任纽约红衣大主教。1998年1月，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时，率领一个纽约朝圣者代表团访问古巴。

^② 阿尔法-66，1961年建立的准军事组织，基地设在迈阿密，在那里有训练营地。在古巴进行自杀式袭击并组织罪恶行动。欧米加-7，1974年建立的恐怖主义组织，基地设在迈阿密，基本上由吉隆滩入侵的老兵组成，专门进行针对古巴政府在纽约、新泽西和佛罗里达的代表的汽车炸弹暗杀和武器袭击。是四十六年间对古巴实行的系统的恐怖主义中最活跃的两个组织。

拉：您说到“肮脏战争”时，指的是，比如说，像公共场所的罪行这类行动吗？

卡：不，不是，是指非常规武装集团对我们进行的一种游击战。因为美国人很聪明。苏联朋友很迟钝，很学究气；而美国人，美国军人，很灵活。他们立刻就看出来我们用什么方法推翻了巴蒂斯塔，战胜了那支军队，那就是武装斗争与人民斗争相结合。

拉：他们以为也能建立一些游击队来对付你们？

卡：试图这样做过。那是他们第一次使用这种方法。他们不尊重我们的专利权！他们自己就使用了，就组织了。我们在对付匪徒的斗争中比在对付巴蒂斯塔的战争中死的人还多。他们利用了我国中部的埃斯坎布拉伊山，而我们向那里派去了4万多人，都是志愿者，其中很多人是首都的。

在对付“肮脏战争”的斗争中使用兵役制部队时，参加的应征者都是根据一个观念自愿去的，这个观念就是：在一场国内斗争或一次国际主义使命中，战士应该是自愿的。

拉：我打断一下，80年代，尼加拉瓜的“反对派”也是美国资助、武装和训练的，桑地诺主义者既然了解你们在“肮脏战争”中的经验，却没有能够消灭他们，这怎么解释？

卡：我认为那里犯了个错误，但你不能责怪他们。在尼加拉瓜，军队是为了保卫自己不受帝国主义的外部侵略而建立的，但是帝国主义发动了一场国内战争，而我要说，国内战争是不能用服兵役的士兵去对付的。你根据义务兵役法带兵，训练，派他去战斗，他战死了，家里就认为是国家，或革命，或它们的法律让他去送死。

或许桑地诺主义者付出了“肮脏战争”的最高代价，因为他们规定了兵役制。为了对付“肮脏战争”的匪徒，我们根本没做这种事。有那么一个时期，被学院主义牵着鼻子走，结果学院主义造成人们有点儿偏离了革命造就的最好的东西，那就是对通向胜利的策略与政治和军事方案的创造

精神。如果您被学院书本里的教条牵着鼻子走，您就完了。

真的，我过去一直有反学院派的思想。请您想象一下，在当今时代，在“隐形”飞机和智能导弹时代，在能够用相当准确的武器在六七公里以外摧毁一辆坦克的时代，例如用雷达为您锁定和摧毁坦克，我们还在抱着关于1959年、1960年、1961年和1962年防务的原则和措施生活。有的武器您应该会用，您必须完全离开学院的书本和方案。

拉：你们就这样在埃斯卡布拉伊山里打败了“肮脏战争”？

卡：我们包围了埃斯卡布拉伊山，把它分成四段，在每个区域的每间房子中布置一个小队进行清剿，我们一小块一小块地清剿。包围常常并不是很密集、严密的。一次夜间包围常常能够搞清敌人从哪里经过，因为可以整队、靠近，投一颗手榴弹，射击，为了不伤着自己的同志，在被攻击点左右两边的人不能痛快地大干。

有10%农民的支持，就可以建立开展非常规战争的根据地，在埃斯卡布拉伊山那儿，由于某些特定情况，由于在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时期有一些集团在那里活动，革命没有这么多人支持，大概可以得到8%（原文为80%，疑有误——译注）的人的支持。只要得到5%居民的支持就可以组织一场非常规战争。

我们的非常规战争与他们在这里组织的非常规战争之间的区别是，我们时刻在行动，监视着敌人，以使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在固定的一点或在运动中打击他们，进行武装斗争的匪帮成员没有这种精神。后来，从尼加拉瓜发生的事情以后，他们这种武装斗争就开始叫作“肮脏的战争”了。他们是逃避战斗和摆脱追击的老手，在这种事情上，他们有点开溜的特殊才能。我们从来不发扬这种才能，因为即使在我们人数极少的时候，我们的方针也是打击，打击。他们则相反，在地下挖一个装有电灯和设有小呼吸孔的掩体，像潜水艇的船员那样吸取空气。如果派一营人采用强有力的、像篦头发的方法清剿区域——每10米由一个人进行搜查，但仍然一个匪徒也找不到。他们成了逃避战斗和逃避追击的真正的行家里手，但不发扬

一点进攻精神。

后来，80年代和90年代，帝国主义改变了策略：派遣雇佣军——受过对萨尔瓦多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进行杀戮和种族灭绝的毒害的年轻的小伙子，给他们5000美元在古巴的饭店里安放炸弹。波萨达·卡里莱斯和其他恐怖主义特务不是从美国政府来的。喏，我们有个萨尔瓦多人，是雇佣来的，每个炸弹5000美元，他一天就放了5个。这么说吧，在许多国家，您出钱就可以招募数以千计的雇佣军，有时候甚至出2000就行。给他们出来往旅费，等到放完炸弹回去之后再给钱。

因此这个萨尔瓦多人想创造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纪录：企图让5个炸弹同时爆炸。与此同时在迈阿密，古美基金会和整个黑帮宣布，罪犯是军事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人，是不满现状的古巴人，他们在饭店放了炸弹，这是非常正当和合法的事。关于这种事情，报刊上登的文章很多。

拉：后来还有其他类型的袭击吗？

卡：喏，我跟您谈到了数以千计的恐怖主义行动、暗杀、火烧“埃尔恩坎托”百货公司、炸毁“库布雷”号船、在飞行途中炸毁民航客机；谈到了病毒攻击、猪瘟和造成数十万人生病和一百多个儿童死亡的出血登革热。

此外，80年代还有针对农业的生物袭击。例如，一种叫蓝霉菌的寄生植物袭击了我们的烟草种植园；接着，一种不知名的菌类毁了我们最好的甘蔗品种——巴巴多斯4362，毁了这个品种90%的收成。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的咖啡也是这样。其他作物受了另一种灾害蓟马虫害（Thrips Palmi）。马铃薯的收成也是这样。还有其他毁灭性的灾害，给我们的农业制造了很多难题。很难证实，但所有情况表明，这些灾害不是偶然出现的，确实是有人居心险恶。此外，这种事打击起来很复杂，必须运用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准备没有多大作用。

拉：从军事观点上说，你们拥有足够的拿起武器的人来抗击所有那些

侵略和所有那些威胁吗？

卡：在60年代特定时期，为了保卫国家，我们需要的人力规模上升到数十万人，因为我们的对手不是别人，恰恰是美国。

那时是这样的年代：还是以人与人之间、战士之间、旅之间、营之间和军之间的斗争进行常规战争。在那个年代，您必须预见到海上登陆。占领一个国家——这里指的是一个岛国——的主要途径是海上登陆。您还必须考虑到空中登陆，但这不是主要方法。我们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在可能进行海上登陆的点上。在保卫从各个角度看是最具战略意义的区域时，监视运兵船的技术发展，特别是监视可能登陆的地点。有这么多可能的海上登陆地点，自然也是可能的空中登陆地点，我们就必须在几乎全国进行强大的动员和准备。

哦，对了，幸好那时候已经进行了扫盲运动，正在进行继续教育计划，到处都有学校。

拉：这使得你们拥有了受到更好教育能够掌握现代军事装备的人吧？

卡：不错。例如，在1962年“十月危机”后的某个时期，我们不得不接受4.2万苏联士兵的全部装备，其中包括要求具有至少12年级和专门学习的知识的才能使用地对空导弹。连大学专业人员的培养也受到了影响。我们得不到想要的医学大学生数目，学士的数量也不够，许多读学士学位的人就部分地，或在战斗中，变成了掌握现代技术、雷达和通信的临时教师，就是说，实际上，所有装备都需要非常有技能的人员。

所以在某个时期，很大一部分服3年兵役的士兵是半技术员或学士。进入人才奇缺的一些专业的人有些例外。例如医学，因为在1959年以前我们有6000名医生，而在最初几年走了3000人。

我们用了不少于二十年时间挑选学生学习医学专业，从而达到我们现在拥有的7万多名医生这个数目，且每名医生几乎都掌握一个或两个专科。从只有1个医学系增加到21个系，几乎都是特殊时期以前那最后十年间建立的。第22个医学系主要是为来自国外的学生开办的。

拉：无论吉隆滩登陆还是“肮脏的战争”，都是美国约翰·肯尼迪总统批准的，您刚才提到1962年严重的“十月危机”，后来，他跟您和赫鲁晓夫一样，也是那场危机的主角。然而，听您说到肯尼迪时，没有感到对他有什么敌意，甚至反而感到有点好感。这又怎么解释？

卡：喏，1961年4月吉隆滩时，肯尼迪实际上是继承了艾森豪威尔及其副总统尼克松的计划。入侵已经决定好了，有了消灭革命的计划，尽管革命还没有正式的社会主义性质。

在那时以前，我们采取的最重要措施是土地改革和大型工业、商业和银行企业国有化，还有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其他措施，诸如扫盲、降低电价和电话费、城市改革、房屋租金法、没收盗用公款者的财产，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宣布社会主义，也没有公开宣布马列主义学说，吉隆滩战役加快了革命进程。

我甚至应该说，我们的第一次土地改革那时候还不如麦克阿瑟将军在日本进行得那么激进。因为美国1945年占领日本时，麦克阿瑟消灭了大庄园，分了土地，把小块土地给了许多日本的贫穷农民。在日本，大庄园不属于美国大公司，而在古巴属于这样的公司。因此，在这里不允许进行土改，就像阿本斯1954年在危地马拉进行时不允许一样。

于是，肯尼迪怀着疑问、顾忌和某些迟疑执行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的行动计划。他相信，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制定的这样的计划将会得到人民的支持，人民会加入入侵者的行列，民兵不能战斗，他们肯定会发起反对国家政府的暴动。他们也许相信了他们自己的虚假宣传，无疑，他们低估了古巴人民和革命者。

肯尼迪犹犹豫豫，面对入侵者的困难，终于决定给他们空中支援，但是在他们准备这样做时，已经没有雇佣军可支援了。不到72个小时，起义军和革命民兵闪电般的反击就彻底消灭了那支远征军。帝国的一场惨败。一次大大的羞辱。

拉：肯尼迪对那场羞辱做出怎样的反应？

卡：他一方面推动经济封锁、海盗袭击和“肮脏的战争”。但也以一种比较聪明的方式做出反应：为拉丁美洲制定一个社会改革和经济援助的政治计划。

吉隆滩失败后，肯尼迪提出争取进步联盟、和平队，这是一项遏制革命的真正狡猾的战略。他制定了一个计划，十年内拨款 200 亿美元，用于一项土地改革计划，土地改革呀！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土地改革这个词，把它看作是共产党人的事，却提出拉丁美洲需要一场土地改革。他们另外还提出建造住房、财政改革、教育和医疗计划。喏，几乎，几乎就是我们正在做的。

面对古巴革命，肯尼迪被迫抛出这类动议。他明白，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客观因素可以在这个大陆引发一场激进的革命。可能会有全大陆范围的，而且或许更加激进的古巴革命。

最后，许多拉美领导人把能捞的钱都捞到了，争取进步联盟平平庸庸地结束了。但这是肯尼迪一个狡猾的反应，他的智慧确实无可争议。



我
的
一
生

第十三章 1962年“十月危机”

濒临一场原子战争边缘的世界—苏联人的背叛—失败的谈判—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普京—肯尼迪被刺

拉：您和全世界与肯尼迪一起经历了一场最危险的国际危机：1962年“十月危机”。时过四十三年后，您怎样看当时的形势？

卡：那是个非常紧张的时刻，可以从那场危机中得出的教训很多。由于美国政府对古巴的侵略和野蛮政策，和一项直接使用该国海上、空中和地面部队入侵我们岛的计划——这项计划是他们在吉隆滩遭受惨败10个月后，在危机爆发前大约8个月时通过的，世界差一点发生一场热核战争。

苏联人得到关于这项计划绝对真实的消息，通报古巴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尽管不是完全明白地说，实际上是在保护消息来源。他们说，赫鲁晓夫与肯尼迪在维也纳会晤后，他们已经确信那个计划。几乎在二十年后，当与这件事有关的文件被美国政府解密并公布时，才知道计划的细节。

为了跟我们谈话，他们派了乌兹别克斯坦党的书记沙拉夫·拉希多夫(Sharaf Rashidov)和苏联战略导弹部队的首脑谢尔盖·比尔尤佐夫(Serguei Biryuzov)元帅。劳尔和我出席了与他们的第一次会见。

在提供了上述情报后，他们问我想应该怎样才能避免那场袭击。我十分镇静地说：“像他们在类似情况下做的那样，请你们发表一项公开声明警告美国，对古巴的攻击将被认为是对苏联的攻击。”

我阐述了那个观点。他们想了片刻，然后又说，为了不单单是个声明，必须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就在那时他们表明了他们的看法：在古巴部署最低限度的中程导弹。

在我看来，就像我察觉的那样，在苏美力量对比中取得优势的愿望已经显而易见。我坦言，不太愿意那些武器在古巴存在，因为我们关注的是，

避免我们国家成为苏联基地这样的形象，特别是在拉美范围内成为基地。我对他们说：“咱们休会一会儿，我想跟革命的全国领导商量一下这件棘手又非常重大的事情。我就在中午商量。我记得参加那次会议的除了劳尔以外，还有布拉斯·罗加、切、多尔蒂科斯和卡洛斯·拉斐尔。我向他们说明了会谈的情况，和除了真心希望防止对古巴的攻击，赫鲁晓夫对此事感到有牵连以外，苏联人希望改善战略力量对比，苏联导弹安放在古巴意味着可以与美国通过将类似导弹安放在苏联邻国土耳其和意大利取得的优势等量齐观。”

我还说，在美国侵略我们国家时，我们指望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全力支援，而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需要我们时，如果我们拒绝冒政治和威信的风险，那将是我们前后不一。在领导层的会议上，大家一致接受了这个道义和革命观点。

回到苏联代表等候我们的地方，我对他们说的原话是这样的：如果是要保护古巴不受直接攻击，同时又巩固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我们同意部署必要的中程导弹。

剩下的时间用来讨论有关的补充措施。将运进 42 枚中程导弹。将用火箭艇、一个米格 -21 飞行团、4 个全副装备装甲车和坦克的摩托化步兵旅和一个战术核导弹团加强古巴的海军、空军和地面部队；将部署射程 30 公里的地对空防空火箭炮来保护战略核武器。

这次谈判是在危机 5 个月前进行的。一秒钟也不能耽误，工作量是巨大的。

没有这些前提，就不能想象 1962 年 10 月发生的事情。此外，还立刻提出起草有关文件。苏联人给国内发了出去，不久就传了回来。

我仔细分析了文件，意识到从政治观点上看，关于运进导弹的军事协议或协定草案有漏洞，如此棘手问题不适宜作为公开文件提交。

将草案从头至尾重新修改了一遍，我是用手写的，让劳尔带到莫斯科。他在那里与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赫鲁晓夫讨论。他们接受了，连一个句号和一个逗号也没删。

开始进行准备。应该承认，苏联军队和国家行动效率很高，在这样短的时间内部署了协议规定的兵力。我们方面做了巨大努力，与苏联人一起勘查分布部队和武器的地点，包括中程导弹和所有保护部件。按照尽可能严格的分隔、伪装和谨慎的规范做所有这一切，或许这是最难的，这谁都可以想象。我们的武装力量和安全机关在党和群众组织的支持下行动得非常有效，我认为世界上还没有看见过那样的效率。尽管做了这样的努力，传言（rumores）——我们古巴叫谎言（bolas）——还是到处传。反对革命的人通过各种途径向美国发出音信，告诉家属和官员他们观察到的动静。报刊很快就对谣传做出回应。肯尼迪受到反对派和报刊的诘问。

就正在运往古巴的武器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苏美两国政府进行了一场无谓和奇怪的争论。赫鲁晓夫对肯尼迪肯定地说，武器是防御性的。肯尼迪理解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中程导弹。我想，肯尼迪是按照他的方式理解了赫鲁晓夫明确无误地说出的话。赫鲁晓夫继续肯定地说；不是出于技术观点，而是出于维持苏联在古巴地位的防御性意图，武器是防御性的。苏联没有任何必要做这些解释。古巴和苏联做的是完全合法和严格符合国际法的。从最初一刻起就应该宣布，古巴可以拥有为了自卫所需要的武器。

我们不喜欢公开辩论正在出现的势头。我派工业部长和革命统一组织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切去向赫鲁晓夫阐明我的观点，包括必须立即公布苏联和古巴之间签署的军事协议。

我没能说服他。赫鲁晓夫的回答是，过些时候他将派波罗的海舰队去压一压美国方面过分强烈的反应。

在我们古巴领导人看来，苏联是个强大和有经验的国家。我们没有别的理由说服他们处理事务的战略应该变一变，除了信任他们，我们别无选择。

拉：危机是怎样开始的？

卡：10月14日到15日，美国人侦察出了导弹设施。一架高空飞行的

U-2 间谍飞机拍到了几处发射台的照片。今天才知道，实际上是苏联情报机构的一个成员奥列格·潘科夫斯基（Oleg Penkovsky）上校，把后来 U-2 飞机侦察到的导弹的精确位置给了美国人。10 月 16 日报告了肯尼迪。六天后危机就开始了。

赫鲁晓夫态度的难以置信之处在于，既然在全国各处部署了地对空火箭炮，却没有阻止对手完全有可能找到苏联—古巴的防御工具，而是允许间谍飞机飞行。

这已经不是与战术或战略有关的问题。而是一个与面对造成的形势是否保持真正坚决态度有关的决策。从我们的观点来说，当时我们坚持、现在我们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允许间谍飞机飞行就无偿地给了对手一个极大的便宜。允许他有整整一周的时间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组织应对计划。

危机爆发时，赫鲁晓夫对于应该怎么办没有明确的想法。他的第一个声明是强烈谴责肯尼迪采取的立场。

拉：那么肯尼迪怎么样？

卡：肯尼迪在危机爆发好几天以前就行动了。10 月 19 日，他跟军队参谋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商议，参谋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他对导弹设施进行大规模空中袭击。10 月 20 日，肯尼迪听从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的建议，决定用 183 艘战舰，其中包括 8 艘航空母舰和运输舰上的 4 万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从海上封锁古巴岛。

与此同时，579 架战斗机集中在佛罗里达，5 个师的军队随时待命，其中有伞兵第 82 和 101 王牌师。这时美国和世界公众舆论还不知道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拉：肯尼迪是什么时候告诉公众舆论的？

卡：10 月 22 日，肯尼迪在晚上 7 点发表电视讲话。他通过美国所有频道极其耸人听闻地发表讲话。世界舆论那时候才得知危机和世界处于一

场热核战争边缘。肯尼迪宣称，苏联应该要么撤出他们的导弹，要么冒险进行那样的战争。他还宣布海上封锁古巴，以阻止运进新导弹。那时候，苏联人已经拘捕了奥列加·潘科夫斯基少校，并且知道了美国人已掌握了所有情报。

拉：您是什么时候知道美国人知道的？

卡：实际上，22日那天大张旗鼓地宣布肯尼迪要在晚上7点讲话我就猜出来了，我还观察到一系列其他迹象。除了对导弹存在的反应以外，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事。我曾经请求在古巴的苏联军事指挥部最大限度地加快建设战略导弹发射台。我们必须随时准备战斗。白天黑夜地干。10月16日，实际上还没有一处发射台完工。18日建成了8处，20日有了13处，21日已经有了20处。全速进行。

拉：面对如此大的危险。你们做了些什么？

卡：我跟您说过了，从肯尼迪讲话之前的时候起，我们就预先猜到 he 露面的目的，于是决定宣布战斗警报，并动员到最后一个人。将近30万有高昂战斗精神的战士拿起了武器。10月23日，我发表电视讲话，谴责美国的政策，提请注意入侵危险，全面动员人民，并且表明不管有什么样的风险，我们准备在任何情况下进行战斗。

拉：美国舰队的海上封锁真的实行了吗？

卡：实行了。封锁是在10月24日从下午两点实行的。当时正有23艘苏联军舰向古巴开来。

拉：在那种形势下联合国是怎么做的？

卡：美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和苏联大使瓦列里安·佐林（Valerian Zorin）进行辩论，我说是一场令人厌烦的辩论。史蒂文森引人注目地向安理会提交了战略导弹基地的大幅空中照片。佐林否

认证据，否认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他拒绝辩论。一切都是没有预见到的，那人没有为辩论做准备。他不进攻，不谴责，不使用古巴这个受超级大国侵略和威胁的小国拥有的要求支援的强有力的理由，不使用忠于其国际主义原则和义务的苏联拥有的给予支援的强有力的理由，却卷入一场源自赫鲁晓夫在危机前几个月内的动摇和对这件事的蹩脚的公开处理的平庸的争论。他犯了拒绝真正辩论的错误，这样的辩论本应该涉及古巴的主权、自卫和自我保护的权利。

这是 1962 年 10 月 25 日的事情。

拉：这会儿我想象美国人在继续飞越古巴，不是吗？

卡：他们继续飞越，而且允许他们不受惩罚地飞越，尽管有恰恰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事先部署好的防空火箭炮，我说的这种情况就是在我们领土上空公开和无耻的间谍活动，观察我们防务的每一个细节。

他们继续派遣 U-2 间谍飞机，还开始进行侦察飞行，甚至低空飞行。我们决定对掠地飞行的美国飞机开火。那时候掠地飞行侦测不出来，便于突然袭击。我们向驻这里的苏联军事负责人提出了这一点，对他们说不应该允许掠地飞行。我们事先告诉他们我们要打。用防空大炮开火。

10 月 27 日，在奥连特省，苏联人操纵的一门萨姆式防空火箭炮开了火，击落了一架 U-2 间谍飞机。那时候出现了最紧张的时刻。间谍飞机驾驶员美国军官鲁道夫·安德松丧了命。那件事证明实际上已经在战斗。随时可能发生一个引发战争的新事件。请允许我告诉您，在这里，人们很平静。

拉：您在某个时刻想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

卡：请注意，那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我们自己相信冲突不可避免，我们决心接受那场风险。我们脑子里没有闪过在对手的威胁面前让步的念头。

拉：可是苏联人让步了。

卡：在那个极度紧张的时刻，苏联人向美国发出建议。赫鲁晓夫没有跟我们商量那个建议。他们提出，如果美国从土耳其撤出大力神导弹，他们就撤走导弹。10月28日，肯尼迪接受了这项承诺。苏联人决定撤走SS-4导弹。我们认为那绝对是不正确的。那种做法引起了极大愤怒。

拉：您有过协议是背着你们达成的印象吗？

卡：我们是从公开渠道得知苏联人正在提那个撤走导弹的建议的。绝对没有跟我们讨论！我们不反对找个解决方案，因为避免一场核冲突是重要的。但是赫鲁晓夫必须对美国人说：“还应该跟古巴人讨论一下。”那时候缺少镇定和坚定。由于是原则问题，他们应该跟我们商量一下。

如果商量的，协议的条件肯定会比现在好。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就不会还在古巴，就不会还坚持高空间谍飞行。所有这些使我们受到极大侮辱。我们提出了抗议。即使在达成协议后，我们还继续对掠地飞行开火。他们不得不停止了这样的飞行。我们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了。那件事影响了我们的关系好多年。

我本不想对您详细叙述我们在那场危机中采取的所有步骤，但是，如果不了解赫鲁晓夫与我之间的来往信件，就不能理解那些步骤的全部政治、道义和军事含义。

先给您念念1962年10月26日我给赫鲁晓夫的信：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从对形势和我们掌握的报告的分析看，我认为侵略几乎在最近的24至72小时之内就会发生。

有两种可能的形式：第一种也是最有可能的，是对特定目标的空中袭击，以达到摧毁它们的有限目的；第二种虽有可能性但不太可能，是入侵。我明白，实行这种方式将要求大量兵力，此外，也是最令人厌恶的侵略方式，这一点可能会阻止他们。

您可以放心，不管是哪种袭击，我们都将坚定和坚决地反击。

古巴人民的精神状态极其高昂，将英勇地抗击侵略者。

此刻，我想用简短的话表达一点个人意见。

如果出现第二种方式，帝国主义者入侵古巴以便占领之，这种侵略政策包含的对人类的危险是如此之大，因此在那种情况发生后，苏联绝对不应该允许帝国主义者可能对古巴进行最先核打击的情况。

我之所以跟您这样说，是因为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性变得极其危险，如果他们真的做出如此野蛮和违反法律和普遍道义的事，例如入侵古巴，那么无论解决方案多么残酷和可怕，那将是为了最正当的自卫永远消灭这样危险的时刻，因为不可能有其他解决方案。

看到这种侵略政策在怎样发展，帝国主义者怎样不顾世界舆论和无视原则和法律，封锁海域，侵犯我们的领空并准备入侵，而另一方面，尽管他们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却设法使任何谈判的可能性归于失败，这点意见是看到这些情况产生的。

您过去和现在都在不懈地维护和平，在您那超凡的努力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时，我理解这些时日必定多么苦涩。尽管如此，我们将把和平得以拯救的希望保持到最后一刻，并准备做出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但同时，我们也平静地准备面对一种我们看到非常现实和非常迫近的形势。

再次向您表达古巴人民对待我们如此慷慨和亲如兄弟的苏联人民的无限感谢和尊敬，和我们对您的深切感激和敬佩，并祝在您掌管巨大任务和严肃责任中取得成功。

顺致兄弟般的敬礼！

菲德尔·卡斯特罗

10月28日，赫鲁晓夫给我回了一封信：

亲爱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

10月27日我们致肯尼迪总统的信可以使问题按照有利于你们的方向得到处理，保卫古巴不受入侵和不致引发战争。看来，您也了解到肯尼迪的复信做出了美国不仅不用自己的军队入侵古巴、而且也不允许它的盟国实施入侵的保证。美国总统以此积极地回复了我1962年10月26日和27日的信件。

……

但是现在，法律不像五角大楼黠武主义者的不明智那样有效。现在，当协议遥遥在望的时候，五角大楼在寻找借口使协议归于失败。这就是它组织飞机进行挑衅飞行的原因。昨天你们击落了一架飞机，而以前在它们飞越你们领土时没有击落。这样的步骤将会被侵略者利用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尼基塔·赫鲁晓夫

就在那同一天，10月28日，我回复赫鲁晓夫：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我国政府关于您向我们通报的情况的立场包括在今天提出的声明中，声明的文本肯定您已知晓。

关于我们采取的防空措施，我想向您说明一点。您说：“昨天你们击落了一架飞机，而以前在它们飞越你们领土时没有击落。”

以前它们是孤立的侵犯，没有特定的军事目的或由那些飞行派生出的实际危险。

现在情况不同了。存在着对特定军事设施突然袭击的危险。我们决定不应该坐视不顾，因为关闭了侦测雷达，潜在的侵略性飞机不受

惩罚地在目标上飞行，一场突然袭击可能会将它们彻底摧毁。在付出努力和花费之后，我们不认为应该允许这样的事，此外，那样会在军事和精神上极大地削弱我们。10月24日，古巴军队怀着这样的动机动员了我们全部储备的50门防空大炮，来支援苏联军队的那些阵地。

如果我们想防止突然袭击的风险，炮兵必须得到射击的命令。关于击落飞机的情况，苏军指挥部可以向您提交补充报告。

以前，对我们领空的侵犯事实上是偷偷地进行的。昨天，美国政府企图将昼夜任何时候侵犯我国领空的特权正式化，对此我们不能接受，因为那等于放弃一项主权利。然而，我们同意在恰恰可能对谈判造成极大损害的这个时刻防止发生事件，我们将向炮兵发出不要射击的指令，但只能在谈判进行期间，而且不撤销昨天发表的关于决心保卫我国领空的声明。此外应该考虑到在当前紧张情况下可能偶然发生事件的危险。

我还想告诉您，原则上我们反对对我国领土进行检查。

我特别赞赏您为保卫和平做出的努力。我们绝对赞成必须为这个目标而斗争。如果能够公正、牢固和最终做到这一点，那将是对人类无可估量的贡献。

顺致兄弟般的敬礼！

菲德尔·卡斯特罗

10月30日，赫鲁晓夫给我写信：

亲爱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

我们已经收到您10月28日的信和关于您，还有多尔蒂科斯总统与我们大使举行的会谈的通报。

……

我们理解，由于我们答应美国政府从古巴撤出作为进攻性武器的

导弹基地，以换取美国方面放弃用美国自己及其西半球盟国的军队入侵古巴的计划，从而解除“四十天行动”，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的承诺，这样做给您造成了一定困难。这样做导致消除了——正如您非常清楚的那样——孕育在两大强国对抗之中的加勒比地区的冲突，并消除了这场冲突成为世界性热核和导弹战争的变化。

我们从我们驻古大使那里得知，在一些古巴人中存在着这样的看法：古巴人民希望得到另一种性质的声明，无论如何也不希望得到关于撤出导弹的声明。

……

还有意见说，如同大家所知，在采取您所知道的决定之前，我们和您没有就这些问题进行磋商。

……

难道这不是你们方面与我们的磋商吗？我们理解这封电报是极度恐慌的信号。如果在已经造成的情况下，同时还考虑到美国黠武主义这个无节制的好战集团想利用造成的形势对古巴进行袭击的情报，我们继续磋商，我们早就失去了时间，这场打击也早就实行了。

我们形成了我们在古巴的战略导弹变成了对帝国主义分子有吸引力的力量的看法：他们被吓住了，由于害怕会发射导弹，他们可能会冒险通过轰炸来消灭之，或者可能会冒险对古巴实行入侵。应该说他们能够使导弹退出战斗。因此，我再说一遍，你们的恐慌是完全有理由的。

在您10月27日的电报中，您建议我们首先对敌人的领土进行核打击。您当然清楚这样会导致怎样的结果。这将不是一次单纯的打击，而是一场世界性热核战争的开始。

亲爱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我认为您的这个建议是不正确的，虽然我理解您的动机。

我们经历了可能爆发世界热核战争的最严重时刻。在发生那种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显然会遭受极大损失，但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也会损失很大。至于古巴和古巴人民，甚至很难笼统地说，对他们那将会怎样结束。首先，古巴将会在战火中烧光。毫无疑问，古巴人民会英勇斗争，但也会英勇地消失，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

现在，由于已经实行的措施，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与您谈判向古巴运送导弹武器时提出的那个目标。我们已经使美国承担起他们自己不入侵古巴、也不允许其拉美国盟友入侵古巴的义务。我们在没有核打击的情况下得到了这一切。

……

在保卫古巴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时，我们当然不能相信美国政府的否决权。我们已经并将继续采取一切措施来加强我们的防务和积蓄力量，以备还击的不时之需。

……

我们认为侵略者遭受了失败。他准备侵略古巴，但我们中止了侵略并迫使他在世界公众舆论面前承认在现阶段不这样做。我们评价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帝国主义当然不会停止反对共产主义。但我们也有我们的计划，而且要采取我们的措施。只要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政治——社会制度，只要其中的一个——我们知道那必将是我们的共产主义制度——没有在全世界胜利，这个斗争过程就将继续下去。

尼基塔·赫鲁晓夫

10月31日，我以下面的方式给赫鲁晓夫复信，这是我要读的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10月30日来信收悉。您认为在采取撤走战略导弹的决定之前确实征求过我们的意见。其根据是您所说的从古巴传去的令人惊恐的消

息，最后还有我10月27日的电报。我不知道您得到了怎样的消息。我只对10月26日夜发出、您10月27日收到的信负责。

赫鲁晓夫同志，我们在事态面前所做的就是做好准备和决定斗争。在古巴只有一种警报：战斗警报。在据我们判断帝国主义的袭击已经迫在眉睫时，我认为将此情况通报给您，并提请苏联政府和指挥部对袭击的可能性保持警惕是适宜的，因为已经有苏联部队承诺：在保卫古巴共和国不受外部侵略时与我们一起战斗，而对于这样的袭击，我们无法阻止，但可以抵抗。

……

危险不会影响我们，因为我们感到我们国家面临危险已经很长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它已经习以为常了。

……

当得知撤走武器这个突然的、出乎意料的和实际上无条件的决定时，许多准备以无比高尚的尊严献身的古巴人和苏联人的眼里流出了泪水。

或许您不了解，古巴人民为了履行他们对祖国和人类的义务准备到了何种程度。

我在写信时不知道，信中的话可能被您误解，或许由于您看得不仔细，或者由于翻译，或者由于我想用太少的话说明太多的意思，结果确实误解了。然而我没有犹豫就那么写了。赫鲁晓夫同志，您以为我们是自私地想着我们自己，想着确实不是没有意识到，而是完全确信他们正在经历的风险而准备牺牲的高尚的我国人民吗？

……

我们知道——您别以为我们不知道，正如您在信里暗示的那样，如果爆发热核战争，我们必定被消灭。然而，我们没有因此要求您撤走导弹，没有因此要求您让步。难道您以为我们想要那样的战争？但是如果入侵就要发生，怎样来防止这样的战争呢？问题恰恰是这种事情是可能的，恰恰是帝国主义封死了所有的解决出路，而他们的要求

在我们看来是苏联和古巴所不可能接受的。

既然事情正在发生，对发动战争的疯子该怎么办呢？您本人曾指出，在目前情况下，战争必然会很快变成一场热核战争。

我理解，侵略一旦发生，就不应该把决定什么时候使用核武器的特权给予侵略者。这种武器的毁灭力如此之大，运输工具又如此之快，以致侵略者会在初期占有相当大的优势。

赫鲁晓夫同志，我没有提议您苏联发动进攻，因为那样做不仅不正确，而且是我方不讲道义和卑鄙无耻，而是提议您，从帝国主义进攻古巴和在古巴进攻用于在外来进攻时帮助古巴自卫的苏联军队，而帝国主义分子因这一事实变成对古巴和苏联的侵略者那一刻起，给他们以毁灭性的回击。

……

赫鲁晓夫同志，我没有提议苏联在危机中发动进攻——而从您在信中对我说的话似乎得出这样的意思，而是提议帝国主义发动进攻后，苏联要毫不犹豫地进攻，绝对不要犯允许敌人对苏联首先进行核打击那样情况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赫鲁晓夫同志，我坚持我的观点，因为我认为这是对一种特定形势做出的现实和正确的评估。您可以说服我说我错了，但不能没有说服我就说我错了。

……

您可能会想我有什么权利这样做。我是遵照作为革命者义务的我的觉悟的启示，怀着对苏联敬仰和亲热的最无私的感情，不在乎会有多少麻烦这样做的。

……

我看不出怎么能说就您采取的决定跟我们商量过。

此时此刻我不可能希望别的，只希望我错了。但愿是您全对了。

正如向您报告的那样，这一阶段经历着无以言表的苦涩和悲伤时刻的古巴人不是寥寥几个，而是许许多多。

帝国主义分子已经开始重新谈论入侵国家，这证明他们的诺言是

短暂的，不值得相信。然而，我国人民仍坚定不移地保持着他们抗击侵略者的意志，而且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相信自己和那种斗争意志。

我们将和逆境做斗争，我们将战胜目前的困难，我们将继续前进，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破坏对苏联友好和永远感激的纽带。

顺致兄弟般的敬礼！

菲德尔·卡斯特罗

这些信件以前发表过，但我认为，把它们收入今天应您的要求我对“十月危机”的重新叙述中是适时的，因为正如我前面说的，没有它们，就不能充分理解我们在那场危机中的做法的全部政治、道义和军事意义。

拉：1991年9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访问莫斯科期间，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美国谈判，莫斯科从古巴撤走了叫作“机械化步兵训练旅”的最后的苏联军队。那次跟你们商量了吗？

卡：没有，还商量什么！他们已经完全没落了。他们从没有商量过。凡是从这里运走的，都不做商量地运走了。“十月危机”中没有商量，他们承诺撤出导弹要在联合国监督下接受检查。我们说：“不行，这里谁也不能检查，不准许，如果你们要走，那不是我们的事。”喏，他们又编造说要在路上，在远海检查。由于检查的方式，那次引起了一种相当紧张的形势。但苏联还是一个超级大国。说到这个话就长了，犯了很多错误，我在其他场合谈到过这个问题。

拉：关于这个就说到这儿吧。1991年他们从古巴撤走苏联训练旅的时候……

卡：这个他们是直接跟美国谈判的，没有跟我们商量；没有商量就都谈成了。现在再谈判那个训练旅没有一点意义了；那个旅在人员和手段上

大大削弱了，既然苏联已经四分五裂，那个旅的人员来自各个共和国，怎么能战斗呢？当然，苏联军人技术上受过很好训练，又勇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了这一点。但是，原苏联的政治形势很糟糕。

拉：那时本来可以设想，作为从这里撤走苏联旅的交换条件，美国人应该从关塔那摩基地撤走，是不是？

卡：喏，我跟您说过，这件事只能在“十月危机”时办成。那时候本可以很容易地办到，只要稍微镇定和沉着一点就行，因为世界不愿意因为美国政府的随心所欲而走向一场核战争。

拉：走向一场世界战争。

卡：我们提出了五点要求，包括停止对古巴的海盗袭击与侵略和恐怖主义行径，可后来这些又持续了好几十年；停止经济封锁，归还关塔那摩海军基地非法占有的领土。所有这些本来都可以在那种极度紧张的形势中办到，因为我前面说了，没有人愿意因为对古巴的经济封锁、一些恐怖主义袭击和违背古巴人民意志占领的土地上的一个非法基地而走向一场世界战争。谁也不会为此走向一场世界战争。

战略导弹的存在是把美国和它的盟国团结起来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但重要的是这个事实：与苏联人的协议没有一点不合法的地方，面对已经用各种借口计划好的入侵这个现实的危险，根据这项协议部署了导弹。美国历史学家在他们自己的档案里保存着证明这一点，即入侵我们的计划的所有文件。所以说，在苏联人提出部署导弹作为保证我们安全的方式时，继吉隆滩之后美国入侵古巴的计划就已经制定好了。入侵我们的借口自从1962年2月就拟定了，至于导弹，我想是7月开始运到这里的。

拉：1962年夏季。

卡：是，是那年夏季，过了好几个月了。苏联人很可能说到了那件事，因为他们常常有相当多的情报，两个超级大国一直用已经有的和将要有的

一切手段，互相搞了好几十年的间谍活动。苏联人通过间谍或情报了解了入侵古巴的计划。没有人跟我们说他们知道，更像是从赫鲁晓夫与肯尼迪在维也纳的会谈等推论出来的，不过他们肯定知道。

既然美国人在土耳其有同一级别的大力神导弹，在意大利也有，可是并没有人想要轰炸或入侵这两个国家，那我们与苏联人的协议就没有什么不合法的地方。问题不是合法性，一切都是绝对合法的，而是赫鲁晓夫对问题做了不正确的政治处理，在无论古巴还是苏联都有合法权利的时候，却开始提出关于进攻性武器和非进攻性武器的理论。在政治战役中，不能丧失道义，而求助于伪装和谎言。

协议内容绝对合法，我再说一遍，合法，甚至合理。不是非法文件。不正确的是使用谎言叫人不知情。这给肯尼迪壮了胆。这回他有了真实证据，是美国人通过他们的U-2间谍飞机在空中得到的，这种飞机侵犯领空，可就允许它这么干。如果您部署了地对空导弹，就不能允许在您应该保卫的领土上飞行。美国就不允许一架飞机在它的领土上空飞行，可能没有允许一架苏联侦察机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领土的导弹上飞行过。

有很多政治和军事错误；必须了解这些错误才能解释那时候发生的事情。

1962年10月，不是我们准许的，而是我们没有采取措施来阻止运走导弹，因为我们快要跟两个超级大国发生冲突了，这对古巴可是大事。

拉：可能太大了！

卡：我们控制着国家，如果我们做了决定，这里就什么也不会动。不过这是不明智的，也没有意义。我们不准许的是检查。我们抗议，表示我们不同意，提出了五点要求。

就像我正在讲的那样，这回苏联人在这种政治中，在从那几天里生出的恋情——那是非常冷的战争中一场非常热乎的恋情——中与美国人谈判，与美国人一起决定，不在古巴领土上，而是在公海上进行检查。

后来，在2001年10月宣布关闭并撤走电子侦察中心^①时，那是一个已经做好的决定，只是为了征求同意才告诉了我们。

拉：你们也没有同意？

卡：我们不同意这样做，因为在弗拉基米尔·普京2000年12月访问古巴时，我们参观了这个中心，是坐落在哈瓦那南部的一个重要的电力监听站，普京来时非常友好。我发现这个监听站像犹太人居住区的地方，因为苏联人在那里与世隔绝，与家属一起自我隔绝，于是我们决定给他们安排一些儿童活动、参观文化和娱乐景点及其他活动。我不知道监听站是那个样子。他们宣布关闭和撤走监听站，是单方面决定，是在普京访问大约10个月后提出的。无论哪一次都没有事先商议。

拉：尽管有那次“十月危机”，但您对肯尼迪保持着积极看法？

卡：肯尼迪靠那次危机取得了威望，表现出他有能力筹划有效的对策。如果我们参加谈判，我们会进行建设性的谈判。也许会进行一场对话，一种可能会防止我们国家后来不得不面对的许多难题。

关于肯尼迪，尽管发生过那样的事，但在判断他的政策时，我应该分析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什么学说占上风，一场在距美国90海里的地方宣布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可能造成多么大的动荡。这场革命是古巴人自己进行的，苏联人没有给过古巴革命一分钱、一支枪。

1959年1月，我一个苏联人都不认识，也不认识苏联领导人。

^① 这个重要设施设在卢德斯附近，在哈瓦那以南40公里处，占地72平方公里，有大约1500名俄罗斯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军事人员在那里工作。设立于古巴与苏联结成紧密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盟时期。用来监听各种电子通讯。1994年，俄罗斯与古巴就保持该基地达成一致，为此，莫斯科每年付给约2亿美元租金。2001年10月，莫斯科宣布关闭卢德斯和越南金兰湾的电子监听站。卢德斯基地撤走之后，古巴政府对其设施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造、现代化和扩建，开设了信息科学大学，该大学是名为“思想战役”中最雄心勃勃和最引人注目的项目之一。

拉：您弟弟劳尔好像认识几个苏联人？

卡：认识了一个，尼古拉·莱昂诺夫，一个苏联青年，劳尔参加1953年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一个争取青年人权利的国际大会回来时，偶然与他同乘一艘船。我说过，劳尔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联盟（Juventud Socialista），他们创造了很好的成绩！没有疑问。他认识了莱昂诺夫——现在还活着呢，他是作为外交官去墨西哥。他们同乘一艘船，仅此而已。社会主义不是通过克隆来到这儿的，也不是通过人工授精。这里情况很不一样，在拿古巴与东欧国家其余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或意图做比较时，必须考虑这一点，东欧国家现在正在试图建设资本主义呢。

尽管历史在演变，人类社会在发展，一些趋势最大程度地影响甚至决定着历史的演变，但还是有一些主观性的因素对事件有非同一般的影响，有时候减缓或加快可能的历史进程。

就古巴的情况来说，没有丝毫疑问，客观和主观因素的结合加快了我国的革命和变革进程。这一切导致了与美国的对抗和1962年“十月危机。”

可是，肯尼迪在那个时刻表现明智，他不想让事情复杂化，下令停止掠地飞行，后来还命令暂停“獾行动”（Operación Mangosta）^①。

这一切使所有反对古巴革命的人对肯尼迪恨之人骨，因为他没有给舰队下令开进吉隆滩支援雇佣军，因为他没有像许多将军和许多我们的敌人劝告的那样，利用“十月危机”的紧张局势干涉我们。他们很可能就躲在了刺杀他的阴谋的幕后。虽然我没有证据，我是对可能发生的事进行推测。我敢说事情就是这样，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产生疑问。

拉：1963年11月22日暗杀了肯尼迪后，指控李·哈维伊·奥斯瓦尔

① “獾行动”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针对古巴制定的一项广泛的颠覆战计划。包括恐怖主义、经济战、情报战、心理战、支持武装集团和支持反革命政治组织等各种行动。1961年11月根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在试图从吉隆滩入侵失败后的思考抛出，1963年1月3日正式终止。

多有罪，说他同情古巴。您认为是企图把古巴卷进这次刺杀吗？

卡：好在没有允许那家伙访问古巴。那可能是一个大阴谋和一次大挑衅，因为他们本可以利用他来控告古巴。事实上在调查时，我们提供了我们掌握的所有情报。

拉：您对刺杀肯尼迪事件的官方说法有什么想法？

卡：这么说吧，一切都非常奇怪。由于我在精确射击方面取得过专业知识，我没法设想在几秒钟时间内，用一支装有望远式瞄准镜的枪打一枪，再瞄准，再打一枪。您用望远式瞄准镜射击时，枪要动几毫米，目标就没了。当您瞄准 500 或 600 米以外的一个盘子时，随着射击时刹那的一动，目标就离开了焦点，您必须再次寻找。

如果你站在窗口，打一枪，必须立刻装子弹，重新寻找目标再射击，在短短几秒钟里用望远式瞄准镜寻找运动着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由一个肯定没有多少经验的人这么准确地开三枪是非常难的。

拉：您认为有好几个射手？

卡：对这几枪，我不明白的是射出的方式。我提不出别的理论。有一大堆理论了。我能说的只是根据我使用有望远式瞄准镜的枪的经验，干脆说吧，官方版本说的情况是不可能的。

在那次刺杀中，有两个现象使我无法理解。第一，持枪人采取的射击方式，在极短的时间里精准地连续射击。这不符合我有过的经验。

第二，奥斯瓦尔多被拘押，关在监狱里，来了个慈善和高尚的人，那个杰克·卢比，他对这场悲剧伤心至极，可就在那儿，在警察和电视镜头面前杀了奥斯瓦尔多。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哪次在别的哪个地方发生过类似的事。

拉：您不相信官方的说法？

卡：不信。我根本不信关于那个奥斯瓦尔多是怎样开枪的说法。阿

瑟·M. 小施莱辛格，他是肯尼迪的一位顾问，后来到过这里^①，他写了一本900页的书^②，叙述了这个故事，说出了这个人是谁。这个奥斯瓦尔多曾想到古巴来，因为我们的人对他极度不信任，人家就劝说他别去了。

现在请您设想一下，如果那家伙到了古巴，然后去了那儿，没几天就杀了肯尼迪，恰恰在访问古巴一个星期以后。这里有个计划，不仅针对肯尼迪，也针对古巴。我清楚那种说法是不可能的。施莱辛格讲出了细节。

奥斯瓦尔多可能是个双料特务。现在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他来来回回去了苏联，而在全面冷战时期互相监视是很严格的。

拉：他到过苏联。

卡：是，到过那儿，娶了个苏联人，然后回来，又离了婚。施莱辛格甚至寻找一篇几乎是弗洛伊德理论（Freud Sigmund, 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译注）的论文来解释这个人的行为。

这个人企图来古巴想干什么？杰克·卢比这家伙能到警察局杀了奥斯瓦尔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极其奇怪的两件事，理所当然地助长了各种怀疑和有某种阴谋的想法。不过我没有资料，不能做别的，只能推测。我能说的是，就这两个问题，特别是那样射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就使人对围绕这一切做出的解释的真实性提出疑问。

① 阿瑟·M. 小施莱辛格，约翰·肯尼迪的顾问，2002年10月11—12日在哈瓦那举行“十月危机：四十年后的政治视野”国际会议期间，以85岁高龄访问古巴。在那次会议上，有人问他，是不是像经常说的那样，肯尼迪在“十月危机”后想改善与古巴的关系？他说：“我是这些想法的直接证人，因为他不止一次跟我谈过这些想法，我可以说，尽管有许多问题需要他关注，（肯尼迪）总统已经在思考实现他与哈瓦那接近的途径和方式。”就此他说到，“有一封致古巴政府的信，准确内容我想不起来了，是通过巴西政府转递的”。最后他说：“但是他的努力随着那年年底被刺杀而打断了。”古巴国家通讯社电讯，2002年10月13日。

② 阿瑟·M. 小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F. 肯尼迪在白宫》，海员图书出版社，波士顿，1965年。



我
的
一
生

第十四章 切·格瓦拉之死



切·格瓦拉与反帝运动—告别信—在非洲游击战中—回到
古巴—完成在安第斯山的使命—最后的战斗—切·格瓦拉的教训

拉：“十月危机”以后，美国侵略的危险过去了。革命得到巩固。切·格瓦拉开始周游世界。好像他对国际上的事、对反帝运动非常感兴趣，不是吗？

卡：他相当注意观察第三世界的形势。他关心国际事务，关心万隆会议^①、不结盟运动和其他问题。他1965年出访，周游世界，会晤周恩来^②、会晤尼赫鲁^③，会晤纳赛尔^④，还有苏加诺^⑤，实际上，他对国际事务和发展中世界问题很感兴趣。

关于中国，我记得切·格瓦拉跟好几位中国人士谈过话，接触过周恩来——这我说过了，会见过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思想感兴趣。他没有接触过苏联人。不过，显然他更赞成，或者说，更看好中国。

他甚至访问了南斯拉夫，尽管南斯拉夫实行自治还有诸如此类的问题，说真的，我不太喜欢。一个合作社拥有饭店和从事其他经营活动，就使它离开了最初的目标。我在古巴看见过几个，有时候它们不是从事农业，而

① （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于1955年4月18—24日举行。属于开始称为第三世界的29个国家聚会，产生了不结盟国家运动。最有影响的与会者是尼赫鲁（印度）、周恩来（中国）、苏加诺（印度尼西亚）和纳赛尔（埃及）。

② 周恩来（1898—1976），中国革命者，毛泽东战友，与其一起长征（1934—1935）。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被任命为总理，兼任外交部长。

③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889—1964），印度政治领导人，在争取印度独立斗争中为莫汉达斯·甘地战友，斗争于1947年胜利。曾任该国总理。

④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1918—1970），埃及陆军上校，参加推翻君主制和法鲁克国王的1952年政变。1954年执政，提出泛阿拉伯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亚非世界最重要领袖之一。在1967年6月抗击以色列的闪电战争中战败。

⑤ 苏加诺（1901—1970），印度尼西亚政治领导人。1927年创建印尼民族党，两次赢得国家独立：1945年抗击日本人，1948年抗击荷兰人。印度尼西亚第一任总统，直到1965年9月30日被推翻。

是从事商业和旅游业。

拉：1964年12月他到了联合国，后来到阿尔及利亚，1965年最初几个月还去了非洲。

卡：是的。不过那是后来，是一项战略，在他履行使命的最后阶段，那时的他已经做出了去玻利维亚的决定。好哇，怀着了不起的热情，他的目的是在阿根廷为革命做贡献。是去创造条件，因为那时候谁都想消灭我们，我们的回答是改变当时的状况。这是大实话。我们总是坚持这个原则。

拉：有一次您对我说：“他们把封锁国际化了，我们要把游击战国际化。”

卡：先是反对特鲁希略，1959年7月，一群武装起来的多米尼加人从古巴出发去推翻他，这成为第一次支持反对一个独裁政权斗争的运动——那一次是对和我们一起斗争的多米尼加人原有的一个承诺，是个例外。特鲁希略曾经向巴蒂斯塔供应武器，战争结束后，巴蒂斯塔去了那里避难，一些反对我们国家的武装行动也是从那里来的。

至于有类似情况的其他国家，尽管他们没有可能对我们有多大好感，但我们的准则是尊重，尊重国际法。但是有明显的差别，有的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性多一些，有的少一些。当然，最无条件屈从美国的国家立即与古巴断了交，其他国家抵制。巴西抵制了，乌拉圭抵制了，智利抵制了。而委内瑞拉一点没有抵制，因为那里是罗慕洛·贝坦科尔特^①，他一会儿是左派，很快就成了充满反动仇恨的家伙。所以说，一些拉美国家在一段时期内与古巴保持了外交关系，而墨西哥是一直都保持。

^① 罗慕洛·贝坦科尔特（1908—1981），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社会民主派）领导人，1945—1948年任总统。1958年重新当选——这次是民主当选，残酷地打击委内瑞拉游击队。1964年被推翻。

拉：美国指责你们到处帮助颠覆。

卡：美国对古巴的要求多种多样，一直在变，每时每刻都增加新要求。

最初，它要求我们必须放弃社会主义。后来，要求我们必须断绝与苏联的贸易和一切形式的关系。在谴责和孤立我们以后，他们一直在提出各种要求。吉隆滩战役以后，“十月危机”以后，每次都提出新要求。接下来是拉丁美洲的革命斗争：拉美斗争爆发后，古巴应该停止对这些斗争的任何支持——我这里是在给您说美国提出的种种要求；后来是安哥拉，安哥拉在1975年受到南非进攻时，全世界都知道发生的事情：必须撤出安哥拉，如果我们撤出安哥拉，同古巴的问题就能解决，他们就这样对我们说……还有诸如此类的事。

后来问题就更多了，因为1974年出现了埃塞俄比亚革命，由于那里造成的局面，1977年我们必须与埃塞俄比亚人合作，由于其他原因也必须合作。我们是个被孤立的国家，美国越是企图孤立我们，我们越是要与世界其他地方联系。

拉：可是有人继续指责你们“输出革命”。

卡：在60年代那个时期，拉丁美洲已经没有人和我们有关外交关系——刚才说了，墨西哥除外。那时期我们遵守国际准则。由于学说，由于信念，我们是想革命，是想要革命，但我们尊重国际法。此外，我坚持认为，革命不能输出，因为谁也不能输出使革命成为可能的客观条件。我们一直是从这一观点出发，而且继续这样认为。

革命胜利后，我在1959年5月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的一个会议。在会上我为拉美提出了一个类似马歇尔计划的东西——就像那个著名的援助欧洲重建的计划，我估算要花费200亿美元。喏，当时我没有现在这样的经验，更谈不上别的。但我确实有些想法：除了一生中读过的所有东西和对问题的思考以外，没有多少国际经验。我对拉美的具体经验也不多。尽管如此，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主动提出了发展问题。您知道拉美那个时期欠多少债？

拉：不知道。

卡：50 亿美元。

拉：与现在的 8500 亿美元债务相比，数目不大。

卡：当时拉美有现在的一半人口，不到 2 亿 5 千万人，现在有 5 亿多人。外债——我不说内债，那也是国家欠阔佬们的债——是国家必须连同利息偿还给外国的债务。这还不包括资本外流、不平等交换和资本流向货币强劲和经济更稳固的国家，以及布雷顿森林给予美国的特权，^①就是在世界上印制美元的那个国家的权利。货币的避难所不再是美元了，因为尼克松总统在 1971 年 8 月单方面中止用黄金兑换美元，只剩下美元了，那是本半球唯一现存的外汇。所有其他货币都大幅波动，没有一种货币可靠。那时候，拉美国家所有的钱都趋向于外流，流向美国。

拉：我想，您在美洲国家组织上提出的计划被拒绝了。

卡：如果采纳那个计划，这个大陆很多悲剧就避免了。两年后，我跟你说过，肯尼迪重新捡起这个想法，提出一个援助拉美的类似的马歇尔计划，就是争取进步联盟：土地改革、财政改革、建设住房等等。

拉：这没能阻止他继续敌视古巴。

卡：是的，那时候他们对我们不做任何承诺。我想是有客观情况的，切·格瓦拉做的事绝对正确，一点儿分歧也没有。那时候已经谈到美国的干涉政策，真的，约翰·肯尼迪总统是个有才能的人，他的悲剧是在于接受并执行了侵略古巴的那次吉隆滩入侵。他在失败中很勇敢，因为他承担了全部责任，还说出了“胜利有很多位父母，失败是孤儿”那句话。

肯尼迪非常喜欢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把它派到了越南。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士，据说表现很好，但却不負責任和毫无道理地应承

^① 布雷顿森林（美国）协定，1944 年 7 月由 44 个国家签订，目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革货币制度和鼓励国际贸易。协定规定用黄金兑换美元，并规定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协定还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请参见第 20 章注 9）。

了残忍又可耻的越南战争，迈出了最初步骤，还开始派兵增援。一切都从这个开始。而在1954年赢得了一场抗击法国战争的越南人，据他们对我们说，看到古巴革命在吉隆滩的胜利，受到了鼓舞，他们总是说古巴的胜利对他们有影响，增强了他们斗争的信心。也许是客气。他们在南方一直保持着战斗体制。

拉：越南也鼓舞了你们。切·格瓦拉常说：“要创造两个、三个、很多个越南。”^①

卡：我完全赞同他的话，我要说，1979年，在他牺牲十二年后，越南战争早已结束，桑地诺运动通过一种像我们进行的那种斗争，像切·格瓦拉的那种斗争，在尼加拉瓜取得了胜利。萨尔瓦多的运动也在以可畏的势头发展，它是取得经验最多的一场运动。

拉：你们给了萨尔瓦多人相当多的援助，是不是？

卡：提供了我们微不足道的合作。由于1975年战胜了美国，越南人给了我们许多他们在西贡陷落后收取的美国武器。我们用船从非洲南部运过来，把一部分给了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萨尔瓦多人。

拉：你们认为拉美具备了再现另一个像古巴那样的革命经验的条件吗？

卡：请注意，有些主观因素可以改变历史。有时候存在实现革命变革的客观条件，但不具备主观条件。是主观因素造成革命在那个时期确实没有扩展。武装斗争的方法已经得到证实。我跟您说，尼加拉瓜是在切·格瓦拉牺牲十二年以后才取得胜利的。就是说，在拉美其余地区许多国家，客观条件比古巴的条件还要好。这里的客观条件差得多，但也足以进行一次、两次或三次革命。在拉美其他地方，客观条件好得多。

在尼加拉瓜、萨尔瓦多，还有危地马拉，我们为革命者的团结出了很

^① 切·格瓦拉：《创造两个、三个、许多个越南，这就是口号》，见《全球正义、解放和社会主义》，前引书，第51页。

多力。为分裂的桑地诺主义者，为分裂成不下五个组织的萨尔瓦多人，为同样四分五裂的危地马拉人。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也确实把他们团结起来了。我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我们向中美洲的革命者提供了微不足道的合作。但是，有共同利害关系和对革命运动给予某种形式的合作不意味着输出革命。

拉：但你们帮助切·格瓦拉把革命带到了玻利维亚。

卡：是的，我们跟切·格瓦拉合作了，我们跟他有共同观点。那时期切·格瓦拉是对的。当时斗争也许会扩展，我当真相信这一点。那时期，1968年，巴拿马还没有出现托里霍斯。同样也出现过其他现象，如1970年阿连德在智利取得胜利，开始恢复与古巴的关系。

我们在古巴开展斗争以前，1948年，哥伦比亚已经有了游击队。不过那是另一段更复杂的历史，因为那里，在相当长的时期把游击队看作有点像“七二六运动”在古巴的情形。后来出现了一系列并行因素。这个问题我不想分析，这一直是非常棘手的事。

拉：切·格瓦拉对您讲过，对您说过他对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的计划是什么吗？这件事您跟他看法一致吗？

卡：他着急。他想做的事很难。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我对切·格瓦拉说，可以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向他提出，需要时间，不要着急。我们想让他不太有名的干部迈出最初的几步，为他想做的事创造更好的条件。他知道游击生活是怎么回事，知道需要身体结实，一定的年龄。虽然他能克服局限，也有钢铁般的意志，但他知道，如果再等下去，就不是身体条件的最佳状态了。

关注这些因素的時刻到了，虽然他没有表露出来。他心中有其他重要的考虑：几乎是在革命的最初几年，他派了一个记者在阿根廷北部组织一个游击小组。记者叫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Jorge Ricardo Masetti），

他跟我们在山里待过^①，后来创建了拉丁新闻社，切·格瓦拉跟他非常要好。马塞蒂在那次任务中牺牲了^②。切·格瓦拉还是这样一个人，他派人去执行任务时，总会发生死亡的悲剧，这对他打击很大。每次想起死去的战友他都痛心。这从他在玻利维亚写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时就会读到，比如战友埃利塞奥·雷耶斯，“圣路易斯上尉”的死亡对他打击有多大，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失去了游击队中最好的人，当然，他是游击队的一根顶梁柱。”

在到过玻利维亚、1962年又去过阿根廷北部的人中，有一个是我们现任的内政部长，阿韦拉多·科洛梅·伊巴拉（Abelardo Colomé Ibarra），绰号“富里”（Furry）^③，那时候才22岁。那时马塞蒂已经死了。切·格瓦拉总想着他的计划，当然，根据承担的许诺，我们完全支持他。

切·格瓦拉心急，他想去履行其使命时，我对他说：“条件没有准备好。”我不想让他去玻利维亚组织小组，而是想让他等力量组织起来的时候再去。就我们来说，我们经历了游击战争最初阶段全部的光辉业绩。我说：“切·格瓦拉是位战略领袖，应该在发展起一支足够牢固和经过考验的力量时再去玻利维亚。”他总是着急，可是还没有最起码的必要条件呀。我不得不说服他：“还没有创造出条件。”因为他是个战略型干部，有政治家的丰富经验和才能，不应该在最初阶段冒险。

我们正在刚果帮助卢蒙巴（Lumumba）^④的人。此前我们与阿尔及利亚人在他们1961年反击摩洛哥入侵的战争中合作过^⑤。切·格瓦拉很着急。

① 马塞蒂1958年4月在马埃斯特腊山会晤过切·格瓦拉。关于这次会晤请见：《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拉丁美洲。一个大陆的觉醒》，海洋出版社，墨尔本，2003年，第199—207页。

② 以马塞蒂（二号司令）为首的25人小组驻扎在阿根廷与玻利维亚交界的萨尔塔地区，1964年4月15—25日“失踪”。

③ 路易斯·巴埃斯：《将军们的秘密》，洛萨达出版社，布官诺斯艾利斯，1997年。

④ 帕特里斯·卢蒙巴（1925—1961），刚果（金）政治领导人，反对比利时争取独立斗争的领袖，1960年6月任总理，1961年被谋杀。

⑤ 艾哈迈德·本·贝拉：《切是这样的人》，“外交世界”，1997年10月，见第15章。

但是因为非洲和非洲的斗争对他有极大吸引力，我建议他去非洲完成一个重要任务，与此同时在玻利维亚创造开展斗争的起码条件，这场斗争的根本目标是他的祖国阿根廷，因此，以后将是一场更加广阔的斗争。非洲的任务非常重要，因为必须对比属刚果东部反对冲伯^①（Tshombé）、蒙博托^②（Mobutu）和欧洲雇佣军的游击队给予支援。

拉：是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那时期领导的运动吗？

卡：不，那时候是加斯东·苏米亚洛特（Gaston Soumialot）领导，他到古巴来了，我们给了他帮助。我们还通过坦桑尼亚向他提供过帮助，当时该国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是同意的。跟他同去的切·格瓦拉和古巴人穿过坦噶尼喀湖（Tanganyika）。1965年4月，我们确实向那里派了一支很好的别动队，还有切·格瓦拉。大约150人，装备精良，经验丰富。在那场非洲革命运动中，什么都得干：经历，做准备，搞训练。是个艰巨任务。切·格瓦拉在那里度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拉：在他的非洲日记中^③，切·格瓦拉对那支游击队的头头们批评得很厉害。

卡：批评得很厉害，对那些头头和随便什么人。他有那样的特点，严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习惯。他批评别人和自己都很严厉。

① 莫伊兹·冲伯（1919—1969），前比属刚果政治领导人。在加丹加省创建科纳卡特党。1960年在数个西方强国支持下反对卢蒙巴，指使人选自己为加丹加总统，宣布该富饶地区独立。卢蒙巴要求联合国干预，由于中央情报局的唆使，被加丹加省军官杀害。冲伯被迫放弃政权，流亡欧洲，一段时间居住西班牙。死在阿尔及利亚。

② 蒙博托·塞塞·塞科（1930—1997），独立后任刚果军队首脑，1965年推翻卡萨武布总统，依靠雇佣军支持打击游击队，为该国独裁者，直至1997年被洛朗·德西雷·卡比拉的军队推翻。

③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我们哪儿也没去的那一年》，《埃内斯托·切·格瓦拉非洲日记片断》，正文由帕科·伊格纳西奥·泰伯第二、弗洛伊兰·埃斯科瓦尔、费利克斯·格拉汇编和评论，法文版，梅特莱耶出版社（Métailié），巴黎，1995年。

拉：对自己严厉？

卡：是的，他对此要求很严，我跟你讲过墨西哥和波波卡特佩特尔火山那儿的事。有时候甚至因为他一时失去镇静的随便一件蠢事，也要批评自己。但也非常诚实，非常尊重人。

1965年4月到非洲时，他遇到很大的困难。历史很奇妙。有段时间白人、南非、罗得西亚和比利时雇佣军，甚至为中央情报局效劳的古巴反革命分子都介入了。非洲军队没有经过充分训练。切·格瓦拉想教给他们战斗，讲解可以有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因为在他们取得经验，有了战争素养时，那些刚果人就成为了令人畏惧的军人。他们没有这种素养，而在得到这种素养后，就变成了非同一般的军人，令人畏惧的军人。埃塞俄比亚人、纳米比亚人、其他人、安哥拉人也都有这个特点，有了战争素养，同样是非同一般的军人。

那时候，刚果东部的那些战士还没有得到这种素养。我们这样告诉切·格瓦拉。我们从哈瓦那派了我们的战友分析形势，准备支持他们。如果需要派更多军队，我们也会派，因为我们这里有的是志愿者。但实际上，那场斗争没有前途，没有在那时期开展的条件，我们叫切·格瓦拉撤回来。他在刚果待了大约7个月。从那儿去了坦桑尼亚，在达累斯萨拉姆那儿待了一段时间。

这些斗争切·格瓦拉都去参加了，当然，可以说是秘密离开古巴的。那时就开始有谣言了，开始说切·格瓦拉已经“失踪了”。

拉：国际新闻界说你们之间有严重的政治分歧，决裂了，说你们把他关进了这里的监狱。甚至说把他杀了。

卡：我们默默地忍受着那一大串谣传和谣言。不过他在1965年3月底走时，给我写了一封告别信。

拉：那封信您没有公开？

卡：没有。我把信留在手里，1965年10月3日，在宣布成立新的古

巴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仪式上我才公开，因为必须解释那届中央委员会没有切·格瓦拉的原因。与此同时，谣言还在传，敌人继续散布猜疑和怀疑，散布谣传说切·格瓦拉因为与我们有分歧被“清洗了”。

拉：一场真正的谣传战。

卡：他是自发地给我写那封信的，我认为他非常坦率：“我后悔没有充分信任你。”^①那时他谈到了“十月危机”和别的事情。我认为很多人他都不相信，因为他很爱批评人。

有一天他为我写了几句诗。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跟我总是很亲密，总是非常尊重并且总是服从我的决定。我没有强加于他，我们讨论，我不常下命令。我常说服他该干什么。我很少时候不得不说“你别做这件事”，或禁止他什么。

1966年3月他从非洲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去了布拉格。情况复杂，事实上他是秘密地去的。因为他写了告别信，因为他自尊心特别强，所以走了以后，脑子里没有想过回古巴。但是，做玻利维亚的事情的干部已经选好了，他们正在做准备。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做解释，谈到他的义务，谈到了理智。

拉：让他回古巴。

卡：是的。我认为家里已经公开了那封信。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严肃地这样对他说。我劝他回来，我对他说，为了他想做的事，这是最适宜的：“在那里不可能做这件事。你必须回来。”我对他说“你必须回来”，不是命令，是劝他。我对他说他的义务是回来，不要有任何其他考虑，为玻利维亚计划做完准备工作。他秘密地回来了。喏，哪儿也没人认识他。一路上也没人认识。1966年7月回到了这儿。

^① 准确引文是：“我唯一的严重错误是从马埃斯特腊山最初时期起没有更加信任您，没有足够迅速地理解您领导者和革命者的品质。”请参见菲德尔·卡斯特罗1965年10月3日公开的这封信的全文，载《菲德尔·卡斯特罗记忆中的切》，前引书，第34—36页。

拉：他化装了？

卡：好家伙，化装得那么巧妙，以致有一次我请了几个领导层的战友，对他们说想让他们认识一位非常有趣的新朋友。我们一起吃午饭，结果没有一个人认出他来。您看是不是真的化装了。

拉：劳尔在他对面也没认出来？

卡：劳尔几天前在他训练的中心跟切·格瓦拉分别了，吃午饭那天他正在苏联访问呢。跟我在一起的人谁也没想到是切·格瓦拉。毫无疑问，给他化装，给他整容，我们的人真有一手^①。他去了比那尔德里奥省一个地方，在一个山区，那儿有一处房子，圣安德烈斯庄园。他在那儿组织力量，跟随他去的15个人一起准备了几个月。他挑选想要的人。也是在那儿最后几次见了他的妻子和孩子。我常去那儿看他。

拉：要带他们去玻利维亚打游击？

卡：有几个是山里的老游击队员，其他人跟他在刚果战斗过^②。他跟他们每个人谈话。我和几个战友对他提出一些异议。我对他说：“我说，别这么干。”他要把两个战士分开，一直形影不离的两兄弟，我对他说：“别分开这对兄弟，随他们便吧。”两个人很好^③。还有一个人，我很了解他的性格，很好的军人，就是有时候有点好争论。

① 切·格瓦拉做了由古巴专家施行的造型和口腔假牙化装整容。

② 按照切·格瓦拉的命令训练准备去玻利维亚的突击队由下列人员组成：胡安·比塔略·阿库尼亚少校（“华金”）、安东尼奥·桑切斯·迪亚斯少校（在玻利维亚叫“皮纳雷斯”和“马科斯”）、古斯塔沃·马钦少校（“亚历杭德罗”）、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蒙特斯·德奥卡少校（“帕乔”）、赫苏斯·苏亚雷斯·加约尔上尉（“金发人”）、埃利塞奥·雷耶斯上尉（在玻利维亚叫“罗兰多”和“圣路易斯”）、奥兰多·潘托哈上尉（“安东尼奥”）、曼努埃尔·埃尔南德斯上尉（“米格尔”）、奥克塔维奥·德拉康塞普西翁（“莫罗”）、莱昂纳多·塔马约（“乌尔瓦诺”）、哈里·比列加斯（“鹿博”）、达列尔·阿拉尔孔·拉米雷斯（“贝尼尼奥”）、卡洛斯·科埃略（“图马”）、何塞·马里亚·马丁内斯·塔马约（“里卡多”）、伊斯雷尔·雷耶斯（“布劳略”）和雷内·马丁内斯·塔马约（“阿图罗”）。

③ 是何塞·马单亚和雷内·马丁内斯·塔马约兄弟俩。

有些情况下我提醒过他。所有去玻利维亚的人都很出色，其中有埃利塞奥·雷耶斯，“圣路易斯”上尉，他牺牲时切写道：“你那英勇上尉的矮小身材……”；这句话是借用聂鲁达的诗——巴勃罗·聂鲁达的诗他读了很多，一句很美的诗，写在他的玻利维亚日记里。他从心眼里喜欢他。切·格瓦拉也是这样的人。

人都是他挑的，我们讨论过这件事。我向他提出了几点建议，他维护那个有很强特性的人，但这个人我了解，担心他有点不守纪律，这很重要。一直到他1966年10月走时，我跟他谈过很多话。他走时怀着多大的热情啊！

拉：对于切·格瓦拉驻扎游击队的玻利维亚尼亚卡瓦苏（Ñancahuazu）地区也讨论得很多吗？您有什么想法？

卡：他去玻利维亚时，这事没有其他选择了，因为在那种形势下，有了他带来的充分信任和有经验的那些人……喏，那情况他了解。德布雷已经去了，作为记者已经帮了一些忙，收集了地图。这任务是我给他的。

拉：是您派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去的玻利维亚？

卡：我派他收集那块地方的情报和地图。那时候切·格瓦拉还不在那里。1966年11月他到了以后，就开始组织人。

他终于组织了一场很好的运动，有了玻利维亚的干部，例如因蒂·佩雷多（Inti Peredo）等——这是我想的事，对此也很清楚。他了解玻利维亚人，了解他们的性情，这话他跟我讲过。由于理所当然的谨慎，最初他们驻扎在一个有农村根据地的区域。在他挑选的一个地方，他一面到处走，一面训练人，随着时间流逝，问题出来了。在他走向不远处一个居民更多的区域时，出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事，这是第三次了——前两次我跟您说过了，切·格瓦拉没带药。

拉：在玻利维亚，切·格瓦拉没有治他哮喘病的药？

卡：他没药了，这是第三次。他离开驻地到处走，是一次持续很久的长途跋涉，走了几乎 40 天。然后再次离开走一小段，治哮喘的药落在营地了，而营地被玻利维亚军队占领了。由此出现了严重困难。

拉：您怎样解释切·格瓦拉的死？

卡：长途跋涉回来时，切·格瓦拉已经发现了问题，在玻利维亚共产党领导人马里奥·蒙赫（Mario Monge）（那儿有他的人）与反对蒙赫的另一条路线的一位名叫莫伊塞斯·格瓦拉的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蒙赫要求指挥权，切·格瓦拉很正直，生硬……我想切可能做了更大努力去争取团结，这是我对他说的意见。他的性格使他为人非常坦率，他跟蒙赫进行了一次言辞激烈的争论，蒙赫的很多干部帮助过组建工作，因为因蒂和其他人是这个组里的人。蒙赫要求的事是不可能的：当那支队伍的头，这是令人气愤和不合时宜的野心。

已经出了一些问题，是没有说过或几乎没有说过的事，这事对拉美的革命运动造成了极大损害，那就是亲苏派和亲华派的分裂。在具备客观条件和完全有可能开展切·格瓦拉去那里推动的那种斗争的历史时刻，这种状况分裂了整个左派和所有的左派力量。

知道发生这场决裂时我们不得不做了多么大的努力呀！1966 年 12 月，马里奥·蒙赫到这儿来了。后来，党的二号领导豪尔赫·科列（Jorge Kolle）也来了。是我邀请的，我给他们解释发生过的事。我们还邀请了胡安·莱钦（Juan Lechín），一位著名的工人领袖，我跟他在东部地区待了大概三天，劝他帮助切·格瓦拉。他答应了。

拉：您邀请莱钦到哈瓦那这儿来的？

卡：是的，因为我对决裂很担心。我想，实际上没有任何理由要求那个指挥权，简单地说，或许是缺少点什么，这么说吧，缺少点精明。因为说实话，如果蒙赫要求指挥权，切·格瓦拉可以给他个司令的头衔，他想

要的头衔，但没有部队的指挥权。有个野心问题，要求有点荒唐。蒙赫不具备领导那一摊的条件。

拉：切·格瓦拉过于生硬？

卡：切·格瓦拉的问题是过于正直，我不骗人，他可能讨厌“外交手腕”这个词、“诡计”这个词。

不过，请听好我的话，在我们自己的革命里有这样的事吗？有几次发现人们心中有野心？谁能取代别人？谁有担负特定责任的威望和才能？愚蠢。我们不止一次的交出指挥权，做出让步。如果直着走找不到解决办法，这种特定情况下就需要精明一点。那时期，蒙赫与切·格瓦拉的决裂造成了危害。

拉：危害？

卡：危害很大。世上不知道我们为防止危害做了多大努力。

拉：为了调和？

卡：我们容忍的一些事情，您在这里甚至是想象不出来的，大错误。是大错误！有时候是这个人犯的，或是那个人犯的。不管怎样，我们总是批评既成事实，但抱着团结精神。

当然是蒙赫做得不对，我跟您说了，后来，玻利维亚共产党的二把手豪尔赫·科列来了，我劝他说，尽管有党的纪律，但不能把那些人扔下不管。我叫来了莱钦，跟他谈话，劝他支持游击运动。

可是，那次跋涉后——这次跋涉时间很长，因为他在根据我们在山里得到的经验考察人，训练人——切·格瓦拉刚刚从那次出行回来，就发现那里出现了这些问题，几乎立刻就有一股敌军进来了，游击队陷入了军队的埋伏。

他们在某一时刻遭受了背叛^①。军方已经知道那个区域有一支游击队。是在，这么说吧，战斗提前打响时，我们不愿意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想在初次战斗之前组织一条战线，那时还有可以组织的人。

然而，这会儿政治因素发挥作用了。切·格瓦拉在他的日记里都说清了。发生了下面的事：小组分裂了。他一直试图与“华金”和“华金”的小组取得联系，塔尼娅^②在那个组里。他用了全部时间在寻找，设法与“华金”会合，一路上发生了一系列战斗。怪事，切·格瓦拉找了他好几个月，好几个月呀！当从广播中听到那个小组已被消灭的消息时，他还以为是谣言呢。

可是，在某一时刻，世人相信“华金”小组被消灭确实是真的，这事发生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切·格瓦拉与因蒂·佩雷多和其他游击队员去往因蒂有联系和影响的一个区域，但他得到了那样的消息。这对他打击很大，我认为那一时刻他做出的反应有点冒失。再说，跟他一起走的几个人状况不好，几乎不能行动，这就耽搁了时间，但还在继续往前走，这时已经有玻利维亚干部了。

如果这个小组到达那个区域，那还算顺利，但在到达一个商店时，他本人在日记中写道：“‘大嘴’（‘Bemba’）电台走在我们前面，大家都在等着我们。”不过还在继续走。中午时分到了一个村子，村里没人。村里没人表明事情奇怪，可能有一股部队。这时候，光天化日之下，他继续前进。因蒂走在前面。这时候，一支部队，一个紧紧盯着他的连队打死了一名玻利维亚游击队员，还有另外几个人，打退了那一小股游击队。切·格瓦拉带着病号和为数不多能够打仗的战友到达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即埃尔夫罗峡谷时，他就在那里战斗，抵抗到他的枪由于一颗子弹卡壳不能射

^① 西罗·布斯托斯，阿根廷人，豪尔赫·马塞蒂小组唯一幸存者，是切·格瓦拉的队伍和应该与游击队会合的阿根廷战士之间的联络员，被抓获并施以严刑，似乎供出了切·格瓦拉在哪里及其位置的情报。

^② 塔玛拉·邦克·比德尔（1937—1967），绰号“劳拉·冈萨雷斯·鲍尔”，以“游击队员塔尼娅”知名，德裔阿根廷人，在“华金”小组中参加玻利维亚的游击战，1967年8月31日，小组成员在瓦多德尔耶索的一次伏击中牺牲。

击为止。

切·格瓦拉不是会当俘虏的人，可是一颗子弹把他的枪堵住了，敌人已经很近，打伤了他。他受了伤，又没了武器，就这样抓住了他，带到附近一个村子，“无花果树村”（La Higuera，又译伊格拉村）。第二天，1967年10月9日中午，狠毒地把他枪决了。切·格瓦拉确实从来没有发抖过，恰恰相反，越是遇到险境时，也正是他胆量大增的时候。

拉：您认为切·格瓦拉会自我牺牲吗？

卡：这么说吧，我宁肯自我牺牲也不做俘虏。他肯定也会这么做的，但问题是他没有选择，他正在战斗，而战斗是他必须做的事。切·格瓦拉是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丝毫不怕死的人。

拉：您是怎么知道切·格瓦拉死亡的消息的？

卡：虽然意识到几个月来他正在经历的危险和他面临的极其困难的状况，但我还是觉得他的死是难以置信的事，是一个——我说不清——人们不能很容易适应的既成事实。时光流逝，一个人往往会梦见死去的战友，看见他活着，跟他交谈，然后现实又把我们惊醒了。

对一个人来说，有些人并没有死。他们是那么顽强、那么强大、那么强烈的存在，以致人们不能相信他们已经死去，已经消失。主要是因为他们继续存在于感情和记忆中，我们，不仅是我，而是古巴人民，对他死亡的消息特别悲痛，虽然消息并不意外。

传来一份知情电文，报告了1967年10月8日在尤罗峡谷发生的事情。大多数电文里宣布的都是谎言，但这份电文讲述了一点确实发生的情况，因为那些人没有足够的想象力，不会编造出符合一支游击队唯一可能被消灭的方式的故事来。我认为，结局是瞬间的事，我看那消息是真实的。

一个有经常解读电文习惯的人，不用丝毫想象，你看到的都是谎言、谎言和谎言。突然间你觉得，不可能编造出唯一可能消灭那个小组的方式的故事来。

现在，有趣的不是仅仅阅读切·格瓦拉在日记中写的内容，还要阅读反对他的头头们写的内容。那一小股人经历战斗和取得胜利的次数真了不起。

当经过证实的他的死亡消息传来时，我们非常悲痛——我们当然悲痛。正是因为这个，在那些日子里，我在悼念死者的悲痛中发表了一次演说^①。我在演说中问道：“我们让我们的子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答道：“我们想让他们像切·格瓦拉一样。”这已成为我们先锋队员的一句口号：“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先锋队员：我们要像切·格瓦拉一样。”

后来日记送到了。世人不知道日记对于了解发生的整个情况，了解他的思想、他的形象、他的刚毅和他的榜样的价值。一个深明廉耻、极有尊严和大公无私的人，这就是切·格瓦拉的为人和世界敬仰之所在。一个聪明人，一个富于幻想的人。切·格瓦拉不是为了保卫别的利益或别的事业，而是为了保卫拉丁美洲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事业而牺牲的。切·格瓦拉不是为了保卫别的事业，而是为了保卫地球上的穷人和卑贱者的事业而牺牲的。切·格瓦拉的事业必将取得胜利，切·格瓦拉的事业正在取得胜利。

拉：切的形象遍及全世界。

卡：切是一个榜样。一种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这一时刻，他的思想、他的事业正在取得胜利。后来，1997年6月，找到他的尸体和另外五位战友尸体的那些人真是天大的功劳！甚至应该感谢玻利维亚人，感谢当局，他们进行了合作，提供了帮助。

拉：找他们的遗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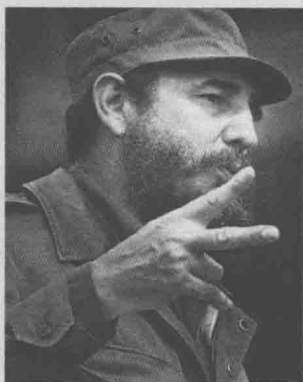
卡：那个人，豪尔赫·冈萨雷斯，现在是我们医学系的主任，多大的功劳哇！他们是怎么找到的，这可是奇迹。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 1967 年 10 月 18 日在哈瓦那革命广场为切·格瓦拉举行的庄严的守灵仪式上对一百万人发表这次演说。

拉：切留下的伟大教训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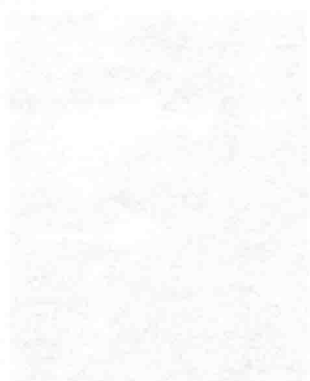
卡：留下了什么？我想，真正最伟大的是精神价值，是觉悟。切象征着最高的人类价值和—个非凡的榜样。他创造了—个伟大的光环和—个伟大的神话。我非常敬佩他，赞赏他。这种敬佩总是产生很大的亲情。我为什么非常亲近他？这故事我跟您讲过了。

他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很多，是不可磨灭的，所以我说，他是我认识的最高尚、最非凡和最无私的人之一。如果—个人不相信群众中成百万、成百万、成百万地存在着像切—样的人，那么这一点就没有意义了。如果像他—样的几百万人没有养成这种品德的萌芽或能力，那么以独特方式脱颖而出的人将会—事无成。因此，为了人人都能像切—样，我们的革命才这么注重扫除文盲和发展教育。



我
的
一
生

第十五章 古巴与非洲



阿尔及利亚—艾哈迈德·本·贝拉—切·格瓦拉在刚果—
几内亚比绍—南非入侵安哥拉—卡洛塔行动—决定性胜利—新的
入侵—奎托夸纳瓦莱战役—“被遗忘的”丰功伟绩—一场战争的
教训

拉：切·格瓦拉的去世并没有终止古巴革命履行对其他被压迫人民做出的承诺。不仅对拉丁美洲和中美洲——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或尼加拉瓜，而且对非洲的承诺，尽管人们知道得很少。我希望我们能谈一谈这个问题，即古巴参与、古巴战士参与某些非洲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的问题。

卡：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在我们谈论切·格瓦拉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但我确实认为，人们并不充分了解古巴给予非洲兄弟国家人民的英勇支持。然而，我国革命历史中由成千上万男男女女、国际主义战士写下的这光辉一页，即使为了鼓舞当今和未来几代人，也应该让它广为人知。我也认为，在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全力支持下，欧洲对非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掠夺史，人们似乎也已淡忘了。

拉：阿尔及利亚前总统艾哈迈德·本·贝拉有一次^①对我说，革命胜利以后，古巴立即毫不犹豫地支持了阿尔及利亚战士们的反法独立斗争，您能予以确认吗？

卡：当然。要知道，我们在1959年1月获得的胜利离武装斗争的结束还很遥远。每当帝国主义给予人民一点小恩小惠或民族独立得到巩固时，它就加剧其背信弃义行为，这使我们处在随时整装待发的状态。无论在古巴还是在世界的其他许多地方，许多同胞必须履行我们的神圣义务，继续为保卫革命而献身。

实际上，1961年——当阿尔及利亚开展举世震惊的独立斗争时，我们

^① 参见艾哈迈德·本·贝拉：《这就是切·格瓦拉》，《外交世界》，巴黎，1997年10月号。

取得胜利还不到两年，就有一艘满载支援阿尔及利亚爱国者军火的古巴船只驶向那里，并在回程时带回来了上百个孤儿和伤员。

请允许我在这里插一句话，因为，当我谈到这一事件时，突然想起了今后不该忘记的事情。这段历史将会在今后的很多年里重演。1978年，卡辛加（Cassinga）的生还者^①，其中绝大部分是孩子，来到了这里。现任纳米比亚驻古巴女大使就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从中您可以看到人的命运。

拉：我不记得那个卡辛加事件了，您能追述一下吗？

卡：它发生在安哥拉的南部。当时，守卫安哥拉南部漫长边境线的许多古巴部队中的一支，在离卡辛加不远的纳米比亚难民中心的一个地方，打了一场激烈而血腥的战斗。这支古巴部队向那里推进是为了追击在那里着陆的南非空降兵。在现代化战斗机的不断支援下，他们正在那里实施大规模的屠杀。我们的部队在遭受敌人空中打击、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来到了南非空降兵正在屠杀儿童、妇女和老人的地方。那是在那场战争中我们遭受伤亡最多的一次战斗。但是，大屠杀得到制止，成百上千生还的儿童和伤员被运回古巴，得到康复，然后进入学校，受到初级和中等教育，有的还在古巴的一些大学完成了学业。

我不想再谈论此事了。我们刚刚谈的是阿尔及利亚的事情。但是，促使南非种族灭绝者在安哥拉多年时间里做那些事情的局势和因素有可能重复。在我们部队的追击下，他们在1976年迅速地撤退到了安哥拉和纳米比亚的边境。

拉：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阿尔及利亚，您说到一艘船……

卡：是的，我说到那艘装着武器、支援阿尔及利亚武装力量抗击法国军队的船只。它离首府已经很近，从地中海的另一海岸几乎已能见到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他们打得非常艰苦。装运的武器有105毫米口径的大炮和

^① 卡辛加大屠杀发生在1978年5月4日。当时，南非军队轰炸了位于安哥拉南部库内内省的纳米比亚难民营，杀害了600多人，其中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大量器材。那是一场残酷的战争，牺牲了成千上万个阿尔及利亚人的生命。人们最近还告诉我们，法国人至今尚未把殖民军队在那里埋设地雷的地图交给阿尔及利亚，而从那时起至今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四十多年了。在那艘船上，带回了许多孤儿和伤员。我们在这里治愈了他们。

我应当补充的是，在那些年月里，尽管帝国主义从我国掳掠了一半的医生，给我们留下的只有三千名，我们还是向阿尔及利亚派出了几十名医生，去帮助那里的人民。也是以这种方式，在四十多年前，开始了同第三世界人民非凡的医疗合作。

拉：你们已经成为某种“医疗超级大国”。

卡：嗯，我不知道这个用词是否确切，但我可以告诉您的是，我们已经拥有7万名医生，另外还有2.5万大学生正在就读医疗专业。无疑，这使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我毫不夸张地说——占有了一个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地位。

我不知道其他人会做些什么。因为，我们的北方邻居只会派直升机而不会派医生，因为他们没有可以解决世界任何问题的医生，号称“人权领袖”的欧洲也没有。非洲有三千多万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而欧洲派出的医生不足一百名。为此，人们募集了几百亿美元，却招募不到一百名医生。为了遏制那个瘟疫，必须拥有像“亨利·里夫”（Henry Reeve）支队^①那样的救助小分队和古巴政府正在组织的许多医疗队伍。我想，十年之内我们将拥有10万名医生，也许还将培养来自不同国家的另外10万名医生。我们是培养医生最多的国家。那时，美国从我们这里掳掠了很大部分医生，并竭尽全力不让我们拥有他们。我相信，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培养出十倍于美国能够培养的医生。这就是我们对他们做出的回答。

^① 2005年，毁灭性的“卡特里娜”飓风摧毁了美国新奥尔良，以及路易斯安那州和阿拉巴马州的广阔地区。为救助受害者，古巴提出派遣一支由医生和卫生防疫人员组成，配备有药品、救助物资和野战医院的小分队，但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由此另行组成了“亨利·里夫”支队，以纪念这位曾参加古巴独立战争并荣获古巴解放军多个高级职位的美国人。

拉：2005年，八九月间，当“卡特里娜”飓风席卷新奥尔良时，你们向美国建议向他们提供医疗救助。

卡：是的，我们许诺派遣1610名医生，并在第二次飓风来临前提出派遣更多的医生，他们原本是可以抢救出许多生命的。但是，美国政府出于傲气，宁愿让它的公民死在住房和医院的房顶之下，因为没有人能把他们从废墟中挖掘出来，或者死在体育场、收容所里，在那里，一些人逃脱了被淹死的命运，最终却无病身亡。

这就是那个自称人权卫士的国家。就是这个在1959年企图让我们没有医生的国家，最终落得自己没有了医生，因为当人们需要他们的时候，它并不拥有。美国有几千万移民或非洲裔美国人，几千万人的医疗得不到保障。而在这里，在古巴，任何公民都享受医疗保险，却从来没有人像某些卑鄙的雇佣兵那样，问他有什么想法，或者是否支持禁运。从来没有人这样问过，将来也绝不会这样提问。

今天，在向国外派出近3万名医生的情况下，在古巴本土，我们还拥有不少于4万名的医生，保障我国人民健康所需的医院和诊所设施。甚至，在那个万分艰苦的时期，我们还降低了人口死亡率，达到了现有的水平，提高了预期寿命，使我国人民的健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今天，这是肯定的，在未来的岁月里将会更好。我们希望在短期内将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今天的古巴，艾滋病人仅占人口的0.07%，是世界上感染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我们尽管还有一些难题需要解决，但是，在艾滋病毒感染率仅次于古巴的拉丁美洲国家里，它的这个指数都要比古巴高出8倍。

拉：最近，你们向危地马拉，在克什米尔（Cachemira）地震后也向巴基斯坦派出了医生，是这样吗？

卡：是的，我们向危地马拉派遣了“亨利·里夫”支队的700名男女医生，加上已在那里的近300名，加起来共达近千名医生，去抗击这个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它也许是该国历史上最大的自然灾害，比“米奇”

(Mitch) 飓风所造成的灾难要大得多。正是这场灾难促使我们建立了与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的古巴全面卫生计划。在几个月的时间里, 那些英勇的同志前往危地马拉的山区, 足迹遍及受灾的各个角落。而这并不是我们的医生们唯一的业绩。

“亨利·里夫”支队建立以后, 事实上发生过两次大灾难: 危地马拉灾难和巴基斯坦地震。在巴基斯坦, 古巴医生写下了英雄主义、牺牲精神和工作效率的光辉一页。如同古巴革命在各个领域创立的许多业绩一样, 它将载入史册。

我们从巴基斯坦地震中发现, 地震救灾不仅需要许多救生犬和挖掘机, 与任何其他自然灾害相比更需要医生。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是, 在巴基斯坦, 地震发生在遥远的山区, 生活在那里的几百万居民中, 近十万人缺衣少食, 更多的人严重受伤: 骨折, 特别是上肢或下肢骨折……你难以想象那场灾难是多么大, 你也难以相信该国领导人向世界上极其富有的国家寻求更多帮助的斗争有多么艰苦。那些极其富有的国家惯常掠夺第三世界各国, 是环境的破坏者, 它们挥霍浪费能源, 使其枯竭, 越来越少, 越来越贵, 从而改变了环境……古巴医生在那里, 写下了人类互助极其光辉的一页。请您原谅我的这些题外话, 但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拉: 我知道, 医学是一个令您激动的问题。古巴在卫生领域的国际主义救助是令您自豪的原因, 但我还是希望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正在谈论古巴革命后的头几年里古巴对阿尔及利亚的援助。

卡: 我说到, 那时我们向阿尔及利亚派遣了 30 或 40 名医生, 我需要找一找确切的资料^①。1962 年 6 月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以后, 我们才结识了本·贝拉总统。在那年“十月危机”前夕激动人心的日子里, 他来哈瓦那访问我们。他在华盛顿会见肯尼迪总统后, 直接飞来这里。他

① 第一批派往阿尔及利亚从事卫生领域合作的医疗队由 29 名医师、3 名牙科医生、15 名护士和 8 名中级技术人员组成, 其中男子 45 名, 女子 10 名。(古巴编者注)

们谈论的问题之一是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导弹危机。他向我们表示支持。我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艾哈迈德·本·贝拉，因为我们熟知他的斗争历史，以及阿尔及利亚人英雄主义精神和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历史性胜利。

拉：古巴军队参加了1963年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战争吗？

卡：事情是这样的：“十月危机”一年以后的1963年秋季，出现了一种意外的形势。经过英勇艰苦斗争取得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在邻近撒哈拉沙漠的廷杜夫地区受到摩洛哥入侵的威胁。得到美国后勤支援的摩洛哥军队企图掠夺血洗后的阿尔及利亚的自然资源。在那种情况下，古巴军队——一支装备有夜视装置（那是我们为了自卫而从苏联接收的）、大炮配件和数百名战士组成的炮兵营^①——穿越大洋，在没有征得任何人，包括那些设备的提供者同意的情况下，响应兄弟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召唤，前去保卫它的领土，保卫在反对殖民强国的斗争中用那么多阿尔及利亚人的鲜血换来的财富。

拉：很快，你们又援助了非洲反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斗争，那是残存于非洲的最后的殖民主义之一，是吧？

卡：从1965年起，我们也援助了安哥拉和几内亚比绍争取独立的斗争，主要是培养干部、派遣教官和物资支援。

几内亚比绍是葡萄牙殖民地。从1956年起，那里发生了争取独立的伟大斗争。那是在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非洲争取独立党的领导下展开的，它的领袖是英勇的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1974年9月，几内亚比绍获得独立。约60名古巴国际主义者，其中包括大约12名医生，从1966年起，与游击队共度了10年时光，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与他们朝夕相伴。尽管我们的医生比把他们派往阿尔及利亚时并不多多少，因为革

^① 那支古巴部队由埃菲赫尼奥·阿梅赫拉（Efigenio Ameijeiras）指挥，他是“格拉玛”号和马埃斯特腊山的老战士，前古巴国家革命警察部队司令。

命后完全由我们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医生还没有毕业，我们还是向他们派去了医生。

1975年7月，佛得角群岛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群岛也从葡萄牙取得了完全的独立。

同样，那一年的年中，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它的领袖——令人难忘的兄弟和同志萨莫拉·马谢尔（Samora Machel）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的斗争，莫桑比克也取得了完全的独立。如同在睿智、坚韧、坚定的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和其他杰出领袖领导下，由他们英勇的人民获得解放的津巴布韦一样，那个国家也经常遭受南非军队的入侵。

1999年，葡萄牙殖民地中最后取得独立的，是远离古巴、位于大洋洲的东帝汶。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以后，我国处在非常特别和相当孤立的时期。

拉：关于前比属刚果，古巴的支持是怎样开始的？由于切·格瓦拉的参与，这种支持曾经达到高潮。

卡：我记得切·格瓦拉曾访问过好几个非洲国家。我们曾经谈论过。在1964年12月11日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他强烈谴责美国支持比利时对刚果的入侵。据我记忆，他说：“世界一切自由人士应该为对在刚果犯下的罪行伸张正义。”

那时，我力图让他镇静下来，以赢得在南美洲创造条件的机会。

1964年12月末，在同我们协调以后，切·格瓦拉直接从纽约出发，开始了他的长途旅行，访问了9个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马里、刚果、几内亚、加纳、达荷美（今贝宁）、坦桑尼亚和刚果（布）。刚果的伟大领袖帕特里斯·卢蒙巴在1961年1月遭到杀害，成为这个地区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伟大烈士。

切·格瓦拉会见了所有伟大的非洲爱国者：在阿克拉会见了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h Nkrumah），在科纳克里会见了塞古·杜尔（Sekou Touré），在巴马科会见了莫迪博·凯塔（Modibo Keita），在布拉柴维

尔会见了马桑巴·代巴（Massemba Debat）。在阿尔及尔，也和还在葡萄牙殖民统治下的一些国家的解放运动领袖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他们是：安哥拉的阿戈什蒂纽·内图（Agostinho Neto）和卢西奥·拉腊（Lucio Lara），几内亚比绍的伟大领袖阿米尔卡·卡布拉尔，及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领导人。

拉：切·格瓦拉是在那里决定参加刚果的游击运动的吗？

卡：不，在第一次访问以后，切·格瓦拉回到了古巴。他十分关心非洲的形势，在那次历史性访问并和那些非洲著名的领袖会谈以后更是如此。但是，他依然迫不及待地想去玻利维亚。于是，正如我对你说的那样，我向他建议，在等待玻利维亚条件成熟的同时，他先带一些同志去非洲。他的任务主要是支持刚果东部的游击运动。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此外，也能使他获得更多的经验，并培养新的干部。

1965年4月24日——这是确切的日子，切·格瓦拉和一队为数众多的古巴战士到达南基伍省，邻近菲济，坦噶尼喀湖边一个叫作基班巴的地方，那是被洛朗·德西雷·卡比拉游击队控制的地区。他是在中国接受政治和军事训练的。那个时期，中国也在同他合作。卡比拉在南京的一所军事学院接受了几个月的训练。但是，当时他的游击队正陷于深刻的危机。从1964年年底开始，游击队受到在比利时和美国军官指挥下，由南非、罗得西亚、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白人雇佣兵的猛烈进攻，正处在解体状态。

拉：你们派了更多军队去支援切·格瓦拉吗？

卡：是的。那年7月，也就是说，在切·格瓦拉刚刚到达那里三个月时，我们就向那里派去了精心挑选的由约250名战士组成、在豪尔赫·里斯克特（Jorge Risquet）领导下的一支队伍。他们抵达了另一个刚果的布拉柴维尔，因为，那时候和今天一样，有两个刚果：一个曾经是比利时殖民地的刚果，后来改称扎伊尔，它的首都是金沙萨；

另一个曾经是法国殖民地的刚果，它的首都正是布拉柴维尔。这是两个被浩瀚的刚果河分开、隔河相望的首都。我们把他们派往那里，是为了保卫马桑巴·代巴的民族主义政府，并从那里对切·格瓦拉提供支援，他所在的位置是东岸另一个刚果的广阔地区。

里斯克特他们在布拉柴维尔也开始训练其他游击队的队员，特别是安哥拉解放运动的成员。他们在短期内培养了足以组成三支队伍的人员，从布拉柴维尔出发，参加到了安哥拉的游击战中。

就这样，从1965年起，我们实现了与刚果、安哥拉，以及曾经是安哥拉领土卡宾达（Cabinda）的游击斗争的合作。在所有情况下，我们的合作基本上属于培养干部、派遣教员和提供物资帮助。

拉：古巴在非洲最为人知的参与行动是在刚果，您记得那是怎样开始的吗？

卡：是的，我记得十分清楚。在1974年4月发生的所谓“康乃馨革命”（Revolución de los Claveles）以后，葡萄牙殖民帝国开始解体。经济崩溃，以及卫国战争（它使这个帝国难以支撑并最后打垮了它）造成的消耗，削弱了这个亲法西斯、亲美的反动政府。

我说过，1975年，葡萄牙在非洲的大多数殖民地——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在殖民政府倒台以后已经取得了完全独立，并得到那时已在里斯本成立的进步政府的承认。

但是，安哥拉，这个葡萄牙非洲殖民地中最大和最富有国家的形势却大不相同。美国政府实施了一项秘密计划——这是现在才获悉的。直到不久前，华盛顿还声称“同那里发生的事情毫无关系”，自己是“无辜”的，以剥夺安哥拉人民的合法权利，并安插一个傀儡政府。关键是，它和南非结成了同盟，共同训练和装备葡萄牙殖民者建立的组织，使安哥拉的独立化为泡影，并在实际上成为与扎伊尔的家长、腐败的蒙博托共管的地方。这个蒙博托是世界上最大的强盗，谁也不知道他的400亿美元藏在什么地方，存在哪个银行，哪个政府帮助他搜罗了这几百亿的财富，而这个扎伊

尔却是个几乎一无所有的国家，没有铀矿，没有铜，也没有其它矿产，因为它只是欧洲在非洲的主要殖民地之一。好了，那个计划是想把安哥拉变为腐败的蒙博托和南非法西斯的共管地。华盛顿毫不犹豫地使用它们的军队入侵安哥拉。独裁者、恐怖分子、强盗、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者毫无顾忌地加入到所谓“自由世界”的队伍之中。而几年以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却恬不知耻地把他们称之为“自由战士”。

拉：那个时期，美国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合作。

卡：完全合作。对此，在谈到南非法西斯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时，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忘了说了。我应当告诉你的是，当安哥拉遭受南非侵略、古巴出现在那里时，为了把安哥拉并入南非——法西斯和种族主义的南非，美国向南非转让了几颗类似投放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因此，在安哥拉战争中，人们常常忘记了的是，古巴和安哥拉战士面对的，是拥有美国——通过以色列——提供了八枚核弹的军队和政府。它们怀有不少的希望，希望把这些核弹投放到我们的头上。对此我们很有戒心，并采取了一切措施，防备南非人向我们的军队投放核弹。

拉：南非人拥有美国提供的原子弹？这是人们不知道的。

卡：人们不知道，却完全是事实。“民主人士”，不是民主党，而是那个“民主帝国”，和谁没有签订协议？哪种强盗行径没有做过？它和蒙博托签订协议，容忍他的罪行。不要忘记，当卢蒙巴被杀害时，是蒙博托领导着由欧洲人武装起来的雇佣军，杀害了许多刚果（后来成为扎伊尔）的公民。

有一天我问纳尔逊·曼德拉：“请问总统，您知道南非拥有的原子弹在哪里吗？”“不，我不知道。”“南非军人是怎么对您说的？”“他们一个字都没有说。”这个时刻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没有人提这些问题，就像没有人对以色列拥有的核武器提出问题一样，没人问。世界上传播的是帝国及其同盟者感兴趣的消息。他们甚至企图在石油和天然气消耗殆尽

时垄断核燃料。

就是现在（2005年年底），他们正在执行企图阻挡伊朗生产核燃料的愚蠢政策，并要求他们使用储量很大的天然气和石油，因为，今天它的这两种碳氢化合物的日产量合计500万桶。伊朗希望节约这些产品，并有一天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利用核燃料生产电力。这完全是合理合法的。目前，法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如日本、韩国或加拿大，使用核燃料生产近80%的电力。伊朗人只是希望，用核燃料而不是碳氢化合物生产它所消耗的电力的一大部分。

拉：面对用原子武器装备的南非军队，你们采取了什么策略？因为，我认为，那是你们面临的一种全新的形势。

卡：是全新的。确实，面对那个拥有核武器的南非军队，我们必须采取一些与之不相称的方法。我们决定组建一些战术小分队，每队人数不超过一千人，用坦克、装甲运输车、大炮和防空武器全副武装起来。不仅如此，依靠飞行员驾驶米格-23飞机做贴地飞行和战斗的勇敢精神，面对拥有数十架战斗机的敌人，我们却掌握了制空权。那是一篇绝美的史诗，然而却没有理智地、充分地描述出来，多可惜啊！

拉：那场对安哥拉的进攻是什么时候发动的？

卡：那是在1975年的10月中旬。当扎伊尔军队和配有重型武器、南非军事顾问的雇佣军从安哥拉北部发起新的攻击，靠近首都罗安达近郊时，南部面临着更大的危险。南非的装甲部队已经穿越南部边境，并迅速深入境内。他们的目的是，联合南方南非种族主义者和北方蒙博托雇佣军的力量，在预定将于1975年11月11日安哥拉宣布独立之前占领罗安达。那真是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日子。

拉：那时有古巴军队在安哥拉吗？

卡：那时，在安哥拉有480名教官——在卡宾达还有一队人从事训练

工作，他们是应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主席、杰出和享有崇高威望的领袖阿戈斯蒂纽·内图——他在许多年里组织和领导人民斗争，得到所有非洲人民的支持和世界的承认——的邀请去那里的。他只是要求我们提供合作，训练将成为新独立国家军队组成部分的训练营。我们的教官只配备轻武器。有一些供训练用的武器，例如军校的迫击炮，但是这些人的装备基本上是轻武器。

拉：面临双重入侵，那些古巴人参战了吗？

卡：当然，他们立即投身于保卫安哥拉的战斗。1975年11月初，他们中的一个小组和本格拉省（Benguela）革命训练中心的新学员一起，立即勇敢地投入到了抗击种族主义军队的斗争之中。在这出其不意、双方力量悬殊的战斗中，数十名年轻的应征者阵亡，其中包括8名古巴教官牺牲，7名受伤。与此同时，南非人损失了6辆装甲车和其他物资。在这场战斗中，他们的伤亡极大，但从不公布数字。在那片偏僻的非洲土地上，古巴人和安哥拉人的鲜血第一次流到了一起，浇灌了灾难深重的非洲土地上的自由之花。

这样，在1975年的11月，在“格拉玛号”登陆整整十九年以后，一小支古巴人在安哥拉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斗争的最初几仗。

拉：于是你们决定向安哥拉派出更多增援，是吗？

卡：正是这样。我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挑战。我们的教官决不会接受命运的摆布，更不用说那些为祖国独立英勇斗争了二十年的安哥拉战士们了。那时，在和内图总统协调以后，古巴决定立即派遣内务部的特种部队和革命武装力量的常规部队，从空中和海上分两路迅速赶往那里，去迎接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入侵。

从相隔一万公里以外的地方，作为光荣的起义军继任者的古巴部队投入了与非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南非军队和最富有国家、由欧洲和美国武装到牙齿的扎伊尔傀儡军队的斗争之中。

拉：于是，你们发动了所谓的“卡洛塔行动”（Operacion de Carlota）。

卡：是的，开始了被称为“卡洛塔行动”^①的战役，那是我国历史上最正义、最持久、规模最大和最富有成效的国际主义军事行动的代号。

拉：为什么你们把它命名为“卡洛塔”？

卡：那次行动的名称也是一个象征，是为了表达对在古巴起义最初几次战斗中牺牲或被处决的成千上万奴隶的敬意。在那些战斗中，培养了许多具有卡洛塔才干的妇女。卡洛塔是一位黑人妇女。1843年，她领导了一次反抗可恶奴隶制度的斗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拉：那次行动成功了吗？古巴军队阻止了他们夺取卢旺达吗？

卡：是的，成功了。1975年11月末，敌人在北部和南部的进攻受到遏制。我记得，当古巴和安哥拉军队占领一个又一个村庄时，我们收到了如下的消息：“进入了某某村庄”“如何如何前进了”等等，从两个方向到达了北部和南部的边境。那个帝国没有达到肢解安哥拉使之得不到独立的企图。安哥拉和古巴人民的英勇斗争制止了它。

一队队装备齐全的坦克联队、地面和防空炮兵部队、达到营级规模的装甲兵，由我们的商船运到那里，迅速在安哥拉集结。36000名古巴士兵开始抗击强大的南非种族隔离主义分子，直到把他们赶出边境。在那里，当抗击南非人的战斗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飞行员驾驶的是安哥拉的米格-21和米格-17战斗机。穿越克韦河（Queve）桥前往对岸时，我们以几乎达到极限的程度，用米格-21打击南非人。

在南部打击敌军的主力时，我们迫使他们后退了一千多公里，一直退到他们在安哥拉和纳米比亚边境的出发地——种族主义者当时设在那里的殖民基地。那里集中了他们所有的军队。迫使蒙博托相对薄弱的队伍后退

^① 关于这次行动如何付诸实施的详细描述，请参阅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克斯所著的《卡洛塔行动》，《三大洲》（*Tricontinental*）杂志，1977年第53期，哈瓦那。

了几公里，并立即向主要敌人即南非人发起了进攻。1976年3月27日。南非的最后一名士兵撤离了安哥拉领土。

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安哥拉和我们相距遥远。例如，人们查看地图，会以为安哥拉比莫斯科离我们更近一些。但如果我们坐飞机去莫斯科，要比去卢旺达早到一个半小时。您瞧多么遥远啊！

十分重要的是，您如果处在那种形势下，您不能犯表现软弱的错误。弱者肯定会被打败。您必须派遣所有必需的兵力，加上一定数量的增援，也许是两倍、三倍的兵力，谁知道呢。兵力不仅仅指人数，还取决于火力、武器的数量和威力等等。后一时期我们还派出了飞机。我记得，我们在一些船舱里装了一队米格-23型飞机。

但是，好吧，当发动第一次进攻的时候，那些飞机还没有运过去。我们飞的是安哥拉的战斗机。必须占领万博，那是比勒陀利亚和华盛顿武装和豢养的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领导人若纳斯·萨文比的驻地。这是一个具有部落优势的地区，设想中是支持萨文比的，但是，在万博——我记得它，我到过这个地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获得远比萨文比多得多的支持，尽管后者在那里有更大的种族优势。

派遣必需的部队去那里的决定是在11月4日夜间接做出的。而在3月时，所有队伍都已经到了那里。他们从两个方向向前推进。在南部，南非人甚至没有来得及炸掉桥梁。

在北部，蒙博托的正规部队和雇佣兵在几个星期内被派往扎伊尔边界的另一侧。他们也被迅速消灭。我不明白，在南非人遭到那个命运以后，他们为什么不撤退呢。

拉：美国既没有阻止卡洛塔行动，也没有阻止你们参与安哥拉，对此您怎样解释？

卡：嗯，从最近几年解密的文件中，我们比那时更多地了解了华盛顿当局那时候是怎样想、怎样行动的。无论是美国的杰拉尔德·福特总统，还是权力极大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还是那个国家的情报部门，都没有

想到被禁运着的小小国家古巴参与安哥拉事务的可能性。这个小小国家在吉隆滩打败了他们，在“十月危机”中尊严地接受了挑战。这里，既没有人害怕，也没有人垂头丧气。除了地理上的邻国以外，在这之前，没有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以实际行动支持过另一个国家的人民。

拉：但是，在最后关头，你们得到了苏联的保护。

卡：您瞧，在安哥拉，当我们决定发动“卡洛塔行动”时，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得到苏联任何可能的“保护”。说真的，在取得军事胜利以后，古巴主张要求南非为它的冒险行为付出巨大代价，包括纳米比亚的独立。但是苏联政府担心美国佬做出反应，对我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我们迅速后退。有书信为证，一切证据俱全。

拉：那你们做了什么？

卡：在做了一些严厉抵制以后，我们不得不接受苏联的要求，尽管是部分的。在决定向安哥拉派遣军队之前我们没有征求苏联人的意见。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为创建安哥拉军队提供了军火，并在战争期间对我们提出的有关军需物资请求做了积极的回答。对安哥拉来说，没有苏联在那个胜利后给予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安哥拉的前途是难以想象的。

设想一下，当安哥拉人民在南方要防卫大国南非的侵略，在北方要防卫蒙博托的入侵时，苏联是唯一能够提供所需军火的国家。我们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待在安哥拉，十年都不可能。必须创造所需的最低条件。

拉：但是我想，由于极不相同的军事传统，在有关在那里如何作战的问题上，你们和苏联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卡：的确如此。在古巴人和苏联人之间，存在着战略和战术观念的分歧。我们训练了成千上万名安哥拉士兵，并为那个国家军队的培训和作战提供参谋。我们总是对他们说：“我们的任务不是直接参与国内战争，而是防卫外国的侵略。”无论在敌人进攻一个地方的时候，还是在出现某种

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都会援助他们。苏联人则为军队的高层领导参谋，并向安哥拉军队慷慨地提供他们所需的武器。我们相互间的关系、交往和友谊尽管很好，高层的出谋划策却让我们很是头痛。这是观念问题：他们的观念来自不同的战争。我会说，那是一种学院式的观念，从一场大战、一场死了许多人的战争经验中形成的观念；我们有的是另一种经验，一种从现在我们称之为“不对称战争”或非正规战争中得来的经验。但是，存在着并非不对称的东西，存在着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的基本的共同感情，而不是任何不对称。

在古巴和苏联军人之间始终充满着相互尊重、深刻的友谊和理解。这完全是真的，我们和他们相处得很好。始终存在着那种精神。

拉：那么，在1976年取得的那个胜利以后，你们退出了安哥拉？

卡：是的，但以我们认为合适的速度和规模。面对那个微妙的局势——那是必须对安哥拉人说的，他们大致了解我们的立场，必须对他们解释那种局势。我们认为，我们不得不同他们讨论这件事情，武装力量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在1976年4月飞往安哥拉，与内图总统分析逐步撤退大部分军队的必要性。我们实际上并不赞成采取这种措施，因为我们认为，那是不必要的，是在我们处于优势、对手的士气极端低落的情况下，在敌人面前示弱。我们想，在双方——古巴和安哥拉都认为在安哥拉建成一支强大军队所必需的时间里，我们都应该待在那里。

然而，我们开始准备撤退我们的人员和装备。内图总统理解我们的理由，尊严地接受了古巴军队的撤退计划。那是一次渐进的、逐步的撤退。我们逐渐减少在那里的存在。与此同时，在中部山脉的高处，我们保留了强大的战斗部队。但是，我们的力量实际上受到了削弱。当南非人看到这种削弱时，开始采取敌视行动，在那个300公里的范围内，在我们的军队所在山脉的战略要地，在离纳米比亚边境约250公里的地方，他们时而进攻、渗透，时而撤退。

他们钻了空子。您了解帝国主义和它的追随者，他们总是会利用一切

可乘之机的。他们肯定知道我们的局限性，知道我们受到压力，知道我们正在撤退。

拉：1977年您访问了安哥拉，是吗？

卡：是的，不到一年以后，在1977年3月，我终于访问了安哥拉，亲自向安哥拉和古巴的战士祝贺他们取得的胜利。那时，已经有12000名国际主义者，即我军的1/3，回到了古巴。按照预期在那时完成了撤退计划。

但是美国和南非并不满足。比勒陀利亚和华盛顿政府勾结在一起，尽管当时后者对此遮遮掩掩。由所谓的“建设性承诺”和里根总统制定的“连锁行动”方案组成的那个阴谋在1980年曝了光。美国和南非的顽固立场使我们必须在长达15年之久的时间里给予安哥拉人民以直接支持，尽管那时已经达成了第一个撤退计划的协议。

有两个撤退计划。1976年的撤退计划和后一个撤退计划。最后的撤退要在南非被打败以后。到那时，那将是我们很高兴做的事情。那场斗争开始的时候，30多万古巴人成为志愿者。因为只有志愿者才去安哥拉，在这里我们称他们为预备役人员。这是一个不能违背的原则。内战，就像我们说到的那场埃斯坎布拉伊的“肮脏战争”一样，只能派志愿者去。其他人派的不是志愿者，就是给高报酬的。因为，按照规例，打仗会死人的。国际主义任务不用志愿兵是无法完成的。这是另一个原则。

很少有人相信我们能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在那个同盟者极其谨慎的情况下，能够坚决地抵抗美国和南非的挑衅。

拉：你们以某种方式，从安哥拉帮助过该地区的其他被压迫人民吗？例如被南非占领的西南非洲——今天的纳米比亚——人民，或罗得西亚——今天的津巴布韦——人民，或者在种族隔离政权的种族主义压迫下的南非人民本身？

卡：20世纪80年代，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人民反对殖民压迫和种族隔离的斗争蓬勃发展。安哥拉成了那些人民的坚强堡垒，古巴也确

实对他们提供了支持。

比勒陀利亚政府总是背信弃义。例如，卡辛加——我们曾经谈到过它、博马、新卡腾加和松贝等地方是对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南非和安哥拉人民犯下的某些种族隔离罪行的舞台，同时也是我们提供支持反对共同敌人的鲜明范例。

拉：那些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卡：我只给您举一个例子：对安哥拉城市松贝（前新里东杜）的进攻。那是南非罪恶图谋最鲜明的例证。那里既没有古巴也没有安哥拉的士兵，只有医生、教员、建筑人员和其他民事合作人员，敌人却企图劫持他们。这些男男女女用民兵使用的步枪，和安哥拉兄弟们一起一直抵抗到增援来到，赶走了侵略者。7个古巴人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倒下。

这仅仅是我们可以提供的许多例子中的一个。我们身为军人或非军人的国际主义者，每当需要的时候，随时准备和被压迫的安哥拉人、纳米比亚人、津巴布韦人和南非人一起流血牺牲，他们是牺牲和勇敢精神的榜样。

这是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年、成千上万现役和预备役战士，以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和革命武装力量的常规部队一起完成的英雄业绩。

为了保证每一项任务的成功，在古巴国内，还有几百万男女为离去人员留下的工作及保障战士和民事协作者家庭的生活需要而加班加点地劳动。

应当特别感谢我们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家人。他们忍受夫妻离别之苦，在每一封家书中鼓舞亲人，避免提及遭遇的困难和牵念。特别是那些阵亡兄弟的母亲、儿女、兄弟和配偶，他们忍受着亲人牺牲的极端痛苦。他们毫无例外地把深深的痛苦转化为对祖国的爱，更加忠诚于事业。为了这个事业，他们所爱的人自觉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拉：1987年对安哥拉发起了一次新的军事挑衅，南非又进攻了。

卡：是的，1987年末，发生了南非对安哥拉领土最后一次大规模侵略，

使那个新国家的生存处于危急之中。那一天，南非和美国对安哥拉一支大部队发动了最后的、也是最具威胁的进攻。当时，那支部队正在安哥拉东南边境的沙漠地带向然巴（Jamba）方向行进，据说那里是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领导人若纳斯·萨文比的司令部所在地。我应该说，我们始终反对对然巴发起攻击的。每当出现这种攻击时，就不能阻止南非在最后时刻用他们现代化的飞机、强大的炮兵和装甲部队进行干预，他们是能使安哥拉部队遭受巨大损失的。

我们每年都和苏联人和安哥拉人争论这件事情：“不要干这种事，不要做那些需要巨大耗费、昂贵而毫无用处的攻击。不要指望我们去做这种冒险。”

有时我们达到了目的，但那是他们年年都要做的一项练习。最近一次是我为参加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而访问津巴布韦时。那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因为苏联人坚持重建国家边境的理论。那个地方离罗安达一千多公里，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角落。他们设想，那是萨文比所在的地方。而当时，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和“肮脏战争”正在全国蔓延，已经到了首都附近。最初阶段，我们正在制定撤退计划，但却发生了某种意外。

安哥拉独立前夕，扎伊尔的一支部队——加丹加人进入了安哥拉。在反蒙博托的战争结束以后，他们自作主张，在某些安哥拉军官的支持下，入侵了扎伊尔的富裕省份加丹加。欧洲报刊掀起了轩然大波。法国、比利时等国立即派出了军队。不仅南非在南部边境驻扎有军队，比利时和法国军队，也就是说，北约也向北部边境派去了军队。

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停止了撤军，尽管我们并不喜欢这样做。

拉：但是，安哥拉参谋部没有听从你们的意见，那时候，你们面对南非的侵略做了些什么呢？

卡：您是指对安哥拉东南部边界萨文比的所谓首都发起的攻击吗？

那时，再一次重演了人们熟知的历史。在攻击的最后阶段，安哥拉人受到南非的沉重打击，在人员和全新装甲设备方面遭到了重大损失。那些

设备是苏联——除了军事顾问外——专门为那次行动提供的。壮足了胆的敌人向靠近北约梅农盖空军基地一个备用机场的奎托夸纳瓦莱深入，准备给安哥拉一次致命的打击。那里一个古巴人也没有，以前也没有，因为有人曾经对他们说：“别指望我们。”面对这个无疑是最大的，我们一点也没有责任的灾难，安哥拉政府发出绝望的请求，要求我们支援。

您想象一下，面对这种事前估计到了的灾难，我们会出现怎样的精神状态。可以设想，那是相当不愉快的。但是这一次的灾难要大得多。那支军队尽管所剩无几，但撤退时仍然秩序井然，因为安哥拉战士是忘我、勇敢和守纪的，但是部队的士气被毁坏了，仅剩的坦克和装甲运输车刚刚还能开动。离那里最近的我们的部队远在 200 公里以外。

拉：最后你们同意了吗？

卡：那个时候，尽管我们也面临近处的美国可能发动军事入侵的危险，革命的政治和军事最高领导在做了巨大努力以后还是决定，如同我们不止一次向苏联人提出的那样，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集中必要的力量和手段，给南非军队决定性的一击。

我们的祖国重演了 1975 年的伟大业绩。部队和战斗器材源源不断地穿越大西洋，卸在安哥拉南部海岸，以便从安哥拉的西南部，从纳米比亚方向打击敌人。与此同时，在离东部 800 公里的地方，一支全员的坦克部队，在事前排除了铺设在近 100 公里路面上的地雷以后，向北约旧的备用机场奎托夸纳瓦莱挺进，那里集结着受南非人攻击的安哥拉武装力量。用直升机向那个战略要地运去了装甲兵、炮兵和军事技术人员，以利用集中在那里的无数技术装备。新的增援补充了装甲兵营，使这个被人遗忘的名字在许多天里成为国际瞩目的中心。简单地说，我们的战士和指挥官与集结在那里的安哥拉军官及士兵一起，为向那个空军基地挺进的强大的南非武装准备了一个精神陷阱，使那支种族主义军队受到耗损，削弱了力量。

拉：那一次你们在那里总共集中了多少兵员？

卡：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遵守两项基本原则：首先，要么强大得足以打败敌人，要么冒被人打败的风险。那种失败将使革命陷入险境。多年来，我们是在那里赌博自己的前程。在古巴这个地方，我们不可能被打败。他们只可能在那里，在安哥拉打败我们。赌资太大了，大大超过某些人的想象。

其次，就像我们在马埃斯特腊山所做的那样，不必用巨大的、昂贵的代价来决定战争的胜负。在马埃斯特腊山，我们只以几十名战士的牺牲就打败了巴蒂斯塔的进攻。我们的哲学是，以最小的牺牲赢得胜利。在安哥拉，我们还是不折不扣地贯彻这种策略。

这一次，在那里集结了 5.5 万名古巴战士。就这样，当南非军队在奎托纳瓦莱付出血的代价时，在西南部有 4 万名古巴士兵、3 万名安哥拉士兵、约 3 千名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纳米比亚游击战士，在约 600 辆坦克、几百门大炮、一千支防空武器和掌握了制空权的、勇敢的米格-23 空军部队的支援下，向纳米比亚边境推进，准备彻底扫除驻扎在那个主要方向的南非武装。注意，是扫除，是前所未有地忠实于我所指出的原则，用无数出人意料的重击，而不用野战的方式，扫除他们。

领导安哥拉行动的莱奥波尔多·辛特拉斯·弗里阿斯（Leopoldo Cintras Frías）（波利托 Polito）^①显示了他是一位辉煌的军事首领。我还记得，他在年仅 16 岁时就在第一纵队参加了 1958 年 11 月 20—30 日发生的吉萨战役。那个月的 28 日，我们交给他的主要任务是，做在那些激烈战斗中缴获的一辆小坦克的炮手。用那辆小坦克，我们在凌晨向那个驻军的主营地发起攻击。T-17 小坦克在发射 55 发炮弹后被敌人的反坦克火箭炮击中。波利托背着我军的一个重伤员撤退。在发觉那个同志已经牺牲后，他继续用坦克上 30 毫米口径的机枪作战。他的英雄业绩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用从敌人那里缴获的 PRC-10 无线电台，我就近注视着他的英雄业绩。那

^① 现为军队上将、古巴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西部军司令。

时，离我们的胜利还只有 32 天，而那不是他在那段时间里唯一的英雄业绩。

二十九年以后，在指挥古巴、安哥拉和纳米比亚军队的日子里，他参加了奎托纳瓦莱战役和在安哥拉西南部、纳米比亚方向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反攻。

关于那些战斗和那场斗争的突发事件，可以讲述的事情很多很多。是一次长期、复杂的战斗，无疑是古巴武装力量历史上最大的军事行动。我可以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讲述那场漫长战斗的演变和它的数十次事件与趣闻轶事，因为，我都记得十分清楚。总有一天，有人将会写出这个英雄业绩的全部历史的。

拉：在奎托纳瓦莱，南非武装力量遭受了重大失败。

卡：是的，非常重大，我说是致命的失败。在奎托纳瓦莱取得的无可争辩的胜利，特别是强大的古巴武装力量在安哥拉西南部的威慑性进军，彻底结束了外国的军事入侵。敌人不得不收起强者的傲气，坐到谈判桌上来。

拉：谈判的结果如何？

卡：谈判以由南非、安哥拉和古巴于 1988 年 12 月在联合国总部签署的西南非洲和平条约告终。从那时起，在三年时间里，我们从安哥拉进行有条不紊和有组织的撤退，直到最后一个士兵。

人们称之为三边谈判，因为在谈判中，桌子的一边坐着安哥拉人和古巴人，桌子的另一边是南非人。美国装作调解人坐在了桌子的第三边。实际上，美国是判官，又是谈判的一方，是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同盟者，他们适合坐在南非那一边。

美国谈判代表团的团长是多年来一直反对古巴参加谈判的非洲事务副国务卿切斯特·克罗克（Chester Crocker）。面对南非侵略者所处的严峻

军事形势，他不得不让步，同意我们参加谈判。在他的一本自传^①中谈到古巴代表进入会议厅时，他还是客观的，他写道：“谈判彻底变了。”里根政权的这位代理人清楚地知道，当古巴代表坐在谈判桌前时，粗暴的阴谋、讹诈、恫吓和谎言都行不通了。

这一次没有发生 1898 年在巴黎出现的情况。那时，美国人和西班牙人在古巴代表、解放军和武装起来的古巴政府的代表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了和平谈判。这一次，我们的武装部队、古巴革命政府的合法代表和安哥拉政府的代表都在场。

拉：达成协议以后，你们认为你们最终完成了在安哥拉的任务吗？

卡：是的，毫无疑问。国际主义任务完全完成了。我们的战士，仅仅带着安哥拉人民的友谊、带着在离开祖国数千公里以外作战时使用的武器、完成任务后的满足和阵亡兄弟的遗体，开始昂首阔步地返回祖国。最后一批是在 1991 年 5 月从安哥拉回来的。

他们的贡献对巩固安哥拉的独立，对纳米比亚在 1990 年 3 月取得独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还对津巴布韦的解放，以及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灭亡，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场战争——最可怕、最令人心碎、最困难的人类行为——能伴以如此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获胜者又如此谦逊，是历史上少见的。在十五年的时间里，只有一个俘虏被古巴军队枪毙。仅仅一个！对此我将终生不忘。遗憾的是，我们知道我们一些被俘的战友遭到了怎样的命运。南非人干了些什么？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干了些什么？美国佬干了些什么？那些最终被打败了的人显示，在他们的队伍中完全缺乏这种品质。只有坚定的原则和纯洁的目标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国际主义战士能在每一项行动中都如此光明磊落。

无疑，传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传统是由争取独立的起义者开

^① 切斯特·A. 克罗克：《南非的正午：艰难环境下创造和平》（*High Noon in Southern Africa: Making Peace in a Rough Neighborhood*），诺顿出版公司，纽约，1992 年。

辟、经由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战士和地下工作者加强了。革命胜利以后，民兵、革命武装力量的战士和内务部，又在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继承了这一传统。

拉：国际上对古巴的这一行动了解得很少，对此您做何解释？

卡：为什么这个非凡的英雄业绩从来没有被人广泛传颂？这是有原因的。不久前，即 2005 年的 11 月 11 日安哥拉独立 30 周年时，为避免古巴的名字在纪念活动中出现，美帝国主义做了非同寻常的努力。极端的例子是，华盛顿甚至改写历史，古巴似乎与安哥拉的独立、纳米比亚的独立和直到那时候仍然不可战胜的种族隔离主义政权的失败毫无关系。古巴甚至并不存在，一切都是偶然的产物，是人们想象的结果。

他们现在还企图证明，美国政府与成千上万被杀害的安哥拉人、几千个被摧毁的村庄、几百万埋在安哥拉土地上的地雷（直至今日，那个国家的许多儿童、妇女和百姓还在被这些地雷夺去生命）毫无关系。

这是对安哥拉人民、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人民顽强斗争的侮辱，是对古巴十分可笑的不公平。古巴是唯一为了非洲而与可耻的种族隔离政权做斗争和流血牺牲的非非洲国家。

拉：现在美国已经成为安哥拉的一个重要同盟，是安哥拉石油具有决定意义的买主，您认为，是这个事实促使它遗忘了古巴在那里的行动吗？

卡：确实，今天，美帝国主义从安哥拉榨取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石油，挥霍自然资源，使那个不可再生的石油储备趋于枯竭。

古巴履行杰出的反殖民主义领导人阿米尔卡·卡夫拉尔的话：“古巴战士随时准备为各国人民的解放献出生命，帮助取得了我们的自由和我国人民的进步，作为回报，人们从我们这里拿走的唯一东西，是在为自由而斗争中倒下的战友。”

美国企图抹杀古巴光荣作用的可笑图谋激怒了非洲人民。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人们从来没有就所发生的事写出真实的历史。知名的研究人

员悉心寻找资料。我可以对您说的是，过去，古巴方面从来不想写这些东西，并拒不谈论以无私和友谊精神所做的事情。而今天，我们已经准备为此提供合作，向严肃的、希望讲述那些事件的真实历史的历史学家逐步开放档案，公布文献。

拉：总共有多少古巴人参加了安哥拉那场漫长的战争？

卡：十五年的时间里，三十多万国际主义战士，近五万文职合作人员在安哥拉执行任务。这是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和成千上万战士的非凡业绩，他们志愿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他们完全自愿地演绎了无数英雄主义、忘我和人道主义的业绩。安哥拉的业绩、争取纳米比亚独立和反对法西斯种族隔离政策的斗争大大锻炼了我国人民。这是一个具有极高价值的宝贝。正如我所说的，还有几百万男女在古巴做着后勤保障工作。

叛逆者、起义者、地下斗士、吉隆滩、“十月危机”和与强盗行径做斗争的战士们、国际主义者、民兵、革命武装力量和内务部的成员，总之，战斗的人民，是植根于非洲和西班牙并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大树。1936—1939年，当西班牙共和国遭受法西斯和反动派进攻时，数百名古巴人投入西班牙内战，不少人献出了生命。四十年以后，古巴战士以成倍增长了的力量来到非洲，保卫受到同类敌人侵略的人民。2077名同胞在那里倒下。

来不及抖落路上的风尘——像马蒂在玻利瓦尔纪念碑前所做的那样，回到祖国的最后一批国际主义战士和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一起，在青铜巨人（指古巴民族英雄、第二次独立战争领导人安东尼奥·马塞奥——译注）墓前，向所有在我国人民进行的斗争中倒下的战士致敬^①。

今天，这个美好的传统由成千上万名医生和其他卫生保健工作者、教员、体育教练和其他领域的专家继承着。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在与战争环境同样艰难的条件下履行自己的义务的。

^① 1989年12月7日，安东尼奥·马塞奥逝世周年日时，开始祭奠活动，举行在非洲土地上从事支援行动时牺牲的国际主义战士的下葬仪式。

拉：你们从安哥拉的长期战争中吸取的最后教益是什么？

卡：主要教益是，一个能够做出那样英雄业绩的人民，当需要保卫自己的土地的时刻来临时，有什么事情做不了呢！对我们那些英勇牺牲的亡人，我们做了一个永恒的承诺：把革命进行到底，永远无愧于他们做出的榜样。这个承诺是对昨天和今天懂得为维护正义而尊严地战斗和牺牲的古巴人，对如马克西莫·戈麦斯、亨利·里夫·切·格瓦拉那样的男男女女，对那些在漫长的历史上为我们的祖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显示了团结的巨大价值的人做出的。

当今一代和未来的古巴人，不管面临多大的困难，将继续勇往直前，不停地斗争，让我们的革命事业，无论在已经如此的政治领域，还是在军事领域，相信很快也会在经济领域，永远坚不可摧。我们将以更大的力量弥补我们的不足，改正我们的错误。我们将继续斗争。我们将打败帝国主义的每一次侵略，粉碎他们的宣传谎言和他们狡诈的政治和外交阴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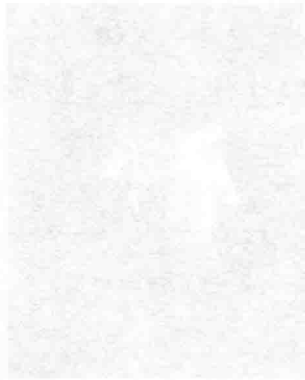
我们将继续经受禁运的后果。但是，古巴人的尊严、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和世界各国政府几乎一致的反对，也包括美国人民日益拒绝这个践踏他们宪法权利的荒谬政策，总有一天会粉碎这个禁运。

如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安哥拉付出的几倍于吉隆滩的代价一样，谁想到这里打仗，他就会遇到成千上万个基方贡多（Quifangondo）、卡宾达（Cabinda）、埃博（Ebo）、莫罗斯·德·梅东达（Morros de Medunda）、坎甘巴（Cangamba）、松贝（Sumbe）、鲁阿卡纳（Ruacana）、奇帕（Tchipa）、卡卢埃凯（Calueque）和奎托夸纳瓦莱那样的地方，如同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在安哥拉、纳米比亚和南非的英雄人民面前一样遭到失败。人们都没有想到，这一切会和加勒比海这个小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我
的
一
生

第十六章 与美国的移民危机



与里根达成的协议—卡马里奥卡 (Camarioca) —马列尔 (Mariel) —“筏民” —1994 年 7 月 13 日海难—1994 年 8 月 5 日的哈瓦那骚乱—修正案—移民和“难民”

拉：我希望，我们现在讨论一下古巴和那些想离去——出于政治或经济的原因——的人之间几乎持续存在的、造成了你们与美国的关系紧张的那个问题，即人们所说的“移民危机”。我想，即使在革命前，始终有人想离开古巴的，是吧？

卡：有很多人——这是传统——总是想去美国。那个国家被电影、以后又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理想化了。根据官方记录，古巴移居美国的人口（包括他们的后代）1958年已经高达12.5万人。这是1959年以前，在战争、法西斯主义、纳粹大屠杀，以及其他重大事件发生后不久的情况。那时，他们每年仅仅签发2千或3千张签证。权力、财富、许多人受到的崇美思想教育，特别是希望拥有汽车、财富、高薪的幻想，对于许多没有读过书、30%的人口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

那个国家有很大的吸引力。从革命取得胜利的那一刻起，移民问题，特别向美国移民受到空前的影响。那时，同那个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复杂的情况。1959—1962年期间，估计有27万人去了美国，其中有几千名医生、工程师、教员、教授和技术人员。而在最初去那里的7万人中，有一部分人并未履行签证手续。请注意，美国是在1961年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的。

拉：你们同美国的第一份移民协议是和里根政府签署的吗？

卡：是的，与罗纳德·里根在1984年12月签署了第一份协议。由于希望遣返那些所谓的“除外人员”（一部分于1980年逃离马列尔港的人，美国希望把他们遣返给我们），他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灵活。我们接受了。我们对他们说，“把‘除外人员’的名单附在协议里面。”有两千多人姓

名的一份名单附在了协议里面。美国当局每年将签发 2 万张签证，它将保证这一数量的人去美国时不必冒任何风险。

做出了一个安排，我们答应接收那些“除外人员”。在那个两千多人名单中的人现在还在回来，他们在那里服完刑期，然后把他们遣送回来。

在签署这些协议以后，出现一种紧张形势。一段时间内，1986 年和 1987 年，协议完全停止执行。与此相应的是“马蒂电台”的开播。美国人很少以良好愿望做事。之后，又重新执行协议。协议的重新执行，是因为问题继续存在，必须找到避免非法出境的办法。

协议并不坏，但他们并不履行，而实际上，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意识到那个修正案^①（Ley de Ajuste）所起的恶劣作用。为了增添内容，美国人一次又一次、再三地对这个修正案做出新的解释。

拉：什么内容？

卡：瞧，比如以前，非法前往那里的人要等待一年才能申请在美国的永久居住权，就业要履行一整套手续。但是，后来通过一系列的解释、附加规定和对犯罪行为的让步，这些都变了，不是作为法律，而是在实际操作中变了，从而使非法移民问题更加严重。现在这一切要求都没有了，所有问题都一路畅通地得到解决，一踏上美国土地就能得到解决。

然后，正如我说的，他们用“马蒂电台”发起挑衅，阻碍了与里根达成的第一个协议的执行。在 1986 年和 1987 年两年里，协议的执行中断了。以后，又恢复执行协议。他们重新遣返那些出了名的“除外人员”，我们则接受名单里的人。但是，还有一句话，“每年 2 万张签证”的承诺成了

^① 古巴修正案（The Cuban Adjustment Act，或 Ley de Ajuste Cubano）是美国众议院于 1966 年 11 月 2 日在众议院议长林登·B. 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的主持下通过的，它修改了关于古巴移民的条款，把他们称为“政治难民”，享有政治避难和在美国的永久居住权。古巴认为，这个法律鼓励非法移民。

一个骗局，因为他们颁发的签证最多只有一千多张，每年约 1200 张，以后又下降到 1000^①。也就是说，比 2 万张要低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1994 年 8 月 5 日的移民危机^②。

拉：8 月 5 日那天，在哈瓦那的一个居民区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骚乱。

卡：是的。那时，克林顿是总统。他们通过“马蒂电台”宣布，将有一些船只来哈瓦那运送人员。而众所周知的是，我们从一开始确立的原则是，一艘航行中被劫持的船只，即使在哈瓦那湾内，为避免发生事故，我们也不会拦截它。

由于那种形势，发生了 1994 年 8 月 5 日的事件，那场骚乱。

拉：您好像亲自去安抚那些骚乱分子了，是吗？

卡：是的，我亲自去了。在那里，我们既没有使用警车，也没有使用消防车。我和随从一起到了那里，很简单地下令不要开枪。当我了解情况后，我说：“谁都不要动，警察和士兵都不要动。”我带上费利佩·佩雷斯·罗克^③（Felipe Ramón Pérez Roque）。然后，卡洛斯·拉赫^④（Carlos Lage Davila）找到了我们，和我们一起上了路。看到船只没有来，那些人就愤怒起来，开始投掷石块，砸碎玻璃。这就形成了骚乱。他们砸烂东西，攻击人群。

拉：古巴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吗？

卡：是第一次，四十六年中仅有的一次骚乱。在“特殊时期”的那

① 1994 年，直到 7 月 22 日，美国只给了 544 张签证，而根据 1984 年的协议，到每年的那个时候，美国应当发放了一万张以上的签证。

② 1994 年 8 月 5 日，正是在那个“特殊时期”，一帮人强占了哈瓦那港的一艘快艇，从而在港区引发示威活动。午后，在该区的附近、市中心和老哈瓦那的一些街区发生暴乱。警察的警戒线被冲破，局势濒危。

③ 费利佩·拉蒙·佩雷斯·罗克，1999—2009 年古巴外交部长，当时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私人助手。

④ 卡洛斯·拉赫·达维拉，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部长会议秘书。

种条件下，由于经济形势十分困难，前来运送人员的欺人谎言、“修正案”等等，在那个时候汇合到了一起。还有，1980年马列尔移民危机后和里根签订的协议也没有得到执行。我们必须迫使他们，美国人关门，我们开门。这就是历史。

拉：那个“修正案”是什么时候在美国颁布的？

卡：修正案是1966年在马坦萨省一个小港口卡马里奥卡（Camarioca）事件后颁布的。由于1965年的卡马里奥卡危机，所有想离开国家的人得到了免费机票。这是在“十月危机”发生三年以后的事情。由于那场危机，古巴和美国之间没有了航线，旅行中断了。

“十月危机”之前，他们鼓励人们离开。在1962—1965年期间，我们估计有几万人非法离开了古巴。美国政府支持“彼特·潘行动”，我和您说过的，他们带走了1.4万名儿童。

拉：在你们宣布在古巴实行社会主义以后，这类活动是不是加快了步伐？

卡：彼特·潘行动是很早以前就开始了的。1961年4月16日，即革命取得胜利近两年半以后，在我们掩埋入侵吉隆滩轰炸中的牺牲者遗体的时候，我们宣布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那次轰炸是由巴蒂斯塔和美国的飞行员驾驶涂着古巴空军颜色和标志的美国战机进行的。在那个安葬受害者的仪式上，我第一次谈到社会主义。

必须懂得，国家是按照革命规律成为社会主义的，是有现实基础的。首先，打败了巴蒂斯塔及其政权，而后，他的军队和警察被解散，还没收了强盗们的非法所得。这是让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会高兴的事情，即使他们并没有经历革命或类似的行动。但是，仍旧没有社会主义的觉悟。有关这一点，关于如何培养社会主义觉悟，是有许多话要说的。

拉：让我们继续讨论移民问题。您正在对我说，“十月危机”后美国

决定取消旅行。

卡：是的，1962年他们中止了一切旅行。旅行已经不可能了，众多的家庭被分割。许多把儿女送往美国的父母还是认为革命会垮台，而与他们的骨肉永远分离了。

拉：您说到，第一次移民危机是在卡马里奥卡发生的，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卡：正如我说的，1965年10月的卡马里奥卡危机是第一次。他们切断了旅行，不让人们离开。于是就有了非法出境、发生了问题和宣传。已经在那里的人——我对您说过，已经走了一些人——很有钱，因为，第一批走的是有钱的官。钱少的人不熟悉路子。正如我提到的，走的是一些职业人士、医生、熟练工人、教员等等。而我们必须忍受缺乏这些技术人员的苦果。

但是，“十月危机”发生以后，美国人切断了旅行的可能性，造成了家庭分离带来的一切问题和非法出境发生事故的危險……于是我们说：“不，不必冒险，你们来找他们吧。”我们在巴拉德罗（Varadero）附近设置了一个叫作卡马里奥卡的小港口。来了近千艘船，因为当我们说“你们可以来，也可以走”的时候，佛罗里达那边的人是完全信任我们的。那一次，因为这个移民协议，他们自由地走了，人数肯定会超过30万人。

拉：在一段时间内它使非法出境活动停止了？

卡：是的，必然会停止的。不需要打击，不带来任何问题，那个非法的、冒险的交通就停止了。因为，这些人尽管有其他愿望，比如希望离开，他们的行为是正派的。他们尽管缺乏爱国主义精神，但他们是信任古巴当局的。于是和美国达成了一项协议：所有提出申请、想去美国的人都可以合法地离开。我们得到了这种承诺。是革命，是我们为那些人争取到了签证，使他们得以上路。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从1962—1965年，人们是以不

可靠的、危险的方式走的。然而，正如我说的那样，此后有约 30 万人经由那个途径走了。

事情是这样的：那里聚集了人群，因为留在这里的亲属希望移居，去那里和亲人团聚。当然，也有坐飞机走的，开辟了一座空中桥梁。没有一个遇难者。从我们争取到的这个途径，通过卡马里奥卡行动这种方式，他们移民去了国外。

走了不少有能力的人。国家忍受了这种损失。大量专家、技术人员、熟练工人流失了。他们去寻求更好的生活。那里的工资和物质条件要比一个被禁运国家能够给予的好上 20 多倍。如果做确切的计算，无疑会更高。我们的分配除了必须合理以外，还必须做到人人都能享受到它。古巴已经没有任何奢华。革命胜利 6 年以后，爱国精神还不是很强烈，后来在绝大多数人中具有的牢固社会主义觉悟那时还不存在。新的国家还缺乏以后在与地球上最强大帝国斗争中取得的经验、组织程度和能力。只有革命在教育领域做了巨大努力以后，我们才经受住了这种巨大的人才流失。不要忘记，正是那个时期发生了“肮脏战争”、对吉隆滩的入侵和“十月危机”。

卡马里奥卡事件发生于 1965 年 10 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这之后不久，即 1966 年的 11 月，美国实行了修正案。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了解了修正案的实质及其后果。正由于如此，美国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想取消这个法律。

拉：然后，在 1980 年发生了马列尔危机……

卡：马列尔危机是帝国主义伙同其他拉美和欧洲国家发起挑衅而引起的第二次危机。在暴力进入秘鲁大使馆事件——当时，大使馆的一名古巴警卫遭到杀害，秘鲁方面决定不交出凶手——发生以后，我们决定撤销那个外交使团的警卫人员。我们清醒地知道这样做的后果。约一万名希望前往美国的人进入了使馆，其中多数是流氓。我们安排了马列尔港，对希望移民的人撤销了一切限制。我们授权臭名昭著的古巴—美国移民团派船来

古巴、靠岸，并收容他们。于是，像在卡马里奥卡一样，再次建立了一条海上通道，10万人移民前往了佛罗里达。

我们就此做出决定，如同以后以负责态度处理美国飞机的劫持者一样，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事实证明，对肇事者判处在古巴服刑20年并不能阻止这类事件的发生。我们也得以证明，在美国劫持飞机的人，一般说来，都是一些精神失常者。我不记得有哪一个从美国劫持飞机来古巴的人是出于政治原因。大致上，他们都是有着同类问题的人，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从这儿到那儿走一走而已。

是我们平息了马列尔事件，单方面、无条件地，因为我们照顾卡特总统，不想帮助右派在美国获胜。我们允许10万人出走，然后关闭了马列尔通道。然而，修正案刺激非法移民的效应重新显示了出来。

拉：第三次移民危机是发生在1994年的“筏民者”危机。

卡：是的。1994年时，苏联危机，即苏联解体已经发生，我国开始了“特殊时期”。在这个阶段，美国每年发放的签证不到一千张……您发现情况已经变化了吗？不能按老套子看问题。

那时，在那个阶段，“修正案”变成了移居美国的可靠途径，也成为反古巴宣传的强有力工具。1994年，已经在那个“特殊时期”里，尽管里根承诺每年发放2万张签证，但持签证合法前往美国的还不到一千人。与此同时，得益于“修正案”而非法移居美国的在5千到6千人之间。他们企图以此来挑起不满和内部骚乱。由于他们不履行1984年的协议，对于想去美国的人来说，“修正案”是一个出路。但是，像以往一样，求助于这个法律的人，不是教员，不是劳动者，不是没有犯罪前科的人……具有这种特征的人不是那些惯于用非法手段偷取船只和小艇离开的人。干这种事情的是另一类人：流氓、犯罪分子等等。是他们在1994年8月挑起了哈瓦那的骚乱。

拉：8月15日的骚乱是有预兆的。此前的7月13日，由于国际报刊

广泛渲染的一次事件：被劫持的一艘拖船沉没，许多人遇难。他们指控你们造成了这场灾难。它引发了一场反对你们的大规模运动，您还记得那是怎么一回事吗？

卡：是的，我讲给您听。在拖船事件之前，在科希马尔（Cojimar）发生了一个事件：一艘快艇在那个地方的小港里靠岸，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人带走，非法移民去了美国。这是非同寻常的事情，一艘美国小艇靠了岸。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了，在那里值勤的几个警察向小艇开了几枪。

然后发生了另一事件。一部拖拉机在拖斗里带着一些人企图非法出境。在靠近海岸时，一个警察前去阻止，拖拉机上的人开着拖拉机向警察身上轧去。这两个事件是在短期内先后发生的。下达了绝对命令：绝不阻截带有人员的船只。这条规则一经确立，就得到了严格遵守。

一段时间以后，我想正是1994年7月13日，发生了您所说的事情，我们的那个敌人企图大加利用的事件。

在一个码头，停靠着一些在那里作业、对进入哈瓦那港的船只提供服务的拖船。一批人合谋劫持了一艘旧拖船。那是一条只能在内河做短距离航行的木船。他们在晚上劫走了它，切断了通信联络。在另外两艘拖船上的三四名船员很生气，因为被劫走的船是他们的，他们具有保护自己工作场所的精神。他们没有告诉别人，因为那里没有电话，自发地登上了另外两艘拖船，去跟踪那条已经离港的旧拖船。

任何部门都没有获悉那个突发事件。我们有关于7月13—14日一夜里所发生情况的全部报告。一得到这一事件的消息——不知道是一个小时还是更长时间以后，边防军派出一艘巡逻艇全速追赶，不是为了拦截那条船，恰恰是为了让那些自发地去追赶他们的船员回来。

夜很黑，有风浪。那些船员干了些什么？拖船航速很慢，每小时只有五六海里。他们跟随着那条被劫持的旧拖船——我想两三个小时以后追上了它，准备采取行动迫使它返航。两条船一前一后，这时候事故发生了。那条在后面的铁质拖船因为靠得很近，当一个大浪打来时，撞到了那条木

质拖船。把被劫持的船撞出了一个洞——船上载有 60 多人，船开始进水，有人开始落水。

撞船的铁质拖船——船上有三四名船员，不会更多，没有办法搭救落水者，但开始收容船上的人。救了一些人，直到害怕被救者的人数太多，会反过来劫持他们时为止。他们在救人。幸好，事故发生几分钟后巡逻船全速赶到了。

拉：然后呢？

卡：铁质拖船救出了几个人，但获救者的多数，半数以上的人，大概 30 个人是被巡逻艇救上来的，因为他们接受从事这类任务的训练，船上备有救生圈、绳索等从水中救人的必需品。救出了许多人，大多数获救者是由巡逻艇营救上来的。这是一次有 40 条生命遇难的悲惨事件。像往常一样，敌人企图大肆利用这一悲惨事件。

拉：你们认为那是一个意外事件？冲突不是预谋的吗？

卡：在追踪被劫持拖船的人那一方，没有任何挑起冲突的意图。他们是自发前往的，为的是让他们回头。他们没有过错，他们所做的，只是在那艘港口不可缺少的拖船被偷的情况下做出的一种反应。应当承担责任的，是美国政府里那些鼓动和鼓励这类破坏行为的人。这里做了一项全面的调查。所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一次无纪律、不遵守规定的行为，而不是故意、有预谋的行动。

现在，他们知道这些命令吗？我想他们应该知道，尽管这些命令并未下达到拖船。海岸警卫队、负责人、警卫队的每个队长都接到了命令，是了解有关绝不阻截劫持行为、避免发生事故和人员伤亡等项指示的。

拖船的船员，在他们愤怒时，或出于自身的尊严，或其他原因，试图收回拖船，然后又做出了救援他们的人道主义表示。当局与事故及其后果毫无关系，恰恰相反，救出了半数人员。

您知道，这成了诬蔑古巴击沉一艘船只的材料。船上乘坐着这种冒险

行为中常有的百姓、妇女，甚至儿童。尽管危险，劫持者总是夹带妇女和儿童。它发生在1994年的7月。

拉：在他们批评你们的时候还继续提到这件事。

卡：对，它成为反古巴的理由。但是，事实上，真实情况是，我们的人员得到的指示是：不要阻截航行中被劫持的船只，以避免发生事故。

我重申，有关这个事故我们做了确切的调查，拖船上的船员没有任何使那艘船沉没的意图，而是救助了人的生命。为这件事情严厉惩罚这些船员，只能是蛊惑人心的行为，是不公道的。

拉：您认为那个灾难以及由此引起的宣传运动恶化了已有的气氛和环境，从而助长了8月5日骚乱的发生吗？

卡：我对您谈过了。在哈瓦那之所以发生骚乱，是因为臭名昭著的“马蒂电台”——这个无线电发射台是不配称作“马蒂电台”的——说，有一批船只到这个城市的海岸来接人。人们，其中大都是流氓，聚集起来。正如我所说的，他们一般都在夜间抢劫船只。他们不管船只的状况，也不管天气好坏。就是这样的一帮人，不是那种和我们有政治分歧的人，如我们所说的不赞成我们主张的人。90%以上已经移民的人，像墨西哥人或其他国家的人一样，他们移民的原因，不是因为失业，不是因为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得不到治疗，或者没有足够的食品。在我们这里食品几乎是无偿的。

拉：那他们为什么要移民呢？

卡：他们移民，因为想得到一辆汽车，因为想在一个广告满天飞的消费社会里生活。您也可以问中国人，你们为什么想移民？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的巨大进步，真正的、客观存在的、可观的进步。我说的不仅仅是革命的成就——土地、许多其他权利和可能性，我说的是年增长率达10%的中国。

存在着一种世界性的移民压力，如在你们所熟悉的欧洲，从阿尔及利亚、从摩洛哥、从整个非洲向欧洲移民。欧洲人认为摩洛哥了不起，是一个同盟国。然而，摩洛哥人在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同样有事故，尽管那个距离要短得多。

拉：发生很多事故。

卡：您是指那儿？

拉：是的。海峡里每年都要死几十个人。

卡：啊！比这里还要多！

可能更多。^①

尽管距离很近？

拉：尽管距离很近。

卡：而墨西哥人，尽管有自由贸易协定^②……在墨西哥边界每年死亡的人数约 500 人。不仅墨西哥人，还有企图前往美国的中美洲人，但多数是墨西哥人，还有人试图走海路。

最近 20 年里，从圣多明戈移民的多米尼加人超过了一百万。他们大多数穿越拉莫纳（La Mona）运河，那是很危险的，死了很多人。您感觉到了吗？他们进入波多黎各。这就有了一百多万多米尼加移民。今天，成批寄回来的汇款已经超过了那个国家自有的收入。

① 估计每年有 10 万多摩洛哥人和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人企图偷渡直布罗陀海峡，成功者极少。据马德里局的统计数字，2003 年的头 9 个月里，在西班牙海岸被捕的外国人达 15985 名，他们从摩洛哥坐在木盆里而来。据偷渡受难者的朋友和家人协会（AFVIC, Asociación de Amigos y Familiares de Víctimas de la Inmigración Clandestina）统计，在 1997—2001 年期间，约 10 万名来自摩洛哥的偷渡者在企图穿越海峡时丢了性命。

② 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199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拉：是移民寄回来的？

卡：是的。超过了任何其他收入，高于圣多明戈许多客户企业工人的工资。

拉：你们呼吁废除那个非人道的“修正案”吗？

卡：“修正案”造成了不知多少人死亡，几千人。从来不公布谁到了哪里，是否有人死亡。从来没有。古巴是世界上唯一受到这个野蛮法律伤害的国家。

如果他们这样对待墨西哥，将会怎样呢？我不是要求对其他国家也实施“修正案”，因为那是一项杀人的法律。但是我主张，如果按照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实行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通，那就应该像欧洲人那样在申根协定国家内实现人员的自由流动。这是我维护的东西，而不是将人们引向非法途径，造成很多人死亡的“修正案”。

有多少人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边境“墙”死去？过去人们谈论“柏林墙”。如果愿意，大家都可以研究其中的原因，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战争的危險、面对面相持的坦克、共产主义与欧洲工业最落后国家之间可怕的意识形态和宣传战。好吧，我不讨论在1961年修建柏林墙的原因，也不讨论是不是有避免人员外流的其他方式。但是我可以问，是什么原因促使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修建了这座长达3千公里的墙？为了进入过去也是墨西哥领土的区域，在墨西哥和美国的边界每年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名，此外还有几百万非法入境者，几百万！许多人过着骨肉分离的生活。

但是另一方面，今天墨西哥的最大收入，超过了石油的收入，是来自移民的汇款，每年达220亿美元。边境越危險，探望家人的非法入境者越少，不可能探望，因为有几百万人呢。

由于失业和工资差别等原因，希望去美国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在本国客户企业工作和一个在美国工作的人之间的工资差别至少有15倍。一个非客户企业与一个美国企业之间的工资差别达到20倍，因为客户企业的

工资要稍高一些。我不知道，一个墨西哥南方的企业与美国企业之间的工资差别是否达到 30 倍。

拉：您说的是，从经济方面的原因看，离开古巴的人和离开自己国家的墨西哥人、多米尼加人或阿根廷人是一样的？

卡：是的。您提了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移居？我对您说，古巴人移居国外与多米尼加人、墨西哥人、中美洲人、南美洲人，那些未被封锁国家、非社会主义国家、有汽车和大量其他奢侈品国家的人移居国外的原因是一样的。对于梦想过资产阶级生活的人来说，他们有许多消费社会里的东西，不享受“修正案”给予的无证件就能非法进入美国的权利。对于企图非法离开古巴的人来说，“修正案”成为了一种基本的鼓励。

墨西哥并没有修正案。如果有，墨西哥就会像其他中美洲国家一样，30%甚至 40%的人口将移居美国。有几百、几千座为美国装配产品的工厂，那里的工人工资略高于这些国家的国内工资，如果再有一个修正案，尽管有那座可恶的死亡之墙，四五千万墨西哥人将前往边境的另一边去。我不能提供一个确切的数据，但我知道，在阿根廷，在危机之前……

拉：您指的是 2001 年 12 月的危机？

卡：是的。但因为经济问题、经济困难、就业问题，以前就已经是了。根据调查，阿根廷有 30%的人希望移居欧洲或美国。30%！而阿根廷没有被禁运，是世界最大的食品生产国之一。

许多从业人员，科学家、知识分子、优秀的教员也移居国外，因为美国要的是最好的人才，虽然具有大学学历的从业人员经常是以合法手段移居国外的。人才的窃取不是用劫持船只、冒险或以生命为赌资穿越国境的方式进行的。

我想，阿根廷的经济状况始终比墨西哥好，生活水准比墨西哥高，只是无论对墨西哥人还是对阿根廷人，都把他们叫作移民。

拉：而不是像古巴人那样称为政治难民。

卡：从四十多年前起，所有离开古巴的人都是“流亡者”，是“社会主义政权的敌人”。在移民美国的拉丁美洲人中，古巴人的受教育水平最高，因此，在那个国家里得到的收入最高，而许多来自本半球其他国家的人，由于缺少教育和培养而被迫从事更艰苦的工作。不少人是半文盲或缺乏职业教育，最终只能做采摘西红柿或其他植物等精英人士不愿做的工作。实际上，假使有一项面向拉丁美洲的修正案，我想，半数美国居民将是拉丁美洲人。

您设想一下，如果有一项面向中国，面向亚洲国家，甚至面向欧洲的修正案，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况。不知道会有多少富裕的欧洲国家的人、半失业者会移民美国。每有一个当地出生的美国人，至少会有2个或3个刚刚来自国外的人。两句话：如果有一项如同“古巴修正案”那样的世界修正案，他们就会入侵美国，就会占领美国。那个“修正案”已经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它给予那些劫持一艘船或一架飞机的人一切权利。那是鼓励犯罪。

拉：您认为那些用这种办法移居国外的人是一些绝望者？

卡：这些冒险行动的组织者是流氓。他们把那些在美国有亲人、热切希望与自己亲人团聚的人拉下水。他们由于不具有能得到签证的大学毕业，不是熟练技术人员，在无数情况下，必须无限期地等待。在多数情况下，那些有机会去中转国家，像西班牙、墨西哥、加拿大或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是不会劫持船只、不会采取这类不负责任的行动的，不会坐上木筏去的，不会让孩子去冒生命危险的。

拉：那些为移民而犯罪的人，有没有被美国当局拘捕并遣返回来？

卡：那些非法前往的人是世界上唯一享有特权的人。不管他们是否触犯美国法律，不管他们经由哪种途径，甚至，当他们拿着假证件、假护照下飞机时说“我是某某某，我求助于‘古巴修正案’”，他就有权在那里

居留，第二天就能得到工作^①。以前要等一年。现在，所有这些规定都取消了。目的？捣乱啊。多少人因此丢了性命啊！

所有有前科的人，或者犯了某种罪行的人，都可以求助这项法律，而他们则宣布他为“流亡者”“社会主义的敌人”……“特殊时期”开始的时候，正像我对您说的那样，有一项移民协议，但他们不履行。这一切鼓励了非法行为，因为家人可以向那些没有得到签证的人——我重申——派出一条船，打电话通知他们什么时候来接他们。他们使用快艇。

拉：他们商量好到一个隐蔽的地方接他们吗？

卡：他们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间都可以用电话联络。协商好在海岸的一个地方，确定一个确切的时间是不难的。但是，在那种气氛下，关于那些秘密，在那些不能合法旅行的人中，总是有人会获悉这些计划的。于是，他们讹诈，也去了那里，坐上了船。这样，一条能坐6到8人的船，往往载运了20、25，甚至30个人。

拉：冒着沉没的风险。

卡：因此，谁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人们说“很多人”，但是没有人知道数字，因为人们永远收不到谁到了哪里、有没有意外、落水者的姓名等方面的信息。美国当局连死者的名字都不公布。从这里您就可以想象，他们是以什么精神来执行那个“修正案”的了。

迈阿密的人维护那个法律。他们为地方当局组织节目和公众演出，带电视台记者去海岸警卫队，以阻止他们拦截船只。您设想一下，当他们与阻止他们的海岸警卫人员较量，千方百计想上岸的时候，海岸可能已经近

^① 2003年9月，在四十年间发生第一次例外。当年4月，一个劫持一架客机到达迈阿密的古巴人被佛罗里达的一家法院判处20年徒刑。与此同时，也是四十年间第一次，2003年7月，美国当局遣返了12个古巴人。这些古巴人在卡马圭劫持一艘船后非法进入佛罗里达（参见第22章注2）。

在眼前了，他们的脚也可以在干一湿之间了^①。他们善于赢得支持，犯罪团伙为腐蚀海岸警卫队员制造了许多丑闻。有时候，就在岸边为他们表演节目。

拉：给那些海岸警卫队员摄像吗？

卡：是的。在那里的人都上了电视。于是，他们企图以这种压力恐吓海岸警卫队员。甚至，在一个不那么敌视的当局执政的时候，如克林顿政府时期，就发生了我正在讲述的那些事情。因为，大选的时候，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利用的话题，都可以用来争取佛罗里达的选票。克林顿甚至在佛罗里达获得了胜利。他什么都没有说，但是，在这些人拥有的权力中，有一种是丑闻权力，是反古巴的院外活动集团的权力。克林顿在议会是少数，而他们——佛罗里达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那里有权力，因为美国古美基金会为竞选给了他们许多钱。有数十名议员，如新泽西州得到古巴人支持、属于民主党的鲍勃·梅嫩德斯^②，收受竞选资金。这样，在很有钱的反古巴院外活动集团中，既有民主党人，也有共和党人。这一切都过去了。

拉：你们认为克林顿更有建设性吗？

卡：是的。他并不特别咄咄逼人。但是，克林顿来自那个社会，继承了反古巴运动的所作所为。为表现得体面一些而能够做的事情很少。这些事情都发生在现总统布什上任之前。好了，之后是里根。但是，1989年以后，在“特殊时期”，老布什正忙于其他事务：海湾战争、裁军、通过签署战略武器协议从苏联领导的新政策中获得最大好处。大家都了

^① 踏上美国领土的古巴非法移民（“干脚”）将自动享受“修正案”赋予的权利，可以进入美国并在那里居留。在海上被拦截的人（“湿脚”）则要被遣返古巴，尽管美国当局常常漠视他们自己的法律，允许那些“湿脚”者在那里居留。

^② 罗伯特（鲍勃）·梅嫩德斯，生于古巴，新泽西州13区众议员，2002年11月14日在华盛顿当选为美国众议院民主党团主席。

解戈尔巴乔夫，特别是谢瓦尔德纳泽^①做出的让步。他们既没有多少有关武器的知识，也不懂战略，什么也不懂，就去谈判，他们所要的就是谈判，美国政府却从中得到了好处。

拉：尽管有1962年起就生效的禁运，你们现在还是能从美国买到食品，是吗？

卡：是的。从2001年11月起，在毁灭性飓风“米奇”过境本岛以后，美国众议院在做了许多修补和修正以后获得多数票，通过了不得禁运食品的法律^②。

拉：是共和党人？

卡：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一起以多数票通过了授权向古巴出售食品的法律。

在另一些问题上，比如去古巴旅行，则封杀了有关倡议，连讨论一下都不让。黑手党和极右派用了什么程序？有关基本法律的建议措施，他们称为修正案。但讨论一项非常重要的法律时，比如国防预算，或者农业补贴预算、州预算时，有关法律就十分重要，只要有一个委员会提出要加以修正，任何反对修正的努力就在实际上不可能取得成效，因为他们已经把它列入任何人都反对不了的法律范围里了。于是，他们在实际上修改了一项已经通过的法律，限制了它的一切可能性，使它几乎失去可行性。

①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928—），苏联外交部长（1985—1990）。苏联解体后，任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格鲁吉亚共和国总统数年。

2014年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逝世。（中文编者注）

② 虽然有1962年起就生效的禁运，美国在2003年成为古巴食品的最大供应者。在头9个月里，向古巴企业“食品进口公司（Alimport）”出售了价值2.38亿美元的食品和农产品。2003年9月，以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斯·包科斯（Max Baucus）和共和党众议员丹尼斯·雷伯格（Dennis Rehberg）为首的、由包括美国旅游经纪人协会（Asociación de Turoperadoras de Estados Unidos）主席罗伯特·惠特利（Robert Whitley）等企业家组成的蒙大拿州代表团访问了古巴。在这次访问中签订了出售价值1000万美元食品的协议。尽管美国当局对交易做出种种严格限制，美国向古巴出售食品和农产品的活动还是取得了进展。

好了，正如您不可能赞成一样，我们不赞成单一方向的销售活动。此外，那个法律还做了这样的修改：向古巴的每一次销售，都要征得美国财政部的批准，就像您在一家成衣铺购买一件衣服时要得到市长的批准一样。

拉：或者得到我的银行的批准。

卡：不，不，不是银行，是美国财政部，是一个需要它授权的政府部门。于是，在发生“米奇”飓风几天以后，他们需要做出一个姿态，如同我们在2001年9月11日事件以后向受害者所做的那样。他们提出一项人道主义援助，派出了技术人员来估算受到的损失。我们回答说，我们已经做了估算，我们正在用我们的粮食储备帮助受害者。我们感谢他们的姿态，并补充说，最好是根据通过的法律，由古巴向美国购买数量相当于“米奇”飓风受害者所需的食品。他们接受了，并根据那个打满补丁的法律向我们出售了一定数量的食品。从那以后，每向我们提供一次，都要得到美国财政部的批准。

我们公开表示，他们每做一次友好姿态，就会有我方的一个友好表示。他们批准的有效期甚至长达一年——在我们看来，这是具有建设性的，于是我们增加了食品的购买量，而不仅仅是最初的数量，以恢复我们的储备。所有按照那项法律所做的销售都要我们付现款，我们付了。^①

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内，大多数是反对禁运的^②。他们主张尊重美国人履行的宪法权利，主张通过一项法律，允许获得古巴的产品。

公众舆论也有很强的呼声，70%以上的人反对禁运，主张允许美国公

① 2003年9月14日，古巴食品进口公司主席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宣布，古巴在8个月内向美国企业购买了价值2亿多美元的粮食。

② 尽管布什政府的好战态度，美国国内主张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的支持者（企业家、学者、旅游经纪人、民主党或共和党的议员）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其表现之一是，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西半球外交小组委员会主席、主张灵活经济封锁措施的共和党政治家之一的诺曼·科尔曼于2003年9月访问古巴，并于2003年9月21日会见了菲德尔·卡斯特罗。

民访问古巴^①。实际上，它是被禁止的，仅仅批准原籍古巴的人每三年访问一次^②。

拉：美国公民不能访问这里？

卡：那是被禁止的。但有些人还是来了。结果是，如果惩罚这些人，就需要大大增加监狱的容量。他们可能被判处 10 年的监禁。

拉：因为来了古巴？

卡：因为来了古巴，或者任何其他违背禁运法律的行为，一个美国公民可能被关进监狱。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未经允许而访问古巴的人必须缴付高达 25 万美元的罚款。如果是一家公司，罚款额可以高达 100 万美元。此外，还实行一种行政罚款，每次违法要支付 5.5 万美元的罚款。


① 在这方面，华盛顿的众议院于 2003 年 9 月以 227 票赞成、188 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允许美国人访问古巴岛的动议。由于乔治·W. 布什当局此后做出的决定，该项决议实际上无效。

② 2004 年 5 月，布什当局对古巴采取了旨在强化经济侵略的一整套措施，其中包括：把允许旅居美国的古巴人访问古巴一次的期限延长到三年，把这种旅行的访问对象限制为直系亲属，并严格限制汇款的数量。



我
的
一
生

第十七章 苏联的崩溃



生态灾难—基础设施状况—平庸的信息业—犯罪集团的王
国—没有了苏联的生活

新观察 2005 年 10 月

拉：1991年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崩溃以后，暴露了许多可怕的事情。表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生态灾难，基础设施的状况十分糟糕。您自己曾对我说，医疗卫生事业已经停止运转……

卡：有缺陷地运转，但比现在还要好十倍。

拉：日常生活可怕的困难，还出现了类似黑手党的犯罪集团，惊人的腐败。党的干部占有了国家财产的一大部分。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存在的70年中，没有造就一种“新人”。暴露出来的这一切，第一，您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吗？第二，它们影响了您的信念吗？

卡：我来回答您。您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有一些是我早就知道的，但有许多是后来才知道的。应当好好地加以分析。

我早有不同看法。例如，在我去莫斯科的时候，我就抱怨，因为有一个党的小干部始终、到处跟着我，实际上把我变成了他的财产。看到了小小的贫困现象、嫉妒和自私自利，这是一种到处可见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更为严重。我承认那些问题是有的，但比其他地方要轻得多。

我们来一个一个地分析。谈第一个吧。

拉：生态灾难。

卡：确实是。以前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生态灾难，可以说是西方首先发现了它。马克思认为财富发展的极限在于社会制度，而不是今天大家知道的，在于自然资源。

苏联人不了解生态灾难。在苏联这样地域广阔的国家里也许是难以察

觉到它的。但是，那里发现的生态灾难与发生在欧洲和美国的生态灾难是一样的。

拉：那么，切尔诺贝利……？^①

卡：切尔诺贝利事件，那是核反应堆造成的唯一一次悲剧，它确实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在这之前已经有过其他生态灾难：在墨西哥、中美洲、南美洲、亚马逊雨林都有。人们争论如何挽救、是不是可以挽救。生态破坏是全球性的。实际上不能归罪于苏联。

拉：但是，比如咸海。苏联人为了争当生产大国，决定把河流改道，咸海正在消失。

卡：但它并不是一个特殊问题。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等人执政，争论很多。他们想发展生产。例如，他们想在哈萨克斯坦发展小麦生产，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增加产量。也试图在乌兹别克斯坦——我到过那里——开垦人们称作饥饿大草原的地方。于是，引来了来自山区河流里的水，生产了几百万吨棉花。我现在认为，那不是正确的技术利用。那时，人们不了解，以为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想都没有想到会造成巨大的生态灾难。我记得，赫鲁晓夫当时和我谈到这类计划、开垦新的土地、超高的产量。他们极力仿效美国。好了，农业发展了，作物有了灌溉等等，但是盐碱问题却日益严重。

我们也有所发现。我们使用了除草剂。当蔗糖的产量提高到 800 万吨时，如果不在一定时间内使用这些化工品，就不会有农产品加工业。化肥，好吧，化肥在一定时间内挽救了人类。一般来说，人类无法想象能够养活 50 多亿人口，而他们大部分分布在第三世界国家里，过着营养不良、忍饥

^① 1986年4月26日，位于乌克兰南部、离白俄罗斯边境仅12公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非战争性质的核灾难。初期，地方当局对居民和世界隐瞒了灾难的规模。灾难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人受到放射性物质的污染。

挨饿的生活。然而，我记得瓦赞（Voisin）^①有一本题为《草、土地和癌症》的书。他在书中分析了钾对某些癌症蔓延的影响——我读过许多这类书籍，对农业方面的书特别感兴趣——和钾过量造成的危险。块茎植物一般需要它。对橡胶和甘蔗要施氮肥、磷肥和钾肥。许多食品类农作物——其中包括粮食——需要这三种元素。

今天，人们了解到，过度使用化肥和除草剂会带来许多意料之外、惊人的后果。拉克尔·卡森（Raquel Carson）著有《静悄悄的春天》一书，它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今天，人们学习有关基因的知识，但二十年以前，人们的有关知识很少，尊崇的是孟德尔（Mendel）遗传学法则。从豌豆中发现基因，通过染色体和基因相结合，大大促进了传统遗传学的发展。过去，人们不知道遗传工程，不知道细胞的基因转移。我们在传统遗传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然后我们看到了遗传工程的可能性，并发展了它。今天，您可以使用用这些方法生产的，并非天然的疫苗、药品等医疗用品。天然产品可能受到其他成分的污染，因此，合成疫苗要比天然疫苗安全得多。

在一段时间内，人们认为科学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今天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挑战更加严峻。我们不能舍弃科学，科学必须解决它自身带来的问题。抢救物种是艰巨的任务，依靠由盈利和广告主宰一切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绝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

也就是说，它涉及的是非常复杂和深刻的、人类未曾解决的问题，对此丝毫不能责怪昔日的苏联。

拉：基础设施、通信线路、铁路、公路、电话、电力等状况都十分糟糕。

卡：注意，我一点都没有为苏联人所干的坏事辩护的意思，这是我应该向您申明的。我开始思考，今天还在思考，如果没有那个国家被迫进行的加速工业化——这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过错，他们对它实

^① 安德烈·瓦赞（1903—1964），法国农业工程师，《草、土地和癌症》（特柯诺出版社，马德里，1961年）一书的作者。

行了封锁、侵略和发动了战争，如果没有工业化，苏联不可能在纳粹的打击下生还，而是被打败。他们在战争的高峰期搬迁了工厂，把它们转移到冰天雪地的地区，在工厂连屋顶都没有的情况下开工生产。他们是一个伟大英雄业绩创造者，是那场战争中最应该受到赞扬的人。而在那场战争之前，人们犯了多少政治错误啊。那些才是最应当受到批评的错误。

回忆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到它衰败时，这种关系持续了三十多年。我想，苏联人的汽油太多了。汽油是他们在生产了工业、运输业、农业所需的燃料油和柴油后的剩余产品。他们没有发展一种消费社会，不像美国和西欧那样充斥着私人汽车，生产大量消费汽油的产品。我认为他们做得很好。我的想法是，苏联的汽油有富余，而在20世纪60年代没有找到市场。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苏联的货车、小货车、吉普车和汽车大量使用汽油发动机的原因了。谁能比我们了解得更清楚呢？我们购买了几万辆汽车，在三十年内总是有苏联船队给我们运来汽油。还应该说，也有运来原油、燃料油或柴油的船只。装有柴油的机器设备更为有效。

但是，实际上苏联在产业经济许多领域技术落后，这就使它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及其同盟者的斗争中付出了代价。奇怪的是，苏联是一个研究机构最多、开展的研究项目也最多的国家。除了军事领域，苏联却是创造发明在经济领域付诸实施最少的国家。

公路很窄。也许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很少修建高速公路。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的铁路宽度与欧洲国家不同。在这样的交通条件下他们取得了很大进步。他们的汽车也许并不很豪华，但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的列车可以到达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铁路系统，它无疑比公路长途运输要便宜得多，深入到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今天，私人汽车消费了炼油厂生产的大部分汽油。在美国，每天消费量超过850万桶，它确实是难以承受的，它将迅速耗尽世界上已经探明和将要探明的石油储藏。

拉：他们也没有发展信息技术，而他们有几千名工程人员，有很高的能力，您怎样解释这一点？

卡：这没有道理可讲，是缺乏远见，很让人吃惊。相反，美国人全速发展了它。在某些事情上，苏联人很平庸，但不是在科研领域。问题在于应用。他们做了更多的研究，更早地进入太空，而没有信息技术是到不了太空的。

拉：古巴避免了这种错误吗？你们注意发展信息技术吗？

卡：在我们国家，有一段时间没有讲授计算机技术，甚至连大学里也没有。我们正是在大学里逐渐开展起来的。然后，我们开设了170家计算机青年俱乐部，不久前增加到了300家，每个俱乐部拥有的计算机也增加了一倍。根本的是，今天在我国，计算机教育是从学龄前儿童开始的。百分之百的儿童，从学龄前到大学都有他们的计算机室。我们发现了它提供的巨大可能性。我们还在儿童、成人、青年和整个人口的教育中竭尽全力地利用视听设备。我们以最低的耗费和成本，在所有缺电的地区利用太阳能使用这种技术。

我们已经进入了大规模利用信息技术的阶段，并在它的其他领域大力开展工作：培养成千上万名节目制作和设计人员。我们创设了一所信息科学大学——现已经到五年级，从全国挑选最优秀的学生，每年入学人数达2000名。

拉：让我们继续讨论苏联。当苏联崩溃时，到处出现类似黑手党的王国；暴露了大量腐败现象。他们没有能够树立道德观念，而是恰恰相反，形成了一种普遍腐败的现象。

卡：我来给您分析。资本主义是一切病毒的制造者。黑手党是资本主义社会制造的。所有腐败的疫苗都在那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有，因为人们有需求，你需要创造价值，增加价值。我们奋斗——今天仍然努力奋斗，因为革命要推翻一切法则。我记得，我们发现存在着一种富人文化和一种

穷人文化。富人文化非常体面：我买东西，我付钱。而穷人文化呢，我怎样才能从这里得到这些东西呢？我怎样才能从富人那里偷到这个或那个东西呢？

许多穷困的、好的、爱国的家庭对他们有工作的，比如说在旅店工作的儿子说：“听着，拿一条床单来，拿一个枕头来，拿这个来，拿那个来。”这种态度来自贫困文化。当彻底改变这一切的社会变化发生以后，这类习惯还会延续很长时间。

如果社会主义制度有朝一日在古巴消亡，如果我们遵循费利佩·冈萨雷斯（Felipe González Márquez）^①那一类人的忠告去做，这里也会这样，黑手党和资本主义一切丑恶的东西都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复活，包括毒品和犯罪行为。在我们社会里，有些阶层还没有把他们整体改造过来。我们具有的激情是，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通过一场真正的教育革命，可以把他们逐步改造过来。

苏联应该也发生过这种情况。我不真切知道您所说的事情在苏联达到何种程度，因为苏联有足够的学校，大量的开展科学研究，大学的水平很高。

无论如何，人总归是人，我们不能把他理想化。幸而，出于一种巨大的信念，我认为，人类尽管有其缺点和局限性，是有足够能力维护自己，有足够的智慧完善自己的。如果不相信这一点，我就没有理由为此而奋斗终生。我会说：“您瞧，他已经无可救药了，希望肯定会落空。”也就是说，您可以做各种可能的比较，而我相信，总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似乎无法理解的事情。有些现象是属于另一种类型的。

拉：在古巴，你们没有进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称作“改革”（“perestroika”）的事情，对体制的运行进行总体修正。您认为这里不需要这种“改革”，从而保存了革命吗？

卡：您瞧，我能对您说的是，苏联有的历史现象在古巴并不存在。这

^① 费利佩·冈萨雷斯·马克斯（1942—），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领导人，1982—1996年任西班牙政府首相（参见第二十三章）。

里没有斯大林主义，在古巴从来没有发生过滥用权力、个人迷信、到处竖立塑像等类现象。这里从革命的最初时刻起就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以活着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一项工程，或为他立一尊塑像。这里，在面向公众的办公室里没有官方的肖像。我们始终反对个人崇拜。那种崇拜在我们这里是有的。

我们没有必要去改正其他地方的错误。我们也没有强制性的土地集体化，那是在我们国家从未发生的事情。我们始终遵循一条原则：社会主义建设是所有希望建设一个新社会的自由人的任务。我们没有必要去改正从来没有犯过的错误。

假如我们做这种“改革”，美国人就会很高兴，因为苏联人实际上是自己毁了自己。如果我们这里分成10个派别，在这里发生可怕的权力之争，美国人就会成为地球上最幸福的人。他们就会说：“我们终于摆脱了古巴革命。”如果我们做那种类型的、同古巴的现实毫无关系的改革，我们就自己毁了自己。但是，我们不会自毁的。这一点应当十分明确。

拉：您对戈尔巴乔夫为改革苏联所做的努力感兴趣吗？

卡：您瞧，我对戈尔巴乔夫从他上台时所做的一切有极坏的看法。最初，当他说要把科学引入生产领域，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沿着集约生产的道路前进，而不是用增加工厂的数量来扩大生产时，我很高兴。外延生产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应该采取集约生产的道路前进。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采用集约技术，没有人会不同意这一点。他还谈到反对获得非劳动收入。这些都是一个真正社会主义者的言论。

这些是戈尔巴乔夫最初的言论，最初我们很看好它们。他甚至反对酗酒。我认为这很正确。当然，我认为在那里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需要做长期的说服工作，因为很久以前俄罗斯人就知道如何在一个随便什么样的蒸馏器里生产烈性酒伏特加了。我甚至和他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喜欢讨论这些事情。

我也对您解释了苏联用别的方法处理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必要性，这

种关系更加广泛，不仅仅是同共产党的关系，也是同左派力量、同所有进步势力的关系问题。

拉：他们在处理与其他亲苏共产党的关系时，采取一种很霸道的态度。是吗？

卡：您瞧，有人为了取悦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站出来批评被世界反动派丑化了的历史人物。我不是那种人。但是我也不会愚蠢到不敢说出有义务说的话。在苏联，专制政府的传统、等级思维、封建文化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造成了滥用权力的倾向，特别是造成了一个霸权国家和政党对其他国家和政党发号施令的习惯。

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和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保持着关系，并且是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对哪一个说你应该做什么。并且，我们发现，每一个革命运动都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各自的特色。我记得一些转折关头：当苏联崩溃时，许多人陷于孤立，其中包括我们，古巴的革命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当时，有许多地方的其他革命运动展开了争斗。我不想说它们是哪些运动，是哪些人，它们都是一些严肃的运动。面对那个令人绝望的、苏联崩溃的形势，他们问我们是否继续斗争，还是和反对势力谈判，寻求和平，即使知道这种和平会引向何方。

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能征求我们的意见，你们是要去斗争的人，你们是要在斗争中战死的人，不是我们。我们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事情。但是，那种事情只能由你们自己决定。我们会支持你们做出的决定。”那是我们尊重其他运动的最高表现。不是企图把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这么做，是出于我们的认识和经验，以及他们对我们的革命的高度尊重。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能考虑他们的决定会给古巴带来什么好处或坏处。“你们决定吧！”就这样，在这种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他们做出自己的决定。

拉：您认识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吗？

卡：是的。认识他时，他是莫斯科市杰出的市委书记，有一系列好的

想法：满足首都需求的意图，那个城市的发展。我对他强调说，要保存历史遗迹，不要破坏它们。为了供应莫斯科市场，叶利钦想修建温室。他对所有的干部都严格要求。正因为他批评缺点和错误时的严厉态度，我们印发了叶利钦的演说。我曾经对他说：“保护好那些祖传的建筑，因为你们几乎已经使古老的莫斯科消失，而建造了另一个莫斯科。”在出访尼加拉瓜时，他在这里做了停留，和我们谈了很多。

在我访问莫斯科时，有一天，叶利钦是我特邀的客人。我甚至对他说了下面一些话：我搞不懂为什么有些产品四十多年来保持着同一价格，从而成为了稀缺产品，造成了一些问题。鱼子酱的价格和斯大林时期一样。我对他说：“此外，你们把某些产品的价格定得这样低，从而造成浪费。面包太便宜了——我对他说，许多人买了面包去喂养小鸡，然后在‘农村自由市场’出售。”我看到了许多浪费。当国内那么多事情已经变化了，世界的货币量已经成倍翻番时，这些东西极端便宜是违反经济规律的。有时候，它们并不是生活必需品。这就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浪费和对资源的漠视。

那里有一种矛盾：一方面是那个可以任意决定销售价格的自由市场，还有那个理论——美国人用这个理论作为维护私有财产的理由。根据这种理论，集体农庄庄员在一小块土地上生产占总量极高比重的土豆，我不知道还生产了有多高比重的鸡蛋或其他东西。但是，人们没有说出来的是，集体农庄庄员能够生产便宜的鸡蛋和牛肉，是因为他们使用了国营农场生产的非常便宜的谷物。您可以在 15 米乘 15 米的一块地方饲养 2000 只、3000 只、甚至 5000 只母鸡，还可以养几头高产母牛。

拉：你们做过那种试验吗？

卡：是的，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房间里做了一项试验，使用电灯照明，来试验一平方米的面积内可以生产多少牛奶，试验用这种办法，用水灌溉，在一平方米的面积上可以生产多少公斤绿色植物。我们试验在面积一公顷的土地上需要耗费多少能源。理论上，人们可以在城市里修建一栋 20 层

的大楼。这样，一公顷就变成了20公顷。如果有电、水、化肥、一头或几头高产奶牛，就可以生产出50公顷土地上才能产出的东西。还不知道一头奶牛能生产出多少牛奶呢！奶牛吃植物饲料，吃几乎没有谷粒的、富含蛋白质、施了肥的绿色嫩芽。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我们必须努力研究这些问题。就是说，叶利钦——当时他还不是俄罗斯总统——和我就这些题目谈了许多。我们什么都谈。

拉：谈苏联的事情是怎样运转的？

卡：您瞧，坐无轨电车是4个戈比，我记得，地铁是5个戈比，这就使莫斯科人频繁地乘车，从一头到另一头穿梭。我向叶利钦解释我们与此有关的经历，因为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想，交通应当是免费的。”我用交通不应该免费的忠告回答他。我的理由是，应当有一个合理的价格，即使仅仅是为了让人们减少在享受免费乘车待遇时所做的、非必需的外出次数。因为，有一次在这里，在古巴，我们交给我们的一个同志，一个地区的党委书记——那时还有地区，那是比省小，比市大的地方——一批客车。他事前没有和我们商量，就实行了免费的城际交通——用人们常有的自由主义行动，自作主张搞了免费交通。这引起了一场可怕的争论，我严厉批评了他。

这里的交通几乎是免费的。人们不是步行十个或七个街区，而是乘坐公共汽车来走这段路。也许并不付钱，因为没有时间付，或者只付七八百米路段的钱，从而成倍增加了不必要的消费。所以，您注意叶利钦对我说的话。我劝告他，不应该把教育和医疗以外的事情，如交通和其他服务搞成免费的。我分析说，因为物价是不浮动的——对此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很多东西实际上已经是免费的了。在那次访问中，我见过叶利钦许多次。实际上，那时我对他的激进思想是很欣赏的。这是在发生苏联解体灾难以前很久的事情。

拉：你们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怎样？

卡：一样的。和戈尔巴乔夫有过很好的关系。多年以前，劳尔·卡斯特罗在一次访问苏联时认识了他，同他有着友好关系。我认识了他，和他谈过许多话，我们经常交谈。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这是他的特点之一。他对我们确实很友好，表现得像一个朋友那样，可以看出他对古巴革命的尊重。当他在苏联执政时，他尽一切可能不做伤害古巴利益、影响同我国的良好关系的事情。他是一个有着良好愿望的人，因为我毫不怀疑，戈尔巴乔夫具有为完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意图。我不怀疑这一点。

但是，他没有找到解决他的国家遇到的巨大问题的办法。毫无疑问，他对在苏联出现的现象以及后来的灾难起了重大作用。他没有能够避免苏联的解体，不懂得如何维护它的大国地位。相反，他的错误、随后表现出来的软弱，促成了解体。正如我对您说过的，我们向他建议，不仅仅邀请各国共产党，还要邀请其他左派力量和进步力量来参加代表大会，共同商讨重大问题。发生飓风以后，他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送来了援助，一切都很好。他们制定了一个初步计划，我对您说，那是一个好的计划，是建立在与集约生产有关的思想上的，而集约生产是应该发展的。

以后，开始了国际政策方面的让步、战略武器方面的让步，在所有领域都做出了让步。某一天，戈尔巴乔夫甚至征求费利佩·冈萨雷斯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意见。他是自己告诉我的，我想是在一封信的一个段落里写的。他的处境已经很复杂。我读到这封信时尽管并不觉得意外，但还是很吃惊。我不肯承认社会主义在苏联倒退了一百年的现实。

拉：在某个时刻，你们认为自己的安全得到了苏联军事力量的保护吗？

卡：从来没有。在某个特定时刻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受到美国的直接进攻，苏联人决不会为我们而战的。我们也不能要求他这么做。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设想、要求或期望哪个强国——当美国入侵离它 90 海里的小岛时——同美国作战是很天真的。

我们得出结论，那种支持永远不会得到。还有，在苏联消亡前几年的

时候，有一天我就此直接询问苏联人：“请坦率地告诉我们。”“不”他们回答。我们知道他们会这样答复的。于是，我们前所未有地加强我们的观念，完善我们的战术和战略思想。依靠这些，我们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甚至在军事领域打败了人员比我们多一百倍、武器比我们不知强多少倍的军队。在得到这个答复以后，我们前所未有地深深相信自己的观念，加以深化。我们自强不息，使自己达到了这样的水平：今天我们可以说，不依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这个国家在军事上也是不可战胜的。

拉：苏联崩溃的时候，许多人预言古巴革命也要崩溃，你们是怎样抵制的？

卡：当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消失的时候，没有人为古巴革命的生存哪怕赌一分钱。

当那个大国在一天之内崩溃时，我们国家遭受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我们陷于孤立、无援。我们的糖失去了所有市场，我们得不到粮食、燃料，乃至为死者举行宗教葬礼所需的木材。转眼之间我们就会没有燃料，没有原料，没有食品，没有卫生用品，什么也没有。所有人都认为：“要垮台了。”一些愚蠢的家伙到今天还认为古巴会垮台，认为即使今天不垮台，以后也会垮台。只要他们还心存幻想，还希冀我们垮台，我们就应该多想想，我们就应该得出自己的结论，使我们英雄的人民永远不会遭遇失败的命运。

美国加强了禁运。出现了“托里切利法”^①和“赫尔姆斯—伯顿法”^②，两者都有治外法权的性质。我们的市场和基本供应的来源都遽然消失了。

① 于1992年获得通过。“托里切利法”确定两项基本惩罚：1. 禁止美国公司在第三国的子公司与古巴进行贸易活动；2. 禁止曾经进入古巴港口的船只以贸易为目的，或离开古巴港口180天内在美国港口靠岸。

② 杰西·赫尔姆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丹·伯顿，印第安纳州众议员。两人提出一项法案——1996年3月12日由威廉·克林顿总统签署，内容主要是“关于由于古巴革命而受到利益损害人士的权利”和“对与古巴进行贸易活动者采取的措施”。

卡路里和蛋白质的消费减少了几乎一半。国家经受了考验，并在社会领域大大前进了。今天，大部分营养需求已经恢复，其他领域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即使在这种条件下，几年里完成的事业和人们的觉悟都创造了奇迹。为什么我们经受了考验？因为革命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越来越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是一个智慧的人民，越来越团结的人民，更有知识和更具战斗精神的人民。



我
的
一
生

第十八章 奥乔亚事件和死刑



纳瓦罗·沃尔夫 (Navarro Wolf) 的揭发—MC 公司的生意—
美元与毒品—哥伦比亚连接—枪毙奥乔亚 (Ochoa)—革命与死
刑—事实上的延期

第八十章

拉：1989年的奥乔亚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无数的评论。^①

卡：是的，当我们发现这些严重的背叛行为时，根据著名的1号判决书，我们必须枪毙他们。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国家陷于极大的风险之中。我们不得不强硬。对我们自己队伍中的人、对向国家和革命做出过承诺的人应该更加强硬。至于内政部，证明他是同谋比证明它是无辜的更为容易。问题在于，我非常了解他的情况，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表现。

拉：您说的是阿布兰特斯（Abrantes）吗？

卡：是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在我的警卫队里。啊！然而，权力就是权力。也许，对于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同自己做斗争，为能够自律而斗争。也许这是最难做到的事情之一。

拉：同权力助长下的腐败做斗争？

卡：同腐败做斗争，甚至同滥用特权做斗争，需要一种成熟的、很高

^① 1989年6月，古巴共和国的英雄、与卡米洛·西恩富戈斯（Camilo Cienfuegos）并肩战斗的马埃斯特腊山老战士、57岁的阿纳尔多·奥乔亚（Arnaldo Ochoa）中将被捕。奥乔亚在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游击战中，以及在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的战争中表现突出。被捕的还有内政部的一些高级官员。他们都被指控腐败和贩运毒品。被一个军事法庭宣布——1989年1号判决书——为有罪，以“极端背叛祖国罪”判处其中4人死刑，执行枪决，判处其他人监禁。7月19日，国务委员会批准了这一判决。4天后，1989年7月13日，奥乔亚将军、卫队的安东尼奥（托尼）上校、蒙尔赫·马丁内斯上尉和阿马多·帕德龙少校被枪决。内政部长何塞·阿布兰特斯和他的几名助手被指控为同谋，被判——1989年2号判决书——监禁。何塞·阿布兰特斯被判监禁20年，于1991年1月21日在狱中死亡。

的觉悟。因为我见到过那些虚荣心膨胀、不能正确使用权力的人。您能够看到许多不能正确使用权力的现象。我说过，我很了解这个同志。深入研究他的情况可以发现，他是头脑出了问题。

拉：您指的是谁？

卡：就这一点来说，我指的是那个部长。

拉：阿布兰特斯？

卡：是的。我下令做了一个调查。因为，我反复读到某些消息和一些令我怀疑的材料。我要求阿布兰特斯对关于飞机在巴拉德罗着陆的揭发做一个调查，尽管像其他许多揭发一样，我认为它是虚假的。我对他说：“详细调查一下这件人们反复提到的事情。”

我下令去找哥伦比亚一个名叫纳瓦罗·沃尔夫^①的人。他活着，是“四一九运动”的人，被炸弹炸伤后来这里接受治疗。他来了。我未能亲自见他，因为在许多情况下，由于需要处理重大事务，政府的工作不允许我亲自去过问也很重要的其他事情，虽然这好像令人不能相信。纳瓦罗·沃尔夫和一些同志谈了话，回到了哥伦比亚。阿布兰特斯没有告诉我纳瓦罗·沃尔夫即将回国。

阿布兰特斯几乎每天都来我的办公室，和我们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曾经是我的卫队长，此后在和反革命做斗争时的表现也是好的，富有成效，得到了提升。不幸的是，不知不觉中，就像后来发现的那样，他的野心逐渐膨胀。我不想说这些事情。事实上，他每天都来，等着见我。总有什么消息或事情要对我说，直至一些细节。他有事无巨细都来征求我的意见的习惯，经常占用我宝贵的时间。

但是，凑巧的是，当纳瓦罗·沃尔夫来的时候，我问阿布兰特斯：“你们见到他了吗？”“谈了什么重要的事吗？”他回答说：“不，没有什么

^① 安东尼奥·纳瓦罗·沃尔夫，“四一九游击运动”前领导人，现为哥伦比亚议会独立参议员。

大事。”以后我们会知道到底有没有大事的。那正是我们碰到奥乔亚问题的时候。他是一个有历史功绩的军官，古巴共和国的英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纵队的战士。啊，但是他有权，有一天他掌握了财权。我不能说奥乔亚盗窃了这些钱财。

拉：奥乔亚个人发了财吗？

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卷入这一事件的人的出发点都是想帮助共和国。因为我们是一个被禁运的国家，每当我们需要购买一个零配件或某个被禁运的东西时，总是由负责反禁运的内政部管理的一些小企业去购买对某项工业十分重要的零件。自然，这是不需要办海关手续的。是的，我们不接受禁运，那是非法的，种族灭绝式的。那些同志有时候卖一些雪茄或其他古巴产品。零件来的时候，他们当然要付款，然后转卖给某个企业。内政部把这些收入用于电信、交通运输。国家始终处于资金短缺的状态。但他们拥有这些小企业，可以办这类事情，尽管我们规定他们只能利用已有的企业，禁止他们创办新的。他们取得了某些经验。

拉：在巴拿马有这样的企业吗？

卡：可能有。我不了解细节。由于他们与边境警卫部队、海关和其他机关的关系，当然拥有某些便利条件。

有一天，他们突然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想和某些毒品走私集团建立联系。

拉：和毒品走私犯？

卡：我不知道是怎样开始的。那是人所共知的，那些走私集团的资料都在那里摆着。他们把钱交给部里，内政部管理这些钱，把它的大部分用于购买零配件之类的东西。但是，当以这种方式运转钱财时，弱点就出来了：给汽车配上一些特殊的暗色玻璃、光亮的轮毂、带录音功能的收音机，把拉达车打扮得漂亮一些，穿得好一些。他们不把钱存到银

行里去。

奥乔亚在国外开了一个账户，存着来自桑地诺分子的钱。他们把钱交给他，是想让他购买一些他们得不到的通信设备。他曾经在尼加拉瓜做顾问。

拉：他参加了桑地诺推翻索摩查的战争吗？

卡：桑地诺分子已经取得了胜利。他是在这之后去那里的，是为了在反“肮脏战争”的斗争中帮助桑地诺分子。但是，等一等，我先得对您说点事，我对您提到过纳瓦罗·沃尔夫。

拉：是的，纳瓦罗·沃尔夫，前“四一九运动”的游击队员。

卡：“四一九运动”的哥伦比亚人。但是，我并没有说他向我们报告了什么。当阿布兰特斯对我说“没什么大事”时，我们已经在调查奥乔亚所犯的错误：他在国外开了一个账户等等。我们力求让他坦白，以便在考虑到他的历史——他没有完全交代——的情况下，找到一种不是最严厉的解决办法。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处境：不可能瞒着他调查下去。我们必须同他的助手谈话等等，不可能完全隐秘地做这件事。但是我们一点也没有调查有关毒品的事情，只调查利用那个巴拿马账户从事的不正当活动，以及在帮助桑地诺军队取得某些供应的名义下进行的、非常奇怪的不正当行为。

拉：在安哥拉？

卡：在安哥拉，他是驻那里的军事使团的头头。他没有坦白。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和他谈了三四次。

拉：亲自谈的？

卡：是，当然，但说得非常谨慎，然而没能让他坦白。根据已有的审理手段，不对他采取最严厉的纪律措施，就不能对这样一个重要军事领导

人继续调查下去了，人们是想帮助他的。

拉：他有个人政治野心吗？人们谈论阴谋活动，说他可能成为您的对手。

卡：不，没有任何危险。没有任何政治风险。纪律、觉悟、革命武装力量的动员等所达到的高度，既不是建立在任何类型的专制制度之上，也不是建立在任何个人因素之上的，它是建立在一种牢固的政治教育的基础上的。

那是一种你不能把它定性为具有政治性质的犯罪，因为，奥乔亚从来没有过政治性的、反对革命的表现。我们拘捕他，是因为他没有交代清楚那些问题。在搜查他在尼加拉瓜时的助手豪尔赫·马丁内斯（Jorge Martínez）上尉时，发现了一张麦德林市一家旅馆的名片。

拉：麦德林，在哥伦比亚。

卡：在审问那个军官时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他接到奥乔亚让他去麦德林，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Pablo Escobar）接触的指示。

拉：是毒品卡特尔 [Cartel (法)] 的主要头目之一。

卡：他是世界上最出名的毒品走私犯。这已经是极其严重的事了。他把国家置于被指控为参与毒品走私的危险之中。一个古巴军官和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联系在一起的事实，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

为什么会发生这类事情？因为他在安哥拉时和内政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内政部派往那个国家的代表有很深的友谊。从他那里了解到那个官员的兄弟正在做的一些生意。那个兄弟是谁？是一对孪生兄弟。许多年里，他们在古巴和古巴以外完成过许多任务，肩负过许多革命使命。

拉：是卫队的帕特里西奥（Patricio）和托尼（Tony）兄弟俩吗？

卡：对。几年以后，两人成为奥乔亚的好朋友。其中一人是一个部门

的领导，这个部门负责管理我说的那个做这种交易、称作 MC 的公司。

拉：为了获得外汇？

卡：不是外汇，而是买一些零件，顺便卖一些遭到贸易禁运的商品。他们也是阿布兰特斯的好朋友。他有一种秉性，对待朋友就不仅仅是简单的保护，而是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也能够做出来的。

在下达指示，调查电信中说的通过巴拉德罗贩运毒品一事时，纳瓦罗·沃尔夫来了。我们要求他提供哥伦比亚对这件事的评论。阿布兰特斯告诉我，纳瓦罗·沃尔夫没有提供有重大意义的消息。奥乔亚是 7 月 12 日被拘捕的。他被捕以后，发现了通过马丁内斯上尉与毒品发生的关系。他解释了为什么会有那家麦德林旅馆的名片。

拉：你们对那个发现感到吃惊吗？

卡：发生类似的事情让我们吃惊。奥乔亚派他的助手犯了一个严重错误。经巴拉德罗走私的那家公司的头头是卫队的托尼。那个发现不能不成为一个令人气愤的意外。尽管如我所说的，没有证据表明在那些卷入的人中有哪一个占有了那些钱财，他们这么做还是出于获得零件以抵制禁运的愿望。已经有浪费的现象，甚至储藏了相当数量的金属制品。在一些交易中，外国方面拖延付款，在拘捕前几天才交了钱。

但是，关键在哪里？在于纳瓦罗·沃尔夫对和他谈话的同志说，有谣传说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同那家公司的头头、卫队的托尼有接触，原话就是这么说的。

拉：MC 公司。

卡：我对您说，很多年以前我就认识了卫队的这兄弟俩，他们有威望。这样，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就碰到了另一件严重得多的事情，必须立即拘捕一些重要领导人和其他一些人。

好了，除了刚刚收到的一定数量的钱以外，还有些钱藏在朋友家里，

也被收了回来。在诺韦尔托·富恩特斯（Norberto Fuentes）^①——一个写过海明威的作家，曾经在安哥拉待过——家里藏了约20万美元。正如我说的，在其他地方也藏了钱。是人家欠他们，不久之前才还的钱。每运送1公斤可卡因，毒品走私分子付给他们1千美元。当然，运送500公斤，就是50万美元。50万美元是很大的一笔钱了。

拉：他们是怎样操作，怎么做的？

卡：飞行员玩命。这些飞行员没有停止飞行。夜间，当他们被跟踪时，甚至做贴地飞行，不理睬跟踪他们的任何飞机。飞行员们“轰炸”，也就是说，把装有毒品的箱子扔在离海岸几英里的地方。怎么办？他们就从海岸派小艇去捞。还有另外的方法，连“轰炸”都不需要了。从哥伦比亚来一架小飞机，在巴拉德罗着陆。MC公司的人从那里把毒品交给一些伪装以货物换取雪茄的船只。MC公司的人进进出出，由于其担当的角色和在内政部承担的任务，他们的权力很大。

用飞机着陆的办法要方便得多，毒品在一个码头交给一些快艇。这就是1号判决书的由来。

但是，阿勃兰特斯没有说出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事。如果那个时候他说出实情，对奥乔亚的调查和毒品走私这两件事就不会联系起来。在我读了一些让我感到忧虑的电报以后，我下令进行调查。电报读多了就会成为专家，知道什么是实情，哪里是编造，哪里会有一点确实的东西。我下令调查。

我们发现了两个月以前的那些怪事，发现了有关那些飞行和在巴拉德罗着陆的消息。在审讯奥乔亚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马丁内斯上尉的麦德林之行。

^① 诺韦尔托·富恩特斯（1943—），古巴作家，《海明威在古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序，古巴出版社1985年于哈瓦那出版）一书的作者。流亡于迈阿密。在《甜蜜的古巴战士》（Seix Barral出版社，巴塞罗那，1999年）发表过关于奥乔亚事件的个人版本。2004年在西班牙出版了一本以《菲德尔·卡斯特罗自传》（德斯提诺出版社，巴塞罗那）为题的书。

一天下午，在武装力量部每天下午举行的例行会议上，我偶然见到了那个名叫亚历杭德罗·龙达·马雷罗（Alejandro Ronda Marrero）的小伙子，在特种部队担任重要任务的年轻军官，是他接待了纳瓦罗·沃尔夫。我很了解这个小伙子，他有许多优点。于是我问他：“哎，你和纳瓦罗·沃尔夫说了些什么？”他回答说：“您没有收到我交给阿布兰特斯部长的一份报告？”我对他说：“没有，你有副本吗？”他说有，还存在电脑里。会议以后，我和他边谈边回到大楼，进了我的办公室。我让他在电脑里找出那份文件。他给了我纳瓦罗·沃尔夫通报内容的报告的副本。阿布兰特斯也是参加每天在革命武装力量参谋部举行的形势分析会的。

拉：是他把那个报告交给阿布兰特斯，让他转交给您的？

卡：他交给了阿布兰特斯，而这个连一张小纸条都要交给我，一点小事都要请示的阿布兰特斯……

拉：没有带给您那份报告？

卡：在和我讨论他的部下参与的所有反毒品行动和调查的时候，有关这份报告的事却什么都没有说。我让他去找，那天下午我对他说：“听着，阿布兰特斯，我这里有一份纳瓦罗·沃尔夫所说内容的报告，你做了什么？你有没有副本？”我又对他说：“你没有副本？”我们让人去找，没有找到。“但是，你怎么不交给我这份报告，阿布兰特斯？”没有得到解释。

还有，有关这份报告的事，他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然而，你怎么可能连一个字都不说呢？”于是我对他说：“去找，把副本找来！”他找不出来。他应该记得纳瓦罗·沃尔夫提到过卫队的托尼这个名字，提到过他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接触。有谣传说，那位哥伦比亚的来访者听说过这件事。

无疑，阿布兰特斯的行為是下意识的……那份报告牵涉到了他最信任

的人，他认定的生意场上的奥林匹克冠军。我不知道乔治·索罗斯，也许或者是比尔·盖茨在买一些零件、卖一些雪茄时，是不是能够表现得比他们更加出色……然而，那些人，MC公司的人表演得像是生意场上的冠军。他们甚至把那些钱存起来，等着再用，或者一点一点地交，以细水长流的方式交出来，避免引起注意。

用这些交易积聚了300万或者400万美元，也许更多。但是他们没有偷。我关注着每一个细节，我意识到这一点。那是一种极度的疯狂，极端不负责任，会给国家造成可怕的伤害，使它的安全处于极度危险之中，是上天给背信弃义和侵略成性的帝国的一份礼物。有许多人卷了进去，其中包括他的朋友诺韦尔托·富恩特斯等人。在1号判决书里没有提他们。比如诺韦尔托，他写作，出过一本关于海明威的书，也在安哥拉写书。1号判决书也没有提另外一些人，他们藏了钱，像是MC公司的银行。实际上，判决书排除了一些人。主要的参与者有很多关系，把所有的合作者——许多人甚至是抱着良好愿望做的——都包括进来并没有好处。这就是著名的1号判决书。

我告诉您，奥乔亚甚至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想法，用一条大船来装运那些箱子。奥乔亚想干什么？奥乔亚派一条船装了六吨毒品，快艇把它们转运到古巴南部，再运到美国。一个疯狂的想法，而他们以为在帮助国家。

拉：这样，古巴就参与了毒品走私。

卡：我对您说，瞧，一个出口商品和服务超过50亿美元、进口金额又超过这个数字的国家，假设它进口了，谁知道呢，比方说5万公斤，您就获取了5000万。您以为一个国家可以像他们企图的那样，用这样的方式解决它的经济问题吗？按照设想，他们走私50吨，每公斤1000美元，按照奥乔亚的奇妙设想，就是5000万美元。但是没有那么多。MC公司应该倒运了4吨至6吨。他们干了一段时间了。这就是要进行调查和采取那些措施的原因。

拉：但是，您不觉得那些刑罚太严厉了吗？

卡：对纯反革命罪，政治性质的、反革命类型的犯罪很多年以前就不判处极刑了。对某些普通犯罪，罪大恶极的、凶恶的杀人罪，判处过极刑，而不是其他类型的犯罪。1号判决书涉及的是综合性质的犯罪。那是1989年的事情。

拉：对您个人来说，归根结底是一个要枪毙同志的决定……应当是很艰难的，是吗？

卡：是的，但那不是个人的决定。是由31名成员组成的国务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决定。我给您解释它是如何运作的。最终，国务委员会成了一名法官，那是一种令人相当痛苦的、特有的权力。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要让所有的决定都是由委员会的成员一致通过的。当有人有不同意见时，就要争论，再争论，而所有的同志都有良好的修养，都很有责任心。几乎所有问题都要达到一致。而一般说来，几乎所有的决定都是一致通过的。因为，当存在反对意见的时候，两条、三条，甚至一条，都要通过讨论解决，或者干脆不做判决。公布1号判决书的时候，那次的国务委员会会议是通过电视台直播的。

拉：走私毒品在古巴要处以极刑吗？

卡：您瞧，有关毒品，这里发生过可怕的事情。一个西班牙人，比方说，在这里办了一家合资公司，并寻找市场。他既有技术，又有资本，生产一些非常漂亮的小玩意儿。原料是哥伦比亚的，用集装箱可以运1吨来。他们来到这里——像是最勤奋的企业家——卸下原料，装上成品，用集装箱把它们运到西班牙。某一天，我们从一条消息中得知，“截获开往古巴的、装有毒品——不知道是2吨还是3吨——的集装箱！”好像是一次从哥伦比亚进口的奶粉或类似物品。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是哥伦比亚警察头子的一次不正当行为。没有相关报告。什么也没有对我们说。如果得到报告，我们会扣留它们的。但是犯罪分子得到消息后逃跑了，听着，您知

道他们还在逍遥法外吗？

我们把所有的信息都告诉了那里，告诉了西班牙。我们分析了集装箱，运送过去的并不多，但有几个是满载的。我们见到了证据。我想让您知道的是，他们正逍遥法外。

拉：在西班牙？

卡：是的，他们没有受到惩处。他们声称，我们是为了没收他们的小铺子——有 12 个或 14 个工人的——而指控他们。顺便告诉您，他们没有受到惩罚。

这引起很大的不愉快，愤怒。我们说，他们怎么能利用一家合资企业来大量运送毒品呢？于是，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严厉得多的惩罚，对于利用国家领土从事大规模毒品走私的，处以实际上直至死刑的刑罚。那个惩罚已经确定了，当犯了这类罪行时，有法律规定要处以无期徒刑。

拉：走私毒品的案件多吗？

卡：啊，大多数是小规模的。有人把毒品装在胃里或某些特定的场所来偷运。有人因此而丢了性命，焦躁不安。狗闻不到胃里的气味。但是，负责这项工作的人慢慢取得了经验。有的人很可疑。有人甚至在体内带了 1 公斤。您知道 1 公斤值多少钱吗？5 万，或者 7 万美元，谁知道在欧洲或其他地方的零售价是多少呢。

一次，有一批人——其中几个是英国人，其他是加拿大人——在衣服套子里带了 17 公斤。有些事情令人难以置信。有人死了；另有人把毒品装在双层行李里，他们的招数层出不穷。这里关着约 150 名贩毒的外国囚犯。许多人是想把毒品再偷运到欧洲去，但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初期的国内市场。

拉：从哪里来的？

卡：主要来自飞机的空投，有些是从海岸渗透进来的。巴哈马海峡就

在古巴的近旁。

拉：他们在远海投放毒品？

卡：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监视着，他们也有飞机，有情报网，和我们有某种合作，但从来不愿意和我们签订一项反毒品走私的协议。从2001年起，古巴就与一项共同对付恐怖主义和一项移民协议一起，提出和他们签订一项反毒品走私的协议。那些船在海边靠岸，当遇到危险时，他们就扔掉毒品。

奥尔金省有时候报告我：“发生两次投放！”我怎么理解“两次投放”？就是有两批毒品上了岸，经常是装有大麻的包裹。一次“投放”意味着从船上卸下了30或40个包裹。

拉：如果被跟踪。

卡：如果被跟踪，他们就把包裹扔到大海里，海浪就会把它们带到靠东边一点的地区。

也有另外的方法：来一条大船，一条货船，同来自美国的快艇联系上以后，快艇搜寻船只或飞机投放的货物。当然，这些“投放”是旅游业发展或其他原因而出现在初期市场里的毒品的主要来源之一。比如，每年有十多万来自美国古巴人，他们当然能来。他们中的大多数行为端正，但也有人，包括一些旅游者，为了自己个人的消费而带来了少量毒品，尽管我们的旅游业通常是健康的。我们正在研究这些案例。

在毒品由游艇运送的同时，还有其他大规模走私方式。旅游船的数量多达几千艘。这里，到一些地方来的是私人船只和游艇，来的人很多，其中一些人带了毒品。可以种植，但不是主要来源。农民们有很好的组织，觉悟很高，最大的来源是“投放”。我们成功地对这种问题进行了斗争，我们必须阻止它，因为毒品损害大脑。毒品有一种特别坏的作用，它使人失去理智，破坏人的思辨能力，使人的道德沦丧，发生严重的伦理问题。

您瞧，一个为赚钱而走私毒品的人会十分小心，因为惩罚起了刹车的作用。我想，害怕遭到极刑的惩罚，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阻止这一严重罪行

的蔓延。应当避免让它的消费成为有严重后果的社会问题。

拉：世界上许多国家废止了死刑。所有欧盟国家已经废止了，因而，许多人问，为什么在古巴，在这个取得了那么多社会进步的国家里却没有废止死刑。

卡：我想这是一个困难的题目，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如同环境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一样，在我们这里讨论了很久。

当我们起来革命的时候，当我们进行斗争，或者革命胜利的时候，我们争论死刑问题吗？不，我们真的不争论。在入侵、“肮脏战争”、袭击、破坏之类的活动盛行的年月里，我们争论了吗？不，我们确实没有争论。我们思考了做这个题目的方式、程序和法律内容，也参考了一些历史经验。

怎么样呢？那就是，政治运动必须自卫，资产阶级也是这么做的。无论是反革命还是革命，都必须以这类或那类程序来保卫自己。对我们来说，根本的、高于一切的是，通过规则、法律程序来保卫自己，避免不公正。正如我给您解释过的，要避免一切法律之外的、法庭之外的行为，这是我们所要避免的。

我们并不因为执行了死刑而感到高兴。有一段时间甚至停止执行极刑。但是我们遇到了恐怖计划和袭击，还不少。在革命的第一年，极刑被取消了。您听着，一些人保住了性命，但有许多人等待判决或者逃跑了。再后来，又不得不恢复了极刑。等待我们的，并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我们最近做出的事实上废止极刑的决定，也含有天真的成分。

我们是从生死存亡的角度，也是从革命进程中、在很久以前的深刻革命中产生的某些观念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一般来说，这类抗争的参与者是从“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这一实际出发来考虑这一问题的。如果你没有能力保卫自己，你就会被打败，你就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清晰的想法。面对最严重的犯罪，我们说：“好吧，我们怎样来真正地制止它呢？如果雇佣观点很强，就不是一个思想意识问题了。幸运的是，我们不必同思想或事业的狂热分子做斗争。我们乐

于同贪图物质享受、有经济或社会野心的人做斗争。”

拉：单纯的雇佣兵，而不是某种事业的狂热分子。

卡：从狂热分子那里我们是逃脱不了的，那样，我就不可能在那些袭击计划中生还了。谁也逃脱不了狂热分子的手掌。我们的优越之处在于，反对我们的人不是狂热分子，而是一些精于算计的人。于是，那些以为搞一些恐怖活动，杀人，暗杀教师，牺牲农民、士兵——工人和农民构成我们的力量——的生命就可以得到奖赏的人就错了。得到奖赏是这些人的希望。

当然，在那样的情况下，最严重的罪行会被判处死刑。这是在那个时期占有主宰地位的想法。斗争逐步展开，逐步取得胜利。事实上，那些罪行出自反革命动机。

拉：你们逮捕了许多他们的人吗？

卡：我们逮捕了他们，因为采取了一切措施，建立了组织，使用了一切必要的手段来化解源自国外的行动。使用了潜伏和情报手段，乃至技术手段。比如说，我们也能知道某人是在哪里讲话。这是谁都知道的事，略懂技术的人都知道。

拉：他们被判刑了吗？

卡：那些在旅馆里安放炸弹的人被判了死刑，但实际上没有执行。我记得，没有因为反革命罪而执行的枪决。我想实际上他们更是罪有应得的人。许多年以前，我可以对您说，谁知道是多少年以前就不执行了。最后时刻，人们提交给国务委员会。有一种提交给国务委员会裁决的手段。放置炸弹、并被判决的人中，没有一个是被执行了的。

拉：他们被判了死刑？

卡：一些人被判了死刑。

拉：但是没有被执行？

卡：是的，没有被执行。死刑通常只被用于犯有最恐怖罪行的人。那儿也有一个舆论问题。即使不再有法律存在，它也会基本上保留下来的。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因为您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如果他们派一架飞机载着人飞到它的上空，这个国家是不会对那些罪犯实施大赦的，也不会宽恕特权人士。因为，一般来说，公众舆论通常是严厉的。

一个政府并不能总是按照人们的要求来做事情。您知道，几乎在所有的地方，死刑的支持者总是多于反对者。就是在欧洲，也有许多国家想实行死刑。

拉：是的，公众舆论是赞成的。在法国还是多数。

卡：但是，您也有义务不让别人牵着鼻子跑，不软弱地跟随一种看法，即使它是普遍的，占统治地位的，因为，它当然也可能是极端的。

拉：这里的公众舆论中，赞成死刑的人占多数吗？

卡：人们往往更加激进。因为有些形势深深地激怒了人民。当他们从关塔那摩基地开枪打伤或者打死人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反应会是多么激烈。但是，人们怎么说就怎么做也是不必要的。

当发生这类罪行时，您无法想象情况会是多么困难！甚至，当由于某个特定的原因，或者由于犯有这类罪行的人是一个年轻人时，最高当局会出现宽恕他或减轻刑罚的倾向。于是，与邻居、亲人和公众舆论就会发生问题。当然，它不是影响做出最后决定的因素。但我可以肯定，那是不容易的。

拉：最容易的，不是就像欧洲国家那样，取消死刑吗？

卡：作为法律，我们没有取消它。但事实上，我们自2000年4月^①以

^① 这部分谈话发生在2003年1月，是在4月1日一条游艇被劫持，劫持者被捕获，其中3人于2003年4月11日被判处死刑之前。它结束了死刑在事实上的停止执行。古巴当局从2000年4月起实行死刑宽限。据国际大赦的资料，2003年11月在古巴有52人被判处极刑，但他们得到了宽限。

来就没有执行过极刑，但没有取消。我并不认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可以做这件事的世界里。好了，难道他们还保留着福特方案吗？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杰拉尔德·福特做出决定，禁止美国官员参加、策划和执行暗杀美国的敌人。在当前这个带有新的、充满敌意理论的时期，没人知道布什政府是不是已经废弃了它。有人认为是的^①。

如果开始对国家实施恐怖主义，如果犯罪，在一所学校里杀害儿童，我向您保证，在那样的情况下不实施最严厉的法律是很难的。人们——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也不知道怎样称呼在学校放置炸弹的行为——把恐怖主义称作“为一个大国和一个外国政府服务”。

好吧，欧洲人没有被禁运，也没有人每天都给他们放炸弹。我不知道他们如何对付像红色旅^②这样的组织。我也听说过有些人在外国被执行死刑的消息，比如巴斯克分子，有几十人……

拉：作为例子，您指的是反恐怖解放小组^③？因为，在西班牙没有死刑。

卡：好吧，没有死刑，但发生了我们从来不做的事情，即由于政治原因、不经审判就杀人的事件。在欧洲，他们就杀了几十个人。

拉：法外的？

卡：在西班牙虽然没有死刑，但有红色旅的成员被法外枪杀的历史，或者埃塔分子被法外枪杀的真实历史。

① 参见希摩·M. 赫施 (Seymour M. Hersch) 《应有的服从——从“9·11”事件到阿布·杰拉德的拷问》(Obediencia debida. Del 11—S a las torturas de Abu Ghraid)，特别是第292—305页《人的猎取》一章。阿吉拉尔出版社，马德里，2004年。

② 红色旅，具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意大利地下组织，1970—1980年间十分活跃，其成员多次袭击和绑架意大利的企业家、工业家和政治领导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78年绑架和杀害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的主席阿尔多·莫罗。警察最终解散了该组织，并监禁了它的500多名成员。

③ 反恐怖解放小组 (GAL, Grupo Antiterrorista de Liberacion)，西班牙国家安全机构创建的 secret 组织。1983—1987年间，它用袭击、暗杀和“肮脏战争”等手段从事反巴斯克独立组织埃塔的行动。它实施了数十次袭击，杀害了26人。

这里有死刑，但是没有法外的枪毙。一个例子都没有。从中您可以看到表面现象，看到区别，看到真理在哪里，看到哪里有蛊惑人心的、虚伪的理论。

我们保证，在古巴从来没有过一例法外的枪毙，从来没有刑讯拷打。可以问那些（在1997年）放置炸弹的人，他们是否受过拷打，是否挨过一拳。当然，他们不是狂热分子，而是雇佣军。当您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过错时，他们马上会把一切都说不出来的。于是，他们自己就会解释是如何把爆炸物放在一个小电视机里带进来的；那个塑料制品是什么颜色的；为什么狗闻不出来，因为那是一种狗会放过、发现不了的爆炸物；带电线的引信是哪儿来的；定时器是如何安装在玩具里的。用这种定时器可以让炸弹在5分钟、一个小时内或99个小时后爆炸。所有的东西都是精工细作的。

但他们合作，立刻讲出了所有的事情，因为许诺给他们的是钱……我们不给他们钱。我提到的那些犯罪分子平静地、冷漠地和我们合作。这样的人有几千个。

中美洲和其他地方发生那些问题和冲突之后，有人会为了得到5000美元而做任何事情……甚至为更少的钱。对有些人，他们许诺用2000美元来换取炸弹、机票和其他东西。他们利用旅游业提供的便利，而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一架飞机上，任何疏忽对大家都是性命攸关的。任何一架飞机都不是完全保险的。他们使用一种特殊的炸药，带一个普通的数码定时器，一套任何种类的医疗器具，如果允许的话带一架小电视机。您瞧，这就是现在，“9·11”事件以后美国人遇到的问题。他们把这种技术教给恐怖分子，用来反对古巴。

波萨达·卡里莱斯（Posada Carriles）本人制定计划，企图炸毁美国人乘坐的从中美洲飞往古巴的飞机。我想，如果发展一项能发现恐怖计划——还有毒品——的技术，所有的人都能从中得益。这是两个大问题。所有能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技术，都将使人们受益。

拉：到目前为止有多少已经宣判的死刑没有执行？

卡：在那些来自国外、在反革命行动中放置炸弹的人中，没有人遭到枪决。我不能告诉您是从什么时候起，但应该是几年前就开始了的。

至于一般犯罪，执行到2000年4月。现在我不能告诉您确切的数字，但可以问一问，应该有几十例。制裁是有的，我不能说出确切的数字，可能是20或者25次。但是现在我不能告诉您确切的数字，因为我这里没有资料。

拉：从那时起没有执行？

卡：一次都没有。

拉：从三年前起？

卡：是人们称作宽限期之类的东西。但是，我想提醒的是，并没有废除。之后，如果您愿意，我可以说说我的意见，但没有废除。好了，有许多杀人的方法。杀人的科学或艺术被刻意修饰，而您现在不能够说：“我们来废除死刑！”有两件还没有宣判的极其严重的案件，其中之一是，一个家庭接待了来自迈阿密的一次访问，全家，包括一个孩子遭到杀害。由一般罪犯制造的这种十分严重的犯罪造成了很严重的社会舆论问题。这是有待解决的案例。不是我们喜欢，也不是着急，或有任何愿望。但是我想，彻底废除任何类型罪犯的死刑还要等待一段时间。废除死刑是我们很高兴做的事情。但没有做彻底宽容的承诺。

拉：你们在研究这种可能性吗？

卡：我对您讲了我们担心什么，讲了我们在政治类型的案件中如何逐步减少死刑的执行，对您讲了那些放置炸弹的雇佣兵的案例，然后我对您说很长时间没有执行死刑了，但是并没有废止，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复杂的阶段。

对于一般犯罪，我们事实上不实行死刑，但也没有放弃。我给您解释，

因为我不想欺骗任何人，我们认为人民在这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会带来严重的舆论问题。尽管可以肯定这里不会发生任何不公正现象，但是，那些严重犯罪的人会从某种宽大中受益。人民无法理解他们。需要教育。需要在我们中间开展一种教育。在具备执行这项政策的起码条件时，革命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拉：您个人对极刑是怎么想的？

卡：对于极刑我有我的观念。我认为，极刑不能解决问题，死刑的影响是相对的。

我们正在研究犯罪及其原因。我们需要深入，我对有关工作和进行的各类研究很满意。有些罪行十分严重，任何学习法律的人无疑会知道一个原则：精神错乱的人享有不予追究的权利。我们正在严肃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正在分析精神错乱者的案例。美国存在大量有精神疾病的人。有一项司法原则：必须证明——怎样证明——一个人不是在那种状态下犯的罪。

关于犯罪的精神原因做了多少研究？要是属于遗传性的、偶发性的，属于对人造成问题，导致他做出暴力行为……那该多好啊！有哪一些是影响人的头脑，使某些人事实上变成带有魔鬼的遗传因素和偶发因素呢？

我们正在沿着那样的现实、那样的经验、那样的观念前进。这里从不因为报复而惩罚一个人。在刑罚中，我们有无期徒刑，是对极刑的一种替代……

我想，我们正在走向未来，走向在我国具备废除极刑的条件的未来。那样，有一天我们会跻身于废除那个刑罚的国家之列。我们期望它，不是出于单纯的哲学原因，而是出于法律和现实的考虑。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观点，就是我们关于极刑的立场。



我
的
一
生

第十九章 古巴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新自由主义政策，通常被简称为“改革”或“新自由主义”。

改革通常指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在拉丁美洲，改革通常指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改革通常指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

① 参见，例如，世界银行（2001），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2001—2002年）；世界银行（2001），《全球化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世界银行（2001），《全球化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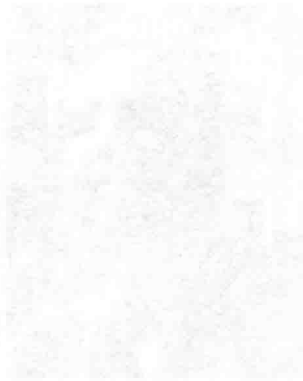
② 参见，世界银行（2001），《全球化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世界银行（2001），《全球化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③ 参见，世界银行（2001），《全球化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世界银行（2001），《全球化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④ 参见，世界银行（2001），《全球化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⑤ 参见，世界银行（2001），《全球化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⑥ 参见，世界银行（2001），《全球化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新资本主义—什么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混乱—生态灾难—保护环境—思想战线的战斗—全面教育

拉：前些时候，在我和您交谈时，我问您想如何避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影响在古巴蔓延，而您回答说“我们将耐心地等待全球化的崩溃”，您还是这么想吗？

卡：当我那么回答您时，施蒂格利茨^①还没有写过一本书，关于索罗斯^②还只听说过他那些大的投机行为，2001年12月的阿根廷危机，以及今天我们知道的一系列危机还没有发生。

我们逐渐意识到什么是全球化。很早以来我们就阅读了许多材料，它们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有可能发生比1929年危机更为严重的形势，它促使我们去研究1929年的危机，重读加尔布雷思^③和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研究有关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论断和基本思想。我们甚至自问，那个体系还留下什么吗，还留下点东西吗，世界上还有自由竞争吗，还有自由企业吗，还有那些被视为“真理”的美妙教义吗？

您还用另外一个名称来称呼全球化，我想是把它称作“唯一思想”^④，另一些人谈到了“历史的终结”^⑤。然而，我完全相信，事情恰恰相反，应当加以抵制。我深信这一点。

① 约瑟夫·E. 施蒂格利茨（1943—），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79—1999年世界银行副行长，《全球化的烦恼》（Taurus出版社，马德里，2002年）和《幸运的90年代》（Taurus出版社，2003年）的作者。

② 乔治·索罗斯（1930—）：《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处境危险的公开社会》，Plaza & Janes出版社，巴塞罗那，1999年。

③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1908—），哈佛大学终身教授，《1929年的崩溃》（Ariel出版社，巴塞罗那，2000年）等著作的作者。

2006年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逝世。（中文编者注）

④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失去方向的世界》，Debate出版社，马德里，1997年。

⑤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Planeta出版社，巴塞罗那，1992年。

拉：您自问资本主义还留下什么？您认为全球化正在毁灭资本主义自身？

卡：今天没有资本主义，没有竞争。今天，在所有大的行业里只有垄断。在几个国家之间还有生产电视机或电脑的竞争。世界银行甚至还让它们生产汽车，但是那个资本主义已经不复存在。

今天，500家全球性企业控制了世界经济的80%。价格不是竞争性的，比方说，抗艾滋病药品的销售价格是垄断性的。药品成为世界上最被滥用、最离奇、最具剥削性的领域之一。在许多情况下，药品往往以高出生产成本十倍的价格出售给人们。广告决定卖什么东西，不卖什么东西。没钱的人不能为他的产品做任何广告，尽管他的产品极好。

20世纪40年代那次世界最后的大屠杀以后，他们对我们许诺一个和平的世界，要缩小贫富差距，最发达国家要帮助欠发达国家。最后都成为莫大的谎言。它们强加给我们的是一个已经不能维持、不能忍受的世界秩序。世界正被引向一个死胡同。

我们认为，作为资本主义建立基础的任何范畴都已不复存在，因此，芝加哥弟子^①教育人们的理论同样并不存在。此外，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待发展，有待撰写。

拉：您在另外一次谈话时对我说，在政治领域不存在“模式”，目前没有人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含义。您对我说，在聚集了拉美所有左派的圣保罗论坛哈瓦那会议上，需要达成一个不提“社会主义”一词的协议，因为这个词会导致分裂。

卡：您瞧，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确切的定义。

^① 嘲讽式地称呼“芝加哥弟子”指芝加哥货币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是反凯恩斯理论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生。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府、联合王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总统的政府贯彻了他的学说。

首先，仅有的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的，是亚当·斯密^①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于是，在我们搞社会主义的时候，经常用资本主义采取的那些方式。这是我们最大的忧虑之一。因为，如果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资本主义方式的手段，就会迫使所有的企业相互竞争，就会出现到处收买财物的强盗企业、海盗企业。应该做非常深入的研究。

有一次，切·格瓦拉对实行预算拨款制企业和实行自筹资金制企业各自的后果问题做了一些论争。我们曾经谈到过它……^②他作为部长研究了一些大垄断企业和那些实行预算拨款制的企业的组织形式。苏联用另一种方法：自筹资金。对此格瓦拉提出了强有力的论据^③。

马克思只是在《哥达纲领批判》^④中，在试图给社会主义下定义时略微做了些尝试，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博学、非凡聪明和十分现实的人，不能想象他会对社会主义做出空想式的描述。问题在于理论阐述，这方面已经做了许许多多。由此，进步人士长期分裂，就有了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辩论，有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托洛茨基分子与斯大林主义分子之间的问题。或者说，对于那些大辩论的拥护者来说，是两大领袖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在这两人之中，更聪明的无疑是托洛茨基。

斯大林更像是实践领域的领导人、阴谋家，不是理论家，尽管在此后，他有时扮演了理论家的角色。我记得，在那时分发的一些书籍中，斯大林使用了水的例子，企图解释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人们想把斯大林变成一个理论家。他是一个组织者，有着巨大的能力。我认为他是一个革命家，我不认为他从来没有为沙皇服务过。然后，他犯了大家都知道的

① 亚当·斯密（1723—1790），苏格兰经济学家，有关资本主义的第一位伟大理论家，《国富论》（1776）的作者。

② 参见第十一章注7。

③ 见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著《全面公正、解放与社会主义》一书中的“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海洋出版社，墨尔本，2002年。

④ 卡尔·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费德里科·恩格斯：《序》（1891），Progreso出版社，莫斯科，1983年。

错误，镇压、清洗等等。

列宁是一位天才，死时相当年轻，否则还能做很多事情的。理论并不总能解决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时期，从1921年起，列宁竭尽全力地贯彻新经济政策……我对您谈到过它，我告诉过您切·格瓦拉本人并不赞同新经济政策。

列宁产生了一个真正可谓天真的想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建设资本主义。您记得，那些大国想摧毁布尔什维克革命，都对它发起了进攻。不能忘记对那个不发达国家造成了破坏的历史。俄罗斯是欧洲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国家。此外，列宁还相信，按照马克思的路线，革命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发生，而必须在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的情况下在各地同时实现。

因此，在那个第一次革命发生以后就需要做出选择，是继续还是停止。在欧洲其他地方的革命失败以后，列宁只有一条路可走：在一国，即在俄罗斯建设社会主义。您设想一下，要在一个文盲占人口80%的国家里，在需要对付所有国家进攻的那种形势下，在知识分子或者逃亡他乡或者被枪决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您意识到了吗？

拉：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时代，有许多激烈的争论。

卡：有无数论战。而列宁已经去世了。我认为，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十年里，苏联丧失了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时间。由于个体生产已经贡献了在那样的条件下的最大产量，他们匆忙进行合作化运动。古巴农村始终有十万以上的个体小土地所有者。1959年我们首先做的事，是给所有的佃户和贫农分配土地。

拉：您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意识形态极度混乱的时期吗？

卡：是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着巨大混乱。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很不相同。存在着许多问题，即使最伟大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家也不可能做出如此长期的预见，尽管他们的认识在把我们变成具有革命思想的人方面起

了决定性作用。

人们和欠发达、疾病和文盲做斗争，但还没有找到总体解决人类问题的办法。那些人类的问题不可能由一个又一个国家逐个解决，因为统治是前所未有地在全球基础上实现的，即建立在帝国及其同盟者的权力基础上的所谓新自由主义。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具有统治地位的规则，进行事实上与封建奴役相同的或更残酷的剥削，造成更加不幸的后果。

许多人正在谋求摆脱这种支配。您亲眼见到，有多少人参加了在阿雷格里港或2004年在孟买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的会议。我读了不知道多少篇刊登在您的杂志^①上有关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文章。也读过其他严肃杂志上刊登的相关文章。

多少年来，这里的同志每天都从左、中、右各种杂志上收集有关世界经济问题的重要文章。我们可以说，这类文章是很难懂的，因为在大多数国家里，广大群众没有受到经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教育。面对现在和未来越来越难以维持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人民要做出反应。

拉：然而，您不觉得自由主义全球化已经受到重大打击，不像前几年那么神气了吗？

卡：是的，我也有这个印象，因为已经发生了阿根廷事件、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éstor Kirchner）在2003年5月取得的胜利和那个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象征在国际经济危机的决定性时刻遭到的失败。不仅仅是1997年的东南亚危机，而是一次世界性危机，加上伊拉克战争，加上巨额债务的影响，加上由于超额印制钞票造成的致命的货币贬值和地球上主要经济与军事大国的财政赤字。

问题是世界性的，因而也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觉醒。因此，终于可能出现一个更好世界的时候，将是一个光辉的日子。您瞧，那个您自己也说过

^① 指《外交世界》，伊格纳西奥·拉莫内领导下在巴黎出版的有影响月刊，以十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古巴编者注）

的话见效了：“另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但是，当出现一个更好的世界时——那是可能的，我们还要重复地说：出现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因为这个世界正处在一个或“更好”或“消失”的十字路口。

我相信思想，相信觉悟，相信知识，相信文化，特别相信政治文化。我们用了许多年来培养一种觉悟，我们对教育和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有巨大信心。我们现在生活在缺乏政治文化的世界里。您应该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因为您为在经济新秩序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等复杂问题中加入政治文化观念而斗争过。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学校里教授的都是教条，甚至在这里也是这样。

拉：教条使您生气？

卡：我是彻底反对教条的人，这在另外场合我对您说过的。相信思想的巨大力量是我国人民的信念。我们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懂得了思想和知识的价值。然而，还有危险，因此我们始终试图日益加强对新一代的教育。因为，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需要更多的知识，以便寻求和找到全球性的解决办法。

拉：哪一些，比如说？

卡：首先，要使人类能够生存下去，因为人类的生存绝对没有得到保证。这是我们从短暂历史中得到的认识，人类的生存并没有得到保障。人类还很新，把他的各个进化阶段都算在内，也许还不到一百万年。具有智力的现代人可能有约十万年历史。大家知道，生命的进化受到了坠落在特万特佩克地峡(istmo de Tehuantepec)的陨石阻挡——这是被所有人接受的理论。人们说，它像是一次巨大的核爆炸，它的尘埃和阴影把地球的大气层遮挡了几个星期，杀死了不知多少种类的恐龙和其他类型的生命，又有了一些演化。但那时还没有人类。

对于工业化的世界，今天有一种新的危险：一个已经有 65 亿居民，每年还要增加近 1 亿、至少 8000 万的人口。我在那里有三只计量器，大

致标示每天增加的人口。幸运的是，中国做了极大的努力来限制它的人口增长，否则，今天地球上人口将是 67 亿。

大家都知道人口将会增长多少，大家都知道文盲、缺乏教养与一个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关系。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和现实世界中的许多事情。在许多国家里存在着一种真正的人口爆炸，那里的经济得不到增长，而是债务重重，灾害不断。

全球化继续漠视这些爆炸性的现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继续把许多国家、许多人引向深渊，因为它的指令仍然完全有效。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它喜欢保护它的大企业的利益——不惜与全世界战斗，仍旧我行我素。它对任何国家，包括对加拿大强制征税。某一天，它决定对加拿大征收 30% 的木材出口税，影响了一个交易额达数十亿美元的市场。

此外，问题在于存在着一个世界的主人。在把进口的钢铁再出口到其他一些国家时，美国要征收巨额税收，而对自己的小企业却给予一切优惠。对于世界其他地方和它的盟国来说，美国的经济政策是前所未有的、自私自利的。

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在全世界发展，而这并不是好事。现在，人们关心的应该不仅仅是民族的，还应该是世界的。世界应该发扬国际主义情感。如果我们开始责备其他国家的人民，就像由于纳粹的暴行而谴责德国人民——您知道，在那个特定时刻，许多德国人是支持那个可怕的事业的——那样，我们就不是国际主义者，也不会掌握一种世界应当团结互助的理论。

拉：希特勒和纳粹的事业。

卡：但那个国家的人民遭受了 1919 年华沙条约带来的难以忍受的后果。希特勒得到的大部分东西是在华沙条约中确定了的，它们把那个国家的人民推到了一个极其艰难的境地。失败以后，在一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瓜分世界的战争结束之后，那个条约把德国人团结了起来，进行了选举。

是的，因为希特勒是通过选举进入总理府、掌握政府权力的，并没有发动政变。1923年他确实想在慕尼黑搞一次暴动，一次类似的冒险，并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出于民族主义的动机，他给人民灌输了种族主义的、荒唐的、罪恶的理论。1972年我访问了奥斯维辛，那里犯下的罪行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拉：罪行中的罪行。

卡：很长时期内，人类会毛骨悚然地、憎恶地记起大屠杀，记起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里灭绝人性的罪行。

拉：今天没有了任何可与奥斯维辛的暴行相提并论的事情，但是全球化助长了危害生态环境的巨大罪行，它造成可怕的灾难，可能对后代产生不祥的后果。您关心保护生态环境问题吗？

卡：三十年前人们并不谈论我们今天知道的这类问题。在罗马俱乐部^①里集中了一些大人物，他们通过数据和分析做出了预测。有人批评他们，称他们为“乌托邦”、毁灭论者等等。他们是先行者。我想这不过是三十年前的事。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生态问题迅速地、直线地发展。真正的悲剧也许是，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我们竟然对这种危险一无所知。

拉：您认为是不知道还是不想知道？因为人们对科学和技术有一种盲从。

卡：您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二十五年以后，人的整体是理性的，会读会写，但对于人类盲目、无情、加速的进步会破坏自身生命的自然基础这一事实，他们一句话都没有听到过。前几百代的人也不知道会有如此痛苦的危险，他们当然也没有承担起如此巨大的责任。

我再说一遍，仅仅三十年前，人类对这个大悲剧还没有任何概念。

^① 罗马俱乐部，思想家和科学家的团体，现代生态学和经济超量生产批判理论的首创者。1972年发表了一份引起巨大反响的报告：《增长的限度》。

那时，人们以为人类灭绝的唯一危险来自那个几分钟内就可以发射的、大量储存的核武器。今天，在此类危险绝对没有消失的情况下，一个意外的、可怕的、但丁式的危险正在逼近人类。当您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您肯定没有听说过臭氧层和气候变化。在您毕业很多年以后，才开始讨论那些问题。

今天人们知道，石油这个自然界经历3亿年才生成的尤物，人类将在一百五十年内耗尽它的已经探明和可能探明的储量……这是一个和最大的生态灾难同样严重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突然没有了能源，世界上所有的汽车将会瘫痪在那里。而现在还没有石油的替代品。在一段时间里，人们以为可以用核能来代替。

就是罗马俱乐部的那些人指出，为此，人们不知道需要建造几千个核电站，而且三十年之后，放射性污染地区的数量会让人惊恐万状。

拉：有一段时间，你们期待利用核能，甚至开始在西恩富戈斯建造一座核电站，我想，后来又放弃了。

卡：是的，那个计划放弃了。它不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那样一种开放式的石墨核电站，而是封闭式的水冷核电站，也就是说，使用的是更常见的、迄今为止更安全的技术。核能已经解决了例如法国那样一些国家的能源问题。法国用它的技术在自己的领土上修建核电站。它给予邻国优惠，当它有富余的时候以便宜的价格在凌晨卖给没有修建核电站的其他欧洲国家。但是，毫无疑问，当石油价格开始上涨时——这也是没有人预料到的，因为大家都相信石油丰富得像太平洋里的海水一样多，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的上涨有一点好处：迫使人们在能源消费、工厂、工业生产等活动中发展更加节约能源的技术，能更好利用节约能源的汽车、客车、飞机……使石油延续更长的年月。强制节约，迫使法国那样的国家发展它们的核工业。这样就可以减少污染，使它不像石油价格上涨之前那么厉害。

拉：法国可以发展它的核工业，但是，比如说伊朗今天想生产核燃料，

而华盛顿不让，并引起了一场世界性危机，您怎么看伊朗的形势？

卡：像其他任何工业化国家那样，伊朗有谋求生产核燃料的权利，而不被迫毁掉一种有用原料的储备。这种原料不仅是一种能源，还能生产许多产品：化学肥料、纺织品，以及今天广泛使用的许多材料。那个帝国威胁说，如果伊朗生产那种燃料，就要打击它。核燃料不是核武器，不是核弹。禁止一个国家生产最近、将来要使用的核燃料，就如同禁止它寻找今天的燃料——即将耗尽的石油。世界上禁止哪个国家寻找煤、天然气、石油等燃料了？

伊朗有 7000 万人口，希望发展工业，它完全有理由认为，为生产几千万千瓦小时的电力而耗尽它的天然气或石油储备是一种犯罪，而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它又亟须发展工业。那个帝国要禁止它，威胁要对它实施轰炸。今天（2005 年 12 月），国际范围内已经在争论，究竟是哪一天、哪个时间来对伊朗寻求核燃料生产技术的实验室实施预防性的突击轰炸，或者，是帝国自己，还是利用——就像在伊拉克所做的那样——以色列的卫星。如果他们轰炸伊朗将会怎样，我们拭目以待。

拉：他们已经指控你们给了伊朗技术支援。

卡：是的，他们指控我们——对我们他们什么都指控——和伊朗合作，转让那种技术。而我们和伊朗正在组建的公司，是一家生产抗癌药物的工厂。像古巴一样，伊朗也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过生产核武器问题，因为我们不需要它。尽管技术上是可行的，但生产它要花多大的代价啊？而面对一个拥有几千枚核武器的敌人，生产一件核武器有什么用呢？那将是玩核对抗游戏。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生产核武器。更没有帝国主义所要的那种特权，拥有这种特权的目的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霸权统治，掠夺它们的自然资源和原料。我们已经做了千百次揭露。我们将在世界所有场合，毫不含糊、无所畏惧地维护各国人民生产核燃料的权利。在这个世界上，乞求和为所欲为、实力霸道和恐惧心理都应当不复存在。不再害怕的人民越来越多，起而反抗的人民越来越多。那个帝国将不再能维持今天仍然维持着的体制。萨尔瓦多·阿连德曾经说“迟早会有一天”，

而我认为迟早会有一天，那个帝国将不再是世界的主人。

拉：在某种程度上，这次危机是目前石油耗尽和正在发生的变化的第一个后果。

卡：是的，因为目前有 80% 的石油掌握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手里，而其他国家已经耗尽了它们的石油，其中包括美国。它曾经拥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现在则只够用几年时间了。因此，它力图在地球的所有地方不择手段地获取石油。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个能源正在枯竭。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以后，大规模电力生产——除了太阳能、风力、生物燃料以外——只有依靠核燃料这一种基本来源了。因为通过非常原始的技术处理氢，使它成为合适燃料的日子还很遥远。没有氢，人类将无法生存。这就是技术发展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的人类。这是当前的一个严重问题。这世界就是这样的。

存在着无数我们甚至一无所知的生态问题，灾难接踵而来，有的祸害甚至比核燃料更大，比如癌。

拉：或者是艾滋病。

卡：二十五年前还没有艾滋病。而今天，艾滋病患者或者艾滋病毒感染者的人数不少于 4000 万人。拥有大实验室的人研究的是治疗手段，而不是预防，不是研制疫苗，因为一次治疗——大家都清楚——的价格是一万美元，而病人每年都要重复治疗，这样就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很简单，治疗医学比预防医学能获得多得多的利润。现在，出乎人们的意料，又出现了非典型肺炎（突然出现的剧烈和严重的呼吸系统症状）的病毒；或者是尼罗热（la fiebre del Nilo）的病毒，它发生在美国的东北部，很可能是从世界其他地方传过去的；或者那个著名的登革热，它以四种不同形式的病毒出现，这些不同形式病毒的组合导致如登革出血热那样的复杂病症。还可能出现禽流感病毒，造成一种可怕的、未知的流行病。所有这些问题在不久以前都是人们不知道的。今天，人们意识到在这些问题之间存在着一

种密切的关系：经济、工业、人口、发展、生态……

拉：一般来说，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很少关心生态问题，古巴关心吗？

卡：我们看到对生态问题的关心在增长；我们注意和观测到了气候的变化；我们发现和观测到了海水的上涨，也看到和观测到了污染。事实是，在我国，生态觉悟正在增长。正在教育人们，电视节目经常发布消息，提供指导。所有的孩子都在这方面接受教育。今天，他们是环境保护的主力。

正如我在前几次说过的，仅仅一百年间，人口数量从约 15 亿增加到了 65 亿。人类必须完全依靠目前还在研究、开发的其他能源。贫困在蔓延；新旧疾病正威胁着要消灭一整个一整个的国家；土地正在被风化，失去肥力；气候变了；空气、自来水、海洋越来越被污染。

联合国的权威正在被剥夺、阻碍和破坏。对发展的援助减少了，正在要求第三世界国家偿还高达 2.5 万亿美元的债务——在目前条件下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而每年却要花上万亿美元来发展花样翻新的杀人武器。这是为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

类似数额的金钱被用在了商业广告上，来刺激几亿人无法满足的消费欲望，这又是为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

我们人类，作为这种“文明”的受害者，第一次真正面临着由于自身的疯狂而将遭到灭绝的危险。

约十五年前，1992 年，当任何政治家都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时，我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生态峰会上谈了这个问题。许多人认为我夸大其词，指责我为“灾难论者”。那时我说，一个物种——人类，正处在濒临灭绝的危险之中。遗憾的是，时间越来越清楚地证明我说得有理。

拉：您认为，在自由主义全球化与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吗？

卡：我认为，保护环境的一切努力与那个强加给世界的邪恶经济体系、

那个冷酷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互不相容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其强加的条件牺牲了几十亿人的健康、教育和社会安全。它以残酷的方式，利用强势货币和第三世界的弱势货币之间的自由买卖，每年从第三世界掠夺大量钱财。

简而言之，我认为，保护环境同世界贸易组织的政策是互不相容的。看来，设计这种政策，就是为了让富国利用其商品毫无节制地侵略世界；就是用美洲自由贸易区和其他“鲨鱼和沙丁鱼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迫使穷国用常常占财政支出总额 50% 的巨额资金来偿付债务——在目前情况下根本无法还清；用掠夺人才、几乎完全垄断的知识产权和滥用地球的自然资源和能源，来断送穷国的工农业发展，使它们除了供给原料和廉价劳动力以外别无出路。

不公正的单子长得没有尽头。地狱越来越深，掠夺越来越大……

拉：古巴不是消费主义社会，消费是节俭的，就是这里的一些人对此也感到遗憾，您对那些抱怨不能拥有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产品的人想说些什么呢？

卡：您瞧，我会对您说，消费社会是发达资本主义在今天新自由主义阶段最可怕的发明之一。如果我想象 13 亿中国人的汽车消费达到美国的水平，那是发疯。我不能想象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印度如何生活在一个消费社会里。我不能想象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那里连电都没有，有的地方 80% 以上的人是文盲，那里的 6 亿居民如何生活在消费社会里。

在一个邪恶和混乱的经济秩序下，最多在 5 个或 6 个十年里，消费社会将耗尽已经探明和可能探测到的全部碳氢燃料……今天，有几千万辆机动车奔驰在发达国家、甚至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大街小巷和公路上，但是，对这些机动车所需的能源在今后五十年内会是怎样的状况，却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想法。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极不合理的消费方式。它绝不应该作为一种模式推荐给我们的后人，因为，当石油耗尽的时候，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人有可能达到 100 亿。

那种经济秩序、那样的消费模式，是与地球上有限的、不可更新的自然资源不相容的，是与大自然和生命的法则不相容的。也与人类的基本伦理原则、文化和道德价值相冲突的。

拉：但是人也需要物质财富，您不认为吗？

卡：当然。我不忽视，绝不忽视物质需求的重要性。应当始终把它放在第一位，因为，为了学习，为了得到另一种生活质量，必须满足某些有形的、物质的需求。但是，生活的质量在于知识，在于文化。价值确实构成真正的生活质量，但最高级的生活质量却是超越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的。

拉：您仍旧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梦想家。

卡：梦想家是不存在的。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一个梦中人说他看到了连做梦也看不到的东西。

拉：对人类要失去信心吗？或者还应该对他能够阻止自己走向深渊的能力保留一点希望？

卡：好吧，我们知道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按照我的观点，没有什么事情比培养一个共同的觉悟更紧要的任务了：把问题摆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几十亿男女老幼的桌面上。客观条件和他们中大部分人遭受的苦难造就达到醒悟的主观条件。一切都联系在一起：文盲、失业、贫困、饥馑、疾病，缺乏自来水、住房和电力，荒漠化、气候变化、森林的消失、水旱灾害、土地风化、生物递减、瘟疫，以及您所熟知的其他灾害。

1992年的里约会议后我们取得了什么成果呢？几乎一无所有。相反，在京都议定书遭到傲慢无礼的抵制的时候，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远远没有降低，却增加了9%，而在污染最严重的国家美国，增加了18%！海洋和河流比1992年遭到更严重的污染，森林正在以每年150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几乎是瑞士领土面积的4倍……

人类社会已经犯下巨大的错误，并且还继续在犯。但是我深信，人类

有能力接受最神圣的思想，抱着最慷慨的情感，克服顽固的本性，以感知和思考改造生活。这是在历史长河中多次显示了的。

拉：在古巴，你们是否已经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环境，您能举一些例子吗？

卡：我们这个被禁运了四十多年的国家，在社会主义阵营崩溃、被迫面临一种极端困难的境地时，可以在城市里可利用的空地上，利用秸秆和农业废物，用滴灌技术和微型飞机，生产了并继续生产有机作物，年产量达 300 万吨。它的耗水量极低，附带给 30 万城市居民提供了工作岗位，却没有向大气排放一克二氧化碳。

拉：古巴生产雪茄，而现在许多消费者协会揭露说烟草导致癌症。您本人曾是闻名的雪茄烟民，而现在戒了烟。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卡：是啊，众所周知，从 5 个世纪以前起，古巴就是著名的雪茄生产国。这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作物。在哥伦布到来时，这个小岛上就已经生产和消费它了。哥伦布在“发现了我们”的同时也发现了烟草。我们不能放弃它，更不用说在被禁运的情况下了。这可称作是一粒田园诗式的乌龙球。但是，当我们把一盒雪茄送给一位朋友时，我们对他说：“如果你抽烟，那就抽它吧；如果你的朋友抽烟，那就送给他，但是最好的办法是把它送给你的敌人。”

古巴是雪茄的生产国和输出国，但也开展反吸烟运动。古巴是很高质量的甘蔗酒的生产国，我不介绍它，但人们可以尝一尝它……我们提醒孕妇，几乎要求她们不要喝甘蔗酒。既不要喝酒也不要抽烟。我们这么做，因为我们知道酒精和烟草对孕妇有害。

拉：你们开展所谓的“思想战”，您是怎样理解“思想战”的？

卡：“思想战”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有一些新事物，非常新的事物，有些事物我可以毫不担心地把它们称作非凡事物。我们学到很多，很多。

但是，特别是，最近几年它已经达到顶峰，成为优先的事情。

你们也是这样，因为您的关于文化侵略问题^①的著作和提供的有关国际垄断主要媒介的资料，我们学了，讨论了，并在一次文化会议上提出讨论。在开展思想战线的战斗之前，我们开展的第一个斗争是“如何挽救国家的文化？”知识分子记得我在那个危险的特殊时期说过的一句话：“必须挽救文化。”

几个月以前，我们召开了古巴作家艺术家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大会延长了好几天。会上我们已经谈到“文化侵略”，并引用了您的另一本著作中非常有价值的资料，以后我们将出版这本著作^②。又召开了记者代表大会，然后，类似的讨论几乎每6个月都要重复一次。我们认识了这个问题。

您本人已经证实了这个臭名昭著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许多问题。世界上的知识阶层、学者和经济学家从什么时候起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我想——因为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尽管犯了那些错误，尽管形成的权力是巨大的、单方面的，这个世界还是有救的，因为我相信思想的力量大于暴力。

是思想照耀着世界。当我谈论思想时，我指的只是正确的思想，能给世界带来和平的思想，能为消除严重的战争危险带来解决办法的思想，或者能够结束暴力行为的思想。正是为了这个，我们谈论“思想战”。

拉：你们开展了我们称为的“全面教育”，来普遍提高居民的知识水平、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这是知识的社会化，把知识当作共同财富。是吗？

卡：我们发现下面的事情晚了：许多人把金钱当作决定性的东西是一个错误。决定性的东西是知识水平和教育水平。几万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掌握知识、享受技术和职业教育的人去了迈阿密。革命使约80万来自下层社会的职业人士和知识分子毕了业。

我们发现了什么？我们发现，家庭核心中知识和文化程度高的，能够

①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媒介王国》（*La tirania de la comunicacion*），Debate出版社，马德里，2000年。

②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静悄悄的宣传》，艺术与文学出版社，哈瓦那，2002年。

进最好的学校学习，他们以学历进入那些学校，并得到最好的地位和职务。于是，产生领袖和主要干部的阶层就会保持不变。而家庭核心中受教育少的，他们一般来自资本主义社会里穷人中最贫困的，被歧视者中最受歧视的阶层。这个阶层也会保持不变。

请您注意，我不是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观点来谈论阶级差别。我谈的是教育水平的差别，当然它是与贫困和社会排斥联系在一起的。建设一个新社会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因为有许多因素阻碍着这条道路。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许多年以后，当不再有文盲的时候，人们将至少受到9年义务教育。到了那个时候，那个最受惠的阶层会保持下去，而那个被排斥的阶层也会保持下去。

1959年以后，我们做到了没有了文盲，没有了失学儿童。但是，在整个学校体系中，在根据学历、经过考试入学的大学里，在社会阶层之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差别。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具有明显的优势。在资本主义时期，后者是穷人中的穷人，他们中有白人、黑人，也有混血种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即使在革命以后，继续严重影响着孩子的前途。来自最低下阶层家庭的孩子们知识比较贫乏，不能得到进入好学校所要求的好分数。根据我们所观察到的，这种情况将延续几十年。如果我们听其自然，可以预言，这些人的儿女将永远成为不了企业的领导人、经理，或占有重要位置，因为，当前没有大学水平的人就什么也领导不了。等待他们的将是牢狱。

拉：怎样改变这种社会决定论呢？

卡：为了纠正这种情况，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教育革命，甚至与我们进程的第一阶段并不协调的革命。我们正在改变这一切。不是剥夺那些能进入好学校的人的机会，他们也是革命者。我们正在把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延伸到全国各地。一方面，这是教育发展必不可少的一步，另一方面又是社会平等化的强有力手段。从几年前开始，我们就召唤那些年龄在17至30岁之间、受过9年教育、又由于某种社会原因或其他原因而没

有继续学业、参加了工作的年轻人。我们说服他们继续学习，为他们开办了合适的、多样的、有吸引力的课程班，甚至给他们一定经济上的帮助。

这是从2001年9月开始的。2005年9月有45000多名这样的学生进入了大学学习。他们将成为最最革命的人，因为这些计划使他们得到了新的生命。不学习，没有职业，没有坚定的社会支持，他们会停留在什么地方呢？

拉：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前途呢？

卡：我要求逐个调查年龄在20至30岁之间，由于一般犯罪而监禁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监狱里的青年居民的案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发现，犯有那类罪行的犯人中只有2%的人是职业人士或知识分子的儿女。您如果到国家最好的学校去调查，会得到相反的结果，那里的绝大多数人是职业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儿女，很少人来自穷人区。好了，我把有关资料都给您了。

现在我们正在完善教育领域所做过的事情。艺术指导员学校的1.6万名青年——他们在负有盛名的机构中学习——的社会和种族构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舞蹈领域——有的种族在这方面具有先天的优越条件，在戏剧、音乐、绘画，总之，在所有艺术领域都是如此。这让我们非常满意。在那些专为没有一技之长的青年人开设的班里，我们贯彻“学习即就业”的新观念。目前，有11.3万名学生在这些培训学校学习。有新设的医疗专业的科系，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的表现越来越突出。还创立了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几百个电脑俱乐部、多学科信息俱乐部。还有一家享有盛名的信息科学大学，有8000多名学生。

如果某个人的才能不适应某项活动的要求而需要“合理安排”，我们会让他去学习，工资照付，当然总是本人自愿的。在我们的条件下，低效率的经济活动付出的代价总是高于更高质量的学习所需成本的。

拉：古巴有多少大学生？

卡：在我们的大学里目前有 60 万名不同学科的大学生。可培养或可再培养的公民可以从一个行业转到另一个行业，他们将能做很多事情。大学生中，有 9 万人是没有学历和职业的年轻人，许多人来自平凡家庭，而今天在大学的学习中有了出色的表现。现有 958 个大学区，有 169 个属于高等教育部的市级区，有 84 个设在旧的甘蔗厂里的大学区，18 个设在监狱（这是一种全新的事物）的大学区，169 个市级的公共卫生大学区。1352 个设在门诊所、卫生所、血库的教学区，人们在那里学习与公共卫生有关的专业知识。有近 10 万名高等教育的教授和副教授。许多过去在糖厂官僚机构和其他地方工作的人，今天在那里讲课，是副教授。大学生和教师——不包括大学里的其他工作人员——总共有 60 万名左右。



我
的
一
生

第二十章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访问



托里霍斯和巴拿马运河问题—卡特和马列尔危机—头几次
碰面—历届美国总统—巴雷拉法案—修改宪法吗？—回答

回答哈特才·米吉德总南国美 章十二第

拉：您于2002年邀请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ames Earl Carter）访问古巴，他后来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做出了那个邀请？

卡：首先，我对他的看法一直不错，认为他是个有道德的人。他的对古政策具有建设性。他是最值得尊敬的总统之一，有伦理，有道德。我记得1976年《花花公子》杂志对他所做的那次有名的采访^①。在那次采访中，他以十分健康的心态回答问题。

拉：您是《花花公子》的读者吗？

卡：不是。但由于它登载了很有意思的卡特采访记，我就拿来看了。什么都问，甚至问他是否一贯忠于其妻子，是否从未犯过错误，而他回答说：“哦，犯过思想上的错误。”他有说出那种事的诚实态度。卡特不会撒谎。我跟您说，那时，在他当选之前，我就直觉感知他是一个具有伦理原则的人，而他的这种原则是以真挚的宗教情感为依据的。

拉：在其1977—1981年总统任期内，卡特执政时，未发生过特别的危机吗？

卡：没有。当我发觉他将赢得1976年大选时，存在着一些悬而未决

^① 罗伯特·希尔（Robert Scheer）：《采访吉米·卡特》，《花花公子》杂志，1976年11月。

的重大问题，如巴拿马问题和托里霍斯（Omar Torrijos）^①可能采取某种行动的风险问题，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公开说，如果不把运河归还巴拿马，他将用武力夺回它。托里霍斯是个非常坚决、非常爱国的人。我完全明白那种性质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我同情托里霍斯的爱国斗争，当时我们之间保持着联系。当古巴的所有对外关系中断后，有些人士以几个加勒比国家为依托，为打破古巴的孤立而进行斗争，托里霍斯就是其中的一个。

托里霍斯要求归还运河并就此问题达成一项合理的协议。我对卡特了解不多，但我几乎习惯于从远处，通过某些迹象来了解要人名流。根据卡特的声明、他的演说，我发觉那个可能成为美国未来总统的人，是个具有宗教渊源的老实人。同时我也发觉，托里霍斯的那些言论可能迫使他采取激烈的行动，而对一个像巴拿马那样的小国来说，这可能是个不祥的行动。因此，我敢于建议他等待美国大选的结果，提议他要有耐心。

当时执政的还是福特^②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Rudolph Ford）并不好斗，但他是继尼克松之后一个过渡性的总统。我实际上对托里霍斯说了两件事：“我相信卡特将赢得大选”——这一结论是分析了那时的各种因素后得出的，并补充道：“我认为，他是个能理解问题的人，跟他可以达成一个有关运河的协议。”这是真的。我不止一次对他这样说。这他自己讲述过，我只是在叙述他早已讲过的话。

拉：托里霍斯自己讲过？

卡：是的。更确切地说，他没有讲过我所说的话，而是讲述我对于用武力夺回运河的主意所表达的看法。他在访问古巴时曾表示感谢。

^① 奥马尔·托里霍斯（1929—1981），巴拿马将军，总统（1968—1978）（原文如此。托里霍斯1968—1981年任巴拿马国民警卫队司令，1972—1978年任巴拿马政府首脑。——译注）。进行了重大的社会经济改革，1977年与美国总统卡特举行谈判，签订了归还巴拿马运河协定。死于一次奇怪的空难中。他儿子马丁·托里霍斯于2005年当选巴拿马总统。

^② 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1913—），在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上台，是美国第38届总统（1974年8月至1977年1月）。

2006年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逝世。（中文编者注）

我在卡特这个人身上发现了一种道德行为。后来卡特不仅赢得了大选，而且还改善了对古巴的态度。他想有所改变。“照管利益办事处”^①的建立应归功于他。

拉：那个办事处是卡特担任总统时建立的？

卡：是的，是在那个时候。那时还出现了领海和 200 海里的问题。我们在离美国和加拿大海岸 12 海里外的海域捕鱼。我们曾捍卫 200 海里权利，以声援智利、秘鲁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结果是，当我们拥有了一支出色的捕鱼船队后，我们却变得无海可捕了。我国的主要渔场之一是靠近美国的海域，那里水温较凉，浮游生物更丰富，因而有更多的鱼。我们一起讨论。卡特甚至准备讨论领海边界协定，还准备同意按我们与加拿大的做法继续捕鱼。当然喽，这些允诺是经过反复讨论、大幅削减后的结果，而且还附加了其他一些限制配额、提高成本的条件。

托里霍斯—卡特协定的签订、一些措施的采取、“照管利益办事处”的建立，所有这些都是卡特时代的积极步骤。那时的形势很困难，1975 年开始的安哥拉战争仍在继续，但卡特是位愿意处理好与我国存在的诸多问题的人。

拉：但出现了马列尔移民危机，对吗？

卡：对。发生在 1980 年，我们已经谈过这件事。但马列尔危机得以平息，恰恰因为当时的总统是卡特。总的来看，他态度良好。我们也不愿意因采取固执的立场而帮助里根和极右派获胜。发生了伊朗问题^②，

^① 美国驻古巴“照管利益办事处”和古巴驻美国“照管利益办事处”是个委婉语，以便双方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在哈瓦那和华盛顿设立各自的代表机构。美国在吉隆滩入侵前 4 个月即 1961 年 1 月与古巴断交。

^② 1979 年 11 月，正当伊朗伊斯兰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一批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支持者袭击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并劫持了 52 个美国人当人质。一切解救的尝试都失败了。卡特授权派遣特种部队去解救人质，但由于技术问题和途中发生的事故，远征失败了。1981 年 1 月 20 日，当卡特任期届满、里根接选总统时，人质被伊朗人释放。

以及试图用武力解救美国驻伊大使馆的人员，这是不必要的，而且那样做可能会导致牺牲生命和一场血腥的战争。马列尔事件是由躲在大使馆里逍遥法外并得到外国支持的人引起的。

拉：在秘鲁大使馆，对吗？

卡：在秘鲁和委内瑞拉大使馆。在外来的指令下，他们甚至要把人送回家去，但是后来决定召唤一些已经被送回家的人，重新把他们送到为数不多的使馆中去，因为那时与我国建交的拉美国家并不多。一些罪犯开着一辆小面包车强行进入秘鲁使馆并被接纳。死了一名警察。

第二天，我们撤走了保卫使馆的卫队，人们立刻明白撤走卫队意味着什么，随即有许多流氓闯入使馆。这意味着将在无签证状态下，以政治难民身份前往美国。那些人挤满了使馆。宣传蒙骗了卡特，使他相信“被奴役的人民”愿意接受美国民主的庇护。然而，进入使馆的人是些不折不扣的流氓，而对流氓从来不会给予签证的。

拉：全是流氓吗？

卡：绝大部分是，但总有个别不是。

拉：进入的人有成千上万，对吗？

卡：大概有 10 万人。

拉：10 万！但可能没有地方待。

卡：是的，几乎装不下。而就在那时卡特出了个坏主意，他说在美国“他们将受到热情的欢迎”。于是出现了马列尔危机，卡马里奥卡（Camarioca）危机的翻版（见第十六章关于移民危机）。

卡特在伊朗问题上已经遭到了比较沉重的打击，这时又犯了错误，我

认为这是个真正的错误。《修正案》^①自那时起至今一直完全有效。

拉：他来古巴时您向他提过这事吗？

卡：我不能揭人家的短。那件事成了他不能再次当选的部分原因。首先产生了伊朗问题。事实是，那件事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卡特。正当他谋求连任时，他的远征伊朗失败了。

拉：为解救困在德黑兰使馆内的美国人质而进行的那次远征失败了。掉下了一架直升机。

卡：卡特还遇到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石油价格飞涨，这对他来说也许是更糟糕的，给右派、给里根的人开辟了道路。

肯尼迪的兄弟参议员也是总统候选人，他在当时是个相当有影响力的人，非常善谈，在初选中一路领先。

拉：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是他吗？

卡：爱德华·肯尼迪。真是个传奇故事，因为尽管发生了查帕奎迪克灾难^②，那位姑娘在事故中淹死了，那个男人却在民主党内激发起一股巨大的力量。伊朗问题中断了那个进程，于是右翼人士争取到了相当多的支持。卡特成了最弱勢的候选人。我相信，那时唯一能击败里根的人也许是特德·肯尼迪（Ted Kennedy）^③。人们对那个令人遗憾的插曲已经淡忘了。克林顿也有相似的丑闻，但不是因为性质类同，而是因为同样被人家炒作利用，尽管他坚持到任期届满才下台。

① 《修正案》（Ley de Ajuste），即《修正古巴难民身份为美国合法长期居民身份法》（Ley para ajustar el status de los refugiados cubanos a la de residentes permanentes legales de Estados Unidos）的简称。（译者注）

② 1969年7月19日，爱德华·肯尼迪在查帕奎迪克发生了一次奇怪的车祸，造成他的女秘书玛丽·乔·科佩奇尼死亡，引起了巨大的风波。

③ 特德·肯尼迪，即爱德华·肯尼迪。（译者注）

拉：您说的是莫妮卡·莱温斯基（Mónica Levisky）那件事？

卡：是的。更令人遗憾的是选了现在这个[乔治·W. 布什（George W. Bush）]当接班人，而且还是通过贿赂选出来的。

拉：你们制止了马列尔移民潮是为了不给卡特争取连任制造问题？

卡：是的。你瞧，当我们制止马列尔移民潮时，比如说，我们已经能够讨论《修正案》了，但是我们没有那样做，因为我们不愿意浪费时间，使卡特在那个政治进程中受到伤害。我们甚至还解决了由美国自己制造的一个问题：劫持飞机问题。因为我跟你讲过，对那些从美国劫持飞机抵达古巴的人，我们的惩罚日益严厉，直至判处 20 年徒刑。

拉：就是在那个时候你们决定系统地把劫持美国飞机的人遣送回去吗？

卡：在古巴的惩罚阻止不了劫持者们的行动。卡特的任期在 1981 年 1 月结束，那时里根即将就任总统。我们于 1980 年 9 月 18 日首次把劫持者遣送回美国。我们跟卡特政府办理此事。

实际上，我们跟卡特做了两件事：制止马列尔移民潮和把头两个飞机劫持者归还给他。令人痛心的是，他们都是古巴人，像其他一些人那样是非法进入那个国家的，而随后又想回来。正是那些人，为了回来，有时他们劫持一架飞机，而不顾将会受到的惩罚。但我们只与卡特办理此事，因为他所持的立场更具建设性。

我记得他们被判处 40 年监禁。我们曾公开提醒人们注意这种措施，因为事实上，当出现一架被劫持的美国客机时，发生灾难的危险是实实在在的，而单纯的惩罚是不够的，显然只有遣送回去才是解决的办法。但他们从来不遣返劫持者，反而予以鼓励，不给予惩罚。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决定把劫持者归还给美国当局。这是真实的历史，是史实。

拉：您从未感到卡特太敌视古巴……

卡：虽然卡特是一个可恶的帝国主义的头子，但我感到——我已对您

说过——他是一个具有道义的人，他不是杀人犯，也不是种族灭绝主义者。我所读过的他的东西，各种声明、访谈等，表明他是一个规矩正派的人，而对管理着一个享有那么多的利益和特权、那么多的优惠和权力的国家的人能做到这样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拉：而且还受到那么大的压力。

卡：还处在“冷战”时期。但是我想说，他是我所认识的美国总统中最好的，这与我对其他每一位总统的评价没有关系。我对肯尼迪、克林顿都有我自己的看法，我必须对他们每一个人有某种看法，因为我每天在阅读消息和情报，面对帝国主义的仇视和敌视。

拉：您把从艾森豪威尔至今的所有总统实际上看作对手呢，还是不管怎样，看作是与古巴有着最艰难关系的国家的总统呢？

卡：我们是些很容易激动的人，但是不抱仇恨。仇恨是另一回事，它不知从何而生，可能就存在于人性之中。有的人能够比较心平气和，而有的人则很容易激动；可能蔑视或轻视一种政治制度，可能对一种政治制度抱有极坏的看法，但不仇恨人。

由于我们信奉的学说，我们不抱仇恨。应该有一种具体的人类观，而另一面是把问题人格化，把罪责归咎于某个人，而这个人也许被推上了某种特定的立场，因而身不由己，不能做任何其他的事，也许都不可能诚实做人。

在那个伟大的巨人般的国家，在那个伟大的巨人般的帝国，像在罗马帝国那样，出现过一些聪明的、光彩夺目的皇帝，也出现过另一些……好了，那儿有一个，据苏埃托尼奥（Suetonio）^①说，他令其坐骑当领事。

^① 盖奥·苏埃托尼奥（Gaius Suetonio, 70—160），罗马历史学家，生活在图拉真（Trajano）和哈德良（Adriano）两位皇帝时代。著有：《12个恺撒的生活》（*La vida de los doce césares*）。

拉：卡利古拉（Caligula）皇帝^①。

卡：本人对罗马历史基本上全知道。本人说的是历史，尽管历史也充满了趣闻轶事。

美国的总统们各不相同：有的夸耀自己没有读过一本书或者只读过一两本书，有的只读过很少的书，而另一些则读过许多书。比如约翰·肯尼迪，他是个读书很多的人，一个有文化的人，写了著名的《勇气剪影》（*Perfiles*）一书^②。此外，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名战士，指挥一艘鱼雷艇在太平洋上作战，还在战火中协助救出了几位同志，并被授勋嘉奖。

拉：您把卡特总统放在有文化者的行列吗？

卡：依我看，卡特是在美国总统这一职位上所能表现的最诚实的人。此外，他还得承接因越南战争而留下的那份遗产：越战费用总计 5000 亿美元，几乎花光了所有的钱财；黄金储备从 300 亿美元——按 35 美分 1 盎司^③计算——锐减至 100 亿美元。这迫使尼克松于 1971 年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决定在无法定含金量的情况下自由发行美元。他这样做就单方面撕毁了布雷顿森林协定^④。金价上涨，而伴随而来的是石油危机。人们寻求黄金，把它作为可靠的东西，却不信任纸币。于是金价上升至每盎司 300 美元或更高，而他们原来剩下的 100 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一下子变成了 3000 亿美元。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时代，按 35 美元 1 盎司计算，美国的黄金储备是 300 亿美元。那样的一些现象被遗忘了，拉莫内，有那么多的东

① 卡利古拉（12—41），罗马皇帝（37—41），本名 Gaius Caesar，专横残暴，后被刺杀。（译者注）

② J. F. 肯尼迪（J. F. Kennedy）：《勇气剪影》（*Pérfiles de Corage*），另译为《当仁不让》，是一部有关美国历史上 8 位最勇敢的参议员的著作，荣获 1957 年普利策历史奖。作者通过这些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崇拜个人牺牲、献身事业、性格坚强等价值特征。

③ 原文如此。（译者注）当时每盎司 35 美元为规定价。（中文编者注）

④ 布雷顿森林协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资本主义列强签订的，规定货币对黄金的平价（35 美元 1 盎司）并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及其专门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西被忘却了。

我跟您说，我对卡特的看法一向很好。您问我他怎么样。我是怎样认识他的。是2000年十月初在特鲁多的葬礼上认识的。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死了，他是个伟大的朋友，一个非凡的人物^①。

拉：他曾任加拿大总理，不顾美国的压力，与古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卡：是的，他是个很高贵的人。我记得他来的时候，他的儿子才三四个月。不久前，他那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在一次事故中死了^②。是个悲剧。

我们把特鲁多带到一个我经常去的小岛，那儿除了灯塔看管人住的屋子外，什么也没有。那是一所废弃的老房子，已有一百五十多年或差不多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后来给它加盖了屋顶。特鲁多和他的妻子就睡在那里。我们在屋子外面，在海边谈了很多。他是一个我真正仰慕的人，他不止一次来过古巴。他是运动员，喜欢在江河中航行。拥有一艘深水潜水艇或这类设备，在格陵兰海岸对面的水域寻找“卢西塔尼亚”号轮。^③他就是这一类型的人，喜爱大自然、十分健康的人。或许卡特在加拿大也能成为像特鲁多那样的人，但在美国就不可能。

拉：您去参加特鲁多的葬礼并在那里遇见卡特的吗？

卡：是的，在渥太华，2000年10月。我早已认识他，不知道是否是在另一场合、另一时间还曾与他见面。他卸任后，继续其政治生涯，创建基金会并从事其他学术、社会和政治活动。正如我跟您说过的，他的伦理不像我们中的许多人的伦理那样来自某一政治理论，而是产生于他的宗教思想。

① 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1919—2000），1968—1979年和1980—1984年任加拿大总理。

② 指迈克尔·特鲁多（Michel Trudeau，1975—1998），他于1998年11月15日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发生的一次雪崩中丧生。

③ “卢西塔尼亚”号轮（Lusitania），英国豪华游轮，1915年5月7日被德国潜水艇的鱼雷击沉，当时船上有大约2000名旅客。

拉：卡特是新教牧师，对吗？

卡：对。那是在特鲁多的葬礼上，我们相见，我们交谈。啊！我以前见过他，好像是在1989年1月卡洛斯·安德列斯·佩雷斯（Carlos Andrés Pérez Rodríguez）的〔（第二次出任总统的）——中文编者注〕就职典礼上。

拉：在委内瑞拉。

卡：是第二次，因为卡洛斯·安德列斯在任上再次当选总统。在他的第二任就职典礼上，在加拉加斯，我认识了卡特并与他交谈，谈得不多。我在那儿还与罗伯特·肯尼迪的遗孀交谈，因为在约翰·肯尼迪被刺杀之后，肯尼迪家族与我们建立了联系，进行交流，发展着一种真正的友好关系。这些都是本人不被仇恨驱使的证明。

拉：约翰·肯尼迪的儿子也来过？

卡：在他最后的一次旅行中，肯尼迪的儿子来过这里，那时他还是个孩子。

拉：杀害他父亲的时候，约翰·肯尼迪只有两三岁。

卡：他是《乔治杂志》社的主管。他与我共进晚餐，我们谈了两三个小时。不久以后，1999年7月，他乘坐的那架轻型飞机夜航失事，他本人和妻子遇难。那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悲剧。唉，肯尼迪家族已经有过好几次这样的悲剧了。

拉：好几次，是的。

卡：但那一回他们是去委内瑞拉，我在那里认识了罗伯特·肯尼迪的遗孀。我还认识一个名叫尤尼丝（Eunice）^①的姊妹，她的丈夫就是1961

^① 尤尼丝·肯尼迪·施莱佛（Eunice Kennedy Shriver），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和爱德华·肯尼迪的姊妹，玛丽亚·施莱佛的母亲。后者是电视台记者，电影明星阿诺德·施瓦辛格的妻子。施瓦辛格于2003年10月当选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

年组织和和平队的萨金特·施莱佛（Sargent Shriver）。我认识鲍勃·肯尼迪的许多子女。

拉：您在1989年首次与卡特会面。

卡：对。那次，在加拉加斯，在下榻的双子座大厦。我们谈了一会儿，他想以某种方式处理古美关系。他派他的人到古巴来谈，但总有要求。那时有安哥拉的形势或萨尔瓦多的革命斗争问题，就是说，存在着我们不能做出任何让步的情况和问题，然而有个人愿意改变对古巴的政策，而这个人就是卡特。

那是美国发生两位数通货膨胀的年代。越战的后果，越战的代价。1979年还在伊朗发生了伊斯兰革命，中东最强大的宪兵被打败了，可以说，是被群众运动打败的。这是一个非凡的例子，说明在特定的时候，人民可以依靠情感、思想和英雄主义，在实际上不放一枪的情况下打垮最强大的军队。伊朗的例子是个历史性例子。所有这些后来影响了他再次当选。

拉：这对卡特的再次当选是致命的。

卡：是致命的。哦，对卡特来说，处境本来就非常困难。但对民主党挑选一个总统候选人来说，也是致命的。记得我与您讲过，那个时候出现了爱德华·肯尼迪。面对损害卡特的那些问题，我再与您重复一遍，首先：在伊朗发生的事，解救入质的无效尝试，那是一次实际上不知道如何说服卡特把它进行到底的行动，因为卡特是位聪明的政治家。有人可能给他灌输了一种吉隆滩式行动或某种类似的行动计划。问题是那次军事行动对他造成了伤害，而他是要争取再次当选的人，结果落选了。第二，或第一，要是您愿意的话：两位数通货膨胀，以及石油价格暴涨。不应忘记，差不多是在他执政期间油价升至今天（2003年1月）的水平，即每桶35美元。

所有这些因素汇集在一起。在初选中出现了一位有实力、横扫千军的候选人，他就是爱德华·肯尼迪，一个无可争辩的有才华的人。甚至有人说，他是肯尼迪家族中最杰出的政治家——他的亲属如此描述。他正处于一路

领先之时。但是，当国外产生上述问题时——几乎是一种自然规律，每当发生某种对外政策现象时，意见看法就会趋于一致，而那种现象恰恰发生在肯尼迪有力地冉冉升起的初选进程中，那种形势突然变了，产生了围绕在卡特总统周围的情势。

所有这类事情通常总会被夸大，不是由于其本身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其在美国国内具有无可置疑的反响。人质问题有点儿重要，但是个可以解决的问题。不是两分钟或两天能解决的，这也是事实。涉及一个受辱的大国，它会傲慢地做出反应。

拉：那件事使得超级大国有点儿出丑。

卡：那件事引起了巨大反响，改变了大选的趋向。正在与爱德华·肯尼迪竞争并在民调中处于落后状态的卡特，自民主党初选之后就开始上升并最终成了候选人。在那种时候，卡特不可能赢得第二次大选，但也许肯尼迪能赢，奇怪得很，是他做了宣布卡特为候选人的演讲。无疑是一篇出色的演讲。

1980年能战胜里根的人，名叫爱德华·肯尼迪。许多人根本不谈这件事，或者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与一些人交谈过，他们对此甚至提出质疑。然而，这是我所持的观点，我对那些天的情况记得很清楚。

后来里根上台了。如果说尼克松进行无税战争，那么里根用来自印厂的钞票加强军备。公共债务成倍增长，这是现今布什以同样方式在干的事。布什正在把世界引向灾难。

后来，当卡特来古巴访问时，我们对他有进一步的认识。我们了解了他的经验、他的敏锐性和外交熟巧程度。我还知道了他了解得不太清楚的事情的疑点，他对这些疑点问题的看法可能有些天真。

拉：您邀请他的动机是什么？

卡：我们先是在委内瑞拉相遇，后来又在加拿大会面，我们谈了话，是我亲自对他说应择日访问古巴。因为实际上，只通过书面材料是不能了

解一个国家的，而如果这些材料是由对手写的，那就更不能了解了，因为有关这个国家的材料差不多全是教条式的概念……我说：“哦，最好安排一次接触，以便多些了解。”

关于他的活动的消息，总有一些传到这里。在特鲁多下葬时我去了加拿大，我们在那儿的一个仪式上——记得是在一个教堂里或在进入教堂之前——我与他交谈了几分钟，我向他问候，对他提起我们在加拉加斯的谈话并对他说：“我们正在等待您的来访。”我再次提醒他访古。于是他对我说：“对，我很快就去。”就这样，有一天传来消息说，他已决定访问我国。

当然喽，就像对待所有来访者那样，我们建议他安排访问计划并确定所有要谈的问题，告诉他想谈什么就谈什么，想跟谁谈就跟谁谈。在大学：“说吧，把您的想法说出来”，而他的所有想法跟我们的截然不同。那是两种不同的生活观、社会观、政治制度观、政党存在观，以及在许多其他问题上的不同观念。

拉：卡特在大学的演讲，我看了有线新闻电视网（CNN）的直播，我觉得既大胆又诚实，以相当坦率和直截了当的方式说出了他的不同意见。当时您感到吃惊吗？

卡：在大学的演讲我陪着他。他在那里做了一个言辞激烈的演说，有些学生与他辩论。他结束演讲后，我站起身来，走上前去，向他致意。我们随后去看棒球赛，体育场内座无虚席。我在那儿说服了他，之所以能说服他是因为我先说服了他的卫队长。我对他说：“喂，咱们上场吧。”我让他投掷第一个球。我对卡特说：“我们上场吧，但我喜欢只有您和我两个人上场。”那里有6万名观众。

拉：场上没有保镖，没有别的人。

卡：没有，没有，就我们俩。我已经试探过，看看在那件事上他的卫队长是否是位能被说服的人。而要说服我的人却不怎么容易，但我最后可

以对我的卫队下命令，他们必须服从，因为你说：“这是命令！”当时我跟我的卫队争论起来，我对他们说：“这事我已经跟卡特的卫队说好了，就我们两个人上场。我们从球员休息室出来，必须走 100 米左右才能到达本垒，必须从观众席前经过，所以就我们两个人去。”

拉：直至场中央。

卡：直至投球点。看台上观众极多，而出场的就我们俩。后来我跟他开玩笑，因为有一些人由于他在大学演讲时说的话而发怒了。

拉：我们谈谈这事。

卡：发生了辩论。后来，我与他继续会谈。一切正常，但会谈结束时我对他说，我们在这里友好地、理性地交换了看法，交换了意见，并说：“请您听我说，幸好所有去那个体育场的人，在直播您的讲话时已经在那儿了，所以没有听到；否则，我们就有麻烦了。”因为那些人兴高采烈，十分友好地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俩。但我对他说：“幸好那些人没有听到您在大学的演讲。”他的演讲在这里引起了争论。

拉：卡特的演讲在这里做了直播吗？

卡：全部直播。但既然我们已经说了：“愿意来的人……”包括布什，我们将为他组织听众，让他在广场上演讲。因为布什去了迈阿密并发表了演说。

拉：您也邀请布什总统来访吗？

卡：我们告诉布什，我们愿意讨论问题，我们将为他召集全体公民。我们也邀请所有的军人、所有的领导人和所有的干部。

请允许我告诉您，人民中绝大多数毫不犹豫地支持革命进程。如果是看法问题，我们准备在革命广场上跟愿意到这里来讨论问题以说服人民的人进行讨论。如果需要，我们将开动所有的扬声器，让他们在所需要的时候

间内向人民做解释和进行讨论，因为这不是以教条为生的问题，而是在论据和道理的基础上坚持自己所想和所捍卫的东西的问题。

拉：就是说，G. W. 布什总统可以到这里来发表他的意见并进行讨论，你们允许吗？

卡：我们允许，但是人家不允许他这样做。

拉：是的，可能人家不允许他这样做。

卡：但是，如果他们想这样做，就能成。在这儿，聚集在革命广场，比在华盛顿要安全得多，因为这是一个有政治修养的人民。这个人民不是狂热的人民，不是用狂热和仇恨教化出来的人民。假如我们是用仇恨教化的人民，那么我们将什么都不是。一个人只要坚持自己的思想和信念而不是依靠狂热，就能在某项事业中具有永久不衰、日益增长的力量。

我们在革命斗争中从未怪罪过美国人民，尽管在一定时期，大部分美国公民相信所有的反古言论，相信我们是对美国安全的一种危险等等。在美国历届政府的反古政策中，存在着一些非常令人遗憾的插曲。然而，给予美国公民最佳接待的国家是古巴。

拉：更加安全吗？

卡：更加友好。因为没有播种过仇恨。人家通过新闻媒体，甚至通过谎言或诬蔑使人民相信了这事和那事，而如果因此去怪罪这个人民，那是愚蠢的。

从未宣称怀恨过谁。这不是由狂热分子组成的人民。您谈到了安全。这儿可以给美国来访者提供这种安全，因为不仅是安全部队，而是全体人民，有觉悟的全体人民在照看来访者，尊重来访者，与来访者讨论，尊敬地倾听。

我们有两个例子。一是1998年教皇保罗二世来到革命广场。在这儿，

教皇完全自由地发表演说。他所宣扬的东西并不符合革命的思想 and 学说，但这与你对教皇这个人及其功绩的见解无关。毫无疑问，他是个非凡人物。他的个人思想及其十分顽固的反社会主义立场的历史原因，我已向人民做了解说。他在这里，在我们的祖国，围绕他的是钦佩和尊敬。

教皇还出席了在古巴圣地亚哥举行的一个集会，所有的人都去了。在那个场合，发表演说的人当中有人讲得非常难听，非常难听。于是人们逐渐离去，广场变得空荡荡的，留下来的人也许只有十分之一。我从电视中目睹了这一幕，电视台必须寻找角度，以免出现无人的场面……劳尔在那里，是我请求他去圣地亚哥的。然而，那儿没有抗议的喊声。这儿^①对人民说：“不贴标语，不搞海报，不喊反对的口号，不要喊叫；如果人家对某件事不赞成，这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有政治教养的人民，明白那些只是形式。因此，欢迎教皇的不仅是那些信徒，还有全体人民。此外，我亲自做过两次电视讲话，因为必须保证人们清楚地知道他的人格、他的历史、他对穷人的支持，总之，要让人们知道他是谁，是怎样一个人。

因此我对卡特说：“好，我们可以在这里挤满广场，你们来吧，来说服人们，使他们相信革命无用和为什么无用。坚持你们的论据，展开争论。我们提供全国人民和全国所有的电视台与电视机。”于是我们邀请了他们。

拉：您提到了卡特在大学所做的并被直播的演讲，卡特总统在其演说中提及一项动议，即所谓的巴雷拉法案。据我看到的材料，这项动议的依据是古巴宪法的一个条款，该条款规定法律动议不是国会的专利，公民也能提交法律草案，只要是代表了不少于1万公民的意愿。

这一法案好像是由1万1千多个公民签署的，而卡特总统当着您的面提到它。书面媒体全文刊载了他的演说。我想就这件事向您提个问题：您认为提及巴雷拉法案最终是卡特总统犯的一个触觉错误，一个不正当做法，

^① 此处应该是指古巴政府，但卡斯特罗并没有明说。（中文编者注）

一种侮辱吗？

卡：绝对不是。我已对您说过，他来了，他决定访问计划，与所有想见的人会晤，绝对的自由。没有任何侮辱可言。我们怎么能叫卡特来古巴访问，却处处限制他，限制他说什么话呢？因此不是，绝对不是是一种侮辱。

拉：您对那个巴雷拉法案怎么看？

卡：您可以对那个动议做个政治分析和法律分析。我想谈一谈这件事，但不带任何偏激情绪。

我们可以说，那是美国或美国政策搞出来的几十个创造中的最近一个。这最近一个创造，就是利用费利克斯·巴雷拉（Félix Varela），一位具有先进思想的古巴神甫。比如，他反对奴隶制度。他的一系列主张，我们可以说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是非常人道的。他是头几个谈论独立的人之一，因为在那个年代，我是说在19世纪初，对于独立谈论得不多。在那个殖民地年代，在那些十分孤立、具有爱国思想的公民群体中，巴雷拉是位有威望的古巴知识分子，一个高贵的人，一个怀有爱国主义情操的人。我已说过，我们那时是个奴隶制社会，有几十万奴隶。

在那个世纪，古巴出了几个光芒四射的思想家，例如何塞·德拉卢斯·伊·卡瓦列罗（José de la Luz y Caballero），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这批主张变革或主张某种自治或在那个殖民制度内进行某些改进的人中，就有费利克斯·巴雷拉神甫。

他后来移居美国。他在那里是个备受尊敬的人物，是个在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之间深受钦佩的人。何塞·马蒂是那个世纪古巴思想的巅峰，还有其他许多人，但巴雷拉是最早的几个之一，是一种思想的先驱，这种思想逐步向反对奴隶制、要求独立的方向发展。哈瓦那大学大教室里存放着巴雷拉的骨灰。这就是巴雷拉的故事，一个美丽的人文故事。

后来出现了把巴雷拉溢为圣徒的主张。我们尊敬并钦佩巴雷拉，但我们把他看作一个民间人物，一个世俗人物。由于在特定时期——我们已经谈过——在初期，在革命的头几年，与天主教会发生了一些冲突，美国——

大家知道——也企图加以利用，制造宗教对立，制造一种反宗教的革命形象。这也是想利用教会的帝国主义企图。

拉：我原来不知道教会想把巴雷拉神甫溢为圣徒。

卡：当出现把巴雷拉溢为圣徒的主张时，我们中许多人疑惑不解，几乎把它看作是一种企图，即企图将一个世俗的、备受尊敬和钦佩的人物变成宗教人物，变成一个圣徒。哦，我可能赞同，但也应该——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说的——把其他许多古巴人溢为圣徒。

比如说，应该把切·格瓦拉溢为圣徒，因为假如你由于爱国者们的仁慈、牺牲精神、能为某种事业牺牲生命、成为人类的烈士而要把他们封为圣徒的话，那么有很多人应该受封。许多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战士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信仰，他们为反抗暴政而牺牲，为反对压迫制度而死去。还有一些人为遭受帝国进攻的祖国在吉隆滩战斗而牺牲。

我不想干涉教会的任何事情，但是我说过，我有些疑惑不解。然而，我们甚至连最微小的抗议都没有提过，甚至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实际上，巴雷拉是位世俗人物，是一个爱国者，最好保持他的这种身份。我们要把巴雷拉，一个属于所有人的人物，变成只属于某个教会的圣徒吗？尽管这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非常值得尊敬的，也受我们尊敬的教会。我们并不感到高兴。

回到您提的问题，即巴雷拉法案问题上来。挥舞他的形象来反对革命的企图是又一个卑劣无耻的企图，而每一次这样的企图都有巨大的宣传效果。

我刚才不得不多用了些时间，对您讲了一些舆论界必须知道的事情。我觉得需要让您知道谁是巴雷拉，因此我多用了几分钟。现在我准备就您提的关于所谓的巴雷拉法案问题中您更感兴趣的细节问题做一答复。

拉：您是否特别反感反对派利用如巴雷拉神甫或何塞·马蒂本人这些

人物的名字？

卡：您所说的“反对派”，如果是指利用马蒂的名字在迈阿密的那批人，那么这个“反对派”是个事实上的恐怖主义黑手党。至于巴雷拉，一位受全体古巴人尊敬的历史人物，却被人利用来搞那样的新阴谋。何塞·马蒂，他是我国最受崇敬、最神圣的人物，而他的名字同样被人用作一个非法的、颠覆性的和破坏稳定的广播电台的名称。

拉：设在迈阿密的那个吗？

卡：是当代建设的最大的谎言工厂。此外，这个名字还被用作一个同样非法的电视台的名称，这个电视台先是通过一个在3000公尺高空的卫星，现在又从一架飞近古巴领空的飞机上转播节目，毒化国际舆论。它们是美国政府的官方机构。

拉：回到巴雷拉法案，古巴议会对那个有1万1千人签名的要求会怎么办？会给予答复吗？

卡：您谈到了一个法律层面，谈到有1万个签名就可提出一项动议。

拉：一项法律提案。

卡：一个提案。我国宪法——我想像所有其他宪法那样——规定谁有动议权。于是，很多人都有动议权，如群众团体、工会、妇女、青年、学生、议员、领导、部长……就是说，可以做法律动议的人多得不知其数。差不多所有宪法都涉及这个主题。我不能告诉您，比如在美国是怎样的，在墨西哥是怎样的，或者在其他拉美国家是怎样的，但是我国宪法规定1万人可以提出一个动议。好了，这个宪法机制就是搞那一阴谋的合法工具。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件事他们整整议论了一年，他们至少应该议论了一年，试图征集1万个签名。关于这事，有个我不想专门谈及的故事，但我应该补充一句：那里有猫儿腻。

拉：为了征集签名？

卡：您看，对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拒发签证的人，人家承诺予以办理。所有这一切都得到设在美国的那些组织的支持，得到它们的经济资源的支持。与传统的竞选活动一样，那儿有金钱交易问题。这种事在古巴已经消失了。

拉：您是说那些签名中有些是用金钱买来的？

卡：什么都有，包括贿赂。另外，有一些签名还需要核实，因为你必须核对核实资料，你必须深入查验。1万1千实在太少。征集800万……

拉：在一次正式投票中？

卡：不是在一次投票中，而是在2002年5月20日布什的迈阿密演说之后。在那次演说中，布什实际上要求古巴更改宪法，废止社会主义制度、法律和各种规定。那是针对其迈阿密的朋友们所做的一个真正的鼓动性演讲，正是那些人决定了他的总统竞选，这是大家熟知的事，就像大家都知道2000年11月的那次弄虚作假的选举是用什么方法进行的：政客方法，因为为了让布什当选，连死人都投了票。整个美国黑人族群不能行使其权利，因为禁止他们上学。还搞技术舞弊，更改候选人的顺序。一个在某区连100票都得不到的候选人，仅仅由于改变了顺序竟然获得了数千张选票。有些人发觉以后想纠正错误，而他们的选票却被作废了。估计由于这个原因而被作废的投票数额不少于四五万。

拉：这些选票可以使阿尔·戈尔（Al Gore）获胜。

卡：布什在那里仅仅由于数千张选票而获得了胜利。那次巨大的舞弊之后，国务院中新设的各部和关键职位，甚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都任命了与迈阿密的恐怖主义黑手党合伙的人物，而正是这个黑手党给了布什那个作假的胜利。那位先生本人被任命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拉美事务副国务卿。

拉：奥托·赖克（Otto Reich）？

卡：对。我们已谈论过他，一个与肮脏的尼加拉瓜战争有关联的人。海牙国际法庭于1987年做出的谴责美国反对桑地诺革命不断进行侵略的裁决，未被执行；美国自己的法律未被遵守；发生了被称为“伊朗门”的事件，以及所有那些不公正的事情。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赖克都是同谋犯。历史不能无视这一切。

他们真的决定了美国的那次总统选举。是凑巧，不是因为他们有那样的实力，但偶然性使得佛罗里达变成决定争斗胜负的州，而且仅决胜于数千张选票。随后，在国外的军人们的选票继续不断地到来，布什胜了。而他的对手们连一个明智的战略都没有。

他们任何时候都没有想到应要求重选，尽管他们拥有要求重选的一切合法的根据，而且谁也不能说这不是民主的。

拉：他们要求重新计票。

卡：他们要求的是重新计票，而他们应该要求的是在那些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不正常情况的地方重新举行选举。难道一个像美国民主这样如此“完美”、如此“光辉”的民主就不能在某个选区而不是在整个美国进行重选吗？

这有多难呢？只在少数几个选区，在只差上万张票戈尔就可获胜的那些地方就可重选。除此之外，最贫困人群的选举权，美国黑人群体的选举权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他们中多数人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被送进监狱并因此而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是最贫困的人群，上大学的机会、担任私人公司或公共部门要职的机会最少。在狱中待过的人……

拉：就没有选举权。

卡：在许多国家，被囚禁的人没有选举权，在一定时间内失去了权利。在美国，在很多州，就终生失去了权利。我不能肯定在所有的州，但在很多州——您应该知道得比我清楚——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一直没有了这些权利。但是，在佛罗里达州2000年的选举中，甚至不让享有这种权利的

人投票。

这就是决定美国大选的方式。在 1959—1961 年间从这里去迈阿密的
那些人是选举舞弊的冠军。他们引入了一些美国过去没有的东西，比如让
死人投票。就这样让布什赢得了选举。

拉：但是，你们到底拿巴雷拉法案怎么办了？

卡：把关于签名的种种考虑放在一边，把若干数量签名的合法性问题
放在一边，接受那是 1 万 1 千个享有签署一项请求的宪法赋予的合法权利
的人，给予这种待遇，受理了请求书，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有关委员
会进行了分析并给予了答复。

拉：怎样答复的？

卡：我手头没有文件。

拉：概括地说。

卡：简单地说，拒绝了那个动议，拒绝了提议修改宪法的主张，这是
非常合乎逻辑的，如果考虑到如下事实的话：记得我已经提到过，数周前
有 800 多万人，即 98.05% 有选举权的人签署了一份对宪法进行修改的法
律草案，并提交给了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声明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
“不可改变的”。尊重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按规定应有的一切权力，但
改变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权利除外。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在宪法中载
明了的。这是对美国总统布什 2002 年 5 月 20 日在迈阿密的演说中所提
要求的回答。这项法案是由所有的群众团体提出并由那么多数量的公民亲
手签署的，因为这里人人都识字。

拉：那就是最终对巴雷拉法案的正式答复吗？

卡：那就是答复，不是对巴雷拉法案的，而是对布什的无耻要求的答
复。两者差不多是同一回事。

拉：您认为那个答复，那种答复能被反对者们接受吗？

卡：我们进行了广泛的动员，作为对美国总统所提要求的答复。这跟巴雷拉法案没有任何关系，否则就像是用大炮轰击蝴蝶那样的事了。仅在一天内，全国有 800 万人参加了游行，这是以前没有搞过的最大的动员，而且都有拍摄的影视资料为证。

当然，国际传媒是不知道的，但对我国人民来说，这非常重要。法国要改变宪法需要什么？

拉：需要至少参众两院 2/3 人的同意才能修改宪法。

卡：在法国谁有法律动议权，谁就可提出修改提案？

拉：政府可以提出修改提案，可以进行公决投票，但是不会考虑公民签署一项要求就能改变宪法的可能性。

卡：哦，那么我们的宪法比你们的更民主了。在这儿，许多组织、工会，直至一般公民都能提出法案，但提出法案不等于说，你可以简单地把你的法案列入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讨论议程，不等于必须改变共和国的宪法，更不用说提议改变革命的性质了。

因此，简单地说，那个巴雷拉法案，委员会受理了，研究了，也答复了，问题是它的发起人不想接受答复。那一切都是宣传材料。他们大量、无偿地拥有的东西，是一种让国际媒体谈论他们的能力，但他们是一个虚拟的现实。

任何人都可来这个国家，看看古巴发生的事，看看群众组织有什么力量，那些称为持不同政见者而且处于分裂状态的小团体有什么力量。从其采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恐怖主义方式提出改宪这一点看，那个反革命的、亲美的法案是比较明智的。

拉：也谴责封锁。

卡：当然。今天，在这个国家，实际上任何人都找不到 10 个赞成封

锁的人的支持。反对封锁在美国本土都成了一种时髦。

但是，如果你支持其他一切事情，如果你签署一切诬蔑、一切谎言、一切作为封锁依据的运动，以及为封锁进行的辩护，那么你就是口头上反对封锁，尽管世界上已没有人替封锁辩护了。这是我知道的，因为我询问了。

我想跟您说的是，我们的国家正处于一场根本问题的大决战中。其他事情的重要性只是相对的。把那个法案放大，完全是媒体宣传上的需要。这您知道得很清楚。

拉：不光是媒体宣传，因为巴雷拉法案发起人奥斯瓦尔多·帕亚（Oswaldo Payá）^①为人权而获得了萨哈罗夫奖（Premio Sajárov）并去法国斯特拉斯堡（Estrasburgo）领奖。许多评论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说，他不可能离开古巴去领奖。但是他去了，并且相当正常地回来了。那个法案也获得许多政治团体、社会团体和宗教界的支持。您认为欧洲参加了一场反古运动吗？

卡：欧洲对此什么也不知道，这是我可以对您说的，拉莫内。甚至法国总统还发来了一封信，因为有人说帕亚不会去，不允许他去，以及我不知道的其他什么障碍。这没有意义，因为我们通常允许他们出国旅行。没什么重要的，但对于一切反革命集团的领袖和头头来说却是重要的。这些集团反对革命，是由美国的“照管利益办事处”组织的。

您想象不出美国的那个“照管利益办事处”对古巴内部事务的干涉达到了什么程度。把他们召集到那儿开会，向他们寄发读物，给他们送钱。这里，1美元可以购买每天定量供给孩子们的牛奶100升。1美元兑换25比索，4升合1比索。

^① 奥斯瓦尔多·帕亚·萨迪纳斯（Oswaldo Payá Sardinás, 1952—），工程师，所谓巴雷拉法案的名义发起人，是所谓的“基督教解放运动（Movimiento Cristiano de Liberación）”总协调员。该运动是个反革命小集团，宣布“为所有人的自由和人权而斗争”。2002年4月，奥斯瓦尔多·帕亚支持反对委内瑞拉的宪法总统乌戈·查韦斯的政变，2003年获得由欧盟因他“捍卫人权”而授予的萨哈罗夫奖（Premio Sajárov）。

所有那些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不到迈阿密去治病。他们在这里用1美元可以在一定的限额内购买100升牛奶，用100美元可以换得2500比索；他们不用偿付房款，不需缴纳住房税，因为他们是房屋的主人；这里的房租只是象征性的——之所以不给房屋的占用者所有权是因为那些住房构成了工厂或工业的必需品；他们的子女免费享受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服务和优良的医疗卫生服务；他们子女的生活有保障，保证有极高的存活水平，能获得各种治疗，不管是外科心脏手术或心血管手术——可能需要5万美元，还是心脏移植——可能要10万美元——或肝脏、肾脏移植。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些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接受美钞，用来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的生活过得相当甜蜜。

从来不问人家是不是革命者，是否支持革命，是否是持不同政见者。可能有过关照某个人的情况，因为他拥有从外部获得的美元，从而在某种紧缺品的分配上引起一定的腐败。但从来没有歧视这个或那个社会阶层。倘若不信，请找出证据来！当那些组织向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送钱——至少100美元——时，他们享有上述所有的保证。美国人已宣布将汇寄多少个百万美元来帮助几个持不同政见者，而这些人存在是虚拟的，是完全虚拟的。

应该向他们每个人问的问题是，他生产了什么，做什么工作，得到多少奖金。他们随便写篇文章——诬蔑性文章，给那些媒体寄去，给反古的美国电台寄去，而这是法律，现行的法律所不容的。之所以没有依法执行是因为执行与否，乃是国家的权力，是共和国检察院的权力。

在世界任何地方，一个人不能替某个敌对的大国服务，也不能在某个外国政府的命令下工作，不管他做怎样的掩饰。我们有成堆成堆的证据。

所有那些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一个虚拟的现实，就像我说过，他们并不存在，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并且是受美国的“照管利益办事处”领导的。

他们之间有分歧，因为一些人说愿意跟政府谈判，而另一些人说不愿意。但我们不受别人的摆布。如果我们尽心关注或在这里搞一次议会辩论，人家将驱逐我们，宣布我们是白痴，因为有一小撮人或者可能有1万人希

望我们这样做。

拉：但 1 万人是宪法所规定的。

卡：是的。他们有动议权，而在这件事上，我们也有代表数百万古巴人的权利。但是，关注有关的细节问题没有用。那些不正常情况，如重复签名，有时没有姓等等，这些我们知道，但这不是要讨论的主题。

我们的出发点是，假设那些签名是真实的，每个人都有权签名，所有的签名都是自发的，没有考虑私利，没有考虑好处，也没想获得去美国的签证。我们把这些统统忘掉，从一切都是诚实的这一假设出发。它们进入了相关的法律程序，而议会委员会行使了它的权力，一个委员会所行使的完全合法的、宪法赋予的权力。

如果欧洲分析其全部历史和宪法，以及在那里发生的事，那么就不会对古巴议会的一个委员会的决定权感到如此惊讶。不是两三个议员，而是几十个……我们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我们的法律。为什么对所有那些事会感到如此惊讶呢？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没有别的了。这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所有的情况，因为您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拉：帕亚先生去了，又回来了。他是自由的吗？

卡：他有个引起国际传媒注意的办法：每天找件事做借口，“人家是否在拖延我”……许多时候，他连有关的手续都不办。他们甚至随便找个借口作为宣传和发表各种声明的原料。他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本领。

拉：古巴人权委员会于 2003 年 1 月公布了一份文件，说截至那一天古巴监狱中关押着 223 名持不同政见者。

卡：听我说，好像只占原有的 1 万 5 千名囚犯的 1% 多一点，我们把那些人释放了。但除了释放外，还保证他们去美国。所有进过监狱的人，95% 以上，都去那儿了。这就是那些人把他们带入这一切的，鼓动

他们……

在那个时候，牢中关押的就是我说的那个数。如果说现在还关着 203 人，那么差不多应该给革命建一座丰碑。

拉：223 人。

卡：我们可以对被释放的数千人算一下账，包括某些人，比如罗兰多·库韦拉（Rolando Cubela），此人接受各种武器，企图谋反。他在暴政时期是个学生，表现杰出，记得他曾经处决过巴蒂斯塔的一名军官，有段时间是游击队员，哦，以前我们大家都是朋友。可他后来被策反了，搞谋反，被抓起来，判了刑。他在牢里待的时间不长。

他因为什么被惩处的？他找借口去了国外，在那里接受了人家的训练，人家给他一个望远式瞄准镜和对我进行袭击的一切装备。他被囚禁的时间不长，我们释放了他。

数十个参与袭击计划的人恢复了自由，被送到国外，其中很多人继续他们的营生，因为那种事变成了他们的营生，像一家旅行社，他们开了个制定袭击计划社。这就是那个故事。他们说有多少来着，202？

拉：223。

卡：现在可以肯定，那些人犯了法。我已说过，如果我们对跟“照管利益办事处”勾结或合谋并由美国出钱，从事“持不同政见者”职业的所有人加以审判，如果我们对所有犯法的人加以惩处，那就不只是 223 人，而要比这多得多。这数字是革命宽宏大度的明证。在押的很少。教皇来的时候，比现在的多。

拉：约翰·保罗二世要求您释放一些囚犯吗？

卡：人家给了教皇一份名单，遗憾的是那份名单做得太差了，甚至列入了许多已获释的人。名单是最后提供给教皇的。在制定其全部访问计划时，教皇始终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到了最后却冒出一份名单，一份令人

遗憾的极坏的名单。递交名单的人并不尊重教皇。为了满足教皇的要求，我们只能从一个名或一个姓来鉴别和查找出现在他的那份名单上的人，但是很多人已经获释，有的甚至已经移居国外。人家给教皇提供了一份糟糕的名单，而在这之前教皇没有谈及此事。

当时我们说：“好吧，我们愿意……”梵蒂冈的外长回答道：“不，没有关系，他们不一定只是有政治性质动机的囚犯。”我们称他们为反革命分子，但不否认反革命是一种政治行动，尽管希门尼斯·德阿苏亚（Jiménez de Asúa）^①说不，这位伟大的西班牙法学家说，那些因为推动社会变革和革命进步而被捕的人是“政治犯”，那些为使社会倒退而斗争的人不是政治犯。我非常同意他的看法，但概念就是概念。我们一直使用“反革命”这个词，但他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政治犯”或“持不同政见者”囚犯。我坚持他们都干下了违法行为和别的不法勾当。革命是有法律的，但出于宽宏大度，有时不执行法律，所以几乎应该为此立个丰碑。

说着说着，我突然有个想法：许多人几乎只服刑一半就被释放，还给他们工作，让他们在一种差不多是开放的制度下进行社会设施或经济设施建设，发给他们全额工资，不克扣一分一厘。我的想法是请有关同志将所有那些人分批列出名单，总共有成千上万。

我曾与他们会聚，那时他们许多人在青年岛上。我从附近经过，他们拿着镐、铲等工具在劳动。我走近他们，实际上与那群人混在了一起，跟其中的许多人交谈，还对其家属给予帮助。在那个时期，反革命囚犯的数量是很大的。

我将要求进行调查，做一份名单，总共有多少人，以及通过谁把他们释放的，有时候是通过美国的天主教会。我们对他们说：“给他们搞签证。”您能明白，在这种气氛下，一个反革命分子找工作和便利是困难的，因为人们的敌对情绪很大。于是我们决定：“请你们去国外吧”，而且有人给

^① 路易斯·希门尼斯·德阿苏亚（Luis Jiménez de Asúa，1899—1970），西班牙法学家，是1931年起草西班牙共和国宪法的议会委员会的主席。内战结束后，他流亡阿根廷，在科尔多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任刑法学教授，著作甚丰，包括一部刑法专著。

他们搞签证。可能有数万人，因为对有些还在服刑的人还给他们减了刑。不但释放他们，还预先给他们减刑。以后，由于知道那些人欠他们的情，所以全都坚持要求签证。

拉：那些被囚禁过的人，你们放他们去美国吗？

卡：在与美国签订移民协定之前，所有进过牢房的人均有权申请签证，而且被拒签的人很少。确保获得美国签证的最佳履历，是当过反革命并在古巴坐过牢。如今搞抽签——这种抽签有时显得有点儿奇怪，每年的签证配额是2万。

我给您的答复是：可能是223、250或300。只要不犯法，谁也不会进牢房。

这里有4个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①，他们所干的事……当看到列举其种种反国家行径的清单时，我几乎真的对内政部表示不满。他们破坏投资，给投资者写信，威胁说将被没收。他们竟然能做所有的这些事情，我对此几乎感到愤怒。一天，他们终于被逮捕了……对，4个人都被逮捕了，被判了刑，是轻刑，不能说是重刑，因为他们犯的是重罪。

在特殊时期，有许多人从事破坏国家努力的勾当。当他们走到一定的极端时，除了把他们逮起来，就别无他择了。但内政部的行动并非出于害怕，也不是实施某种镇压政策。它有权，但并未采取严厉的做法。

现在，这是一个进行自卫并且能够自卫的革命。如果不进行自卫，就不在这里了。它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我们有核子武器，也不是因为我们富裕。我们顶住了四十六年的封锁，顶住了敌视、侵略、经济战，外加一个十分艰难的特殊时期。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的同心协力，没有政治觉悟，任何国家都顶不住这一切。这就是我的回答，对那些指控我们践踏人权的人的答复，对指控我们把我们称之为反革命分子，而他们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人囚禁起来的那些人的答复。

^① 所谓“国内持不同政见工作组（Grupo de Trabajo de la Disidencia Interna）的4个领导人，因危害国家安全罪于1999年3月被判处5年至3年不等的徒刑”。



我
的
一
生

第二十一章 2003年3月逮捕不同政见者



詹姆斯·卡森在哈瓦那—在美国“照管利益办事处”召开会议—会发动攻打古巴的战争吗？—劳尔·里维罗（Raúl Rivero）
案件—巴利亚达雷斯（Valladares）事件—极刑问题

波浪如向不辭數月 五 COUS 第二十二家

拉：接着谈上一个话题，我想再次提起 2003 年 3 月逮捕几十名不同政见者和同年 4 月处决三名劫船犯这两件事。我已读过费利佩·佩雷斯·罗克的声明和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①，您 4 月 25 日的讲话以及您的“五一”演说，因此，我已全面了解了你们对这几件事所做的解释。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决定在那个时刻逮捕不同政见者？也就是说在劫持船只之前和伊拉克战争打响之前。促使古巴当局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逮捕不同政见者的动机是什么？我想，最早的逮捕行动发生在 3 月 15 日。

卡：您指出的这几件事没有一件是古巴方面蓄意制造或预先策划的。美国政府的险恶计划一个接一个地出笼。伊拉克战争还没有爆发。古巴是可能成为布什政府提出的先发制人和突然袭击进攻的目标之一，古巴已被他们看作恐怖主义国家而列入了黑名单，甚至每年都被国务院列入黑名单。曾几何时，博尔顿（John Bolton）^②别有用心地指控我们正在研制生物武器并对我国进行无耻的污蔑。

美国驻古巴照管利益办事处^③一直在开足了马力工作，完善布什政府制定的旨在颠覆我国和古巴革命的各项计划，并寻找借口入侵我国。

一个危险的信号是詹姆斯·卡森（James Cason）来到古巴，他自 2002

① 见 2003 年 4 月 9 日外交部长新闻发布会。

② 约翰·博尔顿，2005 年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曾任国务院副国务卿。（中文编者注）

③ 古巴与美国自 1961 年 1 月起没有外交关系，因此既不互设大使馆，也不互派大使。但是，为了处理共同利益事务，自 1970 年末开始，两国相互允许在对方首都建立照管利益办事处，实际上行使大使馆的职能，代表处主任在许多方面起了类似大使的作用（见第 20 章相关注释）。

年 11 月起出任美国驻古巴照管利益办事处主任——此事在 2002 年 9 月就宣布了。此前他已来古巴做过多次考察访问。

卡森是奥托·赖克的人。赖克是个阴险人物，他在那场反对尼加拉瓜的血腥而肮脏的战争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他为推翻桑地诺主义革命的反革命武装匪帮的头目们出谋划策，起草过文件和宣言。以反革命组织名义发表的一些文告都出自奥托·赖克之手。众所周知，那场肮脏战争曾引发了一桩国际丑闻，里根执政时期白宫里那些战争推动者违背了国会规定，用武器换金钱，并参与了贩毒活动^①。布什想要提名奥托·赖克为主管拉美事务的副国务卿，这一嘲弄大大激怒了国会，尽管共和党议员在国会中占多数，参议院还是否决了这项任命。原本布什是想利用国会休息期间提出这一任命的，后来改为任命他当主管古巴事务的总统顾问，这一职位是不需要国会批准的^②。

所以说，他们派来当美国“照管利益办事处”主任的这个人詹姆斯·卡森是雷奇的人。卡森前来接替维基·哈德尔斯顿（Vicki Huddleston）夫人，她秉承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非常敌视我们，她是布什就职之前就来的，还不是专门来完成某种使命的。卡森来此任职是有具体目的的。一般人只知道来了一个新任主任，我们当时猜想他多多少少会同他的前任一样执行相同的敌视政策。可是不，卡森是他们专门挑选的，是奥托·赖克挑选了他，并给了他种种指示。

拉：卡森是什么时候抵达哈瓦那的？

卡：我跟您说过，他事先曾以贵宾和候任美国“照管利益办事处”主任的身份为掩护多次来我国进行考察旅行。这是一种卑鄙行径。他 11 月

^① 在里根总统执政时期的 1985—1987 年间，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私下向伊朗出售武器，用出售武器所得的金钱资助尼加拉瓜的反革命分子（即“孔特拉斯”）。此事曝光后激发了一起大丑闻，国际媒体把这一丑闻称之为“伊朗门事件”，这一引喻来自另一大丑闻，即导致尼克松总统 1974 年辞职的“水门事件”。

^② 2003 年 7 月美国政府任命罗杰尔·诺列加（Roger Noriega）为负责拉美事务的副国务卿，代替奥托·赖克。

份上任，与众不同的人未到任就已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他是带着预先制定好的极具挑衅性的计划前来上任的。

他上任之日正值拉美地区局势处于紧张状态。这年的4月11日发生了反对乌戈·查韦斯总统的军事政变，这一政变是布什政府公开策划和支持的；委内瑞拉的军队和新一代军官拥护合法当选的总统和革命进程的领袖；人民群众起来了，总统回到了总统府。12月委内瑞拉又发生了石油风潮，后果十分严重，原油开采几乎停顿，斗争相持了3个月，在玻利瓦尔运动领袖坚定果断的领导下奇迹般地扭转了乾坤。“一桶石油也不给古巴！”亲帝国主义和法西斯分子这样叫嚣。石油价格成倍上涨，古巴与委内瑞拉之间的协定中止了数月，我们不得不出超高价向第三国购买石油，我们国家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委内瑞拉的反革命活动阻碍了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严重打击了古巴。

就是在发生这些事件的时候，奥托·赖克的代理人，布什的特使来到照管利益办事处走马上任。从2002年11月11日卡森到达古巴之日起，到2003年3月19日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开始，这4个多月里，我一方面要关注事态的演变，同时又不得不进行三次重要的出访：2002年11月底访问基多，参加著名画家奥斯瓦尔多·瓜亚萨明（Oswaldo Guayasamín）^①创建的“人类圣殿”落成仪式；12月底访问巴西，出席1月1日卢拉总统的就职典礼，他是位工人阶级和左派友好而坚定的斗士，我国人民的朋友；1月19日再次去基多，出席厄瓜多尔总统卢西奥·古铁雷斯（Lucio Gutiérrez）的就职典礼，他是因社会力量和左派政党结盟而当选总统的。

值得指出的是，如果好好分析一下12月和1月这些日子，可以看到委内瑞拉尚未摆脱那场狡黠而险恶的石油风潮打击的阴影，在这一对古、

^① 奥斯瓦尔多·瓜亚萨明（1919—1999），厄瓜多尔画家，20世纪拉丁美洲美术界顶级人物，拉美印第安人民事业的伟大捍卫者，古巴革命无条件的朋友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私人朋友。2002年11月29日在基多落成的纪念性建筑“人类圣殿”是瓜亚萨明的巅峰之作。

委两国人民都非常重要的时刻，在同样受到外来侵略威胁的情势下，两国之间进行密切交流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正是我每次出访的深层次动机，并由此萌生了必须进行密切合作的想法，为后来形成“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打下了基础。

除此之外，我还应加上 2002 年 12 月下旬召开的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会议以及 2003 年 1 月 19 日举行的人民政权普选^①。

就在我本人在那几个月里频繁进行国内外活动的同时，卡森一直在外交特权的庇护下使用帝国主义为所欲为却为人民所不齿的惯用伎俩疯狂地进行活动。他对帝国的每一次行动都在古巴人民钢铁般的意志面前遭到彻底粉碎这一教训似乎一无所知。

拉：您所进行的这种种活动使您没有太多去注意卡森先生在这里的所作所为吗？

卡：我不是唯一关切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和它对我的侵略活动的人，因为这是一场在许多条战线同时开展的斗争。当然，我总是特别关注那些对革命最有战略意义的事务。您向我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都与这些事务有关。

由于我们对美国“照管利益办事处”所干的坏事已见怪不怪了，所以我也没有更多留意卡森那种绝不正常的行为。他早在上任前就同迈阿密黑帮开过会，并发表讲话。上任伊始，又频繁往返于哈瓦那和迈阿密之间，接受白宫以及迈阿密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集团的指示和援助，这一集团在布什竞选获胜中起过决定性作用。他利用外交邮袋带进了数千只收听颠覆分子电台的半导体收音机、小册子、传单、行动指示等其他类似的东西。

这些情况十分严重，远远超出了正常范围。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

^① 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为古巴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由 600 多名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由全国各地区的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 5 年。人代会每年举行两次例会，必要时可召开非常会议。

了2003年2月24日，那天是节假日，是古巴纪念1895年最后一次反对西班牙争取独立战争开始的爱国节日。那一天，卡森参加了一次很大的会议。

拉：是在美国“照管利益办事处”吗？

卡：不，是在一户人家，最著名的反革命分子头目之一的家里。他去了，在那里的节日活动中召集了几十个人，大约20到30个反革命分子——我现在记不清确切数目了，这是以节日里朋友聚会为借口的。

拉：那次会议有什么重要性？

卡：那次会议的重要性就是卡森在那里公开发表了演说。2月24日他在那里公开发表了一些非常傲慢无礼、大肆攻击的讲话。卡森还谈到了他有一个要在古巴巡视6000英里的计划，俨然像个美国总统候选人。被邀请的其他国家的外交官，没有一个人出席，只有他一个人去了。有人问他去那里害怕不害怕，他讲了许多骇人听闻的话，恶语伤人，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实在令人无法容忍。

拉：他攻击您了吗？

卡：攻击了。那时我事情很多，忙于许多计划，没有太留意他的那些言行。几天之后，3月6日举行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在那个场合我仔细分析了他的言论。

从2月24日到3月6日，那几天过去了，我还没有公开讲话，但我已经读了他所有的讲话，在古巴讲的和在迈阿密讲的^①，因为正如我说过的，他来回往返，完全是公开的挑衅。事情很清楚，我不知道他不是疯了，以为他的行为是可以容忍的，或者如许多人认为的，他这是明知故犯，要的就是挑起事端。这一切引起了我们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许多

① 参见《2002年12月美国驻哈瓦那利益代表处主任对迈阿密电视台的讲话》，网址：www.rebellion.org/internacional/030414cason.html

朋友的担忧，他们说我们绝不能容忍他的挑衅行为。

拉：为什么说这可能是个圈套呢？

卡：您看吧，他把人逼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那个开始走遍全古巴的人甚至正在组织……借口是“视察”那些被美国人在海上抓走后送回古巴的人。其实美国并没有送回所有的人，只送回了一部分，因为美国不愿履行、也从未履行过我跟您说起过的那个移民协定，事实上总是留下一些人。有些人本来可以在海上被抓到后遣送回来的，但这些人往往到了海上，知道会得到迈阿密集团的支持，便拒绝服从命令。他们甚至寻机同美国的海岸巡逻队发生冲突。迈阿密反古巴分子在美国的“公关人员”就指控美国巡逻队“迫害古巴爱国者”。我跟您解释过，大多数出走的人与政治毫不相干，因为那些真的因政治原因想出走的人都根据移民协定得到了签证。

拉：我一开始向您提问的意思，撇开技术性的回答不谈，是这样的：那时候全世界正处在伊拉克战争前夜……

卡：嗯，战争还没有立即爆发。伊拉克战争是3月19日开始的，而卡森的这些挑衅行为发生在2月24日，几乎是一个月之前，当时谁都不知道美国佬会在哪一天对伊拉克动手。

您听我解释。卡森发表了那篇讲话。哦，这已是难以容忍的事。其他的外交官收到了出席2月24日集会的邀请都没有去。卡森则还在那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当有记者问他，他的出席是否证实了古巴政府的指控时，卡森说：“不会，因为我相信整个外交使团都收到了邀请，我们的国家一贯支持民主。”云云，云云。“我是应邀去做客的，”于是他说，“我一点也不害怕”。

他又直截了当地回答了另一个问题，而且方式十分粗暴……他用流利的西班牙语说道：“很不幸，古巴政府倒确实是害怕了：他们害怕思想自由，害怕言论自由，害怕人权；一些团体正在表明，也有不害怕的

古巴人”等等，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卡森先生最后宣称：“我在这里是应邀做客，我还要走遍全国，访问所有渴望自由和正义的人。”

哦，我不知道要是法国人或欧洲人，听到有人发表这样的言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任何古巴公民都懂得这是挑衅，注意：这场危机的发生与谁都无法预见的攻打伊拉克的战争计划毫无关系。

至于与欧盟的危机，是跟某个国际问题或某一决定有所关联吗？我们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做，有许多活动要进行，我们无意节外生枝制造问题。但是，我们能允许欧盟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后发表那样一些声明^①吗？我们被列入了“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并且在布什先生所说的“六十多个”国家中名列前茅，这些国家随时可能遭到“先发制人和突然袭击”的打击。难道可以责怪我们从中看到了巨大危险吗？难道我们现在应该双膝下跪同欧盟进行外交谈判吗？为了回应那些声明，我们只需做一个虚与委蛇的表态就够了。那种不答复的人、不斗争的人、不战斗的人注定未战先败。然而在我们中间永远找不到会这样做的人。

同卡森的问题一样。没有一个大使馆的外交官会做出他那样的事，他竟在一个反革命分子头目家里做那样的事：召集一帮子人庆祝独立纪念日。如果说曾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捍卫过自己的独立的话，它就是古巴人民。可是他们那伙人想做的事却是让美国侵吞古巴，把古巴变成佛罗里达的附属地。如果说有许多国家，甚至是一些大国都变成了美国的附庸的话，请您告诉我，一旦古巴被这样一些受奥托·赖克先生之流和美国右翼分子指挥的团伙所操纵，那么古巴会变成什么样子？古巴会是什么样的国家？这么一群卖国贼怎么可能会庆祝祖国的独立纪念日呢？

所以我说：“事情太奇怪了，任何人都有权问一问在那个‘爱国’活动上一共喝掉了多少酒。”我说了——这极富讽刺意义：“古巴实在害怕极了，赶紧端正态度，跟着这位奇怪的外交官员指引的方向走吧。也许在照管利益办事处工作的众多美国情报人员会对他说，古巴可以满

^① 2003年6月，欧盟在古巴逮捕和判处了75名不同政见者及处决了劫船犯后决定对古巴实施一系列的外交制裁。

不在乎地取缔这个办事处，因为在古巴看来，这是个培养反革命分子的温床，是各种明目张胆反对古巴、搞颠覆活动的指挥部。曾经在这里长期代表美国利益的瑞士外交官们多年来工作得非常出色，他们从不进行特务活动，也不搞颠覆。”所以，我说过：好吧，就让瑞士人再来，重新代表美国人工作吧。

“如果这就是他们一再发表如此蛮横无理的讲话想要挑起事端的目的，那么，最好让他们厚着脸皮大着胆子说出来吧。总会有一天，不管是什么时候，美国人民自己会派来一位真正的大使的……”这就是我在3月6日讲的话，当时我们得到证实，我们5位被美国逮捕的英雄^①已被移送到特别部门。他们对这5人采取了十分严厉的措施，此事在古巴反应敏感，因为这5人是人民的偶像，曾被授予“古巴共和国英雄”的称号。美国人出于敌意、报复和仇恨的心态无理地把他们投入了“空窟”^②。他们把这5个人残酷无情地投入墓穴般的牢房一事在古巴激起了极大愤慨。第二天进一步得到证实，这5人确实被关在那里。我们发表了多篇演说，他们却置若罔闻。

3月10日，古巴外交部向照管办事处主任递交了一份外交照会。你已经拿到了。

① 古巴情报人员赫拉尔多·埃尔南德斯（Gerardo Hernández）、雷内·贡萨莱斯（René González）、费尔南德斯·贡萨莱斯（Fernández González）、安托尼奥·格雷罗（Antonio Guerrero）和拉蒙·拉瓦尼诺（Ramón Labañino）5人1990年打进几个迈阿密的古巴恐怖主义准军事组织。这些组织专门从事袭击古巴经济目标的恐怖活动，以吓跑外国旅游者，例如，1997年9月4日在哈瓦那戈巴卡瓦那饭店制造爆炸，造成意大利青年旅游者法比奥·迪·塞尔莫死亡。1998年6月，哈瓦那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转告了这5名情报人员在反对恐怖主义的共同斗争中获悉的情报。这些文件却被美国当局利用于1998年9月逮捕这5名情报人员。他们经迈阿密一家法院胡乱审讯后被判处非常长的徒刑，开始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服刑。2005年8月亚特兰大上诉法院法官复审否决了迈阿密的判决和徒刑。一年后，于2006年8月，该法院对此案重新进行了审理。5名古巴人至今仍被囚禁在监狱里（见第12章相关注释）。

② “空窟”是一个4米见方、四壁密封的地牢，里面关着一名囚犯，赤脚，只穿一条裤衩。一束刺眼的强光24小时照射在身上，严禁与人接触，连监狱看守都见不着。

拉：我拿到了，也看过了。

卡：但重要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我们对这位声称将要走遍全岛的卡森先生指出两点：第一，对遣返的筏民要进行视察，这不在移民条约的条款之内，而是我们对这些人做的一件事。10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在什么方面违反过这些协议。

拉：这些协议规定了被美国当局遣返的筏民应回归他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吗？

卡：是的。这往往不是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有几次我们不得不安置这些筏民去做别的工作，因为与他们共事过的人拒绝让他们若无其事地重返工作岗位，对他们不太放心。譬如对他们原来工作过的某大学或某单位，你总不能为了要他们接受筏民回去工作而接管这所大学，或与某单位的人去吵架吧。为他们找一份大体相同的其他工作那倒是能做得到的。

而那个卡森实际上已走遍了全岛，因为部分筏民已经成立了一个遣筏民的组织。

拉：成立了一个筏民组织？

卡：他们是些被遣返后留在古巴的乘木筏偷渡的人，卡森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几乎把他们组织了起来，以便以“视察”为名，把这些筏民组成了几个小组。这不是必须要做的事，而是我们的善意，就像1994年危机期间在关塔那摩集结了大量筏民，约有一万多人，拥挤得都快“爆炸”了。我们答允他们动用2万份签证中的一部分。后来美方又稍微多发了一些签证，我们在这里不是讨论签证发多发少的问题，而是说我们连这样的事都做了。但问题是美方无权进行“视察”。我们告诉他们说，这事不在协议的范围之内。

第二，我们还告诉他们，美国外交官不得在古巴自由旅行，他们是受到限制的。他们必须照会我方要去何地，应提前72小时通知我方。我们驻华盛顿的外交官也同样受到限制。但是古巴是个小岛，美国是个大国。

他们照管利益办事处的人员比我们在华盛顿的人员多出 10 倍。在这方面谈不上什么对等，也无法比较。我们在那里的人数与那个国家的面积相比，他们在这里的人数与我国的面积相比……想要旅行先通知还不够，必须提前 72 小时提出申请。当然，对于这位绅士先生，我们是不会同意他的申请的。

他们在那边也用同样的办法对付我们的人，不过，哦，情况不能相提并论。我们做什么了？我们告诉他们不能旅行。于是乎卡森召开了两次会议。2 月 24 日那次会议之后，他……又开了两次会议，一次在 3 月 12 日，另一次在 14 日。

拉：您是否认为这些会议是对您 3 月 6 日的声明和决定限制他们行动的一个回答？

卡：您瞧，我是 6 日讲的话，我是这么说的，我们可以取缔美国“照管利益办事处”，没有什么了不起，天塌不下来。2003 年 3 月 12 日在卡森的住所又同 18 名反革命分子开了一次会。这个无法再进行 6000 英里反对革命和干涉内政旅行的人把他们请到了自己家里，利用他的家同 18 名所谓的“不同政见者”开会。所有这些人都是由美国组织、支持和资助的，因为，您听我说，所有的文件都在这里，我们掌握了全部物证，对此我们本来是可以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的。

拉：我读过你们出版的《不同政见者》那本书^①。

卡：14 日在卡森家里又开了一次会。照会指出：“3 月 14 日，在美国驻哈瓦那照管利益办事处主任家中再次召集了头目们开会”，实际上是每两天开一次会。这是为所谓的古巴新闻记者们开办的“伦理学座谈会”。在 34 个人里面只有 4 个人在某种情况下学过一点类似新闻的东西；但是

^① 罗莎·米丽安·埃利萨尔德(Rosa Miriam Elizalde)和路易斯·巴埃斯(Luis Báez)著：《不同政见者——古巴情报人员揭秘事实真相》，政治出版社，2003 年，哈瓦那出版发行。

所有这些“新闻记者”的头衔都是由卡森和新闻宣传加封的。

3月14日那天，我开会开到很晚，大约晚上11点钟时我听到了详细情况：发生了什么事？这一天出了什么事？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们还要等什么？这是一场可能要拖上一年半载的战争吗？甚至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这样的事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在那边，美国的朋友们十分担心，他们说：“喂，不能让他挑衅下去了！”

拉：你们为什么不驱逐卡森先生？

卡：我们从未驱逐过一个美国外交官。他们却使用过驱逐的办法。再说了，卡森先生并没有犯什么法，他只是违反了国际准则。不能把他送上国际刑事法庭，因为不涉及犯罪问题。他是在为种族屠杀制造条件，但还不是参与种族屠杀。

我们能容忍这一切吗？您还不能对一位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先生追究他的法律和外交责任，但他不该做任何这样的事。而那帮人从他那里受到了鼓舞，已经公开地肆无忌惮地组织起来了。我不知道换了法国人他们会做些什么，我很了解法国人，法国人具有很强的尊严感。是呀，那时谁也不知道伊拉克战争哪一天爆发，我们说：“应该起诉那几个主要的头目。”因为他们非常活跃，其中就有玛尔塔·贝亚特里斯·罗克（Marta Beatriz Rogue）夫人，2月24日她也曾在自己家中组织过一次集会。可以完全不受法律制裁吗？我们绝不允许！我们也不允许一个国家的代表做出那样的事，我们清楚他的计划，他们做了许多不检点的事。我们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想证明什么。我们早已洞悉他这样做的目的，他发表的许多讲话，中心思想是挑动群众性的移民出国风潮。这又可以利用来作为入侵我国的理由。从大环境来看，我们当时的处境比1994年8月5日前的日子还要糟糕……所以说，他们的这些公开行为是同侵略的思维联系在一起的，是进行挑衅。

拉：您说是“挑衅”，您难道不认为卡森的行为本身是一种挑衅，而

你们用逮捕来进行反击不正好中了挑衅的计吗？

卡：挑衅的概念是什么？也许应该查查词典，但我理解的概念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行动，这就叫挑衅。有的挑衅可能是谩骂，往往是无理谩骂。有时一个人对另一人挑衅是为了与他打架……世界上充满了挑衅，有无穷无尽的挑衅。我们了解我们在美国或其他地方的朋友们要求的是：我们不能听任他们的挑衅。但他们并不希望我们驱逐卡森。

假如有人要向你开枪，并在做各种准备向你开枪，你能用什麼办法躲避呢？你就听任他把你打死吗？

拉：但是当时有当时的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许多人在分析这些挑衅时是与美国干涉伊拉克前夕的国际大环境联系起来考虑的。那时有许多社会运动反对布什和他的盟友。从那时的国际环境看，布什先生确实成了最遭人抨击的政治人物。正在此时，古巴发生了逮捕事件，产生了某种牵制作用，为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口实，他会说：“瞧瞧，古巴也出了事，逮捕了非暴力的反对者。”于是，那些曾抗议过布什的古巴的朋友们自己也遇到了困难，如您所知，他们中不少人受到了压力，不得不说：“布什做的事不对，古巴发生的事也不对。”仿佛这两者是同一码事。这一国际格局大大削弱了人们对古巴的支持。

卡：您说得对，我们理解。但是你在做一件事时，你的出发点是坚定不移的信念。一个人做事不能没有坚定的信念，我们的信念就是应该保卫国家，国家正面临危险，国家正受到威胁，这一切都是不公正的。

我们时刻想到的是对手美国。我们的问题不是跟欧洲人，不是跟其他什么人，我们时刻想到的是美国，美国在直接威胁我们，美国在直接向我们挑衅，美国在直接给我们制造危险。许多人在美国进行斗争，他们的处境比在欧洲困难得多，因为一个欧洲人，哪怕是进步人士也没有什么危险，当然，他是在捍卫自己的理念，从他们的原则立场出发。

现在说到我们在美国的朋友们的情况，他们自己对我们说：“别驱逐！”我们也不认为驱逐是个办法，因为斗争不是在欧洲、日本或其他国家的首

都进行，而是在这里进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四十六年来一直对我们虎视眈眈的邻国。

现在的局势已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哦，假如当时我们把卡森驱逐出境，那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外交行动。但是我实话告诉您，我并不认为我们当时是被迫三思而后行的。事后分析总比事先分析容易得多。当时我们说过：“好吧，这事既然要做了断，我们就了断吧。”

他们把5位英雄扣留在美国，对此我国人民义愤填膺，因为他们囚禁这5人是毫无道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们有一整套我跟您提到过的计划，他们在这里实施这些计划时，没有人加以阻拦，也没有办法阻拦。我考虑过，嗯，难道我做的事犯法吗？不对。谁在做犯法的事呀？正是他们那伙人。

被他们无理关押在美国的这5个人是在那里收集情报的，因为我们一直遭受着爆炸、劫持、破坏、谋杀计划、在旅店安放炸弹等活动的伤害……这5个人不是现在才被囚禁的，而是从1998年9月12日开始就被囚禁了。

2001年9月11日之后，针对猖獗的恐怖主义进攻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恐运动。1998年9月12日逮捕这5位同志的时候也正在开展反恐运动，因为1998年8月7日美国驻东非三国的大使馆遭到了可怕的袭击，造成了近300人死亡，而我们这几位同志的主要任务是打入内部收集有关恐怖主义分子活动的情报。

拉：他们是企图制止反对古巴的恐怖活动吗？

卡：是的。在我国人民的头脑里始终存在一个极大的悖论、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的5位同志被他们投入了苦牢，而另一方面，卡森的所有朋友们却完全逍遥法外。此外，我制定的那些严厉的法令在正常情况下根本无法执行。每当我们惩罚一些人时，就得忍受巨大的压力。但是我们顶住了压力，根据各人表现实施了惩处，就像现在做的那样。

我坦率地告诉您，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实际需要做出决定，没有什

么别的特别理由好解释的，因为你正遭到战争威胁，你不可能允许有人在你的国内组织一个具有潜在犯罪危险的第五纵队，而他们干的正是这个。有些理论家们不同意……比如我跟你提起过的西班牙大刑法学家希门尼斯·德·阿苏亚（Jiménez de Asúa），他就不同意把进行这类活动的人，那些一直在进行反对事业的人说成应对“政治”罪行负责。我们把他们称为“反革命罪”。可是这些人无可争辩地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这个案件则与国际政治联系在一起。

那帮人清楚地知道，尽管古巴存在困难，给人民造成了痛苦，但革命仍然得到、尤其在最近几年里进一步得到了几乎举国上下一致的拥护。我们也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在这种情况下，我说道：好了，先生们，容忍和宽恕结束了，应该撵他们走，如果他们想要离开，滚蛋就是了，但对那几个首要分子应该抓起来，不是抓所有的人，只抓那几个最积极参加那些具体活动的人：参加那次在玛尔塔·贝亚特里斯夫人家里召开的会议的人，在那个会上卡森发表了2月24日的讲话；还有参加了那几次“新闻记者伦理”座谈会以及其他几次同一性质会议的人。

那天我和同志们开会一直开到晚上11点，分析了所有的资料、所有的信息，一致认为：一切条件都已具备。于是我们说：“行，这是唯一应做的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我们知道要对我们所做的事承担责任。

拉：你们是否估计过在古巴的形象方面要为此付出多大代价？

卡：要付出代价的主要是一直在对我们进行挑衅和组织这些活动的敌人。我们的回答是针对他们，而不是任何其他人。

我们是在古巴同美国发生了政治冲突，面临着同他们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我们头脑里别无他念，对我们来说，最主要、最根本、最重要、最关键、最生死攸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同他们的斗争。

没有人会从欧洲来攻打我们，除非是某个疯子。所以，我们那一天一直在集中讨论这个问题，不仅是我，还有其他在一起分析形势的同志们，大家都坚信，除了做出这个回答外我们别无他择。因为我们想到了，还有

更加令人担心的事：我们可能将面临一场战争。当时对伊拉克的最后通牒尚未出笼，但是从一些宣传和演说中已能觉察到这种事即将发生。当然，您不可能知道是不是在一个月之内发生。

拉：对你们发动战争？

卡：是的，我要是早点深入分析2月24日的材料并联系到卡森所做的那些事情的话，我们可能还会更早地做出这个决定。但是，如我对您所说，我那时正忙于一大堆活动，那一类的文件天天送到我手上，但突然之间您看到的事情异乎寻常，已发展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不是因为人身攻击的问题。我毫不在乎别人说我这个那个，因为我对那些攻击已习以为常，经常遭到各种各样的攻击，有些攻击无耻到了往往令人作呕的地步。斗争进行到这个分上，应该做出回答了。我们一度被逼到了墙角。你会说：“哼，这是挑衅。”但你又不能马上开火。对这种别有用心挑衅，什么程度能容忍，什么程度不能容忍？他们是铁了心要挑起事端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做出判断是否已到了超过容忍程度的临界点。这是决定我们做出反应的关键因素，其余都带有偶然性。

拉：你们真的认为美国在设置圈套准备对古巴发动战争吗？

卡：听着，战争没有爆发，无人知道事态会如何演变，尽管我知道，因为我曾反复想过，一场反对古巴的侵略战争将会是怎样，会有多少伤亡，会造成多大破坏。恐怕连但丁都想象不出目前发动一场对古巴的入侵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比起伊拉克战争付出的代价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我们考虑得很多，因为已经有过越南战争，我们知道那里发生过什么情况，已经有过科索沃战争，之前还有过另一场战争，海湾战争以及现在的伊拉克战争。如果您看到了我们这个国家的生存、千百万人民的生命面临危险处境的话，您就会很好理解古巴当前最为关心的、压倒一切的问题是什么。

拉：保卫国家？

卡：对。请允许我告诉您，这里有千百万古巴人已做好了打一场全民战争的准备。我曾说过，我们已经达到了“军事上坚不可摧”的程度，美帝国主义想象不到，也付不起如此高昂的生命代价，如果它想要占领我们的国家，也许要比在越南付出同样或更多人的生命，而且美国社会也不会愿意在帝国主义的冒险行动中为它的统治者偿付成千上万生命的代价。您别相信他们拥有庞大的后备兵源。正如我们在伊拉克战争中看到的，报名参军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了。他们把招募新兵变成了劳动就业的途径，为了进行非正义的战争雇用失业人员，而且常常雇用大量的黑人入伍当兵。但是，有消息报道，非洲裔美国人愿意参军的越来越少了，尽管他们日益面临失业和被边缘化，因为他们已意识到他们是被用来充当炮灰的。2005年9月底飓风“卡特丽娜”袭击路易斯安那州的贫民窟时，政府大喊“各自逃命去吧！”把成千上万居民——其中多数是非洲裔美国人——抛弃不顾，许多人淹死在老人院或医院里，甚至对有些人实施了安乐死，因为医务人员害怕看到他们被活活淹死……这些真实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对这种现象应当好好深思。

为了打仗，他们招募拉丁美洲人，那是些为了逃避饥饿偷越国境的移民，国境线上每年都有500多名移民死去，也就是说，远远多于柏林墙存在的28年里每12个月为偷越国境而死去的人数。美国曾天天谈论柏林墙，而对竖立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每年有几万人为逃避贫困和不发达而死去的那堵墙却只字不提。这就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

拉：一个应该懂得自卫的世界。

卡：敌人也在进行心理战。如果敌人以为别人对他一味忍让，无可奈何，他就会对别人产生出生物学上所称的追击本能。

驯狮人有时背朝着狮子，挥舞鞭子，发出“啪、啪”的响声，不时向观众点头致意，接受掌声，紧接着便要转过身去，面对狮子，因为要不然，狮子会出于追击的本能做出反应。甚至连最最驯服的哈巴狗都会朝你吠叫，

你要是逃跑，它就追你，甚至可能在你的腿肚子上咬上一口。但是你若转过身去，小狗就后退了。我有体会，我曾海里遇到过梭鱼、鲨鱼，人要是正面对着它们，它们的自卫本能便发生作用，它们会自己后退。没有比背朝敌人更危险的事了，因为这会助长他的追击本能，野兽有追击本能，帝国主义的追击本能比野兽还厉害，帝国主义的领导人和掌握武器的人的心理状态就是这种野兽的心理状态。

拉：你们不愿意成为任何野兽的猎物。

卡：不愿意。对待野兽应该正面应付。第一，美帝国主义必须知道一定会有一场斗争，而且将付出高昂的代价；第二，美国人应该能够想象到这场斗争的结局将同他们过去的历次冒险行动一样。我敢肯定，他们在这里的任何冒险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听好了，我们绝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我们也不会有这样做的愿望。

所以，注意，这便是我们的战斗，这便是我们的回答，他们随时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不过不是按照他们想象的方式得到回答，因为弱者必须运用另一种办法，就是运用智慧、心理较量和机智灵活。就是说，我在这里谈的都是些光明正大的办法，在斗争方法方面，我们从来不使用不道德的手段，从来不违背我们的道德观和我们的原则。他们不是长久以来一直在策划暗杀我吗？可是，在我国，没有一个古巴人的头脑里会想到用行刺美国总统的方式来报复他们。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有人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古巴是不是与肯尼迪或别的人的死亡有什么干系？大家都知道这段历史。这种做法不符合我们的道德观，也不是政治家应该做的事。您若面临问题，您就自己保卫自己吧！

应该争取斗争胜利，办法是给敌人制造困难，不让他们在政治上达到目的，其余的都是废话。哦，最根本的是我们在全身心地投入战斗。

拉：关于这事，我想提两个问题：第一，我想说，连古巴的朋友们都对不同政见者被判处这么重的徒刑感到震惊，因为说到底他们不过是

些非暴力的反对派，而且你们一向称之为“意识形态斗争”；第二，在这些被捕的不同政见者中有一位是诗人，甚至在古巴也一致认为劳尔·里韦罗（Raúl Rivero）^①是位大诗人。您不认为囚禁一位大诗人有损国家的形象吗？

卡：很遗憾。很遗憾，因为从司法层面说，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不能成为他免受惩罚的理由。说实话，我没有读过他的作品，也没有听说过他是位大诗人。据说，我们国家里诗人和疯子都有一些，不过，在我眼里，比如说，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②是位大诗人。

也许应该下个定义，什么叫“大诗人”？如果说一位大诗人竟然是这么一个人，他抛弃了道德观，抛弃了他的祖国，生活来源全都依靠那些封锁他的国家、想用饥饿困死他的人民、千方百计要毁掉他的国家的人供给，从技术角度他也许能够舞文弄墨，但在我看来，这种人永远不配称作大诗人。在我心目中，何塞·马蒂才是大诗人，他把生命献给了祖国；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do）^③、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米格尔·埃尔南德斯（Miguel Hernández）^④才是大诗人，他们是被法西斯主义迫害致死或被枪杀的，他们拥有的不只是华丽的辞藻。

我没有读过劳尔·里韦罗的作品，我无法对他韵律优美的辞藻做出评论。

① 劳尔·里韦罗（1945年生），古巴记者、诗人。曾任拉通社驻苏联记者。1967年获大卫诗歌奖（哈瓦那，古巴作家和艺术家协会主办），1969年获胡利安·德尔卡萨尔全国诗歌奖（哈瓦那，古巴作家和艺术家协会主办）。曾任大诗人尼古拉斯·纪廉的私人秘书。1991年在《十人公开信》上签名，该信要求政治和经济开放。他是独立通讯社“古巴通讯社”的创建人。2003年3月20日被捕并于4月4日被判20年监禁，罪名为“有行动反对国家领土完整”。2004年11月30日获释，流亡至西班牙。

②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1899—1936），西班牙诗人和剧作家，著有《吉卜赛歌谣集》（1928）、《血的婚礼》（1933）以及其他重要剧作。是历代西班牙文坛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西班牙内战开始时遭佛朗哥分子枪杀。

③ 安东尼奥·马查多（1875—1939），西班牙诗人，“98年一代”的成员，著有《孤独》（1902）和《卡斯蒂利亚田园》（1912）。西班牙内战末期在流亡地法国高里奥尔逝世。

④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1910—1942），西班牙诗人。著有《永不消逝的闪电》（1936）和《人民之风》（1937）等。参加了西班牙内战，站在共和派一边。遭佛朗哥分子监禁，死于狱中。

拉：您没有读过劳尔·里韦罗的作品？

卡：没有，但我确实读过许多诗人的作品。古巴现在有成千上万个优秀诗人，但他们还没有幸运赢得国际宣传，或符合为他们铸造“大诗人”塑像的资格。从技术角度，我无法对此做出评判，但从道德角度，我能做出评判。所以我有权说，没有不讲道德的诗歌，因为诗歌是讲究道德的，甚至比小说更讲究道德。小说偏重情节，我把诗歌与情感联结在一起。我记得，比如巴利亚达雷斯（Valladares）^①的情况，他突然间成了“世界性的诗人”……

拉：阿曼多·巴利亚达雷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这里被关押过。

卡：是的，他纯粹是因恐怖主义活动而被捕的，他安放炸弹。一共有两个人涉案，其中一个是新手，我们没有惩罚他，因为他还不到法定年龄，但巴利亚达雷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是在吉隆滩入侵事件之后，那时正在执行臭名昭著的“獠计划”，这一行动包括几十个暗杀计划、几千个恐怖活动，几千个呀！巴利亚达雷斯干的就是这些活动之一，他落网被捕，受到了审讯并被判处了徒刑。他一度假装成麻痹症患者，欺骗全世界，因为当时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宣传机器正在进行疯狂鼓噪。

拉：那时世界上群情激动，因为你们逮捕了一位被媒体说成是诗人的麻痹症患者的人物，人们推测他的麻痹症是因为在监牢里受虐待的结果。

卡：他创作了一本诗集《轮椅上的诗歌》，而且还出版了，描写的是一个“囚徒诗人”——一个安放爆炸筒和炸药的恐怖分子，他不是那种造成经济损失的恐怖分子，而是安放致人死命的爆炸物的恐怖分子——巴利亚达雷斯因其在国外出书和患有麻痹症一下子变成了大名人。你认识雷吉斯·德布雷吧，我也认识他。那时期他是法国总统密特朗的顾问。他来到

^① 阿曼多·巴利亚达雷斯（1937年生），巴蒂斯塔独裁时期当过警察，1960年因恐怖主义活动被捕并被判处30年监禁，在狱中服了22年徒刑。一股国际运动把他说成是“麻痹症诗人”“古巴监狱制度的牺牲者”。1982年获释后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使。

古巴为巴利亚达雷斯辩护，他实际上等于对我说，要是不释放“囚徒诗人”，密特朗政府会垮台。

拉：责任重大……

卡：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我询问了一位著名的医生：“我说伙计，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呀？”因为当时有人在起哄，说什么的都有。这位医生告诉我：“他什么毛病也没有。”我说：“怎么会什么毛病都没有呢？这不大可能吧。”医生坚持说：“就是什么毛病也没有。”

拉：巴利亚达雷斯是坐在轮椅上呀。

卡：是的。医生对我说：“不妨可以做次试验。”啊，好极了，做试验还不容易，只需用视听手段监测他的活动就是了。以前没有做过这种测试。于是对他做了试验，进行了检测，并把他的举止行动全部拍摄了下来。应该为巴利亚达雷斯的模仿秀给他发个奥林匹克大奖，他的本领真大，蒙骗了全世界。他单独一人的时候，他东张西望——录像全都拍摄了下来——站起身来走路，上厕所，在厕所里做各种动作的体操，他的身体比你、我，比哪一个运动员都棒，健康得很哩。

拉：他一直在装假。

卡：我告诉了您雷吉·德布雷对我说的话。他们把德布雷叫了来，请他看录像。也放给他看。

拉：放给巴利亚达雷斯看。

卡：是的。我们给他最后答复前，把巴利亚达雷斯叫了来，给他看了他做体操运动的录像——他真的能够写出一本教人如何做保健操和如何假装麻痹症患者的教科书了——他一看录像，第一个反应是像弹簧似的噌地一下跳了起来。

于是，我们把录像放给雷吉斯·德布雷看，然后对巴利亚达雷斯说：

“喂，你将被释放——他已服完了大部分的刑期并充当了一场骇人听闻的运动的工具，我们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自己走着上飞机，自己走着下飞机。”德布雷明白了，我们要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让他自己走着上下飞机，停止扮演麻痹症患者的角色。我没有对他提出批评，因为蹲牢房的人为了出狱什么招都想得出来。

拉：他有权利这样做。

卡：是的，我要说，他有权利想出各种招数，但我们把他拆穿了。你看他多有能耐，骗过了许多医生。我是个不易轻信的人，我们请来了一位高明的专家，是他告诉了我：“此人什么毛病都没有。”

拉：您本人是否以为他真的患了麻痹症……

卡：我原来以为他有些问题，很想知道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从医生角度看能否治疗。

我们向来不屈服于压力，这是坚定不移的原则，就像尊重人格的原则，像我们用以指导革命的各项原则一样，其中之一就是：在古巴用强硬手段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而用其他方式可以得到许多东西。

拉：回到有关劳尔·里韦罗的话题，自2004年起到今天出狱，他从未使用过暴力，没有放过炸弹，而且他还是尼古拉斯·纪廉的爱徒，纪廉您是承认他为大诗人的。

卡：还有，弗拉迪米罗·罗加（Vladimiro Roca），他是多年担任古巴共产党领导人的布拉斯·罗加的爱子。

拉：弗拉迪米罗·罗加是个反对派，但没有被逮捕，除了他以外还有比如奥斯瓦尔多·帕亚（Oswaldo Payá）、埃利萨尔多·桑切斯（Elizardo Sánchez）。为什么在某些进行了同样活动的人与其他人之间会有区别？

卡：说实在的，没有区别。

拉：但这几个人没有被捕呀。

卡：在处理上有所区别。这几个人老早以来一直在做犯法的事，而且情节严重，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但这里，采取行动主要是针对最近发生的事情，这一点决定了谁该负更大的责任。请注意，他们中有些人可以兴风作浪，跟其他捣乱分子一般无异。

有两个事实可以回答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您问处罚是不是太重了。我对您说过，不算太重，要是按照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惩处这类罪行即“叛国罪”所做的刑法规定，甚至可以判处极刑、无期徒刑或30年监禁，对其中有些人的量刑是根据其罪行严重程度而定的。有些最轻的只判了5年。服刑期都在5—28年之间。

负有严重责任的人，不只是指上面提到的那些责任，尽管他们没有被司法起诉，这些人都有绰绰有余的“资格”被提起公诉。谁都别以为他们有权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或者以为国家会坐视不管。如果需要对您提到过的这几个人或其他什么人提起公诉的话，我们就会立即起诉。我们不会做出极端的事来，因为相对来说我们的行动很有节制。

您问了，我就回答，谁都没有司法豁免的保证，一切都取决于事态的发展，需要采取措施时我们就会采取措施，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正在捍卫的事业高于一切。必须采取措施的时候，我们就会不计后果，不惜代价地采取措施。

我这么说是因为您问起了我，您几乎是逼着我回答，我们是朋友嘛。您向我提出这些问题是很自然的，但我想要说的是，我不希望把我的话理解成威胁。我不骗您，我应该回答您的问题，而且十分坦率地回答了您的问题，但我非常真诚地希望谁都别把我的话理解成威胁。我是在我刚才提出的范围、条件和情况下说这些话的。依法办事是我们应当行使的权利，也是权力。我们忍耐的时间够长的了，这些法律许多年前就通过了。

拉：至今尚未执行过？

卡：这些法律还没有执行过，至今仍有效，谁都知道这些法律是古巴

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有些人认为参加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是一群傻子、一些无条件服从的人什么的，让这些人去胡说八道吧！

但是我们高度评价参加代表大会的男女代表们，我们非常尊重他们的意见。

譬如说，代表大会上有一些宗教界人士是反对极刑的，所有包含判处极刑内容的法律都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因此，一些包含极刑内容的法律不是一致通过的。在这方面是有一些例外的，我们完全尊重这些例外，因为这正反映了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人的意志，一般来说，牵涉到死刑问题时，最难获得通过的是公众舆论。

拉：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卡：如果您认为前面的问题我们已经谈完了……

拉：是的。这个问题的逻辑推理是：在欧洲、欧盟成员国中已没有一个国家实施极刑了。在惩罚最恶劣的罪行时取代极刑的最高刑罚是什么呢？是无期徒刑。一般来说，在实践中实施的最高徒刑是20年左右的监禁。因此，在欧洲有一部分舆论显然会提出问题：为什么对一些根本不是暴力分子、没有犯过杀人罪的反对派要判处这么长的徒刑呢？

卡：我原来不知道那是最高徒刑。

拉：是最高徒刑。在欧洲原则上已没有人在监狱里待20年以上了。

卡：连军法中也没有极刑？

拉：欧洲在和平时期军法中也没有死刑

卡：没有死刑，难道犯了叛国罪，在军法中也只能判处20年监禁吗？要是在战争时期，又实施什么样的法律呢？

拉：我不知道。最高徒刑是无期徒刑。例如，不能把犯人引渡到一个有被判处死刑或20年以上徒刑危险的国家去。因此，当看到这些和平的

反对派中一些人被判处 28 年徒刑时，在欧洲引起了巨大震动……

卡：在法国，一些“埃塔”分子被杀害，政府当局知情还是不知情？

拉：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已经谈论过。我们最后一次谈论极刑问题时您曾对我说过，您从哲学角度反对极刑，我们还说到，你认为古巴可能朝废除死刑方向发展。

卡：是的，我确认我说过的话。我理解，也感谢您给我提供的这一资料，即在欧洲不仅已取消了极刑，而且也没有了无期徒刑，即不能判超过 20 年的监禁。

拉：原则上已没有人会在监狱里待 20 年以上了，尽管可能还有例外^①。

卡：您知道，我们一度曾被迫制定或修改了一些法律，因为还存有一点幻想，以为有国际法存在，任何国家无权入侵另一国家。然而，就有那么一个国家，也许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国家，我们的北方邻国，1983 年的某一天，它入侵了格林纳达——利用的借口是防止有人对美国进行报复，伤害一些美国大学生，其实这些大学生毫无危险；1989 年它又入侵了巴拿马……那时还不是单极世界，不是只有一个称霸世界的超级大国，而是两个。

那时古巴本身的情况，从安全角度来说，似乎还比较好，经济上虽然仍遭封锁，但还能支撑下去，原料、燃料、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尚有保证，我们的食糖能以合理的有利价格出售。但是这一切发生了变化。

现在，我想，当时在 1976 年参加宪法草案^②和各种法律起草工作的同

① 也有许多例外，例如在法国，鲁辛·莱吉（Lucien Léger）1966 年被判无期徒刑，在狱中服刑 41 年后于 2005 年 10 月 3 日获释。同一天在法国还有另外两个服完了 40 多年徒刑的人出狱。

② 古巴共和国宪法，在以布拉斯·罗加为首的著名法学家委员会完成了草案起草工作后，交付实际上是全民参与的公开的人民咨询过程，最后文本由接着举行的全国公民表决，得到了 97.7% 的赞成票，于 1976 年 2 月 24 日正式颁布。后来由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根据宪法修改程序进行了一些修改，得到大会通过后被吸收进宪法。

志们中间存在某些错觉，认为死刑历来就有，无须讨论，原因是30年来古巴一直遭受侵略战争威胁乃至核战危险、经济封锁，数以千计的人成了长期以来从未中断、直至前不久还在继续的恐怖活动的牺牲品，而这些恐怖活动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正式支持，后来又变成非正式支持，也就是说，美国当局根据形势变化改变对这些恐怖活动采取了纵容、允许甚至鼓动的态度。

那时不得不考虑到，比如说，那600多个妄图直接或间接行刺我本人的暗杀计划，我跟您说起过这些计划。人们很单纯，往往把事情简单化了。杀人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您可以策划阴谋去杀某个人，您也可以制造种种条件和心理状况诱惑许多人去杀人。我说的是各种蛊惑他人去杀人的计划，他们开动了整个宣传机器进行蛊惑、蛊惑、蛊惑。

我敢肯定，在你们欧洲，我想，绝不会同意利用各种大众传媒进行宣传，蛊惑大家去杀人，不会同意有人说：“喂，你把偷你家东西的人杀了”“你把欺负你儿子的人杀了”“你把调戏你老婆的人杀了”，或者说“把你那不守妇道的老婆杀了”。你们会说：“应该禁止这种做法。”然而美国，或者说那些负责美国政策的人，却一直在蛊惑别人去杀人。我说这话是有各种先例为依据的。

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个人什么都不担心。古巴革命早期的一个例子是吉隆滩入侵，当时袭击古巴的飞机机身上涂有古巴标记，而飞机却是另一个大国的，这是违反国际准则的最坏的例证中的一个。

当时死刑是与各种刑事处分不挂钩的，也可以说，一开始是停止实施死刑的，后来不得不再次恢复了死刑，因为发现了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制造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局面。实际上，革命初期是停止施行极刑的。

我猜想，由于你们那里没有战争，你们不会遇到与我们这里相同的问题，在欧洲没有人想要颠覆现有秩序，冷战已经结束……你们的生存不受任何威胁，不存在千百万欧洲公民面临死亡的危险。

拉：看不出有这种危险。

卡：没有，看不到这种危险。你们有北约，有超级强大的北约。所谓的“冷战”已经消失，没有任何威胁，虽然在马德里和伦敦发生了可怕的袭击。我问您：你们是从哪年开始做到废除极刑的？

拉：在法国，20多年前密特朗总统于1981年废除了死刑。当时舆论都赞成死刑，但密特朗总统坚持他的决定，我们，就是说，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和公民支持废除死刑。死刑取消了，尤其因为发生一桩案子，有两个犯人布费和蓬当普斯，1971年在监狱里劫持了一名看守和一名女护士当人质，并砍掉了两人的脑袋。1972年这两个犯人被认定犯有“杀人罪”，判处了极刑，两人都得上断头台。此事引发了一场大辩论。两人中一个被斩首，而另一个没有被斩首。于是有人说了：“怎么可以判处一个没有杀人的人死刑呢？”两人中一个杀了人，另一个可能是从犯，但没有杀人，后来此人就没有被判死刑。由此爆发了一场很重要的辩论，此外又发生了两三件引起争论的案件。经过那几次争论之后形成了死刑应该废除的意见。最后，密特朗决定取缔死刑。

卡：法国是第一家，后来又有别的国家，是吗？

拉：不，是其他国家先废除极刑的，我不记得时序了^①。西班牙最近才废除。

卡：什么时候废除的？

拉：西班牙实际上是从1978年颁布民主宪法时起就停止死刑了，1995年正式废除。

卡：哪些欧洲国家至今还保留着极刑？

^① 在法国之前，已有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废除了死刑：1928年爱尔兰，1968年奥地利，1972年芬兰和瑞典，1976年葡萄牙，1978年卢森堡和丹麦，1979年挪威。但最早取消死刑的国家是拉美国家：1863年委内瑞拉，1877年哥斯达黎加，1906年厄瓜多尔，1907年乌拉圭，1910年哥伦比亚。

拉：没有了，欧盟内部一个都没有了。

卡：那些将加入欧盟的国家呢？

拉：将要加入欧盟的国家，如果现在还有死刑的话，也不可能继续保留了，因为欧洲人权会议 1983 年 4 月 28 日的第 6 号议定书要求取消死刑。

卡：要是有的国家还有呢？

拉：我不相信还有，哪怕是明文规定还有死刑，那么为了加入欧盟它们也得废除。

卡：捷克共和国有吗^①？匈牙利有吗^②？波兰有吗^③？

拉：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理事会要求，为了尊重人权应该废除死刑。所以要加入欧盟，就必须废除死刑。这是土耳其遇到过的问题之一。土耳其原来有死刑，因它希望加入欧盟，便要求它取消死刑。例如，您还记得吗？当他们逮捕库尔德工人党领袖阿布杜拉·奥卡兰——他是个进行过许多暗杀活动的团体的头目——的时候，全欧洲要求土耳其不要判处他死刑。

卡：我刚才跟您解释过，整个这一时期，古巴一直存在死刑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与我讲到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我国死刑与政治活动不联系在一起，主要与一般刑事犯罪有关。与反革命活动有关系的犯罪不执行死刑。

死刑至少应该继续存在十几年，或者比十年还多得多，可能是二十年、二十五年。

① 捷克共和国于 1990 年废除死刑。

② 匈牙利于 1990 年废除死刑。

③ 波兰于 1997 年废除死刑。

拉：您跟我说过，实际上没有执行过。

卡：我是说得看具体情况，在某一案件中执行过死刑，某种程度上曾想把它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而实际上它不是政治问题。

拉：奥乔亚案件？

卡：对，是奥乔亚案件。我跟你说过那是一起一般性的犯罪活动。只不过那些活动的涉案者是些担任过很重要职务、甚至是立过大功的人——奥乔亚在执行革命任务和国际主义任务中立过功。实际上他们的活动构成了叛国罪，国家曾因此而被置于十分困难、差点险遭不测的境地，可以被认为犯的是政治性的、破坏性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军事性的罪行。在我国当时的情况下，担任过如此重要职务的人进行了这种性质的活动，可以被认定犯了叛国罪，虽然不属政治性质，但对国家而言相当于同等的、甚至是更加严重的叛逆罪。因此，他们的行为被认为是叛国。

拉：因此交由军事法庭审理？

卡：是的，他和其他几个人是武装力量和国家全部队的军官。我想，对奥乔亚、警备队的托尼以及另外两人被枪决没有多少人会像我们大家那样感到痛心疾首。您知道，敌人的宣传，美国的宣传企图把这一问题说成是内部对立、争权夺利问题。只要古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不可避免地都会与谎言、野心、恐惧、争权、夺利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这四十六年里，发生的每一件事，不管是什么性质的，都会被用来进行政治炒作。

拉：你们已不再因为政治原因实施极刑了吗？

卡：从未因反革命活动而动用过极刑。我不知道我们一旦抓到了波萨达·卡里莱斯或哪个安放过炸弹和进行过这么多暗杀行动的人，古巴会发生什么事。我要告诉您，我们在处理那些私带武器入境，甚至因而造成过人员死亡的反革命分子的案件上与许多人的意见相左。我们对他们相当宽大，以免因而动用极刑。

这些事实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蓄意犯罪的严重性，而且确实是些性质严重的犯罪行为，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些不道德、卑鄙下流的行为。我认为这些人实在不应该私运武装，他们的罪行，按照法律和绝大多数群众的意见，都该被判死刑。我们甚至还因为没有把这些被雇用来为一个帝国主义大国效劳和屠杀生灵的人罪有应得地判处极刑而遇到了一些政治性的困难。

但我想跟您说的是，有些事实，不论动机是什么，产生的影响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影响大一点的案子，我们在做这样或那样的抉择时困难也更大些。这一细节不应忘记。

实际上极刑的判决要提到国务委员会上讨论，这样一来便把国务委员会变成了集体的最高法院。这个责任在欧洲可能只由一个人来负，而在我国是集体地由国务委员会的31名成员来负。该判死刑的罪行都是些令人发指、骇人听闻的一般性罪行，如残酷的谋杀、强奸女童等。强奸女童并把她杀死是十分可恶的事件，对这样的案件如果不判处最高刑罚的话，可能会在人民群众中引发政治性质的严重问题。

您知道，在古巴关于这种鲜血淋漓的事件是不会公开宣传的。这里不存在所谓的“红色新闻”，可能会引起不良效果的有关凶杀事件的报道不予发表。过去这类新闻司空见惯：发生了一宗杀人肢解案，大肆报道，不久又发生了另一宗手段更为恶劣的肢解案。疯子、完全失去了理智的人总是有的。宣传这类案子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助长同类罪行的发生。

自从1976年通过宪法之后，凡是判处极刑，无论上诉还是公诉，都要提交国务委员会审批。您看吧，这31位国务委员都要为每个案件伤透脑筋，为了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必须得仔细分析全部案情，就好像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头头们一样，无论罪行多么严重，谁都不喜欢因此判处极刑。此外，还得考虑到对每个案件的舆论反应。

虽然您不报道某些案件耸人听闻的情节，但没有一个案件是不为人知的。虽然报上不登“红色新闻”，但口耳相传，照样广为散布，对罪行的反感常常是一致的。

应当听取群众的抱怨。这往往是双倍甚至三倍地令人头痛的事：第一，要把握好群众对罪行的厌恶程度；第二，要本着惩罚的出发点是制止犯罪和保护社会的理念做出看起来比较正确、比较恰当的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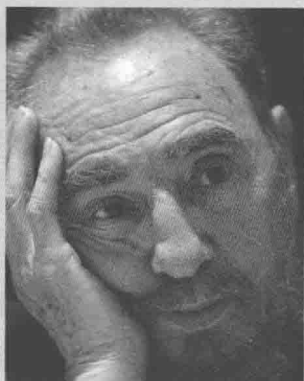
拉：国务委员会对政治性犯罪和一般性犯罪是区别对待的吗？

卡：在处理这两类罪行时是加以区别的。反对极刑的人提出的理由之一是，死刑无法制止重犯这种罪行，它还会再发生。

鉴于开初的这种情况，我们先是放慢分析案情的过程，后来又开始有意识地拖延执行死刑的过程。这一运动多年来一直停留在早期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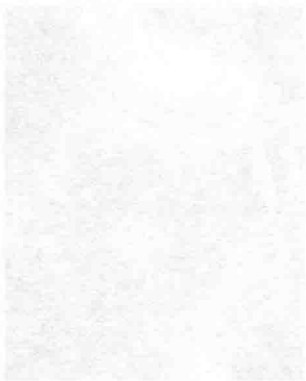
我们也意识到，反对极刑的主张在世界上呈越来越扩大的态势。对死刑持反感态度是自然的，没有受过仇恨、冲动或复仇思想教育的人更是如此，这对一位政治领导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至少我们没有复仇思想，我们有的是战争时期的经验。我跟你讲过，当起义军中出现流寇主义思想苗头时，不得不执行十分严厉的革命法令——枪毙。这种情况很少，但从根本上铲除了流寇主义，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

这与感情因素无关，不管是哲学家的感情，还是宗教的感情。按照我的看法，最最有力的一条理由是看它的效果如何。我认为，在有些罪行中执行死刑实际上不产生效果，而我认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执行这种严厉的刑罚，能够产生效果，甚至是长期的效果。



我
的
一
生

第二十二章 2003年4月的劫持事件



劫机—会引发又一次移民潮吗？—劫持雷格拉渡轮—谈
判—美国当局的态度—革命、社会主义与犯罪行为—处决三名劫
持犯—若泽·萨拉马戈的声明

拉：有关这些问题我想问问您关于2003年4月执行的最近三起处决案。出乎意外的是，判处了三个人死刑并已处决，而这三个人尽管劫持了一条船并干过一些事，但实际上他们没有杀人或伤人。这几个人被判死刑着实令人吃惊^①。

卡：这次劫持是此类事件中的一起。存在着爆发劫持浪潮的极大危险，伴随这个浪潮而来的必然是美国以此为借口在整个“先发制人战争”思维的指导下入侵我国。

2001年9月11日纽约发生了恐怖袭击并兴起了一股好战浪潮，我们称它为纳粹法西斯浪潮。好在我们曾谈到过1994年8月5日事件。我对这件事始终记忆犹新，因为当时我们已经面临出现移民潮的局面，在哈瓦那湾里已找不到安全的船只和游艇，并已停止了安全的海上旅游和捕鱼活动，什么都没有了。

那时总的经济形势十分困难，1994年我们已经历了三年的特殊时期，物资严重匮乏。绝大多数人是有决心保卫革命的，但是受到煽动想去美国的人——我告诉过您曾经有过一项并未履行的移民协定——也为数不少。我跟你讲过，那些想通过其他途径移民美国的人是可以出去的，一般来说，通过非法途径去美国的人都是些流氓无赖、犯罪分子，许多人都有犯罪前科。

这一回，2003年4月，他们又想挑动什么呢？他们想挑起1994年8月曾出现过的那种情况，那时美国人在把发放的签证减少到每年不足一千

^① 2003年4月1日，一帮人在哈瓦那湾劫持了一艘载有几十名乘客的渡轮。劫持失败了。主犯们遭捕并受到审判。他们中3人被判处死刑，并于2003年4月11日被枪决。

份后，宣称他们将派船接走希望移民的人。

拉：当时的局势像只高压锅。

卡：是的。那段时间本来应该发放1万份签证，却只发放了500份。在布什执政后的新形势下，一些极端分子像奥托·赖克之流、罗杰尔·诺列加之流以及所有那些匪徒产生了一个念头，挑起移民潮，借此滋生事端。

他们这些图谋我们都知道，虽然我们对许多细节不完全掌握，也不清楚将以何种方式制造危机。所以，这类性质的计划他们是早已酝酿好了的。依我看来，从道德观念来说，那些拿了美国工资去搞阴谋活动的所谓的“不同政见者”们的罪行比那几个被判处死刑的人更为严重，这就是您想知道的，为什么他们虽然没有造成流血和死人还要被判死刑的缘故。

在当时情况下，劫持船只事件是和我跟您解释过的局势联系在一起的，性质十分严重，严重极了，但是，听着，要是没有发生此前发生过的事情的话，还不能说得那么严重。就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两个小时，晚上7点钟，发生了一件几乎从签署移民协定以来的十年里从未发生过的事。

拉：十年来没有发生过劫持事件？

卡：这里在很长时间里发生过偷盗船只、偷盗喷农药和其他生产用的飞机的事。但是自从1994年签署移民协定的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劫持带乘客的飞机事件。令人奇怪的是，2003年3月19日星期三伊拉克战争打响前大约两个小时，一架客机从以南80和100公里的青年岛起飞，做当天的最后一班飞行，在到达博耶罗斯机场时报告说被劫持了。6个人手持利刃闯入驾驶室，用匕首对准驾驶员和副驾驶员的咽喉，这种劫机的方式与炸毁纽约双子座大楼的劫机犯们使用的方式如出一辙。这是非常奇怪的。

拉：他们想去美国吗？

卡：是的。但是飞机上带的燃料刚够在美国基韦斯特（Key West，又名“骨头岛”——Cayo Hueso）降落。机上燃料本来只够飞青年岛一个来回。那是一架载客40多人的飞机。劫匪有多人，几个月前就开始策划了，他们已来回了好几趟，观察如何躲过安全检查，甚至还拍了照片。我们在这方面有疏忽，因为多年来一切正常，例行公事，正如我跟您所说，已经十年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了。

美国接受了他们。美国当局做了些什么事？拘捕了6个带匕首的人，对几个同谋犯则按照“古巴修正案”，立即给予他们居住权。美方开始侦讯，侦讯期间扣压了一部分古巴机组人员，把飞机留在了那里，为迈阿密恐怖主义黑帮没收飞机创造了条件，后来他们果真没收了飞机。其余的旅客都受到了虐待，对那些愿回古巴的旅客使用了各种粗暴手段鼓动他们留下，总之，围绕这架飞机问题他们什么卑劣的事都干了。

自从古巴20多年前采取了一项措施后，再也没有美国飞机被劫持过。过去经常有载着200甚至300名乘客的美国飞机改道飞来这里。劫机者手持一只瓶子，瓶口上放着火绳，说是汽油炸弹。这些人往往因为精神失常，说不上是政治问题……有些则是逃犯，有些是亡命之徒，也有的是神经病患者。有时候好几个星期没事，有时发生了一起劫机事件后同一星期里会发生三起、四起这样的事，好像那些有冒险倾向的人之间，流行着某种心理传染病似的。

我们十分谨慎地处理了这些被劫持的飞机和乘客，必要时还给他们供应燃料，并立即送还飞机和乘客。这种情况发生过好几十起。正是美国人在古巴革命初期发明了那种敌视古巴的办法，他们像欢迎爱国者那样接待古巴劫机分子，广为传播消息，鼓励其他人放心效尤。从此，全世界开始了劫机现象。

古巴解决了他们的劫机问题，他们却没有惩罚那些偷盗我们的飞机或船只的人，而是相反，完全纵容他们。谁都没有料到，自从1994年起有了移民协定后，还会在2003年一场战争爆发的前夕发生一架古巴客机遭

劫持的事件。

这一事件在古巴激起了极大愤慨，更为严重的是，几天后迈阿密的一名法官宣布暂时释放6名劫机犯。嗨！他们不认为劫机犯是危险分子，而且还认为他们是古巴的“不同政见者”，实际上他们的劫机与政治风马牛不相及。他们利用了政治形势，但本人往往不是政治活动分子。您分析一下这些人的作案动机，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作案人都有刑事前科，或有法律问题，或是些打架斗殴、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家伙。不是说所有的人，但确有不少人受过法办。这号人都好逸恶劳，靠从事反社会活动为生。总之，这些人都有进行劫持活动的思想基础，是些亡命之徒。

近来我们一直在同社会工作者一起做一项工作，让那些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人重新回归社会，帮他们找到工作，有谋生手段，了解社会情况，因为实际上这些犯过罪、有过前科的人很难找到工作……然而，那次事件实在有些蹊跷，谁都不能保证说那号人物没有被革命的敌人所利用。偶然性太大了。尽管这一行动性质极其严重，他们却几乎被立即释放，这种做法也太离谱了吧。

拉：当这里的人们得知6名劫机犯在佛罗里达获释时发生了什么事？

卡：3月29日得悉6名劫机犯被释——此时伊拉克战争已经打响了10天——不久，31日又一架乘客更多的飞机被劫持。也是直接从青岛起飞的，但这架飞机载客量稍大，共45名乘客。

有个人拿着手榴弹——假装拿的是手榴弹，说要炸掉飞机，他自己待在飞机尾部。他要求把他送到迈阿密去。燃料不够，驾驶员降落了——他不愿意让人抢走飞机，他说无论如何不能丢了飞机，他把飞机降落在哈瓦那机场，但降落在跑道当中，跑道因此而中断了一整夜。

那时我们得到证实，美国方面有人不希望飞机飞往佛罗里达。他们也在关注此事，并在采取行动。我们立即向他们通报了发生的事，他们随即发来一个声明，表示他们反对，甚至要求公布消息。他们同我们谈了这个想法。

差不多与第一架飞机相同时间，第二架飞机被劫持了，也是从青年岛起飞的末班飞机。我们立即查询资料，试图说服那个人，通报了美国国务院，并叫醒了美国照管利益办事处主任。于是他们送来了一个相当正面积极的回音，表示反对，不同意让飞机飞往美国领土。

在他们发表这一声明后，我们要求他们派人将声明内容告诉劫机者。他们立即派遣美国照管利益办事处主任，那个叫詹姆斯·卡森的去传达这一声明内容，奇怪的是，虽然谁都知道此人的全部来历，但卡森还是执行了指示。他到了机场，和驾驶员通了话。因为唯一的联络方法是同驾驶员通话。那个劫机者——带着手榴弹的那个人——不愿和卡森通话，说不行，怎么能证明通话的人确实是卡森。卡森告诉他愿意把自己的护照送给他看以兹证明，卡森想了各种办法让此人相信自己真的是卡森，并要求他停止行动。

大家甚至想出了一个主意，飞机不在佛罗里达降落，而是飞到别的州去。因为大家知道，去了佛罗里达一定会节外生枝，那里是反古巴黑帮的天下，司法机关等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但困难在于飞机没有足够的燃料，加足了油也飞不到别的州去。这场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折腾了整整一个早晨。

拉：您本人也到了现场？

卡：是的。卡森先生来的时候，我不在，我不愿意见到他，哪怕是远距离我也不愿见到他。但是古巴民航局的同志们到了那里，他们做了种种努力设法处理好这一复杂局面。外交部的同志们也在场，一位外交部官员陪着卡森。华盛顿方面指示卡森去机场时，我相信此公睡得正香，他大约是在凌晨1点或1点半被叫醒的。卡森来到飞机旁边，因为这样他可以不用通过驾驶员直接与劫持者说话，那个带着手榴弹的人却拒绝与他交谈，一个劲儿地说不。

看得出发生了意见分歧。美国照管利益办事处主任在2点半左右回去睡觉了，我留在机场做说服工作。

拉：您同劫机犯说话了吗？

卡：开始没有，我同驾驶员说了话，没有同劫机犯说话。我对驾驶员说，请打开飞机上的扬声器，我要同机组人员讲话。我同机组人员通了话，我叫他们切莫惊慌，因为那家伙威胁要扔手榴弹，我谴责了那个家伙的行为，说：“这是个不负责任的人。”我一直在观察这个人的一举一动，因为他的行为让人觉得有必要从心理角度去分析他。劫机犯强迫男人们集中到前舱一间行李室内，把妇女儿童带到后舱。他自己就待在后舱。

拉：他是单独一人，还是有同谋？

卡：单独一人，但他带着两颗手榴弹，紧紧握在手里，进行威胁。说：“等太久了，要是不给我加好汽油，我把飞机炸了。”我指示驾驶员：“你要这么说，你要那么说。”当此人进行威胁时我大声回答道：“你要是这么做，那您绝对是疯了。”我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为了试探此人的危险程度。哦，这时天已大亮。卡森还在睡觉。假如那时候我们允许飞机起飞的话，它也只能飞到佛罗里达，不可能去别的地方。长时间的对峙。有一度时间，机舱门被打开了一下，让男乘客都下来，由于飞机上有妇女，男士们出于礼貌，要让女士们下机，男士们说女士不下他们也不下机了。此外，还得研究汽油怎么个加法，要找个适当的办法。

为此又争执了好久。我们设法保护乘客，可以让他们都下飞机，由飞机带着劫机者去佛罗里达。但驾驶员拒飞，他说不愿意到了那里后飞机被没收。我当然对他说：“喂，你要听从我们的命令”，我的语气非常坚定。他不吭气，我又说：“您要照我说的办。”驾驶员还是罢飞。

我一直在揣摩那个人的心思，他把妇女和儿童赶到一边，把男人赶到另一边，他要干什么。我对民航局长阿塞维多说：“阿塞维多，你通过扬声器对机上人讲话，告诉他们那人是个罪犯。”我指示他向乘客讲明情况，要他们保持镇静，但是阿塞维多的讲话却一个劲儿地声斥那个劫机犯。

阿塞维多大约讲了半分钟话，他讲完后我对他说：“喂，你说的话和你的说话方式正好使那个人做出相反的事来。”于是，我只好决定自己对

机组人员、对机上全体乘客讲话了。

拉：您对乘客们讲话了？

卡：是的，我对他们说：“你们能听出我的声音，你们都听过我讲话。”——当然，我说话很镇定和平静——“这个人在威胁妇女与儿童的生命，他顽固不化，情况危急。”我呼吁他们，一旦觉察到他要掷手榴弹，就夺去他的手榴弹，不要让他扔出去。我向他们发出呼吁，给他们指示，我向他们解释，我们没有答允劫机犯的任何要求，但我们还在寻求解决办法，我告诉他们，美国人不让飞机飞到他们那里去。我把一切有关情况都告诉了他们，说劫机犯甚至拒绝同美国利益代表处主任说话，他坚持一种非常可耻的立场。此人态度依然十分强硬，为了软化他并提醒乘客，我说，到了最后时刻面对危险你们要采取行动。全部问题在于把握好此人的危险程度，采取正确的措施。

拉：让他放人，是吗？

卡：是的，让他放人，给他加油，让飞机降落在别的地方去。天亮时我们不得不把地理学家都叫来了，让他们研究一下其他的地图，因为航空地图没有包括那些地方的情况。我们在电话中说：“多找些地图，弄清楚从这里到某地某个机场的确切距离。”看看有什么地方去得了。机上汽油至少可以飞一百多公里，刚好抵达另一机场的边上。我们做了种种估计，没有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这时，那个家伙气急败坏地对阿塞维多说：“快让飞机起飞。”阿塞维多回答说：“汽油不够飞到巴哈马。”其实飞到巴哈马是做得到的，我们可以同那边的负责人联系。我们不知道他们如何反应，但去巴哈马有很大的缺点，我们同这个国家有一个关于非法移民的协议，对该国意义很大……他们会把非法移民遣返回来，但他们有许许多多的岛屿，偷渡分子是不会尊重别国主权的……

不久前刚开过一次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议，现在要同他们通电话是做

得到的，要求他们等飞机在那里降落后，逮捕劫机者并把他遣返古巴，这并不困难。可是这样做有什么不合适呢？第一，要找到总理，看他不在那里，要做他的说服工作；第二，我们做的这一切并无意义，因为真正起作用的是美国人说话要算数，不让飞机去他们那里，不扣留机组人员，我们不愿意飞机被没收，也不希望同谋犯——如果有的话——留在那里。当然，所有这些条件，我们都要提出来让美国人考虑，看来他们似乎也希望不要发生曾经发生过的事。

去巴哈马还有个问题，即使在巴哈马得以给劫机者加上汽油，飞机还是不能去任何地方。我们可以说：给他加油吧，让他飞到美国任何一个州去，可是，我们这里担心什么事呢？即使在巴哈马加足了汽油，飞机也到不了美国的哪一个州，而会掉进海里。于是又想到了另一个办法：也许勉强勉强够飞到牙买加，因为驾驶员常常留有一点备用油；就算勉强勉强到了牙买加，等于把这个难题转加给了牙买加人。所以决定不这样做。告诉劫机者说不行，因为到了牙买加也同样解决不了问题，这不是几分钟能解决得了的事，要冒很大风险，飞机没有飞到牙买加可能就掉进了海里。

哦，我们在机场既准备了加油车，也准备了救火车，采取了各种措施，要提防手榴弹爆炸呀。

拉：你们查清楚劫机犯的身份了吗？

卡：嗯，我们一直在乘客名单中寻找谁可能是劫机犯，因为有一个妇女和一个女孩……嗨！一开始犯了个错误，发现有个人像是嫌疑犯，是旅客中的一名医生和他老婆，一度怀疑他是劫机犯，可是弄错了。经过三四个小时的调查，到了上午传来情报说不是他，是另一个人。

查到了那个人的住所，发现在他家中藏着几个制造手榴弹的石膏模子，这可能是用来浇铸手榴弹外壳的，但我们不清楚此人是否已经铸造成了手榴弹……此外，还发现了我想是一些塑料材料吧，因此怀疑他可能会有真的手榴弹，虽然还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这一点。我则根据分析他的各种回答、反应和情况，越来越倾向认为他并没有真家伙。

我们发现，劫机犯的兄弟是我们内务部的一个工作人员，在马坦萨斯省找到了这个兄弟，他后来也去了机场并提供了帮助。我说：“把他叫来，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说服工作。”让他过来看看能否和他兄弟找出一个解决办法，我们告诉那人如果放弃劫机行动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对大家则说他一定会受到惩罚。等他兄弟到了机场也许能同他商量出一个解决办法来。为此我们又继续斗争了好久。与此同时，我们一直在等待美国方面的消息。

拉：这段时间里卡森回过机场吗？

卡：拂晓时，我们就告诉卡森，汽油不够，飞机飞不到佛罗里达以外任何其他州，希望另找一个地方，比如一个空军基地可以允许飞机降落并为其提供更多的便利，然后把飞机连同驾驶员和乘客送回古巴。美国人一直在开会研究，似乎那天上午在国务院或其他什么地方他们一直在争论不休。

各种各样的理由都摆出来了，跟那个人谈来谈去，争取他下机来谈。我们开始在新的基础上谈判，即同意给他加油，以便继续飞，又向他解释了各种困难，以达到拖延时间等待美国国务院答复的目的，这时大约已是上午11点钟。同时我们又争取时间以便让部分乘客下来，并给飞机加油。时间在斗争中一分一秒地过去，那家伙也累了，我们一点一点地争取，先是给孩子们送水，后来又争取到从机上放下22名乘客，减少了重量，汽油已够用了。

那时我们又再次拨通卡森的电话：“有消息吗？”“没有。”过了一会儿又问：“有消息吗？”“没有。”还是确定不了可以准许飞机着陆的最终地点。我们告诉卡森已经争取到放下来了22人，可以飞到任何一个州去了。“请考虑，可去哪里，已没有危险了。”已经给了相当多的时间，因为这一安排——从飞机上下来22人——是在上午9时做出的，我们给了他两个小时，但还是没有答复。我们再等：“有答复了吗？”“没有。”“有答复了吗？”“没有。”这时已是上午11点钟了，已跟那人谈好把加油车开过来，马上加油。计算了一下加油需要多少时间——可能需要20分钟，

一小时或一小时半，需要多少时间就花多少时间，为了消除手榴弹问题带来的危险性，也为了达到飞往其他州的目的，这就要看美国当局方面是否真的愿意改变政策。我觉得，可以看出美国方面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政策。

拉：华盛顿有两种不同倾向？

卡：是的，无疑那里出现了两条路线，我们不知道哪条路线会占上风。与此同时，那个人必须在 11 点钟左右动身，应该找个借口拖延时间等他的兄弟到达。已电话联系过，他正想尽办法赶路。一架飞机——我记不清楚是飞机还是直升机——载着他离开了巴拉德罗。我焦急地看着表，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一会，但他们总算到了。我想，这位兄弟差不多就在这个时间到的，呵！那家伙正在要水，要求给他和乘客所需的一切，还向我们要钱，瞧，——多古怪的头脑！——他要我们借给他一千美元，好给乘客一点钱以备下飞机时用……我们还在等待华盛顿的答复。他要这要那正好帮了我们的忙，他兄弟的飞机迟到了好久。他兄弟终于到了，同他谈了话，但那个家伙对什么都不相信。就这样争取到了时间。此时已是 10 点 55 分：“有答复了吗？”“没有。”到哪里着陆？不知道。

拉：你们把事态演变的全过程都通报卡森了吗？

卡：我们把采取的每一步骤都告诉了卡森。“听着，我们做了什么，劫机者做了什么，怎么同他谈话，争取到让多少人下飞机，他的兄弟已赶到……”全部情况都告诉了卡森。说明起飞的时间到了。“我们再磨蹭一会儿。”利用劫机者的兄弟，利用别的借口再拖一下，给他准备点三明治、现金什么的。民航局长阿塞维多显出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我对他说：“你这里有钱吗？”他不理睬。嗨，不是他不愿理我，他心里烦着呢。我又对他说：“喂，你这里有现金吗？”“有。”我说：“好吧，给他 500 美元。别给他 1000 美元，就给他 500 美元得了。”争取时间嘛。他们把钱给了劫机者。劫机者说：“都准备好了吗？什么时候起飞？”他的语气很强硬。“还没有，喔，快了。”

于是，我们又对跑道上的工作人员说：“喂，干慢点。”他们便慢慢悠悠地干着。我们准备好了两名驾驶员、两名副驾驶员，他们从飞机前门进去，换下了原来的驾驶员，没有让那个人看见。事实上这两名驾驶员已一整夜没有合过眼了。美方的答复还是没有到。好吧，我们告诉驾驶员：“准备起飞。”大约在11点54分飞机起飞，比预定时间推迟了一小时。美国照管利益办事处的人还是没有得到答复。我说，好吧，你们在天上再等一会儿。飞机飞上天时，卡森收到了答复，要飞机在基韦斯特机场降落……这是个最糟糕的地方！比任何其他基地都糟糕。

到了那里，我们的人再一次受到了虐待，他们逮捕了劫机者。哦，那家伙还带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儿子，儿子不是他的，是那个女人的，不过第二天他们就把那女人和儿子放了。那个女人不好，是从犯，那女人参与了携带手榴弹或制作手榴弹的塑料材料之类的活动。劫机犯的手榴弹不是钢制的。

拉：是为了不被检测出来？

卡：是的，但是美国人第二天就释放了那位女士，劫机犯还留在那里。他们公开审理并虐待所有的乘客，千方百计迫使一部分人留在美国，他们扣压了部分机组成员，等待有关方面的调查，还没收了飞机。他们所做的一切与原先做出的承诺完全背道而驰^①。

拉：第二天，2003年4月1日，在哈瓦那湾又发生了一艘满载乘客甚至包括几名外国旅游者的船被劫持事件。

卡：事情确实来得非常蹊跷。第二天早晨传来消息：前往雷格拉的游艇遭到几名手持手枪和匕首的歹徒劫持……哦，我们遵循的原则是：谁都不要去阻拦。船离开海湾进入了海面。他们通过无线电话与我们联络，到

^① 2003年9月19日，几个月之后，佛罗里达的一所法院判处——40年来第一次——此次的劫机犯20年徒刑。另一方面，2003年7月美国当局第一次将在卡马圭劫持船只的12名古巴人驱逐到古巴。数十年来古巴一直在呼吁对海盜行径采取此类措施。

了离古巴海岸约六七海里的地方时提出要求，派一条船把他们全体送往佛罗里达。说：“我们带走了50人——他说50人，实际上没有那么多，我们还带着多少多少个孩子，带着……”

劫持犯的头目说带着一群儿童和外国旅游者，6个到8个儿童，五六个外国旅游者。他们夸大了数目，后来知道实际上只有一名儿童。很奇怪船上没有更多的儿童，因为一般情况常常载有一群儿童。

拉：这条船要去哪里？

卡：这是一条摆渡船，一条载客量一百人的渡轮，在海湾里为哈瓦那老区和其他市区的人摆渡到海湾的另一边去。

拉：去雷格拉区吗？

卡：是的，这是一艘只能在风平浪静的水面上航行的渡轮。这种渡轮都是平底的，不可能在浪大的海上航行。他们劫持了这么一条船，说是载有50人，是在天亮时劫走的。我去了解情况时已是上午九十点钟了。他们已发出了第一次威胁，要求送条快一点的船去，威胁说不送船去就把人质扔到海里去。这是发出的第一次威胁，接着又用无线电话重申了这一威胁。我询问了我们的边防人员，他们报告我说，跟往常一样，已通知了美国的海岸巡逻队。

拉：这事发生在我们刚才谈到的劫机事件之后多久？

卡：24小时之后。

拉：您刚刚结束上述飞机事件的谈判。

卡：飞机是3月30日被劫持的，31日谈判了一整天，4月1日天刚亮就发生了劫船的事，属于同一性质……劫机的消息可能在31日就向民众广播了。很可能是在佛罗里达宣判有条件释放3月19日用匕首劫持第一架飞机的那些劫机犯的消息一传出之后，这伙人就开始策划劫船了。他

们头一天在某个人的家里开了一次会，相当仓促地做出了劫船的决定。我虽然不能确切告诉您，但我敢肯定第一次劫机的消息推动了这一新计划，这回选择了雷格拉游艇作为目标。

拉：他们是9个人吧？

卡：这伙人确实数目众多，统统是同谋犯，可能有11到12个人，其中还有几个妇女。那个带孩子的女人就参加了密谋。

拉：您是否认为，这些事件，这次劫船，加上前两次劫机等，可能引发一次新的移民浪潮，一次新的移民危机？

卡：这是明摆着的。而且已得到了证实。抢劫雷格拉渡轮具有象征意义，因为那是一艘不能航海的船，这事是美国当局鼓动出来的。

3月19日发生了第一次劫机，美国人接纳了劫机犯，做了一切他们想做的事，就差没能公开说出来：“我们要当街释放他们。”还可以看出，一方面法官做出这一判决，另一方面检察院——不能不说这是莫大的虚伪——提出不能释放他们，要上诉到亚特兰大法院，亚特兰大法院的职权高于迈阿密法院，但亚特兰大已把有关权力授予了法官。这就是说，在发生了9月11日袭击事件之后的今天，由于局势十分微妙，他们做了某些努力，避免随便释放劫匪。但从长远看，是不可能阻止得住的……

我跟您说过，这里90%的非法出境者是他们从佛罗里达派船接走的。只有10%的人是乘了木筏或偷了小船偷渡的。这种做法已断送了许多人的性命，我跟您说过，这些船只大多严重超载，一些由做非法移民生意的蛇头操纵……到了那边，美国当局并不惩处这些有罪过的人。我们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对他们严惩。后来几个美国总统开始改变做法，在移民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立场。

拉：布什总统执政后，美国在移民问题上是不是后退了？

卡：他们做了些什么事？停发签证，与里根时期一样，找了一些借

口，借口总是能找到的。事实是他们停发了签证。不久詹姆斯·卡森来了，接着发生了3月19日的怪事——伊拉克战争打响前两个小时——那几个人手持匕首劫持了一架满载旅客的飞机。接着开始发生了一系列相类似的行动。

4月1日黎明时分，发生了雷格拉渡轮事件。几天后甚至有人袭击了一名士兵，抢走了武器。第三起劫持事件被我们制止了。已发现30多起劫案的作案人都不是出于政治动机。所有的案件都是由1994年8月5日的罪恶事件引发的，那时他们制造了哈瓦那骚乱，他们造成的这种局面使得我们不得不对美国人说：“我们不再替你们看守海疆了。”于是，我们不再看守海疆了。大量群众乘坐木筏出逃正是发生在这个时候，这引起了他们的恐慌。现在，伊拉克战争开始了，在这一新形势下，他们又把此事当成了最好的借口以制造乱局，为其侵略行径辩解。

拉：雷格拉渡轮劫持事件是怎样了结的？

卡：他们开走的船行驶一段时间后燃料用完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把内务部长阿维拉多·科洛梅·伊瓦拉派去了，边防警司令也去了。我对我的一名助手说：“喂，去找一条燃料船，再派几艘快艇一起去那里。”一定要避免发生1994年7月13日那样的翻船惨剧。

当天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佛罗里达海岸巡逻队说要像往常一样派几条船来……过去我们每次通知他们有偷渡情况时都是这样做的。这次他们突然通知说已下令他们的船头掉头返航，说有一条不知哪一年——我不知道说的是不是1988年——的法律规定，被劫持船只挂哪国国旗就由哪国处理问题，他们说这件事应该由古巴处理。

他们明知有一条船只被劫持，船上有人质和几名危险分子，他们可能曾经说过：“喂，我们不让他们过来，我们要派船把他们遣送回去，保证对他们像对所有人一样。”其实美国人从来没有兑现过自己的承诺。他们高兴时准许20%或更多些人留在美国，多少满足一点迈阿密黑帮的要求，那帮人是反对全部遣返的。

他们送来了一个通知，告诉我们他们不再按惯例办事了：等候，靠近，监视，进入美国领海后再做决定。估计他们想履行一项协定，他们的做法似乎在说：“你们自己去处理吧。”我们就不得不自己来处理这件事了。

嘿，被绑架的公民什么人都有，还有儿童和外国人。我的指示是：“给他们多送点东西去。”海面上是三级浪，越来越危险。在到达大约22海里左右之前，我又说：“派去几艘快艇、一组救护人员、一条拖船什么的。”我们当然不会袭击渡轮，那是愚蠢的。应该想方设法避免沉船。所以我们派去了内务部长。具体指示是：——我们大约有三条船在那里——“一条船部署在劫持船右侧100米，另一条在左侧100米，第三条在船后一公里处，密切监视，万一出事立即抢救。保持这一状态，一直护航到美国领海。千万留神，直至到达那边。”

美国当局出尔反尔地宣称，这是我们的事，他们知道船到了那边该做什么。他们先是说跟往常一样派船来接，后来又这样答复我们。当劫持船燃料用完时，停航不走了。

劫持分子继续扣着一群妇女当作人质，用尖刀对准她们的喉咙进行威胁。他们始终把刀架在几名妇女甚至几名外国旅客的脖子上。他们清楚知道，这样做能起到什么作用。当燃料用完时他们同意用拖轮拖。

那条船没有沉掉算是奇迹了。您要是看到了现场情况……那是一艘只能在内河里航行的平底船，这一情况美国方面也知道，但还是拒绝接纳。燃料用完后，劫持分子同我们电话联系，表示同意在船头上系条缆绳由拖轮拖着走，但他们不改变态度。就这样到达了马列尔港，靠近一个码头，却不肯靠岸，只用一根几米长的缆绳拴在堤坝上。

他们显然要去寻找燃料，跟那架要求加油的飞机一样，对什么都不信任。

拉：您也在亲自关心此事？

卡：我也在关注此事。我告诉您为什么吧。整个工作过程持续到了大

约晚上 11 点，各军兵种、边防警都到场了……您是知道在欧洲和其他任何地方发生了劫持事件是怎么做的嘛，采取各种行动，甚至发起突然袭击，随意开火，格杀勿论。

我们在那里集结了特种部队和边防警察，而大家想的只是解救这条船。我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叫他们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拉：您去了马列尔？

卡：我先用电话向他们发指示，待处理完了其他事情立即赶往那里，我是抢在估计他们可能会采取行动解救人质之前赶到的。当我快要到达时——也就在差半小时就到午夜 12 点的时候——他们要我别再往前了，那边正要开始行动哩。

他们得到的指示是我们原先告诉他们的意见，即在两旁布置后备兵力，而此时船只几乎已靠近码头。哦，大家原来指望船一抵达码头劫持分子能恢复理智。我不放心，决定亲自去……我命令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动手的结果受到伤害的往往是乘客、劫持者以及所有的人。

快到 12 点时，船已停下，我一直是使用一部小小的手机进行联络的，电话联系得特别小心，我一打电话他们在美国都能听到。

拉：您说的话他们都听到了啦？

卡：我说：“告诉他们什么也别做。”当时我们的人正在做准备工作，正在策划如何解救人质。我到了，观察了形势，建议他们不要马上行动。那时几位负责人乘坐的那条快艇还没有到，码头上甚至还有一个商人，我对他们说：“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这很危险，应该寻找一个不流血的解决办法，避免人员伤亡。

说实在的，那天晚上，我们通过一辆巡逻车上的无线电话一直在揣摩那个像是担任头领角色的人物，这个人物是个真正的危险分子，他跟另一个人，那个飞机上带手榴弹的人完全不一样。

拉：你们查清楚他们的身份了吗？

卡：刚开始一无所知，得派人去调查。在现场你只能分析他的举止行为，听他怎么说话，如何辩解，观察他的文化水平怎样。得到的印象是，这是个没有文化的人。他用手枪顶着人质脑袋的姿势非常危险，他偏偏选择了法国妇女当人质，两个北欧人、两个法国人，一共4名妇女。

拉：4名外国旅游者。

卡：那个头目是个危险分子，这是我们得出的结论，于是开始研究整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一直在那里观察动静。所有人都已疲惫不堪，从头天黎明1点起一直没有睡过觉，已经过了24个小时，已说不清谁比谁更需要休息，是劫持分子呢，还是我们的人。我说了：“大家都去休息。”达成了某种“休战”协议，让大家都休息。我们给孩子们送去了水。他们说：“4个或6个娃娃。”我们给孩子送去了牛奶，给人质送去了水，在谈判中我们答允他们寻求某种解决办法。

我去睡了几个小时觉。那个劫持分子的头目同意派他的一个助手上岸，进行谈判。

那个派上岸的人态度十分骄横、强硬，虽然那时紧张气氛已有所缓和。他们依然傲慢不逊，要价很高，进行威胁，提出了最后通牒。在那种情势下，我们改变了策略，对他们的要求不予回答，开始考虑如何解决问题，因为已无法谈判下去。我们不得不寻找别的办法，人质正经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

到了这个份儿上开始使用了一系列策略，更确切地说是心理战的策略。已经做好了几种动武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放弃了其中几个办法。尽管那个主要头目是个最危险的人物，但他也不是没有弱点可利用。

拉：你们考虑过武装介入？

卡：是的。他用手枪顶着外国旅客的脑袋，扳机是打开的，而且没有保险。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因为在水中找到那支手枪时，找枪的潜水

员差点被射出的一颗子弹打中。所以说当时的情况确实十分危险，就是说这家伙当时是可能会开枪的。但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才严惩此人的，问题不在这里。

当时情况确实很危险，必须因势利导。没有使用任何暴力，而是运用了各种心理战手段。一切准备都做好了，危险程度几乎已降到零。您要考虑到那时已是黎明“休战”之后 12 个小时的中午时分。终于产生了效果。我们在船对面的码头上部署了一支军队作为心理威胁，法国女人中的一个向相距很近的我们在码头上的军队做了一个几乎觉察不出的手势，分明是个暗号。她就是被手枪顶着脑门的那个法国女人。再说，那个混蛋已有点疲劳不支，相当浮躁，因为我们的联络电话一直关着，已有一个小时没有跟他说话，也不做任何答复。

为探测他的举止，我们又通了个电话……我对内务部长说：“告诉他，唯一的保证是释放人质。”时机已到，已到了下午时分，正当我们准备使用另一个办法确保不动武解决问题时，那个法国女人行动了……那个姑娘向码头旁我们的特种部队小分队的人做了一个手势，小分队的人请示了我们，我们说：“行，这是个最聪明不过的法子。鼓励他们跳水。”于是，两个法国女人跳下了水。那个面临危险最大的女人决心较大，另一个稍有点胆怯。两个人表现都很勇敢，我不知道她们用了什么借口，先是跳下一个，接着跳下第二个，连一个和绑匪头目站在一起的男子也紧接着乘机跳下了水。那个头目挥舞着手枪看水里发生的事，被劫持的乘客中有一个是我们内务部的人员连忙抱住了这个头目，两人扭打起来，都掉进了海里，那支手枪首先掉了下去。所以我们后来要在水里寻找那支手枪。大约 30 个小时后找到了那支手枪，并捞了出来。子弹就在水里出膛了。绑匪枪里装满了子弹而且没有上保险，要制服他是很危险的。他掉进了海里，船上的人都做了同一件事：跳水。

拉：没有人受伤？

卡：没有，一个都没有。当然，我们是采用了好多心理战术的。例如，

当他看见海上一艘快艇渐渐靠近时，显得十分慌张。现在，他已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快艇在水上打转。我们已做了在紧张情况下能做的一切，用尽了所有能使用的办法。现在这个结局是那个法国姑娘促成的，所有被劫持的人都跳下了水，绑匪也跳下了水，大家都被捞了上来。

我后来去看望了他们，跟那几个法国女游客谈了话，问了她们一些必要的问题，也跟所有的人质说了话。我没有跟那个绑匪说话，和其他几个说了话，问了他们一些事。在40个乘客中有几个是从犯，大约是12个人，还包括几个女人，那个带孩子的女人是绑匪的同谋，但至少还有28个乘客与劫船事件没有任何瓜葛。

拉：在同他们谈判时，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做过什么承诺，比如说，如果他们平安释放人质的话，就释放他们，发给他们去美国的签证什么的？

卡：哦，问题是他们制造出来的，哪怕想说服他们都十分艰难。这不是我所喜欢的，我说了：“告诉他们，他们将受到惩罚，轻重程度看每个人的表现”，如果他们愿意合作解决问题的话。说实话，原先曾谈起过如何优先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来着，但在美国当局采取了背信弃义的立场之后，出现了新的情况。

在那种情况下确实需要寻找一个类似美国飞机一再被劫持时采取的那种解决办法，我们遣返了那几个劫持最后一架飞机的美国人。从此在24年里没有再发生过一次劫机事件。现在所有的人，那些疯子、半疯子都懂得他们达不到目的了，因为我们会把他们全都遣送回去。这是美国当局在发生这几次劫持古巴飞机或船只时所不愿意做的事。要是他们肯干脆利索地遣返劫持分子的话，问题也就有望解决了。

具体到古巴的情况，严惩不贷还嫌不够，尚不足以为戒。应该让他们冒更大的危险，要警告他们在任何情况下劫机或劫船的人都休想得到一滴燃料，他们得不到汽油或任何合作，也得不到船或飞机。

第三点是，谁要这样做的话谁就将被起诉，国务委员会不会宽恕。

而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当局的态度，这里可能成为人质的人才会

有风险。所以我说：好吧，假如一架班机，一架载有 100 人的飞机在空中爆炸了，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谁对这些死难者负责？应该是那些一直在那边鼓励这种行为的人。所以我对许多时常批评我们的朋友们说，请你们好好理解我国的处境吧，古巴不能不进行自卫呀。

拉：即便在那种情况下，劫持犯还是会受到严惩，这在任何其他国家里都是这样做的。不过，为什么要判处极刑并且立即处决呢？

卡：实际上连这种警示性的惩罚仍还不足以为戒。对我们来说，当时情况非常复杂，我们曾准备同那个可能是头目的人在惩罚问题上做些承诺，我们对他说：“你们将受到惩罚，惩罚轻重看你们肯不肯合作。”我们也确实做了很大努力争取那人合作。然而我们当时的处境极其困难，就在审理此案的时候又发生了企图抢夺武器劫持另一架飞机的事件。根据各方面传来的消息，大约有一二十个甚至 30 个劫持飞机和船只的计划，策划者都是些胆大妄为的亡命之徒。

当时的问题都是美国人一手造成的。谁都清楚，在那种情况下，美国的态度证明了问题绝不可能得到解决。他们嘴上说劫持的飞机统统送还，到时候却只遣返了一名劫机者，问题不了了之。有了“古巴修正案”，于是有了劫持飞机的事，有了盗窃抢夺农用飞机、但还不是客机的事。谁都没有想到最后会发生这样的事，这确实完全出乎意料。

您想想看，劫持飞机是发生在伊拉克战争打响前夕，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最迫切需要做的一件事是立即制止此类事件发生，对我们来说，除了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劫持行为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避免出现劫持浪潮。其余的事以后再说和解释。我们必须宣布：“我们的政策是一滴汽油也不给。”因此，他们可以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降落，但得不到一滴汽油。也就是说，谁都别想弄到汽油。此外我们还要采取一些其他措施。

所以，由于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利用这种办法达到目的的可能性——虽然还可能从某个地方劫走一艘游艇什么的，也就不再可能发生劫持带有人质的飞机和船只的事情了，此时已无这种可能性。

现在请您听我告诉您什么道理：自2002年9月起美国人停止了执行十年来一直履行的一项协定。这不是在我们谈起过的检查执行情况之后，而是在禁止旅行之前6个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他们停止发放签证，并制造了1994年8月出现过的局面，制造了一个在古巴开始抢劫船只和飞机的混乱局面。您可以想象到我们为什么不得不重视这事，其重要性几乎超过一切。

他们使用了一种很奇怪的方法劫持飞机，谁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当时伊拉克战争还没有开始呢。劫持是在此之前就策划好了的，他们为此来过古巴好几趟。谁都不知道那是些什么人，人们知道的是那些人是外面派进来的，这很可能，我想可以得到证明，因为只需派进来一个人，一个头目就够了，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他们早已策划好了，好几个月前他们就停发了签证，并制定好了某种行动计划。他们已经成功劫持了第一架飞机。他们，美国人，跟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这其中蕴藏着多大的潜在能量。

奥列弗·斯通（Oliver Stone）^①再次来古巴时，我们会见了斯通和与他同来的人，费利佩·佩雷斯·罗克外长也在场，还有那8个袭击了一名古巴士兵、夺去了他的步枪企图占领和劫持一架飞机的家伙。这几个人都受到了惩处，虽然飞机没有劫持成。他们是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行事的，到了机场，并采取了行动。当然，没有一个人是出于政治动机。每个人都讲述了自己这段经历，都说了自己的动机。我们一起交谈，几乎就像我们现在在这儿一起交谈一样：“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这个那个。”所有的人都只上过9年学，只有九年级文化程度——有一个稍多一点。我们国家里每人都必须读书识字，而这些犯罪分子大多数只有九年级文化水

^① 奥列弗·斯通（1946年生），美国电影工作者。摄制的影片有《小分队》（1986）、《7月4日出生》（1989）、《肯尼迪》（1991）、《天生杀手》（1994）、《尼克松》（1995）、《一个普通的星期日》（1999）和《亚历杭德罗·马尼奥》（2004）。2002年在古巴摄制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纪录片《司令》（2003），该片原为美国HBO电视台专制，后因嫌该片批判不够而遭拒播。在2003年3月不同政见者被捕和2003年4月3名劫持犯被处决后，斯通重返哈瓦那，拍摄了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新的采访，作为《司令》系列片的续集，该片2004年制作完毕，放映时片名为《寻找菲德尔》。

平。在场的人都录了音，摄了像，整个谈话都由奥列弗和他的班子拍摄了下来，奥列弗还提了些问题，我也问了他们一些问题，我甚至跟他们解释说：“你们必须受到处罚，但是幸亏你们没有劫持成功。”

他们每个人都讲了因为什么原因决定劫机，什么时候做的决定。有一天我们说：“看看他们去。”他们就在这里，因为他们作案的地方属哈瓦那法院的管辖区。这一切都没有公布过，他们侃侃而谈就像您和我谈话一样。

拉：他们说了为什么要出走吗？

卡：他们什么都说了。可问题是还有三十多个劫持计划哩……

拉：在付诸实践？

卡：是的。有 30 个劫持计划，如今都已销声匿迹了。

拉：因此，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极刑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吗？

卡：在我所说的情况下，采取这样性质的措施一下子就把问题解决了。我们有一个前例可以说：虽然在美国这个国家里始终有那么多的疯子，有各种各样失去了理智的人，但在二十五年里没有人再绑架过一架飞机，过去曾经发生过几十起劫持客机事件，尽管我们一直在惩罚劫机犯。只是有一次，我们把劫机犯遣送了回去，从此问题就彻底解决了。要是他们同样遣返劫持者，问题也早就解决了。要是他们取消了他们的“古巴修正案”，也就不会有这类问题发生了，拉蒙内特。这就是历史，我全都讲给您听了，我差点忘了，我们已经有过一次访谈了。

拉：所有那些抗议这三起处决的人给了您什么思想情感上的启示？

卡：我们完全尊重大家从宗教、哲学或人道原因出发反对极刑的意见。比起社会科学对犯罪问题的探讨来，我们古巴革命者有着更为深刻的理由厌弃极刑，今天我国正在研究讨论这个问题。总会有一天我们能够让所有

的朋友们，也包括您在内，所建议的废除死刑的愿望得以实现。我必须说，我们特别难过没有能积极响应教皇保罗二世高尚的干预。

我对这位教皇深怀诚挚的敬意。我理解并敬佩他为生命与和平所进行的崇高奋斗。没有人像他那样如此强烈如此坚定不移地反对伊拉克战争。我绝对相信，他决不会劝说伊拉克人放弃自卫而任人宰杀，也决不会劝告古巴人去做类似的事。他清楚地知道，这不是古巴人之间的问题，而是古巴人民和美国政府之间的问题。当年耶稣用鞭子将商人们逐出了庙门，就是他也不会不捍卫人民的。

拉：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的声明^①使您感到意外吗？

卡：是的。我们感到十分痛心。我相信他稍微草率了一点。他没有深刻了解实际情况和我们的处境。但我尊重他的信念。我们的许多朋友对这些处决深感不快。我们尊重他们的原则。但是要看到许多是新闻炒作，制造了极大混乱。有几位曾发表声明批评我们的朋友，如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后来纠正了他最初的态度。我们非常赞赏我们的一些朋友至少部分地听取了我们的解释。

^① 若泽·萨拉马戈（1922—），葡萄牙作家，199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于2003年4月14日，即处决三名劫持犯数日后在西班牙《国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到此为止》的短文，他在文中宣告要同古巴保持距离。然而，在2003年10月12日刊登在墨西哥《日报》和哈瓦那《起义青年报》上的他与罗莎·米丽安·埃利萨尔德（Rosa Miriam Elizalde）的访谈中，萨拉马戈肯定地说：“我没有同古巴决裂。我依然是古巴的朋友。”

2010年若泽·萨拉马戈逝世。（中文编者注）



我
的
一
生

第二十三章 古巴与西班牙

费利佩·冈萨雷斯—何塞·马利亚·阿斯纳尔—西班牙社会党人与古巴革命—西班牙左派—与费利佩·冈萨雷斯决裂—佛朗哥与阿斯纳尔—胡安·卡洛斯国王—费利佩王子—曼努埃尔·弗拉加

拉：2003年3月逮捕不同政见者之后，西班牙政府前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发表了攻击您的严厉讲话^①。

卡：愚蠢的行为。他对我关于在西班牙不按司法程序处决“埃塔”（ETA）的巴斯克人的谈话大为恼火。因为我揭发说：^②在一位西班牙政府首脑——费利佩·冈萨雷斯——的授权下，数十名“埃塔”分子未经司法程序就被处决了，却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抗议，或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控诉；我还说，另一位政府首脑——何塞·马里亚·阿斯纳尔——（José María Aznar）在科索沃战争艰难时刻建议美国总统加大战争强度、增加轰炸次数和打击非军事目标，这将造成无数无辜者死亡和数以百万计人遭受巨大牺牲。报纸上只说：“卡斯特罗攻击了费利佩和阿斯纳尔。”对真实内容却只字不提。

我跟您说得十分清楚。当时西班牙政府对那些处决是脱不了干系的。他们的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是不可能不知情的。说他不知情谁都不会相信。稍有一点国家概念的人都知道，这样的行动没有政府的同谋是不可能实施的。他最亲密的合作者，内务部长和警察头子显然接到过命令。这几个合作者受到了审讯和惩处^③，但他没有。他首先要做的是对所发生的事承担责任。要是我也像他这样处事的话，在古巴我再也无法向别人下达命令了。

① 对安德烈斯·奥本海默（Andrés Oppenheimer）发表的讲话。见2003年6月13日迈阿密《新先驱报》。

② 在2003年4月25日古巴电视台一次特别节目中的讲话。见菲德尔·卡斯特罗：《人民最神圣的职责是保卫祖国》，国务委员会出版局，哈瓦那，2003年。

③ 费利佩·冈萨雷斯政府的内务部长何塞·巴里奥努埃沃（José Barrionuevo）和安全国务秘书拉斐尔·贝拉（Rafael Vera）分别被判处11年和7年监禁。

拉：您同费利佩·冈萨雷斯有过多年的交情，是吗？

卡：早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成为国内重要力量之前，即从1976年西班牙民主开放时期开始，我就认识费利佩了。也就是在1977年第一次大选前他当选为众议员的时候。他于1976年6月访问古巴，我们谈得很多。后来，他多次访问拉丁美洲，经常路过古巴。他去了巴拿马，同奥马尔·托里霍斯关系很好，他去过多地方，因为他一向对拉丁美洲非常感兴趣。他来了古巴，他喜欢海，喜欢钓鱼，他对用尼龙线钓鱼兴致勃勃。有一回我们在海上待了两天。我们和他有过多友好谈话。加西亚·马尔克斯来过，瓜亚萨明来过，秘鲁作家阿尔弗雷多·布里塞·埃切尼克（Alfredo Bryce Echenique）到过这里，还有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我想，索拉纳当过文化部长，后来成了“大元帅”，北约的秘书长，今天他当的官相当于欧盟的外交部长。我们聚集了好多人物，亲如家人，无话不谈，很有积极意义，极富建设性。

后来西班牙的报纸抨击了费利佩，因为在古巴囚禁了一个人，是当时一个恐怖主义组织的头目，此人原籍西班牙。

拉：是埃洛伊·古铁雷斯·梅诺约（Eloy Gutiérrez Menoyo）^①吗？

卡：是的。古铁雷斯·梅诺约，我们决定释放他。他实际上已服满刑期。我们不希望在这件事上让费利佩左右为难。他曾十分谨慎而又很尊重地同我们谈起过这个问题。我们主动释放了古铁雷斯·梅诺约。

拉：在费利佩·冈萨雷斯1982年10月上台，并被任命为首相以后，

^① 埃洛伊·古铁雷斯·梅诺约，1935年出生于马德里，父母是共和派，童年时移居古巴，参加过武装反抗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加入了所谓的埃斯坎布拉伊全国第二战线，该组织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七二六运动”没有关系。他在该组织中取得了司令的军衔，但在革命胜利后拒不接受革命选择，于1961年去了美国。1965年潜返古巴，参加了反革命的“肮脏战争”。被捕后入狱22年。获释后去了迈阿密。他在那里成立了名叫“改变古巴”的组织，主张政府与反对派对话。1995年返回古巴，会见了菲德尔·卡斯特罗。2003年夏，他眼睛已半瞎，回古巴度假，并宣布将留存古巴，为“争取政治空间”而斗争。

您还同他保持着良好关系吗？

卡：我们当时都希望费利佩获胜，因为他虽然有各种缺点，但还是一个你可以与之交流和交谈的人，也还保持着某些循规蹈矩正人君子的风度。他当上了首相后情况就不同了，产生了一些分歧，因为在我们看来，在那时的冷战格局中，西班牙能在同全世界发展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开展贸易和维护和平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说实话我们不赞成西班牙加入北约。

这问题在当时引发了争论，因为我对一家西班牙通讯社发表了一些讲话。那时他已在大选中获胜。我非常理解 1986 年实现的欧盟内部经济一体化的问题，因为这对欧洲有利，因此也对西班牙有利。但在北约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完全不同，我发表了一些公开、坦率的反对北约的讲话。我对如何看待西班牙通过外交开放所起到的作用，以及那种格局下，西班牙能在世界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而自己又不卷入北约，发表了我的看法，费利佩·冈萨雷斯自己也曾说过不会卷入之类的话。我的这些看法可以在 1982 年 5 月关于西班牙加入北约一事所做的一篇很长的访谈中找到。

拉：是北约问题冷却了你们两人的关系吗？

卡：嗯，费利佩变化很大。但是我们都赞成费利佩在 1992 年大选中战胜阿斯纳尔。我关注他们的辩论，观察阿斯纳尔，他是个机器人，是一台脑子里装满了一大堆资料和数据机器。他同费利佩进行电视辩论；费利佩在第一轮中表现不佳。我看得出阿斯纳尔的策略、他的心理状态，他那像机器般进攻、指责和一再重复的方式。尽管如此，费利佩信心十足，对这第一轮辩论并不在意，果然，在电视辩论过后所做的民调中结果对他不利。我本人甚至对他做了一些评论，我悄悄地提醒他必须认真对待第二轮辩论，要做好准备。由于他比阿斯纳尔的文化水平高，更有经验，更加灵活，这一回他占了上风。费利佩在第二轮辩论中取得了广泛胜利，使得对方招架不住。阿斯纳尔没有了词，无以对答，因为费利佩夺过了他的话头，

费利佩胜了。

但是，嗯，大家都知道，在费利佩·冈萨雷斯执政期间西班牙发生了许多事：贪污腐败、有人暴富、甚至发生了有人建造的豪宅里光是浴盆就装了四十来个的故事，就是这样，许多人发了大财，各种各样的生意都可以做。出现了一个贪污成风、一夜暴富、道德沉沦的过程^①。

我记得，在费利佩获胜后的头几年里，有一次在哈瓦那西班牙大使馆举行的晚宴上，讨论到社会党能够执政多少年的问题，我说，社会党只要奉行廉洁政策，起码是真诚的政策，就能无限期执政下去。我看不出在西班牙有什么可能让它下台。

依我看，是费利佩政策的右倾化导致了威望下降、贪污腐败和发生这种种事情。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度很好，后来逐步恶化。在某一时期开始举行伊比利亚美洲峰会，噢，几次峰会费利佩都参加了，我们两人相处正常，以礼相待。但后来他越来越屈从美国和北约的政策，在其他各个方面。费利佩威望下降，确实下降了；最后阿斯纳尔获得了胜利。

拉：苏联解体时，费利佩·冈萨雷斯是否向您提出过某些劝告，为了避免类似的崩溃古巴应该进行改革？

卡：我记得非常清楚，当苏联垮台时，多少人冲我而来，要我们做其他人同样的蠢事。您要是参加某一聚会，比如说某次就职典礼，那里总会

^① 以费利佩·冈萨雷斯为首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1982年至1996年的13年间主导西班牙对古政策。在此期间，发生了一系列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等丑闻，引发了很大的社会恐慌：费莱萨（Filesa）事件、伊比利亚公司（Ibercorp）事件、防务情报高级中心（Cesid）窃听事件、“解放反恐小组”（Grupos Antiterroristas de Liberación GAL）谋杀事件、挪用社保基金事件、路易斯·罗尔丹（Luis Roldan）贪污案、胡安·格拉（Juan Guerra）贪污案……那几年在西班牙流行新闻界称之为“敛财文化”现象。社会党人、经济部长卡洛斯·索尔查加（Carlos Solchaga）下过这样的定义：“西班牙是个能在最短时间里挣到最多金钱的国家。”参见马里亚诺·桑切斯·索莱尔（Mariano Sánchez Soler）著：《用公家钱做私人生意——西班牙政客贪污手册》，2003年福卡出版社，马德里出版。

遇到一些人，如卡洛斯·安德列斯·佩雷斯（Carlos Andrés Pérez）^①啦，费利佩·冈萨雷斯啦，还有其他一些拉美人物，他们一起向我劝说，我们应该做些让古巴生存下去的事情……

我恭恭敬敬地听他们说，同他们讨论一定程度上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仍保持坚定不移的立场，于是费利佩说，那是一种“努曼西亚式的立场”，指的是努曼西亚（Numancia）^②和马贡西亚（Maguncia）那个故事，他说：“嗯，那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们宁愿要这样的结果。

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我就是那些人，那些努曼西亚人的崇拜者，非常崇拜他们的勇气、他们的态度。我的立场是坚决反对有的人要求我们做出妥协，正是这种妥协使许多人一个接一个地垮了台，其中就有费利佩、卡洛斯·安德列斯，首先是苏联。

拉：我相信，当过费利佩·冈萨雷斯的经济部长的卡洛斯·索尔查加（Carlos Solchaga）也来过，是吧？

卡：是的，因为当时费利佩·冈萨雷斯想“帮助我们”，您想一想，似乎我们是傻瓜，不了解西班牙。但是，他想“帮助我们”，想给我们派一个顾问来。我们已最大克制地向他表示感谢。我答复说：“我们十分感谢您”，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拒绝。

拉：你们有涵养地听取了意见。

卡：费利佩还没有提出派谁来当顾问，但我们清楚地知道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曾为戈尔巴乔夫提供过顾问。最初的几位政府顾问是费利佩的人。

① 卡洛斯·安德列斯·佩雷斯（1922年生），委内瑞拉两届民主行动党总统（1974—1979年及1989—1994年）。曾在1989年2月“加拉加斯事件”和1992年11月多次用暴力镇压群众暴动。他作为第一个因盗用公款于1996年5月30日被判刑的委内瑞拉总统而载入史册。

② 西班牙高原城市努曼西亚，距现在的索里亚市6公里，公元前134年在两次暴动后被“非洲人西比昂”（Escipión el Africano）的罗马军团围困。围城达两年之久。城中大多数居民宁愿殉难而不投降侵略者。塞万提斯于1582年为这一历史悲剧创作了不朽戏剧《努曼西亚》。

有一次，戈尔巴乔夫不是在和我说电话就是写信时跟说起他很敬重费利佩·冈萨雷斯，说：“费利佩是社会主义者。”在我的记忆中费利佩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者，绝对不是。费利佩却自鸣得意，一个劲地派他的人到那里去为戈尔巴乔夫当顾问。

应该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建一座纪念碑，以表彰它为苏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所做出的重大贡献。那里后来发生的可怕情况是：不少人因取消了医疗服务——原来就不怎么样——而死亡，儿童死亡率升高，平均寿命缩短。

拉：依您看，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对此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吗？

卡：是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应对派遣这些顾问负责。后来美国顾问也去了莫斯科。派去的顾问越来越多，做出的让步也越来越大，最后，苏联解体了。

拉：费利佩·冈萨雷斯一度派给您的也是同样的顾问吗？

卡：是的。我想要告诉他的是，我知道的比顾问们的建议多得多。费利佩的一些想法与我们提倡的理念大相径庭。有一回他说起西班牙有许多医生失业，我对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呢，我们培养了大量医生，在社区设立家庭医生制，可以在广大农村，在全国各地提供大量的医疗服务。”费用是可观的，我们甚至讨论了为了上万名医生就业所需的成本，为人民群众提供医疗服务，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拉：他怎么回答您？

卡：嗯，他听得津津有味。1986年11月费利佩再次来古巴，我们到海上钓鱼，我们在一起待了一整天，回来后我们又去了“热带风情夜总会”（Tropicana）。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Raúl Alfonsín）曾去过那里。费利佩想去“热带风情夜总会”，那里为他准备了一场盛大演出。参加表演的是一些很漂亮的女子，大多是黑人姑娘，都是艳丽无比的演员。

我记得我还陪同费利佩上台向演员们致意，照了不知多少张照片，大家都很开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是个歌手，名叫琳达·米拉瓦尔(Linda Mirabal)后来终于留在了西班牙，因为你们欧洲人善于盗窃头脑。

拉：据我所知，除了盗窃头脑，还盗窃肉体。

卡：是的，首先注意到的是肉体，不过我所说的是艺术头脑。艺术头脑往往长在美丽的肉体上，这要看是哪一种艺术了。

有人给费利佩拍了一张照片，照片是这样的：那个非常漂亮也非常革命的女郎就这样搂着费利佩的脖子，他则这样看着那个混血姑娘，显得乐不可支。刊登在一家杂志上，我不知是哪一家了，反正你们不知要花费多少钱、多少道林纸来刊登欧洲和那些社会上的各种八卦新闻和流言蜚语，这家杂志上写道：“卡斯特罗和费利佩一同花天酒地”“在哈瓦那同独裁者一起寻欢作乐”。滑稽可笑的是琳达同费利佩在一起，这张照片实在有趣。

我想，那家刊物上也登了卡洛斯国王的儿子的照片，他因作为士官生正在周游世界，整整两版说的是国王的儿子。说费利佩和我，主要是费利佩，刊物说了他一句话：“同独裁者一起寻欢作乐”，因为他去了“热带风情夜总会”。

我们有过这么一段经历，苏联消失之后，我们便处在一个特殊时期，他们和我见面是为了劝说我们去做那些足以在六个月内消灭革命的事。这真是天大笑话，我们心中有数……

拉：你们没有听从这些劝告，但进行了某些改革，不是吗？

卡：当然，是的，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我们得接受外汇商店，这是我们厌恶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去那里的人都是些能够收到许多过去合法或非法出境的亲友们寄来的外汇。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重视这些外汇商店。

哦，合资企业的想法我们是早就有的，确切地说，是为了发展旅游业。

拉：发展旅游业的想法你们早就有了吗？

卡：是的，成立某些合资企业的想法也是在此之前就有的，不过那时候我们所做的事基本上是采取一些温和的经济措施，您不能做太冒险的事。我们建立了一些吸收外国资本的合资企业，研究其特点，哪些适用，哪些不适用。我们强忍了外汇商店带来的痛苦。我们深知开展旅游业有它的不利之处，会带来坏习惯……应该反对腐败，旅客可能带进毒品。好在我们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我们推动的是健康人的旅游，他们是加拿大人和来自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基本上都是来休闲的。

几乎所有的旅馆都是我们自己建造的，那时招牌上写的是：“某某公司……某某旅店哈瓦那分店。”似乎是这些外国公司花的钱，它们建造的。不对，许多是我们建造的。他们在旅游业方面有经验、有技术，旅馆则是我们的，我们同外国企业签订管理合同。合资建造的旅馆极少，只有几家是部分我们出资，部分他们出资。

此外，我们在建造这些旅馆时，使用的都是国产材料，我们不需付现金。现在随着质量越来越高，你也得进口一些材料……但至少80%的旅馆是用我们古巴自己的材料建造的。

也有的外国公司因资金不到位，而由我们把它建完。现在签有租赁合同，80%归古巴。我们国家基本上依靠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自救。我们虽然也同一些信誉良好的企业，我是说一些严肃的企业签订了某些积极有利的合同，但主要是靠自己的资源、自己做出的牺牲。当然，你得会争取，懂得需要什么东西，要不然，别人会用一美元买下一个共和国。

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哪方面你应该保持100%的控制，我们在电力、石油和多方面达成了协议，但我们决不会对一所医院、一所学校、一家基本的经济或社会服务设施实行私有化。

拉：您同费利佩·冈萨雷斯的决裂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他现在持这么严厉的批评态度？

卡：嗯，开初情况一切很好，那时还存在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和其他

一切，我国经济还不是很拮据。那时还有一定的交情。后来，苏联消失了，正如我刚才跟您说过的，费利佩和他的朋友们想“挽救”我们，向我们进行劝告，我们要是听了他们的劝告，也会像所有听从他们劝告的人一样统统完蛋。这些劝告之一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听了这些劝告，谁都逃不了毁灭的命运。所有这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劝告使许多国家难以支撑下去。我们对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宗旨、我们的目标，坚信不疑，毫不动摇。我们懂得什么地方可以退让，什么地方不可以，我们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了。

比如说，我们谈起过的合资企业，有时候您会了解到一台机器值 100 万或 150 万美元，一年或一年半内就能付清。你就不应该再去办那样的合资企业，人家投资一台机器，你投资其他东西，本应在一年里回收的钱却要延长到二十年，每年搜刮走我国的钱财。

现在，如果你要在海里钻探，如果你要开采石油，进行考察，这一切都是在一个框架内进行，由于垄断现象和其他的原因，市场价格会比成本价高出许多倍，你若不掌握技术又缺乏足够资金，你就可以签订风险合同。应该对这些合同中规定的国际准则了然于胸，应该认真仔细地讨论每一个细节。在古巴成立公司是由中央统一审批的，这样做的好处极大。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小企业和“野鸡公司”。

拉：您把什么样的企业称之为“野鸡公司”？

卡：我跟你讲过那两个西班牙人的故事，他们来此投资了十多万美元资金，组织了一个贩毒机构。他们从哥伦比亚购买原料，市场是在西班牙。表面上看他们是些精明、能干的经营管理人员：集装箱运到码头时他们亲自去接货，直接运进工厂，再用原来的集装箱装上产品运往西班牙，他们又亲自押货到码头。我告诉过您，我们后来发现，这些集装箱有夹层，装满了毒品！他们也生产一些物品，雇用了十二三个工人——我们后来知道，他们在与许多人交往中十分和蔼可亲。运往西班牙的集装箱里装的是仿制人像模型，毒品藏在夹层里，运到欧洲出售或转运到美国。

这一骗局是某一次在哥伦比亚发现的，后来发生的情况是我们对这几

个家伙提出了警告，他们便留在了西班牙。他们在西班牙遭到了起诉，他们辩解情况不是这样，问题出在古巴，因为古巴想“霸占工厂及其产品”，他们是无辜的投资商，云云。我对您说过，他们现在依然享有自由，尽管在哥伦比亚和古巴人尽皆知他们的意图是进行大规模的贩毒。您听我说，我们确实感到蒙受了侮辱，这两个家伙却在西班牙逍遥法外，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是人尽皆知的事。

拉：我在电视上^①，见到您对阿斯纳尔先生大动肝火。我的印象是您对这位西班牙前首相一点好感都没有。

卡：碰巧让您看见了。我不认为我那时发了火，因为我一直很平静。可能是我看到了欧洲人那个很不合时宜的声明感到气愤，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都看到了在伊拉克的狂轰滥炸，知道数百万人成为终生残废。尤其是那些身受重伤断臂缺腿的人常常会感到生不如死。当我说到身受重伤时，还应该想到精神上受到的创伤，那些终生致残、精神受伤的人，有些是5-7岁的儿童，有些是30、60或80岁的人，他们要是活到90岁，得受多少的罪。轰炸造成的残废何止数百万，死伤的人太多了，实在难以统计。看到所有财富、文化、博物馆毁于一旦，心理创伤更是无法估量。

那时，人们刚刚看到这一切，据了解，在西班牙92%的公民反对伊拉克战争，在法国、在世界各地大家都反对这场战争。我国人民也看到了这一切，他们感受到了自己也会遭到同样命运的威胁。就在此时出现了那篇欧盟声明^②，这篇声明为美国政府制造的借口涂脂抹粉，美国政府想把它的法律强加给全世界，并要压垮我国。我国受到了侮辱、遭到了谩骂，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为我们抵制了，因为我们不听从他们的命令。我们产

① 在2003年6月11日《圆桌会议》节目上讲话。

② 2003年6月5日欧盟做出外交制裁古巴的决议，其中规定限制同古巴政府的官方关系，同时加强同古巴国内反对派的接触。此前的4月30日，欧盟的执行机构欧洲理事会已经决定无限期推迟古巴要求加入科托努协定的申请。2005年1月3日，在该组织改变态度后，哈瓦那恢复了同欧盟各国的正常接触。

生反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感到非常愤慨。

我后来看了您说的那个电视节目。嗯，我是很生气，但没有达到大发雷霆的程度。

拉：我发现您那时很强硬。

卡：我那时是强硬，可能是我的面部表情强硬，但是我也说了很多幽默、讽刺的话。我喜欢讽刺和幽默，不喜欢发火或板着脸孔。那时，我确实没有在电视上大发脾气。至少我自己认为没有发脾气。您得到了这个印象，其他人可能会给您这样的印象，因为他们比我更加气愤，更加恼火。我问过他们，他们这么回答我的，我知道冷静沉着的效果会更好。

当然有时我谈到某些事时，情绪有些激动。我觉得我那次讲话情绪有点激动，有点冲动，而不是发火或大怒，可是从第二天全国人民的反应都看出来^①，非常坚决，大家确实被激怒了，这样的声明所意味的危险，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为它辩解。

嗯，我们是有一个党，有不同政见者，有犯人；我们不是唯一的党，也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难道我们不能够有一个党吗？我们必须要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政见者吗？我们不能实施任何法律吗？有一系列问题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的政府回答得了，它们对待一个小国用的是双重道德，双重标准，是持歧视的态度。

拉：在那次讲话中，您把阿斯纳尔先生称作“小元首”，还说他是个“胆小鬼”。您是否认为尤其是阿斯纳尔先生的态度导致欧盟采取了反对古巴的措施？

卡：他是主要头目。注意，阿斯纳尔是迈阿密古巴—美国人恐怖黑帮的朋友；他们为他竞选提供资金，他乘坐那帮人的飞机旅游。

^① 6月12日，为了表示抗议欧盟的制裁决定，近百万人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驻哈瓦那大使馆前举行游行示威。在西班牙大使馆前的游行队伍由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头。

拉：是指豪尔赫·马斯·卡诺萨（Jorge Mas Canosa）^①和美国古美基金会的朋友们吗？

卡：是的。应该说是费利佩·冈萨雷斯开始在经济方面对他们做了一些让步，但阿斯纳尔是所有这帮人的密友，他去中美洲活动时坐的就是马斯的私人飞机，他们也在2000年的大选中资助了他，就这样，他战胜了费利佩。

1996年阿斯纳尔上台执政时就带着很大的偏见和反动仇恨，因为阿斯纳尔天生是个反动派。阿斯纳尔是个保守、反动的人物。

当时发生了一件事对他很有利，1995年4月大选之前有人行刺他，这件事确实帮助了他当选。他做了个姿态，我可以这么评价他，据我从报纸上读到，他表现得很勇敢。他立即去看望了所有受伤的人，这种做法往往能赢得人民的好感。这就是说，他做了个姿态，他充分利用了那次暗杀事件，也充分利用了左派本身的种种错误、不和、矛盾和分裂。

因此我想，2004年3月11日马德里阿托查火车站发生大爆炸，阿斯纳尔以为又可以利用这类袭击行为了。不料，结果适得其反，他的党在大选中失败了。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赢得了胜利，他从伊拉克撤回了西班牙军队。我们非常高兴。

拉：依您看，西班牙左派分裂严重，是吗？

卡：应该实话实说。我不是西班牙左派的辩护士。我们与左派联盟有关系，但他们之间分裂严重。我不能责怪这个分裂的左派，因为最坚决反对与其他左派达成某种协议的正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

阿斯纳尔和他的党是怎么想的，这一点大家都清楚。当然，我们对他从未有过半点好感，更不希望他当选，因为我们多少知道他的思想和他同迈阿密黑帮的关系会导致什么结果；他是个黑帮人物，我要说，他从他们

^① 豪尔赫·马斯·卡诺萨，古巴流亡分子，百万富翁，在迈阿密成立了古美全国基金会。他被认为是反古巴政府鹰派人士中的极右分子，他与组织恐怖和暗杀行动有牵连，其中包括多次谋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行动。死于1997年11月。

那里得到过很大支持，那帮人对阿斯纳尔的政策寄予厚望。

拉：他在 1996 年上台后立即开始对古巴进行非常系统的批评。

卡：他的政策在马德里国会里引起激烈争论，因为他任命了一名大使，叫何塞·科尔德切（José Cordech），正常情况下应该首先等待驻在国政府对他的任命表示同意，而这位大使却在此前便开始发表讲话，对古巴指手画脚，要古巴做什么不做什么。我们干脆撤回了对此公任命的同意，我们说：“我们不接受这位先生当大使，撤回对他任命的同意，请另派他人。”这一切在马德里议会里激起了轩然大波。

拉：在那次电视讲话中，您在批评阿斯纳尔先生的立场时，我记得您好像说什么“总之，连佛朗哥都对古巴采取了较正确的态度”。

卡：至少是值得尊重的态度。

拉：值得尊重的态度？在什么意义上？

卡：我告诉您。从理论观念上讲，古巴革命胜利时我们是强烈的反佛朗哥主义者。美国佬一开始就采取了各种反对我们的措施，整个欧洲也一样。古巴革命在失去了欧洲的情况下得以发展，显示出没有欧洲，古巴革命照样能够顺利前进。那个年代，即 1960 年，离世界大战结束没有多久，北约啦、冷战啦、美国封锁啦等什么都有了。

美国强迫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国家与古巴断交，也要求它的欧洲盟国这样做。尽管我们一直批评佛朗哥，攻击佛朗哥，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屈从华盛顿要求的人。我们的立场完全基于信奉的理论不同。我一有机会就攻击佛朗哥。

我想，有一回，大概是在 1960 年 1 月，一位西班牙大使，名叫胡安·巴勃罗·德洛亨迪奥（Juan Pablo de Lojendio），是位侯爵……那时期我们的组织措施还不是很多，安全措施也不健全，那天大约 12 时左右在广播电视大楼里我正在做电视讲话，狠批佛朗哥，忽然听到一声怒吼，像坦

克般冲进一个气壮如牛的人来，因为他也是个小胖子，他破口大骂，大吵大闹，场面很乱。当时我不知对他说什么是好，在这种挑衅场合还得保护他，以免引起强烈反响。我说：“把这个没有教养的人弄出去！”好不容易把他请了出去。这个人真够勇敢的，我得承认这点。我没有太生气，因为，嗯，我对这位大使的胆大行为差点笑出声来。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他驱逐出境。

拉：不过没有断交，是吧？

卡：没有，谁都不会同佛朗哥断交。西班牙买我们的雪茄烟，买古巴的糖，古巴的朗姆酒也是西班牙买的，然而，那时我们确实有一股反佛朗哥热，一个劲儿地批判佛朗哥。而且，我们还同西班牙共产党人保持着公开的关系。“热情之花”伊巴露丽（Pasionaria Ibárruri）、圣地亚哥·卡里约（Santiago Carrillo）等人都跟我们公开来往。

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后来跑到苏联去的那些人中，有一些是军人，例如恩里克·利斯特尔（Enrique Lister）将军，还有一些访问过古巴或有军事经验、军衔较低的人，来到古巴帮助我们组织民兵和做各种事。佛朗哥就是不跟我们断交。

这种态度应该受到赞扬，值得我们尊敬，在这一点上甚至还值得我们感激。他顶住了美国的压力，他做事有股加利西亚人的倔强劲儿，就是不同古巴断交。在这点上他的态度非常坚决。

拉：对此您做何解释？

卡：嗯，可以这么解释：佛朗哥是埃尔费罗尔（El Ferrol）人，塞维拉（Cervera）的舰队就是由埃尔费罗尔一带的人组成的。

拉：1898年塞维拉海军上将的古巴圣地亚哥战役。

卡：那次战役是胡来，一次无谓的牺牲。塞维拉本来应当放弃那些船只，把水兵当作步兵来作战，大炮用来守城，用步兵守城。那些对作战一

窍不通的政治家们给他下了一道愚蠢的命令，就像今天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那样，阿斯纳尔也好，布什也好，都对作战一窍不通。

在那边，从马德里，一位政治家给塞维拉下了一道命令，叫他把舰队撤离圣地亚哥海湾，他在舰对舰的作战中被击毙了。这是一件十分残酷的事，令人痛心，那些西班牙水兵们的勇敢令人敬佩，那里高度显示了西班牙人的堂吉珂德精神和英雄主义。我们对此肃然起敬，向那些勇士们致敬。所以，人们说，佛朗哥是埃尔费罗尔那儿的人，塞维拉的舰队就是从那里来的。对西班牙军人来说，那次战役这一发生在古巴的事件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创伤。

当时的情况是，美国对西班牙发动了一场投机取巧、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战争，令西班牙蒙受了一次历史上莫大的耻辱。美国在那次轻而易举得胜的战役中摧毁了西班牙的整个舰队，严重打击了西班牙的军威和国威。发生这事时佛朗哥还是个孩子。佛朗哥一定是在那次惨痛的经验中，在一种压抑和渴望复仇的氛围中成长和受到教育的，也许他参加了那次迎接溃败舰队船只的残骸以及受到屈辱和沮丧的将士回归的仪式。此情此景一定给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古巴革命自1959年来所做的事，从抵抗美国、反对帝国主义到在吉隆滩打败它，可能被他看作是替西班牙进行历史报复的一种方式。总之，我们古巴人懂得如何对付美国并抵抗它的侵略，并以这种方式恢复了西班牙人的情感和荣誉。这一历史因素，也可说是感情因素曾对佛朗哥的态度产生了影响。我不相信是经济原因，也不相信是别的原因。

后来佛朗哥参加了一场殖民地战争，即1920年的摩洛哥战争，在那次战争中西班牙军队遭受了重大伤亡，在1921年那次阿努阿尔战役中伤亡约3000人。我读过那次战争的全部历史。佛朗哥作为军事首领表现突出，获得了勇士美誉，在军人中很有声望。1934年，他被派到阿斯图里亚斯去镇压煤矿工人大罢工，在反动阶层中声誉大振。无疑，他很狡猾——我不知道这是否也算是加利西亚人的特性，因为人们都说加利西亚人很狡猾。有一段历史大家都知道，这里就不重复了：墨索里尼、希特勒参加了西班牙

牙内战、格尔尼卡大轰炸、瓜达拉哈拉战役，意军在这次战役中大败。全世界都知道这些事情的经过。佛朗哥十分狡猾，因为接下来他们就要求他参加世界大战。

在德国人打败了法国人，成功侵占了法国并赶跑了英国人之后，墨索里尼加入了战争。墨索里尼宣战了，他以为拥有罗马军团。他忘记了，古罗马军团最后是由野蛮部落组成的，最初的罗马人，恺撒时代的罗马人早已不复存在。意大利人民是个和平的人民，有着另一种文化，另一种思维方式，他们没有当年罗马人一向具有的好战传统——德国人倒继承了这种传统。意大利参战了，您是知道的，他们吃了一个又一个的败仗，被逐出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埃尔阿拉梅，意大利人最后成了德国人在战争中的一个很大累赘，后者不得不派遣隆美尔去了北非。隆美尔大出风头，他没有镇压者的骂名，倒像是个颇具君子风度的军人。

而那时希特勒正登峰造极，不可一世，他于1940年10月在恩达亚（Hendaya）会见了佛朗哥，他没有能说服佛朗哥参战。佛朗哥很狡猾。

拉：他很谨慎，没有参战。

卡：当时他只答应派出一个师——蓝色师团，但不参加世界大战，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最后。后来，美国人遵循它们“坚信不疑”的传统参加了战争，拉拢佛朗哥加盟，于是从1953年起佛朗哥又得到了美国的庇护。

如果对佛朗哥的一生进行分析的话，嗯，他杀过很多人，进行过镇压，他的名字是与西班牙历史的一个悲惨时期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他从摩洛哥带进了摩尔人——那时大家都这么称呼他们，他曾同这些摩尔人打过仗，他把他们带了进来，成了最早到达西班牙的部队，他自始至终把这些摩尔人当作自己的私人卫队。

我不相信阿斯纳尔处在佛朗哥的地位不会像佛朗哥那么残忍。我认为，他甚至会更加残忍，他很可能会像墨索里尼那样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阿斯纳尔又投靠了美国佬，这是完全没有必要做的事，他成了美国的一名仆役。

拉：您认为他的政治远见也不如佛朗哥吗？

卡：作为国务活动家，从人品和能力来说，他比佛朗哥差得远了。这是我想说的。他的政治能力只及佛朗哥的一个零头儿，佛朗哥显现出他有很强的政治能力。阿斯纳尔也远不如他有骨气，也许比他更加残忍，因为阿斯纳尔这个人十分复杂，充满仇恨。

佛朗哥是个思想反动的人……他走过的一生已有了定位，阿斯纳尔是佛朗哥的继承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人民党是从佛朗哥那边的人当中，而不是从社会党人当中产生的，阿斯纳尔并不出生于马克思信奉者的行列，他的思想是佛朗哥主义。

再说了，我还没有听说过佛朗哥像其他人那样大肆敛财。他的支持者都发了财，但他的政府似乎不太腐败。如果我们做某种“人生类比”的话，佛朗哥属一类，这位“绅士”属于另一类。

佛朗哥掌握报纸，阿斯纳尔差不多也这样，只不过全是买来的。在西班牙，全国性的主要大众传媒、大的电视台基本上都控制在阿斯纳尔和他的那帮人手里。哪里还会有不同政见呀？

此外，我认为，佛朗哥——虽身材矮小——并不是个复杂的人。阿斯纳尔则是个道德和政治都很矮小的人。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智利圣地亚哥，我感到他举止怪异，是个缺乏自信的人——有点心神不定。

刚开始，有一段时期古巴和阿斯纳尔政府的关系很坏，那时西班牙议会里正为此进行辩论。有一天西班牙方面同古巴外交部达成协议，做出了一项安排：阿斯纳尔要同我通话。我在上午等了一小时，阿斯纳尔打来电话，说话语气很温和——看来他虽不是经常这样说话，但在需要这样说话时他也能这样做——那时两国关系正发生严重危机，因为我们不同意他们大使的任命，议会正为此事在辩论，他提出了问题，希望改善关系，准备任命一位新大使，于是那次谈话为两国关系营造了正常的气氛。我心里想：“嗯，可能在重新考虑，也许已意识到，对待古巴不能来硬的一套，也不能讲条件。”我们通情达理，接受了新大使爱德华多·洪科·博内特（Eduardo Junco Bonet）。当然，他派给我们的是个

佛朗哥分子，不可能派来别的货色，那是个满脑子法西斯思想的人^①，他来了。

整个这一时期，此前也一样，西班牙驻古巴大使馆起的作用是一个为美国照管利益办事处服务的搞阴谋诡计的工具。我不能说费利佩·冈萨雷斯时期也是这样，但是在某段时期，随着费利佩本人思想理念逐步蜕变，他也同美国佬合作。

西班牙大使馆在詹姆斯·卡森和所谓的“不同政见者”等阴谋活动中，一直与美国合作。欧洲国家的大使馆，令人生厌的不止一家。我还没有提到捷克使馆呢，因为我没有把它看作欧洲国家，还有波兰使馆。北欧人，那些左派，社会民主党已不再是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的党了，帕尔梅是个优秀的人，是位好朋友，他真诚关心第三世界的问题。今天的情况已完全不同了，他们越来越向右倾演变，如同布莱尔先生一样。布莱尔是“新道路”的创导者，后撒切尔时期的工党领袖——这一时期是经济自由化特别盛行的时期——他今天成了激进的好战分子。

拉：您认识托尼·布莱尔吗？

卡：有一次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会议上见过布莱尔。我注意到：这人瘦高身材，傲气十足，眼睛好像长在额头上。我同他交谈了几句，很简短，冷冰冰的。说实话，我一直对他紧跟美国的政策心生厌恶。那几天里，欧洲人正在同美国人谈判，他们以奉行懦夫政策为交换条件，要求放宽执行赫尔姆斯—伯顿法中的某些措施，并允许他们在利比亚或其他一些地方，在中东，也许是伊朗，进行某些石油开采的投资。他们签订了一项协商一致而又绝对不道德的条约。

拉：是在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吗？

卡：是在所有人之间，也包括欧洲人，但是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美国

^① 参见《西班牙驻古巴大使爱德华多·洪科·博内特大学时代就接近极右派》一文，1998年5月11日马德早《国家报》。

大使在跟布莱尔谈。我在那里见到布莱尔时，我对他实在很不满意。我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很反感，我认为这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一种极不道德和没有原则的妥协。

他曾大谈童工问题，我对他说：“喂，我注意到您谈到了全世界的童工问题，但据我了解，在英国就有 200 万童工。”我就是这样心平气和地对他说。我想，他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第三世界的傻瓜和无知者的傲慢无理，可我对他说的是大实话^①。

布莱尔是第一个到达那里的，许多人来来去去，大家自然相待。克林顿已经先离开了大楼，他没有做布莱尔所做的事。看上去此人相当傲慢，趾高气扬，仅此印象而已。有的人可能给我印象好一点，也可能坏一点，这没有关系。我感兴趣的是人们在想些什么，在做些什么。

我阅读了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那本书，他在书中提出了一套理论，认为已出现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②。哪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只不过是一条当今世界上所有朝三暮四的人已经走过的道路。显而易见，这条道路的锋芒所指是反对欧洲人已经争取到的社会保障现状：减少养老金，减少失业补贴。总之，根据这一理论，那些社保措施会把人们养成懒汉，主张没有了工作，就应该通过某种手段强迫他们去工作。嗯，我的主张则是，应该对人进行教育，而不应该用经济机制去强迫人做什么，在我看来，吉登斯属于那一个学派。

布莱尔把克林顿奉为偶像。不错，克林顿是个有教养、很聪明、有思想的人。我似乎看出那个英国人对克林顿崇拜得五体投地，但那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忽然有一天，布莱尔又把布什奉为偶像。这就是布莱尔干的事，他又把布什奉为自己的偶像了。

我一向谨慎小心，我不喜欢毫无必要地攻击他人，我讲的是实话，因谈起了这些问题，才想起这件事来的。

①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低工资协会”的统计，在英国约有 200 万童工，大多为外来移民子女，几乎一直在从事非法劳动。

②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巴塞罗那陶鲁斯出版社 2002 年版。

然而我认为，布莱尔这个人比弗朗哥的继承人，那个弗朗哥分子阿斯纳尔还要弗朗哥，再说了，英国也没有出过弗朗哥嘛。众所周知，他们两人在历史上都犯过许多错误，都曾滥用过职权，但我看出布莱尔和阿斯纳尔之间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在我看来，阿斯纳尔和西尔维奥·贝鲁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之间倒是有许多共同点，他们是两条大大的走狗，是法西斯主义的两大继承者，因为他们是同一类人。

贝鲁斯科尼还是各种媒体的老板，他操纵媒体。他也去了那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媒体老板能制造舆论，影响舆论，能量很大。贝鲁斯科尼掌握各种媒体，他凭仗这点达到了今天的地位，呼风唤雨，为所欲为。

拉：您一直关注西班牙和西班牙的政策，而您对西班牙国王却赞许有加。您是否认为他在西班牙同古巴关系方面总的来说采取了正确立场？

卡：是的。我认为他在各方面都正确。我一开始就赞赏胡安·卡洛斯国王。这您知道，他是一位在弗朗哥时代培养出来的国王。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功于弗朗哥，至少他为国王受到良好教育建立了一套方法。嗯，让他学到陆军、海军等各方面的知识……用一套很好的方法为西班牙培养了一位国王，无疑这位国王是位正人君子。

拉：在他同您的关系方面吗？

卡：我认为他在各方面都是位正人君子，因为，您看呀，原先谁都不曾对他有什么特别好的评价，没有理由嘛。他当上了国王，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原因使他当上国王的，可是当西班牙发生了那场愚蠢的政变时，他为西班牙做了件大好事。

拉：1981年2月23日的政变。

卡：这是一次阴谋。国王在一些明智的军人——我现在想不起所有人的名字了——的支持下，恢复了秩序，挫败了政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事是发生在希腊军事政变之后，1967年希腊也发生过军人政变，那是一

场浩劫，没有能够保住政权。

拉：代价是他的大舅子、希腊的康斯坦丁国王丢掉了王冠。

卡：谁？

拉：希腊国王，他支持了那次雅典政变，康斯坦丁是索菲亚王后的哥哥，西班牙国王的大舅子。后来他又想推翻军人委员会，结果失败了，1973年他失去了王位和王冠，上校们建立了共和制。看来，胡安·卡洛斯从中吸取了教训，就是不应该在那种情况下支持政变军人。

卡：我想，我那时正在参加一个会议，在莫斯科参加一个大会，在那里得悉马德里发生了特赫罗（Tejero）的政变。后来我又阅读了大量报纸，知道了每个人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国王确实显示了他的个性、自信、能力和权威。他为西班牙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因为他为西班牙省却了不知多少麻烦。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他的坏话，从那次事件之后大家开始对这位国王肃然起敬。

那一天胡安·卡洛斯真正当了西班牙国王，以前是别人要他当的，这一时刻是他自己要当的。他的行为可圈可点、令人尊敬，尽管他享有极高的威望，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有什么越轨行为。他非常非常尊重规章制度和宪法。他是个正派人。还可以说一句，在某一时刻，有人曾想要讹诈他。

拉：讹诈他？

卡：我只不过说说罢了，但是确实有人曾试图向他施加压力，想削弱他的权威，打击他的威信。哼，他们不喜欢有一个有权威、有威信、那么受人尊敬的国王。您听，他们是怎么问他的：“您要去古巴？”他说：“嗯，我是想再去。”可是他没有再来古巴，因为……

拉：阿斯纳尔先生不许他来。

卡：明摆着的。这本来是早已定下了的事，阿斯纳尔却不愿意，回答

国王说：“嗯，该您去的时候再去吧。”他就用这种十分粗暴的方式跟国王说话。

后来我结识了国王，我们交谈了多次，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会讲故事，很有个人魅力。他把儿子教育得很好。在英国，人们批评王室没有教育好王子。可是不能这样说西班牙国王，因为至少他努力想教育好培养好费利佩王子。王子也进了军校，学习陆军、海军知识，是个很正派的小伙子。我也在多次峰会和我出席的一些新政府就职典礼上见到过他。我要说，胡安·卡洛斯国王在教育儿子方面也很有功劳，派他代表国王参加许多国际活动。在这点上，我对国王也很有好感。

我从2003年5月西班牙士兵在土耳其空难中死亡这一悲惨事件中看到^①，要不是阿斯纳尔先生甘当走狗角色，想在国际上逞能，在那次战争中根本就没有西班牙什么事。

这事很像1991年阿根廷总统梅内姆派出一艘军舰到波斯湾通过电视观察伊拉克战争。嗯，阿斯纳尔则派遣士兵到那里，到阿富汗去为布什的侵略军充当替死鬼。

您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吧，美国佬就是这样戏弄全世界：让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士兵，在西班牙军官的指挥下，跑到伊拉克去当警察、扫雷或做其他不知什么事。太过分了！嗯，我说，只有在17世纪才会发生这样的事。

西班牙人指挥拉美士兵——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不是吗？在那里，在伊拉克当警察，看看死的人是否是拉丁美洲人和西班牙人。那些西班牙士兵本来就不应该去那里，这是第一；第二，去那里的这批人乘坐的飞机人尽皆知属于世界各地一些唯利是图的航空公司，而我认为，西班牙本国有的的是钱和飞机嘛。

对那些人的牺牲阿斯纳尔负有重要的责任，虽然说采取了各种措施也

^① 2003年5月26日，一架由西班牙国防部包租的乌克兰地中海航空公司所属的“雅克-42”飞机在土耳其特拉布松附近爆炸，机上有62名西班牙军人，他们在阿富汗喀布尔执行任务后回国。

可能出事故。但事实很明显，例如，我们曾在十五年间空运过几十万战士去非洲，没有发生过一次事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采取了各种保障飞行安全的措施。

他们随随便便向一家航空公司租用了几架飞机……谁都知道那是些什么样的公司，他们只图省钱。只要能在零部件上省钱，就在零部件上省钱，因为他们的指导思想是拼命赚钱。他们租用来运输士兵的就是这类飞机。我毫不怀疑，这里面有个责任问题。

拉：您向西班牙国王发了唁电，而没有发给首相。

卡：是的，因为我认为那些军官和士兵都是牺牲品。他们去那里是受人派遣，他们没有要求去。而我们所有去履行国际主义任务的人都是自觉自愿的，而那些西班牙士兵是执行命令……他们到伊拉克去干什么？

伊拉克惹了西班牙什么事？

拉：不对，这些空难军人是去了阿富汗。

卡：对不起，我是想说阿富汗。阿富汗更遥远，我不晓得他们中许多人知不知道阿富汗在地图上什么地方，因为事实上当询问美国青年阿富汗在哪里时，我想，知道的人大约不到12%。换句话说，美国青年被派去一些国家打仗时，连这些国家在地图上的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最多或许听说过。

所以我认为发个唁电是正确的。我没有把唁电发给那个装模作样的阿斯纳尔，他对这些军人的牺牲负有罪责。我把唁电发给了国王。幸亏有个国王，要不然我的唁电就没有人接收了。

拉：在西班牙您也同加利西亚地方政府前主席曼努埃尔·弗拉加（Manuel Flaga）保持着良好关系。

卡：是的，他是个狡猾而又聪明的加利西亚人。您可能不信，我同他友好，因为我还是半个加利西亚人哩。弗拉加交友甚广，他总想寻找所有

加利西亚人做朋友。他有过很大改变，他为西班牙效过力，是个很好的管理人才。我在加利西亚还有亲戚，我同他们有联系。

当然，他也不是各方面都有教养，因为，比如说，一方面他很和蔼可亲，但他又做过一些不对的事。

拉：在哪一方面？

卡：弗拉加也和费利佩及其他人——我不愿一点他们的名——一起，在苏联垮台之后竭力想向我劝说。他邀请我到一家漂亮的餐厅吃晚饭——是在马德里 1992 年奥运会期间——他也向我提出了几个方案。您知道他向我建议什么吗？——恕我背后说您，堂曼努埃尔·弗加拉——您知道他给古巴提出了一个什么方案吗？“古巴方案就是尼加拉瓜方案”，这是原话。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器重他，尊敬他。

拉：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卡：就是说古巴应该做尼加拉瓜在桑地诺政府下台后所做的一切……这一切已把尼加拉瓜引向了无底深渊，贪污成风，盗窃横行，出卖一切，太可怕了！这就是尼加拉瓜方案。您看吧，这是什么样的方案。这同费利佩和他的精英顾问们向戈尔巴乔夫建议的俄罗斯方案如出一辙，其他人在别的地方提了类似的建议。统统完蛋了。他们的建议是坚决实施新自由主义、私有化、严格履行国际货币基金的规定，这一切已使许多国家和人民掉进了万丈深渊。

拉：您想什么时候再访问西班牙？

卡：哦，那位仁人君子阿斯纳尔在台上时不可能，不过现在他不在了，出现了一点可能性。

我第一次到西班牙是 1984 年 7 月，做技术性停留，那时我跟丹尼尔·奥

尔特加一起参加了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的葬礼^①后从莫斯科回来。我在首相府会见了费利佩·冈萨雷萨。我们在马德里下降时大雾漫天，但他们还是用直升机把我们接到了蒙克洛亚宫。我跟胡安·卡洛斯国王通了电话。费利佩接待了我，极尽地主之谊。由于他是地道的塞维利亚人，请我们喝了雪利酒，吃了哈布戈火腿，拉曼查奶酪……后来我们去了附近的官邸吃午饭。我记得雪利酒让我胃口大开。午餐是蔬菜、鹌鹑脯肉，我还以为那是头一道菜，却忽然给我送上了餐后甜食！好玩极了。这就是我第一次到西班牙。几乎没有看到马德里，只有几个小时。后来我又去了西班牙，时间就充裕了，那次我还去了加利西亚。

^① 尤里·安德罗波夫（1914—1984），苏联领导人，国家安全机构权势显赫的“克格勃”的头子、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1982年11月在勃列日涅夫逝世后被任命为苏共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84年2月9日逝世。



我
的
一
生

第二十四章 拉丁美洲

马科斯副司令—土著人的斗争—埃沃·莫拉莱斯—乌戈·查
韦斯与委内瑞拉—反查韦斯政变—进步军人—基什内尔与阿根廷
象征—卢拉与巴西

拉：司令，我想提个有关马科斯（Marcos）副司令的问题。2004年1月是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引发的恰帕斯州萨帕塔运动十周年。我想知道您对这位在替代全球化运动内部产生的深得人心的特殊人物的看法。您认识他、读过他的讲话吗？

卡：我不能对他做出评说，但我读过您写的关于马科斯^①的一些材料，介绍他的那些情况确实十分有趣，有助于了解他的为人，甚至知道为什么给予他“副司令”的军衔。过去在拉丁美洲凡是参加过战争或打过仗的人都称将军。从古巴革命开始，形成了一个习惯，军事首领都称“司令”。这是我从“格拉玛号”远征中带来的一个军衔。由于我只是一支小小的起义军的首领，并且我们还得在马埃斯特腊山负责一个军事组织，总不能称呼为“游击纵队总书记”吧。于是我得了个“总司令”（Comandante en Jefe）的称号。Comandante（少校、指挥官、司令）在传统军队中本是个比较普通的军衔，但这词有个好处，实际上可以给它加上一个jefe（首领）什么的称呼。

从那个时候起，没有一个革命运动再使用将军这个头衔了。然而，马科斯使用了副司令的头衔。我始终不太明白是什么原因，我想这是他谦逊的表示吧。

拉：是的，他说：“人民是司令，我是副司令，因为我听从人民的调遣。”

卡：应该这样来理解：他是人民司令员的副司令员。很好。我从你那

①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特：《马科斯，起义者的尊严。与马科斯副司令的谈话》，西班牙巴伦西亚，西贝尔蒙德出版社2001年出版。

本关于与他交谈的书中，得知了许多他的详情、思想、观念、他为印第安人事业所做的斗争。我怀着深深的敬意阅读了这本书，我很高兴能从中了解到有关他的为人和恰帕斯州局势方面的情况。

毫无疑问，他后来在做那次旅行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做此旅行正确与否是有争议的，但不管怎样，我是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过那次旅行的。

拉：您指的是马科斯于2001年4月所做的那次走遍墨西哥的“和平进军”^①。

卡：是的。我兴致勃勃地观察了全过程，我看到了马科斯的完美品格，毋庸置疑，他是个正直、有主见、聪明的人。他是个知识分子，也许在人们对他还不甚了解时并不会这样认为。我掌握的情况不充分，但这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一个革命战士要有思想、毅力和知识。

我理解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两个、一百个马科斯，因为我了解，我深知几百年来各国土著人民所处的境遇。我了解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告诉您，我对我们西半球的土著人民真诚地怀有政治的、人道的和革命的同情。

拉：您密切关注拉丁美洲土著人民的斗争吗？

卡：非常关注。如您所知，我曾是画家瓜亚萨明的好朋友。我很敬重他，多次同他交谈，他常跟我谈起印第安人的问题和他们的不幸遭遇。此外，我从历史书上得知，几百年来存在过种族灭绝，但是现在人们的觉悟越来越高。马科斯和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抗争就是这种战斗精神的新

^① 2006年1月1日，马科斯副司令开始了一次新的为期6周走遍墨西哥的旅行。这次他是骑着摩托车重温1951年切·格瓦拉和他朋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那次著名的南美洲之旅，目的是在2006年7月2日总统选举之前走遍全国32个州，并创建一个与传统政党对立的“政治替代全国阵线”。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已于2005年6月放弃了所有“军事攻击行动”。在这次旅行中，马科斯以“零号代表”的身份出现，声称彻底拒绝墨西哥一切党派，包括民主革命党（PRD），它的候选人是当时民调最看好的安德列·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

的例证。

这些就是我能告诉您的有关马科斯的情况。我们怀着高度尊敬的心情观察他奉行的路线，我尚无机可乘，从不可能亲自与马科斯进行过交谈，我只是通过各种新闻和阅读有关他的参考资料了解他，我也知道，许多人，其中包括不少知识分子，都对他深表钦佩。

拉：厄瓜多尔也有波澜壮阔的土著运动，是吗？

卡：可不。我很器重厄瓜多尔的印第安人组织，土著民族联合会（CONAI）和“帕恰库蒂克”（我们的土地），他们的社会团体，他们的政治团体和他们的男女领袖。我也认识多位玻利维亚非常英勇的领导人，那里有十分强大的战斗力，我认识玻利维亚的主要领导人，就是今天的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他是位杰出人物，是个出类拔萃的人。

拉：我猜想您一定为埃沃·莫拉莱斯在2005年12月18日玻利维亚总统选举中获胜而欢欣鼓舞。

卡：非常高兴。那次选举非同小可，无可争辩，因是玻利维亚历史上第一次选出一位土著人总统而震惊世界，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埃沃具备足以在空前未有的困难时刻领导他的人民和国家的一切品质。

玻利维亚位于美洲的心脏，以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名字命名的国家。它的首任执政者是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元帅。这是个人才辈出和地下资源丰富的国家，可是今天被评定为本地区最贫困的国家，它的近900万人口的居民基本上分布在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山区。

这是那个国家的环境，埃沃·莫拉莱斯就是要在这样的环境里为他人民的大多数人规划充满希望的未来。他的出现证实了本地区传统推行的政治体制已经分崩离析，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争取真正独立自主的意志。他的当选表明了拉丁美洲的政治版图正在改变，新鲜空气正吹遍本半球。

一开始埃沃在12月18日大选中并没有占据优势的把握，当时相当

担心，因为可能在议会里发生操纵现象。但当他第一轮选举中赢得了接近54%选票的胜利，并在众议院中也获得胜利时，一切争论都烟消云散了。

这是一次奇迹般的选举，这次选举震撼世界、震撼帝国以及美国强加于人的难以为继的秩序。这次选举表明，华盛顿已无法像往昔那样依靠独裁统治了，帝国主义失去了过去的工具，已不可能故伎重演了。

拉：古巴是埃沃·莫拉莱斯在刚当选总统之后、2006年1月22日上任就职之前，于2005年12月30日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您是否认为那次访问已给他与华盛顿的关系制造了麻烦？

卡：玻利维亚当选总统，埃沃兄弟的友好访问是在古巴和玻利维亚两国人民之间具有历史和深刻意义的兄弟友爱、团结互助关系的框架内进行的^①。谁都不能因此而感到不快，也不能因为签订的那些协议而感到不舒服。那是些有利于生活、有利于人类的协议，并不犯什么法。我们也不认为犯了美国的什么法。古巴是在帮助提高玻利维亚新生儿的成活率，怎么会得罪美国政府呢？难道减少儿童死亡率或是扫除文盲会得罪什么人吗？

拉：您认为在别的拉美国家里也有土著居民的成分吗？

卡：在拉美三个国家里社会状况相当严峻，那里存在重要的土著力量和土著居民成分：除了玻利维亚之外，便是秘鲁和厄瓜多尔。危地马拉也有大量的土著居民，不过那里的发展情况不同于其他国家。说到土著成分，当然，墨西哥人中也有相当比重。简而言之，我可以说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冒出一个为土著人民争权的马科斯来，又为何还会出现十个或

^① 2005年12月13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和玻利维亚当选总统埃沃·莫拉莱斯签署了一项古巴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给予玻利维亚强有力支持的合作协定。莫拉莱斯2006年1月22日就职后，该协定中的11项内容都已生效。两国同意建立一个非营利性的双边机构以保障为经济困难的玻利维亚人进行眼科手术，为此，古巴将提供设备和专家（带工资），拉巴斯的新政府提供住所。双方还同意最近由古巴装备起来的拉巴斯全国眼科研究所分别在科恰班巴和圣克鲁斯设立两个附属中心。这几个机构加在一起每年可以做5万例手术。协定预期，“如果玻利维亚决定向那些靠近玻利维亚中心城市的邻国的贫困病人提供眼科医疗服务的话，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这些设施的能力”。

一百个马科斯来，我认识的这些土著领导人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他们做事认真。我跟厄瓜多尔的土著领导人谈得很多。他们谈话严肃认真，令人肃然起敬，值得信赖，是些心口如一的人。在厄瓜多尔，跟在秘鲁和其他国家一样，都能找到这样的人。

拉：您说过，您十分钦佩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

卡：没错。我们在查韦斯身上看到了一个另类印第安人，一个新型的印第安人，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印第安人和印欧混血人种的混血儿”；他确实说过，他有一点黑人血统、一点白人血统和一点印第安人血统。但你仔细看看查韦斯，你能看到一个土生土长的委内瑞拉的儿子，委内瑞拉就是一个人种混杂、集各种优良特性和超人智慧于一体的国家。我常听他的演说，他以自己出身卑微和人种混杂而自豪。委内瑞拉什么人种都有一点，主要是当地的印第安人和从非洲来的奴隶。可能还有一点白种人基因，这不是坏事，所谓的人种混合向来是好事，丰富人类种族嘛。

拉：您是否关注过委内瑞拉局势的演变，尤其那些制造动乱反对查韦斯总统的图谋？

卡：是的，我们非常关注那里的事件。查韦斯在1994年，即他出狱后9个月和首度当选总统前4年访问了我们。他很勇敢，因为当时有人对他访问古巴大张挞伐。他来了，我们进行了交谈。我们发现他是个有教养、很聪明、非常进步的人，一个真正的玻利瓦尔主义者。后来他在大选中获胜，还多次获胜，他修改了宪法，得到了人民的巨大支持。敌人试图用武力或经济打击消除他。他挫败了寡头势力和帝国主义反对玻利瓦尔进程的种种图谋。

根据我们在经验丰富的银行工作者的帮助下所做的估算，在查韦斯之前著名的四十年民主时期里，从委内瑞拉流失到国外的资金约达3000亿美元。要是真的实行过合理分配的民主制度，要是那些民主机制发挥过应有的作用，要是那些蛊惑人心的宣传和庞大的传媒机器所说的话里尚有些

许真实可信的东西，那么，委内瑞拉的工业化程度早就超过瑞典了，它的人民所受的教育程度早就高于瑞典了。

我们计算过，从查韦斯政府上台执政到2003年1月建立外汇管制期间，又从委内瑞拉流走了300亿美元。诚如我们所指出的，这种种现象说明本半球现有的这个秩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拉：2002年4月11日在加拉加斯发生了一次反对查韦斯的政变。您关注了那些事件吗？

卡：当4月11日中午我们看到反对派组织的游行队伍被政变分子改变行走路线，向观花宫^①逼近时，我们立即意识到，事态严重恶化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通过当时尚在播放的委内瑞拉电视台观看游行。挑斗、枪击、伤亡几乎立刻发生了。几分钟后委内瑞拉电视台中断了播放。消息通过不同渠道断断续续传来。我们得悉，几名高级军官公开发表言论反对总统。消息证实，总统卫队已经撤走，军队正在攻打观花宫。有几位委内瑞拉的要人打电话给他们的古巴朋友以示诀别，他们准备抵抗和牺牲，具体谈到了殉难。

那天晚上我正在大会堂的会议室同部长会议执行委员会开会。从中午开始，以自治区主席[莱亨达卡里(Lehendakari)巴斯克语，意为自治区主席]为首的巴斯克地区官方代表团一直同我在一起，他们是应邀来共进午餐的，当时谁都无法想象那个不幸的日子里会出什么事。他们成了4月11日下午1—5时期间发生事件的见证人。

那天下午我老早就试图同委内瑞拉总统通话。电话打不通呀！到了半夜，即4月12日晚12点38分，我得到消息说查韦斯在等电话。

我问他这会儿的局势。他回答说：“我们现在被围困在观花宫里。我们失去了能调动的军队，他们切断了我们的电视信号。我没有军队可调遣，我正在分析形势。”我立即问他：“手上还有多少人马？”

^① 观花宫，位于加拉加斯，为国家总统的官邸。

“二三百人，他们都已筋疲力尽。”

“你有坦克吗？”我问他。

“没有呀，有过几辆坦克，都被撤回营地了。”

我又问他：“还有别的部队吗？”

他回答说：“有别的部队，但在很远的地方，我同他们联系不上。”

他指的是劳尔·伊萨亚斯·巴杜埃尔（Raúl Isaiás Baduel）将军和伞兵营、装甲师和其他部队，但他失去了能同那些玻利瓦尔派和效忠的部队联系的一切通信手段。

我十分为难地对他说：“能允许我说点个人意见吗？”他答道：“可以。”

我又尽量使用劝告的口气对他说：“向他们提出尊严和体面待遇的条件，保存你手下人的生命，他们是些最忠诚的人。你不能牺牲他们，你自己也不能牺牲。”

他激动地说：“大家都准备死在这里。”

我连忙对他说：“这我知道，但我想我可以更加冷静地考虑你目前能做的事。别辞职！提出体面的、有保证的条件，避免无谓的牺牲，因为我认为你应该保存自己。而且，你要对你的同志们负责。你不能殉难！”

我清楚地记得，1973年9月11日阿连德的情况和2002年4月12日查韦斯这会儿的情况完全不同。阿连德没有一兵一卒，而查韦斯拥有陆军中的大多数士兵和军官的支持，尤其是青年官兵的支持。

“你别辞职！不能辞职！”我再三对他说。

我们谈了些其他问题：我认为他应该暂时出国，想个法子联系上政变队伍中某个掌握实权的军人，向他提出你愿意出国，但不辞职。我们从古巴设法动员在我国国内和驻委内瑞拉的外交使团，我们将派出两架飞机，我们的外交部长和一些外交官随同去接他。他想了一会儿，最后接受了我的建议。现在一切要看敌方的军事头目怎样决定了。

在《我们的查韦斯》一书的两位作者对当时任国防部长、现任副总统何塞·维森特·兰赫尔（José Vicente Rangel）——他当时一直在查韦斯身边——的采访记中，原话是这样说的：“菲德尔的电话对避免牺牲起了决

定性作用。他的忠告让我们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对我们帮助极大。”

拉：您是不是鼓励他拿起手中的武器抵抗下去？

卡：不是，正相反。当年阿连德是抵抗到底的，依我看，在那种情况下他这样做是正确的，他像他原先许诺的那样，英勇就义。

查韦斯有三种选择：困守观花宫，誓死抵抗；离开总统府，设法团结人民发动全国抗争，这在当时情况下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出国而不辞职也不放弃权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我建议第三种选择。

在那次电话交谈中，为了说服他，我的最后几句话的中心意思是：“挽救那些和你一起的好汉们的生命，现在进行战斗是不必要的。”这个想法基于如下信念：像查韦斯这样深得人心又富有魅力的领导人只是一时被叛逆击败，只要不被打死，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支持者是军队——是会用更强大的力量要求他回来的，他的回国将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负责任地向他提出了上述建议。

在那个当口，当还存在较快胜利归来的实际可能性时，不必提誓死战斗的口号，萨尔瓦多·阿连德当时这样做是很对的。查韦斯胜利归来的事后来果真发生了，虽然比我想象的提前了很多。

拉：你们那时曾想过用某种方法帮助查韦斯吗？

卡：嗯，我们那时能够做的事只有运用外交手段。我们一清早就召见了全体驻哈瓦那的外国大使，我们建议他们陪同我们的外交部长费利佩（佩雷斯·罗克）一起去加拉加斯，和平地把委内瑞拉合法总统查韦斯活着接过来。

那时我毫不怀疑，查韦斯不久定会在人民和军队的簇拥下回来的。目前，应该防止他丧生。

我们提出在政变分子决定同意他离境的情况下派两架飞机去接他。但政变分子军事头目拒绝了这个建议，而且通知他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查韦斯穿上他的伞兵制服，在他的忠诚助手赫苏斯·苏亚雷斯·丘里奥只身

陪同下走向政变军事指挥部蒂乌纳堡垒。

等我同他约好两小时后再给他打电话时，查韦斯已遭政变军人囚禁，失去了同他的一切联系。电视台一次又一次地播放他“辞职”的消息，以期涣散他的支持者和全国人民的士气。

几小时后，已是4月12日白天，忽然接通了一个电话，他与他的女儿玛丽亚·加夫列拉（María Gabriela）通上了话。他告诉她，他没有辞职，成了“俘虏总统”。要她把情况告知我，以便告诉全世界。

4月12日上午10时02分，他女儿立即打电话给我。把她父亲的话转告了我。我马上问她：“你不准备亲口把情况告知全世界吗？”“为了我父亲，有什么事我不能做的？”她用这句明确无误、令人钦佩和斩钉截铁的话回答我。

我立刻联系新闻记者、著名电视节目《圆桌会议》主持人兰迪·阿隆索。兰迪手持电话和录音机呼叫玛丽亚·加夫列拉。那时大约是上午11时。当场录下了他女儿清晰、真实，令人信服的话语，录音带立即录制好后交给各个常驻古巴的国际电视新闻站。CNN得意扬扬地从委内瑞拉播送着政变分子提供的消息，而它的驻哈瓦那记者迅速在中午从古巴播出了玛丽亚·加夫列拉澄清事实的讲话。

拉：这样做产生了什么结果？

卡：嗯，数百万委内瑞拉人——其中大多数是反对政变的——听到了广播，企图用所谓辞职的无耻澜言去蒙骗他们的忠于查韦斯的军人也听到了广播。

到了晚上11点15分，玛丽亚·加夫列拉又打来电话，她的声音饱含凄恻。我不等她说完头几句话便问她：“出了什么事？”她答道：“我父亲晚上被人用直升机带走了，去向不明。”“快，”我对她说，“你应该立刻亲口公开揭发。”

兰迪和我在一起，正在《思想战》节目里同青年团的领导和其他干部举行会议，他随身带着录音机，立即复述了这一则子夜故事。这样，委内

瑞拉和全世界就会得知查韦斯奇怪的黑夜转移去向不明的消息。此事发生在12日夜里至13日凌晨期间。

13日星期六，一大早在哈瓦那省的圭拉德·梅莱纳市举行“公开论坛”。我在上午10时前回到办公室，接到了玛丽亚·加夫列拉的电话。她告诉我“查韦斯的父母非常担心”，他们想从巴里纳斯与我通话，希望发表一个声明。

我告诉她，有一条国际通讯社的电讯报道说，查韦斯已被转移到委内瑞拉北海岸阿拉瓜州的杜里亚莫海军基地。我说了我的看法，从情报的性质和细节看，消息似乎是真实可信的，我建议她尽可能地把情况打听清楚。她又对我说，武装部队总监卢卡斯·林孔（Lucas Rincón）将军想跟我通话，他也想发表公开声明。

查韦斯的母亲和父亲和我通了话：巴里纳斯州一切正常。查韦斯的母亲告诉我，当地驻军头领刚同她丈夫乌戈·德洛斯雷耶斯·查韦斯、巴里纳斯州州长、查韦斯的父亲通过话。我要求他俩尽量保持镇静。

我也同巴里纳斯州查韦斯出生地萨瓦内塔镇的镇长通了话，他想发表声明，并告诉我，当地驻军都很忠诚，我可以察觉到他非常乐观。

我跟卢卡斯·林孔通话。他肯定地说，伞兵营、装甲师和F-16歼击轰炸机基地都反对政变，并准备行动。我大胆向他进言，要尽可能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避免军人间发生战斗。显然政变已告失败。我们没有听到总监的声明，因为通信忽然中断，而且未能恢复。

几分钟后，玛丽亚·加夫列拉又打来电话，她告诉我，伞兵营营长巴杜埃尔将军需要同我说话，并说马拉凯的效忠部队想要发表告委内瑞拉人民和国际的舆论书。

我迫切想知道消息，不等巴杜埃尔开口就问了他三四个有关局势的具体问题，他做了详细答复，满足了我的好奇。他说各个阶段都没有发生战斗。我连忙向他表示：“就等你发表声明了。”他对我说：“请稍等，我把电话转给全国国防和安全委员会常务秘书胡利奥·加西亚韦·蒙托亚（Julio García Montoya）中将。他已赶来表示对我们立场的支持。”这位军官是马拉凯青年军官中军龄最长的一个，他此时手下没有军队可指挥。

巴杜埃尔——他的伞兵营是驻扎在阿拉瓜州马拉凯的实力强大的坦克、装甲兵和歼击轰炸机部队中最基本的支撑之一——出于对上级的尊重，他把电话转给了蒙托亚将军。这位高军衔军官的话说得实在机智、令人信服和十分到位。他的基本表态是委内瑞拉武装力量效忠宪法。这句话说明了一切。

我自己都快成为新闻记者了，接收并传达着各种新闻和公开信息，我仅仅使用一部手机和兰迪手里的录音机。我见证了委内瑞拉人民和玻利瓦尔武装部队十分精彩的反政变斗争。

那时的形势大好。4月11日的政变已无丝毫成功的可能。但是一个可怕的险情依然笼罩着这个兄弟国家。查韦斯的生命处在极度的危险之中。在政变分子劫持下，查韦斯本人成了寡头势力和帝国主义在它们法西斯冒险行动中剩下的唯一资本。能把他怎么样？把他杀死？满足他们对这位敢于反叛的玻利瓦尔式战士、穷苦大众的朋友、委内瑞拉尊严和主权不屈不挠的捍卫者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罪恶心态，要是人民知道了查韦斯被害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如同当年盖坦（Gaitán）遇难后在波哥大发生的事情那样？一个有关类似的悲剧及其鲜血淋漓的破坏性后果的念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继上述电话联络之后，随着中午时光的流逝，从四面八方传来人民群众愤慨和反抗的消息。在肇事的主要中心加拉加斯城，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沿着大街小巷向总统府观花宫和政变分子的中心设施进军。眼看着对囚禁中的朋友和兄弟爱莫能助，我思绪万千。我们还能利用这部小小的手机做点什么呢？我真想立即主动跟巴斯克斯·贝拉斯科（Vázquez Velasco）将军本人^①通电话。我从未和他说过话，也不清楚他的底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回话，他会怎样做。为了完成这个特殊任务，我不能依靠玛丽亚·加夫列拉的宝贵服务。我思之再三。下午4点15分，我打电话给我们的驻委内瑞拉大使赫尔曼·桑切斯（Hermán Sánchez），我征询他，认为巴斯克斯·贝拉斯科会不会回话，他说，也许会。

^① 政变期间自封为委内瑞拉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步兵将军埃弗拉因·巴斯克斯·贝拉斯科显然曾一度成为军事政变分子的代言人和头目。

“给他打电话，”我要求大使，“用我的名义，代表我向他转告我的意见：事态发展可能导致委内瑞拉血流成河。只有一个人可以避免这种危机：乌戈·查韦斯。劝告他立即释放查韦斯，以免事态恶化。”

巴斯克斯·贝拉斯科将军回了电话，肯定地说，查韦斯在他手上，可保障他的生命，但不能接受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的大使坚持同他说理，试图说服他。将军很不高兴地中断了谈话，挂上了电话。

我马上给玛丽亚·加夫列拉通话，告诉了她巴斯克斯·贝拉斯科的话，尤其是有关保障查韦斯生命的允诺。我要求她让巴杜埃尔再次和我联系。4时49分接通了电话，我详细告诉了他赫尔曼和巴斯克斯·贝拉斯科交谈的情况，我表示了我的看法，巴斯克斯·贝拉斯科承认查韦斯在他手上，这一点十分重要，形势有利，应该尽量向他施加压力。

此时在古巴尚不确切知道查韦斯是否已经被转移，去了哪里。一度传闻俘虏已被遣送到奥尔奇拉（Orchila）岛。当我下午5时左右同巴杜埃尔通话时，这位营长正在挑选人员，并准备好了直升机，以便去救回查韦斯总统。我想象得到巴杜埃尔和伞兵部队为完成这项微妙的任务须获取准确无误的情报是多么得不容易。

在13日晚上12时以前的几个钟头里，我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同尽可能多的人谈话上，话题是查韦斯的性命。我跟许多人通了话，因为那天下午人民在陆军官兵的支持下正在控制局势。我至今还不知道那个“短命总统”卡蒙纳（Carmona）^①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离开总统府观花宫的。我那时知道在丘利奥（Chourio）领导下总统卫队及总统府警备队的成员们已经掌控并占领了大楼里所有重要的办公室，始终坚定不移的兰赫尔已回转国防部。

我甚至在迪奥斯达多·卡维略（Diosdado Cabello）^②一就任总统职务

① 企业家联合会主席佩德罗·卡蒙纳被政变军人任命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这一窃取来的职务只存在了不到48个小时。

② 宪法副总统迪奥斯达多·卡维略从军事政变爆发到乌戈·查韦斯胜利返回观花宫这一期间临时担任委内瑞拉总统。

就同他通了话。由于技术原因通信中断，我又立即通过高教部长埃克托尔·纳瓦洛（Héctor Navarro）转告我的口信，建议他作为立宪大会主席命令巴斯克斯·贝拉斯科释放查韦斯，警告巴斯克斯，违抗命令将承担严重责任。

我几乎跟所有人都通过电话，我觉得我自己也从4月12日早晨玛丽亚·加夫列拉打来电话开始就在那出戏中扮演了角色，我只是后来才得知乌戈·查韦斯蒙难期间的全部详情。自从他11日晚被转移到不明去向的地方之后，他面临着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危险，而他充分显示出了自己的高度睿智、镇定自若和革命者的天性。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政变分子一直到最后一分钟都对他封锁消息，不让他知道国内发生的事情，直到最后还在逼他签字辞职，他坚决不签。

一家私人飞机——据说是一个著名政治寡头的专机，由于缺乏有关他的准确情报，没有提到他的名字——等候着把查韦斯转移到一个不知是什么地方，也不知是什么人的手里。

我讲述了我所知道的一切，终有一天别人会写出这个故事其余部分的全部情节来的。

拉：查韦斯是进步军人的代表，但在欧洲，也在拉丁美洲，许多进步人士偏偏指责他是军人。对于这个进步思想与军人两者间的表面矛盾，您是怎么看的？

卡：在巴拿马，奥马尔·托里霍斯是军人的榜样，他对社会正义和祖国具有深刻的觉悟。在秘鲁，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Juan Velasco Alvarado）^①也实施过重要的进步行动。应该记得，譬如说，在巴西人中，路易斯·卡洛斯·普雷斯特斯（Luis Carlos Prestes）是位革命军官，他于1924—1926年间进行了一次英雄的长征，几乎堪比毛泽东1934—1935年

^① 领导一个军事委员会的胡安·贝拉斯克斯·阿尔瓦拉多将军（1910—1977）取得了政权，并成为1968年到1975年期间的秘鲁总统。实行了银行、战略工业（石油、捕鱼、铜矿）国有化，并进行了意义重大的土地改革。

的长征。

豪尔赫·亚马多（Jorge Amado）^①，在他的精彩文学作品中，写过一个关于普雷斯特斯长征的美丽故事：《希望的骑士》。那个军人的英雄事迹着实令人感动。进行了两年半，走遍了国内广袤的地区，没有打过一次败仗。在刚过去的20世纪里，军人中产生过许多重大的革命事迹。

我可以列举出他们中一些杰出军人的名字，像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他是位墨西哥革命的将军，实行了石油国有化，进行了土地改革，并永远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在20世纪中美洲最早的起义者中有一群50年代的危地马拉军人，他们团结在危地马拉陆军的高级军官哈科沃·阿本斯（Jacobo Arbenz）周围，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活动，其中的一项活动是进行了崇高而大胆的土地改革，此事引发了雇佣军入侵，帝国主义像在吉隆滩一样，也用同样的理由发动入侵，反对那个堪称进步的合法政府。

进步军人的例子不胜枚举。在阿根廷，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也是军人出身。应该了解当时的情况，1934年底隆被任命为劳工部长，他制定了许多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法律，后来当他被关进监牢后，人民为了报恩，把他救了出来。

庇隆犯过一些错误：他冒犯了阿根廷的权贵，羞辱了他们，把戏院和富人阶级其他的象征物收归了国有，但他们的政权和经济势力原封未动，他们利用有利时机在美国的同谋和支援下打倒了庇隆。庇隆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把这个富饶国家拥有的财富和资源收归国有，并尽力为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而奋斗。这个对他感恩不尽并忠贞不渝的社会阶层把庇隆变成了贫贱民众终身崇拜的偶像。

利韦尔·塞雷尼（Líber Seregni）将军——若干年前还是乌拉圭广泛阵线的主席——是拉丁美洲最进步、最受人尊敬的领袖之一。他的品德、

^① 豪尔赫·亚马多（1912—2001），（按葡萄牙语译名为若泽·亚马多）巴西大作家，1942年曾创作了路易斯·卡洛斯·普雷斯特斯的传记：《希望的骑士普雷斯特斯》，1956年由布宜诺斯艾利斯未来出版社出版。

他的纯洁和坚强意志帮助了那个高贵而团结的人民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他们选举了塞雷尼的接班人塔瓦雷·巴斯克斯（Tabaré Vázquez）为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在这个国家面临崩溃的时刻把乌拉圭左派推上了执政地位。古巴感激利韦尔·塞雷尼，他和许多杰出的乌拉圭人一起为缔结今天存在的乌古两国兄弟般的团结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们没有权利忘记弗朗西斯科·卡马尼奥（Francisco Caamaño），这位年轻的多米尼加军人，在1965年约翰逊总统为了阻止宪法总统胡安·博什（Juan Bosch）回国而出兵登陆多米尼加共和国时，同4万美国大兵英勇奋战了几个月。他率领数量极少的军人和百姓对入侵者进行的顽强抵抗持续了好几个月，这是西半球有史以来最壮丽的革命事迹之一。卡马尼奥被劫持至帝国一段时间后回到了祖国，为自己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

乌戈·查韦斯出生在一个卑微家庭，受过委内瑞拉军事学院的严格训练，委内瑞拉是玻利瓦尔传播了这么多自由、团结和拉美一体化思想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像查韦斯那样的人，那就不可能在我们美洲当前决定性的时刻产生一个像今天在那个兄弟国家里进行的革命进程那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进程。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矛盾。

拉：在阿根廷，庇隆和庇隆主义一直具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影响。在阿根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模式已在2001年12月轰然倒塌，您如何看待阿根廷近来发生的事？

卡：当2003年5月消息传来，阿根廷大选结果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éstor Kirchner）获胜、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失败时，我感到非常高兴。为什么？有个重要原因：野蛮资本主义最糟糕的东西，即如查韦斯所说，在那个拉美国家里——它已成为新自由主义的突出象征，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最糟糕的东西遭到了惨败。

阿根廷人，虽然远未达到他们最理想的目标，殊不知自己已经为拉丁美洲和全世界做了一件大好事，他们把一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重要象征埋进了太平洋8000多米的海底深处。他们给我们全拉美越来越多已

认识到那个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是个多么可怕和倒霉东西的人们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教皇保罗二世——他享有普遍尊敬——在 1998 年访问我国时谈到了“团结全球化”。谁会反对那个词意完美的全球化呢？这个词的概念不仅涵盖了生活在一国边境内的人，也包括了地球上各地人之间的关系，团结全球化将适用于建立了真正自由、平等和公正的世界后的明天，而在今天他们还在浪费、破坏和挥霍天然资源，置全球居民于死地。

不可能一步登天，但请相信我的话，阿根廷人已经给了这个象征非同小可的一击，这点具有重大价值。

拉：拉丁美洲仍有外债问题吗？

卡：在全世界，就人口相比，外债数量在增加。今天全部外债高达 2.5 万亿或 2.6 万亿美元！发达国家今年将给第三世界国家提供 530 亿美元作为正式的发展援助。而作为外债利息要向他们索取 3500 亿美元！

在拉丁美洲，外债在直线上升，现已高达 8000 亿美元。谁都还不起，这使得任何认真的发展政策难以实施。只要各国政府每年都用四分之一的出口收入偿还外债的话，在拉丁美洲就无法消灭饥饿，外债已偿付过了两倍，现在几乎比十年前翻了一番。

拉：现在美国提出的办法是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ALCA），您对 ALCA 有何看法？

卡：一场灾难。不过是场可以避免的灾难，因为我们已经目睹了 2005 年 11 月 4 日、5 日在马德普拉塔因举行所谓的“美洲峰会”而引发的战斗。那是一场反对 ALCA 的声势浩大的斗争。有过两场战斗，一场在街上和体育馆里，另一场在国家元首聚会的会场里。

在马德普拉塔，那个不祥的 ALCA 计划已经彻底失败，ALCA 计划要求这些技术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对另外一些国家的产品开放全部边境，那

些国家具有最高的技术水平和最高的生产率，它们生产最新式的飞机，掌控全球通信，它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4样东西：原料、廉价劳动力、顾客和市场。这是一种新的残酷的殖民化方式。

拉：您认为这会增加拉丁美洲对美国的依赖吗？

卡：假如拉丁美洲被帝国吞噬了，假如把我们吞下了肚子，就像那条鲸鱼把先知约拿吞入腹中，又消化不了他，终有一天不得不把他吐出来，于是在我们的西半球又将重获新生。但我不相信那么容易被吞食，我希望不会被吞食。近年来的事件正在证明这点：在每个学校、每个家庭、每个公园里都设一个士兵，放一把刺刀，不可能用此办法来统治全世界。

我总说，应该依靠美国本国人民，依靠美国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美国人民可能会受骗，但总会了解真相的，就像在儿童埃连事件^①那样——80%的美国人民支持古巴孩子埃连·贡萨雷斯回国。

今天美国人民反对封锁古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反对突然袭击、干涉主义的战争理论，美国人民遭受过2001年9月11日纽约城的卑劣袭击，应该指望美国人民。也应该指望欧洲的知识分子，因为人们像您一样一直在为唤起良知而做巨大努力，他们为唤起必要的良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拉：此外，现在在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及其他国家里，一系列政府在推行进步措施。您如何看待，譬如说，卢拉在巴西正在树立的榜样？

卡：显然我是怀着最大的同情心注视卢拉所做的一切。他在议会里并不拥有足够的多数；他不得不依靠其他力量，甚至保守势力，以便推行某些改革。新闻媒体曾对一些国会议员的贪污丑闻大肆渲染，但没有能把

^① 1999年11月，一个叫埃连·贡萨雷斯的孩子被他母亲非法地从古巴带到了一条船上，在渡海前往佛罗里达途中母亲被淹死了，美国扣留了这个被渔民救起的孩子，而孩子的父亲要求让他返回古巴，从而引发了哈瓦那和华盛顿之间的一场外交危机，以及古巴要求归还埃连的强大群众运动。最后美国的最高法院于2006年6月判决男孩由其父亲接其回古巴。

卢拉牵扯进去。卢拉是个深得人心的领导人。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们一直关注他所走的道路，我们同他谈得很多，他是个有信念、聪明、爱国、进步的人，出身很卑微，从不忘本，从不忘记一直支持着他的人民。我相信大家都是这样看待他的。因为这不是进行革命，而是战胜挑战，消除饥饿，他能做到。这是要扫除文盲，他也能做到。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应该支持他^①。

拉：司令，您是否认为在拉丁美洲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时代已经结束？

卡：注意，谁都不能断言今天一定会在拉丁美洲发生革命变更，但谁也不能断言，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里不会随时发生革命变更。如果有人客观地分析一下某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他决不会产生半点怀疑，那里的局势是爆炸性的。譬如，儿童死亡率指标，在好多国家里是出生率的65%，而在我国则低于6.5%；在拉美国家儿童死亡人数平均比古巴高出10倍。患营养不良症的人往往高达总人口的40%；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在拉丁美洲，失业人数在成年公民中多达数千万人，也还存在弃婴问题，达数百万人之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席有一天对我说，要是拉丁美洲达到了古巴的医疗和卫生水平，每天可以拯救70万儿童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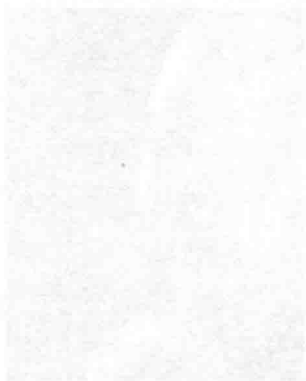
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紧急解决——ALCA不是出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也不是，那么，在拉丁美洲就会在美国想不到的什么时候不止一次地爆发革命。到那时就不能再责怪这些革命是什么人煽动起来的了。

^① 在2003年9月卢拉总统正式访问哈瓦那期间，巴西和古巴就能源、捕鱼、旅游、医药、工业、卫生、教育和体育，共签署了12项合作协议。



我
的
一
生

第二十五章 今日古巴



人权—经济封锁—新闻与报导—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
布什总统侵略成性—伊拉克战争—会对古巴发动“先发制人的战
争”吗？—论恐怖主义

拉：您作为国家元首当前主要关心哪些问题？

卡：今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反对恐怖主义、反对间谍活动的斗争上。我们全国专心致志争取释放被美国囚禁的“五名英雄”。我们高度关注反对各种形式的贪污腐败，大力开展节约能源和全面改造发电系统的运动——我们称之为真正的能源革命，争取进一步提升我们教育和卫生体制的质量和效率。我们投入了许多关注和精力去实施各项新的国际主义合作项目，例如向世界许多地方派出数以千计的古巴医务人员。例如，在巴基斯坦地震造成了许多伤亡和巨大破坏之后，我们派去了古巴医务人员。又如在实施“奇迹行动”^①中，我们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我国关心国际经济危机，关心石油问题，关心应对各种经济战争和政治战争的措施，我国关注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展开的斗争，全世界都熟知在那里年复一年上演的闹剧，到处散布攻击我们的谎言和污蔑。他们却不告诉世界，该委员会通过的各种捍卫人权的措施80%是由古巴提出的。

拉：是在日内瓦人权委员会上吗？

卡：是的，古巴提出的动议往往得到美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支持，总会有30、35、40张支持票。美国却抓住一个问题，死死不放，对别人施加压力，进行威胁。

^① “奇迹行动”始于2004年，首先是为前往古巴接受眼科治疗的委内瑞拉人民做外科手术，主要是做白内障手术，后来扩大到20多个国家，从发起到2005年12月，在古巴共为175000名患者做了手术，使他们恢复了视力。2006年“奇迹行动”在多个拉美国家里开设了由古巴医务人员做手术的眼科中心。

拉：古巴问题

卡：抓住古巴问题，谴责古巴“侵犯人权”。因而在那里年年都要展开一场激烈的外交斗争。另一场斗争是在联合国大会上进行的，在联大会议上古巴得到越来越多的反对封锁的支持票，今年（2005）票数突破了180张，只有4个国家投票反对谴责封锁的决议：当然是美国、它的国际盟友以色列，还有两个其自身生存完全依赖于美国的太平洋上的弹丸岛国。也就是说，90%的联合国会员国都谴责封锁。

拉：90%的联合国会员国都支持古巴揭发对它的经济封锁吗？

卡：是的。少数几个投了弃权票，只有三个国家支持美国：马绍尔群岛^①、几个很小的岛屿——我们尊重任何国家的国土面积，但这是几个曾为美国佬保护国的太平洋小岛，另一个是处境相同的小岛帕劳，以及以色列，这个国家不幸扮演了不光彩的美国小伙计的角色，它支持对古巴的封锁，并与全世界大多数国家背道而驰。少数几个投弃权票的国家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赞成封锁，而是怕美国会找它们的茬。

应该对这几十个国家表示敬意，它们在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里都负有债务，或在经济上对美国有所需求，然而在联大上投票反对封锁。这不是秘密投票，而是公开投票。如果说联合国的投票是秘密投票，如果说在日内瓦的投票是秘密投票，恐怕美国在任何问题上都得不到支持票。

当然，应该说，“可敬的欧洲”在日内瓦表决时常常同美国沆瀣一气。我必须这么说，这是我的义务。这在过去不成问题。北约的投票是一致的，非北约的国家投票也是一致的。当社会主义阵营还存在的时候，日内瓦表决时是不可能发生操纵行为的。但后来球衣改变了颜色，站队变换了位置，

^① 马绍尔群岛——60000居民，180平方公里，1529年西班牙航海家发现。1886—1914年成为德国保护领地，后转受日本管理。1945年受联合国委托成为美国托管地。自1946—1958年，在属于该国领土的两个小岛比基尼环礁和伊尼维托克环礁上进行了67次核试验。1979年独立，根据《自由联邦协定》隶属美国。1990年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有人转到另外一边去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5年前稍一不慎，他们也成了少数派。

这对美国来说是空前未有的事：那些选举人权委员会成员的国家偏偏不选举美国。美国花了几个月时间调查哪些混蛋会在秘密投票中投反对票，但还是陷入了少数，这回美国不敢冒秘密投票的险了，而是物色了一个准备弃权的候选国，以便让下一个候补的国家当选。也就是说，美国必须要求原来那个候选国弃权自己才能当选。

在那儿，他们就是这样干的，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四十六年来，这样的事情一桩接一桩从未间断过。

拉：他们对古巴指责最多的是囚禁政治反对派。

卡：是谁未等刑满就释放了成千上万的反革命分子呀？是古巴政府，不是美国政府。美国利用在这里发生的任何一起依法拘捕事件，大肆鼓噪攻击我们。

你们在欧洲对政治犯动用的法律是非常严厉的，比我们的严厉得多。在英国，监牢里关满了有过政治和爱国动机的爱尔兰囚犯。我记得有一次发生过绝食行动，英国人让许许多多爱尔兰囚犯活活饿死。西班牙人对由于政治原因而进行斗争的巴斯克囚犯实施了非常严厉的法律。意大利政府至今还禁锢着三十多年前有过行动的“红色旅”成员。我们知道，德国政府对巴德尔小组^①的成员是何等的严厉，几乎所有人都死在了监狱里。在法国，关押着好几十名为政治原因抗争的科西嘉囚犯。

美国呢，为什么不释放为争取波多黎各独立而斗争的波多黎各人

^① “红军派”（Rote Armee Fraktion）或称“巴德-迈因霍夫集团”（Banda de Baader），是一个武装分子集团，曾在1968年和1972年间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过暗杀行动。1972年6月5名主要领导人被捕，并被关在斯图加特施塔姆海因看守森严的监狱里。1974年11月，霍尔格·迈因斯（Holger Meins）绝食了几星期后死去。1976年5月，德国当局宣布乌里克·迈因霍夫（Ulrike Meinhof）在牢房里自杀身亡。1977年10月18日，安德列亚斯·巴德尔（Andrens Baader）、古德伦·恩斯林（Gudrun Ensslin）和杨·卡尔·拉斯佩（Jnn Carl Raspe）也都神秘地死在牢房里。

呀^①？为什么不释放新闻记者穆米亚·阿布贾马尔（Mumia Abu-Jamal）呀？他已被关了23年。为什么不释放印第安领导人莱昂纳德·皮尔蒂尔（Leonardo Peltier）呀？他已坐了25年多的牢。

我对你讲过，吉隆滩入侵后，我们一次就释放了1200名俘虏。那个时候，大约有300个反革命组织，那是个恐怖主义横行、破坏活动猖獗的时期，全国被关入狱的人约达15000名。

拉：革命后有15000名政治犯吗？

卡：你要称他们为政治犯，也行。我跟你说起过吉隆滩入侵、“十月危机”“獐”暗杀行动的那些岁月，发生过数十个反对我们的行动计划，从而制造了数以千计的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武装团伙和肮脏战争，让我们的人民付出的生命代价比战争时期还高。

拉：还发生了1976年那次破坏行动，导致一架古巴民航飞机在空中爆炸。

卡：机上人员全部罹难。从当时摄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有100万人参加了抗议游行。这一罪行的主犯，一名罪证确凿、自己也供认不讳的国际恐怖分子，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于2005年3月得到了美国的接纳。美国竟然在所谓的“国际反恐战争”全面展开期间给予了这个最重要的国际恐怖分子之一的人以政治避难！难道存在两种恐怖主义吗？一种好的，一种坏的？我们曾多次向布什总统，向“小布什”诚恳提出过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问题：波萨达·卡里莱斯是从哪里进入美国的？乘的是什么船？在哪个港口登的岸？是哪位王储做的主？是那位佛罗里达的小胖子兄弟（杰布·布什州长）吧？请原谅我称他“小胖子”，我不是批评他，而是向他提个建议：多运动，少进食，我说这话是为了这位绅士的健康。是谁接见了波萨达·卡里莱斯？谁给了他许可证？为什么那个无耻地将他带到美国

^① 15名波多黎各人（5女10男）因争取波多黎各独立而在美国被判处相当于无期徒刑的刑期。他们中多数人已在监狱中度过了十六年以上。

的人还在佛罗里达和迈阿密的街头溜达？鲜廉寡耻的“小布什”至今不愿回答，三缄其口。我们的兄弟国家墨西哥的当局也没有时间——看来他们都很忙——来回答问题^①。

你看他们是不是厚颜无耻吧，撒了那么多的弥天大谎，而当有人向他们提出一个率直的小问题，一个简单的小问题，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一句回话。就是这样，我们在古巴这么多年来遭到这么多的侵略、这么多的阴谋暗算，我们能做什么？不错，有过法律制裁，也很严厉，但这里从未发生过一起囚犯死亡事件，也没有发生过一宗不合司法程序的处决案。可是我们也得自我辩护一下。我并不认为自我辩护是违法行为。没有一宗历史案件没有经过这样或那样方式的自我辩护。可以进行自我辩护，这是最合法不过的事，因为不这样做，是你自己放弃权利，你就见鬼去。你要把自己变成传教士，那就去当牧师，只能布讲福音，我并不反对福音，因为福音中也包含许多积极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选择牧师或传教士的道路，而是选择了道德范围内的革命政治的道路。

拉：他们也攻击过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总统。

卡：这你知道得很清楚，全世界都知道。一个国家不进行自卫便无立锥之地。你看看委内瑞拉发生的事情吧。我们已谈论过那里的事。没有人能像查韦斯那样尊重民主权利和人权的了。那里发生过政变，绑架了总统，总统生命垂危，他们任命了一个人，此人在短短几个小时里将政治权利、人权、自由践踏殆尽，解散了国会和最高法院，封闭了电台，逮捕了爱国者，那个法西斯分子卡蒙纳曾是工商企业主集团联合会的主席……之后，他们

^① 面对古巴一再揭露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到了美国以及他如何进入美国由何人带他人境等详细情节数周之后，美国被迫在迈阿密拘捕了波萨达并以“非法入境”为由递交法院处理。2005年11月波萨达的同谋犯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也被逮捕，此人是该恐怖分子进入美国国土所乘坐的船只的船主，他也因非法携带枪支被递送法院处理。就在撰写本条注释的时候，企图豁免波萨达及其同谋的罪行并释放他们的阴谋活动正在讲行之中。

2007年4月21日，卡里莱斯在交纳35万美元保释金后出狱，并于当天乘私人飞机抵达迈阿密其妻子的住处。（中文编者译）

又策划了石油工人大罢工。然而，那里没有一名政治犯。

拉：他们时不时地指控古巴侵犯人权，这特别让您生气吗？

卡：听着，我相信，在人权方面没有一个国家比古巴更加历史清白的了。革命为我国人民所做的事可以用数字来说明，这是别的国家难以做到的。在革命后的四十六年里，拯救了不下 45 万儿童的生命，在古巴要是没有革命取得的进步，这些孩子早就命丧黄泉了。古巴公民的平均寿命与革命胜利那年，即 1959 年相比增加了将近 18 岁。

为扫除文盲我们创造了条件，让所有的儿童上了学，使所有公民都能学习。在教育和卫生方面，在第三世界，乃至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我们在为人民谋福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乞丐和失业已彻底消除，吸毒、赌博等恶习也都彻底灭迹。您在这里找不到要饭乞讨的孩子，找不到露宿街头的孩子，或是赤脚的，或是面黄肌瘦的孩子，或是辍学的孩子。

我不想细说我们向数十个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援助。在四十多个国家里有古巴医生在义务工作，他们救活了成千上万条生命。我们向成千上万名任何别国不肯收留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受害的儿童提供了免费看护和治疗。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地方能比得上古巴那样对人类的慷慨救助了。这就是那个有人企图谴责它践踏人权的国家吗？提出如此无耻的指控，只能依靠造谣和污蔑了。

拉：我并不认为有人会因卫生政策而批评古巴，也许正相反，对此普遍都有好评。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人们不太了解这些数字，也不太知道您说的对第三世界的援助，您能提供些数据吗？

卡：在卫生政策方面，古巴一岁以内的新生儿死亡率不到 6%，这个指标比加拿大稍低一点，在不久的将来要努力达到 5%，或许低于 4%，争取在美洲大陆名列首位。为把人民的平均寿命从 70 岁提高到 80 岁，古巴与瑞典和日本相比只用了一半时间，现在古巴人的预期寿命为 77.5 岁。

古巴的医疗服务已使古巴公民的预期寿命从 1959 年 1 月革命胜利时的 60 岁左右提高了将近 18 岁。

今天，我国人民拥有的医生数目是 1959 年留在国内没有出走的医生的 15 倍，而且分布情况更加合理。另外还有几万名医生在国外提供医疗服务。古巴已有 7 万多名医生。我给你个确切数字吧，现在有 25000 名正规医学院的学生，这还没有算几万名正在学习其他医疗科学的学生。如果把所有目前正在护士学校学习的学生和学习与卫生有关的专业的学生都算进去的话，总共约有 9 万名青年正在医疗领域接受培训。

还有许多医科学校设在古巴的其他城市里，约有 4 万或 5 万名学生，他们住在一些具有专业和文化知识的严肃人家的家里，这些人家的心理素质以及学生和学生家庭的素质都是经过审查的，这是一种全新的、独一无二的经验。这些学校具备良好的物质条件、必要的教学设备、视听设施、互动课程。这意味着，一名医生在那里经过六年学习得到的知识用传统的方法可能要二十年才能学到。

我们正在努力建立最好的世界医疗基金，这不仅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拉丁美洲医学院（ELAM）的入学人数将会达到 12000 名学生，例如，现在古巴已有 2000 名玻利维亚青年学员。已有许多国家要求我们帮助他们培养医生，我们能够做到，而且能比谁都做得好。我们实施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教学方法，很快就会见分晓。我们的医学院里将有成千上万的拉美学生。古巴将在今后十年里培养出 10 万左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医生。遵照古巴与委内瑞拉签订的“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ALBA）的原则。这项计划将在坚定不移地迈向我们各国人民一体化的进军中提供同等数量的医生。我和乌戈·查韦斯总统代表古、委两国人民做出承诺，要在我们这个地区，实施具有重要的人道和一体化内容的宏大社会经济计划，特别要支持扫盲、教育、加勒比石油公司（Petrocaribe）、加勒比电力公司（Electrocaribe）、防治艾滋病和发展健康卫生事业。

拉：还决心开展“奇迹行动”吗？

卡：是的。“奇迹行动”正是在这一框架内开展的。这是一项巨大的任务，至少能使 600 多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人民保持和恢复他们的视力，而且十年里还将培养出 20 万卫生专业人员，这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一计划已从委内瑞拉开始做起，我们决定把“奇迹行动”扩大到加勒比各国。2005 年 9 月，在我国进行眼科手术的加勒比人已达到 4212 名，委内瑞拉人达到 79450 名，加在一起已达 83662 人。

拉：古巴也在向发生灾难的地区派遣医疗队，是这样吧？

卡：是这样。我们已建立了一支专门在灾区和疫病流行地区工作的国际医疗大队，名叫“亨利·里夫”大队。没有任何别的国家会向遭受飓风袭击的中美洲兄弟人民派出 1000 名医生，而古巴在 2005 年秋天向危地马拉派出了这么多医生。又如，也是在那个时期（2005 年冬天）古巴医生出现在地球的另一边，从哈瓦那飞行 18 小时才能到达的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震地区，去面对一场许多年来在地球上从未发生过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死亡和痛苦。我不记得有没有别的地方的情况会比那里更严重得了，那个地方受灾的贫困人民是些居住在极高山区的牧民，冬季即将来临，那里的天气十分寒冷，生活极其贫困。

我谈到过的这些医疗队我都曾一一为他们送行。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在世界各地工作的同胞们的情况，我们一直同他们保持着联系，他们中就有“亨利·里夫”大队和许多其他医务人员。他们正在谱写一段美丽的故事，此时此刻正在展开的这则故事，在我们的革命生涯中是前所未有的。

拉：您向我展示过您为了关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每天早晨必需阅读和参看的一大堆文件、几十条从国际报刊上翻译过来的电讯和文章。就这方面，我希望我们能谈谈古巴的新闻报道情况。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古巴虽然有许多优秀的新闻记者，但对这里发生的事情进行批评的报道却很少很

少。对此，您有何看法？

卡：哦！实话告诉你，我们的新闻机构不是在革命的敌人手里，也不在美国代理人手里，而是在革命者的手里。我们的报纸是革命的报纸，我们在电台和电视台工作的记者都是革命者。我们有许多报纸，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机关报：工人、青年团、党、农民、军队。有数十家报纸，都是革命的报纸。

拉：读了这里的报纸，听了这里的电台广播或是看了电视新闻后得到的印象是，这里一切都好，只报道成就和胜利。既没有问题，也没有人感到不满意。这就有点奇怪了，因为我想，即使在党内也应该多进行一点批评，以便开展辩论、争论和讨论吧。

卡：听着，这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曾有过一种倾向，以为开展批评、揭发做得不好的事情是迎合敌人，是在帮敌人和反革命的忙。有时对某些事情做了报道也是忧心忡忡，生怕被敌人利用。然而我们发现，在反对消极事物的斗争中新闻机构的工作十分重要。我们提倡批评精神，我们坚持认为必须进一步发扬批评精神。我竭力鼓励批评精神，因为这是完善我们体制的一个基本因素。

我们知道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妥当的批评，我们提倡负责任的批评。尽管批评可能引起后果，但是有批评总比没有批评好。

当然，处理问题时，应该非常认真负责，不要给敌人提供那种可能用来破坏革命的敏感新闻。这就是一个革命者执行任务时不容易掌握的一件事。

拉：开展负责任批评的愿望能否达到了足以准许新闻自由的程度？新闻自由是许多人所要求的。

卡：如果您所谓的新闻自由是要给予反革命和古巴的敌人自由发表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的言论，进行造谣污蔑和制造条件反射的权利的话，那我可以告诉您，我们不赞成那种“自由”。

只要古巴还是个遭到帝国主义封锁的国家，深受不公正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或“古巴修正案”的危害，还是个受到美国总统本人威胁的国家，我们就不会给予我们敌人的盟友那种“自由”，他们的目的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存在。

拉：某些自由媒体也被认为与革命格格不入吗？

卡：在那些“自由”媒体上，谁在说话？说些什么话？谁在写文章？他们说的是报纸或电视台老板们想说的话，写的是他们定稿的文章。这一点您知道得很清楚。侈谈“言论自由”，而实际上捍卫的基本上是大众传媒所有者的权利。我坦率告诉您，在我们这里，在古巴不存在这种媒体的所有者，但是各个群众团体都有自己的媒体：大学生有自己的媒体，工人、工会、农民，甚至军人都有各自的媒体。大家都有自己的新闻机构。请相信我，他们有很大的自由发表他们认为适宜发表的东西。

与其质疑我们的方式——这是四十多年来抵抗我们强大邻邦的后果和结局，不如去问问我们的公民，他们感到自由还是不自由。

拉：也有外国报刊受到审查和不能在古巴发行的。

卡：听着，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外国报纸，有美国的和欧洲的，是些重要的、严肃的报纸。这方面我们比传说的宽容得多。在许多售报点都可以找到外国报纸，可以用外汇购买。旅游者可以买到，任何拥有外汇的古巴人也可以买到和传阅。这并不犯法。这里没有人害怕那些报纸或是电视台可能说出来的反革命言论，比如 CNN 吧，许多人在收看，没有问题。

不过我们不能耗费我们的财力——因为我们还有其他优先的用途，如能源、食品、卫生等——去进口外国报刊。对我们来说，这类的进口绝对不是首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限制这家或那家刊物发行，因为它一直在系统地进行反对我们的运动，进行反革命运动，一直在散布谣言、污蔑和制造谎言，企图制造分裂，挑动对立。对此我们是不能容忍的。我们

为什么要允许一家反革命报纸在这里发行呢？

这是因为他们大谈新闻自由，而当古巴揭露某些他们认为不宜让人知道的事情时，他们却不予发表。您知道，每个机关报都应服从一条路线，而路线是由控制报纸的人制定的，他们是媒体的主人，有的人自由度大些，有的人小些，虽然不可否认，也有不少人是独立的。

拉：您对这里新闻报道的批评程度满意吗？

卡：嗯，我不知道您是否具体了解我们新闻机构的情况，我可以告诉您，对我来说，国内发生的事情的最重要的情报来源是各种报纸，它们比党或国家机关呈报给我的报告还要好，有时给我的帮助更大。我及时了解发生的任何事情。我天天阅读各种报纸，是在晚上。

您跟我谈论批评精神，但我不禁要问：在那么多自称比我们更民主的国家的报纸上批评精神又在哪里呢？在美国，那些宣传机器的真正代言人记者和电视台都支持布什总统攻打伊拉克的战争，他们的批评精神又在哪里呢？

本该属于人类头等权利和特征的真实性和道德观在那些媒体上所占的篇幅越来越少了。电讯、电台、电视、移动电话和互联网每时每刻都在潮水般地传递世界各地的新闻，对一个公民来说要关注这么多的事件实在不很容易，在这些铺天盖地的消息中人类智慧很难辨明方向。

对那些自称自由和富有批评精神却又从属于宣传广告、从不敢批评登广告人的新闻机构，我倒要问一声：为什么你们捍卫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要花费数目惊人的钱去做广告宣传呢？浪费在广告宣传上的亿万美元可用来做多少事情呀？您在这里可以看到，国家不把 PIB（Producto interno bruto——西班牙语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一分钱用于在报纸、电视或电台上做广告，古巴不在商业广告上花费一分钱。

很不幸，在美国或世界上许多别的地方，那些大众传媒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不是在抨击它们。像您这样懂得大众传媒会对思想产生作用的人能够认识到，在这里，传媒是用来进行教学、教育和提高价值

观念的。实际经验使我深信不疑：价值观念一定能在人的心灵、智慧和心中生根开花。

谈到欧洲的新闻“自由”，我们不做口是心非的推理。我们追求的是在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和信息灵通的国家里，一个是有完整而普及的文化并能够与世界沟通的国家里的另一种新闻自由。害怕自由思想的人不会去教育人民，不会给人民提供服务，不希望人民最大程度地获取文化和深刻的历史及政治知识，不让人民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评估事物并用自己的头脑去得出结论。要想在自己头脑中得到东西，就应该具备必要的判断手段。

大众传媒在它产生之时就控制了人的思想，它的统治地位不仅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之上，而且也建立在条件反射的基础之上。谎言和条件反射不是一回事。谎言影响认识，条件反射影响思考能力。不了解真实情况与丧失思考能力不是一回事，因为在你的脑子里占主要地位的是反射：“社会主义坏，社会主义坏，社会主义让你六亲不认，社会主义剥夺你的家，社会主义夺走你的妻子。”所有无知的人、所有的文盲、所有的穷人、所有的被剥削者都跟着说同一句话：“社会主义坏，社会主义坏。”调教鹦鹉学舌，训练狗熊跳舞和狮子鞠躬，用的就是这种办法。

他们不去教群众读书写字，每年却花百亿的钱去愚弄广大群众，让人们变得仿佛失去了思考能力，哄骗他们去购买十种不同品牌而性质一样的商品，他们必须欺骗群众，因为这上千亿的钱不是由企业支付的，而是由那些受了广告诱人的影响去购买商品的人来支付。有人一次次购买派尔莫丽洗衣粉、高露洁牙膏、康达多香皂，仅仅因为听人说了一百遍，给他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印象，在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那些大谈“洗脑”的人，就是这样在印刻、洗涤别人的脑子，致使人类失去了她最大的财富：思考能力。

他们不是要在总人口中文盲占20%—30%、半文盲占50%的国家里谈论“新闻自由”吗？人们能用什么观点，乃至用什么手段发表意见，在什么地方发表意见呢？每当许多有文化和聪明的人想要发表一篇文章，却没有办法发表，遭到封杀、压制和丑化。那些重要媒体早已成了垄断操纵

的工具。

我们则拥有并运用传媒来教育公民，来增进他们的知识。这一工具在革命中发挥了作用，提高了公民的觉悟、思想和价值观，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利用得很好。然而我们知道还能做什么，我们懂得如何利用传媒的社会功能来提高整个社会的知识、文化水平以及生活与和平的质量。

我们绝不会相信在西方国家里媒体是用来增强团结观念、促进友爱和正义精神的神话。他们宣扬的社会制度的价值观本质上是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的。一个人的文化水平越高，就越能懂得，当今世界上日趋复杂的问题是绝不可能通过一个失去了理智和不合情理的社会方式解决得了的。

拉：虽然您反对个人崇拜，并常常谴责个人崇拜，可是古巴的传媒频繁地提到您本人，您在传媒内容上占有重要位置。这使您感到不舒服吗？

卡：请听我说：正好与一些人认为的相反，我不大在公开场合露面。我不习惯天天在电视新闻上出境，可以连续半个月新闻媒体上没有一条有关我的消息。我只出现在某些我必须参加的纪念活动上，或者是当有外宾或某个国家元首访问古巴时，或是在发生了比如像破坏性的飓风那样的非常事件的时候。

我向您保证，我很不喜欢出现在报纸、电视或电台上。这里从不发表崇拜国家元首的消息，对国家领导人描写得相当自然。我可以这样说，媒体提起我时是恭恭敬敬的，但又是亲切随和的。没有人把我当作高高坐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王。许多人像邻居一样看待我，同我聊天。

我生性反对一切近乎个人崇拜的事，您可以觉察到，这点我也跟您说起过，在古巴没有一所学校、一家工厂、一所医院或一幢大楼用我的名字命名，也没有我的雕像，实际上连我的肖像都没有。这里不印制标准像。可能在某个办公室里有人放着我们的一张照片，但这是他的个人行为，而且绝不是正式肖像。这里没有一个国家的机关浪费钱和时间去印制和散发我的或任何其他领导人的肖像，这在我国找不到。

众所周知，我尽可能地不在报纸或电视新闻中出现，只是在非要不可

时我才听任安排。您会注意到，我是世界上最少在媒体上露面的国家元首当中的一个。我也不喜欢把我的名字与头衔和职务联系起来，幸运的是，人们都叫我菲德尔。

认识我和熟悉我的言论、思想的人都知道，我是个能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人。我毫不妥协地反对一切个人崇拜或造神运动的表现。

拉：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大众传媒常常用来进行宣传。

卡：除了向人民通报国内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之外，我们还要利用传媒增进人民的知识和提高他们的整体文化水平，驳斥谎言，崇尚真理。为此我们开设了新的教育频道，通过这些频道，《大学面向大众》节目除了教授学校课程以外，还开设语言和其他多种课程。2003年我们开办了电视第三频道，是专门用于教育的；2004年又开播了第四频道，也是教育的。电视是一种广泛传播知识的绝妙而尚未充分利用好的方式。

运用视听手段并充分发挥其作用，我们便进入了普及信息和知识的时代，而不是去散播毒素或大做广告，不是为了让别人都为我着想。如果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那样以极其错误的方式利用传媒的话，那么就会剥夺公民独立思想的自由，因为传媒已为他设想好了一切，告诉他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应穿长裙子还是短裙子，什么衣料时髦，从早上起床后该用什么牌子的牙膏刷牙，一直到晚上上床前该服用什么安眠药入睡，一切的一切都绝对地照此办理。这种广告才真叫宣传，而这种宣传往往让人神经错乱，十分有害。谁都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在休闲或娱乐时学会喝含酒精的饮料，吃垃圾食品，或者看暴力和荒诞故事的影片，这些东西会危害儿童的心灵。

拉：您是否认为，在当今新技术的世界上，国家仍然可以控制新闻报道？

卡：越来越难了。今天有了新的传递和接收信息的方式。有卫星可以提供信号，有互联网可以把信息传送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因为一般来说，实际上凡是上网的人也使用电脑，使用电话和各种联络手段。

我们不应该低估世界上几千万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不一定都属于剥削和富有阶级。别忘了，比如说，西雅图，别忘了魁北克，别忘了日内瓦、佛罗伦萨、阿雷格里港，别忘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发生过群众性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的地方，这些运动都是由具有文化知识的人通过互联网推动起来的。今天，除了战争以外，还有许多威胁地球生命现象：气候变化、臭氧层遭到破坏、大气层变暖、我们呼吸的空气、河流和海洋受到污染等都在危害我们的生命。为了反对这些，世界各国人民，包括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美国人民、欧洲人民都在动员起来，致力于一个共同的事业。

今天有了这些与世界沟通的手段，使我们少受一些来自庞大大众传媒的伤害并减少一些对它的依赖，这些庞大媒体有的是私人的，有的是国家的，由于如今有了互联网，无论是不发达国家还是富有国家的人，只要有了某种向往和目标，都可以从事共同的事业。也可以利用互联网来做世界上动机最坏的事情，例如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策划的那些事，或是类似“9·11”袭击者们所干的那些事。

拉：你们谴责了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事件吗？

卡：我们毫不犹豫地谴责9月11日的罪行。我们一再谴责各种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美国政府卑鄙无耻地把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可是古巴从来不允许利用它的领土从事反对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人民的恐怖活动。我们也谴责国家恐怖主义。我们曾向美国政府建议制定一个在我们地区反对恐怖主义的计划，他们拒绝了。

拉：你同意把恐怖主义视作当今世界的最大威胁吗？

卡：我同意把恐怖主义视为当今世界的一个严重威胁，但我认为，人类还面临着其他同样或更为严重的威胁：自然环境和物种生存条件的加速破坏，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民的贫困，恶劣的卫生状况，饥饿……在当今世界上除了恐怖主义以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严重问题。在这一切之外还要加上那个唯一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图谋，它期望成为地球的主人，推行

傲慢的统治全球的政策。

至于说到恐怖主义，美国政府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世界反恐战争”，但我在使用这个词时总是十分小心，因为袭击纽约，袭击马德里、伦敦或其他城市是一个方面，这是些令人厌恶的行为，必须与之斗争；而另一方面，在这一合理的担忧基础上产生了某些令人怀疑的推断。

自从2001年9月11日以来，我们一直在观察，许多民族斗争——比如说像伊拉克或车臣——怎么会被鉴定为“恐怖主义”呢。1980年前后，在里根执政时期，曾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恐怖主义”这个词，他们把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非国大”的战士们如纳尔逊·曼德拉说成是“恐怖分子”，又如把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的战士、争取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巴勒斯坦人或萨尔瓦多的爱国者也都说成是“恐怖分子”。里根把尼加拉瓜的反革命分子比喻为美国的开国元勋，比作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拉斐特志愿者，比作法国为反对纳粹占领祖国而进行抵抗运动的游击战士。

可是当以色列军队轰炸加沙地带居民区，造成无辜者死亡时，他们不把这事称作恐怖行动；当美国军队自己在伊拉克发射飞弹滥杀儿童、妇女时，也不把此称作恐怖主义。

我们在反对巴蒂斯塔的战争中——这您知道，我们曾谈论过，我们总是在那些行动中尽量避免伤及非战斗人员。我们使用过暴力，但您听我说，在我们的革命暴力中从不使用任何这类方法：自杀式袭击平民、绑架非战斗人员和砍他们的脑袋、轰炸学校等，今天看来在车臣、伊拉克、巴勒斯坦的某些斗争在政治上可能是正当的，而我们仍把这些方法看作是不能接受的和可耻的。我认为，这些方法大大损害了他们希图为之奉献的事业。

我应该再补充一句：哪一方面都在使用暴力。那些合法的当政者也在相当程度地使用暴力，使用了相当多的镇压方法，许多地方镇压还非常残酷，为所欲为，对这些镇压却没有人称之为恐怖主义。

拉： 布什总统的态度令您担心吗？

卡： 听着，我们正处在困难时期。前不久，我听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

言论和理念。2002年6月美国总统在西点军校^①发表的演讲中对军人们宣称——我原文引用：“我们的安全要求我们把你们即将率领的军队变成一支应该做好了随时准备向世界上任何阴暗角落发动进攻的军队。”

就在这一天，他宣告了“先发制人和突然袭击战争”的理论，这种事在世界政治史上从未有人做过。几个月后，他在提到攻打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时肯定地说：“……如果我们被迫进行战争的话，我们会动用我们军队的全部力量去进行斗争。”

做此宣告的人不是一个小国政府，而是一个空前未有的最强大的军事大国的元首，这个大国拥有足以多次消灭全球人口的核武器导弹，以及其他多种可怕的常规或大规模杀伤力的军事体制。

按照布什先生的说法，我们就是这些“世界上的阴暗角落”。他们也这样看待某些第三世界的国家。从来没有人把我们说成这个样子，也从来没有人比这更加蔑视我们的了。我们这些曾经是几百年来列强瓜分和掠夺全球过程中的老殖民地，今天整体构成了不发达国家。我们中没有一个国家得到过完全的独立及公正和平等的待遇，也谈不上什么国家安全；没有一个国家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没有一个国家有否决权，在国际金融组织中做不了什么主；留不住自己的人才，也防止不了资金流失，避免不了因经济发达国家过度开发、自私和贪婪的消耗引起的对大自然和环境的破坏。

在安全理事会上，美国再次宣告它保留未来独自决定进攻别国的权力。现在，竟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词句，大谈起“先发制人的战争”来了。

拉：联合国没有能避免伊拉克战争。您认为联合国应该进行改革吗？

卡：应该，而且非常迫切。应该毫不延误地直面一场真正的改革，尤

^① 参见 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6/20020601-3.htm 网站上乔治·W·布什在西点军校的演说。

其应该对联合国的民主化进行深刻的改革。现状已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安理会令人汗颜地无法阻止伊拉克战争证明了这一点。

我认为，联合国的前途取决于伊拉克战争造成的国际危机最终如何结局。今天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是，这样的一个世界还在持续下去，那里盛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一些最强大的国家横行霸道，充满侵略危险，绝大多数人陷于不发达和绝望境地。是允许一个世界独裁者统治我们各国人民呢，还是维护联合国和多边主义？这是问题所在。

我认为，值此2005年成立50周年之际，联合国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至少在往这个方向迈进。但是我们这些人说这话时忧心忡忡，我们希望加强这个组织；而另一些人说这话时却窃窃自喜，他们期盼着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我坦率告诉你：联合国大会今天发挥了什么作用？几乎什么作用也没有发挥，这是事实。只不过是一个争争吵吵的论坛而已，产生不了真正的影响，也发挥不了什么实际作用。

我要问：国际关系遵循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了吗？没有。为什么如今当哲学、艺术和科学已达到空前高度时还再一次要求一些国家人民凌驾于另一些国家人民之上，把其他一些本应以兄弟相待的人民称之为“地球上阴暗的角落”或“北约的欧洲大西洋边缘”呢？

既然联合国宪章宣告“只有为了共同利益”才能动用武力，并为了维护和平才需采取“集体措施”，为什么有些国家自认为有权利单方面发动战争呢？为什么不谈使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呢？

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通过宪章时明文规定各国主权平等。难道我们都平等了吗？享受到了所有成员国同样的权利了吗？根据宪章，是这样的；但是根据残酷的现实，不是。尊重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本应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然而，这一原则只有在最强大的国家同意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哪怕这是一些没有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保卫自己的国家。这些最强大的国家愿意尊重其他一些或许稍稍损害了一点他们的特权的国家吗？我担心不会。

拉：伊拉克战争，您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吗？

卡：在2003年2月，战争前几个星期，我在马来西亚，参加在吉隆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峰会，我同伊拉克代表团的成员，也同当时的副总统塔哈·亚辛·拉马丹进行过长谈，我对他们说：“要是你们真的拥有化学武器的话，销毁了吧，以便联合国检查人员进行工作。”当时对他们来说这是避免攻击的唯一可能。我相信他们这样做了，他们肯定在此之前就销毁了。他们早已销毁了所存的这类武器，可是这无济于事。进攻已经决定，虽然他们已不拥有那种武器。

拉：您对侯赛因·萨达姆有何看法？

卡：1991年入侵科威特之后，他就陷入了导致严重危机的逻辑。我们投票赞成谴责那次入侵的决议。我通过私人信使给他写了两封信，建议他谈判，并及时撤出科威特。

我在第一封1990年8月2日发出的信中写道：“我怀着沉痛的心情给您写信，因我今日得悉贵国军队进入了科威特国。

“无论导致做出如此戏剧性决定的动机是什么，我不能不对您说，我们对此事可能首先给伊拉克和科威特、然后对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严重后果深表忧虑。古巴尽管同伊拉克保持着友好关系，仍不能不反对用军事手段解决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冲突。

“从国际通讯社的报道看，国际舆论的迅速反应已使伊拉克处于了十分危险和有害的境地。

“我认为美国及其盟国非常可能乘机军事介入冲突并狠狠打击伊拉克，而且华盛顿还将乘机在国际上和在海湾地区进一步扮演它自封的国际宪兵的角色。

“在这种情势下，时间因素十分关键，我呼吁您利用好阿拉伯联盟或不结盟国家运动（我们已向该组织表示了我们的意见）的调解，表示你们愿意从科威特撤出伊军并立即寻求政治和谈判解决分歧。这些步骤有利于加强第三世界各国对付美国宪兵角色的国际地位并同时会加强伊拉克在国

际舆论面前的地位。

“当前的根本问题是避免帝国主义借口保卫和平和一个地区小国的主权进行干涉。这个先例一开将对伊拉克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后患无穷。

“伊拉克如对主张政治解决表示明确立场并采取坚决和迅速的步骤，定将有助于我们防止并挫败美国的侵略和干涉主义计划。

“古巴愿意在任何促成政治解决的活动中提供合作。

“我相信，我转告您的这些意见表达了世界上几十个一直怀着尊重和敬意看待贵国的国家此时此刻的心情。”

我们那封呼吁公正合理解决问题的信就是用这句话做结的。

不久后，即1990年9月4日，我在回复从伊拉克发来的一封信里重申了上述原则立场，并呼吁政治解决那个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阴暗并会给全世界带来严重后果的症结。

我们再次坚持我们的意见。我在第二封信的一段中说：“……我决定再次给您写信，恳请您好好读读，仔细想想这封信的内容，我不得不向您就当前十分痛苦的现实提出我的一些意见，我仍然希望这些意见能对您此刻做出重大决策有所裨益。”

接着我又指出：“依我看，要是伊拉克不愿在从科威特撤军的基础上争取政治和谈判解决问题的话，战争定将无情地爆发。那场战争可能会对本地区、特别对伊拉克造成巨大的破坏，无论伊拉克人民准备多么勇敢地作战。

“美国已组成了庞大的军事联盟，这个联盟除了北约以外还包括阿拉伯和穆斯林军队，在政治方面美国已在绝大多数国际舆论面前利用上述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大大丑化了伊拉克，每个事件都在联合国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产生了深刻反响和敌意。也就是说，已为美国的霸权主义和侵略计划制造了理想的条件。伊拉克是不可能军事和政治劣势下作战的。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会在许多年里分裂阿拉伯人。美国和西方会无限期地在本地区保持军事存在，这样的结果不仅会给阿拉伯国家，也会给整个第三世界带来无穷后患。

“伊拉克遭遇的是一场不平等的战斗，既没有站得住脚的政治理由，又得不到国际舆论的支持，当然，在许多阿拉伯国家里也有同情者，但这只是例外。”

这就是我们对这一事件看法的结论，我们甚至威胁萨达姆改变他的立场：“不能允许伊拉克人民多年的建设成果和美好未来被帝国主义的尖端武器毁于一旦。要是在这件事上真还有一点正当和说得过去的理由的话，我是不会劝阻您避免这种牺牲的。”

“绝对不应该把接受广大联合国成员国呼吁从科威特撤军的要求看成是伊拉克的耻辱和屈服。”

“无论伊拉克在与科威特的关系中自认为有什么历史缘由，事实是，国际社会几乎众口一词反对伊拉克的所作所为。正是在这种国际认知广泛一致的情势下掩盖着帝国主义妄想摧毁伊拉克和占有整个地区能源资源的图谋。”

可是我们的这些努力无一奏效。

拉：您本人认识侯赛因·萨达姆吗？

卡：认识，是在1973年9月。我那时在阿尔及尔参加不结盟国家峰会，准备应越南政府邀请去河内。那时越南还没有完全解放。萨达姆到巴格达机场迎接我。那时他是副总统，还没当伊拉克总统，他是复兴党党魁。当时我觉得他是正派人，和蔼可亲。我们游览了巴格达市容，马路宽阔，几座桥梁横跨在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之上。我在那里只逗留了一天。我就是在巴格达得悉智利发生了反对阿连德的军事政变的。

拉：您如何从军事角度评价伊拉克军队在那场战争中使用的防务体制？

卡：我们密切关注了2003年3月至5月的那场战争。为什么萨达姆没有抵抗？这是个谜。为什么不炸掉桥梁阻挡美军前进？为什么不炸毁军火库、机场？这一切都是很大的一个谜。只有什叶派在南方的巴士拉抗击了英国人。

拉：除了你们，所有国家都在战争前夕关闭了他们驻伊拉克大使馆。你们在巴格达一直待到什么时候？

卡：我们的大使馆是留在巴格达的最后一个外国使馆。嗯，还有梵蒂冈使馆。连俄国人都走了。2001年末阿富汗打仗时我们驻喀布尔使馆也是留到最后的。只是在美国进入伊拉克首都后我们才下令撤离巴格达。我们未能够要求在我们使馆的5个人保护馆址抵抗两支军队。他们准备留下抵抗，但是我们要求他们撤离。应该避免大使馆成为某些伊拉克政府要员的庇护所。美国会利用借口来向我们施加压力，会使我们陷于尴尬境地。我们的外交官得到了通行证，他们得以安全离开伊拉克。通行证是由一个国际组织而不是美国人发给他们的。

拉：您对伊拉克局势的演变怎么看？

卡：依我看，只要不停止占领伊拉克，人民将会继续加强抵抗。这种地狱般的日子还将延续下去。因此，首要目标应该是将实际控制权立即转交给联合国，并启动恢复伊拉克主权的进程，建立一个由伊拉克人民当家做主产生的合法政府。但这应是一个真正自主决定的合法政府，而不是完全在新殖民主义军事占领下选举产生的政府。还应该立即停止对伊拉克财富进行无耻的分赃。

拉：布什总统政府在他的“世界反恐战争”中利用了的古巴的关塔那摩基地作为关押“战场俘虏”的高度安全的监狱。您对此有何考虑？

卡：一个多世纪过去了，美国还霸占着这块古巴领土，今天那里已成了让全世界蒙耻和可怕的地方。确有消息说，自2002年1月起，那里已成了一个滥施酷刑的牢狱，那里滞留着数百名从世界各地抓来的人。美国当局之所以没有把那些人带进美国国土，那是因为美国境内有一些法律规定，不允许长年非法拘禁又不依照法律程序进行处理这些人。此外，令世人震惊的是，他们还对那些人施行残忍和野蛮的酷刑。

全世界得知这件事，是因为与此同时那个遭到强大帝国入侵的国家

里有数百名俘虏在伊拉克的一个监狱里，在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也受到了酷刑，并有数十万伊拉克平民丧失生命。在关塔那摩关押了约 500 人——从少年到老人，他们不得不忍受种种闻所未闻、令人发指的凌辱。他们被剥夺了国际法赋予的各种权利，遭到了残酷、不为人道和卑鄙无耻的禁锢。

每天都有新鲜事披露，不久前传出消息说，美国政府在东欧卫星国家里设有秘密监狱，这些国家在日内瓦投票反对古巴，控告古巴违反人权。在反恐斗争的借口下把一些劫持来的人投进了这些秘密监狱。现在不只在阿布格莱布，不只在关塔那摩，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有秘密监狱，在那些地方，“人权卫士们”在滥施酷刑。

事情没有到此为止。也有消息传来，说在费卢杰（Fallujah）使用了白磷弹，帝国主义发现那里的人民——基本上是赤手空拳——难以征服，侵略者在那里陷入了走不得、也留不得的境地：他们要是走了，抵抗战士会马上回来；要是留下，别的地方也需要他们的部队。于是，在费卢杰使用了白磷弹！当这一罪行被披露时，美国政府说白磷弹是一种“常规武器”。既然是常规武器，为什么不公开宣布呢？为什么谁都不知道他们在使用这种被国际公约禁止的武器呢？如果说凝固汽油弹是禁用的，那么白磷弹更加应该禁用。

已经死亡两千名年轻的美国士兵了，有人不禁要问：在这场非正义的、用弥天大谎辩解的战争中死亡还要继续到什么时候？

甚至连美国的高级军官都承认，这场战争已经失败，应该撤军。这对美国是有好处的，因为这场不正义、不光彩、使用了像酷刑这样令人羞愧、不道德手段的战争要再打下去，还会有更多的美国青年在那里丧命；这对伊拉克是有好处的，因为伊拉克人民可以开始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对联合国是有好处的，因为联合国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这对我们世界各国也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吃到了国际经济衰退的苦头，受到了日益严重的不安全因素的威胁。

拉：您担心会发生入侵古巴或对古巴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吗？

卡：如果布什总统决定入侵古巴，那会爆发一场可怕的战争。美国将面对我们全国有组织的武装起来的人民，将遭到前仆后继的全民抵抗。入侵会给我们造成重大损失，但我们也计算过，为了入侵古巴和占领全国，美国需要几百万士兵。在伊拉克，他们派出了大约 15 万人，你已经看到，美国能控制的东西很少。您若是分析一下当年我们和巴蒂斯塔对抗时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是 8 万人对 3 千人，您能算出，他们的力量是我们的 25 倍。所以我告诉您，美国入侵我们并占领古巴得动用几百万军队，美国哪有这个力量。

我们拥有的手段会让入侵者的日子很不好过。除了现在正规军和后备队之外，我们还有地面作战的民兵，千百万男男女女都准备为保卫祖国奋战到底。我计算过，美国军队为了消灭我国，得用两个军人对付我们一个战士，他们需要一支不得少于 500 万士兵的军队。我敢肯定，他们遭受的伤亡将是十分惨重的。我们可以向他们保证，这里具备一切条件使古巴成为他们的地狱和死亡陷阱。

这一点他们是知道的，因为他们要投入的战斗是一场人对人的战斗而不是机械化师对机械化师、空军对空军，或海军对海军。在常规战争中他们占有诸多优势，可是在一场全国范围有组织的人民抗战中，分不清哪里是前线，哪里是后方，他们的技术力量无法施展。你看看车臣或伊拉克发生的事吧。重型和尖端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帮了俄国人或美国人什么忙呢？在古巴，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都宁死不屈，谁都不愿在美国铁蹄下求生。

拉：您认为乔治·布什总统政府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和对古巴都是“好战”或“危险”的吗？

卡：就像我对您说过的，古巴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第一个声援美国人民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提出警告：美国极右派——它是 2001 年 1 月舞弊上台的——推行的政策是对全世界的威胁。布什总统这一政策的形成并非

是这次对美国人民进行恐怖袭击造成的后果，进行袭击的狂热组织的成员们过去曾为前几届美国政府效劳过。我相信，这一政策的制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说明他们存心要在冷战已不存在的时候而且是在9月11日事件发生之前就准备要重新武装和花费大量金钱扩充军备的。2001年9月11日的不幸事件成了他们实施这一计划最理想的借口。

这年的9月20日，布什总统在华盛顿向由于9天前发生的袭击事件而情绪激动的国会公开阐明了这一思想。他使用了奇怪的措辞，大谈“无限正当”，以此为由来进行一场似乎也是无限的战争：“国家不应期望这是一次战斗，而是一次持久的战役，一次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战役。”“我们要使用一切必要的战争武器。”“任何国家，无论在什么地方，现在都必须做出决定：要么同我们在一起，要么同恐怖主义在一起。”“我已要求军队进入戒备状态，做此决定的理由是：采取行动的时刻即将来临。”“这是一场捍卫文明的斗争。”“我们时代的成果和各个时期的希望都取决于我们。”“我们不知道这场冲突将如何发展，但我们知道它的结局将是什么……而且我们知道上帝不是中立的。”

这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个失去了控制力的狂热分子在说话？两天后，即9月22日，古巴揭露这篇演说是一个仰仗暴力、无法无天、无视任何国际准则的世界军事独裁者的思想蓝图。

我跟你提到过，几个月后，在纪念西点军校成立200年之际，在2002年6月3日举行的958名士官生毕业典礼上，布什总统通过一篇对青年军官毕业生发表的激烈演讲进一步阐明了他的思想，他坚定的思想内涵是：“我们的国家安全要求我们做好准备，在必要保卫我们的生命时发起先发制人的进攻。”“我们应该在60个或更多的国家里找出恐怖主义的基层组织……”“我们将把你们，我们的士兵派到需要你们的地方去。”“我们决不能容忍美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听任一小撮恐怖分子和疯狂的暴虐者的摆布。我们要消除这种对我国和世界的阴暗威胁。”“有些人担心，直截了当使用好和坏这两个词汇有点不太外交，或不太礼貌。我不同意。我们面对的就是好与坏的冲突，美国一向把坏

的叫作坏的。面对坏的和流氓政权，我们不是制造问题，而是揭露问题。我们要领导全世界与问题做斗争。”

拉：不过这些声明的目的是以反恐战争的名义准备对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军事干涉。您为什么认为古巴也受到了威胁呢？

卡：您瞧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多么地富有挑衅性，2003年4月25日那天，即在劫持飞机、劫持雷格拉游艇和逮捕“不同政见者”之后，当时任国务院古巴局局长的凯文·瓦特克（Kevin Whitaker）先生对我们的驻华盛顿照管利益办事处主任说，隶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内安全办公室认为，这些接二连三在古巴发生的劫持事件构成了“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并要求古巴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避免这类事情发生。

明明是他们挑起并鼓动了这些劫持的嘛！明明是我们为了保护旅客的生命安全刚一获悉极右派这一反对古巴的罪恶计划便采取了这些坚决的防范措施嘛！由于他们走漏了风声，4月25日那次接触才引起了佛罗里达恐怖分子黑帮的大叫大嚷。在迈阿密，在华盛顿，今天正在讨论从哪里、以何种方式和何时攻打古巴或则解决古巴革命的问题。

紧接着，他们采取了经济措施加剧野蛮的封锁^①。如果说他们的方案是像攻打伊拉克那样攻打古巴的话，那我会因我国可能遭到生命涂炭和巨大破坏而痛心万分。但也许这将会是美国政府历次进攻的最后一次，因为我告诉过您，斗争将长期持续下去，侵略者面对的不只是一支军队，而是千百支军队，这些军队会不断地增加，会让敌人付出高昂的代价，布什总统的冒险和荒诞会使美国人民的儿子们的伤亡远远超出他们的预计。

^① 2003年10月10日，古巴独立战士开始反抗西班牙斗争135周年之际，乔治·W. 布什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实施一系列新的反对古巴的措施：限止到古巴旅游、增加对在佛罗里达的反革命团体的援助以及成立一个和当时的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共同领导的总统委员会以推动“解放古巴”。

拉：美国政府发表了一些声明，指控古巴准备制造生物武器。你们怎么回答？

卡：这些指控是多么无耻、多么令人作呕，因为正是我们亲身体用了他们用病毒和细菌破坏我们的农业乃至伤害我们的人民。对此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没有夸大其词，我要是对您说了半句谎话，我就是个无耻之徒。谈到这方面的某些问题时，我们是了解一些情况的，而且对几乎所有这些情况都掌握了全部证据。

我国没有核武器，没有化学武器，显然也没有生物武器。我国拥有的几万名科学工作者和医生受到的教育思想是拯救生命。让一名科学家或医生去生产能够致人死命的药物、细菌或病毒，这与他们的理念绝对是水火不相容的。

事实上，关于揭发古巴在研制生物武器的传闻不绝于耳。在我国进行科研是为了治疗一些像双球菌脑膜炎、肝炎那样的顽症，使用的办法是运用遗传工程技术生产疫苗，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分子免疫法——请原谅我使用了这个术语——寻找疫苗或治疗处方，也就是说，运用直接打击恶性细胞的方法生产疫苗。有些疫苗可以预防，有些疫苗甚至可以治疗。我们正在这些方面取得进展。这正是我们的医生和科研部门的骄傲。

我跟您进过，有几万名古巴医生在那些最僻远和最不安全的地区提供国际主义服务。有一天我说过，我们不可能也决不会对任何“世界上的阴暗角落”发动先发制人和出其不意的进攻，但我国能够把医生派到需要他们的“世界上最阴暗的角落”去。不过是医生不是炸弹，是医生而不是百发百中的智能武器，况且说到底，违背良心的杀人武器绝对不能称之为智能武器。

拉：您是否认为布什执政的美国可能演变成一个横行霸道的政权？

卡：人类约在六七十年前遭受过法西斯主义的惨痛经历。希特勒利用了一个密不可分的盟友——这您知道——就是能够吓倒对手的恐惧。他在拥有了一支可怕的军队时便发动了一场战火燃遍全球的战争。那个时期欧

洲最强大的国家的领导人因为缺乏远见和胆小如鼠酿成了一场惨剧。

我不相信美国会建立一个法西斯式的政权。在他们的政治制度内曾犯过严重的错误和做过许多不正当的事——其中许多事情还在继续，但是美国人民拥有一定的机制、传统、教育、文化和政治价值，使得美国几乎不可能建立起法西斯政权。危险在于国际方面。由于美国总统拥有的职权和特权是如此之大，国家掌握了一个如此庞大的军事、经济和技术的实力网络，实际上使全世界受到了威胁，这种情况是完全违背美国人民的意志的。

拉：您担心有人暗杀您吗？

卡：有个臭名昭著的人名字叫林肯（Lincoln），姓狄亚斯·巴拉特（Diaz-Balart），他是布什总统的密友和顾问，他于2003年在迈阿密一家电视台上发表演说提到我时说了这么一句哑谜式的话：“我不能谈得很具体，但我们正在设法打破这个怪圈。”

他指的是哪一种“打破怪圈”的方法？是像大选前布什先生在迈阿密向他们承诺的那样，使用他们发展的现代化的尖端技术在肉体上消灭我吗^①？如果是这个，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相信他们还会来进行暗杀。众所周知，他们想暗杀查韦斯。他们还以为杀害了我，问题就解决了。我为之终生奋斗的理想是不会死亡的，将长期存活下去。防范措施嘛是加强了。我在这里和您谈话……嗯，我们是采取了措施的，可是我到哪里都同大家打成一片。

至于说到对我国发动侵略，你再也不可能像1959年、1961年或在“十月危机”之时或之后那样打那个仗了。在战斗还是师对师的时候，我们始终清楚记得，我们运用的观念是“全民战争”，因为按照陈旧的学说或观念，你有6个师，美国可以有100个师。在这种经典式的对抗中，人民只作壁上观，就像我们今天通过CNN观看战争那样，人民并不参加战争。谁拥有更多的师，谁就占上风。你若用学院式的战术来保卫国家，你就输定了。

① 2000年8月25日在迈阿密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演说。

这是我们十分明白的一件事，我跟您议论过。这些想法我们反复考虑过。因为我们早在“十月危机”之后就懂得，我们在面临入侵时，只能孤军奋战，外面不可能送来一颗子弹。这是事实，我们早就懂得了这一点，只有全国组织起来，发动“全民战争”，因为事实证明过：一个战斗的人民是谁都征服不了的……

拉：您指的是越南吧？

卡：嗯，还有其他一些十分显而易见的例子，比如西撒哈拉就是这种情况：他们生活在沙漠深处，那里连树林都没有。可是没有谁打败过撒哈拉人。

拉：今天，车臣的情况也是这样。

卡：是的，我们在车臣也看到了另一事实。你可以赞成或不赞成他们的做法、他们的行为，但是，比如像俄军这样强大和训练有素的军队都没能打败车臣人民。那场战争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当人们准备斗争到底的时候，任何地方的战争都可以持续下去。车臣人民证明了，一个为求生存而战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现在您看看伊拉克的抗争吧。

您再看看科索沃的情况。塞尔维亚人在抗战中表现十分出色，战争结束时它的实力基本上原封未动。

拉：你们分析过这些最近的战争吧？

卡：我们都一一研究过，而且研究得很仔细。从越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中间有海湾战争、波斯尼亚、科索沃、车臣和阿富汗战争。

拉：在这最后的几十场战争中，人们抵抗的是占领——如在巴勒斯坦、车臣、阿富汗、伊拉克，他们经常使用的也是相当招人指责的方法，是恐怖行动。你们也会使用这种方法吗？

卡：不会。我跟您说过，我再次向您重申，我们没有放弃作为战士有

过的这些观念,但我说过,我们绝不会使用牺牲无辜生命的方法。在与敌方、与士兵、与军人的斗争中,我们将继续奉行我们的一贯政策,而绝不会去与侵略者派出国家的公民为敌,我们基本上只同作战人员斗争。

对了,有一种武器我们从不放弃,这是我们唯一拥有的武器,那就是人民,我们决不会放弃全民战争。

相反,我跟您说过,我再说一遍,我们决不会发疯或愚蠢到制造生物武器。我们教给人们的是制造疫苗和与死亡疾病做斗争。我们用道德观教育科学家,我决不会对他们说:“喂,你们去制造天花吧”或类似的东西。而且,何必呢?这种东西敌人比你多出一百倍。

我们也不会去制造化学武器。你如何运载化学武器?你用它来反对谁呀?反对美国人民吗?不!这是不公道的,是荒谬的。你去制造核武器吗?那你是自我毁灭。核武器在某个时候是用来自杀的好武器,好极了!“先生们,时候到了,让我们一起同归于尽吧,这个核武器好使得很哩!”生产核武器来毁灭自己的国家吗?对付一个国家至少应该拥有三万枚核弹,我说的还不是战略武器,而是战术武器、核武器。美国甚至有了用手提箱装的核弹,因为在冷战时期,苏联人也好,美国人也好,都制造出了手提箱式的核武器,用来搞破坏……没有什么野蛮的东西发明不出来的。

拉:是指便携式原子弹吗?

卡:是的。怎么样?您去制造它三颗?那您是去自我毁灭,您是去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一度没有签署……

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卡:不过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放弃某种权利,我们从没有也决不会制造核武器,但是我们说过:“喂,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有的人保留了拥有核武器的权力呀?”现在我们甚至已忘记这件事了。

拉：你们签署了这个条约？

卡：是的，我们签署了。这是明确表示我们保证切实履行保障世界和平的裁军进程，我们希望最终能够具体实现彻底销毁——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所有的核武器。我们也签署并批准了 12 个有关联合国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协定。我们也已决定批准我们在 1995 年签署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禁止核武器条约，俗称“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拉：但是你们还没有签署禁止使用杀伤人的地雷条约。

卡：没有，地雷条约没有签。我们曾用地雷和步枪打过仗，他们有的是飞机、大炮、坦克，什么都有。我们使用过的地雷是反坦克的，或是用来阻挡敌人前进的，都是电动控制的，不是自动的。

拉：可是地雷会杀死平民百姓……

卡：我不记得我们的地雷曾伤害过一个平民。我们使用地雷是为了打击运动中的军队。

拉：我们希望你们不再需要使用地雷了。不管怎么说，万一发生入侵古巴的事，我猜想，你们会得到全世界千千万万动员起来的人民的声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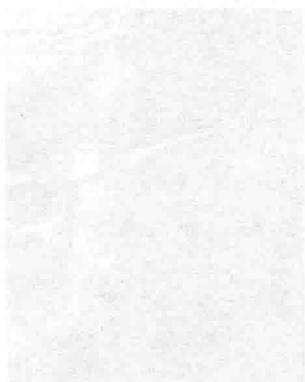
卡：在许多国家里古巴革命拥有众多朋友，得到了广泛的同情，他们在布什总统发出威胁后便向我们表示了声援。然而，我们很想知道，最近那些从所谓的左派和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我国人民为了合法自卫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合法措施进行攻击的人中间，有多少人曾读过那些威胁我们的言论，从而拿出点良心来揭发和谴责布什先生在发表的演说中宣告的反对古巴的政策……

然而，没有人会为我们去作战。只有我们自己，依靠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和发达国家千千万万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的支援——他们已看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灾难也会降临到自己人民的头上，通过传播思想、提高觉悟、动员全世界和美国本国人民的舆论，我们将能够抵抗侵略。



我
的
一
生

第二十六章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



雄辩与演说—爱与恨—关于背叛—革命成就—历史的审判—头号反对派—一党制—腐败—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工资—社会主义是不可改变的选择吗？—接班

拉：您以一个超群的政治演说家著称，但是我发现，您那些基本上属于即兴发挥的演讲往往雄辩有力，而那些念稿子的演讲则稍有逊色，两者之间有差别。您是怎样准备演讲的？

卡：对于我自己的演讲稿，我有时连审阅一遍的时间都没有。我告诉您，口语和书面语是不同的。在口头表达时，人的声调和语调能起作用，而当你照着稿子念的时候，自己会觉得无用的重复话太多。正确的方式应该是以说话的方式演讲，这样你可以强调重点。书面稿子里的重复是多余的，让人反感。我常常重读自己的即兴演讲稿，进行一些修改。有时我发现某句话本来可以表述得更好。

拉：您的演讲稿都是您自己写呢，还是有几个助手帮您准备？

卡：一般来说，当我要求别人替我写一个演说稿，或者至少帮我准备一个草稿时，这样的稿子往往都一塌糊涂，完全不能用，资料缺乏说服力。我不得不全部重写。我与美国总统们的几个助手交谈过，他们曾给总统写过成百篇演说稿，但这一点对我来说至今是神秘的。我从来没办法发表不是由我自己准备或由我自己写成的演讲。法国总统是怎么做的？

拉：每个总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都有一个顾问或助手班子替他们写演讲稿。一些人找资料，另一些人形成文字，再有一些人进行加工。然后，总统过目并加上一些个人色彩，比如一句话，一个词等等。他们差不多都是这么做的。

卡：听说雷吉斯·德布雷曾为弗朗索瓦·密特朗起草演讲稿，真有其事吗？

拉：是的。特别是为他起草过 1981 年坎昆会议的稿子，那是一份支持第三世界的号召。

卡：但那是密特朗的思想还是德布雷的思想？

拉：我猜是德布雷的思想。

卡：嗨！

拉：换个话题吧。您不仅在古巴而且在许多国家都是一个非常受尊敬、受爱戴的人。在 2003 年 5 月底您去阿根廷访问时，就能看出来。

卡：让我说，仅限于古巴。

拉：从阿根廷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一点，我本人 2003 年 1 月在厄瓜多尔也目睹了人民对您的热爱。但是，您也是一个遭到许多对手和敌人仇恨的人，他们斥责您是一个“残酷的独裁者”。您是怎样容忍爱与恨这种双重性的呢？

卡：您看，我从未留心想过这一点。我的心情是绝对、完全、彻底平静的。关于仇恨我解释不太清楚。我想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出于沮丧的心情吧。因为他们的攻击失败了，或者因为看到一个小国竟有能力抵抗那些企图毁灭我们的强大势力。但是，比如说，日本人没有理由仇恨我，我没有往广岛和长崎扔过一颗原子弹，也没有一个日本人因为我的缘故死于世界上任何地方，日本人并不仇恨我，他们应该更无所谓吧。

我们更能感觉到的针对古巴革命的仇恨主要来自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以及美国，这应该是由失望和疯狂的宣传造成的。我已经给您讲过一些例子。最近，甚至有人厚颜无耻地在一份文件里嫁祸于古巴，把古巴列为“对儿童进行性剥削，贩卖人口以换取收入的国家”。还有比这更让人恶心和愤怒的吗？

关于“独裁者”我也无法解释。什么叫独裁者？独裁者是超乎政治机

构、法律之上擅自单方面做出个人决定的人，是由着自己的怪癖和意志处理事务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指责教皇或者布什总统是独裁者。布什可以不与任何人商量就做出可怕的决定，甚至可以不与参议院、众议院乃至内阁商量就发动一场核战争。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比不上美国总统的权力大！任何一届美国总统都比我有更大的可能性下达命令，下达决定性的、导致可怕后果的命令。

您看，我并不做个人单方面的决定。古巴政府甚至不是一种总统制政府。我们有国务委员会，我作为领导人的职权是在一个集体圈子之内的。在我国，凡重大决定、根本性的决定，都由集体分析、讨论、决定。我们这里一直有一个领导班子，由一个班子领导。我不能任命部长、大使。我无权在这个国家里任命哪怕是最基层的官员。我确实有权威，这毫无疑问，我有影响力，那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我并不发号施令，我不通过法令进行管理。

至于残酷嘛……我真心认为，一个毕生为反对不公正、反对各种压迫而斗争，毕生为他人服务、为他人谋利益、推动团结、宣传团结的人，与残酷水火不容。

拉：也有很多人热爱古巴，为古巴辩护。

卡：是的，也有很多人热爱我们的国家，尤其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有谁比古巴更支持非洲？还有哪个国家曾像古巴那样为反对种族隔离法西斯主义、反对种族主义而浴血奋战，并援助他们一直将这场消灭种族隔离的斗争进行到底呢？面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缔造了一种国际主义文化。50 万以上的古巴人，或作为技术人员、或作为战士履行过国际主义义务。

有哪一个像古巴这样贫穷的国家派出过这么多的医生、教师，提供过这么多的义务合作？有哪一个小国拥有 1 万名拉丁美洲国家的青年在此免费学习医学呢？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炫耀，而是出于感情。

因此，这种仇恨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一种造成很深毒

害的人为播撒的毒药。如果他们把一个人描写成比撒旦还要坏的人，并罗列原因，人们就容易恨这个人。但我知道，这样的原因一条也不存在。难道能说在古巴有拷打人的现象？能说我命令过拷打一个人？谁能说这种话？

我们这里从未对任何持不同政见者或者抱有与革命不同的其他准则的人判过刑。我们的法庭根据法律判刑，判处那些反革命行为。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无论是在哪个时代，那些为外国强权服务、反对本国的行为一直被看成非常严重的行为。

有人认为在古巴如果信仰与革命信念不同，就会受到惩罚，这种想法是可笑的。我们这里只惩罚行为，不惩罚思想。这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具有与革命信念不同的信仰和观念，他们享有充分的保障和尊敬。

另一方面，我已经说过，我们遵循绝对尊重人的躯体完整的方针。尽管敌人污蔑我们，但在整个革命历史上从未有一例肉体虐待或刑讯。谁也无法举出一个关于刑讯、暗杀、“失踪者”的例子，而这类事在整个拉丁美洲是司空见惯的。

此外，我们这里从未有过一次紧急状态或宵禁，从未有过一次被治安力量驱散的游行，四十六年里从未有过任何一个警察殴打过一个示威中的公民，或者施放催泪瓦斯，或者放出军犬对付公民。而这些事在拉丁美洲许多地方、在美国每天都有发生。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民支持革命，保卫革命，因为全体人民都是革命的捍卫者。

拉：尽管如此，那些批评革命的人将一切过错归罪于您，他们谈论“卡斯特罗的古巴”。

卡：这些人总是攻击某个人，好像人民根本不存在，只存在一个领袖；好像无数斗争着的人们、捍卫过革命的人们，成千上万的医生、专业人员，那些种庄稼的、生产的、学习着的人们，都不存在。只存在一个叫作卡斯特罗的极坏的家伙，而他正思考着如何让人民更有文化。

在古巴，人的文化水平越高就越具有革命性，越尊重革命，因为多年来积累了大量事实，人们能看见一条始终如一的路线，人们珍视尊严和沉着的品质。我们经历了非常严峻的时刻，但没有犯过可以避免的错误。

如果古巴有一天爆发战争，那一定是被强加的。假如我们只面临投降或战争两种选择，我们将选择战争，因为我们对另一种选择连想都不想。

正如我已经说过，我们被加上了许多罪名。现在又说什么“卡斯特罗正在利用儿童”，但他们却不说我们在培养教师，在创造条件让小学每班20名学生，中学每班15名学生；他们不提我们在卫生保健方面所做的一切。这一切都是为了人，因为做这些事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天性的一部分。相反，他们无耻地把我们归入贩卖人口之列，或归入“从事商业性剥削以便筹集资金”之列……每一个听了此话而又习惯于接受、相信此话的人，都可能想：“瞧，这是什么样的强盗啊！这个人多虚伪啊！”是有很多污蔑，但这些污蔑会在事实面前逐渐不攻自破。

我知道这会造成中伤，但是我们还是在经历了很多困难关头后又闯过了难关。我们上一层台阶又下一层台阶，但在赢得国际上的尊敬和重视方面，我们上了两层台阶。

您无法想象多少人要我签字、留下手迹。当我与那些来访的美国人相聚交谈时，我们很严肃地涉及许多话题、问题；我几乎无法说话。有时有50人之多，他们送我一束鲜花或什么东西，我忙着在书籍、名片或物品上签字，我不得不接受那么多的照相、那么多让我眼花缭乱的闪光灯，真令人难以置信。那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奇怪的、不真实的人物。

拉：一个明星。

卡：是的，我成了人们要抓紧机会利用、哪怕为了能向家人说——人们喜欢这样：“看，我和那个人物照了一张相片。”

有人认为我们不是我们自身。然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什么，只

有我们自己能够评价自己。如果我说我对自己很严厉、很具有自我批评精神，您可以相信我。如果我哪次说了一个多余的词，或者无意中说了什么可能使人觉得虚荣的话，请相信，我对自己绝不客气，非常不客气。一个人必须对自己保持高度警惕。我喜欢事实，对荣誉不感兴趣。

这么多年来，我自己是个证人。影响力、权力并没有逐渐把我变成一个自负的人、虚荣的人，或其他一切类似的什么；相反，我觉得自己一天天更不虚荣，更不浮夸，更不自满。这是一种与人的本能的战斗。我想，只是因为教育，因为真诚、顽强的自我教育，低等的动物才变成了人。

我看到了一种常见现象：人在有了一点权力以后，就开始狂妄，并想利用权力；有时候，权力像毒品。人是懂得这些的，因而必须与之斗争。人们也知道，随着岁月的流逝，热情有增无减，精力有增无减，这是可能的。而精力来自信念。

您的问题是什么来着？（荣誉）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我发誓我没有想这些，我从未意志消沉过，我相信人，我不知什么叫忘恩负义。人们往往不喜欢承认自己欠别人情，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在这个世界上战斗了那么多年，经历使我们懂得了这一点。人有这种骄傲的感情也是自然的，但人往往不喜欢承认这一点，这是件困难的事。

但我要说第三次，我从未想过这个。

拉：我想问您一个同类的问题。您有一些紧密围绕在您周围的朋友和支持者，但也有一批同伴背叛了您。背叛对您的感情有什么影响？

卡：这个吗，我要告诉您，背叛的例子很少，很少很少。有一次，有一个给我们带路的向导背叛了我们^①。他们抓住了他，他落到了巴蒂斯塔军队的手中，他看到了差别，一边是我们这支衣衫褴褛的小部队，一边是

^① 这里指的是农民向导欧蒂米奥·格拉（Eutimio Guerra）在1957年一二月间马埃斯特腊山山区战争开始几个星期后的所作所为。人们发现了他的叛变行为，他承认了叛变事实，并被处决（参阅第十章注释3）（古巴编者注）。

他们装备精良、势力强大的武装，他们向他许诺，给他金钱。这是一次重要的背叛，当然不是我们漫长斗争生涯中唯一的一次。

有没有过政治背叛？有过，比如，我试着回忆一些最重要的吧……

拉：比如，卡洛斯·弗朗基（Carlos Franqui）^①、乌韦尔特·马托斯（Hubert Matos）^②、曼努埃尔·乌鲁蒂亚（Manuel Urrutia）等人的背叛。

卡：卡洛斯·弗朗基不是我的朋友。我真正认识卡洛斯·弗朗基是在马埃斯特腊山上。他是在1958年4月罢工失败后由平原地区组织派往山区的，那次失败是由“七二六运动”策略错误造成的，前面我已经说过此事。在那次惨重失败之后，他们把他派到了马埃斯特腊山上。弗朗基出版一份由平原组织创刊的小报，他曾是共产党员，我们“七二六运动”的领导层曾在某个时期招纳前共产党员，而没有什么比变节者更糟的了，我坚信这一点。

当时一些这样的前共产党员比任何人都更恨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他们犯过很多错误，但他们为劳动者奋斗过。他们开展的斗争谋求的是经济目标，不能对他们要求太高，因为那是冷战时代、麦卡锡时代。当时身为共产党员意味着灾难，尽管如此，在古巴有十万以上注册的、为人所知的、诚实的共产党员。当时的困难是另一种性质的，即宗

① 卡洛斯·弗朗基（Carlos Franqui，1921—），作家兼记者。1956年创办了地下报纸《革命报》。1958年加入马埃斯特腊山起义军，在其中领导“起义电台”的工作。1968年流亡意大利。著有《1952年至1958年古巴革命日记》（*Diario de la revolución cubana 1952—1958*，1976）、《与菲德尔密切相处的岁月》（*Retrato en familia con Fidel*，1981）等书。

② 乌韦尔特·马托斯（Hubert Matos，1918—），游击队司令，曾参加过马埃斯特腊山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曾在“第三起义阵线”中任“安东尼奥·吉特拉斯”（Antonio Guiteras）第九纵队队长。1959年10月担任卡马圭（Camaguey）军区领导期间，开始组织对“共产主义路线”不满的阴谋活动，根据他的说法，革命正在被“共产主义路线”控制。卡米洛·西恩富戈斯（Camilo Cienfuegos）亲自前往卡马圭逮捕他，并挫败了这次叛乱活动。对马托斯进行了审判并判处其20年监禁。马托斯1979年流亡迈阿密，是“独立民主古巴”（CID）组织的领导人。著有自传《黑暗是如何来临的》（*Cómo llegó la noche*；2003）。

派主义、由宗派主义产生的某种意义上的机会主义。有些人的理论是：让这些“七二六运动”的小资产阶级互相打架。在战争时代结束之后，轮到我们来领导了。

在革命初期，我们是怎样与一些染上疯狂反共情绪的人进行斗争的呢？那种反共情绪使一些人退出革命，使一些真正的思想上的小资产阶级找到了借口，因为他们中了毒。当时古巴群众还没有觉悟，社会主义文化还没有出现。后来通过法律、宣传、榜样的力量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与我们共同战斗中的人中90%不是共产主义者，不属于共产党。我们的战士和领导中没有多少共产党员，共产党不派他们来，像切·格瓦拉和我这些共产党员都是通过我们自己的途径加入组织的。当然共产党派来的一些人也是非常优秀和顽强的。“七二六运动”拥有90%的领导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背叛革命。这90%的人一直跟着干革命，与革命生死与共。

所以我说，我个人只经历过极少数人的背叛。乌韦尔特·马托斯是战争后期才加入进来的。他的背叛一点也不使我感到难过。过去我就认识他，接触不多就能嗅出他身上的亲资本主义味道、那种可怕的虚荣心。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在战争后期，在最后一次进攻中，我们失去了许多干部，因此他有机会在进攻中领导一个分队，因为他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而我们当时也必须加强自己的力量。最后，出于形势所迫，必须交给他一个几十个人的、装备良好的纵队，但当时他已经表现出了那种高傲和野心。我几乎是不得已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交给了他那个纵队的。也就是说，他不是攻打蒙卡达兵营时期，也不是在“格拉玛号”登陆时期加入的斗争。所有在蒙卡达时期、在“格拉玛号”时期参加进来的人都是团结一心的，比如切·格瓦拉、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劳尔·卡斯特罗、胡安·阿尔梅达（Juan Almeida）等一大批人。但是乌韦尔特·马托斯不属于那一代老革命。

曼努埃尔·乌鲁蒂亚不是叛徒。乌鲁蒂亚是个好法官，而我们呢，为了证明我们不是为职位和野心进行斗争的，就推荐他当总统，当时

还正要在“七二六运动”和前政府势力间达成一项未经商量的协定。他不是叛徒，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一个平庸的人，可能这后一种提法更合适。

拉：那么拉斐尔·德尔皮诺（Rafael del Pino）将军^①呢？

卡：他的确是叛徒，他在吉隆滩战斗中有出色的表现，他曾是一个优秀的战士，人们没想到他会……但我并不是因为他的可被称之为重大背叛的行为而难过，他加入了那些人的行列，那些人对他在吉隆滩的战友的死亡负有责任。我像了解所有人那样了解他，我尊重那些在一定阶段值得受尊重的人，尊重英雄。我已经向您解释过阿纳尔多·奥乔亚的例子，那个军官栽在了一桩腐败案上。

您看，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例真正的革命者的背叛。如果有人对我说：切·格瓦拉背叛了，您能想象出这种可怕的事吗！或者说，劳尔背叛了，胡安·阿尔梅达背叛了，拉米罗·巴尔德斯背叛了，吉列尔莫·加西亚背叛了，这可能吗！所有这些革命时代的司令们，整个极其宝贵的一代人，那些活到了今天的革命者，那些在蒙卡达、“格拉玛号”、马埃斯特腊山时代战斗过的人，那些在决定性时刻毫不畏缩的人，他们可能叛变吗？

还有一大批新一代优秀人物，许多这样优秀的年轻人。比如费利佩·佩雷斯·罗克。革命成功的时候，费利佩等许多人还没有出生。无数英雄抛洒的鲜血孕育出一大批新生力量。

现在还有一些在战争中、在军事行动中表现优秀的军官，我们没有听说他们中有一例真正的背叛。奥乔亚是一个很丢人的例子，他的问题主要是腐败、堕落，他是一个没有多少知识、文化水平不太高的同志。作为一个战士，他很勇敢，也有很多功劳。我不否认他的任何优秀之处，我们为

^① 拉斐尔·德尔皮诺（Rafael del Pino，1938—），飞行员，少将。在1961年的吉隆滩战役中表现出色。1987年5月出逃美国。发表过数本自传体著作，如：《吉隆滩的黎明》（*Amanecer en Girón*，1982）、《驶向自由》（*Proa a la libertad*，1990）。

他所造成的伤害难过。拉莫内特，要注意的是，敌人从最小的事件里拼命榨取。

您再看看今天那几位在美国被关押的年轻人，那5位英雄，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那才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拉：你们好几次判处了职位很高的领导人。最近又判处了卡洛斯·阿尔达纳（Carlos Aldana）、罗伯托·罗瓦伊纳（Roberto Robaina）……

卡：他们没有被判刑。他们有一些严重的失误，但是没有对他们判刑；倒是敌人利用这一点搞了很多宣传，利用此事达到政治目的。我们只是对他们两人的错误感到遗憾。他们造成的损失伤及了他们自己。

拉：他们只是被撤职了吗？

卡：他们没有背叛的行为，而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拉：是品行问题、道德问题？

卡：可以说是野心问题，他们逐步创造条件谋求权力，头脑有点发昏。

拉：几年以来，特别是当您在一些国际会议上讲话时，人们看见您穿西装、打领带，但是在古巴您从来是穿军装。您为什么这么喜欢穿橄榄绿军装呢？

卡：首先是个实用的问题，因为穿军装我不用整天考虑打领带……省掉了考虑穿什么服装，穿什么衬衫、什么袜子相配的问题。我只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穿文装，比如参加某个国际会议、教皇来访，或者与某个国家元首会面。当然这类礼节在古巴已经逐渐简化。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穿文装，是1994年参加在美洲的卡塔赫纳（Cartagena de Indias）召开的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当时哥伦比亚东道主希望所有与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穿瓜亚贝拉薄布短衫（guayabera）。从那次开始，就像您说的，我在另一些国际

会议上也穿过文装，在古巴国内有些特殊场合，我也穿过文装。

但是这种我从马埃斯特腊山就一直穿的军装是我的日常服装，我已经习惯它了，穿着它，我感觉非常舒服。这身服装不复杂，非常简朴，和战争年代穿的那种军装很相像，只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仅此而已。我还有一身在某些接待场合穿的军装，有领子，要打领带，稍微正式一些。总的来说，我还是穿这身觉得最舒服。

拉：您是一个非常能抽烟的人，在一段时间里，在革命初期，您的形象总是抽着一支醒目的哈瓦那雪茄。您后悔抽这么多的烟吗？

卡：我抽的第一支雪茄是我的父亲递给我的，那是在比兰（Birán）。当时我大概有十四五岁吧。我记得我抽了第一支雪茄，但没学会怎么抽。幸好我没吞下很多烟，我没往里吸。当然了，即使再不往里吸，总还是要吸进一些尼古丁的。

是的，您说得有道理，我这一生抽烟太多了。直到二十多年前的一天，我决定戒烟，谁也没有强迫我。我自己强制自己戒了烟。我觉得放弃这个习惯是对人民健康有好处的一种必要牺牲。听到那么多必须与肥胖、不运动和抽烟习惯做斗争的说法，我终于相信，为古巴大众健康应该做的最后一个牺牲是戒烟。我用榜样的力量宣传。我戒了烟，也再没破过戒。

拉：当您在79岁之际回顾一生时，您还对没能做什么事情感到遗憾吗？

卡：没能更早发现我们现在知道的东西。我们本可以用一半的时间做出比四十六年里已经做到的更多的事情。

拉：您又对做了什么事感到遗憾呢？

卡：让我来想一想我会为什么事情感到遗憾，感到后悔。

我犯过很多错误，但没有一个是战略性错误，只是策略性的。我会为很多事情感到遗憾，甚至会因为某次演讲中的不足……但是我对我们在古巴完成的事业、对我们组织社会的方式没有一丝后悔。

拉：比如说，您对同意华沙条约组织的坦克在1968年8月进入布拉格^①感到遗憾吗？这一做法曾使古巴革命的崇拜者们十分惊异。

卡：让我来解释一下。当时我们认为——历史的发展证明我们是有道理的——捷克斯洛伐克正出现一种反革命形势，它正走向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怀抱。我们当时反对在该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里发生的一切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反对可能日益强化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那种唯利是图关系的一系列措施：盈利、好处、利润、物质刺激，反对所有这些鼓励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因素。所以我们接受了向捷克斯洛伐克派兵的苦涩现实，没有谴责做出这项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过，同时我们要求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做到始终如一，保证当世界其他地区某个社会主义政权受到威胁时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的首要问题是不容置疑的，即完善社会主义。对政府工作方式方法、官僚主义政治及脱离群众现象的谴责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正确的口号却导致了一种明显的反革命政治。所以，我们不得不同意那次军事干涉，尽管那是令人难过和痛苦的。对于我们来说，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力量以抵抗帝国主义在当时是生死攸关的首要问题。

拉：还有一个例子：“为生产1000万吨糖的大会战。”^②您今天认为那是一场重要的经济战役呢，还是后悔在1970年迫使国家做出那样巨大的努力？

卡：那场战役是一次壮举。我们在某些部门达到了做梦都不敢想的指标，在另一些领域实现了三分之二、四分之三或百分之五十的目标。所有这些战役都是为了推动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不否认曾有过错误，但绝不是原则性错误。

^① 参阅菲德尔·卡斯特罗于1968年8月23日发表的演说：《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分析》（*Análisis de los acontecimientos de Checoslovaquia*）。

^② 1970年制定了蔗糖生产达到1000万吨高产指标。这一指标没有实现。

拉：最近你们决定减少用于甘蔗种植的土地面积，并关闭了许多榨糖厂。这使得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工作……这样做是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卡：蔗糖工业曾稳定地达到 800 万吨的产量，而今天勉强达到 150 万吨。我们不得不坚决停止开垦土地和种植甘蔗，因为燃料的价格曾达到了每桶 40 美元，这带来了国家的崩溃，尤其是加上越来越频繁的飓风、越来越拖长的干旱等因素。甘蔗田的地力，在过去那种人工照管、人工收割、不使用重型机械的时代，可以延续至十五年以上，现在只有四五年。与此同时，蔗糖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曾降到了 7 美分。有一天，我向一个蔗糖商业公司问了一个关于蔗糖价格的问题，又问了一个关于生产成本的问题。他们竟不知道我们的糖厂一共生产多少蔗糖！当问到每吨蔗糖合多少外汇成本时，竟没有一个人能答得上来。他们直到一个半月后才给了我答复。您看问题多严重。

问题非常简单，必须关闭糖厂，否则我们就要跌入巴特莱特海沟（la fosa de Bartlett）^①。古巴有很多经济学家，很多很多，我不想批评他们，但是，就像我直率地谈到革命的错误一样，我要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发现在苏联倒台后不久、在石油每桶 40 美元而糖价一落千丈的当时，维持蔗糖生产完全是灾难性的？为什么没有使蔗糖工业合理化？为什么这一年还坚持种植了 2 万卡瓦耶里亚，即近 27 万公顷的甘蔗？为此，当时必须用拖拉机和重型犁来开垦土地，种上过后还要用机械除草、要施肥、要使用昂贵除草剂等等。

看来，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当时干脆必须下一道指示，几乎是一道命令来中止开垦土地。情况就好像你听说“国家正在受到入侵”，而你不能说“等一等，我要与几百个人开 30 次会来研究该做什么”。就好比在吉隆滩，当那个帝国轰炸我们的空军基地并派它的雇佣军从那里进攻时，我们却说：“我们开个会，讨论三天，看用什么办法来对付入侵者。”我向您保证，革命在它漫长的历史上一直是一

^① 古巴东南部海底凹陷，深达 7535 米，系世界最深的海底凹陷之一。

场真正的战争，敌人时刻在窥伺，时刻准备打击，我们给它多少次机会，它就会多少次伸出拳头。

我确实给部长打了电话，并对他说：“请告诉我，你开垦了多少公顷土地？”他回答：“8万。”我对他说：“1公顷也不要再开垦了。”通常这不是我的角色，但是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你不能眼看着国家倾覆。

拉：你们关闭了多少家糖厂？

卡：70家效益相对差的糖厂停止开工。在这些糖厂里，按可兑换外汇计算的成成本超过了销售蔗糖带来的收入。关闭了这些按可兑换外汇计算成成本高于外汇收入的糖厂之后，我们用节约下来的一部分外汇，维持了到那时工资一直在下降的这些糖厂工人的生活。这是我们这样的社会拥有的可能性。不过，最近我们采取了更勇敢的决定，也就是把学习变成一种就业方式，来为这些工厂的许多劳动者谋利益。在裁员的同时，今天有将近4万工人把学习当成了就业。

有10万多17—30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过去不学习，也没有工作。今天他们积极听课，温习旧知识，学习新知识，并因此拿到报酬。我们这个被封锁的国家实际上已经做到了充分就业，也就是人们测定的低于2%的失业率。我们离充分就业已经很近，或者说我们很快就可以实现这一点。

除此之外，没有受到蔗糖业整顿影响的7万蔗糖业工人，也有机会在每天劳动结束后进行学习。这么多的糖业工人业余参加学习而不是以此为职业，这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们都是产业劳动者，或从事工业，或从事农业。

您问我有什么遗憾的事。我的憾事之一是没能更多地学习。在我学习法律、社会科学和外交法这三门互相关联的专业的这个时代，我很想再深入其他学科，并且已经准备这样做。特别是想学习经济学。我是想说，我遗憾没能更多地学习。当然，如果我真的那么做，就会失去将要来临的革命机会，这个机会比我当时想象得要临近得多。

一个人会因为没能生活在一个教育条件更好的时代而难过，我确实为

没能有一位导师，因而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必须根据自己的经验拿主意，为做出许多决定而难过。我的家庭如您所知一直在农村，我生活在寄宿制学校里，这些都是让我难过而又不是我能改变的事情。但是，我不为这些事而遗憾。

拉：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顾当年，您曾估计到一切将会如此困难、将会遇到这么多障碍吗？

卡：我确实知道将很困难。当时我认为根本性的困难在于通过夺取政权来从事革命事业。首先要打倒巴蒂斯塔，但是打倒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了一切照旧，而是为了改变现状。当我走向蒙卡达之际，我的根本思想已经全部形成了，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策略和战略来实现这些思想。

如果我们在1953年7月26日成功的话，我们今天将不会在这里。那时世界力量的对比将使我们无法坚持。斯大林当时刚死，他死于1953年3月，而他身后出现的“三驾马车”不会给予古巴像赫鲁晓夫七年以后所给予的支持^①。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苏联的力量虽然未必与美国旗鼓相当，但却是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了。

拉：您认为出发攻打蒙卡达兵营时的梦想实现了吗？

卡：这正是我要说的，因为您提及了一些事情。我说了，当时必须解决另一类问题。执政是更困难的事情，我不是不知道这一点。1月8日当我到达哈瓦那、当一只鸽子停在我肩上^②时我说的就是这个话。在胜利的

^① 斯大林逝世于1953年3月5日，几个月之后由尼古拉·布尔加宁（Nikolai Bulganin）、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以及格奥尔吉·马林科夫（Georgii Malenkov）组成的三人执政委员会领导苏联。尼基塔·赫鲁晓夫于1956年担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并最终于1958年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1964年被撤职并被列昂尼德·勃涅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取代。

^② 1959年1月8日，菲德尔·卡斯特罗于革命成功后在哈瓦那进行了第一次公开演讲。他在哥伦比亚（Columbia）军营一个礼堂讲演。讲演过程中，一群白鸽飞到他的身边盘旋，其中一只落在他的肩上并停留了几分钟。这件事具有象征意义，这个场面震惊了在场观望这只鸽子的哈瓦那群众和通过电视聆听演讲的所有古巴人。

那天，我甚至有些感伤，1958年夏季当我们打败敌人的总攻、几乎赢得战争之际，我也曾有过一点类似的感觉。当时我感觉到我们已经学会做一些事了，但是当时的一切都很不一样。

1959年1月1日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说：“好吧，我们已经学会了这些，而今天我们面临着一项庞大得多的任务”，当我到达哈瓦那、了解了很多问题之后，我明白胜利之后的一切将要困难得多。

我们当时非常无知，虽然有很多非常好的想法，但非常缺少经验。我们学了别人的一些经验，有一些见解，假如没有这些见解，我们也不会提出引导我们走向胜利的战略……我活下来了，活下来并不意味着功劳，而意味着一种特殊地位，因为我不能否认因此而有经验，不能否认经验的积累带来的责任。

在革命成功四十六年后的今天，在攻打蒙卡达兵营五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可以说我们所做到的事情远远超出了当年的梦想，这也要归功于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好的幻想家。

拉：有一些代诉人罗列罪名反对古巴革命，不断把各种各样的罪责加在古巴身上。作为律师的您，以什么样的理由来为古巴革命说话、反击这些攻击呢？

卡：好，我要说得长些了，事先提醒您。我想重新提出在攻打蒙卡达兵营五十周年纪念日演讲中提到的一部分论据。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古巴的罪责？哪一个正直的人有理由攻击古巴？

古巴人民用自己的鲜血和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武器打败了美国安插的拥有8万军队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古巴成了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统治下第一块自由的领土，她是西半球唯一一个审判并以儆效尤判决了施刑者、凶手和战争罪犯的国家，在漫长的后殖民主义历史上，这些家伙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革命收回了土地并把土地完全交给了农民和农业工人。自然资源、工业和基本服务设施回到了它们唯一的真正的主人——古巴民族——手中。

在 72 小时之内，古巴夜以继日地战斗，粉碎了由美国的一届政府组织起来的雇佣军对吉隆滩的入侵，从而避免了美国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和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战争。革命政府当时已经拥有一支四十多万人的起义军和几十万民兵。1962 年，我们毫不退缩、正义凛然地顶住了可能受到几十枚核武器攻击的风险。我们打败了遍及全国的“肮脏战争”，付出了比解放战争还要多的生命为代价。我们在美国政府策划的几千起破坏活动和恐怖主义攻击之下坚不可摧，挫败了针对革命领导人的几百起暗杀计划。

在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严厉封锁和经济战争的环境中，古巴在一年的时间内根除了文盲，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在四十多年里没能做到这一点，连美国也没有做到——只有进行了玻利瓦尔革命的委内瑞拉是个例外。古巴对百分之百的儿童实现了义务教育。在整个西半球，古巴是完学率最高的国家——从学龄前到九年级实现了 99% 的入学率。古巴小学生的语言和数学知识居世界第一位，在人均拥有的教师数量和每间教室学生数量最少方面，古巴也居世界第一。所有患身体缺陷和弱智的儿童都在特殊学校学习。今天已经在全体儿童、青少年和青年中，在农村和城市里，开展计算机教育和使用强化视听教学手段。

由国家向 17—30 岁的青年提供经济报酬的学习机会，他们过去不学习也没有工作。这在世界上还是首次。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免费完成从学龄前到取得博士学位的学业。古巴今天所拥有的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专业艺术家是革命前的 30 倍。古巴公民的平均知识水平已经达到了九年级以上。在古巴已经不存在任何实际上的文盲。

培养艺术家和艺术指导的学校遍及全国，2 万多名青年在这些学校里学习，使自己的天才和爱好得到发展。另有几万名青年在各个艺术中心学习，这些中心向专业艺术学校源源不断输送人才。大学范围不断扩展，已经覆盖全国各个市镇。在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地方发生过如此规模庞大的教育和文化革命。遵循马蒂关于没有文化就不可能有自由的深刻信念，这一革命将在很大范围内把古巴变成一个世界上拥有最多知识和文化的国家。

古巴的婴儿死亡率从 60‰ 下降到 6‰—6.5‰ 之间^①。除加拿大之外，这是从美国到巴塔哥尼亚整个西半球最低的指数。人的平均寿命提高了 15 岁。脊髓灰质炎、疟疾、新生儿破伤风、白喉、麻疹、风疹、腮腺炎、百日咳、登革热一类感染性疾病和传染病已经根绝；破伤风、双球菌性脑膜炎、乙型肝炎、麻风病、血友病脑膜炎（la meningitis por hemófilos）、结核病等另一类疾病已经得到完全控制。今天，在古巴病死的人的病因与高度发达国家一样，即心血管病、肿瘤病、事故及其他。

我们进行着一场深刻的革命以便向居民提供医疗服务，方便他们就医，挽救生命，减轻痛苦。我们进行了深入研究以便终止遗传链，减缓或尽量减少由遗传、胚胎或分娩带来的问题。今天，古巴是人均拥有医生数量指数最高的国家，比紧随其后的那些国家几乎高一倍。

科研机构长期以来进行持续研究以便找出针对那些最严重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古巴人将享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制度，他们将继续以完全免费的方式接受医疗服务。社会保险覆盖全国百分之百的古巴公民。

85% 的古巴居民拥有不用上税的房产，其余 15% 的居民只需缴纳完全是象征性的——最近刚刚提高到占工资 10% 的房租。

我国吸毒者人数非常少，我们展开毫不留情的斗争打击毒品。从革命初期我们就禁止了彩票业和其他盈利性游戏，目的在于根绝人寄希望于侥幸的心理。

我们的电视、广播和报刊都不做商业性广告。任何一项宣传活动都是为了推动保健、教育、文化、生理教育、体育、良性娱乐、环境保护、反对毒品、减少事故或解决其他社会性问题。我们的大众传媒教育人，而不毒害人、使人异化。我们不崇拜也不吹捧那些腐朽社会消费的价值观。

在古巴不存在对任何在世革命人物的崇拜，不为他们建塑像、出标准像，不以他们的名字给街道、机构命名。领导我们国家的男人和妇女是人而不是神。

^① 2005 年，古巴新生婴儿中的婴儿死亡率在全国各个地区都低于 6‰。

在我们的国家里没有准军事力量和敢死队，我们不用暴力对付人民，也不执行法律审判之外的死刑，不搞刑讯。我们在本国人民和世界各民族中培养兄弟情义和团结之心。

我们向青年一代和全体人民进行保护环境的教育，大众传媒也致力于培养生态保护意识。我们的国家坚定地保卫本民族文化特征，同时吸收其他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坚决反对一切使人扭曲、异化和堕落的东西。我们发展健康的而不是职业性的体育事业，它引导我国人民在世界舞台上获得了最高水平的奖牌和荣誉。

为我国人民和全人类服务的科研事业迅速地更新发展。由科研发展带来的重要药品拯救了古巴和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命。我们从未将研究用于制造生物武器，我们的科学工作者所受到的和正在受到的培养、教育与此水火不相容。

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具有根深蒂固的国际主义同情心。我国曾援助阿尔及利亚爱国者进行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不惜为之付出损害与一个像法国这样重要的欧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当奉行扩张主义的摩洛哥哈桑二世国王企图霸占阿尔及利亚西南部廷杜夫（Tinduf）城附近的加拉耶比莱特（Gara Yebilet）铁矿时，我们送去了武器，派去了战士保卫阿尔及利亚。

1973—1975年，当戈兰高地被不公正地从叙利亚夺走之际，应这个阿拉伯国家的请求，我们有整整一个坦克旅的人员在戈兰高地前为他们设防。

在刚果共和国刚刚取得独立之后，受到外部围困的该国领袖帕特里西奥·卢蒙巴（Patricio Lumumba）接受了我们的政治支持。当他在1961年1月被殖民主义强权杀害之后，我们向他的后继者提供了援助。四年之后的1965年，古巴人民的鲜血洒在坦噶尼喀湖（Tanganyika）西边的土地上。在那里，切·格瓦拉与100多个古巴教官支援了为反对替蒙博托效力的白人雇佣军而斗争的刚果起义军。蒙博托属于西方阵营，人们不知道他盗窃的400亿美元存在了哪家欧洲银行，也不知道是在谁的账户之下。

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的战士们在阿米尔卡·卡布拉尔的统帅下，

为争取这两个葡萄牙老殖民地的独立而战，在训练和支援这些战士的过程中，古巴教官的鲜血洒在那片土地上。

我们在十年的时间里援助阿戈什蒂纽·内图领导下的人民解放运动（MPLA）进行争取安哥拉独立的斗争。当安哥拉取得独立之后，几十万古巴志愿兵又在十五年的时间里参加了保卫安哥拉、抵御南非种族主义军队进攻的斗争；南非种族主义军队与美国同谋，利用肮脏战争埋下了几百万地雷，将整座整座的村庄夷为平地，杀害了50多万包括儿童在内的安哥拉人。在安哥拉西南的奎托夸纳瓦莱和纳米比亚边境地区，安哥拉和纳米比亚战士及4万古巴士兵狠狠打击了南非军队；当时南非军队拥有以色列提供或帮助制造的核武器，对于这一点，美国政府是完全知情的同谋。这场战争带来了纳米比亚的迅速解放，使种族隔离主义政权的垮台也许提前了20年或25年。

在漫长的十五年里，古巴在支持英雄的越南人民反对美国发动的野蛮战争的斗争中保持着一个光荣的位置。这场战争夺去了200万越南人的生命，留下了许多战争伤残人员，使该国的土地布满至今仍给人带来不可估量伤害的化学物质。

古巴人与拉丁美洲数国人民共同抛洒鲜血，与流淌着古巴血液、拉丁美洲血液的切·格瓦拉共同抛洒鲜血；美国在玻利维亚的代理人下令杀害了负伤被俘的切·格瓦拉，他在战斗中中了一颗子弹，当时已经不能使用武器。

当美国以无耻的借口入侵格林纳达这个弹丸岛国时，古巴建筑工人在参加保卫格林纳达的战斗中洒下了鲜血。当时古巴工人为这个依赖于旅游业的岛国援建的、对该国经济至关重要的国际机场正要竣工。

勇敢的尼加拉瓜战士一边抗击美国组织和武装起来的反对桑地诺革命的肮脏战争，一边接受古巴军事教官的训练，在这片土地上，也留下了古巴人抛洒的鲜血。

我没有举出所有的例子。在支援兄弟民族争取独立的解放斗争中，为履行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而英勇献身的古巴战士超过了2000人之多。

在这些受援国家中，没有任何属于古巴的财产。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写下了为他人提供真诚无私援助的如此光辉的篇章。

古巴总是以身作则。古巴从未失职，从未出卖其他民族的事业，从未退让，从未背叛原则。2003年7月，古巴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上、在欢呼声中再次当选为三年一届的人权委员会成员，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古巴十五年以来一直是这个机构的成员。

曾有50多万古巴人作为战士、教师、技术人员、医生或保健人员履行过国际主义义务。四十多年来，数万名医务人员向数百万人提供了医疗服务或抢救了生命。目前，三千多名综合医科专家和其他医务工作者战斗在第三世界18个国家中最偏远的地区，通过预防和治疗，每年抢救几十万人的生命，使成百万人得以保持健康或恢复健康，而这些服务完全是免费提供的。

如果联合国在获得必要资金的情况下没有得到古巴医生的服务——没有他们，下撒哈拉非洲的许多国家乃至整个地区都将面临消失的风险，那些对付艾滋病的不容迟缓的紧急项目也是无法实施的。

古巴发展了用克里奥尔语言（creole）、葡萄牙语、法语、英语及西班牙语等五种语言编写的教材、通过广播来扫盲的教学技术，今天已经开始在某些国家进行这种授课。我们还完成了一项西班牙语的类似计划，通过电视达到了效果极佳的扫盲目的。这些都是古巴发明的、纯粹由古巴人完成的项目。我们对专利权并不感兴趣。我们准备向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免费提供这些技术，这些国家是文盲人数最多的国家。运用这些扫盲技术，能够在五年的时间内，以最低廉的成本将8亿文盲减少80%。

为了别太累，我先讲到这里，但我是可以这样讲下去的……

拉：您做了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总结。您认为历史将怎样评判您呢？

卡：这是不值得关心的事。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类犯了那么多错误，干了那么多荒唐事，如果能够活下去，这一点将会被证明。一百

年之后的人将把我们看成不值得回忆的、由野蛮人和前文明人类组成的部落。

也许，他们将回想起一个人类几近消失的历史阶段，一个发生了那么多可怕事情、仍然像未开化的野蛮人的历史阶段。大概这就是生活在 2100 年的未来人类看待我们的观点。他们看我们就像我们不久前看原始人一样，我相信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关键性的 21 世纪里的每一个十年，都将具有一千年的价值。

所以，谈论未来的历史评判没有什么意义。我就是这么想的，真心真意这么想的。我更关心我们的国家所进行的斗争、今天的战斗会给它带来什么样的威望，这一切并不一定与我个人有关。

我读过许多有关杰出人物谈论荣誉的文字。拿破仑讲荣誉，他总是在关心荣誉。好吧，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情况：在许多国家，人们提及拿破仑，几乎更多地是通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香槟酒、而不是通过他在战场上的所作所为。于是我对自已说：“为什么要关心这些呢？”

像玻利瓦尔这样的人也经常谈论荣誉。我一直很敬仰玻利瓦尔。我有一次在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演讲时这样说过：“玻利瓦尔谈论荣誉，但是玻利瓦尔不是一个征服其他民族的人，而是一个解放者。”亚历山大是一个征服其他民族的人，一个创造了帝国的人。还有一些人物在漫长的历史上一直受到世界的崇敬：阿尼拔、尤里乌斯·恺撒，所有这些人都是征服者和武士。

如果您分析一下，相对来说直到不久前，青年们才被告知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和剧作家，被告知另一些人创造了伟大的美术作品，还有一些人是优秀的哲学家，杰出的诗人，我想直到今天他们还没有被超越。总之，我们过去对做出了伟大精神贡献的人，创造了伟大音乐、绘画、戏剧、文学的人物了解得很少，我们所学习的历史勉强提及他们。那样的历史教育只提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只议论麦哲伦（Fernando de Magallanes）是否环绕了地球，还有拿破仑、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在温泉关（Termópilas，希腊中部山地关口）与列奥尼达（Leónidas，

斯巴达国王)打仗的波斯皇帝薛西斯(Jerjes)、尤里乌斯·恺撒、阿尼拔。他们都是武士,都是西方人,因为对东方的武士谁也不了解。

拉:或者说只提“坏人”,比如阿提拉(Atila)。

卡:哦,他是向西方进军的人。假如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当时有理,同时没有一块大陆横在中途,那他当时就到了中国。然后如果他愿意的话,就会企图用12匹马和几支火枪征服中国,我想他就是这样征服古巴的吧。他会与几十万蒙古骑兵相遇。那么人们所了解的哥伦布就将是一个运气不好的家伙,他怀着疯狂的想法抵达中国。如果他真的占领中国,15分钟之后就会完蛋。您想想,他要是像马可波罗,人们会接待他;他要是以天主教国王的名义,用十字架和刀剑占领中国,那他只能坚持15分钟,还有科尔特斯那些人,都一样。

但是历史一般不提另一些人物。不提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对人类做出那么多贡献的研究者……历史不议论他们,可以这么说,也许一些人会记得他们。然而,政治领导人做出贡献不是为了让人们记得自己。

拉:哪个政治领导人让您怀念呢?在所有您认识的人里,谁给您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卡:让我想一想。我从来都认为切·格瓦拉是我认识的最特殊的人物之一。他是我认识的一个最高贵、最无私的人。还有纳尔逊·曼德拉。曼德拉是我最敬佩的人物之一,他的功绩、他的历史和他所进行的斗争使我尊敬他。在当代外国领袖人物中,江泽民^①是我最欣赏的人物之一,因为我是通过一段长时间了解他的,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几年,通过接触和时间。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① 江泽民(1926—),中国政治领导人,曾为工业技术工程师,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江泽民1985年任上海市市长期间加快了这个城市的经济改革。1989年,江泽民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1993年,江泽民被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被看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的创造者。江泽民2003年3月卸任。当时江泽民被任命为具有影响力的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2004年9月他辞去了这一职务。

在当代西方世界，我可能举出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作为最有能力的国务活动家之一。我认识他，与他进行过很多交谈。他是一个有远见、思想水平很高的人，他关心和平，关心第三世界的问题。

说到西方，我很了解的另一个领导人是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我认为他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正直的、有能力的国务活动家。我对他很有好感，他的死亡，他在奇怪的情况下被暗杀，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拉：您没能直接认识肯尼迪总统吧？

卡：没有。我认为肯尼迪是一个很有热情、很聪明、有个人魅力的人，他试图干一些积极的事情。也许，他是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之后美国最优秀的人物之一。他犯过错误：1961年他为入侵吉隆滩开了绿灯，但那次行动不是他准备的，而是前一届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政府准备的。他不可能及时制止入侵。此外，他还容忍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在他执政期间，美国策划了针对我和另一些国家领导人的最早的暗杀计划。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个人参与了策划，但是确实也很难想象，中情局的某人能够不经总统同意，至少是默许，擅自做出决定实施这种性质的行动。也许他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或者他允许自己的含糊其辞被中情局以自己的方式解释。

但是，同时我看得很清楚，尽管肯尼迪犯了不少错误，其中一些是道德方面的错误，但他是个能够修正错误的人，是个有足够的勇气对美国政治做一些改变的人。越南战争是他的错误之一。出于他的热情，出于他对“绿色贝雷帽”的过分好感，以及他对美国实力的过高估计，肯尼迪迈出了最初的几步，把他的国家拖入了越南战争。

他犯了错误，但他是一个聪明人，有时表现得很优秀、勇敢。我几次说过这样的看法，如果肯尼迪能够活下来，古巴和美国的关系是有可能得

到改善的^①。因为吉隆滩战役和“十月危机”使他十分震惊。我不认为他会蔑视古巴人民，他甚至可能会对我国人民的坚定和勇气感到敬佩。

就在他被杀的那一天，我正在与法国记者让·达尼埃尔（Jean Daniel）^②交谈，肯尼迪通过他给我捎来口信，希望与我交谈。当时正在建立一种沟通，也许这种沟通本可以有利于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

他的死曾使我难过。当然，他是一个对手，但是我仍为他的消失感到遗憾，就好比失去了一个有优点的反对派。他被杀的方式也使我难过，胆怯的暗杀，政治罪行。我感到愤怒、厌恶和悲伤，当时这种感觉源自一个使我觉得不该有如此结局的对手。

他的被暗杀也给我带来了担忧，因为在他从舞台上消失前，他在国内有足够的权威要求美国改善同古巴的关系。我与那位法国记者让·达尼埃尔进行的谈话已使这种可能性浮出水面。他在谈话中向我转达了肯尼迪在度过了对他来说很可怕的“十月危机”阶段之后产生的重要思考和原话。就在我们听说肯尼迪死讯的当时，让·达尼埃尔正向我转达肯尼迪对他说的话：“您去与卡斯特罗谈，然后回来与我谈谈他是怎么想的”，几乎在让·达尼埃尔刚对我说完，就发生了暗杀。

拉：您认识毛泽东吗？

卡：不，我不认识毛泽东。我也不曾有幸认识胡志明，我把胡志明看成一个思想最纯粹的领导人。

毛泽东在历史上有很大功绩。他当然是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鼓动者，而中国革命是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他是一个政治天才和军事天才，他发起、推动、并成功进行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傀儡政府的斗争，所以，毫无疑问，他谱写了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

^① 2003年，肯尼迪与其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间的一次谈话录音内容被公开，谈话内容表明肯尼迪总统希望尝试接近古巴的途径，并同意就菲德尔·卡斯特的提议探讨与哈瓦那一位使者秘密会见的可能性。

^② 法国《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报社社长，当时重要的法国记者。

但同时，我也深信他在晚年犯了严重的政治性错误。不是右的错误，而是左的错误，更准确地说，是极左的思想。他用严厉的、不公正的方式方法把这些思想贯彻到实践中，比如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认为，作为一种极左政治的后果，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后来又产生了右倾。因为严重的错误往往制造出它的对立面：极左的错误到了一定时候会造成右倾和右的政策。

我不是说中国革命已经垮台。这个国家正在寻找一条合适的道路。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历史功勋卓著，是伟大的天才，但是他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看到个人崇拜到了那种地步，的确是触目惊心。

拉：您认识一些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他们当政时曾有过令人憎恶的罪恶行径。比如我想到了阿富汗的哈菲祖拉·阿明（Hafizullah Amin），想到了柬埔寨的英萨利（Ieng Sary），1975年他参与了在柬埔寨的种族灭绝屠杀。他们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

卡：1979年作为总理的阿明在阿富汗领导了一个秘密小组阴谋反对总统穆罕默德·塔拉基（Muhammad Taraki），塔拉基当时正巧在哈瓦那访问。几天后，即同年7月，在喀布尔（Kabul）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塔拉基被暗杀，阿明上台当了总统。这次没有得到勃列日涅夫同意的暗杀导致了苏联在1979年12月对阿富汗的干涉。

阿明在某种意义上有些像波尔布特（Pol Pot）。我们曾有机会在1978年4月阿富汗革命成功后认识了阿明。您无法想象比他更和蔼的人！这点与英萨利完全一样，英萨利在柬埔寨革命后也对我们进行了一次访问。

确实，我曾奇遇般地认识了一些人物，他们表面上完全正常，很有教养，具有西方文化修养，毕业于欧洲或美国，然而后来却做出了令人恐怖、憎恶的事情。这些人好像在既定时刻发了疯。看来有些人的脑神经无法适应革命进程中出现的复杂问题，他们可耻的疯狂举动至今使我震惊。

拉：您认识邓小平吗？

卡：不认识。我很希望我能认识。

您在开始这一组问答时曾问我哪些领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一开始就对您提到切·格瓦拉，一个拉丁美洲人，但我忘了提另一个杰出的、从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拉丁美洲人：乌戈·查韦斯。

拉：您对没能亲自认识 20 世纪下半叶哪位领导人感到遗憾？

卡：我已经提及一个人，胡志明。我也很希望能认识毛泽东。当时不可能，因为很快就出现了那些由中苏冲突带来的问题和分歧。应该把毛泽东纳入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政治战略家、伟大的军事首领之列。我没有忘记胡志明的遗信，信中请求中国和苏联超越争论，团结起来。

拉：那么，戴高乐呢？

卡：由于我们在战争中支持了阿尔及利亚人，与戴高乐的关系不太好，但是戴高乐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的威望很高、权力很大，但由于阿尔及利亚有一大批法国移民，戴高乐为解决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戴高乐作为军事家的一种素质给我留下了记忆：尽管法国人的坦克更多，但他预见到法国可能被德国打败，很简单，德国人把坦克组成了装甲师。于是戴高乐想出了主意，把坦克集中起来，并组成了装甲师。

其次，我佩服他在美国、在英国、在全世界面前表现出的毫不妥协的反抗性。他在那场几乎使法国这个伟大民族栽到西班牙或意大利之下的可怕战争结束后，拯救了法国。他拯救了传统、民族尊严和法兰西的反叛性。然后又出现了由阿尔及利亚之战引起的严重危急时刻，出现了政变的危险、威胁，有人给戴高乐打电话：“请您过来，帮助我们摆脱这个局面。”谁能做到呢？他能做到，因为他有很高的威望。

戴高乐为法国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的坚持下法国生产出了核武器，当时谁也没能禁止他，不像今天，禁止全世界生产核武器，但却不禁止从地理上离我们很近的某些人。也不禁止比如说以色列，它在另一种意义上

离我们的邻居很近。

戴高乐直到被安葬时都是一个天才人物。这是关于他我所能说的。人们可以赞同他或不赞同他，但他是法国的历史性人物。读过法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一点，而我们都曾出于某种原因必须读法国历史，因为多少世纪以来，法国一直在世界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们知道那个抵抗战争中的戴高乐，那个缔造了第五共和国的戴高乐，那个再次拯救了法国的戴高乐，哪怕人们不知道他究竟拯救了什么；因为他们总是经历着政治危机，甚至有每六个月就更换政府的时期。

拉：在第四共和国时期，从1944—1958年。

卡：他犯过错误，比如面对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时的所作所为。当希特勒还没有充分掌握权力而陆军总参谋部反对时，戴高乐允许了希特勒对鲁尔（Ruhr）的占领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事情，如兼并奥地利，兼并苏台德区（Sudetes）。他允许这一切发生。后来，德国人就像戴高乐曾担心的那样集中起他们的坦克进攻法国。

拉：戴高乐把这一切理论化，并写进了一本书^①。

卡：关于装甲师。法国人拥有作为步兵支持力量的零散坦克，德国人打破了这些组合，因为在德国人的脑子里，没有比“后方有坦克”这样的消息更可怕的事了。俄国人那时确实已经有了装甲师，从军事观点来看，他们犯了另一个错误。但是戴高乐有能力统率抵抗运动，尽管身边有他的美国盟友，他没有屈服于他们。由于戴高乐，法国后来扮演了重要强国的角色。戴高乐不是左翼人士，不是社会主义者，他是法国爱国者，一个有战略思想的军事家。然而，当动乱威胁出现在1968年时他怎么样了呢？戴高乐跑到了德国，那儿有法国军队，他去确认这些部队的支持以便镇压任何可能的民众造反。我是这样看的，而我是不能赞同他这种做法的。

^① 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建立职业军队》（*Vers l'armée de Métier*），1934年由贝尔热-勒夫劳（Berger-Levrault）出版社出版于巴黎。

拉：您对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保留着什么印象？

卡：我是在萨特 1960 年访问古巴时认识他的。他是与西蒙·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一起来的。我见他们的时间很少，我招待了他们，与他们进行了交谈。我本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与他们谈话，交换意见。萨特写了一本友好的书，题目是《掠过蔗糖的飓风》(*Huracán sobre el azúcar*)，是给巴黎的一份报纸《法兰西晚报》(*France-Soir*)写的关于古巴革命初期情况的热情报道。

拉：那么对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呢？

卡：我也本希望能更多地了解海明威。他喜欢古巴，热爱这个岛屿。他曾居住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东西，他的存书、房子，这些今天已成为博物馆的一部分了。在革命后的第一年，我曾与他有过两次交谈，非常短暂。如果海明威能在这里多住几年，我会希望有时间与他谈得更多，与他再亲近一点。

他有的小说我读过不止一次。在《丧钟为谁而鸣》《永别了，武器》(*Adiós a las armas*)等许多小说中，他总是让主要角色与自己对话。这是我最喜欢海明威的地方，我喜欢他那些角色自己与自己说话时的独语。《老人与海》这部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的作品也如此。

关于他这个人嘛，就我所了解的那一点点来看，我觉得他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他的习惯、行为、他的物品，都表现了这一点。我从来就很喜欢他的文学。他在书中替自己画像，那些他体验过的冒险，那些他想经历但没能经历的事情。从心里说，我很欣赏他对冒险的渴望。

拉：我希望我们现在来谈谈古巴国内的形势。所有国家都有不满的人群，古巴也一样。同时，看来您通常总能感觉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并总是由您首先在演讲中提出这些问题：这件事情没办好啊，那件事情必须做得更好啊，而人们也总能在您的演说中听见他们感觉到的问题。但是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听不见您在演讲中谈论古巴社会里没办好的事情了。

因此很多人怀念您过去扮演的那种古巴“头号反对派”角色。

卡：的确，我是头号反对派，但不是反对国家，而是反对错误，反对没有办好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有办法了解舆论情况，就像是有一台显微镜。应该承认，在我国人民有自由表达意见的习惯，我们的传统中有这个特点，人们爱表达意见。

多少年来，我们都在每个事件之后收集人民的自发意见，在这些意见里有反对的意见。我在前面已说过，我们还有规定，要公开每一项反对意见。我从不公开宣读与我有关的意见，因为有可能是非常夸奖的，当众念这些让我反感，不舒服，显得虚荣。甚至当几百万同胞中只有几千个人表示不同意见时，我也感到担忧。比如，有1万6千人持反对意见就足以让我们注意了，不是因为百分比，的确不是。要考虑到这些批评意见有可能有道理，是正确的，但也有可能是对革命没有好感的敌对分子的意见。

情况是可以分辨的。当人们说：“这个可能太贵了”，或者说：“电视台的这个节目应该这样而不是那样做”，这些不是来自敌人的意见；尽管也有来自敌人的意见：“你们谈这些，但不提吃饭的问题”“你们说这个问题，但不说那个问题”。也就是说，关于舆论状况的信息是全面的、广泛的，我们关心这些信息，它帮助我们了解真实情况。所有的反面意见都会包括在内。必须关注舆论，在很多情况下，那些能帮忙的反对意见，都是些自然表达的意见。

现在我确实是很有批评精神的，比过去更无情地批评。应该看看我说的那些话，而且我是在公众场合说的。

拉：确实，在2005年11月17日的一次讲话中，您对腐蚀国家的一些坏现象宣布进行“殊死斗争”，您指那些小规模腐败、偷盗国家财产，非法致富；直到那次讲话之前，您还没有对这些现象做过如此严厉的公开谴责。

卡：是的。我们正在邀请全体人民参与这场战斗，一场针对各类问题的战斗，其中包括小规模偷盗、在任何地方出现的任何类型的铺张浪费。

由于我们没有在人民中反复宣传深刻的节约意识，导致了这类问题的产生。

我考虑最多的，是我们的缺点、错误，是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我们正投身于一场反对种种恶习、反对滥用资源、反对某些扩散开的坏习惯的战斗。是的，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已经开始的伟大战斗，我们投入了史无前例的力量和经验，我们会赢得这场战斗。

应该承认，我们这里有几万个寄生虫，他们什么也不生产，然而却发了财，比如，他们买卖偷窃的燃油。很多人提着一根管子，把汽油倒进他们的老牌“榄仁”车（almendron，即1920—1950年期间的一种美国汽车），这些新富人手里有钞票，却连自己消费的汽油都不愿意付钱。在这方面存在着普遍的混乱，造成几千万美元的流失……这是我们要整治的现象之一。

拉：怎么解释一定要由您亲自干预呢？为什么集体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常用方法不起作用了呢？

卡：是的，我们过去相信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这种方法已经不灵了。像过去运用的那种方法实际上已经不起作用。因为批评往往用于一个小集体内部，我们从未在大场合利用批评的方法，比如在剧场里，面对数百人或数千人。打个比方，假如一个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虚报了有关蚊子（*Aedes Aegypti*）存在的一个资料，我们可以把他叫来，批评他。可以这么做。但是我见过一些人，他们说：“我做自我批评”，然后若无其事，笑个半死！他们很得意。他们造成的后果呢？由他们的失职或行为方式造成的几百万元损失呢？

我们必须在屋子里，在核心层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然后发展到核心层外，发展到市镇，乃至全国。我们要利用人应该有的羞耻感，当然我认识很多恰巧可以称之为“无耻”的人。有羞耻感的人，当他看见当地的报纸上出现了有关他们所作所为的消息时，会羞愧难言。在这场反对恶习的战斗中，我们对任何人都不留情，对任何坏人坏事我们都要直呼其名，我们求助于每个部门的荣誉感。最后，那些不理睬的人将去自我纠正，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自我纠正；是的，他们将自食其果。我们相信一点：人都

是有很强的羞耻感的，一个革命者的首要责任是极其严厉地要求自己。

我们要打这一仗，要用更大口径的子弹。革命必须使用这些武器，只要有必要，就要使用它们。革命要建立必要的控制。我们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一切放任自流。

拉：您认为“特殊时期”的困难和匮乏促成了腐败及偷盗现象的产生吗？

卡：是的，尽管偷东西和盗窃资源并不是今天也不是“特殊时期”才有的。当然，特殊时期加剧了这些现象，因为它造成了很多不平等的状况，同时使一些人有可能弄到很多钱，但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记得1990年左右，当时苏联还没有自我解体，我们在（哈瓦那郊外的）贝胡卡尔（Bejucal）修建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技术中心。工地附近有一个小墓地，我有时在那儿转圈。一天我走到了墓地那儿，发现那儿有一个地下市场。修建那个中心的建筑队伍，包括队长们和一大批建筑工人在那里组织贩卖各种产品：水泥、木钉、木材、油漆……所有他们用来建筑那个中心的材料。

多少东西被偷盗啊？有时甚至涉及一些产品需求量很大的重要工厂，比如药品厂。我了解拉利萨（La Lisa，哈瓦那的一个区）区的一家工厂，不得不把该厂的管理人员和其他几十个人弄走。这个厂的管理人员本身和相当一部分人卷入了偷窃药品。不得不弄走了几十个人，再找这个找那个人来代替他们。只是解雇并不能解决问题，解雇也不是唯一办法。您看某些恶习扎根多深，浪费、挪用资源、偷盗多么严重啊。

拉：您对这一切怎么解释呢？

卡：在特殊时期，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些非常不平等的现象。在我们开设外汇商店的那一天，我们心里是多痛苦啊。设立那些商店的目的是为了回收一部分人从国外得到的钱，这些人在全国人民经济极其拮据的时候，在外汇商店购买紧俏商品，那些商品从过去一直到将来都会昂贵，以便我们将收益用于满足那些从国外无法获得任何东西的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此外，有些个体户向国民收费太高，他们一个月的收入是我们一个医生的几倍，这些医生或在危地马拉的高山上，或在非洲的偏远地区、海拔几千米的克什米尔、喜马拉雅的山里工作，抢救生命。比起那些窃贼来，我们这些医生的收入只有他们的5%或10%；那些人将偷来的汽油卖给新贵，将港口的物资用卡车成吨挪运走，倒卖，在外汇商店偷盗，在五星级酒店偷盗国家财产——他们会用在某家外汇商店买来的普通朗姆酒置换宾馆的朗姆酒，就这样利用一瓶普通的朗姆酒能调出的莫希托（mojitos）和达伊基里（daiquiris）（莫希托和达伊基里是用朗姆酒加柠檬汁等调出的两种鸡尾酒名称——译者注）换取额外收入。在这个国家里有多少种偷盗的方法啊！

拉：好像偷盗最多的地方是加油站。

卡：好吧，我们从比那尔德里奥查看起，看看那些收取外汇、销售燃料的加油站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快就发现那里被偷盗的部分与收入部分相等。他们偷了将近一半！在其他一些地方偷盗占一半以上！

在哈瓦那，很多人学会了疯狂偷窃。如果我给您讲讲首都所有加油站的历史，您会震惊不已。要做的事还要多两倍，这简直是一片混乱。每个政府的部门都自行其是，到处分发汽油。在人民政权委员会，灾难、混乱是全面的。

还要看到，所有最老的汽车，那些耗油最多的汽车，都曾给了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表面上看我们合理地使用着汽车，但实际上我们正把国家世代代抵押出去。就我们所了解到的来看，许多公家的汽车在为了与正常工作毫无关系的事跑东跑西。工作人员，或多或少，都利用公家的汽车去看亲戚、朋友、家人，或者女朋友。

已经用不了多久，就像许多发达国家正在做的那样，通过全球定位系统（GPS），就能知道每辆汽车在哪儿，不管在什么地方、哪条街道。谁也乘车跑不了，谁也无法坐车去看姑妈，看什么别人，看女朋友。不是说看望家人、朋友或女朋友有什么不对，但别坐用于工作的汽车去。

我记得有一次，那是特殊时期开始的几年前，我看见有一辆崭新的沃尔沃牌货运车在哈瓦那第五大道上飞奔，那车几乎是刚买的，当时值五六万美元。我对这辆车以那样的速度跑向哪儿好奇，于是让卫队问一下：“停一会儿，问问他去看谁，让他跟你说实话。”那个司机坦白说他在第五大道上开着那辆沃尔沃疯跑是为了去看女朋友……真是无法无天了！（原文 *Cosas veredes, Mío Cid* 为一句谚语，*veredes* 是古西班牙语，即 *verés* 或 *verás*，这句话的意思是“多么离奇的事呀！”——译注）

像这样的事一直有。一般来说，我们什么都知道，很多人认为：“这不是革命能解决的事；不，这样的事谁也解决不了。”但是能解决，这样的事人民能解决，这样的事革命能解决。

拉：怎么解决呢？

卡：首先，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我对道德的作用考虑过很久。一个革命者应该有什么样的道德观呢？所有的革命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从道德观开始的。但是，这也是一个生死攸关的经济问题。古巴人是世界上最浪费电力和燃油的民族之一。我们这儿谁也不知道汽油的价格，谁也不知道电力的价格，谁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市场上的价值。连房子我们最后都白给。古巴能通过赠送房子解决住宅问题吗？一些人买房子，成了房主，他们每月交 50 比索、80 比索，好，现在兑换一下，如果这钱是从迈阿密汇来的，那只是 3 美元啊！这样几年下来，他们只付了不到 500 美元，其中一些人以 1 万 5 千或 2 万美元的价格再把房子卖出去……谁来买呢？无产者吗？底层人吗？有许多底层人，他们得到了不花钱的房子，又把房子卖给新贵。这是社会主义吗？

拉：有一个现象，尽管是合法的，但是荒谬的，就是说那些从国外得到外汇的古巴人比没有任何人在国外的古巴人享有更多的好处。这造成了不满。

卡：是的，您要注意这里的不一致性，他们能得到这些好处首先要感

谢古巴政府的补贴。比方说，现在那些在国外的人，他们有了1美元后干什么呢？他们汇往这儿……我有能得到国外汇钱的亲属，我与此毫无关系。一天我们打听了一下，现在有的省有30%—40%的人能从国外收到点什么，哪怕是一点点。但是，汇1美元是个好买卖，太好的买卖！他们靠汇美元就能完全把我们搞垮，因为，在一个被封锁的国家里，产品是配给的，得到国家高度补贴的，免除了服务费用，或极便宜的，因而这些汇进来的美元就取得了很高的购买力。

那么，古巴人民为从国外汇进的这1美元曾付出多少钱呢？这1美元不是你在这里的劳动所得，是从外面汇给你的，是某个带着健康的身体离开这里的古巴人从外面汇给你的。这个人在古巴从出生起就接受免费的教育，没有患病，到达美国的古巴人都是我们这里最健康的公民。现在我们来看看，为这一个从美国汇来的美元，古巴平均付出了44美元的代价。我们研究过这个问题。

古巴是一个高尚的国家，它为在那边的那些人的美元提供补贴。那些人对你说：“我给你寄2美元，你好支付得到补贴的电费。我再给你寄一台电冰箱，再不，我给你寄钱你好在商店里买东西。”然后，慷慨的汇钱人继续说：“你别担心，你需要什么我给你寄什么，我来保证你在这个白痴社会主义国家消费的、得到补贴的300度电费。”我们是善良的人，但是会有某个公民理直气壮地觉得我们是傻瓜。他有部分道理，注意！

我还记得，当我们分析电力消耗时，发现有一家每月耗费11000度电的私人餐馆（原文Paladar在古巴是“小吃店”“餐馆”“餐厅”的意思——译者注），而这个白痴国家还补贴那里的店主，资产阶级很喜欢带参观者去那里品尝龙虾、虾的美味，以显示私营企业的奇迹。所有这些都是某人从巴塔巴诺（Batabanó）给他偷来的，餐馆有四五个餐厅。不能再这样下去！当然，这个“独裁的、滥用职权的国家”是“进步的敌人”，因为它视掠夺为敌人。

当时，国家给这家餐馆每月补贴1000多美元。我知道情况，因为我问过每月它消耗多少电，合多少钱，这家私营企业以受到补贴的价格付电

费：11000度啊！我记得在超过了300度之后每度电付30分比索。他每月付3000古巴比索，即120美元。但是国家每月要花费1250美元——那次我是按每度电10美分计算的。这就是贸易自由，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发展，这就是前进……

拉：你们将怎么做呢？要取消补贴吗？

卡：不，但我们已经提高了那些用电大户的电费标准。对于那些浪费电的用户，不管它们现在的经济状况如何，我们要遏止它们的过分消费。另一方面，必须逐步摆脱在今天已经成为累赘的补贴政策。

因此，从现在起，补贴或免费只用于那些基本的、紧要的事情。对医疗、教育和一些类似的服务将不会收费，但是必须对住房收费，我们将研究收多少。可能还会有一点补贴，但是所缴租金在几年后必须接近住宅的成本。一切都要适应我们的水平，一切属于人民，唯一不允许的是自私自利、不负责任地浪费财富。要杜绝浪费。

我们也要创造条件让配额本消失。我们正逐步创造条件改变这个在过去必不可少、而现在妨碍我们的配额本。只要按照简单明了的原则，我们不会滥用职权，也不会让人饿死。配额本必须消失。另一方面，我们提高了一些人的工资和养老金，这是针对那些收入最低的人的。劳动和从事生产的人将得到更多的收入，得到更多的消费品，享有更多的服务。那些工作了几十年的人收入将更高，得到更多的东西。很多特权将会消失，对很多不平等的事物我们将逐步截断它们的源头，那些它们赖以滋生的条件。当没有人需要补贴的那一天来临，我们就向着一个公正、尊严的社会前进了一大步。

拉：您正在承认革命在这方面的错误。国外的一些人将会高兴，也可能国内的另一些人会认为您的批评过于严厉。

卡：是严厉，但我这么说了。将来有必要说多少次，我就说多少次。我不害怕承担我必须承担的责任，我们不能搞温良恭俭让，让他们攻击我

好了，让他们批评我好了。是的，很多人应该感到有点痛心……我们应该敢于这样，我们应该有勇气说出真实情况。那些外部的强盗说什么，那些广播明天或后天将以讽刺的口吻做何种评论，这都没有关系……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这不是说革命的坏话，这是说革命的好话，因为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个革命能够提出这些问题，能够抓住斗牛的角，比马德里的斗牛士做得还漂亮。正因此，我们应该敢于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希望实现的目的。

拉：为了打击偷盗，尤其是加油站的偷盗，你们正在起用青年社会工作者，是吗？

卡：是的。我们正在非常严肃地解决这些问题。您无法想象这些青年社会工作者正在以怎样的热情工作，他们正在从事许多任务。我这一生从未见过这样高的热情，这样严肃、尊严、自豪的态度，这么清醒地觉悟到这是有利于国家的工作。目前青年工作者已经进入了炼油厂，他们乘坐在油罐车上，沿途巡视，查看哪里有燃油被倒卖……我们这里曾陆续发现完全靠公家油罐车供给燃油的私人加油站。

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动用全国拥有的 28000 名社会工作者，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在为创建反腐败支部工作着。每一个需要观察的点配置一个支部。在那些地方也有青年团、群众组织、革命的战士……但是最好还是那些偷油的人自我坦白，那样我们就没有必要一个点一个点地发现每处盗窃多少燃油了。

有时社会工作者战斗队必须采取突袭、迅速、严守纪律和有效率的行动，他们的行动是很有影响力的。在哈瓦那城，有 1000 人在行动，我们又动员了另 1000 人做后备力量。他们到达了那些地点，一下子哈瓦那加油站的收入就翻了一番。为什么过去那些职工收不进这么多钱呢？社会工作者必须进驻。我说过：“他们有可能不吸取教训并自我纠正吗？”

哈瓦那已经变成了一所壮观的学校，人们在此学习该做的事，社会工

作者日益提高能力。我们准备动用 28000 名社会工作者和 7000 名正在学习的学生。如果还不够，我说过，从现在起，我们与大学生联合会一起干，我们再另找 28000 名大学生，我们与正在积累经验的社会工作者一起发动这些大学生。如果 56000 人还不够，那我们就再找 56000 人来加强力量。

让我们来告诉那些腐败者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发展，什么是公正，什么是制止偷盗。我们将拥有人民最坚决的支持。我们的社会将会真正成为一个全新的社会。将不会再有很多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这种现象永远也不会结束。”与人民在一起，我们正在证明能够做到。我们应该下定决心：不是我们打败这些不正之风，就是我们自己死亡。

拉：谈到古巴的政治结构，我想问您是否认为一党制的结构今天已经不适应目前日益复杂化的古巴社会。

卡：您在问一党制的问题，对吗？随着我们的人民更有文化，对世界更了解，他们就更热爱团结，珍视团结。我确实看到在一些拥有 100 个或 120 个政党的国家里发生的景象……我认为不应该把这种现实理想化为管理国家的形式，也不应该把它理想化为民主的形式。这是一种疯狂，一种异化的表现。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怎么能以 100 个政党的形式组织起来并取得发展呢？它不会把我们引向任何健康的管理模式。

在许多国家里，古典的、传统的、多党参与的竞选制度往往演变成一种好感度的竞争，而并没有成为一种资质、诚实性或执政能力的竞争。在这种选举中，最后被选上的，是那个给人以好感的人，最善于与大众交流的人，甚至是那个相貌最可爱的人，那个在电视、报刊或电台里得到最好的宣传的人。或者最终，毋宁说已经是个规律，被选上的是那个在广告宣传上花钱最多的人。

您知道得很清楚，因为您在几本书里分析了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个半球某些我不愿提名的国家里，那些美国式的竞选花费几千万美元，有时是几亿美元。形象顾问们教导候选人如何梳头、穿衣、面对大众，以及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这一切就像是一次狂欢节、一幕真正的闹剧、一场演戏……

有时，参加这些竞选的只是那些有足够资金投入宣传战的人。那些在大众传媒露面最多的人，几乎就是最终取得竞选胜利的人。如果一个反对派候选人没能动员出足够的资金来进行有效的竞选活动，即美国广告商所说的“科学广告运动”，那你就可能在竞选中失败。这是事实。这种大选的结果是非常奇怪的，影响它的根本因素与竞选人的才能很少有关系。

此外，不像在其他地方，在古巴不是由党来提名、选举众议员……比方说在西班牙，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内，党主席费利佩·冈萨雷斯决定谁将以该党的名义参加议会。这是一种像搞一场简单民意测验那样容易的方法。不错，他还要估计一下他将提名的议员候选人手中的钱数，及他们能够取得多大的广告效果，但这不难。如果他估计在一个省、一个自治区或一个地区本党拥有 15% 或 20% 的势力，他就将知道本党在这些地方可能拥有的议员的确切数目。于是他提名若干候选人，然后公民只是投票选举他拥护的政党。政党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一个组织，选举人只是为一个抽象的东西投票；选举具体议员的、确定议员名单的，是政党。

另一些国家的人，比如英国人，或牙买加人，他们有选区制度，这种方法稍微好一点。在选区里，每个政党（由选民直接）提名一人，一般每个选区有两个政党。这样，议员就会在议会里取得长期经验。一般来说，比起总统制国家里出来的干部，加勒比岛国的政治干部更有效率，更有经验。

在我们古巴，一条首要原则就是党不提名，由人民提名，每个选区的居民在代表大会上讨论、提名，也就是说决定人选，然后选举将由议会代表他们的候选人。在这个过程中，党不得干涉，绝对禁止党的干涉。

拉：难以相信党不介入。

卡：我们的党既不提名也不选举。我们制度的基础是每个选区的代表，这些代表是由人民在代表大会上为各自选区推举的。每个选区的候选人不得少于 2 人，也不得多于 8 人，他们由人民选举，必须获得 50% 以上的选票。然后由他们组成全国各个市镇的市镇代表大会。由 600 多名代表组成

的古巴全国代表大会中几乎 50% 的成员来自这些选区代表，他们不仅组成市镇代表大会，同时推举组成省代表大会和全国代表大会的候选人。

我不再展开了，但是我确实希望人们有一天能更多地了解究竟什么是古巴的选举制度，因为当一些北边的人问我们“古巴什么时候搞大选？”的时候，的确让人震惊。这个问题可以由我们古巴人问他们并对他们说：“需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可以当上美国总统的超级百万富翁？”或者不这样提，总统候选人不一定必然是超级百万富翁，但我们可以这样问：“一个候选人需要几十亿美元才能当选总统？”“每个职位值多少钱，哪怕是最低的市镇职位？”

在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事，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我们不会在墙上贴满广告，我们不会在电视上大规模播放那些竞选演说，我想他们是那样称呼的。

可能提出两个、三个，直至八个候选人，一般情况下有两到三个，差不多总是两个。有时候要花一些时间选择，因为有价值的是候选人的简历、经历、历史，他们一起参加竞选活动，这些人都是一些质量很高的人选。议会里差不多半数由那些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人员组成。

拉：这些人不是党员吗？

卡：不一定非是党员，不，根本没有这种规定。他们中有很多党员是出于偶然。这证明了什么呢？只能证明有很多好人、很多优秀人物是党的成员。甚至天主教徒、新教教徒也可以是党员，宗教意识不是一个障碍。在开始时曾是障碍，正如我已经给你讲过的。但今天，党已经向具有各种宗教信仰的人敞开了门。

大约 13000—14000 名代表是被群众提名和选举的，他们必须获得 50% 以上的选票才能当选。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是党的成员，这一事实证明，被我们的党挑选出来的男女公民不是腐败分子，而是廉洁的人，在他们中间有许多年轻人，许多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人。我可以向您保证，随着我国历史、斗争、对抗、战斗的发展，我国人民的文化程度将越来越高。他们

珍视团结，把团结看成根本性的、不可缺少的东西。

拉：在许多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里，入党是一种获取特权、肥缺和好处的方式。人们入党不是出于信念和牺牲精神，而是为了私利。在古巴没有发生同样的情况吗？

卡：我们的党不是为了获取特权而建立的。只要出现应尽的义务，那么第一个有责任去做的就是党员。党不提名，不选举，由人民通过1万多个选区来做这些事。党领导，我倾向于说党从意识形态上领导，党制定战略，党与共和国的议会、群众组织，与全体人民一起承担这个责任。这是一种不同的观念。

拉：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也有腐败。您认为在古巴，在领导层内部没有腐败吗？

卡：有这样的情况，一些官员与外国大公司谈判，那么好吧，有时他们邀请这些官员去餐馆吃饭，或者邀请他们去欧洲，让他们住在公司主人的家里，或住在豪华饭店里……最后，我们的一些官员就成了成百万的买主；一方面他们是成百万的买主，另一方面，很多资本家都具备腐蚀人的艺术，他们做的比蛇还要隐蔽，有时比老鼠还要坏。老鼠是一边咬人一边使人麻痹，它们能在漆黑的夜里从人身上咬下一块肉来。就像老鼠一样，他们逐渐使革命昏昏欲睡，再从革命的身上扯下肉来。

不少人的腐败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人知道自己在搞腐败，或者怀疑自己的行为属于腐败，因为人们看见了他们的生活水平，看到了他们所干的蠢事：某人换了小汽车，新漆了汽车，安上了这个，或者装上了一些漂亮的带子，因为讲究排场。我们不下20次地在这里听说，在那里听说。必须采取措施，但是这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

我们做了努力，我们有幸最大程度地避免了腐败或滥用职权的现象，我还没听说过任何比我们做得好的例子。领导层的腐败在我们这里是无法想象的。有可能出现腐败，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一点，这里有很多人陷入腐败，

但是腐败不允许发生在党的领导干部、国家领导干部身上，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允许自己这样做。

有人把我纳入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列。这（谎言）太过分了。我不会为此打官司。我确实没有任何财产，有些比索，自革命的第一年起，我为每项服务缴纳规定的份额，当然是微乎其微的，然后我会剩下一些。我的工资从来没有变过，从工资里我要交党费、一定比例的房租，每个月都要交。我已经好几年没有休假、好几年没有休息过一天了，没有周六，没有周日。物质上我什么也不缺。我拥有我所必需的。我也没有什么过多的需求……

我给您解释一下道德品行的准则和本质。如果说哪个革命领导人在外国某个银行有存款，那就让他们找吧。谁要是能找到一处，那么他要多少给他多少。我们革命领导人没有一分钱，我们可能有些比索，我们还剩下一些，因为几乎所有的消费都替我们付了……

拉：您能告诉我们您的工资是多少吗？

卡：我的工资，以 25 比索一美元计算的话，每月 30 美元。但我饿不死。我交党费、交别的，一定的百分比，从始至终交，交房租，我想是百分之十吧。

您应该明白，一个这儿那儿、在许多个地方被追踪的人，不可能每天都处在一个点上。当然，这些条件都逐步改变了，我们也逐步取得经验。

我要帮助我的一个姨妈，她的一个儿子在战争中死了，这是实行退休制度之前的事，因为起义军曾六个月没有发工资。

还有别的，既然我们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您，这么多年来我积攒了许多接受的礼品。我不知道这些礼品总共值几百万美元，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喜欢卖掉属于或曾属于这个人、那个人的东西。一天，我把 17000 件礼品交给了哈瓦那市的历史学家欧塞维奥·莱亚尔（Eusebio Leal）。我一直不愿意说这件事，免得一些赠送我礼物的人认为我不珍视他们的赠品。其实相反，我正因为珍视才交给了哈瓦那市的历史学家。我对他说我只保留一个东西：“把书给我留下吧；等我死后，就都是公共图

书了。”但是其他的礼物，我全交公了。有很多趣事，有人会对很多事发笑，因为我还交了睡衣，甚至还有价值六七千美元的手表、艺术品、各种各样的东西、精美的绘画、价值昂贵的物品、古董。

我不是在自我辩护，我只是说有些事太可笑。他们两次把我纳入最富有者之列。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搞这么荒唐的把戏有什么目的。我自己没有一分钱，我一分钱也不管理。当然，一般是国家的管理部门管理主席的开销。这在哪个国家都一样。确实，当我访问时，我必须住在宾馆里，必须在某个地方吃饭，但我身上从来不带一分钱。

我可以执行了一个公式：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那么我的所需，我个人的所需的确是非常少的，我的工资从未提高过。我将光荣地身无一文可兑换的外币死去。人们要为我写的回忆录、书籍付几百万的稿费，我只是说：“我写书是为了给学校的。”以这样的准则生活，人感到平静、由衷幸福，感到坚强有力。任何一个革命者的头脑里都容不下一丝不公正，绝对容不下。

我说过革命者的心里容不下报复心理。一个人可以用人世最大的坚定性进行斗争，但是不能出于仇恨而斗争。当我们在马埃斯特腊山时，有一次我说过一句话。当时我正在观察一次用火箭发射的轰炸，那些火箭是由美国人提供给巴蒂斯塔的炮手的，我在写给塞利亚（Celia Sánchez）^①的一封长信的结尾处写道：“看到他们把火箭投向马里奥（Mario）的房子，我发誓要让那些美国人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昂贵的代价。当这场战争结束后，对于我来说，一场更漫长、规模更大的战争将开始，那就是我要打反对他们的战争。我感到这是我真正的使命。”

那是我看到那些炸弹时的一种预感。

但是后来我又目睹了那么多的事情……我看见成百万的越南人死去，成百万的残废，我看见他们向越南的热带森林抛撒下凝固汽油弹，那是一

^① 塞利亚·桑切斯（Celia Sánchez）（1920—1980），古巴女英雄，马埃斯特腊山上第一位女游击队员，从1959年革命成功后直至去世，一直是菲德尔·卡斯特罗身边的合作者（参阅第八章注释9）。

个有着古老文明的、优雅的、感情细腻的民族啊，而美国向两万公里之外的这个国家轰炸。我看见他们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行为、那些拷打，看见他们在费卢杰使用白磷弹……看看那些他们强加于人的独裁政权，那些在美国造的专门指导下培养出来的几万施刑者，那些让1万、2万、3万阿根廷人“失踪”的肇事者，他们还偷走了“失踪者”的孩子。我看见那些人让10万多危地马拉人“失踪”“失踪啊！”再加上对智利的镇压，加上他们干过的所有可怕的事情，不止一次地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干涉，那里曾有一个受到美国支持、由美国制造出来、像尼加拉瓜的索摩查一样的特鲁希略政权……

在给塞利亚写了那段话后我目睹了那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让我觉得那时写下的话是正确的。我不是针对作为人民的美国人。相反，古巴是美国公民在世界上能受到最好接待的国家，在古巴没有偏见也没有心理情结，心理情结会造成仇恨和蔑视。我们这里不存在对美国公民的蔑视，我们的人民接受的不是沙文主义也不是狂热情绪的教育，这是一个在思想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民，否则我们不可能坚持下来。一个国家只有靠思想才能站得住脚。

拉：有一些人，甚至原则上是古巴的朋友，他们面对那么多针对革命的批评，也开始怀疑你们，或最终谴责起你们来。对他们您能说什么呢？

卡：对很多出于一定的思想怀疑我们的人，或者谴责我们的人，我想说的是，想一想这个小国家为什么能够在将近半个世纪里抵御那个最大的强权的多次攻势。如果不是靠着原则、思想和伦理，这是无法做到的。这是唯一的方式。

我们相信人，相信人类，相信人有能力获得道德、觉悟，相信人能够做出巨大的牺牲……人们甚至能为坏的事业做出牺牲。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您看在马恩河（Marne）、凡尔登（Verdún）战场上，连那些工人都去为法国国歌而战，真是美丽的篇章，为法国国旗、法国历史、法国国徽而战。人们为了象征符号成群地去死，只为了那些象征，相信那是美

好的，是值得为之献出生命的，而他们是在保卫帝国的利益，保卫大资本家的利益，保卫那些非洲、亚洲的殖民强权的利益。

在漫长的历史上，我们看到人们为了尊严，为了自己所珍视的价值而死。那是因为有人曾把这些价值观灌输给了他们。应该把那些从人道主义、正义、博爱的角度来看是最美好的价值灌输给人们。

法国革命中，我非常喜欢“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她曾是教诲。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当我们目睹了世界各地发生的状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生的情况，目睹了美国的统治方式之后，还有谁能谈论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吗？甚至连自由也无法论及。无法论及平等，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还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很难论及博爱，很难让博爱统治世界。然而，自由、平等和博爱将会统治世界，因为这些感情正在四处萌发新芽。

因此我常说，知识分子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我们称之为知识劳动者的那些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教授、所有那些在英特网上组织强有力运动的人士，比如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从阿雷格里港的世界社会论坛开始组织抗议活动的人、组织西雅图抗议活动的人，他们才能使当今世界的主子们害怕。

我坚信在美国绝不会建立一个法西斯政权，因为美国有传统，有道德价值观，有政治机构……一般来说，美国人做什么的时候，以为他一定能把这件事做好，因此一些统治者总是首先企图欺骗他们。但是，要想欺骗一个知识分子肯定是很难的，哪怕在这场迫使许多美国公民扔掉法国葡萄酒的伊拉克战争中。这个举动真是愚蠢。假如说是他们正在大喝也好啊，然而，唾弃法国葡萄酒，扔了它？您看看，这是什么样的极端做法啊……这类事情的出现，是仇恨造成的，他们强化仇恨，强化偏见。

我们认为自己有幸觉悟到这些不是政治武器。有政治武器，而且我们的经验证明，运用原则是我们可能拥有的最好的政治武器。

拉：最近古巴在宪法中加入了社会主义是一条出路……

卡：规定古巴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更改性。

拉：您认为在宪法中写入这点就足以保证古巴永远坚持社会主义吗？

卡：我不认为，但这么做事出有因。2002年5月20日，布什先生要古巴改变社会和政治制度，要我们在古巴建立资本主义，建立尼加拉瓜式的或其他一些我没有必要在此提名的国家式的民主。我们给了他一个回答。群众运动持续了两个月之久，举行了群众游行，产生了一个给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关于这个提议我已经给您讲过了。800多万人在提议上签了字，真真实实的签字，因为除了某些眼睛或胳膊有问题的，所有愿意签字的都签了字。一共800万人签字！许多地方都举行了抗议，因为必须是身在本选区的人才能签字。比如，所有当时没在圣地亚哥城的人不能签字；因此有不满情绪，许多人说：“我也想签字！”在选举全国代表的时候，允许在外地投票，但是这次我们做出了我给您解释过的规定。

关于这次签名，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一切都在4天内结束，因为人们不明白为什么不让他们签字。有可能一位大使身在工作的所在国，有可能这位正工作，那位正访问。我们甚至不知道有几十万人因为不在居住地，因而无法收集到他们的签名。

我来结束我的解释。因为他们要我们建立资本主义，我们就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打了一个大仗。所有群众组织的代表第一次全体集合起来开会，讨论一种又一种可能的回答，而这几百万的签字一致支持这一步。

有人可能会问，怎么说不可改变呢？什么都是可改变的。我们曾在宪法里规定全国代表大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修改宪法，作为宪法规定的权限，代表大会可以商定对宪法进行几乎不受限制的修改，当然要通过一定的必要程序。因此我们决定取消全国代表大会的这个权力，取消它修改宪法以改变制度的权力，因此宣布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不可改变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想要改变社会主义性质，就必须进行一场革命，或者毋宁说一场反革命。也就是说，必须这么做，而面对这样一个受过教育的、团结的人民，要这样做并不是很容易的。这就构成了对布什从美国向我们提出的强求的一个尊严的回答的特点。因此，宪法里就写上了这一内容。

敌人甚至可以合法地掌握共和国的政府，他们理论上拥有一个条款：到代表大会去，成为大多数。如果他们推举出选区的代表，假如他们获得大多数，人们投了这些代表的票，就这样，请注意，通过选举的方式他们就有可能夺取政权。因此，一边是“不可改变”的性质，一边是他们就有可能夺取政权，并凭借政权，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一场反革命。这种事情发生过。然后，照此办理，汇集几百万的签名——他们永远也做不到，通过法令宣布，通过法令改变社会主义。

我说是一场反革命，因为他们必须夺取政权来实现这一点，这并不意味着必须通过武力。根据我们的选举制度，他们完全能够通过决定我们选举程序的现行法律机制夺取政权。当我们写上：“不可改变”，那就是不可改变。也就是说，全国代表大会也不能改变它。这就是我们对宪法所做的修改。

他们能够通过一次选举的胜利来改变这种情况。夺取政权，这是要费一点劲的，两者都是困难的事。

拉：您对古巴社会的前途感到乐观吗？

卡：我可以告诉您一件事，我们是乐观主义者，我们清楚我们的命运是什么，这是一种非常艰难但又充满英雄气概的和光荣的命运。我们的人民绝不会被战胜，这就是我能告诉你的话。我们的人民的平均知识和文化水平将会处于世界最前列，像在一场马拉松赛跑中，领先紧随其后者几圈。我这么说丝毫没有沙文主义的意思。我讨厌沙文主义，我更喜欢批评，并总是在提及我们的成就时，表达我们没能做得更多的惭愧；每当我们应用我们的发明时，总是表达没能更早发现的惭愧；每当我们利用了新的可能性时，总要表露没能更早获得这种经验的忧伤。现在，我们至少创造了经验。

您看，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文化程度日益提高、在目前已经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日益获得更多知识的社会，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继续高速发展，在哲学、政治、历史、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成倍获得更多知识。一切都在发展，因为近来我们意识到可以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成倍提高知识水平。

我可以举通过广播、电视节目进行扫盲的例子，或者举利用太阳能向农村任何一个角落、小角落输送从不间断的稳定电流的例子，这样，只要很少的花费，就能通过电视把知识、文化、智慧送到任何地方。

无知是许多坏事的同谋。知识应该成为希望获得真正解放、希望建设一个更美好社会的那些民族的基本同盟，哪怕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悲剧，面临那么多的问题。我给您举了这些例子，但是我们发现可能性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一切在我们的手中，在团结起来的人民手中。

拉：您今天有好几项活动。我们这最后一次会面时间很晚了，已经过了午夜。所有这些活动应该使您很疲劳……

卡：除了一天的日常工作，在今天的工作日结束之时，我还进行了两项重要活动：一是在电视上露面，二是会见去参加一个重要国际会议的代表团。两个题目都很重要。因此我们的谈话开始得晚了一些，但我很高兴接着谈。

拉：您的工作仍然很繁忙，而在2005年8月13日您已经满79岁了。我想问您，您感觉身体如何？

卡：哦，我身体还好。一般来说，我感觉身体还好，尤其是我感觉有精力，对事物有热情。我感觉身体和思维都很好。在这方面，体育锻炼的习惯肯定起了积极作用。我认为体育锻炼不仅有利于肌肉，也有利于大脑，因为它影响血液流动，影响氧气到达所有细胞，包括脑细胞。

拉：2001年6月23日，您在做一次公众讲演时晕倒；2004年10月20日您又摔倒一次，也是在公众场合。这次造成了您的一个膝盖骨折。您从这两次身体的小事故中恢复得怎样？

卡：您看，像以往一样，人们又在做很多推测。确实，2001年6月23日那天我在哈瓦那的一个区——科托罗（Cotorro）区，当我在酷热中连续三个多小时面对电视直播做演讲时，短暂失去了知觉，很轻微。那

是由于高温和过分的日照造成的几分钟的晕厥。几个小时之后，正在为此庆祝的迈阿密的人，惊奇地看见我再次出现在电视节目上，亲自告诉人民所发生的真实情况。那不是一件大事。谁在烈日下站那么久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拉：那么您在圣克拉拉摔倒的那一次呢？

卡：关于2004年10月20日那一次，我曾在次日给人民的一封信中讲述了经过。在结束了圣克拉拉市的演讲时，我意外摔倒了。一些新闻社和其他的传媒散布了关于事故原因的几种说法。作为当事人，我可以给您详细解释所发生的情况。

大约在晚上10点钟我结束了演讲。一些同志到主席台上来问候我。我们一起待了几分钟，然后从同一个用来走上主席台的小木梯走下来到下面聚集。我正准备在一个我上台讲话之前坐过的椅子上坐下来，我在花岗岩的路面上走着，一边不时抬头用目光问候与会客人。

当我距离第一排椅子有15到20米时，没意识到在地面和人群中间有一个比较高的走道。由于高度的差别，我的左脚踩空了，冲力和很久以前被牛顿发现的重心原则使我在踩空的同时向前冲直至摔倒在地面上，时间只有几秒钟。出于本能，我伸出两只胳膊来减缓下跌，否则脸部和头部都会撞上地。

此事责任在我。我的疏忽是由于那天的激动，那一天的活动充满了创造性和象征性。那天夜里11点左右，我躺在担架上，被救护车送往首都。人们用几针镇痛剂减轻我的疼痛。

我记得乌戈·查韦斯总统刚得到消息就打来了电话。他希望与我通话，靠着无线通信我们通了话。

我们一直到达了革命宫。我立即被带进设在那里的小医疗间，那里有为紧急情况而准备的最必要的设备。医生准确地判断了左膝盖和右臂上部的伤情，右臂的肱骨呈现一个裂隙，髌骨碎成八块。专家和病人一直同意做膝盖手术，并用三角绷带固定右臂。

手术进行了三个小时十五分钟。矫形医生精心把每块碎骨放在原来的位置上，拼合起来，并像编织匠一样把它们用不锈钢细线缝合起来，真是金银匠一样细致的工作。

我请求医生别给我用镇静剂，因此他们通过脊椎进行麻醉，只麻痹身体的下半部，而使身体其他部位照旧。出于当时的形势，必须避免全身麻醉，以便我能处理重大问题。于是，自始至终我都继续了解情况，并下达指示处理此突发事件造成的新情况。

外科手术之后，我开始锻炼左腿，同时保持右臂不动。

恢复期和功能锻炼期不太长。我经常游泳，做很多锻炼来恢复腿和手臂的正常功能。我没有耽误一刻处理国家事务。现在我正像您看见的，能走，能活动，生活正常，没有什么问题^①。

拉：说到这里，我想谈谈关于未来的话题。您没有想过什么时候退休吗？

卡：我们知道时间流逝，人的精力也会耗尽。但是，我在这里想向您重复我在2003年3月6日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时对全国代表大会所说的话：“现在我明白了我的命运不是来到这个世界上，在生命的尾声休息。”我向他们保证，如果他们希望的话，我便一直与他们在一起，只要我认为自己还有用，需要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一分钟也不少，一秒钟也不多。

我觉得我每年都为革命投入更多的时间、更大的热情，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更有经验，沉思得更多，考虑得更多。柏拉图（Platón）在《理想国》（*La República*）里说，承担领导职务最理想的年龄是55岁之后。采用他的说法，我想，这个理想的年龄应该是60岁。而我猜想，柏拉图

^① 2006年7月底，菲德尔·卡斯特罗由于肠出血必须接受一次外科手术。因此，7月31日他发布了一个公开声明，宣布由于必须进入一个康复期和接受相对长时间的疗养，他暂时将古巴政府领导人的责任让给宪法规定的接替者——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劳尔·卡斯特罗·鲁斯。作为本书古巴第二版准备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在撰写这条注释时（2006年9月初），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身体已经令人满意地恢复到为该第二版审阅材料紧张工作的程度了。（古巴编者注）

时代的 60 岁大致应该是今天的 80 岁……

您问我我还会在位多久？我向您说实话，这要由全国代表大会以人民的名义来决定；这件事应该由人民来决定。

拉：美国中央情报局在 2005 年 11 月宣布您得了帕金森病。对这条“消息”您有什么评论？

卡：他们正在等待一个自然的、绝对符合逻辑的现象，那就是某人的死亡。他们想到了我，这真是我的莫大荣幸。这等于他们坦白说无法做到多年来想做的事：暗杀我。如果我是个爱虚荣的人，我可以引以为自豪，因为这些家伙表明了他们不得不等待我的死亡。他们每天都在编造些什么，说卡斯特罗是不是得了这个病，是不是得了那个病，是不是得了这个病加那个病。最近编造的是我得了帕金森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当时患有帕金森病，但他又活了许多年并周游世界，他有意志力。

我呢，我跟您说过，我狠狠摔了一跤，直到今天（右）臂还在康复期，并天天好转。在我的肩膀和上臂内部有淤血，但没有在 X 光片子上显示出来。我没有摔到头部，如果摔到了头，我今天肯定不在这里了，那些谋杀我多少次都未遂的人就会扬扬得意了。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失望了。

我万分感谢我的手臂折伤这件事，因为这使我更加注意约束自己。我感觉比任何时候都好，我的生活更有规律并加强了锻炼。我还必须进行艰苦的练习来恢复膝盖，让髌骨能更好地活动。我做了努力，还要继续努力。我学会直到生命最后一秒也要坚持锻炼。我什么都会掉以轻心，我更有毅力吃应该吃的，不该吃的一口也不多吃。

当人做练习的时候，肯定要不断使臂上的肌肉越来越结实。我必须向多少人表示问候啊！成千上万，有些人到了并迫使您伸出胳膊。您不能免礼。您得像某些人那样，当您碰他们这儿的时候，他们挺起坚硬的肩膀让你们相信他很强壮，相信他钢铁般强壮。现在每当人们向我伸出手时，我就这么做。

拉：您总是随身带着武器，现在由于摔了这一跤，我想，您无法使用右臂，也不能使用您的武器了。这使您担心吗？

卡：因为美国中情局的那些家伙总是找事，企图暗杀或干别的勾当，可以想象我在任何时候都带着一件武器，并时刻准备使用它。我遵守这一原则。我带着一支有 15 发子弹的勃朗宁手枪。我这一生开过不少枪。我的枪法总是很准，这是个运气，我也一直保持着运气。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害怕敌人。当时我首先想证实的，是我的胳膊是否还有力气使用我一直使用的武器。枪总是不离身。我取下枪栓，装上子弹，放下保险，打开保险，取下枪栓，取出子弹，然后说：“我放心了。”这是第二天的事。我感觉有力量开枪。

在事故的第二天，他们就把我送到了医院，把我带出一个地方，又带到另一个地方，我也不反对，但心里很明白他们在对我做什么，因为他们必须与我商量手术方案。因为如果我确实感到没有力量做一件事，我就会召唤党组织并说：“你们看，我感到无能为力。”因此我批评了医生，因为他们把事情严重性缩小了一点。对胳膊我更愿意靠功能恢复。用打钉子及其他措施的手术处理更危险，对一个 20 岁或 25 岁的年轻人可以做这种手术。我说：“好吧，反正我也不会参加下一届棒球冠军赛，也不会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总之，必须采取正确的做法。

如果我觉得自己的状况无法承担工作，就会说：“我有这种情况，请某人承担领导的责任，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干不了。”如果我将死去，那就死吧。如果我不死，并恢复了功能，那我就再承担我的工作。如果情况证明我离开岗位更好、更有利，或者说我继续的话反而有害，那我就离开。总之，人是有点经验的。

那个时候我是在为这些事操心的。这里我们不去描写、讲述我们准备了什么措施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准备了一些措施，来应付突发情况。我们的人民应该准确地知道在每种情况下应该怎样做。让我们的敌人幻想破灭吧。如果我明天死去，我的影响会增长。有一次我曾说，我真死的那天，谁也不会相信。我会像勇士熙德（Cid Campeador）那样，人们把死去的他

抬上战马，使他继续赢得战斗。

拉：您几次在演讲和会谈中提起可能出现的继承问题，提起当您不再领导这个国家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您怎样看待一个没有菲德尔·卡斯特的古巴的未来？

卡：好，关于这个问题让我试试讲短点。我跟你讲过那些试图从肉体上消灭我的计划。开始，我的角色比较重要，因为要进行非常重要的思想斗争，必须进行很多说服工作。我跟你说过存在着偏见。那时存在着种族偏见，反社会主义偏见，那是多年来撒下的毒药。

拉：您是说很久以来您就在考虑他们暗杀您的可能性，您必须考虑可能发生的……

卡：您差不多就是在问我继承的问题。

拉：是的，我是在问继承问题。

卡：一开始，处于所有这些暗杀计划之中，我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而今天我并不具备这个决定性的作用。今天我也许具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的权威，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信任我。

我向您介绍过，我们研究所有的公众舆论。我们仔细、认真地跟踪公众舆论。比如说，我可以跟您说说首都的公众舆论，全国其他地方的公众舆论，我能向您介绍所有的意见，哪怕是反对的意见。绝大多数是有利于我们的意见。

在进行了四十六年的斗争并取得了经验之后，我的权威是比过去高。我们这些进行过斗争、打过仗、领导过推翻独裁政权，使国家获得独立的人是具有很高的权威。

还有一个特权：年龄。这是偶然性造成的影响。一个人可以由于自然原因死得很早，或者死于暗杀他的计划。但在我身上这两者都没有发生。

我积累起这么多经验并不是什么大功劳。如果有什么功劳的话，那就

是我始终如一地忠实于思想和原则，就是我没有因为手中的权力而骄傲，也没有受到滥用职权的诱惑，而人是很容易受这种诱惑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意识到如果暗杀发生在我身上将意味着什么，因此我提出了关于我的这个情况的问题，这也是自然的……别人觉得劳尔比我更激进，我承认他像我一样激进。只是因为他曾经在共青团组织工作，别人就觉得他比我更激进。我知道他们害怕，劳尔使他们担心。这是当时的一个具体情况。

第二，据我看，在替代我的作用方面，劳尔是相对最有权威、经验和能力的人选；我还会再次强调我的看法。我向您讲过他怎样在攻打蒙卡达兵营时被捕入狱，怎样改变了局势，怎样在第二阵线将分裂出去的纵队组织起来，作为军事和政治组织者，他的工作的确很出色。后来，他很好地完成了在军队里的使命。他善于教育、培养人才，处理事务很镇静、很严肃。至今他都是最有权威的人，人们很信任他。

在那个年代里，可以谈论什么人替代什么人的问题。当革命成功的时候，我32岁；当1959年1月1日革命成功之时，劳尔28岁，他的生日在6月，我们当时面临的日子都还长得很。

也曾有过数起针对他的暗杀，尽管主要矛头是对准我，这是由我的地位和所负的责任决定的。他是党的第二书记和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这些职务赋予他道德责任和权威性。

拉：在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消失的情况下，劳尔都将是无可争议的接替人？

卡：如果我明天出什么事的话，毫无疑问全国代表大会将开会并选举他，对这一点没有任何异议，政治局也将开会选举他。

但是，他在几年内就会赶上我，因此这更是一个代的问题。我们有幸拥有三代革命者。也不要忘记在我们之前的那些先行者，即人民社会党的老党员和领导人，那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与我们这些人一起产生了新的一代人。再以后，产生了在我们之后的一代人，以及紧接着他们

的那一代人，他们参加了扫盲运动，参加了反对罪恶团伙、经济封锁、恐怖主义的斗争，经历了吉隆滩战役、“十月危机”，履行过种种国际主义义务……许多人立了很多功。这一代人中还有很多人懂科学，懂技术，身为劳动英雄、知识分子、教师。这是又一代人。还要加上与这一代人有最密切关系的共青团员、大学生及社会工作者。他们与青年和大学生们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拉：也就是说，您认为比一个个人、比劳尔更重要的真正的接班人，是一代人，是现在的这一代人？

卡：是的，已经是一代人接替上一代人的问题。我有信心，我也一直这样说，但是我们也意识到存在着很多威胁这一革命进程的风险。存在着主观上的错误……有过错误，但是我们没有及时发现某些倾向和错误，这是我们的责任。今天已经克服了这些错误。

我跟您说过明天可能发生的情况；但现在已经是新一代人在接替了，因为我们这一代正在过去。我们中最年轻的——我已经提到了劳尔的例子——也仅仅比我年轻四五岁。

第一代仍然在与新的一代合作，新一代人遵从我们这些剩下来的少数人的权威。现在第二代人正在工作着，而第三、四代人也正在成长……我很清楚第四代人将会是什么样，看看那些六年级学生的讲演。我们发现了很多人！

我们发现了许多人才，这些孩子们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令人难忘。不知道人民中间还有多少人才，多少天才。我主张天才是群众性这一理论；不是在这方面有天才，就是在那方面有天才；有的在计算机方面，有的在音乐、机械方面；天才是很普遍的，有些人有做这个的天才，另一些人做那个的天才。要使我们的社会得到全面发展和教育，我们现在进行的工作正在于此，人们将会看到它的成果。这些人就是在经过若干年特殊阶段之后写下“我是社会主义者”的800万古巴人。

我充满了希望，因为我发现我称之为第四代的人，他们的知识水平高

出我们这第一代人大约三四倍，高出第二代人大约三倍。正在如此成长着的这第四代人，他们拥有的知识应当相当于第三代人的至少两倍半。

请注意我要对您说的话：将来到古巴来看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成果的人，要比到古巴海滩的人多。我们的国家已经在从事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业。像我们这样一个小国居然能够为联合国提供所需人员以便完成秘书长倡议的在非洲杜绝艾滋病的计划。今天，实施这样的计划已经缺少不了古巴医生。在欧洲和美国征集不到 1000 名医生开赴我们的医生正在工作的那些地方。我说征集不到 1000 名，那是在夸大，不知道他们能够征集到多少……我们向联合国提出派 4000 名医生，现在已经有 3000 多名在那里工作。这满足了一部分需要。这个被封锁的国家，这个经历了四十年封锁、十年特殊阶段的国家，创造了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不是通过在社会上鼓励个人主义、靠利己主义所能创造的。

拉：您在说这场革命没有衰萎？

卡：我们还远远没有结束革命，我们处在我们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在各方面更有希望的时代，您在各处都能觉出这一点。

这是真实的，具体的，我准备接受我们犯了一些错误的批评，理想主义的错误，也许我们太急于求成了，也许我们低估了习俗和其他一些因素的力量和分量。但是没有有一个国家顶住了这样强大的、富裕的对手，顶住了他们的宣传机器、他们的封锁，还要加上支撑点的迅速解体。苏联消失了，剩下了孤单的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动摇。是的，大部分人民与我们同甘共患难，我没有说全体人民，因为有一些人消沉了，但是我们成为这个国家所作所为的见证人，我们目睹她怎样坚持下来，怎样前进，怎样减少了失业，又怎样提高了觉悟。

不应该用选票数目来衡量我们的选举。我通过感情的深度，通过人们的热情来衡量我们的选举，我多年来一直感觉到它们的存在。我从未看见这样满怀希望、满怀骄傲的面容。拉莫内特，这一切都在增加。

拉：您认为接班已经不存在什么问题了吗？

卡：从目前看没有任何问题，以后也不会有问题。因为革命不是建立在考迪罗主义^①思想、也不是建立在个人崇拜基础之上的。考迪罗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与现代社会也水火不容，在考迪罗统治的社会里，群众的行动完全出于对首领的盲目信任，或者完全听命于首领的意图。革命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而我们捍卫的思想早已成为全体人民的思想。

拉：我看您对古巴革命的前途不担心。然而，近年来您目睹了苏联的倒台、南斯拉夫的倒台、阿尔巴尼亚革命的倒台、处于如此悲惨局面中的朝鲜、同样陷入恐怖局面的柬埔寨，还有中国，那里的革命的样式是非常不同的。您对这一切不感到难过吗？

卡：我认为，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本来可以自我解决问题、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国家，它的经验是非常苦涩的。您不要以为我们没有多次考虑这个难以置信的现象：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一个已经能够与另一个超级大国平起平坐的国家，一个打垮了法西斯的国家，就这样土崩瓦解了。

有些人曾认为可以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重大历史性错误之一。我不愿意谈这个话题，也不想做理论分析，但我有无数例证说明，那些自恃理论家的人，那些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的人，在很多事情上没有说准。

我有一次说过，我们在开始时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以为某人知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也多次犯这种错误。今天依我看，我们对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了很清醒的认识，但是关于如何维护社会主义，或者说如何在将来维护社会主义，我们还需要许多更清醒的认识，还需要给自己提出更多的问题。

中国是另一种问题，那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一个没有毁灭本民族历

① Caudillo，西班牙语军事独裁者，源自割据一方的军事首领一词。（中文编者注）

史的大国，一个坚持了某些基本原则的大国，她力求团结，没有使自己的力量四分五裂。

我不能当裁判这个问题的法官，但是我要说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当然，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需要越来越训练有素的、更有能力的领导人。正在四处浮现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适应了这个世界，我们正在适应它，我们会发现该怎样应对它。我们培养了团结的感情、革命的觉悟和能量巨大的价值观念。

因此我可以这样说——我将要说的至少值得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当像苏联那样的强大国家，当您提到的那些政权，还有那样多的事物毁灭之后，我们这个被封锁的国家，这个至今还没有完全走出特殊阶段的国家，却与第三世界分享自己的教育条件，帮助他们培养成千上万的大学专业人才——而且分文不收，同时自己也在各个领域里扎扎实实向前迈进。

我们将以人力资本为生。有了这个人力资本，我们可以帮助许多人，靠我们的经验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靠这个经验我们也可以自己帮助自己，拉莫内特。

我没有什么忧虑，因为我们已经做的就是观察再观察。我跟你说过有危险，注意！有时我发现有错误发生。如果不及时觉察的话……必须永远警惕着风险。必须做到基本有预见，思考再思考，但是要考虑各种可能性。养成习惯去寻找各种可能性并选择最好的可能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拉：但有些人的疑惑是：古巴的革命进程、社会主义进程也会垮台吗？

卡：问题在于，是革命注定要垮台呢，还是人能够使革命垮台？人或者社会能够阻止革命垮台吗？我经常这样自问。您想想我对您说的话：美国佬不可能破坏革命进程，因为我们拥有学会了使用武器的全国人民；尽管我们有错误，但我们的人民具有这样的文化、知识和觉悟水平，他们绝不会允许这个国家重新成为美国的一块殖民地。

但是这个国家能够自我毁灭，这场革命能够自我毁灭。是的，我们自己能够毁掉革命，如果发生这样的事，罪责将在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能力

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果我们不能终止许多恶习：许多偷盗，许多为新富提供金钱的来源；这些新富是从特殊时期里产生出来的，我们不应该允许自己再返回那个时期。

所以我们正在采取行动，我们正努力彻底改变我们的社会。应该再次改变这个社会，因为我们曾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当时出现了不平等、不公正。我们要在绝不滥用职权的情况下改变现状。今天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解决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我们将成为一个拥有综合整体文化的民族。马蒂曾说：“成为有知识的人是成为自由人的唯一途径”，没有知识，就不可能有自由，拉莫内特。

因此我也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持强烈的保留态度和批评态度。这是一种让人挨饿的制度。让人生活在欺骗中，生活在谎言中，传播利己主义，催生消费主义，这都是为了什么？人类如果连保障基本生存的能力都不具备，还要达到现在的生活水平干什么？

我们不能为我们的政治能力立一个塑像，正有无数危险在威胁着这个世界。我们先必须证明人类有能力生存下去。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是对人类的生存能力抱有希望的，因为我看见这个世界有所反应，我看见人类尽管犯了很多错误，尽管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很少的几千年，三四千年吧，但人类在一个世纪里使自己的知识成倍增长。当然，很多进步被用来播撒毒药，传播虚假思想，传播错误信息。

我试图分析我们在什么时候前进了，什么时候后退了，什么时候我们陷入陈规，什么时候我们流于抄袭。我们拥有些许好的素质，如不抄袭的习惯，对祖国的信任，反对沙文主义……没有优于其他国家的国家，没有优于其他民族的民族，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文化特点。您从拉丁美洲可以看出，我们是一些操同一语言，具有几乎同一文化、宗教和民族性的国家，我们都是混血人种。

在欧洲，芬兰人、匈牙利人，讲着这么难学的语言的人们，德国人、意大利人和其他所有人，正在联合起来，在这样一个互相打了五个世纪仗

的大陆上联合起来。是的，可以祝贺他们，尽管我持有上述批评标准，但仍为他们达到的团结水平祝贺他们。我要提醒的是，如果他们成功的话，将对世界有利。现在要观察的是，他们如何实现团结，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时代里，问题十分复杂，关于这个您知道得很清楚。

我要为您的关注表示感谢。您的关注对我也是很大的鼓舞，因为我也读了很多您的文章，您的书对我们是有用的，我们所希望的是您继续写下去，使我们受益，我们还有很多需要了解和学习的东西。您帮助我们建设一种综合整体文化。没有这样一种综合整体文化，如何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呢？没有这样一种文化，世界得不到拯救。

大部分我们正在发展的项目将成为被广泛推广的经验，对此我满怀希望。我们不渴求充当什么之父，也不追求专利权；正相反，如果有人受到我们的启示开创了有益的事业，我们将会感到自豪。

我们工作了很多小时，我工作得很愉快，几分钟后我们将告别。

拉：我想我占用了您的宝贵时间。

卡：哪里。我们以每天十七八个小时的量工作着，我们干得不错。这证明您状态很好，因为我觉得您工作得比我还多。

拉：我有兴趣听您说话。

卡：我对您的问题也有兴趣。对所有这些题目我与您一样有兴趣。我们的国家对任何关注、任何疑问、任何问题都敞开大门。我们绝不对人说一句谎言。

拉：谢谢您，司令。

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生平 和古巴革命的大事记

1926年8月13日

菲德尔·亚历杭德罗·卡斯特罗·鲁斯生于原奥连特省（现奥尔金省）马亚里市比兰镇的马纳卡斯庄园。

1928年6月14日

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生于阿根廷圣菲省的罗萨里奥市。他后来以昵称“切”闻名于世。

1929年10月24日

纽约股市发生大崩盘，史称“黑色星期四”，在美国引发深刻的经济危机，影响波及古巴，成千上万的古巴工人失业。

1930年9月

幼小的菲德尔在比兰镇公立小学开始读书。

1932年底

菲德尔·卡斯特罗被父母送到古巴圣地亚哥市，寄宿家境贫寒的欧弗拉西娅·费利乌女教师家。

1933年1月30日

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执政（被任命为总理——中文编者注）。

1933年8月12日

一场罢工推翻了古巴独裁者赫拉尔多·马查多，产生临时政府。

1933年9月4日

一场所谓的“士官生起义”推翻了临时政府。其首领之一是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拉蒙·格劳·圣马丁上台执政。

1934年1月14日

陆军参谋长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发动政变，推翻拉蒙·格劳·圣马丁总统。自此，巴蒂斯塔与美国合谋，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控制古巴公共生活达10年之久。最初，他先后扶植卡洛斯·门迭塔（1934—1935）、何塞·阿·巴尔内特（1935—1936）、米格尔·马里亚诺·戈麦斯（1936）和费德里科·拉雷多·布劳（1936—1940）做傀儡政府。后来，自己登上总统宝座（1940—1944）。

1935年1月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圣地亚哥接受洗礼，进入该市的拉萨列的天主教会学校，开始小学一年级第二学期学习。

1934年5月29日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实行“睦邻”政策，废除“普拉特修正案”。1901年，美国把“普拉特修正案”强加于新生的古巴共和国，根据该法案，它可以任意对古巴进行干预。

1934年10月18日

在中国，毛泽东领导十余万工农红军进行万里长征，向延安进发。最后，仅有两万人生存下来。

1935年10月3日

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入侵阿比西尼亚，即现今的埃塞俄比亚。

1936年7月18日至1939年4月1日

西班牙内战爆发，共和国受到攻击，最终被由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所支持的民族主义武装推翻。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建立独裁统治。

1939年8月23日

德国与苏联在莫斯科签署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史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

1939年9月1日

德国第三帝国的军队入侵波兰，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与苏联瓜分波兰。

1939年9月

菲德尔·卡斯特罗进入由天主教耶稣教会开办的古巴圣地亚哥市多洛雷斯学校学习。

1941年6月22日

德国入侵苏联。

1942年9月

菲德尔·卡斯特罗进入哈瓦那著名的贝伦学校读中学。该校也是由耶稣会开办的。

1944年10月10日

古巴革命党（“真正党”）党人拉蒙·格劳·圣马丁再次上台执政。民众对他充满希望，但是很快因其政府的极端腐败而陷入失望。

1945年5月8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德国战败。

1945年6月

菲德尔·卡斯特罗结束在贝伦学校的中学学业，获得中学文科毕业证书。

1945年6月26日

50个国家的代表，其中包括古巴，在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

1945年8月6日

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第一颗原子弹，造成十万多人丧生。8月9日在

长崎再次投下原子弹。由此，开始了核时代。

1945年9月2日

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太地区结束。

1945年9月4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考入哈瓦那大学法律和社会科学系。

1946年3月5日

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的富尔顿发表反对苏联的演说，提出割裂欧洲的“铁幕”。由此，开始了“冷战”。

1946年3月14日

美国总统哈利·杜鲁门提出“遏制”共产主义的学说。

1947年7—9月

菲德尔·卡斯特罗参加讨伐多米尼加共和国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将军独裁统治的孔菲特斯岛远征的筹备工作。后来，这次远征遭遇失败。

1948年3月31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出访拉美几个国家，参加一次学生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到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

1948年4月9日

哥伦比亚民众领袖、自由派人士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惨遭杀害，激发民众起义，史称“波哥大事件”。菲德尔·卡斯特罗参加了“波哥大事件”的活动。

1948年10月10日

古巴革命党人卡洛斯·普里奥斯·索卡拉斯上台执政，进一步使“真正党”政府威信扫地。后来，他于1952年3月10日被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将军推翻。

1948年10月12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与米尔塔·迪亚斯·巴拉特结婚。她出身于在政界很有影响的富有家庭。两人赴纽约度蜜月。1955年离婚。

1949年4月4日

《北大西洋公约》问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宣布成立。

1949年9月1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第一个儿子菲德尔·卡斯特罗·迪亚斯·巴拉特出生，昵称“小菲德尔”。

1949年10月1日

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2月14日

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条约。

1950年6月

菲德尔·卡斯特罗结束大学学习，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和律师证书。

1950年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

1951年4月

伊朗总理摩萨台对本国石油实行国有化。

1951年8月16日

爱德华多·奇瓦斯不治身亡。8月5日，当他结束电台采访节目后拔枪朝自己腹部开了一枪，身受重伤。奇瓦斯于1947年创建古巴人民党（正统党）。菲德尔·卡斯特罗与该党有政治联系。

1952年3月10日

在大选前3个月，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将军发动第二次政变，推翻了当时执政的总统卡洛斯·普里奥斯·索卡拉斯。根据预测，人民党（正统党）候选人有望在大选中胜出。巴蒂斯塔建立了反动独裁和亲美政权。

1952年4月9日

玻利维亚发生社会革命，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没收了矿山和大地产，一直执政到1964年。

1953年3月5日

约瑟夫·斯大林在莫斯科病逝。

1953年7月26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 165 名青年人企图攻打和占领古巴圣地亚哥市的蒙卡达兵营，计划以此引发一场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人民起义运动。但是由于意外原因，行动失败。

1953年7月27日

朝鲜战争结束，朝鲜半岛分裂成两部分：与苏联和中国结盟的共产主义的北部和受美国影响的南部。

1953年8月1日

在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转入山区，力图坚持武装斗争，在遭遇一支军事巡逻队突袭后被捕。

1953年9月3日

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当选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

1953年10月16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对他的审判中进行自我辩护，发表了著名的自我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揭露了迫害攻打蒙卡达兵营者的罪行和巴蒂斯塔政权的非法性，为推翻该政权的暴力行动进行辩护，阐述了他的政治革命纲领。他被判处 15 年徒刑。

1954年5月7日

法国殖民军在奠边府受到越南武元甲将军领导的革命力量的沉重打击。这成为殖民地人民觉醒的历史性事件。

1954年6月17日

在危地马拉，一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的雇佣军推翻了哈科沃·阿本斯的立宪政府。阿本斯颁布了法令，进行重要的土地改革。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

1954年8月24日

在巴西，热图利奥·瓦加斯总统被一场军事政变推翻，自杀于总统府。他实行了石油国有化和重要的社会改革。

1954年11月1日

阿尔及利亚开始争取独立的战争。

1954年11月27日

来自尼加拉瓜的势力入侵哥斯达黎加。大学生联合会主席何塞·安东尼奥·埃切韦里亚领导一群古巴青年声援何塞·菲格雷斯政府。

1955年4月18—24日

万隆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印度的尼赫鲁、中国的周恩来、埃及的纳赛尔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产生了第三世界。

1955年5月14日

华沙条约签署，这是由苏联控制的军事同盟，旨在抗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955年5月15日

被关押在松树岛（现青年岛）监狱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战友们获释。在民众的强大压力下，巴蒂斯塔被迫颁布大赦令。

1955年6月12日

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七二六运动”正式成立，为秘密组织，并组成第一届全国领导班子。

1955年7月7日

由于无法以合法方式继续进行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菲德尔·卡斯特罗流亡墨西哥，在那里组织人民武装起义军。

1955年7月

在墨西哥，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埃内斯托·切·格瓦拉首次会面。

1956年2月14日

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发表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下令进行的党内大清洗及其镇压政策。中国不赞同赫鲁晓夫的做法。

1956年10月28日

卡斯特罗的父亲安赫尔·卡斯特罗·阿希斯在比兰镇去世。

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13日

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发生暴动，苏联出兵进行干预。

1956年11月25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他的兄弟劳尔、切·格瓦拉和其他79名远征战士乘“格拉玛号”游艇，自墨西哥图斯潘港口向古巴进发，力图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开始武装斗争。

1956年11月30日

弗兰克·派斯领导的“七二六运动”的武装力量在圣地亚哥发动起义。行动实际上失败了，但是却拉开了人民武装起义、反对巴蒂斯塔暴政的帷幕。

1956年12月2日

“格拉玛号”游艇的82位远征勇士在古巴东部海岸的洛斯卡尤埃洛斯，靠近拉斯科罗拉达斯海滩（“红滩”）一带登陆，开始古巴革命战争。

1956年12月5日

在阿莱格里亚德皮奥，远征军在营地受到巴蒂斯塔军队的突袭，被完全打散。

1956年12月18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和其他6名幸存的远征军战士在辛科帕尔玛斯会合。两天后，胡安·阿尔梅达、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拉米罗·巴尔德斯及其他4名远征军战士同他们会合。

1957年1月17日

在新的幸存远征战士和农民加入后，游击队获得第一次出击胜利，攻克了拉普拉塔阿巴霍兵营。5天后在洛尼亚诺斯德尔因菲耶诺，弱小的游击队再次成功出击，击溃了安赫尔·桑切斯·莫斯克拉中尉率领的一股敌人精兵。

1957年2月17日

美国著名的《纽约时报》社论版记者赫伯特·马特乌斯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采访菲德尔·卡斯特罗。当天，“七二六运动”全国领导机构召开

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会议。叛徒欧蒂米奥·格拉被俘获并判处死刑。

1957年5月28日

游击队在埃尔乌维罗攻打并攻克敌人兵营。切·格瓦拉称这场战役标志着“起义军已经成熟”。几个星期后，卡斯特罗任命切为司令（少校），负责领导他的游击纵队。这是起义军建立以来成立的第一支纵队。

1957年8月20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何塞·马蒂”第一纵队进行了帕尔玛莫恰战役。

1957年9月17日

起义军进行了皮诺德尔阿瓜的第一场战役。

1957年10月

起义军消灭了出没于马埃斯特腊山加拉加斯地区的各路土匪武装。

1957年11—12月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分别领导第一和第四纵队在马埃斯特腊山的莫塔、加比罗、埃尔萨尔托、马尔威尔德等地展开战斗，粉碎了敌军发动的“冬季攻势”。

1958年2月16—17日

起义军赢得皮诺德尔阿瓜第二次战役的重大胜利。

1958年3月1日

起义军司令劳尔·卡斯特罗和胡安·阿尔梅达领导的新建的起义军纵队离开马埃斯特腊山，开赴奥连特省的其他山区。后来，在那里组成了第一阵线和第二阵线。

1958年4月9日

由“七二六运动”发起的全国总罢工遭遇失败。

1958年5月25日

巴蒂斯塔军队向起义军发动大规模攻势。起义军经过74天激战，击溃了敌军。其间，进行了马埃斯特腊山区最重要的几次战役，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希圭战役、圣多明各战役和拉斯梅塞德斯战役。粉碎敌人这次攻势意味着战争发生决定性的战略转折。

1958年8月底

切·格瓦拉和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率领两个纵队向古巴中部和西部几个省份发起攻势。此后10月，在中部的拉斯维加斯省开辟了新的战线。

1958年11月15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离开马埃斯特腊山，向古巴圣地亚哥进发，领导起义军发动总攻。

1958年11月30日

吉萨战役结束。这次重要战役打开了向圣地亚哥进发的通道。

1959年1月1日

在兵败如山倒的形势下，独裁者巴蒂斯塔逃离古巴。起义军夺取政权。菲德尔·卡斯特罗进入圣地亚哥。

1959年1月8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胜利进入哈瓦那，由大法官曼努埃尔·乌鲁蒂亚领导的革命政府正式宣告组成，何塞·米罗·卡多纳律师出任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任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

1959年2月16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任革命政府总理。

1959年4月15—27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应美国报刊主编协会邀请出访美国。19日与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进行会晤。

1959年5月17日

为了落实蒙卡达纲领，政府颁布了土改法。

1959年10月21日

来自美国的两架飞机扫射哈瓦那街头，造成2人死亡、50人受伤。

1959年10月28日

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司令在粉碎卡马圭地区的一场反革命阴谋后返回哈瓦那的途中，因飞机在海上失事遇难。

1959年10月底

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批准由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制定的一项计划，开始对古巴暗中采取行动，包括空中和海上的海盗攻击，怂恿和直接支持古巴国内的反革命组织。

1959年12月11日

美国总统批准中央情报局一项针对古巴的行动计划，其目标是“在一年之内推翻卡斯特罗，建立一个亲美领导机构来代替他”，还包括“发动地下电台攻势”，对古巴电台和电视台实施干扰，支持“亲美反对派集团”，由他们“以武力方式在古巴建立一个控制区”，暗杀卡斯特罗等。

1960年2月

苏联副总理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访问古巴。苏联向古巴提供1亿美元贷款，并签署购糖和出售石油协定。

1960年2—3月

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德波伏瓦访问古巴，会见菲德尔·卡斯特罗。

1960年3月4日

法国装载军事物资的蒸汽船“拉库布雷号”在哈瓦那港爆炸，成为破坏阴谋的牺牲品。101人死亡（其中有6位法国水手），二百多人受伤。

1960年5月8日

古巴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1952年巴蒂斯塔曾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

1960年6月29日

当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壳牌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拒绝加工苏联石油时，古巴将这些公司的炼油厂收归国有。

1960年7月6日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法律，停止购买古巴蔗糖。这是美国对古巴经济战争中采取的首次重要行动。

1960年7月

苏联决定从中国撤出专家，并停止对其提供援助。中苏之间发生冲突。

1960年8月6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对美国石油冶炼厂、糖厂、电力公司和电话公司实行国有化。

1960年9月2日

第一个哈瓦那宣言问世。在革命广场举行的大规模群众集会上发表的第一个哈瓦那宣言宣布：“古巴人民全国大会谴责人对人的剥削，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对欠发达国家的剥削。”

1960年9月9日

至少9次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的阴谋被破获。

1960年9月26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铲除剥夺哲学，也将消除战争哲学。”根据吉尼斯纪录大全，这是在联合国讲坛上国家领导人发表的最长的演说，历时4小时29分钟。在纽约，卡斯特罗下榻哈莱姆区的一个饭店，在那里会见了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度总理尼赫鲁、美国黑人领袖马尔科姆·X和苏联总理赫鲁晓夫。这是他与赫鲁晓夫首次会面。

1960年9月28日

保卫革命委员会成立。

1960年10月14日

古巴革命政府批准城市改革法。

1960年10月30日

除了食品和药品，华盛顿禁止向古巴出口一切其他商品。

1960年11月

反革命者开始实行“彼得潘行动”，大肆宣传，诽谤古巴政府将剥夺赴美国的流亡者的父母权利，导致1.4万古巴儿童迁移美国。

1960年12月16日

艾森豪威尔总统完全停止进口古巴蔗糖。

1961年1月3日

美国断绝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关闭驻古巴大使馆。

1961年1月11日

古巴在全国开始进行扫盲运动。

1961年3月13日

一群海盗登陆，袭击古巴圣地亚哥市的“迪亚斯兄弟”炼油厂，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这是美国所怂恿的加强破坏和暗杀行动的恐怖主义计划的组成部分。

1961年3月13日

在华盛顿，肯尼迪总统建议与拉美国家建立争取进步联盟，对抗古巴革命。

1961年4月13日

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破坏并放火烧毁哈瓦那最大的商场“埃尔恩坎托”，造成一人死亡，商场完全被毁。

1961年4月15日

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哥伦比亚和古巴圣地亚哥等地机场遭到轰炸。飞机悬挂假造的古巴标志，实际上是从中央情报局在中美洲的基地起飞，由古巴和美国雇佣兵驾驶的。空袭造成8人死亡。

1961年4月16日

在前日空袭遇难者安葬仪式上，菲德尔·卡斯特罗警告说，这是入侵行动的前奏，宣布古巴革命为社会主义性质：“这是贫苦大众的、由贫苦大众发动的、为了贫苦大众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

1961年4月17日

由中央情报局训练和武装的1500名古巴反革命分子在猪湾的吉隆滩和长滩登陆。在不到72小时时间内被击溃，1200人被俘。在这3天中，美国海军舰队负载雄厚兵力，待命于猪湾附近海域，随时准备进行干预。

1961年5月28日

比那尔德里奥的“里耶格”电影院在上演儿童节目时遭受恐怖主义炸

弹袭击，几十人受伤。

1961年6月30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表“告知识分子书”，他指出：“与革命站在一起就拥有一切，反对革命就没有一切。”

1961年7月

“七二六运动”、布拉斯·罗加领导的人民社会党和福雷·乔蒙领导的“三一三”革命学生指导委员会合并，成立革命统一组织。人民社会党原领导人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任革命统一组织总书记。

1961年7月17日

刚果的帕特里斯·卢蒙巴遭暗杀。

1961年8月12日至11月20日

修建柏林墙。

1961年12月22日

全国扫盲运动成功结束，古巴宣布成为“无文盲国土”。

1962年1月22日

在美国的要求下，美洲国家组织开除古巴。

1962年2月3日

肯尼迪总统命令，对古巴实行全面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这一封锁延续至今，一直力图在经济方面扼杀古巴和激起民愤。

1962年2月4日

第二个哈瓦那宣言问世。聚集在哈瓦那革命广场的一百多万古巴民众批准了第二个哈瓦那宣言，宣言指出，“所有革命者的义务是进行革命。”

1962年2月7日

华盛顿禁止进口任何古巴产品。

1962年3月12日

革命政府第1015号法律规定，根据国家能够支配的食品公平分配家庭所需基本食品。采取凭本供应制度。

1962年3月13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公开揭露革命统一组织内部存在宗派主义。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被免去职务。

1962年3月14日

肯尼迪政府批准一项内容广泛的秘密行动计划，“旨在帮助古巴推翻共产主义政权”。这一“肮脏战争计划”后来被称为“獾计划”。

1962年3月26日

革命统一组织改名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

1962年7月5日

阿尔及利亚结束战争，获得独立。

1962年10月22日

“十月危机”爆发。肯尼迪总统命令海上封锁古巴，迫使苏联撤回核导弹。在苏联要求下，古巴同意秘密部署这些武器，以便挫败美国直接入侵古巴的新计划。莫斯科在未同古巴（古巴未曾同意采取秘密行动）商量的情况下，几天后答应撤出这些导弹。肯尼迪私下承诺不侵略古巴。

1962年12月23日

美国“非洲舵手”号商船抵达哈瓦那港，运送古巴要求的部分物资。这些物资是猪湾入侵所造成的财产和生命损失的实物赔偿。被俘虏并经古巴法庭审判的入侵者被遣返回美国。

1963年4月27日至6月3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首次访问苏联。

1963年8月6日

菲德尔的母亲莉娜·鲁斯·冈萨雷斯去世。

1963年10月4日

“弗洛拉”飓风横扫古巴岛屿，造成极大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革命是比大自然更强大的力量。”

1963年10月

在阿尔及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本·贝拉的请求下，古巴向阿尔及利亚

派遣 22 辆坦克和几百名士兵。部队由埃菲赫尼奥·阿梅赫拉斯司令率领，帮助阿尔及利亚反击摩洛哥对廷杜弗地区的入侵。这是古巴首次在非洲进行国际主义军事合作。

1963 年 11 月 22 日

美国肯尼迪总统在得克萨斯的达拉斯市遭受暗杀。肯尼迪当时正在探讨与古巴接近的可能性。

1964 年 4 月 1 日

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巴西改革派总统若奥·古拉特。他刚刚把私人石油炼油厂收归国有。

1964 年 10 月 14 日

在莫斯科，赫鲁晓夫被免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当选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

1965 年 2 月 22—27 日

阿尔及尔亚非会议召开，切·格瓦拉在会议上发表讲话。

1965 年 4 月在后来于当年 10 月公开发表的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信中，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正式向古巴告别，秘密赴非洲支持刚果的游击队。他说：“世界其他地方召唤我去贡献我微薄的努力。”

1965 年 4 月 28 日

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多米尼加共和国，镇压由弗朗西斯科·卡马尼奥上校领导的护宪力量。他支持改革派胡安·博什总统重新即位。美国总统约翰逊声称：“我们决不允许在加勒比地区出现第二个古巴。”

1965 年 10 月 3 日

古巴共产党成立。菲德尔·卡斯特罗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在古共成立大会上，菲德尔·卡斯特罗说明了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缺席的原由，并宣读了他的告别信。

1965 年 10 月

发生第一次移民危机。卡马里奥卡港被开辟为专用港口，为那些希望离开古巴的人迁移美国提供条件。

1966年1月

在哈瓦那召开三大洲会议。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七十多个国家的解放运动组织参加了这次会议。

1966年5月16日

在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

1966年11月2日

美国国会通过古巴修正案，该法律规定为那些通过非法途径进入美国的古巴人提供特殊便利。它促进了非法移民，造成无数人丧身大海。该法律至今仍有效。

1967年10月9日

切·格瓦拉在战斗中被玻利维亚军队逮捕后惨遭杀害。当时，他在该国领导游击运动。

1968年1月

以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为首的“亲苏宗派小集团”的35名成员被判刑。

1968年3月

除小农地产外，古巴政府实际上征收了国内所有的私人生意。

1968年5月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大学生反抗运动爆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成千上万的青年人——通常手持切·格瓦拉的画像，要求政治变革和改变生活方式。

1968年8月21日

在苏联的倡议下，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干预捷克斯洛伐克。菲德尔·卡斯特罗在8月23日的一次讲话中，在略有保留的情况下同意这一干预。

1970年5月18日

古巴宣布，当年未实现生产一千万吨蔗糖的目标。

1971年10月25日

在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7月秘密访问北京后，联合国驱逐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安理会 5 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1971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4 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访问由人民团结阵线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执政的智利。

1972 年 2 月 21 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并会见毛泽东。

1972 年 5 月 22 日

尼克松总统访问莫斯科并会见勃列日涅夫。双方签署相互限制核武器协定。

1972 年 7 月

古巴加入经互会，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市场。

1973 年 1 月

越南北方与南方签署巴黎协定。自 1969 年 6 月开始从越南撤军的美国承诺不进行军事干预。

1973 年 9 月 5—10 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参加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

1973 年 9 月 11 日

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遇害。受到美国支持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建立残暴的独裁政权。

1974 年 4 月 25 日

葡萄牙发生康乃馨革命，独裁政权倒台。

1974 年 8 月 8 日

在华盛顿，水门事件丑闻导致尼克松总统宣布辞职。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接任总统职务。

1974 年 11 月

古巴与美国官员举行谈判，寻找解决移民危机的办法。

1975 年 4 月

美国人仓皇撤出西贡。越南战争以越南人的胜利宣告结束。

1975年4月17日

在柬埔寨，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对城市居民和少数民族开始采取灭绝政策。

1975年4月30日

越南爱国武装力量进入西贡。后来该城更名为胡志明市。

1975年6月25日

在康乃馨革命后产生的葡萄牙政府宣布承认安哥拉独立。

1975年11月11日

卡洛塔行动付诸实施。古巴建立空中运输线，向安哥拉运送几千名志愿军战士，阻止了南非和扎伊尔军队向罗安达推进。南非和扎伊尔军队的目的是阻挠安哥拉独立。

1975年11月20日

西班牙佛朗哥将军去世。胡安·卡洛斯二世登基。

1976年2月15日

在全国公民投票中，古巴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以压倒多数票获得批准。

1976年9月9日

毛泽东在北京逝世。

1976年10月6日

古巴一架客机在巴巴多斯附近海域上空爆炸，成为破坏活动的牺牲品。机上73人遇难。委内瑞拉和巴巴多斯当局根据通话记录确定，此事系古巴裔的恐怖主义分子博什和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所为。两人被逮捕。

1977年2月11日

在埃塞俄比亚，陆军上校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上台执政。

1977年9月1日

在吉米·卡特总统任期，美国与古巴相互在对方首都设立外交机构（“照管利益办事处”）。

1978年3月

由于古巴军队的参与，埃塞俄比亚取得反击索马里侵略的奥加登战役

的胜利。

1978年7月28日

第十一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联欢节在哈瓦那开幕。

1978年10月16日

在罗马教廷，波兰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当选天主教教皇，成为约翰·保罗二世。

1978年12月24日

越南军队入侵由红色高棉政府统治的柬埔寨，并于1979年1月7日占领金边。

1979年1月16日

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国王里萨·巴列维被推翻。伊朗精神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于2月1日回到德黑兰。

1979年7月19日

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获得胜利。

1979年9月3—9日

第六届不结盟国家运动首脑会议在哈瓦那召开。菲德尔·卡斯特罗任该运动主席。

1979年12月27日

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

1980年4月

爆发第二次移民危机。在古巴政府宣布允许那些希望离开古巴的人出走后，马列尔港开辟为海路通道。截至9月底，大约12.5万人离开古巴。

1980年5月4日

铁托元帅在贝尔格莱德逝世。

1980年7月18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尼加拉瓜的马那瓜参加桑地诺阵线胜利一周年纪念活动。他承诺帮助桑地诺政府进行打击美国支持的“反政府武装”的战争。

1980年8月14日

波兰格但斯克造船厂发生罢工。由此引起的动荡波及全国。政府与莱赫·瓦文萨领导的工人团结工会签署协议。

1980年9月11日

古巴外交官费利克斯·加西亚在纽约遭恐怖主义组织“欧米加-7”成员的暗杀身亡。

1981年6月

在中国，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被免去党内职务，改革派邓小平获得实际权力。

1981年10月18日

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当选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

1981年10月22日

墨西哥坎昆南北首脑会议召开，22个国家的首脑承诺，穷国与富国之间开始进行全球性谈判。华盛顿施加压力，阻挠古巴参加会议，尽管古巴是77国集团的主席国。

1982年4月2日至6月13日

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爆发。英国军队收回被阿根廷诉诸主权的群岛。

1982年10月18日

在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斡旋下，所谓的诗人阿曼多·巴利亚达雷斯在因恐怖主义活动被判刑并羁押22年后在哈瓦那获释。巴利亚达雷斯是假装身体失去能力提出请求的。

1983年10月25日

在格林纳达总理莫里斯·毕晓普遇害后，美国对该国进行军事干预。在该国进行合作项目的古巴民工抵抗侵略，一些人在战斗中牺牲或遇害。600名古巴人被捕，后被交还古巴。

1984年2月16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访问莫斯科回国途中，首次在西班牙进行短暂逗留。他在蒙克洛亚宫与政府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进行了会晤。

1984年12月

古巴和美国签署第一个移民协定。

1985年3月11日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上台执政，开始质疑国家政治和经济的运转，宣布进行“开放”和“改革”。

1985年8月3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参加在哈瓦那举行的一次关于外债问题的国际会议。外债问题是古巴反对穷国债务斗争的组成部分——“难道压迫者欠下的债务要由被压迫者偿还吗？”

1986年2月

菲德尔·卡斯特罗再次出访苏联，亲切会晤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986年4月19日

古巴开始进行纠偏运动。菲德尔·卡斯特罗揭露了在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错误，如经济主义、官僚主义、自私自利和腐败等问题。

1986年4月25日

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古巴向受事故影响的几千名儿童恢复健康提供重要帮助。

1986年11月

西班牙政府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对古巴进行国事访问。

1988年7月26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拒绝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称之为“是危险的”，“是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违背的”。

1989年4月3日

戈尔巴乔夫访问古巴。

1989年6月

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与邓小平进行会晤。苏联与中国结束争执。发生天安门事件。

1989年6月14日

开始对阿纳尔多·奥乔亚将军、安东尼奥·德拉瓜尔迪亚上校以及国家武装力量和安全部门的其他高级官员进行审判。他们参与了贩毒行动。奥乔亚、德拉瓜尔迪亚和另外两名官员被判处死刑，7月13日被执行枪决。

1989年7月26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尽管将来某一天苏联不复存在了，但古巴革命将继续坚持下去。

1989年11月9日

柏林墙倒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政府相继倒台。

1989年12月20日

罗马尼亚爆发民众起义，政府倒台，几天后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被枪决。

1989年12月20日

美国对巴拿马进行血腥军事干预。巴拿马政府首脑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将军被推翻并被羁押。

1990年4月

桑地诺阵线在总统大选中失利。桑地诺革命结束。

1991年5月25日

在安哥拉签署和平协定后，最后一批古巴军队撤离。如果没有古巴的军事干预，面对南非军队的入侵，罗安达政府无法维持政权。南非军队遭遇失败有利于纳米比亚的独立，加快了种族歧视政权的衰败。

1991年9月11日

戈尔巴乔夫宣布7000名苏联军人从古巴撤出。

1991年12月

苏联倒台，就此结束了该国与古巴的经贸关系。在此后的3年中，古巴经济下降了35%。

1992年1月1日

古巴开始“特殊时期”的第一年。世界上很多人预测古巴革命必将倒台。

1992年6月

菲德尔·卡斯特罗参加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首脑会议。

1992年7月

菲德尔·卡斯特罗参加在马德里召开的第二届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应加利西亚自治区政府主席曼努埃尔·弗拉加的邀请，卡斯特罗访问加利西亚，专访了其父亲的故乡鲁戈省的兰卡拉村。

1992年10月

美国国会通过“托里切利法”，强化美国对古巴的贸易和经济封锁。

1993年2月24日

古巴第一次采取直选方式选举立法机构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601名代表。共产党未提出官方名单。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圣地亚哥当选代表，并被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批准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

1993年7月27日

古巴决定允许开设农牧产品市场，允许个体劳动，建立农民自留地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农民可以将自己的部分产品投放自由市场。另外，还取消了使用美元的禁令，允许公民接收国外汇款，促进旅游业发展，自9月允许小规模私人交易。

1993年11月22日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古巴。

1994年5月

菲德尔·卡斯特罗参加南非纳尔逊·曼德拉总统的就职仪式。

1994年7月13日

由于迈阿密反古电台的蛊惑，哈瓦那发生骚乱。菲德尔·卡斯特罗亲自赶到现场，平息参加骚乱的人群。

1994年8月11日

由于美国未系统地履行两国签署的移民协定，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将不阻止希望出走的古巴人离开本国。几千名“筏民”下海，力图去美国。

1994年9月9日

在纽约，两国签署了新的移民协定。美国允诺每年发放的签证不少于两万个，向古巴遣返所有在海上被拦截的人，以便排队等候离境。

1994年12月14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机场以特殊礼节欢迎委内瑞拉伞兵部队乌戈·查韦斯中校。8个月前他从亚雷监狱获释。1992年，查韦斯因参与反对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政府的暴动而被捕入狱。

1996年2月24日

古巴战斗机击落两架由“拯救兄弟会”反革命组织成员驾驶的小型飞机。他们多次侵犯古巴领空。

1996年3月5日

美国国会投票通过“赫尔姆斯—伯顿法”，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威胁惩罚所有向古巴投资的外国公司，制裁那些使用被古巴实施国有化的美国人的财产的外国公司。12日克林顿总统批准了这一法律。

1997年4—9月

在哈瓦那和巴拉德罗的几家饭店发生炸弹袭击事件。这些行动是由迈阿密恐怖主义组织进行的。在其中的一次事件中，意大利青年游客法比奥·迪·塞尔默被炸身亡。

1997年9月10日

萨尔瓦多公民劳尔·克鲁斯·莱昂在哈瓦那被捕，他承认参与了6次炸弹袭击饭店的行动，承认迈阿密古巴流亡分子曾许诺每次袭击行动给他4500美元报酬。明显证据证明，古巴裔恐怖主义分子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参与组织了这些袭击活动。

1997年10月

古巴共产党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菲德尔·卡斯特罗当选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当选第二书记。

1997年10月17日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遗骨安葬仪式在圣克拉拉纪念堂举行。菲德

尔·卡斯特罗在悼词中赞扬道：“哪里有正义事业需要捍卫，哪里就有你，你是世界所有穷人的先知。”

1998年1月21—25日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古巴。

1998年5月6日

在华盛顿白宫办公室，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向克林顿总统转交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信函。在这封信中，菲德尔向克林顿通报了古巴反革命分子在该国从事针对一些场所和飞机的恐怖主义行动。

1998年7月12日

在与《纽约时报》记者的一次谈话中，古巴裔恐怖主义分子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承认曾于1997年组织袭击旅游设施的行动，这些行动是由豪尔赫·马斯·卡诺萨和美古全国基金会资助的。还承认曾向萨尔瓦多人劳尔·克鲁斯·莱昂支付在饭店安置炸弹的报酬。

1998年8月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一次偶然机会破获了一起由古巴流亡者实施的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阴谋。当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参加第八次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

1998年9月

5名古巴特工在迈阿密被捕。他们打入古巴裔恐怖主义分子的组织内部，从事反对针对古巴的恐怖主义活动的任务。

1998年12月6日

在委内瑞拉，乌戈·查韦斯以56.5%的得票率当选国家总统。

1999年1月17日

乌戈·查韦斯首次作为国家元首访问古巴。

1999年11月14—16日

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二世在参加第九次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时访问古巴。

1999年11月25日

古巴儿童埃连·冈萨雷斯在佛罗里达海岸附近海域获救。当时其母与其他10名古巴人力图渡海进入美国，遇难身亡。迫于迈阿密反古团体的压力，美国当局允许该儿童滞留该城市，尽管他的父亲要求将孩子送回古巴。古巴开始进行要求送回埃连的伟大斗争。

1999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

世贸组织在美国西雅图召开各国首脑会议。大规模抗议活动爆发，形成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国际运动。

2000年6月28日

迈阿密反古的反革命团体的极端阶层阻挠儿童埃连·冈萨雷斯回国的种种企图破产，埃连在其父亲的陪同下回到古巴。

2000年9月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千年首脑会议。在会上，卡斯特罗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短暂会面，双方握手、寒暄。这是五十年来美国总统首次直接与卡斯特罗谈话。

2000年10月26—30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委内瑞拉进行国事访问。在加拉加斯，受到英雄般的接待。

2000年10月30日

古巴与委内瑞拉签署协定。根据该协定，加拉加斯以优惠价格和便利支付条件，每天向古巴提供5.3万桶石油（当时，古巴每天消费15万桶石油，其中，仅能自产7.5万桶）。古巴方面则向对方供应药品和医疗器械，并在委内瑞拉建立一所疫苗生产中心。当时已有1.5万名古巴医生、口腔科专家、眼科医生和卫生技术人员在委内瑞拉执行宏大的“深入社区”计划，旨在向2500万低收入人口中的1700万人提供医疗卫生保障。另外，几千名古巴教师正在该国参与扫盲任务，几千名体育教练在该国任教。

2000年11月

古巴情报部门破获一起由恐怖主义分子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策

划的阴谋。他密谋在巴拿马召开的第十次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期间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波萨达和其他恐怖主义分子被巴拿马当局逮捕。

2000年12月13—17日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访问古巴。

2001年1月25—30日

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召开第一次世界社会论坛，其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来自全世界各地的3万多名青年人聚集一堂，提出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选择，形成世界替代选择运动。

2001年6月23日

在哈瓦那市科托罗区的一次公众集会上，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通过电视台直播、发表了3个小时的讲话后，发生短暂晕厥。晕厥仅持续了几分钟，因天气炎热和阳光过度。8个小时后，菲德尔再次出现在电视节目中，讲述事情的经过。

2001年8月11—13日

值菲德尔·卡斯特罗75岁寿辰，他再度访问委内瑞拉，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市，受到查韦斯总统的盛情款待。

2001年9月11日

发生袭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大厦和华盛顿五角大楼事件，死亡近3000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强烈谴责这一行动，向死者致以哀悼，表示向美国当局提供地勤帮助（使用古巴机场的便利）。他宣布永不停止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

2002年1月7日

华盛顿通报古巴，有意在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关塔那摩是在违背古巴意愿的情况下占领的）建立一座用于关押阿富汗俘虏的监狱。这些俘虏被怀疑参与了国际恐怖主义行动。在处理这些俘虏的过程中，美国当局提供的条件成为一件国际丑闻。

2002年4月11日

在加拉加斯，发生针对乌戈·查韦斯总统的政变。菲德尔·卡斯特罗

极其关注事态的发展。政变失败，查韦斯于4月14日凌晨恢复总统权力。

2002年5月6日

乔治·布什总统指责古巴进行生化武器研究。

2002年5月12—17日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访问古巴。他在哈瓦那大学会堂发表演讲。古巴电视台进行了直播。

2002年5月21日

乔治·布什总统把古巴纳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

2002年11月11日

美国照管利益办事处新代表詹姆斯·卡森抵达哈瓦那。上任伊始，便紧锣密鼓地进行挑衅和干涉活动。

2003年3月

70多名反革命头目被捕，受到审讯并被判刑。古巴政府指控他们是受美国照管利益办事处的雇用。

2003年3月20日

美国飞机轰炸巴格达，开始伊拉克战争。

2003年4月

一伙人劫持一艘渡轮，力图非法开向美国，后被缉捕、提起诉讼和判刑。其中3人被判死刑。

2003年5月13日

华盛顿驱逐14名古巴外交官。

2003年5月26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参加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内斯托尔·基什内尔总统的就职仪式。在大学，向几万名青年听众发表演讲。

2003年6月

欧盟国家就古巴羁押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枪决3名劫持犯进行报复，决定邀请反古分子及其家属到这些国家驻古使馆参加其国庆招待会。古巴政府冻结了采取上述报复决定的欧洲国家驻哈瓦那的使团，拒绝与这

些欧洲外交官发生接触。

2003年6月14日

古巴当局关闭哈瓦那的西班牙文化中心，因为该中心“煽动欧盟采取制裁古巴的措施”。

2003年6月18日

800多万古巴人联署，要求修改宪法，声明古巴社会主义的“不可更改性”。

2003年6月26日

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投票通过对宪法进行修改的议案，宣布古巴社会主义是“不可更改的”。

2003年9月16日

古巴外交部长费利佩·佩雷斯·罗克揭露说，美国实施的经济封锁已经持续四十年，迄今为止，给古巴造成高达72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2003年9月19日

一位于2003年4月劫持一架客机飞往迈阿密古巴人被佛罗里达一家法院判处20年监禁。这在四十年来还是首次。

2003年9月24—27日

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访问古巴，双方签署12项合作协定。

2003年10月10日

乔治·布什总统在佛罗里达承诺加强对古巴施压，宣布成立“声援自由古巴委员会”，由国务卿科林·鲍威尔领导，旨在“准备岛国的民主过渡”。他还决定“加强对旅游的控制，禁止未经批准的赴古旅游”。2002年23万美国人访问古巴，其中，4万多人采取非法形式，冒着被课以最高数额为25万美元罚款的风险。

2003年10月

由于“米奇”飓风造成严重损失，美国政府批准，在严格限制下，向古巴出售食品和农产品。尽管自1962年以来禁运一直有效，事实上，美

国成为古巴最大的食品和农产品供应商。

2004年1月1日

古巴纪念革命胜利45周年。在不断进行反对美国经济封锁、废除美国的反古移民法律的斗争中，在争取释放5位堪称“古巴共和国英雄”的古巴特工人员——他们在美国被判处长期监禁——的运动中，古巴革命业已成为一场争取普遍提高古巴人的总体文化水平的“思想战”。

2004年1月3日

值古巴革命胜利45周年纪念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卡尔·马克思”剧场发表讲话。他揭露说，美洲自由贸易区是华盛顿所维护的计划，是“对拉丁美洲独立的最终破坏”。

2004年1月21日

1.4亿东正教徒的精神领袖，普世牧首巴托洛梅一世访问古巴。

2004年4月14日

美国HBO有线电视频道播放奥利弗·斯通制作的纪录片《寻找菲德尔》，这是2002年2月播放的纪录片《司令》的第二版，当时，这一电视频道曾拒绝播放这一纪录片，认为它有利于古巴。

2004年4月24日

美国法官杰米·L金判处6名古巴流亡分子20年以上监禁。这6名罪犯于2003年3月19日劫持塔克西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当时，这架飞机刚从古巴青年岛起飞。

2004年4月29日

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指责古巴“与国际恐怖主义保持联系”。

2004年4月

古巴和墨西哥之间发生外交危机。在墨西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投票赞成指责古巴后，菲德尔·卡斯特罗指出，比森特·福克政府屈从美国的利益，已使墨西哥外交政策“灰飞烟灭”。

2004年5月8日

美国政府公布一项计划，要“加快古巴向民主过渡”，限制居住在美

国的古巴人赴古巴旅游，强化经济和贸易封锁，拨款 3600 万美元用于资助古巴国内的反对派组织。

2004 年 5 月 14 日

在哈瓦那，面对成千上万名示威群众，菲德尔·卡斯特罗宣读他的“第一封致乔治·布什书”。

2004 年 5 月 18 日

古巴在哈瓦那召开与流亡在外的温和派领导人会晤的会议。

2004 年 6 月 10 日

古巴当局释放在 2003 年 4 月被判刑的 5 位反对派人士。其他一些人也将获得自由。

2004 年 6 月 21 日

在一次百万群众聚会上，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表讲话，宣读“第二封致乔治·布什信”，并指出，美国对古巴实行新的制裁措施，会造成更严重的移民危机，甚至战争。

2004 年 7 月

美国政府 2 月制定的措施生效。这些措施旨在“不支持古巴政权”。流亡在外的古巴人回国探亲访友被限制在每 3 年一次，每次 14 天，而且仅限于直系亲属；他们可携带的现金由原来的 3000 美元缩减到 300 美元，每日花费由 164 美元减少到 50 美元，行李重量原来没有限制，现在限定为 27 公斤；由美国向古巴汇款的额度每年限制为 1200 美元，而且仅限于直系亲属。此前，通过 130 万流亡或移居美国古巴人捐助和探亲访友方式，由美国流向古巴的资金每年达到 12 亿美元。

2004 年 7 月 17 日

布什总统在佛罗里达发表竞选演说，指责菲德尔·卡斯特罗使古巴成为“性服务旅游的主要港口”。

2004 年 7 月 26 日

在圣克拉拉，值攻打蒙卡达兵营 51 周年纪念日，菲德尔·卡斯特罗把乔治·布什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与酗酒相联系。他是在回答美国总统指责古

巴搞性服务旅游时说这番话的。

2004年8月15日

在委内瑞拉，乌戈·查韦斯总统以 58.25% 的得票率赢得全民公决，巩固了执政地位。根据“希望计划”，1 万多名委内瑞拉青年曾到古巴旅游，作为社会工作者，参加为时 45 天的培训班。回国后，这些青年加入了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阵线，该阵线在全民公决前的选民登记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2004年8月26日

由于巴拿马即将离任的总统米雷娅·莫斯科索决定特赦因图谋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而被判刑的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及其 3 个同谋犯，古巴与巴拿马断绝外交关系。

2004年9月10—13日

为预防最近五十年来强度最大的“伊万”飓风，几十万居民被疏散。菲德尔·卡斯特罗通过电视节目参加公民防灾组织工作。最后“伊万”飓风偏离了古巴岛，仅扫过岛的西部边沿地区，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2004年9月30日

在国家主要的火电站发生事故后，古巴政府采取严厉措施节约电力。关闭 118 家企业和哈瓦那及巴拉德罗 40 家饭店。

2004年10月20日

在圣克拉拉省存放切·格瓦拉遗骨的纪念堂前向公众发表讲话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发生磕拌，摔倒在地，左膝粉碎性骨折，右臂骨折，几分钟后，菲德尔再次出现，坐在椅子上。“为了避免谣言”，他本人宣布自己一只膝盖粉碎性骨折，一条胳膊受伤。

2004年10月26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再次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坐在椅子上，右臂挂在绷带上。他宣布，停止“古巴经济的美元化”。自 11 月 8 日，在岛国，美元退出一切流通领域，包括商业、饭店和其他经营单位。美元被仅在古巴有效的可兑换比索替代。

2004年11月16日

欧盟承认，与古巴的对话破裂“并不是积极的”。

2004年11月23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古巴。双方签署价值5亿多美元的合作协定，包括向古巴采镍业投资、教育和卫生领域贷款，以及古巴从中国进口100万台电视机。

2004年11月25日

在中断接触一年多后，古巴与西班牙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

2004年12月13日

大规模的2004堡垒军事演习在全国进行，投入10万名士兵和几百辆坦克。这次军事演习是在美国不断挑衅和威胁古巴的背景下进行的。

2004年12月14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乌戈·查韦斯在哈瓦那签署一项合作协定，扩大了两国现存的关系。协定规定，取消两国间的进口关税，向对方提供投资便利，委内瑞拉以“每桶27美元的最低价格”向古巴出售石油，委内瑞拉为古巴能源和电力工业筹资。所有这一切都是遵循由委内瑞拉总统倡导的“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精神做出安排的。

2004年12月16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与300多名美国企业家聚会。他们大多是农场主和农业生产者。

2004年12月26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加拿大谢里特一贝波克公司在邻近哈瓦那的北部海域发现一个新油田。油田可开采的半重油储藏量达1亿桶。

2005年1月3日

古巴与欧盟8个国家重新进行官方接触，它们是德国、奥地利、法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荷兰和瑞士。几天后，与欧盟所有国家的关系均实现正常化。

2005年1月13日

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社论版撰稿人尼古拉斯·D. 克里斯托夫指出，“如果美国获得古巴所实现的婴儿死亡率，那么美国每年将多出 2212 名婴儿存活下来。”

2005年1月15日

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尽管 700 多名古巴人在美国服刑已满，但仍处于合法边缘状态，处于无限期在押中，因为古巴不接受遣返他们回岛国。他们仍处在押状态是非法的。这些古巴人大多是于 1980 年经马列尔海运通道抵达佛罗里达海岸的。

2005年3月8日

值国际妇女节之际，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表讲话指出，古巴几乎已解决其“经济脆弱性”，能够保障在 2006 年解决能源缺口问题，将住宅建筑量翻一番，更新火车机车设备和城际间公共交通设备。他还宣布很快将投放 500 万口高压锅。

2005年3月17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由于古巴经济“运行十分良好”，比索升值 7%。

2005年4月2日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梵蒂冈去世。

2005年4月13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指责美国向古巴恐怖主义分子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提供庇护。波萨达因于 1976 年炸毁古巴一架客机造成 73 名乘客死亡而受到指控。

2005年4月14日

在日内瓦，由于美国施加强大压力和进行操纵，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以微弱多数票通过谴责古巴的提案。

2005年4月19日

在梵蒂冈，枢机主教、信理部部长、枢机主教团首领约瑟夫·拉青格当选天主教教皇，称为本笃十六世。

2005年4月21日

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为了节省电力，在古巴不再出售传统的白炽灯泡。他还要求古巴人要有些“耐心”，并宣布将在2006年下半年消除停电现象。

2005年4月28日

乌戈·查韦斯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参加西半球第四届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斗争大会。

2005年5月17日

一百多万古巴人由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在哈瓦那举行游行，谴责布什总统反恐怖主义的双重标准，他庇护杀害古巴平民的罪犯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同一天，美国当局以非法入境为由逮捕了这一恐怖主义分子。

2005年6月29日

在委内瑞拉拉克鲁斯港，菲德尔·卡斯特罗与乌戈·查韦斯总统一道参加关于加勒比石油计划的第一次加勒比政府首脑会议。

2005年7月14日

在加拉加斯，拉丁美洲电视频道南方电视台举行剪彩仪式。这是由委内瑞拉、古巴、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付诸实施的一项合作计划。

2005年7月26日

值攻打蒙卡达兵营52周年纪念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称呼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派为“叛徒和雇佣兵”，宣布美国驻哈瓦那照管利益办事处是反对派团伙的主要唆使者，其活动为“挑衅性的”。

2005年7月28日

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任命凯莱布·麦卡里为首任“古巴过渡协调员”，目的是“加快结束岛国的暴政”。

2005年8月9日

美国亚特兰大一家法院下令对5名古巴人（赫拉尔多·埃尔南德斯、费尔南多·冈萨雷斯、拉蒙·拉瓦尼诺、雷内·冈萨雷斯和安东尼奥·格雷罗）

的案件重新进行审理。他们于 2001 年因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被判处长期监禁。菲德尔·卡斯特罗认为这一决定是要求释放 5 名古巴人的斗争的一种“法理胜利”。

2005 年 8 月 20 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乌戈·查韦斯与拉美和加勒比其他国家首脑一道在哈瓦那卡尔·马克思剧场主持拉美医学院 1610 名学生的毕业典礼。该校成立于 1998 年。来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28 个国家的 1 万多名青年在该校免费学习。

2005 年 8 月 20 日

在马丁·托里霍斯总统访问哈瓦那期间，古巴与巴拿马恢复了外交关系。

2005 年 9 月 3 日

在“卡特丽娜”飓风在新奥尔良和路易斯安那州对当地居民造成灾难后，菲德尔·卡斯特罗表示向美国提供帮助，派遣 1100 名紧急救援专业医生。美国政府未对古巴的表示做出答复。

2005 年 9 月 15 日

詹姆斯·卡森结束美国驻哈瓦那照管利益办事处主任任期，由外交官迈克尔·帕穆里接任。

2005 年 9 月 28 日

美国司法机构决定，考虑到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有可能在委内瑞拉或古巴受到虐待，决定不将其遣回这两个国家。波萨达今年 77 岁，原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曾因 1976 年炸毁古巴一架客机、造成机上 73 人遇难而被捕，后于 1985 年，在受到审判前从委内瑞拉监狱逃脱，并非法进入美国。

2005 年 10 月 14—15 日

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召开。菲德尔·卡斯特罗未与会。参加该会的各国首脑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要求美国当局为审判恐怖主义者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提供便利。

2005年10月15日

在哈瓦那，作为反腐败运动的组成部分，青年社会工作者们对该市的汽油加油站进行监察。

2005年10月24日

“威尔玛”飓风在哈瓦那造成严重水灾。

2005年10月28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一次讲话中批判“新富们”，并发动一场运动，整治非法致富、一些领导干部的“谋私行为”、腐败和盗窃行为。

2005年11月4—5日

在阿根廷马德普拉塔市召开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未通过乔治·布什总统提出的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布什总统的建议旨在巩固美国在西半球的经济霸权。

2005年11月7日

2002年人口普查的结果予以公布，当年古巴人口达到11177743人。

2005年11月8日

联合国连续第14次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182个国家对该提案投了赞成票，仅4个国家投反对票，他们是美国、以色列、马绍尔和帕劳。

2005年11月17日

在一次长达5个小时的讲话中，菲德尔·卡斯特罗指出，腐败和普遍的盗窃国家财产置革命于危险境地。他宣布展开一场反对腐败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2005年11月23日

来古巴的游客数目达到200万人，接近于2005年的计划目标。创历史最高水平。

2005年12月7日

在“斯坦”飓风于10月结束后，在危地马拉高原农民生活区提供援助的古巴“亨利·里夫”抗灾服务队医疗队返回古巴。

2005年12月8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参加在巴巴多斯乔治敦举行的古巴—加勒比共同体第二次国家首脑会议。

2005年12月12日

古巴与美国的弗吉尼亚州签署向古巴销售农产品和食品的协定。根据该协定，在今后18个月中，该州向古巴出售总额为3000万美元的农产品和食品。

2005年12月14日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不允许古巴国家棒球队进入美国参加世界棒球比赛。在强烈的国际抗议下，该项决定被迫更改。

2005年12月16日

在哈瓦那，在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席下，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游击队与阿尔瓦罗·乌里韦政府的代表进行“和平对话”。

2005年12月18日

在玻利维亚拉巴斯，争取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埃沃·莫拉莱斯当选总统。

2005年12月20日

美国驻哈瓦那照管利益办事处刚就职的主任迈克尔·帕穆里与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及其声明是“挑衅性和无耻的”，这是古巴电台和电视台转播的常规性节目圆桌论坛做出的评判。

2005年12月30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以国宾待遇欢迎玻利维亚当选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双方签署了重要合作协定。

2005年12月31日

古巴当局根据政府的估计数字宣布，2005年实现11.8%的经济增长率，其中包括社会服务部门的产值。这是岛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四十六年来所实现的最高经济增长率。根据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提议，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宣布2006年为“古巴能源革命年”，以示关注国家正在实施的彻底解决电力生产能力存在缺口问题以及节约能源的计划。

致 谢

我知道事先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也没有扎实的文献依托就发表同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统先生马拉松式的会谈纪要并不十分专业。距离决定撰写此书以及与总统先生开始会谈已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我经常与众多朋友促膝畅谈，集思广益，他们熟悉古巴现状，在交谈中已渐渐明确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疑惑和那些无法回避的问题。书中多有瑕疵谬误，我愿为此负责，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若读者认为书中所列问题属实，这也得益于朋友们的热切帮助和关怀：沃尔特·阿奇加尔，吉塞拉·阿兰迪亚，马克西米利恩·阿尔贝拉斯，布鲁内拉·卡萨特本，埃尔南多·卡尔沃·奥斯皮纳，伯纳德·卡森，拉蒙·查奥，豪尔赫·邓蒂，维克多·德·拉富恩特，卡洛斯·嘉贝蒂，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奥马尔·冈萨雷斯，阿兰·格瑞斯，阿尔弗雷多·格瓦拉，弗朗西斯哥·加拉乌塔，莫里斯·勒蒙纳，里戈韦托·洛佩兹，詹尼·米娜，阿尔弗雷多·尚戈·穆尼奥斯，弗朗西斯·皮萨尼，米歇尔·波尔奇隆，埃米尔·萨德，雨果·西格曼，苏珊娜·特索罗，豪尔赫·提莫斯，米格尔·托雷斯，马努埃尔·巴斯克·斯蒙塔尔班，奥拉西奥·贝尔比斯凯，毛里西奥·文森特以及何塞·齐纳。在此一并至诚谢意！

我还想感谢那些热心的朋友们，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严谨悉心，才促成了这些珍贵的谈话纪要。首先，我要感谢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塔

皮奥先生，这位历史学家所著的《菲德尔新版回忆录》对本书的创作举足轻重，他为人谦逊，细心审阅手稿，总能在最需要时为我提供最详实的资料（姓名，日期，地址，事件），使我少走弯路。其次，我要感谢卡斯特罗总统的个人助理卡洛斯·巴伦赛尔加先生，他年轻有为，极富朝气，才思敏捷，办事高效。再者，我要感谢卡门·罗莎·贝兹女士，她热情机智，在本书成稿伊始给予了我十分热切的关心与帮助。最后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本部作品的朋友们！

当然，我不能忘记鼎力相助的编辑克里斯托·巴尔佩拉先生，至始至终给予我最热忱的关怀与支持，勉励我在困境中坚持创作。

同时，我想感谢我的爱妻劳伦斯和可爱的孩子们，奥菲利亚和弗拉维恩，由于创作需要，我经常不能归家陪伴，他们也必须接受我长时间对着电脑工作，但是他们一直认为这位如此热爱他们的丈夫和父亲是值得等待的，因此对我极为耐心，让我得以精心从容工作，在此表示我最真诚的歉意。

最后，我要将最崇高的敬谢致以尊贵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先生，总统先生精力充沛，平易近人，乐观豁达，总是在他满满的行程档期中抽出时间，在我需要时，慷慨相助，耐心解惑，至此致以我最为诚挚的谢意，感谢！

菲德尔·卡斯特罗 访谈传记

我的一生

卡斯特罗是“所有我们这些革命者之父”。

——前委内瑞拉总统 乌戈·拉斐尔·查韦斯

我只不过是历史上的一声叹息，我永远记得“尘归尘，土归土”，将来不会有多少人记得我。

——菲德尔·卡斯特罗

他是国际政治中最后一个“神圣人物”。

能幸运地在有生之年成为历史人物和传说人物的人并不多，菲德尔是其中之一。

199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了一份长达705页的档案。根据解密档案和古巴安全部门统计，卡斯特罗曾遭受到六百余次之多暗杀，无一成功。他为此幽默地说：“如果奥运会有遭受暗杀次数这一项，我是绝对的冠军。”



Sinoread
创造悦读生活

上架建议：传记·畅销书

ISBN 978-7-5125-0828-6



定价：98.00元